

【文史资料百部经典文库】

我所知道的伪蒙疆政权

WOSUOZHIDAODE
WEIMENGJIANGZHENGQUAN

全国政协文史和学习委员会 编

中国文史出版社

日本帝国主义自1933年开始，先后操纵了“晋北自治政府”“察南自治政府”“蒙古联盟自治政府”的出笼，后将三个伪政权合流，模仿伪满洲国炮制了“蒙疆联合自治政府”。1945年，随着抗日战争的胜利，该政权灰飞烟灭。

本书收录了德穆楚克栋鲁普亲王、李守信等伪蒙疆政权首脑人物的自述，以及各行业人物的亲身回忆，详述了伪蒙疆政权的始末经过及形形色色的情状，揭露了日本帝国主义以这一傀儡政权为工具，奴役掠夺中国蒙疆地区的斑斑劣行。




ISBN 978-7-5034-8760-6

9 787503 487606 >

中国文史出版社官方微网

定价：65.00元

我所知道的 | WOSUOZHIDAODE WEIMENGJIANGZHENGQUAN

伪蒙疆政权

中国文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我所知道的伪蒙疆政权/钟文编．—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16.11
（文史资料百部经典文库）
ISBN 978－7－5034－8760－6

Ⅰ.①我… Ⅱ.①钟… Ⅲ.①伪蒙疆联合自治政府（1939）—史料
Ⅳ.①K265.6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020728 号

责任编辑： 张蕊燕　胡福星

出版发行：**中国文史出版社**
网　　址：www.chinawenshi.net
社　　址：北京市西城区太平桥大街 23 号　　邮编：100811
电　　话：010－66173572　66168268　66192736（发行部）
传　　真：010－66192703
印　　装：北京新华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16 开
印　　张：26.75　　　字数：383 千字
版　　次：2017 年 4 月北京第 1 版
印　　次：2017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65.00 元

文史版图书，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文史版图书，印装错误可与发行部联系退换。

CONTENTS 目 录

目 录 CONTENTS



第1章 | 蒙疆地区各色伪政权

继伪满洲国后的“蒙古自治邦”本末

楚明善*

余滥竽南京政权的蒙藏委员会，垂二十年，虽后半期担任委员，职司政务决策，因我仍兼管蒙务，故事务亦必躬亲。尤其若蒙古自治邦的重大问题，更系我分内事，责无旁贷。因而对于该问题的经过、处理等一切实际情形，均系亲身所历，记忆犹新。兹愿将这一事件的本末据实写出，以备留心民族问题者之参考。间有疏漏处，还望阅者补正。

一、蒙古族要求自治的经过

原来“蒙古自治邦”之产生，是基于蒙古地方自治政务委员会。蒙古地方自治政务委员会，是蒙古官民要求高度自治运动所得到的一种不满意的成果。故一并叙及，以明原委。

1913年，北洋政府把内蒙古东西六盟改成热、察、绥三特别区；1928年，南京政府又进一步把三特别区改为热、察、绥三省，三省人民不分蒙汉均归省府统辖；1930年蒙古会议决议，经转请核准，又承认“蒙古盟旗

---

* 作者曾在国民党蒙藏委员会工作。

管辖治理权一切照旧”。于是省县与盟旗重复设置，蒙汉人地双层管辖，这是蒙与汉冲突、省县与盟旗纠纷的根源。也是蒙民所日夜不安，急欲摆脱省县羁勒，于1933年8月内蒙古两盟发动的自治要求通电之所由来。

按当时的客观形势看：外蒙古独立，内蒙古自易受感染；东蒙沦陷，西蒙亦难免动摇；王公则栗栗自危，青年则走投无路，再加上日本浪人军阀的威胁利诱，自然会惹起全蒙官民自救的打算；因而很容易首先把久已厌恶的省县枷锁来设法摆脱。所以蒙古的自治要求最突出的一项，即摆脱省县的管辖。不过客观形势虽然这样复杂，而一种重大的运动还须有人适当地领导方容易成为事实。但具这种愿望的人虽多，而实际发动的人，也可以说别有用心利用这种形势的人，只有两个。

一个是以“王公派”出头的吴鹤龄。这个人颇具聪明，手段敏捷，因痛恨省治，而地方民族主义特别显露，但他也不赞成王公制度。所以他愿保存盟旗制度以反对省治，而又要在盟旗内设置各种民选的代表会议，以限制王公的滥用职权。结果他在当时对于新旧两方面，均得不到好感。然就当时说，他自蒙古会议一直至蒙古地方政务委员会成立，始终是坚持蒙古自治，很像是一个热爱民族、觉醒较早的人。谁知他是别有怀抱，利用大众要求自治愿望的客观形势，发纵指使，助纣为虐，终酿成拍卖祖国与民族的勾当呢?

一个是锡盟副盟长德穆楚克栋鲁普（简称德王）。他凭借霍硕都因楞亲王的爵位，很为一般蒙民所尊重，而他又有一种接近和利用青年的手段，故东西盟之一般青年多归之。所以到了百灵庙一声号召，群王景从，即与他素不和谐的白云梯亦愿合作，久相反对的吴鹤龄且依为心腹。不过野心甚大，气量欠宏，且不识大体。后来竟中了日人诱惑，而成了出卖祖国和民族的罪人。

吴鹤龄与德王这两个人，虽地位不同，性情各别，唯对于利用形势出卖祖国的勾当，则沆瀣一气。吴在1930年蒙古会议结束后，时时酝酿提倡“蒙古自治”；德王自1932年冬向南京贡献意见，未蒙采纳，愤而离京后，因而决心提倡“蒙人治蒙”。他两人意见原不相合，唯主张“自治”

一端大体相同，所以吴在内部鼓吹，德王在外边响应，一拍即合。这一主张也迎合一般蒙古人的口味，故大家也跟着摇旗呐喊，于是百灵庙“蒙古自治运动大会”于1933年8月14日开幕。

南京政权对于蒙古情形，除了蒙委会尚略知梗概外，其他机构不是忽视，便是隔膜。平时既少留心，临时难免张皇。又以蒙藏会委员长石青阳系蒋政权之敌对人物，不肯委心任事，而临时把内政部长黄绍竑派来应急。又以职掌关系，加派蒙藏会副委员长赵丕廉襄同办理，已是安排不当，难免处理乖张。当时我虽职兼蒙务，而适卧病在床，石青阳屡差秘书征询意见，我虽粗陈省旗分治方案，然因石的关系，亦未能及时提出。终于在10月17日派黄绍竑赴蒙古巡视的命令发表。经黄、赵于11月10日到百灵庙与云王、德王等几经商谈，最后于1934年2月18日核准蒙古自治办法原则八项，于3月7日遂任命云端旺楚克为蒙古地方自治政务委员会委员长，索诺木喇布坦、沙克多尔扎布为副委员长、德穆楚克栋鲁普等21人为委员，德王兼该会秘书长，隐操该会实权。一场民族自治斗争的风波总算暂时告一段落。然其以后以蒙古地方政务委员会为基础，由德王及吴鹤龄操纵，竟超越民族自治斗争的范围，演为出卖民族甘做日寇傀儡——“蒙古自治邦”的勾当。这是出乎蒙古官民一般之所料，也不是蒙古官民当初要求地方自治之本心。

二、“蒙古自治邦”的产生

蒙古地方自治政务委员会从正式批准成立后，这一年中除了盟旗与省县因疆域重复而涉及税收问题稍有摩擦外，主要的就是应付日本金井章二屡次的诱惑与威胁，教它脱离南京而投靠日本成立蒙古自治邦。这时云王、索王及沙王正副委员长等，以年老且对自治无兴趣，均未到会办公，只有具有野心的德王以秘书长代行委员长职务。然以日军西侵已及锡盟东部，德王又惧其蒙旗不保，而又对省方及南京抗日力量无信心，故心中彷

徨，十分动摇。在他决定东下投敌之前，蒙委会已派处长巴文竣到绥远，商同省方对乌兰察布、伊克昭两盟王公，加意联络，使不要盲从德王。后来听说中国共产党方面亦由乌兰夫对德王左右的爱国青年及卫队做工作，极力劝他们脱离德王，以减少他卖身投靠的资本。果然德王到了1936年春随金井章二毅然东去，到加卜寺则宣告降日。于是南京就把乌、伊两盟成立乌伊两盟地方自治政务委员会，蒙古青年成立蒙古保安大队，以孤立德王。

德王随金井到察南加卜寺后，即筹备降日，改加卜寺为德化，废中历实行成历（成吉思汗纪元），于1936年5月12日宣告成立“蒙古军政府”，自为“总司令”。9月4日日寇又催促成立“察南自治政府”于张家口，汉奸于品卿为“主席”。10月15日又成立“晋北自治政府”于大同，汉奸夏恭为“主席”。10月27日“蒙古军政府”改“联盟自治政府”，成立于归绥。云王为“主席”，德王为“副主席”。实际上云王只是一名义主席，并未亲身参加。11月22日经金井章二、前岛升、高太一也之怂恿，联合三“自治政府”合组为“蒙疆联合自治委员会”，一般人通称为“蒙古自治邦”，德王为“主席”，于品卿、夏恭为“副主席”。于是乌、伊、锡、察及新改之巴彦塔拉五盟，连察南十县、晋北十三县均为“蒙疆”区域。其内部组织，最高为“主席”，次为“总司令部”“参议府”与“政务院”。院下为各部，可是最高顾问与主席平等，其实主席的职权，完全为最高顾问所支配。日寇对于中国境内的伪组织，如“满洲国”“中华民国临时政府”都是这种办法，不过对蒙古尤为显著。

三、德王等降敌后的动摇

德王于1936年降日的一年中，从“蒙古军政府总司令”，而为“蒙疆联盟政府”的实际“主席”，再进而为察南晋北和蒙古五盟部广大区域的傀儡皇帝，总算是野心得逞，如愿以偿了。其实他降日后因日寇的侮辱压

迫所受的痛苦，并不是外人所知道的。在受日本浪人一切玩弄的中间，他亦感到十分不耐。在1936年的秋天，他已经派人到南京诉苦，愿归依祖国怀抱。我当即奉派赴察绥考察情形，并征询省府意见。绥远省府完全同意他的归来，傅作义先生说："我的反对德王，不是反对他本人，是反对他投敌；他如若肯回归祖国，我愿把绥远主席让他，甚至为他牵马坠镫也甘心。"

察省府呢？宋哲元说："中央有无抗战决心，如有，我一个电报德王就可回来；如无，回来有什么保障。"

这察绥两省府的意见，绥方比较表示切实；察方认识未免浮夸。我认为其反正，总是与国家有益，当电准南京，会同北平军分会留守严庄，与德王的代表丁我愚等，商妥来归办法：

（一）中央派兵两师到贝子庙作他的声援；

（二）他通电撤销自治；

（三）成立察境蒙古地方自治政务委员会，以德王为委员长，自1934年起经费照发；

（四）所有已编军队暂免调遣，俟胜利后再酌编。

以上各种办法，已商有成议，忽接南京电："以军事整个计划无进展时，暂勿令来归。"这事遂一时作罢。德王当时做傀儡的苦境，已可想见。

四、傀儡政权的瓦解

1945年8月，日本失败退却，把一些傀儡当然遗弃不顾，德王也不例外。在苏联出军东北解决日本关东军时，蒙古人民共和国亦出兵南下直抵察境。德王一班人走投无路，只有回到祖国或者尚有生路。于是他同他的"总司令"李守信，"政务院长"吴鹤龄，"参谋长"乌古廷等同来到北平雍和宫暂避。那时北平市长熊斌据报转电重庆，当令他们到重庆悔过。

到重庆后，由蒙藏委员会拟定安置办法：令德王仍回北平，公家拨房屋居住，并按月发给生活费；其随行重要人员组织一个蒙古宣导团，给资回蒙宣抚；令北平市长就近察看。这就是德王附逆的下场，也就是“蒙古自治邦”的结束。

五、死灰欲燃的尾声

德王及其重要干部被安置在北平后，迨1948年10月东北人民解放军接连解放长春、锦州及沈阳，威震关内，北平亦岌岌不保。德王等做贼心虚，深惧人民难以见容，相率潜逃，一面利用其巴林骑兵残部，集中阿拉善和硕特旗，并一面向逃往广州的国民政府求救，以求死灰复燃。但当时广州的行政院长为素不满意德王的阎锡山，故他们向广州跑了一趟，只得到一毫无实际的虚名义。待彼等自广州回，正解放军进兵察绥，西北渐归统一。德王等看情势危急，其内部意见极不一致：以德王为首的顽固派，主张反人民到底，如势力不敌时则暂逃沙漠躲避，静待时机；以达王为首的先进派，主张与解放军联络，以求地方安定。结果两派分立，德王等北走蒙古共和国与内蒙古交界处，被蒙古人民共和国军队包围缴械，德王及其“总司令”李守信等做了俘虏。达王等派代表向中央投诚起义，被中央特别优待。此即德王等在“蒙古自治邦”失败后不甘雌伏又一次铤而走险的失败余波。

（1962年6月22日）

内蒙古伪自治军前身崔兴武旅与乌古廷总队简述

唐精武*

在抗日战争中，蒙伪军李守信部盘踞内蒙古地区，为敌作伥，臭名远扬，人所唾骂。这部伪军，是日寇和伪满部队进攻热河时，东北边防军热河驻军汤玉麟部放弃热河时所遗留下的变节的一部分余孽———东北陆军骑兵第十七旅崔兴武部，与后来加入的热河陆军蒙古骑兵教导总队乌古廷部等辗转扩大而成的。当他们尚未降敌前，都属于汤部，笔者时充汤军参谋，以担任点验，曾有机会与之接触，现将他们以前的情形，就我个人见闻所知，尽回忆所及的举以叙述，借供史料研究的参考。其遗漏错误之处，以及降敌后的蒙伪军的情形，则希望知者加以修正和补充。

一

崔兴武是东北陆军骑兵第十七旅的创始人，是这个旅第一任也是末一

* 作者系汤玉麟旧部。

任的旅长。他同这个旅的历史是分不开的，所以就由他开始叙述。

崔兴武，也以“星五”“新五”等作为名号互用，奉天（辽宁）省彰武县人。据他说，是幼因家贫，即跟随贩卖马匹的马贩子做小伙计，借以谋生，遂得学会养马、骑马、选马、套马及调教走马的一些技能，所以后来成了有名的骑手。因为贩马往来于内蒙古各旗的荒漠草地日久，又结识了不少的绿林朋友，后来他便不给人家当伙计了，已经成为一个空手倒把的马贩光棍，于是也就习于吃喝嫖赌，无所不为，终以债务口角，殴伤人命，遂逃而为匪，又得练习射击，枪法很准。在清朝末年，清政府派昆源（叔泉，满族）为马政大臣，驻北口察绥一带，改良马政。崔又投在昆源标下为骑师，颇为昆源所喜。后昆源调任热河都统，崔也随至热河，在游击马队为官，从此即在热河军中，历充哨官、管带、营长、团长等职。约在1925年间，率队往东北投归张作霖，辗转编为东北陆军骑兵第十七旅，任崔为旅长。又于1926年春，张作霖命该旅编入镇威第十二军，归军长汤玉麟统率，随军西进，攻略热河，汤就任热河都统后，该旅很长一段时间，驻防在赤峰、乌丹一带。

崔兴武旅虽也是热河旧部队，但是已经编为东北正规军，后拨归汤部。崔本东三省籍，又是与汤物类相投的光棍土匪出身，一般习性也多有与汤相同之处。崔对外也比较活动，肯用面子钱，会作人情，尤其是对于枪马，崔更能投其所好，不但是不吝馈赠，还能陪同赏玩。论射击的精确，可以与汤列为伯仲；若论骑控快马，却是崔的拿手，转较汤要多好几招。每逢崔到省城，汤的一些上选好马，汤必要逐一经崔骑过，加以规整，故往来颇不冷淡。而崔的驻省办事的该旅军需主任李伟臣，也会看风使舵，择要应酬，因此在最初一个相当久的时间，崔与汤及汤部要人之间，却也相处尚好。只不过是猜忌成性的汤玉麟，对于崔兴武这样的人，他内心中是总有些顾虑的。

笔者与崔兴武的参谋长陈宝泉相处颇好，由陈的闲谈中，也常听到一些有关崔的性格与轶事。崔也是个极端个人英雄主义者。他同汤玉麟一样，骄妄自恃，刚愎自用。他虽仅是个独立旅的旅长，可是野心极大。他

很崇拜张作霖，认为张是个知人善任、推诚相见的最理想的长官。他也自命不凡以为是未逢知遇，所以不得其时，只有投靠张作霖，才可以大展怀抱。果然在投张之后，即得编为旅长，满想直接受张指挥，遇机出力报效，何愁功名富贵。不料又编入汤玉麟属下，实非所愿，但又不能违抗，因而转思汤是张的嫡系亲信，若能在汤处干出功绩，借汤之力，仍然可以扶摇直上，际会风云。于是他又将升大官、掌大权的一半希望寄托在汤玉麟的身上，其余的一半的希望当然还是指望张作霖。因此，他在随汤入热后的一个很长时期，极力与汤周旋。这时崔也居官很久，搜刮的资财已不在少数，又善于经营马匹，故早已拥有许多庄田马群，更因擅长选教马匹，他也饲有相当多的骏良快马，颇为豪富。他虽然仍是贪婪无厌，但在必要时，他肯以适当的余资用作政治本钱。他把这种以小饵钓大鱼的有利可图的交易早就盘算好了，所以他对于汤及汤部要人，都能做到必需而适可的应酬，保持了相安的局面。

崔的性情古怪，脾气暴躁，喜怒无常。在他的势力范围以内，更是作威作福，唯我独尊。他在汤玉麟的挟制下，虽然还不敢干涉行政，但是在他防区内的县长、局长们，都慑于他的淫威，无不诚恐诚惶地去趋承他，全怕吃到眼前亏。打麻将牌本是消遣取乐，他却非常认真，只要三把不和牌便会使性发恼，摔牌骂骰子，闹得全座不安，所以他部下的高级人员，都怕同他打牌。在他牌兴发作时，副官们只有去找县长局长们，或是当地的耆绅巨商们来陪同作耍。他们是拒之不敢，只有自认倒霉，输钱忍气。但也有些人，却是甘心乐意，求之不得，正要借此接近他，讨好他，花几个有限的金钱，让他赢，叫他乐，哄得他欢天喜地，情感融洽，就得以从而利用，遇机会，仗他的势力，借他的一言，或是夤缘升官晋级，或是赖以巩固地位，或是便利办事。

崔又是个猜疑而又凶狠毒辣的人。笔者曾以崔未带家小，在闲话时问询陈宝泉。据陈谈，崔性喜骑猎，日与狗马为伍，故并不爱好女色。他原曾有妻有女，平日夫妻感情本就不太好，后来不知怎样他发觉了他的女儿同他的亲随某副官很有感情，就疑心他们是私相恋爱，以为这是败坏他的

门风，丢他的脸面，就盛气逼问其妻。其妻本来就怕他，一经怒急逼问，竟自张口结舌，不知所答。某副官闻风畏惧而逃，崔更认为这是母女通同一气，甚至以为他妻也不自贞。当时他却未动声色，故为镇静。不久，他就佯言要率队出发，将家眷送往庄园暂住，他又密派亲信，追至中途荒郊，将他妻女一并枪杀，就地掩埋。从此崔即独身，更无子女。凡在崔部稍久者，多知此事。举此即可以说明崔的猜疑狠毒，对于自己妻女尚且如此，别人更不足论了。

骑马打猎，是崔日常生活中的主要课程，因此他不但拥有许多的好马，还养着一二十只蒙古猎犬，平常关在圈里，有三五名专人饲养，打猎时才放出来。据崔谈，他如果两三天不去骑马打猎，不但他自己觉着不舒服，马也急得咆哮，狗也闷得乱叫。他打猎，不但可以用得来的山珍野味供他享受，而且还积存了不少高贵的皮毛，这无形中又是个生财之道。笔者原曾在林西驻过防，有一家很熟识的做皮货土产生意的商店。某次余率领一个组点验崔旅，又到林西，一日下午无事，偶然在住所附近散步，顺便到这商店询购土产蘑菇，被他们让在里边待茶。正在闲谈，有人说崔司令又打猎回来了。过了一会，果然崔带着二三十人马，蜂拥过市。等他过去之后，笔者觉得很奇怪，为什么他们会预先知道崔打猎回来，而又是必然从这经过呢？不觉地就要问问他们。原来，是崔的一群猎犬看见吃食尤其是肉类就会当作猎物，争着叼走，或是吃掉，剩下的也会弄脏，无法再卖，有时还会碰坏摔破家具，甚至还会咬伤人，既没人敢来轰打猎犬，也不敢去讨赔偿，他们就只有早作提防，看到崔出去打猎，或是回来，卖小零吃食的挑担子的赶快挑到别处去躲，摆摊或是开小铺的就赶紧收拾。因此只要这种情形，在早晨就可以知道是他去打猎，在下午就知道是打猎回来。这仅是一件极通常的事，却给商民们带来一阵小灾害的恐怖和惊扰。而他毫不在意。联系到其他方面，如军队对于百姓的滋扰，更将是不堪设想。

崔的野心极大，自命不凡，所以在无事时，就从幕僚们学习读书写字，久而久之，就有些人恭维他，不是说他“得天独厚”，就是说他宿有慧根，所以书读得极快，字写得很好。他自认为真是“了不起”了，从此

又时常喜欢写字送人。他曾给笔者写过一副对联，此物虽早遗失，辞句却还记得是“英雄事业三尺剑，大将功名十万蹄”。除掉充满了杀气腾腾的极端个人英雄主义的意味而外，实在谈不到什么书法笔姿。这却可以说明他穷兵黩武的思想。

这样一个穷兵黩武的小军阀，其野心又大，当然是唯恐天下不乱，好利用战乱来扩充势力，提高地位。他在汤玉麟入热后，第一次进军沽源与西北军作战时没有使用他的部队，已经感觉有些不耐烦。不久战事结束，谁也没有发展，并且看到汤将刘山胜的部队一再缩编，对他却毫无挑剔，也就平静下来。第二次汤玉麟进军北平，转战晋北时，原编在镇威第十二军的部队，单独将他这一旅划为留守部队，归代理热河都统孟昭田节制调遣，他又非常不满，以为这样好的机会，却使他向隅，这是阻塞他升官发财的道路。后来汤有电报给他，说是省防空虚，后方重要，嘱他协助孟昭田，竭力维护地方治安。经这一来，他又以为汤是异倚方殷，反而转怒为喜，生出许多幻想来。听说他与刘山胜虽是多年热军同事，不但无甚情感，且曾因权利地位冲突颇有成见。他这次留守热河，驻防赤峰一带，与刘山胜部驻地林西等处，正是洽接；由于汤的电嘱，他更伺机邀功，对于刘部动态，尤为注意。故当刘山胜之侄刘汉杰，因恨汤之屡加宰割，开始准备倒汤反汤之初，即被崔侦知，随时密电告汤，汤遂电令崔率队就近讨平。崔以为这是他既可扩充实力、又得升高官位的绝好机会，所以不顾一切，举其全力，孤注一掷地猛扑刘部。事后据陈宝泉谈，当时若不是刘汉杰利令智昏，又加之众叛亲离，倘抽派精锐骑兵一营，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间道急袭乌丹，猛击崔旅之后背，则崔部必至崩溃而一败涂地。崔既击破刘部，自以为立下莫大之功，必得升赏，最低限也可以坐升刘山胜所遗的赤林镇守使职，而再编充其部队。此时汤已撤军回至承德，崔遂先将刘汉杰解送省城。献俘报捷之后，他又满怀着希望亲来见汤，颇为活跃，结果汤仅以刘部秦旅尹宝山团拨归崔部。并收容刘汉杰团的残余用以补充，而扩充为三团制的甲种旅，即接驻刘部防地，并以一团驻防开鲁，赤峰则另由石文华旅驻防，赤林镇守使职撤销。在汤认为对崔的酬庸懋赏已很不

薄，而崔则大失所望，败兴而归。

时值1928年春夏之间，崔开始对汤发生怨尤，起了离心。随后张作霖又被炸身死，使他更感到前途毫无保障，内心非常苦闷，对汤也就不像以前那样肯于应酬，于是就借口驻地穹远，防务重要为由，自此时起，以至汤放弃热河为止，从未亲来省城再与汤晤。他驻省办事的军需主任李伟臣，也不常在省活动，对汤及汤部要人，仅保持若即若离的状态。

至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汤以崔旅守备开鲁，崔遂进驻开鲁县。在他的文电中看到，对于抗敌备战，表示得非常坚决，大概他又幻想要借守土抗战的幌子，来达到他升官扩军的心愿，企图名利双收，再看势做事。那时抗敌后援会对他颇为期望和鼓励，曾不断派人前去慰劳。他也时常有些真假莫辨的与敌寇发生小战的情报。当时曾传说张学良曾嘱汤玉麟，将崔旅扩升为一个骑兵军，但迟迟终不发表，想是汤玉麟嫉而不与。后在1932年2月间，日寇大举进攻热河时，他竟背叛祖国民族，首先率部觍颜降敌，反戈自残。

崔旅降敌后，即已不知其情况，及至汤军放弃热河撤到察省沽源县时，方知多伦方面的伪军即系降敌的崔旅，但它的伪司令已是李守信，而不是崔兴武。当时这部伪军，还是属于热河伪军大汉奸张海鹏指挥下的一个纵队。至于怎样由李守信代替了崔兴武，崔的结局如何，以及这部伪军的编制实力等等，却都无从得知了。

崔旅在未降敌前的部队情形，概略叙述如下：

旅参谋长陈宝泉，号蕴山，河北人，保定军官学校第八期炮兵科毕业，分发热河军队见习，辗转在游击马队中服役，遂与崔兴武共事，由下级军官、团附参谋、参谋主任以至参谋长。此人书生气很深，爱读古典文字，喜诵词曲，对于《西厢记》尤其烂熟，信口念来，绝无一误。这是由于在军中无可作为，借此排遣苦闷，非真有闲情逸致。跟随崔作幕僚，实无异“高等文书马弁”。因他还诚恳，遇事无所争执，而又谈笑自若，颇能同流合污，故不为崔等所嫉。日久也不免融为一体，为环境所屈服，作利禄的俘虏，丧失本性，成为小军阀的工具。

旅副官长刘润齐，对其历史不详。闻他是在崔旅投归张作霖后，改编时编余的团长转任副官长。他与崔及团长孙凤阁是结盟兄弟，称为崔的死党，故系崔的得力助手。

该旅原只两个骑兵团，每团三营，每营四连，每连三排。

团长孙凤阁，名号一致，奉天（辽宁人），系土匪出身，右目失明，用左眼瞄准，左手射击，而枪法精确（有人称他是热军中第三神枪手，盖指汤为第一，崔为第二）。因他性情粗暴，为人鲁莽，被呼为孙二虎，遂成为绰号。早年投降毅军，辗转在热河游击马队为官，由哨官、管带、营长以至团长，与崔为结盟弟兄，拥有相当资产，吃喝嫖赌，无所不好，鸦片烟瘾很深。

团长李守信，号子忠，热河内蒙古人，也是土匪出身，体格高大，生性强悍，实一典型的亡命徒，好胜斗狠，粗鲁而喜阿谀，最易受人利用。外貌颇纯厚，对财物似不甚吝惜，故在匪伙或军中，有好交之称，实则正其欺世盗名之术。据尹宝山谈，在李为匪时，尹还充下级军官，两人即相交好。经尹力劝，李遂投降毅军，辗转在热河游击马队为官，由哨官、营长以至团长，已亦颇有资产。为官后，尤好女色，慕虚荣，爱浮华。对于所谓汽车洋楼姨太太，特感兴趣，只是那时还受制于崔，不能畅遂所欲。故在当时，他除仅有妻妾数人，并在外间暗嫖外，至于洋楼汽车，暂时还只是一种希望。但并非财力不足，乃是对崔有所顾忌。即此足以说明，他也是个贪婪腐化，而又极端热衷功名富贵的昏庸分子，谈不上什么思想，更讲不到什么气节。陈宝泉曾充他的团附，故私交很厚，后来刘部秦旅的团长尹宝山又增拨到崔旅，他三人遂互相声援，结成一气。陈又是个谋士，这对于崔旅投降敌寇后的以李代崔，恐有很大作用。

该旅在1928年秋击破刘山胜部之后，得扩充为三团制的甲种旅，拨来尹宝山团。团长尹宝山，号宗五，热河平泉县人，热河增编常备军时即入伍当兵，由头目而排长、连长。1925年春，由热河陆军第一混成旅刘山胜部步兵第一团冯志珂部营长，改编为东北陆军第三师阚朝玺部步兵第四十旅刘山胜部第九十四团冯志珂部营长，是年冬阚军回师援奉（郭松龄事

变），刘山胜及原混成旅部队多自动留热未随。刘又扩编时，尹改编为热河陆军第一路总司令刘山胜部、热河陆军第一混成旅冯志珂部第二混成团刘汉杰部步兵营长，后又拨编为第一混成旅冯志珂部步兵团窦连玺部第三营营长。约在1927年夏，随步兵团调归镇威第十二军汤玉麟部直接指挥，开往晋北作战。因作战出力，约在1928年夏，经汤玉麟派升，接任赤林镇守使刘山胜部东北陆军暂编骑兵第一旅秦耀奎部第五团张凤葆所遗的团长缺，不久，秦旅团长刘汉杰护刘山胜举兵反汤，崔兴武旅受命征讨时，尹即暗与崔旅默契，刘部失败后，汤即以尹团拨归崔旅。尹是个营混子出身，习于世故，老奸巨猾，虽是不学无术，却善于应付环境。外貌非常拘谨服从，实则内藏城府，尤其入伍以来，人事变迁极大，遂也习于投机取巧。当团长后，更极力搜刮，故也颇有资产，其性既贪得又严刻，也更汲汲于升官发财，只图个人现实富贵，其他并非所问。在许多同事中，他与李守信最好。他可以为李划策，也能代作主张，故终于狼狈为奸。

二

热河陆军蒙古骑兵教导总队，它的历史很短，所以这个番号，不但在热河人的耳目中，就是在汤玉麟所部的热河驻军的部队里，都是很陌生的。这个部队的总队长，始终是乌古廷。乌也就是这个总队的创始人和结束者。提到乌古廷，也就说清了这个总队的历史，现在就从乌古廷开始叙述。

乌古廷与笔者在汤部同事多年，也很接近，故知之较详。他本名乌珍泰，在1928年间，改为乌臻泰，号椵庭。乌古廷是他最后改用之名。系热河平泉内蒙古喀尔沁旗人。他家原是世袭固山贝子，以后降袭一等镇国公，清光绪末年出生，幼在北京读书至中学。兄弟五人，乌居长，其余当时均年幼都在上学。约在1925年间，因其父病故，乌即承袭蒙古镇国公职，时阚朝玺任热河都统，曾召开蒙古王公会议，乌来参加，阚见乌年青，更欲借以拉拢蒙古王公，愿予培养。乌也很想另求发展，遂经阚暂委

为热河都统公署少校副官，准备送入东北陆军讲武堂受训，然后再加重用。尚未及讲武堂召集，阚即撤走，乌随至东北。不久，汤玉麟又入热任都统，遂仍回原职。当时因讲武堂第六期已经召集过去，故又拖延下来，但是随时都在准备去受军训。此人虽系蒙族，且属王公世子，又极年轻，却是非常活跃，善于交际，更能卑躬折节，趋承权贵，所以汤部上自汤玉麟，下至卫士马卒，无人不知乌副官，也都对他有好感。那时汤部当权的有名的二李，即参谋李赞连、军务处长兼副官处长李树春，都很喜爱他。尤其是李树春，已将他看作心腹一样。所有政治方面的所长处长局长等，以及有力的士绅们，他也都很熟识，很相得。这可以说明，他年纪虽小，野心很大。他看清楚了，他那个过时的王公富贵，已经不足过瘾，要想做高官、发大财，必须另起炉灶，走军阀的道路。所以他处处都在创造有利的条件。生在那时的社会，他又是个贵族王孙，家境富裕，更爱交际，当然是过着腐化浮华的生活。由于其母持家很严，故他对于酒色烟癖等，还不敢公然染指，但在应酬场合，无不适洽人意。后又因随军至晋北作战，致将讲武堂第七期以至第十期的召集机会，全都错过，只好等待。

约在1930年秋，经汤玉麟以东北边防军热河驻军司令部副官，保送入东北陆军讲武堂第十一期受训。遭受1931年九一八事变，逃回热河，算是提前毕业。大家以他年富力强，主张要他准备功课，打算设法保送他考进陆军大学正科，或是特别班，再求深造。他却冠冕堂皇地说，国家多事之秋，民族存亡的关头，已不容置身事外，再去读书升学，应该执戈杀敌，效命疆场，守土御侮，等等。当然谁也不能否认这是正义，更博得人们的嘉许，也就越觉得其人可爱，都愿支持。其实，他早有成竹在胸，认为既已混到军校出身，就有了带兵的资格，又并不想深通三韬六略，去做个空头的军事学家。唯一的希望，就是要当一个拥有现实的、高牙大纛的、越大越好的统兵将帅（军阀），何必把有用的光阴消磨在讲堂里。况且日寇开始侵华，大战已就在眼前，正是千载难逢、浑水摸鱼的好机会，并已具有许多的有利条件，岂肯轻易放过。他就打着上述的一本正经的大道理做幌子，去奔走搞队伍。那时当权的大幕僚们，也愿意将他扶持起来，作个

有力的外援，同时对他帮忙的人也不少，都在替他设法。

1932年间，汤玉麟被迫从事备战抗敌时，有人向汤建议，以蒙古人秉性强悍、生活方式简单，又多习于骑射，备有枪马，只要召集起来，稍加编训，很快地就能练成一支劲旅。它的补给容易，行军轻快，长于超越山岭，驰逐草原，最适用与日寇打运动战，并可借以羁縻蒙旗王公，控制运用王府武装，从而编成一部强大的蒙古骑兵部队。经汤同意，遂派乌古廷主持其事。先训练一批基本作为扩展的骨干，并为了不拘束它的编制，留有可多可少和可大可小的伸缩性，也为了使它很自然地逐次发展壮大，更为了要它在蒙古军中起着中坚表率作用，遂即定名为热河陆军（蒙古）骑兵教导总队，任乌为总队长，容他先在他的王旗辖地平泉赤峰一带，开始编练，并不限制期间和地域。这可算是对他无微不至的照顾。从此，他就回到王旗去着手进行。

在1933年初，汤玉麟被任为华北对日作战军第二方面军副总司令，兼第五军团军团长，兼陆军第五十五军军长。开始对日作战时，因乌尚未报告编练完成，故未将该部队编入战斗序列，当然也未赋予作战任务。及至汤放弃承德，退至丰宁县时，乌即率领已经编成号称两团的蒙古骑兵，追到丰宁。汤在困境得此，颇为感动，立即集合乌部全体官兵，亲自训话，当场宣布改编为旅，事后亦未另下笔记命令，也未确定番号，即称之为蒙古骑兵旅，或仍称之为教导总队。

不久，又随汤军撤至察省沽源县一带。乌部驻地，恰与汤的四弟汤玉铭所部炮兵部队的驻地，毗连邻接。那时正何应钦派员点验汤部，故不得不临阵磨枪地来讲求军风纪等。当有人报汤炮兵部队在驻地滋扰，后闻也确是事实，汤即召汤玉铭当面指责。汤玉铭在无可狡辩中，却公然地说，这是小蒙古（指乌）的部队所为，汤虽并未再责问乌古廷，而乌虽也未加争执，却认为炮兵附近也还驻有其他各部骑兵，汤四竟单单推在他的身上，这是对他侮辱和歧视，背地很表示不满。

那时接升汤军副官处长的孙化久，原是副官处主管人事的第一科科长。孙同当时接升汤军参谋长的崔广森，均系由汤军原始小干部爬起，又

是多年同事的最好朋友，孙且可以左右崔。这时原在“九一八”事变后不久，由汤军去往东北组织义勇军的李佩声（芳庭），又率队投回汤军。李同崔、孙都是好友，与孙最近。乌虽也与崔、孙很好，尤其是在孙化久方面，终较比李稍差。因正准备调整编制，而唯独李佩声的部队较少，孙乃习于过去拆编热河省防部队的经验，在他们几人闲谈时，孙却以应讲私交为名，主张建议，将来即以乌、李两部，合编为一个加强的甲种大旅，由李担任旅长，而以乌古廷副之。当以他们中其余的人，未加可否，遂成悬案。这时汤军的各级参谋间已多传闻此事，都看到当时乌的极为忧虑不安的情绪，可知他的内心，已越加不满，但是谁也无法加以劝慰。由于乌的为人，既重视名利，又极机巧，很可能从此时起，他就开始暗中另找途径。因这时已确知距离并不很远的察省多伦县一带，已被属于热河伪军的李守信部盘踞，乌李都是蒙古族人，在汤军时既已交好，此时互通声息，自是意料中的事。

又不久，何遂来当副军长，又被汤玉麟拘走，他更感到前途渺茫。随着汤军又遭到孙殿英的分化收买和袭击，汤、孙两部遂在沽源附近火并，他认为是大势已去，故未参加战斗，即率队离开，从此与汤军断绝关系。

汤、孙两部战罢，才确知乌古廷部已投归多伦李守信部，仍属于大汉奸热河伪军头目张海鹏部所辖。乌古廷终于背叛祖国民族，丧心降敌，为虎作伥，自然是早已决定于他的恶劣的本质，而上述的一些客观的原因，也不能不多少有些影响。

乌部编成不久，嗣又离去，对其团长等的姓名历史都不清楚，仅知全是蒙古族人。

三

以后先在报纸上看到关于内蒙古伪自治军李守信部的报道，这时他们又做了内蒙古的大汉奸德王的统治工具。这当然是在乌古廷部与李守信部

合流后，由于他们都是蒙古族人，而又有着蒙古族的部队，已具备了这种条件而形成的。至于他们是何时如何改变，以及改变后的情形，都不是笔者所知，故此也就不属于这段叙述的范围了。

（1960年10月29日）

伪内蒙自治军始末

正珠尔札布

伪内蒙自治军是在“九一八”事变后，日寇向我东北发动侵略时，在科左后旗和科左中旗一带成立的，主要目的是勾结日本关东军凭借其帮助组织军队，脱离祖国而独立。其实“九一八”事变前几年，甘珠尔札布和正珠尔札布兄弟即已策划活动。“九一八”事变爆发后，我兄弟俩与日寇勾结，把伪内蒙自治军成立起来。由于军中成分复杂，拥兵者又各怀私利，实际上非但没有达到内蒙独立的目的，反而帮助了日寇侵略东北的军事行动，并给东北和东部内蒙古人民带来了严重的灾难，造成了祸国殃民的罪行。我现在以当事人之一的身份记述往事，聊当自责。伪内蒙自治军又为伪满兴安军的前身，现写出其始末，也许可供修史者的参考。至于错误和遗漏之处，希熟悉当时情况的读者加以指正。

甘珠尔札布和我早在日本留学时，即已同日本的极右团体如黑龙会、大化会、爱之王园社等，日本军政要人如山本条太郎、畑俊六、松井石根、东久迩宫、闲院宫等及其他参谋本部、陆军省的少壮将校，都有密切的来往。

1927年和1928年，甘珠尔札布和我分别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步兵科和炮兵科。我们回到旅大后，策划蒙古独立的秘密活动便积极开始了。我们和当时的日本关东军司令官畑英太郎中将（早在日本留学时与他很熟

悉。畑英中将当时是少将、陆军省军务局长，他的长子畑英一和我是同期生）、高级参谋河本大作和以后的高级参谋板垣征四郎大佐、参谋石原莞尔中佐等接洽，陈述蒙古民族受汉族军阀的种种压迫欺侮，恳求日本帮助蒙古独立。畑英等曾表示非常同情蒙古民族的落后和被压迫的处境，答应有朝一日一定支援蒙古独立的“伟大事业”。他们赞扬我们的“雄图”，说：“蒙古民族和日本大和民族是同种，是兄弟般的关系，应该携起手来。特别是你们，你们的父亲巴布札布将军生前也致力于蒙古的独立事业，应当继承父志。你们是成吉思汗的子孙，好好努力吧。”关东军部并设宴招待我们，几次接洽，我们和关东军的关系日益密切。一些参谋如花谷、堀内等都成了密友。这样，“九一八”以前，我们就打下了背叛祖国成立内蒙自治军的基础。

在与日本关东军接洽之外，我们还一面联络蒙古土匪天红（名金昌，苏鲁克旗人，有100多名胡匪），一面联络蒙古各地要人，合谋蒙古独立的事。天红曾来大连住了些日子，表示参加。后来甘珠尔札布带着妻子（清肃亲王第十四女，日寇浪人川岛浪速的养女川岛芳子，汉名叫金璧辉）到了西科中旗（图什业图旗）王府，秘密训练王府的军队，又动员图什业图亲王业喜海顺参加蒙古独立运动（甘珠尔札布与业喜海顺两人的妻子是亲戚，即业喜海顺的妻子是肃亲王妹妹）。甘珠尔札布由图什业图旗回来就正式与金璧辉离婚了。

我则一面利用日寇侵略我国的大本营“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的特务组织郑家屯“满铁公所”研究蒙古事情，一面联络拉拢蒙古有势力的人物（因为我幼小离开蒙古，不懂蒙古的一切事情）如莫力庙活佛阿旺图巴丹、阿鲁科尔沁王旺钦帕尔赉、温都尔王阳仓札布、爱根庙沙布冷喇嘛等。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日寇发动了侵略我东北和东部内蒙古的战争。但是当时的日本关东军的兵力只有一个师团和铁道守备队，兵力缺少，很需要组织伪军汉奸部队为之效劳。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关东军部当夜由旅顺移驻奉天（沈阳）东洋

拓殖会社办公大楼，甘珠尔札布和我欣喜雀跃地赶忙跑到奉天，住在“满铁”附属的万国旅社，开始了蒙古独立的具体活动。我们一面召集滕续文（哈丰阿）等蒙旗师范学生和其他青年研究，一面到关东军部见了本庄繁司令官、三宅光治参谋长、板垣参谋等要求枪炮子弹。

甘珠尔札布到关东军要求枪炮子弹，板垣参谋问了我们蒙古独立的计划后，答应给我们步枪3000支、子弹60万发（东北兵工厂制造的79大盖）。

我们的蒙古独立打算是：由科左后旗经过科左中旗占领通辽县整顿部队，再往北经过高力板、科右中旗到兴安岭索腰勒吉山会合郭道甫的部队，以后再商议下一步的打算。当时没有具体的蒙古独立计划，只有组织蒙古独立军（后改为蒙古自治军）的计划，认为首先有了武力就好办事。

在万国旅社，甘珠尔札布、滕续文、张洪俊、韩凤林、李友同（阿思根）等和蒙古青年30多名开会商量，决定了蒙古独立军的组织和召集东科后旗统领包善一（额尔敦毕力克）和东科中旗的韩色旺办理，他们俩答应只要有武器就参加蒙古独立军。又派苏鲁克旗人宋福山与盘踞在通辽一带的胡匪天红、高山联络，叫他们参加蒙古独立军，也得到赞同。

当时蒙古独立军司令部的编制、人员如下：

司令：甘珠尔札布

参谋长：萨嘎拉札布（汉名郑凤翔，巴林右旗人，日本“满铁”育成学校毕业。）

秘书长：滕续文（科左中旗人，蒙旗师范学校学生。）

副官长：韩凤林（科左中旗人，日本士官学校毕业。）

还设置宣传、军械等八大处，我担任了最重要的后方联络，即与关东军联络的任务。关东军部还给我们司令部派来一名顾问，名叫和田劲，是退伍中尉，早在奉天从事特务活动的日寇浪人。

甘珠尔札布由关东军要了武器，但是实际在蒙古地方没有直接指挥的部队，只有在奉天集合来的三四十名青年学生，因此无法领运武器。此时

包善一有200人上下的该旗军队，韩色旺在旗下招募了土匪约200人。甘珠尔札布唯一指望着天红、高山等部的土匪200来人归其指挥（主要都是苏鲁克旗人，还有甘珠尔札布的远亲等）。

我们与关东军联络好以后，计划把武器由奉天经过四平、郑家屯运到大蒿子包善一家。这时在蒙旗各地谣言纷起，土匪横行，由火车运武器是一个很艰巨的事情。不多日子（10月初？）关东军把3000支步枪和60万发子弹运到了平齐线一棵树车站，这站是离包善一家最近的一个小站，人烟稀少，卸运武器是比较方便的。我们利用夜间，用包善一强征来的车马，由甘珠尔札布亲自指挥包善一的军队和学生队，全都安全地运到了大蒿子。在这儿把枪和子弹分发给了包善一、韩色旺、天红等部队（分配数忘记）。以后和田顾问携带着若干箱手榴弹也来到了大蒿子。

早在奉天就答应参加蒙古独立运动的包善一，分得多数武器后却坚决不行动，找各种借口不积极进行。我们和他争论了一夜。这夜，和田顾问袋里装着手榴弹与包善一争论，准备包善一不答应的话就炸死他。在很紧张的气氛下，包善一才勉强答应了。

包善一不肯痛痛快快地参加蒙古自治军的原因是：一怕日本军撤出东北；二怕“中央”（国民党）来（据说国民党已派来了高专员）；三怕丢了自己的庞大财产。所以他犹豫不定，看风头骑两头马，表示出对日本也好，对国民党也好的两面态度，根本没有蒙古独立的意思。为了使包善一安心，甘珠尔札布想办法把包善一的全家搬到大连安全地方去居住，以后看到包善一的行动仍然消极，又趁独立军改编之际，把内蒙自治军总司令之职让给他，并使之兼第一军司令。就这样包善一还是始终没有积极行动起来，光顾扩张势力，保护他个人的财产。韩色旺呢，他是包善一的亲戚，原来是一个文人，仰承着包善一的鼻息行事，利用机会捞一把，也是根本没有蒙古独立的思想。

改编后的蒙古自治军的组织如下：

总司令兼第一军司令：包善一

第二军司令：韩色旺

（以上两个军各有七八个团，实际兵力有2000多名。）

第三军司令兼总参谋长：甘珠尔札布

（有七八个团，团长有高山、那钦双和尔曹巴格都等，其他几个团长的姓名忘记。）

炮兵队长：白云航（哈斯巴图尔，喀喇沁右旗人，俄国基辅军官学校毕业。）

各团都有蒙旗师范的学生，相当于指导员的地位。

内蒙自治军号称一万，在科左后旗、科左中旗和通辽县一带活动起来。他们多数是临时召集的土匪流氓，根本谈不到有什么军纪风纪，那一带地方的无辜百姓遭受了好几个月的严重灾难。

1931年10月中旬，第二军和第三军驻在郑通线大林站一带，准备攻击通辽县城。当时驻防通辽县城的是奉天骑兵第三旅。我们攻击以前，首先派了以博彦满都（宾图旗人，“九一八”以后，由张鸿寿介绍和我初次在郑家屯相识）为首的几名蒙旗学生潜入通辽县城，与通辽县当局谈判无条件开城。但是谈判没有成功，结果决定进攻通辽县（博彦满都无法出县，隐藏在一位早认识的女人家，以后逃出通辽）。

进攻通辽的主要是第三军。甘珠尔札布亲自率领高山的部队（这时还没有别的部队）和学生队，由西南闯进通辽县城。我领着十几个人由西攻入了通辽县城，和田顾问领着的十来个日寇流氓，乘火车头开进了通辽车站。包善一部队的铁管带等五六十人深入通辽街中心，他们只顾抢东西和抢食物，结果都被城里守军打死了。守备通辽的第三旅和民团开始反攻。我们互相联络不上，由拂晓打到正午，被迫退出，跑回大林站。

在攻通辽县的时候，包善一自己没有参加，只派了铁管带等五六十人入城，韩色旺和他的部队根本没有参加。我通过小街集时，韩正在那里吃馅饼、抽大烟呢。

攻打通辽失败以后，包善一、韩色旺二人一心只是想把自己的势力、

地盘扩大，发财致富，更不谈蒙古独立，只有第三军始终抱着蒙古独立的愿望。这样，内蒙自治军内部同床异梦，互相猜疑，就更走向瓦解的道路。

这时，和田顾问气愤愤地跑回奉天报告关东军部，说内蒙自治军完蛋了，什么也不是，都是些土匪，非讨伐不可。他不再当顾问了，后来他在沈阳组织了伪靖安军。

我听到这个消息后，立刻上奉天到关东军部见板垣参谋，说明了内蒙自治军的实际情况和包善一、韩色旺二人的灰色态度，并恳求军部再援助大炮和军队防寒被服以便重整旗鼓。于是板垣又派另一名特务，退伍大佐松井清助（曾进入蒙古人民共和国，在库伦做过间谍活动）充当内蒙自治军顾问。松井给我们带来了大口径迫击炮两门和捷克制轻机关枪等武器。在松井死后，又陆续派来了退伍少佐盘井文雄和小泽一六八少佐等当顾问，最后又派来了一个现役少佐本间诚，形成了一个顾问团。这样，关东军部把内蒙自治军完全掌握在它的手里了。

内蒙自治军第一军驻在科左后旗，第二军驻在科左中旗，第三军驻在科左中旗舍伯吐一带。在这期间，日寇羽山支队攻占了通辽县城。当时莫力庙（通辽西60里）活佛阿旺图巴丹也收集了100来名喇嘛和当地人保护莫力庙。我到莫力庙游说他参加蒙古独立活动，他表示赞成，但不想动窝，不肯丢掉莫力庙和自己庞大的财富。于是把他称为救国大师，我当他名义上的参谋长。以后驻热河开鲁县的东北军崔兴武旅的李守信、胡宝山等进攻舍伯吐，夺去自治军的迫击炮，并进攻莫力庙，抢得一干二净。救国大师也就此垮台，跑回通辽了。

甘珠尔札布计划把三个军团结起来北上会合郭道甫，但是包、韩与甘珠尔札布意见相左。这时，松井顾问主张攻击开鲁县城，甘珠尔札布不同意这个主张，按兵不动。松井负气单独领了一些第一军的兵向开鲁前进，中途在开鲁境内被民团打死。我又到关东军部向板垣报告情况，板垣一听大怒，说："你们蒙古人顾问都给打死了，你们还活着！"我沉住气把内蒙自治军的内部矛盾和松井顾问单独行动的情况向他说明。又说我们要蒙古独立的意志是坚定的，我们计划先行北上到兴安岭，目前不必进攻开

鲁，因为开鲁周围都是蒙古地方，将是不攻而破的，所以我们不赞成松井顾问的办法，板垣也没说什么。

内蒙自治军内部矛盾严重，攻击通辽失败后更深刻化。第三军纪律较好，天红、高山所部都能听约束，蒙旗师范出身的学生队怀着强烈的独立希望。第一、第二军纪律紊乱，形同土匪，在科左后旗、中旗和通辽县一带盘踞着四五个月以来，给当地人民的生命财产造成莫大的损失。独立活动一事无成，反给蒙汉族人民带来了很大灾难。甘珠尔札布兄弟俩无法收拾，只有悄悄地抛弃了内蒙自治军。

正在这个时候博彦满都等同日寇特务菊竹稻穗（一名宝藏，当时郑家屯满铁公所所长，日本东京外国语学校蒙古语科毕业）召开了蒙古王公会议，决定了东部内蒙古参加伪满洲国。

1932年3月伪满洲国成立，日寇把残余的内蒙自治军改编为伪满洲国兴安军，把扎赉特王巴特玛拉布坦拉过来任命为少将司令官。

（政协内蒙古自治区海拉尔市委员会供稿）

李守信投敌经过

刘映元

李守信在开鲁兴起的过程

李守信，土默特旗的蒙古人。其祖先与汉人通婚，李本人并不会蒙古语言。李早年在热河北部“拉杆子”，纠集胡匪及马贼，创立“信”字号的“杆子”，在当地胡作非为将近四年。那时担任热河游击马队统领的张连同，对李守信初则包庇，继则收编，派充游击马队中的骑兵连连长。1922年年初，巴布扎布余党所率的“蒙匪”进犯开鲁，李守信奉命出击，打散“蒙匪”，升任营长。1922年4月，第一次直奉战争爆发，热河地方部队驱赶奉军，李守信率部袭击奉军汲金纯部，解决了汲部的一团炮兵，夺获新从德国买来的八门野炮。直系新任的热河都统米振标，将游击马队调驻开鲁，防守热河北部门户。李守信部驻开鲁正西90里的爱根庙（现时辽宁省的绍根）。1924年10月，第二次直奉战争张作霖战胜后，张连同派崔兴武接洽投向奉军成功，奉系新任热河都统阚朝玺将游击马队改为东北边防军骑兵独立第九旅，张连同任旅长，崔兴武任团长。1925年，张连同被宋哲元击败俘走，所部由崔兴武与李守信带领，而以李部的人马最多最强。1928年，东北易帜，独立第九旅改称东北军骑兵第十七旅，崔兴武任旅长，李守信任三十四团团长。

李守信从家里背着一杆套筒枪跑出来闯荡江湖，不到八年时间，当上了骑兵团团长。在热河游击马队时，李守信在17个营当中，与1/3的官佐拜把结为兄弟。他对士兵则用小恩小惠进行收买。他在驻防各地（赤峰、经棚、开鲁）时，结交三教九流，经商谋利，投机倒把，走私贩毒，无一不为，囊刮许多钱财。他自己不吸香烟，手面却很大，将钱尽量应酬朋友和收买官兵。蒙古族里的王公、旗官、活佛、大喇嘛，汉人中的官僚、地主、商人以及胡匪马贼，他都与之交往，或拜把结盟，因之在热河北部十数县的地区里，钱财越聚越多，队伍越拉越大，霸据一方。

日特早年在蒙人中的活动

早在1905年日俄战争中，日本帝国主义战胜帝俄之后，即派遣文武间谍人员潜入内外蒙古进行特务活动。民国初年，日帝利用清室遗老组织的宗社党，暗地勾结蒙古实力派，妄图实行满蒙独立。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当时热河境内的卓索图盟和昭乌达盟，有巴布扎布率领的一支叛乱武装队伍。大巴林旗的王爷将林西东南的大片荒地私自卖与日本人开设蒙古畜产公司，并容许日本人小桥在林西城内开设医院。这个公司与医院，都是日谍进行特务活动的据点。阿鲁科尔沁旗爱根庙的活佛萨布楞，早就与日本帝国主义有所勾结，在庙里藏有由日本偷运入境的大批武器。李守信部驻防爱根庙时，萨布楞活佛邀请李将营部驻在庙里，并腾出两间客室给李本人居住，还每天请李一起吃饭，后来还要求换帖结拜为弟兄。

李守信部下有个胡宝山，从小就当马贼，后来同李守信“合杆”。胡宝山很早就耳闻爱根庙里私藏日本武器的事，曾借口向萨布楞索得快马11匹和大元宝7个。萨布楞见胡宝山贪得无厌，没法应付，乃求助于李守信。他告诉李守信，日人确实给阿鲁科尔沁旗偷运来500支步枪和10万余发子弹，因为王爷胆小怕事，故将这批弹械存放在爱根庙里。他还说，日本人给他一张联络执照，凭这执照可以免费乘坐火车头等卧铺，由通辽去旅

顺、大连，吃饭亦由车上供应。萨布楞从小皮匣中取出“执照”给李守信看，却原来是日本天皇大正夫妇的一张照片。他乘机诱劝李守信说：“你如果想成大事，为复兴蒙古民族贡献自己的力量，我愿意将这批武器交你使用。你打出旗号之后，还可给你弄来日本大炮。”萨布楞还说：“我是出家人，带不了队伍。你是咱们热河最有出息的蒙古人，对张将军（指热河游击马队统领张连同）忠心耿耿，虽然早就想跟你说明而又不敢说，现在胡宝山既已‘挑明’，只有希望你给咱们蒙古人帮忙。你如有心大干一场，别说爱根庙的枪马，整个阿鲁科尔沁旗都能帮你成立军队。”李守信听了萨布楞活佛的劝诱之后，考虑到当时时机尚未成熟，除答应对胡宝山的勒索行为予以制止之外，对其他事项则含糊其辞地敷衍过去。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萨布楞在临死前曾派专人去找过李守信，说有要事相商。李因避嫌，没有前去。事后听说，萨布楞活佛和阿鲁科尔沁旗王爷的代表阳仓扎布，于1932年春天去过郑家屯，在日本满铁公所里，与巴布扎布的儿子甘珠尔扎布及正珠尔扎布，还有通辽附近莫立庙的小佛爷阿旺图丹巴等，参加了筹备组织“内蒙古自治军”的会议。会上决定，甘珠尔扎布任参谋长兼第三军司令；莫力庙的小佛爷任第四军司令。萨布楞活佛在内蒙东部的号召力，超过莫力庙的小佛爷，如其不死，也会成立一个军。他死前专门派人去找李守信，自然与此事有很大关系。

与日特的初步联系

“九一八”事变时，李守信部驻防开鲁（当时属热河省，现划归吉林省）。同年冬天，日军进占通辽，设立特务机关。日军在通辽组有“蒙古自治军”，由东科后旗统领包善一（蒙名额尔敦毕力格）任第一军司令，东科中旗韩色旺任第二军司令，甘珠尔札布任参谋长兼第三军司令，热河库伦旗的鲍殿卿（蒙名那钦双和尔）为联队长，由关东军发给步枪3000支、子弹60万发，并派松井清助、盘井文雄、小泽一六八等为顾问，积极

准备侵犯热河。

通辽距开鲁180华里。当时，上自蒋介石，下至汤玉麟，都没有抗日决心。这时身任东北军骑兵第十七旅旅长的崔兴武，面临强敌压境的局势，为了保存实力，通过开鲁商会会长汉奸蒋金安（旅顺人，领日本人的钱在开鲁开设甘草收购公司），与通辽日本特务机关长田中玖暗中勾结，维持和平相处，通辽开鲁之间的汽车仍然畅通无阻。日军当时由于还得对付黑龙江方面马占山、苏炳文、丁超、李杜等的义勇军，又在企图侵占锦州、山海关，还无暇过问热河，也就容许崔兴武、李守信等的武力保留下来。

1933年初，日军占领山海关，开始威胁热河边境。这时有一架日本飞机低空侦察，被李守信部击落，俘获敌人四名，机枪两挺，电台两部。崔兴武将李守信找去，说："日本人想让咱们把飞机上的人给送回去。我打算派你去同他们谈判，跟他们要些子弹来。"与李守信同行的有开鲁商会会长蒋金安和旅部参谋王新民，还有曾在开鲁当过兽医的日人仓林。李守信一行到达通辽，由日本驻通辽特务机关长田中玖接谈。李守信提出以日本俘虏交换子弹的问题，田中玖则推说他不能做主，希望李守信去新京（指伪满的新京，即长春）与关东军首脑直接谈判。

在通辽的短暂时间里，李守信会见东鲁汽车公司经理王子玉，他俩原是磕头弟兄。王对李说："崔兴武派蒋金安跟你来，不只是为了诓子弹，恐怕还会接洽投降的事。崔当汉奸，要你出名，你可要小心。"

李守信去到长春，见到日本关东军司令菱刈大将和小矶国昭参谋长。菱刈对李守信说："你是一位很勇敢的蒙古人，我们很佩服你李守信团长，希望你同我们合作，建立大东亚共荣圈。"小矶对李守信说："我们不相信崔旅长，你是蒙古人，所以跟你谈。"小矶并向李说："飞机上那几个人，送还不送还，都没有关系。我们日本人为了建立东亚新秩序，已经牺牲了好多人，以后还准备更大的牺牲，不在乎飞机上的这几个人。"李守信表示，愿意将日方意见回报崔兴武。接着，日本关东军"嘱托"金永昌（蒙古人，曾留学日本）劝说李守信，希望能与日本人携手，复兴蒙古民族；并让李与蒙古自治军合作，他可在关东军方面鼎力帮忙；等等。

李守信在长春遇到刘桂堂的副军长夏子明，夏是作为刘桂堂的代表来到长春的。夏对李说："现在连蒋介石也是脚踏两只船，咱们更要见风使舵，不能死抱住一股弦子弹。天下大乱，咱们弟兄们才能出头露面，不然的话，谁能看得起咱们。他们利用咱们，咱们也利用他们。马占山先投日后抗日，现在谁不承认人家是英雄。你不要错过时机，要甩开崔兴武，自己来挑。"李守信遂与夏子明结拜为兄弟。

李守信回到开鲁，带上日本飞机上的人和机枪、电台等再次去到长春，由田中玖与金永昌陪同前往。小矶见李守信将人和机枪、电台等全部送回，非常高兴，对李说："关东军送你子弹22万发，手提机枪（热河造）15挺，韩林春步枪25支，到奉天兵工厂去提取。另外，送你三万元。"接着，小矶带着亲昵的口吻对李说："这都是冲着你李团长才这样办的。"

这时，日军决定进攻热河，赶走汤玉麟，茂木旅团已集结通辽一带。

与崔兴武的一番明争暗斗

在东北军骑兵第十七旅里，虽然崔兴武是旅长，李守信是团长，但在这支队伍里，李守信的历史较长，兵力较厚，崔对李感到尾大不掉难以驾驭。值兹强敌压境动荡不安之际，崔兴武与李守信都得有所选择，或是抗战，或是投敌；同时，两人还都想趁此机会消灭对方以壮大自己，因此明争暗斗颇为激烈。

李守信由长春返回通辽时，看见铁路两侧军运特别紧张，各个站口都集结许多人马，听说日军决定三路进攻热河，茂木旅团已经开到通辽。李守信赶回开鲁，将在长春谈判情况报告崔兴武之后，问道："子弹枪械和钱，你还要不要？"崔听这话，知道话里有话，便反问道："你被日本人吓到了吧？"李说："笑话！只要有了子弹，我什么都不怕！"崔于是转口说："咱们或打或退，你先把子弹弄回来。"李随即给通辽的田中玖去

电话，告诉他崔兴武愿意接受，并亲去通辽接运军火。

当李守信来往开鲁、通辽、长春之时，沿途通行无阻，日本人对于十七旅已按“自己人”（实际上是看作降军）看待。日军占领开鲁后，十七旅的官兵进城出城，日军及伪军也并不阻止或盘查。田中玖还让李守信住进东鲁汽车公司，有事则派人找他洽谈。一天，田中玖将李守信叫去，说：“茂木旅团已经出发，你先回去同崔旅长维持那里的秩序，准备欢迎皇军入城。我派小汽车送你去开鲁。”李守信到达开鲁时，崔兴武已将队伍撤出，向林西进发；县长于寿山也跑了，由商会会长蒋金安代理县长。崔兴武对李守信说：“你在开鲁替我应付，子弹运来就到爱根庙，到了那里咱们再商议。还有，我的那部道奇汽车，没有汽油开不走，日本人来了，你给弄点汽油，也开到爱根庙。”崔说完就走了。

李守信与代理县长蒋金安在开鲁，欢迎日军进入县城，设宴招待茂木旅团长。可是茂木未去参加，却用自己带来的罐头和酒款待李守信等。其间，茂木介绍小柳匀少佐，说是开鲁日本占领军司令，并向李说：“皇军明天向赤峰挺进，你给我弄400辆车运输给养。”李守信提出子弹尚未运到的事，茂木便要小柳匀派日本兵将李扣押起来。还是老牌汉奸蒋金安给弄来30辆大车，总算应付过去。不久，子弹也运到开鲁，李守信也放了出来。据说，田中玖对李守信印象很好，他由通辽赶赴赤峰接任特务机关长，遇到茂木，茂木给小柳匀来了电报，李守信才得恢复自由。

开鲁县城西门外，集结有李守信的队伍2000多人，激于义愤，要求打进城去，为李雪恨。李说：“城里还有咱们眷属200多家，不要意气用事。我现在心里很乱，咱们还是一齐找崔旅长去。”于是队伍便向爱根庙开拔。

到达爱根庙，李问崔：“子弹已经到手，你究竟是降还是打呀？”崔说：“当然是打。我带两团人先退林东。你这个团在这里掩护。”李守信在爱根庙待了一天，因为日军向赤峰进攻，只派来几架飞机在县城周围扔了几颗炸弹。次日，李守信退到天山，崔带领先走的两个团仍在天山等候，并未立即开往林东，三团人马又集结在一起。崔兴武本人在林东等了

一天，不见队伍到来，便由林东又返回天山，要李连夜出动，去打由鲁北退下来的刘桂堂部。李说：“咱们从开鲁撤下来，没有给汤主席（玉麟）去报告。刘桂堂究竟是敌是友，现在还没有判明。你奉谁的命令去打？咱们的子弹可是来之不易呀！”崔说：“不要讲这些。我叫你打，你就给我打。”两人瞪眼半天，不欢而散。可是，为了争夺地盘，李、刘两军仍是在天山城东交锋两昼夜。崔兴武又来到前线对李守信说：“不要打了，一齐朝林东撤退。”李问：“这又是为了什么？”崔说：“刘桂堂态度不明，咱们也态度不明。跟刘桂堂打仗，对中国对日本都不好交代。”崔兴武这时才向李守信说了一些实话，但他怎样与日本勾结，又怎样同国民党政府联络，却没有透露。

李守信率部于3月初到达林东，崔留下命令，叫开林西。李部于3月5日到达林西。

李守信出任日军委派的热河游击师司令

1933年3月，承德沦陷后，日军进抵林西东南，伪军刘桂堂部到达林西东北，崔兴武看出李守信在日本人面前比他吃香，将旅长职务交给李守信，便抽身走了。李守信将代理旅长一事通知所属三个团，并报知日军驻赤峰特务机关长田中玖。田中玖嘱李欢迎小柳匀入城，并维持林西的秩序。3月7日上午，日军、伪军开进林西。

一星期后，小柳匀带领所属骑兵及炮兵开往赤峰。李守信建议从乌丹城附近的灞陵桥过河去赤峰，可是小柳匀心里怀疑，不敢从这条路上走，结果把汽车都陷入河里。两三天后，田中玖派汽车将李守信接到赤峰，说：“你们蒙古人心好。小柳匀不听你的话，把汽车陷到河里，费了很大气力才弄上来。你要是派出一团人进行包围，小柳匀不就完蛋了吗？我找你来就是代表关东军对你表示感谢和信任，希望你维持好林西的秩序。”田中玖还犒赏李守信17000元，接着委派李守信为“热河游击师司令”。

热河游击师的编制及人员如下：

司　令　　　　李守信
参谋长　　　　陈宝泉
　　第一支队司令　刘继广
　　第二支队司令　尹宝山
　　第三支队司令　胡宝山
　　炮兵大队队长　丁其昌

第一、第二两支队，共有汉族官兵6300多人。第三支队共有蒙古官兵1700多人。田中玖派浅田、佐藤为游击师的顾问，浅田兼任林西特务机关长。至是，李守信正式扛起太阳旗，在这以后犯下了一系列的卖国叛乱罪行。

我率伪军在察北的罪恶活动

李守信*

从多伦逼走刘桂堂

1933年夏初，日寇完全占领热河后，派往多伦准备侵犯察北的伪军，计有刘桂堂部约8000人，张海鹏部1800人左右和我部6500余人，共16000多人。张海鹏部来自辽宁，已编为伪满的正规军，张本人出任了伪热河省长，关东军对该部比较信任。我部来自热河北部，正式投敌还不到两个月，除了我是蒙古族人这一点而外，其他都待“考验”。刘桂堂部来源于山东的流寇，在热河沦陷以前被北平军分会收编，同年3月由鲁北（热河省的县名）经天山、林东、林西退到围场一带才投敌，所以关东军对该部最不相信。张海鹏有好几旅骑兵，由其长子张子明和王永清、傅景峰、索华岑等分别带领，开到多伦的1800余人，是王永清旅。因此承德的特务机关长松室孝良，令王永清监视刘桂堂和我，并令林西特务机关长浅田兼我的伪“游击师”顾问，他转告我，注意刘桂堂。这就是日寇对伪军分别对待、相互牵制的做法。除刘桂堂部没有派遣顾问和教官外，我和张海鹏部都有日本人紧紧跟着。

---

* 作者曾任伪多伦警备军司令官、伪察东警备军司令官。

当时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采取的是蚕食政策，逐步侵犯华北。从侵犯察北开始直到1937年“七七事变”以前，除了张海鹏和我的伪军中派有顾问教官和由日本组成的“特设队”外，日本的正规军始终没有在察北露面。日寇最初在察北，是想令刘桂堂的山东流寇进行捣乱，使察省主席宋哲元不能安心在喜峰口一带抗战。怕刘桂堂不听话，又把我带的那帮热河胡匪调了过去，以威胁二十九军的后方。当宋哲元离开察哈尔，冯玉祥在张家口组织起“抗日同盟军”时，日本人又把张海鹏部王永清旅开到多伦，一方面提防刘桂堂和我这两部分新投敌的伪军，另一方面阻止汤玉麟反攻热河和冯玉祥由张家口出击。等到我把刘桂堂从多伦赶跑，张海鹏部王永清旅调到沽源以东，在察哈尔北部便由我唱独角傀儡戏。

1933年3月5日夜晚，刘桂堂部在林西东北的二十家子打了一整夜内讧，翌晨他的井得泉团长投归了崔兴武的刘继广团，他本人率领主力撤至围场以北，曾盘踞了一个多月，派副军长夏子明前往承德接洽投敌成功。由于宋哲元把二十九军大部带到河北，察北一带没有驻军，多伦于4月下旬被刘占领，队伍完全驻在街内。张海鹏部王永清旅后来才到，因不能进街故驻在庙上的东西两仓。我是3月5日在林西代理崔兴武交给我的旅长职务。7日将日本的小柳匀部队和伪满的“兴安军”欢迎入城，25日崔兴武把兵权交我，4月初，赤峰特务机关机关长田中玖发表我担任“游击师”司令伪职，把队伍整顿了20多天，即向多伦开拔，在1933年5月初旬到达多伦。由于多伦的街市被刘桂堂占领，多伦的庙仓被王永清驻扎，我只好在多伦城东20里的善丹河沿岸驻扎。

多伦是先有了蒙古喇嘛教的庙宇，后来才在庙南二里的高地上出现了蒙汉贸易的街市，故多伦又称为喇嘛庙。刘桂堂与我有天山作战（被我毙伤1000余人）及收编井得泉的仇恨，对于张海鹏部王永清旅也严加戒备，把多伦街封锁起来，使我和王永清两部都不能向商务会征要给养。多伦寺庙东西两仓很大，可以驻一万多队伍，但喇嘛的粮食有限，仅能勉强养活王永清一旅骑兵，我在白沙黄草的善丹河边，必须派人到一二百里以外搜刮粮食。好在由林西开拔时多准备了半个多月的米面，所以初来到多伦的

十几天内没有断炊。王永清也是胡匪出身，外号“天下好”，我当胡匪时就跟他磕头结拜，热河沦陷时他在开鲁和我见过一面，到了多伦我们便联合起来对付刘桂堂。这时曾在开鲁当过兽医的日本浪人仓林，也跟我从林西跑到多伦，他和我部的浅田顾问，看见我的官兵给养困难，恐怕发生变化，遂把此种情况，报告了承德的特务机关长松室孝良。松室于5月26日由承德飞到多伦，想调和我与刘桂堂之间的矛盾，用电话把我从善丹河叫往庙仓，想使我俩言归于好，套在一根缰绳上供他驱使。

松室孝良在庙仓南的天然飞机场下了飞机，住在东仓的一个大喇嘛的院子里，叫我和刘桂堂在那里见面。他说：“你们再不要敌对了，我来给你们调解。”我说：“刘桂堂反复无常，毫不讲信义，他要在这里当场打死我，我的队伍岂不是垮了。”正说话之间，听见外边报告刘桂堂到了。松室出去迎接，我便带着我的随从副官由正房躲到西房。刘桂堂进门以前，先跑进四个卫士，各扛着一挺机关枪，枪口朝着正房放倒，趴下做预备射击的姿势，然后他才跟着一个副官，被松室迎接到正房里边。松室打发人叫我过去，我没有答应，以后刘的副官过来请我，见我和我的副官都扪着手枪，一看我有准备，扭头便走。不大一会儿外边的人跑进来说，王永清的人将重机枪架在四周，刘便匆匆辞去，松室孝良把他送出庙仓。他从正房出来，我趴在西房的窗上看了一眼，是个短粗的胖子，脸上长满发黑的横肉，怪不得人们叫他刘黑七。松室把刘桂堂送走，回来对我说：“真不是东西，我太冒失了。”并说：“你的困难我完全知道，我给关东军去电报，要求给你解决。”当天，他飞回承德。

我在林西投敌以后，队伍由崔兴武时的不到2000人，很快就发展成8000多人，田中玖叫我把汉族官兵6500人编为两个支队，蒙古族官兵1700人编为一个支队。从林西往多伦开拔时，日寇不仅没有补充械弹和粮饷，并且把那个蒙古族人组成的支队，留在林西和经棚驻防。田中玖对我说，是怕到多伦把队伍输光，留下这1700蒙古族人作为我的另一笔赌注，所以叫我兼任伪“经林留守司令”。

我知道天下没有便宜的事情，当汉奸也得有一定的表现，才能逐步得

到主子的信任。日本军阀的武器和金钱并不随便给人，于他们有利可图才肯破费。那时我既然披上贼皮，总得摸捞到一些实惠。

松室孝良走后，因为再过两天便是端阳节，王永清留下我跟他在一起过节。他又拿出200块银币，向喇嘛买了一些大米和牛羊。我打发随从副官把大米牛羊送给我驻善丹的队伍，并叫刘继广和尹宝山于过节期间要更加戒备。就在端阳节这天拂晓，刘桂堂派出2000多人，跑到善丹河去摸我的营垒，结果被我部打得狼狈而退。我在仓上看得清清楚楚，丢盔卸甲地回来1000多人，被打死300多人，伤兵有500多人，直到中午才停止。这时冯玉祥正在张家口组织“抗日同盟军”，王永清恐怕刘桂堂反正夺取庙仓，决定把东仓腾出，让我部当天到里边驻扎，他和我的日本顾问，也同意两部分人集中到一起，等得到松室孝良的指示后，好联合从多伦街上驱逐刘桂堂。我部便完全进驻到庙仓，刘桂堂的兵整整打了一下午枪，到天黑以后才停止射击。

5月29日，刘桂堂派他的副军长夏子明跟我见面。夏还带着一个姓黄的参谋长，他们说此次事件是刘桂堂部一个在天山县被我打伤的师长瞒着刘袭击的，希望我不要误会。夏子明曾与我磕头为结拜兄弟，所以我对他们说：“刘黑七打我，你这个把兄弟也不给捎个信，并且是你这位参谋长运筹帷幄给订的计。”弄得他们两个面红耳赤，只说：“我们哪里知道。”我说：“我这次进多伦，是你们昨天拂晓去善丹河把我请来的。”夏子明看见我的态度很强硬，向我说：“你容许我们五天时间，等我们把开拔准备完成，将多伦街腾清后让给你。”我说：“只要你们讲信用，一礼拜以后也行，咱们不服气离开多伦打，不要在街上祸害老百姓。”

夏子明走后的第二天上午，多伦商务会派来代表欢迎我们进街，说是刘桂堂的人已经连夜向张家口退去。我和王永清向承德日本特务机关报告了此事，回电叫我完全占领多伦，让王永清当天开回热河。听说刘桂堂从那天开始参加了“抗日同盟军”。

我于5月30日留尹宝山支队驻守寺庙的东西两仓，带刘继广支队进街，将司令部设在街内，委热河阜新的一个老秀才蒋正清为伪多伦县长。不久

乌古廷从汤玉麟那里跑到多伦，还带过来500多蒙古骑兵。他说汤部在沽源北面的狼尾巴山，被从赤峰退过去的孙殿英解决了大半，孙已领着人进驻到关里沙城一带，汤带着残部困居在独石口外，已到了日暮途穷的境地，所以他来投我。乌古廷（原名乌臻泰，字嘏庭，投日后，改为乌古廷）是喀喇沁右旗的蒙古贵族，曾毕业于东北讲武堂。我因乌出身于军事学校，又是我的磕头兄弟，以为他可以做我的左右手，于是把他打发到林西，代理我的伪"经林留守司令"，去整训胡宝山的第三支队。我恐怕胡宝山在那里给我生事惹祸。不料这乌古廷竟想拆我的台，叫他四弟乌臻瑞，向第三支队的官兵宣传，说我是朝阳七区的汉人，是一个"假蒙古"，这个部队应当由"真蒙古"带领。胡宝山和团长达理扎布（敖汉旗人）等把这话告诉了我，我这时正忙于营救松室孝良，并且我是依靠汉人捧我，蒙古的小头子们既然排挤我，他们有真本事，就交给他们带领好了，所以对此事没有注意。

松室孝良在调解刘桂堂和我的矛盾失败后，第二次又来多伦，听说给我带来六万块"天津字"交通银行钞票军饷，不料飞机在隆化县境内的一百家子山附近失事，落地后被一个外号叫"二寡妇"的女人所带的胡匪，将他和飞机上所有日本人完全捕捉。此次飞机失事是我把乌古廷派到林西以后发生的。消息传来那天，我即派连长张国治带了40多人，到一百家子山一带寻找松室的下落，我叫张连长无论如何要保护住松室。我企图以此向日本人献媚。后来伪热河省长张海鹏比我许的愿大，用大量金钱将此部胡匪收编，松室安全回到承德，我嘱顾问浅田向他说，我也曾派人前去营救，从此松室对我的印象更好，开始给我发军饷。不过没有给我补充武器，只是派来一个日本人组成的"特设队"，附有三辆装甲汽车并配备六挺重机枪，20多个日本人，还有四五挺轻机枪，没有配备炮。吉鸿昌率部由张家口北进时，我就是凭这点力量，认贼作父，在多伦对抗"抗日同盟军"。

和抗日同盟军作战经过

冯玉祥在张家口组织抗日同盟军，日本帝国主义为使冯、蒋火并，坐收渔人之利，除了派飞机在长城内外侦察抗日同盟军的行动，并没有派出正规部队向察北六县发动进攻。在6月中旬张家口打得热火朝天的时候，多伦西南各县，只由张砺生指挥的曹凯和白凤山等部民团驻守，所以多伦到张北之间，可以说阻力不大。

我和冯玉祥的西北军素无来往，但我刘继广支队的团长陈景春（名陈生，字景春）曾参加过宋哲元的军队，并和“抗日同盟军”姚景川（字云章）是亲戚，所以他们派姚景川来找陈景春，企图瓦解我的部队。陈景春是围场县的大地主，他的财产都在沦陷区，不敢跟姚景川轻举妄动。当“抗日同盟军”围攻多伦以前，我曾和参谋长陈宝泉瞒过日本人，召集两个支队长和团长们秘密开会。我说：“谁是真投敌？谁是真抗日？还没有盖棺论定。我们已跟日本人拉上线，现在八字没见一撇，绝不能放弃多伦，必须死守几天，看看抗日同盟军的力量究竟如何，瞧瞧日本人对我们的态度怎样，然后再决定下一步的行动。”参谋长陈宝泉暗中和何清明有联系，一贯主张所谓“曲线救国”，所以同意我的主张。

我叫尹宝山支队防守庙仓，在西边西仓的小孤山上构筑工事，让日本人“特设队”抽出一部分轻重机枪放在上面，以保护小孤山下的飞机场。我带着刘继广支队防守街市，并控制南边的沙岗地带，把日本人的三辆装甲汽车作为机动部队。日本人听说抗日同盟军号称两万之众，前来夺取多伦，浅田等都吓得失去了主张，完全听我调度。7月初旬，日寇由飞机给我运来子弹6万发。“抗日同盟军”进攻多伦时，来了一万多人，7月7日夜晚发动攻击时，我一听没有炮声，机关枪声也很疏落，更有了坚守的把握。多伦虽无城墙，但在房屋上可以放沙袋据守，庙仓本身就是堡垒，没有大

炮很难打开，街和庙中间以及其周围是开阔地带，“抗日同盟军”很难隐蔽。初攻击时，来势相当猛烈，争夺街南的沙岗，打伤了我的团长郭焕章。但由于我们居高临下，又由于他们的攻打不能协同一致，虽然进入庙和街的周围，未能集中力量进街或者占庙。

多伦被围以后，日本飞机在8日白天来过一次，来时正值抗日同盟军的500多骑兵企图夺取庙仓两边的那个小孤山，飞机扔了四颗炸弹，把这部分骑兵和步兵赶跑，除了日本人的三辆装甲汽车在召庙和街市中间以及飞机场周围，用机关枪向抗日同盟军扫射外，我的兵都没打枪。日本飞机降落时，被“抗日同盟军”的步枪子弹射入油槽，把接济我的6万发子弹和一些慰问品卸下，修理了半个钟头，才起飞回到承德。这次以后，因大雨四五天昼夜不停，日本顾问浅田急得老打电报，但飞机找不见多伦的目标，无法接济。抗日同盟军因后方运不上给养，加之连攻数夜没有奏效，士气逐渐低落，尽找地方避雨，战事遂进入胶着状态。我在坚守多伦期间，日夜不眠，我知道我个人的命运全看能否守住多伦来决定，所以老去最吃紧地方亲自指挥。因此抗日同盟军虽然把多伦装在口袋里边，造成三面包围，但无法往里渗透。由于这时全国都注视抗日同盟军收复多伦，冯玉祥一听攻不进去，便叫姚景川出面跟我谈判，想让我把多伦腾出。我的团长陈景春大概是7月10日那天到司令部来见我，他说：“姚景川前几天跑来拉我，我没有理他，因为怕你多心，也未向你报告，今天他到了我的团部，想跟你直接谈判，可否让他和你见面。”我说：“咱们在多伦如同蒙在鼓里，不知道国内外形势，可以让他来跟我谈谈，以便了解一些外边情况。”

姚景川劝我弃暗投明，我说：“咱们日久见人心，现在还谈不到这一点。”他又说苏联已经决定援助冯玉祥100万支步枪，不久即可通过蒙古人民共和国给运来。我心里说：“这是给冯玉祥，冯到手以后不一定就给我李守信。”后来他说：“冯先生真心抗日，得到全国各方面的爱国人士的拥护，如果连多伦也收复不了，人们就要大失所望。现在你要把多伦让出，便可以振奋人心，这就是你对抗日的最大贡献，冯先生以后必然重用你。”他并说：“咱们是热河同乡，我知道你两头为难，说实在的话，

同盟军已经没力量打开多伦，冯先生派我来，是想向你借一借多伦。冯先生真有办法，你不成问题会和我们合作在一起，冯先生要是没有办法，我负责把多伦归还给你。”我因为孤军据守多伦三天三夜，蛮对得起日本人的六万发子弹，冯玉祥既然派代表来，我不能把这条路线切断，现在正到了两面都能讨好的时候。于是我问姚景川：“你们打算借多长时间？”他说：“借两三个月。”我说：“两三个月时间过长，一个月我能应付日本人，到期你们没有办法，那我就要进行反攻，咱们一言为定，都要对得起朋友。”我叫姚景川转告给抗日同盟军，在最近一两天要虚张声势地猛烈攻击，等我把日本人吓唬住，退却命令出于他们口中，我再通知抗日同盟军进入多伦的日期和时间。

我的兵都是胡匪和民团出身，他们都暗藏着不少的“保命子弹”，轻易不肯外露。8日飞机走后给每人发了十几粒，到9日白天都背着空子弹袋子，日本人看见着了慌。仓林曾悄悄问过我：“子弹没了该如何办？”我说：“没子弹拼刺刀。”因而他们用十万火急的电报，向承德特务机关要求接济，可是大雨滂沱，飞机不能来。我即去找浅田顾问，我说：“关东军给我的20万发子弹，已在天山和善丹河两次打刘桂堂消耗殆尽，飞机运6万发，每兵平均发了不到十粒，8日夜晚和9日夜晚，已经打得差不多了，我已剩下赤手空拳，你得给我想办法。”日本人一样怕死，浅田便把此种情况又用急电报告到承德，并且为了急于逃跑，把战况描绘得特别猛烈。松室孝良怕把我这6000多经得起“考验”的伪军被“抗日同盟军”拉走或者吃掉，30多个日本人跟着丧命，从热河再派出伪军，远水救不了近渴，在11日夜晚决定叫我们向锥子山（围场县）撤退。12日拂晓，抗日同盟军进入多伦。

因为事前双方约好，我出多伦的时候，还表演了一番突围战斗，抗日同盟军亦派人追击了十几里。我便在善丹河停了下来，作出掩护退却的各种姿态，其实我八九天没有得到休息，在善丹河的公积淖尔附近睡了大觉。多伦距锥子山280里，走了六天，日本人认为我退得井然有序。7月20日左右，松室孝良派汽车把我由锥子山接到承德，派日本医生把我的痢疾治

好，共耽误了7天，临走给我补充了20万发子弹，500支步枪和9万元军饷，叫我赶快回去反攻多伦。我因往来承德又磨蹭了4天，距离8月11日的限期还有10天，承德的电报直催我开拔，我以准备没有齐全推诿。约到了8月5日，看看推不过去，便把队伍从锥子山开出，当天走了70里停下。日本人发现我迟疑不前，第二天便派来两架飞机在我的队伍周围扔炸弹，我知道这是对我提出警告，只好加快行军速度，于8日到达距离多伦70余里的峪道口。浅田顾问叫我在9日拂晓攻城，我说对敌情还没有侦察明白，在峪道口住了一天，10日傍晚才到了善丹河沿岸。

这时蒋介石调派军队在平绥路东段加紧威胁抗日同盟军，并令宋哲元回察哈尔劝冯玉祥离开张家口，多伦街、庙两处只有张凌云的2000多步兵和几百察北民团防守。10日夜晚，张凌云派出代表三人到公积淖尔见我，痛哭流涕地请我不要夺回多伦。我说："我不前进，日本人给我扔炸弹，现在你们借用多伦的一个月的期限已到，冯先生并没有办法，回去告诉张旅长，我明天上午12点钟非进多伦街不可，今晚明晨你们很可以腾清，我保证不追击。"我对三个代表各送了一匹马，把他们打发回多伦。第二天，张凌云未曾开走，反而派出骑兵向我军警戒，我决定采用"跟上敌人马尾巴进城"的胡匪战术，把队伍兜成一个大圈，一齐上马，由善丹河向多伦直冲，使抗日同盟军无法招架。尹宝山不同意我的办法，按兵不动，我就带着刘继广的那个支队，跟在抗日同盟军的骑兵后边一拥而冲进多伦街上，因为张凌云的步兵看见自己的骑兵退下，不能开枪射击，等到把自己的骑兵让过，我的兵便跟了上来，以致步兵都措手不及，纷纷退出多伦向南奔跑。尹宝山掌握不住部队，他的所部也朝街上冲过，被我指给去占领庙仓，那里有二三百民团，见尹支队上去，均落荒而走。日本人对我这套胡匪战术，感到非常惊奇，其实我离多伦以前就把几个做小买卖的，收买成我的义务谍报，他们早跑来告给我张凌云进入多伦以后的各种情况。

我进了大街，看见刘继广堵住一个商号的大门洞，墙上爬满了我们的兵，刘说："这是张凌云的旅部，张和旅部的人全被咱们包围在里边，你看如何处理。"我说："放走！叫他们带上武器，找莜麦地隐藏，等到

日本飞机走过后再行动。你向张凌云致意，我因避嫌不能和他见面，他需要什么东西，你给他准备好。”我怕日本人发觉，派人通知他们暂不要进街，说是敌人还未肃清，日本人何乐而不为，便在城外架起电台告捷。不大工夫承德方面就派来一架飞机，我们把对空联络符号摆出，飞机朝南侦察了一阵，没有发现抗日同盟军，便返回承德。等到张凌云的人退净，日本人才进了大街。张凌云走时非常狼狈，连乘马都被我的兵给牵走，刘继广给弄了些烧饼并雇了一头毛驴，将他打发回张家口。

在我让出多伦期间，内部还发生了一件事，就是乌古廷听见我退到锥子山，以为我完蛋了，便把我留在经棚和林西一带的第三支队，归附了伪满的“兴安军”。伪蒙疆的大小头子们，一开始和我共事，就把我当成外派，他们离不开我而又随时想拆我的台和夺我的权。日本人和蒋介石还好对付，就是伪蒙疆的一帮人难斗，使我伤透了脑筋。

改编为伪察东警备军

我第二次占领多伦以后，得到日本人的信任，1933年9月，将我的部队改编为伪察东警备军，任我为司令官，两个支队改称为师，由以前的支队长刘继广和尹宝山担任师长。拨来野炮八门和山炮两门，充实了丁其昌的炮兵大队。另外还成立起一个通信队和一个宪兵队。这时浅田专任多伦的特务机关长，赤峰特务机关长田中玖把他的一个朋友退役大佐下永，介绍给我担任顾问，底下的小顾问和教官，增加到20多人，“特设队”除了那三辆装甲汽车之外，还添了30多辆运输卡车。轻重机枪也不断给我补充起来，一共有100多挺，战斗力较前增加许多。同时察哈尔镶黄旗的营长高乐明山，带500多骑兵投我。不久胡宝山从林西乌古廷部队中，也给我策动回来700多人，加上另外扩充的人，我的人数增加到八九千。

队伍编制就绪以后，我即到长春向关东军司令官谢委。这次是由西苏尼特旗德王府的特务机关长宍浦领我飞到长春见的关东军参谋长小矶。

宍浦说一口北京话，给我任翻译。小矶给我戴高帽子，誉我为“蒙古的英雄”，希望我为“民族复兴事业”做出更大的贡献。并说：“你有什么困难，就近和松室孝良接洽，已经电告他大力支持你的部队。”我为了表示衷心拥护“满蒙政策”，便提起乌古廷在林西带的那1700多名蒙古骑兵，我说：“听说兴安军收编了他们，就让乌古廷带了去吧，都是在关东军领导下为了建立东亚新秩序而效忠嘛。”小矶说：“多伦如果占不住，你把人打光，还得用这部分人扩充，得给你留下。”我说：“我一个人分不开两头，最好让乌古廷带领。”他说：“你的心很好，关东军自有办法。”从由德王府的特务机关长宍浦领我前去以及从小矶和我谈的话看来，日本人一方面培养我为汉奸，一方面还培养我为蒙奸，因此我以后由侵犯察北的罪魁变成“蒙疆”小朝廷的“兵马元帅”。

从1933年8月重占多伦，到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前，国内报纸上称我为“李逆”，我心情特别苦恼。从1933年冬天开始到1935年春天，我学会吸食鸦片，娶了一个小姨太太，更加腐化堕落了。这时多伦成立起日本的“善邻协会”，由中岛万藏负责，街上开设了好几家日本料理馆（妓院兼卖小吃的商店），从承德弄来十几个日本姑娘。特务机关的人和我的那些大小顾问教官，完全过着荒淫无耻的生活，浅田管不了下永，把拨给我的大部分经费和一部分军饷都挥霍在花天酒地上面。我终日陪着日本鬼子过着荒淫无耻的生活，可是我的士兵却吃不上洋面大米，除了两套单棉军服外连衬衣都没有，兵血全叫他们喝了，但我不敢过问，虽松室孝良曾几次问过我有无困难，我只能说是一切很好。我的参谋长陈宝泉思想搞不通很苦闷，有一次在郊外打雁，心不在焉地将猎枪装火药过多，猎枪炸掉左手上三个手指。

我和德王携手以前，也有不少小的政治活动，曾在1934年春天，到承德给张海鹏拜过寿。张海鹏因为我在1922年到库伦旗清剿“蒙匪”时给他递过门生帖子，他的旅长王永清和傅景峰又都跟我结拜，张想把我拉到伪满，所以对李树声（李是崔兴武的驻省办事处长，也兼任我的驻承德的办事处长）按我的代表来看待，对李曾不止一次表示过这种意图。我去承德

给他拜寿时，张的大儿子张子明任旅长，称我为“世兄”。宴会时把松室孝良和我都让到主席的正面。过完寿我去辞行，张又留下我吃饭，他说：“多伦占不住，回热河来，我老了，把兵交给你和子明，你们弟兄两个好好地干。”我这时的队伍，比张海鹏的四五个旅还要人强马壮，争名夺利的资本怎能轻易让人。

因为我把多伦占住，日寇为了统治察哈尔的十二旗群①，为下一步占领绥东做借口，早在1934年夏天，关东军便派金永昌和于兰泽两个蒙古族留日学生，由长春来多伦酝酿成立伪“察哈尔盟”。他们来到多伦，住在日本特务机关。他们先编造了一本察哈尔人物调查资料，呈给关东军司令部审核，据说只有镶黄旗总管卓世海（卓都巴扎布）够上担任伪盟长的资格。卓世海这时参加了百灵庙的“蒙古地方自治政务委员会”（以下简称“蒙政会”），并且在张家口有好多财产，不敢回来担任此一伪职，别的人也都不敢出头，所以后来决定让我兼任这个傀儡盟长。我对蒙古事不感兴趣，要抓枪杆子，坚不担任，临时遂由多伦特务机关在金永昌和于兰泽这两个蒙奸协助下，代行了伪盟公署的职权，向察北各旗群征发皮毛牲畜和粮食，并选拔40多个少年儿童，编为一队童子军，附属在我的伪军里边，由日本教官实施军国民的奴化教育和训练。金永昌和于兰泽直到1936年春天伪“察哈尔盟”正式成立以前，都断断续续地住在多伦，除了做其他特务工作外，专门进行这件分裂活动。

德王投靠日本帝国主义，是通过陶克陶和韩凤林跟关东军拉的关系，直到1934年冬天，我才发现这一秘密。有一天多伦机场上降落下一架从百灵庙来的日本飞机，上边坐着两个蒙古人和一个印度人，印度人和一个蒙古人住到特务机关，另一个蒙古人叫陶克陶到我这里找金永昌，经过介绍得知他们都是关东军司令部“嘱托”（特务），因为金住在我的司令部，陶也一同住下。陶克陶对我说，他们是到百灵庙去见德王，因为德王回了

① 旗群——清末民初年间，内蒙古地方的一种行政区划，相当于现在的旗或县。

苏尼特旗，关东军不叫他们到苏尼特旗去，并且那个印度人急于回国，所以路过多伦休息一夜。据我现在判断，那时德王还不敢公开和日寇勾结，他的身边有蒋介石给派过去的特务，如“蒙政会”的保安处长兼保安大队长韩凤林，就是给关东军和蒋介石都做特务工作。在多伦停下，利用两地特务机关的电台和德王联络。

陶克陶因为没有见上德王，感到非常扫兴，不过一谈起蒙古问题，却扬扬得意起来，表示他在关东军方面比金永昌和于兰泽还要吃得开，想叫我买他的账，他好右手抓德王，左手抓我。我向他表示：“我是一个蒙古人，对于蒙古民族的复兴事业愿意自告奋勇。”并且恭维他：“你必定有更大的贡献。”他说：“那自然啦。”我问他：“蒙古民族真能复兴吗？”他问我：“你看怎样？”我说：“现在我对满蒙政策怀疑，究竟是满洲复兴蒙古，还是蒙古复兴满洲，我没有见过德王，如果见到他以后，请他好好想一想。”我知道陶克陶和金永昌都是关东军的大特务，便拿满洲来指日本，因为这是我对蒙古问题的一贯看法，不过很后悔对他们两个人说出，于是扯起为什么把伪“蒙古自治军”改编为伪满“兴安军”以及乌古廷把我的人编归伪满“兴安军”的闲话。可是陶克陶经我一问，却吐露出他的一部分真实思想，他说：“你们如果对关东军有所怀疑，咱们还有外蒙这一条路，我要是再见了德王，就以此向他打气。”这时金永昌正躺在炕上抽鸦片，猛然坐起来说：“陶克陶你说这话叫关东军听见，有没有危险？”陶克陶脸色大变，和金永昌说：“我跟子忠（我的字）随便闲扯，现在关东军毫无疑问支持我们，万一关东军不理我们以后，就得走这条路。”陶克陶因为失言，没再对我和金永昌谈其他事情，假装乘坐飞机疲劳，就蒙头睡了觉。我也躺下闭上眼睛思想心事，只金永昌抽足鸦片才睡。第二天上午，陶克陶便带着那个印度人和另一个蒙古人回了长春。后来金永昌把陶克陶的话报告了关东军司令部，经我向田中玖代陶克陶解释，才没有深究。

我和陶克陶与金永昌，在这天晚上可以说是同床异梦。根据乌古廷把我的队伍带到伪满，德王在百灵庙走着两条路线，陶克陶还有投奔外蒙

古的意图以及金永昌警告陶克陶，等等，使我愈加认识到内蒙古的这些王公、贵族和接受了日本文化的知识分子，都很滑头滑脑，在政治上乱拉关系，并且互相排斥猜忌。所以从此以后，我对他们更加提防，尽量避免卷入。那时已经清楚地看出有三个蒙古组织，一是百灵庙的“蒙政会”，一是伪满的兴安军，另一个便是我的伪察东警备军。伪兴安军和我有矛盾，“蒙政会”也会错打我的主意，我决定了以后要紧紧靠拢关东军，牢牢抓住自己的队伍，少和人谈论政治，少与蒙古的上层接触。不久，金永昌告诉我韩凤林在北平遇害，更使我感到脚踏两只船的危险和骑墙派的可怕。关于韩凤林的死，据我以后了解，蒋介石曾于1934年责问德王勾结日本，德王可能把一切都推在韩凤林身上，所以韩凤林回北平探家时，由军统特务刘建华（曾任伪厚和市警察局长，因和马汉三联络暴露，从呼和浩特跑到准噶尔旗，担任了马占山部慕新亚骑五师的副师长），半夜叫门架走，据说按军统叛徒制裁杀害。这话是伪“蒙古军”成立以后我的师长韩凤楼对我说的（韩凤楼是韩凤林的哥哥）。

德王在百灵庙外受傅作义的威胁，内部分成东西两派，还有白海凤和朱实夫等主张抗日派，使他感到自己孤单和“蒙政会”的环境复杂，早就想到了我的这部分武装力量，但没有关系深厚的人给他联络。继韩凤林给他担任保安队长的宝贵廷，拉扯起来算是我的一个内弟。他听到德王老念叨我，便说：“李守信是我的姐夫。”德王遂派他为代表，来和我联络。宝贵廷原从土默特右旗出来先给我当文书上士，当时我是奉军骑兵独立第九旅二团赵国增部的营长，我把他介绍到团部，赵国增又将他保送至“东北讲武堂”深造，和乌古廷同期同学。毕业后回到热河，汤玉麟正利用蒙古族人，所以他们连一天兵都没有带过，便成了陆军少校，担任参谋和副官一类的角色。热河沦陷和汤玉麟失败后，宝贵廷跑到北平住闲，生活没有办法，听见德王在百灵庙成立“蒙政会”，便跑到百灵庙投效德王。韩凤林死后，他因代理队长爬在德王身边。

宝贵廷在韩凤林死后疑神疑鬼，没敢从百灵庙经草地前来多伦，而是由归绥，经平绥路和北宁路，进入伪满境内，由通辽绕到林西，先住到乌

古廷那里。他从百灵庙出发以前，德王通过日本人，给我寄到多伦特务机关一封介绍宝贵廷的信。这时多伦的特务机关长由浅田换成了浅海，有一天浅海突然问我："宝音德力格尔是谁？"我忘了宝贵廷的蒙古名字，我说："认不得。"浅海便没有叫我看德王的来信，也没有再说什么，使我非常纳闷。半个月以后，乌古廷从林西给我打来电话，说是"宝音德力格尔已经到了我这里，他要到你那里去"。我问："谁叫宝音德力格尔？"他说："就是宝贵廷。"我又问他："宝见我干啥？"乌说："他给德王当代表，可否我代表你跟他接谈，叫他不要去多伦，恐怕引起日本人误会。"这时乌古廷在伪满"兴安军"里，因为一半人被胡宝山拉走，伪满对他已不重视，待在林西并不得意，很想巴结德王。我一听乌古廷的口气，知道他有自己的打算，便对他说："此事日本人早就知道了，我得请示特务机关。"我到特务机关向浅海说："宝音德力格尔汉名宝贵廷，是我的一个亲戚，他是德王的代表，已由百灵庙来到林西，是不是让他到多伦来。"浅海说："叫他来吧！"我给乌古廷又去电话，说是："特务机关叫他来多伦。"乌古廷派了四个兵把宝贵廷保护到多伦。

伪"蒙疆"的大小头子们，都不把我当蒙古人来看待，连宝贵廷也认为我是老粗，不懂政治。他走进德王的门墙，很看不起我这个姐夫，所以对于德王的内幕跟我只字不提。我问他："你为什么绕道而来？"他说："直接走路上有危险。"我又问他："德王为什么要联络我？"他说："德王力量单薄，恐怕傅作义打他，希望和你联合起来，复兴咱们的民族。"后来我刺探他："德王是否已经和关东军勾结？为什么把信寄到多伦特务机关？是德王自己想联络我？还是关东军叫德王这么办？"宝贵廷说不知道。我一看这个小政客的鬼鬼祟祟的样子，便不再跟他深谈，只对他表示："你回去告给德王，我很佩服他，至于两人今后如何合作，我得听关东军的命令。"我因处处小心，说完话即领上宝贵廷去见浅海机关长。浅海要留我们吃饭，我托故回了司令部，他被留在特务机关，深夜才回我家中休息。不知他要了些什么手段，引起日本人对他的重视，第二天即由于兰泽领上飞往长春，后来飞回苏尼特，从那里回了百灵庙。

德王到了这年冬天，才在多伦飞机场上和我初次见面。因为这时百灵庙“蒙政会”快要分裂，由于德王以云王名义免去西公旗石王的札萨克职，引起绥远乌、伊两盟王公的反对，傅作义策划成立察绥两个蒙政会，于是德王的反心日益暴露。他是到长春见过关东军司令官植田谦吉，回苏尼特路过多伦降落，停飞机半小时，匆匆和我会谈。我虽然不愿当汉奸的崽子，但是和德王还没有共事过，心里以为他是个不平凡的王公，所以带着参谋长和两个师长，并令副参谋长刘正中率领着200兵组成仪仗队，到飞机场表示隆重欢迎。多伦特务机关长浅海，“善邻协会”会长中岛，我的顾问下永，以及来到多伦的西苏尼特旗特务机关长宍浦，也到了机场。德王乘坐一架四引擎飞机，里边除了司机还有五个戴校级肩章的日本人。他拖着长辫子，在军号中走下飞机和日本人握手寒暄后，跟我开始了简短的谈话，因为我的顾问下永跟在我身后四五步地方偷听，使我们不能畅所欲言。

他首先问我：“你的军队有多少人？”我不愿告给他真实数目，只对他说：“有五六千人，没有好武器。”他又问我：“有多少蒙古人？”我说：“留在林西的有1700人，带到多伦是少数，并且不是草地的蒙古人。”他希望我给他成立一团蒙古骑兵，作为他的警卫和建军的基干，他要派一个国民党军校毕业的蒙古族学生前来训练这个部队。并且叫我越快越好，他急用，因为百灵庙没多少兵，怕傅作义前去袭击。他还问我：“百灵庙吃紧时，你从多伦支援，几天可到？”我说：“急行军三天可到。”他喜形于色地说：“这可好了，我有了底了。”又说：“关东军给我拨下50万交通票，我已汇到天津。”我说：“我不需要钱。你还有什么事？”他说：“见到你以后，我放了心，我们今后要加强联络，这里有电台，我那里也有电台。”我说：“电台是日本人的，咱们要直接联络。”他说：“对得很，只是如何联络？”我说：“你用‘传箭’（蒙古王公有了紧急事，拿上令箭和公文叫牧民日夜传送），我用快骑。”因为飞机上的日本人催着叫他赶快走，我们的初次会见，就如此结束。

德王飞走以后，我和日本人一齐回到特务机关，浅海问我德王和我谈了一些什么话，我把前半段告诉他，至于我和德王直接联络的事，当然不

对他说。这天多伦特务机关为我和德王会见举行了宴会，日本人都因我和德王联合在一起而祝酒。可见德王路过多伦会见我是关东军的指示，我对此很感不安，恐怕在中间插进一个蒙古上司。

我答应给德王成立一个骑兵团，舍不得贴本，要了一个手段，再让胡宝山从乌古廷那里往出拉兵，于是从林西跑来枪马齐全的600多人，给德王凑了一个警卫团。乌古廷因部队跑得所剩无几，最后被伪满的“兴安军”踢出，在1936年春天，不得不离开林西到嘉卜寺投靠德王。德王派南京军校毕业的喀喇沁左旗人乌云飞，悄悄地从百灵庙来到多伦，训练了一个时期，带往嘉卜寺，后来由“蒙政会”的代理保安队长宝贵廷充任了这个警卫团的团长。我给德王成立起一团人，不但一文钱未给，而且自从见面以后，迄未按照我告给他的办法直接和我联络过。他以为我已经成了他的仆从，有事可以发号施令，根本用不着和我商量，使我很后悔。从此我把德王看成一个志大眼小的人，决定不依附他，未来的前途和出路还得指望自己的枪杆子去打。

占领察北六县经过

1933年8月，冯玉祥离开张家口，宋哲元重主察政，察哈尔北部又恢复了7月间“抗日同盟军”进攻多伦以前的那种状态。1935年，情况有所转变，先是1月间日寇派飞机轰炸赤城、龙关。2月间中日双方在大滩开会，决定二十九军的部队撤至长城底下驻防。在张家口外，也发生了年前的“第一次张北事件”和6月间的“第二次张北事件”，结果由察哈尔代理主席秦德纯和关东军代表土肥原贤二订立了中日双方驻军以长城为界的协定。因为我的伪军还没奉令南犯，二十九军对此不曾履行，这是由于《何梅协定》签订后日本人已把东北军于学忠部从河北逼走，想叫宋哲元暂时维持冀察两省局面，故在察北方面不好意思过于压迫二十九军。

我于1933年4月投敌，到1935年，和日本人相处了两年多，渐渐习惯了

当汉奸的那种生活。后来，看到北平的何应钦向日本人屈膝，宋哲元也和日本人勾结起来，便产生了“老子是挂牌的娼妓，你们是半开门的婊子，咱们谁也不要笑话谁，都是些孬种”的想法。特别是1935年冬天和德王在多伦机场上会了一面，拿上“复兴民族”的大幌子，更给我的投敌做了遮羞布。所以在1935年12月，由多伦进犯察北六县的时候，我野心大增，想把察北完全占领以后，下一步去夺张家口，幻想如同我的汉奸老师张海鹏那样，过一过伪察哈尔省长的老瘾。

察北的战事于12月开始，在11月间就做了准备，我看见子弹不断由承德运来，便和人们说：“快打仗了。”因为多伦特务机关和我的日本顾问，只是在出发的时候给我下达命令，事前并不跟我商量，我也不敢打听，所以只好揣测。最初我认为是进驻百灵庙，因而我给官兵们买了好多毛鞋，把多伦街上的毛鞋完全买光。由于日本顾问掌握着经费，我是用卖了自己从热河带出的十几辆马车和100多头骆驼的钱给官兵买的毛鞋。还有300多兵出发以后因无毛鞋而把腿冻肿，都由前方抬回多伦，被特务机关长浅海看见。浅海报告了关东军司令部，派田中隆吉参谋前来查办。经过调查，下永贪污了好几十万，进入张北以前即把他撤换，以后经费由我掌握，到了张北我开始有了钱。

当时察北六县，只张北驻有二十九军刘汝明的部队，其他各县只有警察和民团维持秩序。12月中旬某日，多伦特务机关向我发布了南犯的命令，宝昌因为没有防守的价值，我们未到以前，当地警察民团即弃城逃走。根据便衣侦察，沽源城内有白凤山所带的三四百民团据守，我为了夸功，诓报日本人说是有二十九军的一旅骑兵。独石口外最大的商镇平定堡，内有天主教堂，察北的地主富户都逃到那里，上边飘扬着比利时国旗，日本人怕引起国际纠纷，禁止我们攻打该地，所以决定只攻沽源县城。由宝昌出发时，下永顾问除了把八门野炮留下，保护20多个日本人和40多个蒙古童子军，并且叫我也不要上前线，指定参谋长陈宝泉，指挥刘继广和尹宝山带着两门山炮，掩护骑兵去攻城。我撇过下永顾问，和参谋长、师长及副参谋长刘正中说：“下永支配我，小顾问支配你们，你们要

听他们，有时也不要听他们，攻城时先用山炮打开豁口，骑兵再往里冲，把敌人轰跑以后，即不要追击。”参谋长陈宝泉一言不发，心情特别愁苦，我怕他们路上寒冷，给了他们一打威士忌酒，陈宝泉当时拿过一瓶就喝了大半，我把那半瓶酒抢过，他才勉强上了马，去追赶队伍。

防守沽源的白凤山，在察北与曹凯齐名，虽是一个天主教徒，但很热爱祖国，他把三门紧闭，将沙袋堆在土城墙上固守。沽源离宝昌约90里路，我的6000多骑兵，当天就到达城外，里边的三四百人毫不恐惧。我军于第二天拂晓发动攻击，陈宝泉没按我的指示指挥队伍，而是将沽源四面包围，两门山炮架在城西的小土山上，朝着城里的县政府乱打，结果把所带的70发炮弹打得剩下2发，也没有将城攻开。刘继广的兵在城墙底下喊话，叫里边缴枪投降，白凤山的人当然不听这一套，我的兵一露头就被打。从多伦派来两架飞机助战，白的人亦不动摇。飞机往城内扔完炸弹，在城北扔下一个通信筒，松井顾问派兵把通信筒捡起，坐上卧车开到北门外边，到刘继广的指挥所进行研究，陈宝泉本来在西门外掌握部队，见有人捡起通信筒开上汽车到达北门外，他也骑着马跑到刘继广那里。刘的指挥所是三间土房，距北门有一箭之地，刘站在房檐底下，陈和松井竟在汽车跟前拆看信筒，遂被白凤山防守北门的民团发现，朝着他们放了一排枪，子弹从陈宝泉的脑部穿过将松井的肩章打成粉碎。刘继广用火力压制住北门，才和松井把陈宝泉的尸体抬上汽车，下午运回宝昌。

我一见参谋长阵亡，当时就发了毛，将八门野炮全装上汽车，下永顾问没敢阻拦，两个钟头就开到沽源城外。因为天已昏黑，我叫把八门野炮摆在城北，决定翌日拂晓攻城，下令不许放走一个民团。夜里又想，不能在沽源充好汉，还是少杀中国人为妙，因此又叫刘继广放开东门，好让白凤山撤走，能把沽源占领，就算对日本人的公事有了交代。第二天攻击时，八门野炮集中只打一点，各发了两炮，就将北城墙轰开，看见白凤山的骑兵从东门跑出，才叫我的兵冲入。他们捉住十几个没有跑脱的民团，主张都弄到宝昌给参谋长祭灵，我不忍完全杀害，又怕日本人知道我故意放脱白凤山，只把一个俘虏弄到宝昌，被20多个日本人在陈宝泉的灵棚前

用刺刀活活戳死。我占领沽源以后，康保、尚义和商都，都没有遇到抵抗，尹宝山部就开入。尹宝山并把一团人开进绥东陶林县城。陶林是绥远主席傅作义的地盘，因为兵力不够分配，集中队伍去防守集宁，才临时把陶林放弃。我不愿意两面作战，腹背受敌，认为占领察北是履行秦德纯和土肥原的协定，占领绥东五县还找不到借口。宋哲元已经和日本人勾搭，他弃守察北不会成为多大的问题；傅作义抗日，我进犯绥东一定要惹麻烦。我通知尹宝山，叫他千万不要继续前进，建议下永顾问要趁势占领张北。大概是关东军叫我们看一看能否在绥东立足，让我和下永由沽源飞陶林视察。我们上午飞到陶林，午饭后，我趁出去解手时向那进入陶林的团长使了一个眼色，在厕所中和他说："傅军一来，你就往出撤。"我们回去和下永没有抽完一支烟，突然又来了一架飞机，叫我们两人赶快坐上，说到多伦有要紧事情研究。回到多伦特务机关，里边坐着关东军的参谋田中隆吉，他问我："李司令官！你对战局有何看法？关东军相信你，并且特别尊重你的意见。"我说："现在先要占领张北，把察北攻下再图绥东。"他说："这很对，我们也是这样打算。"当天浅海叫我把队伍都抽回来去占领张北。

我占领张北的时候，没有遭到二十九军的抵抗，他们事先就撤回张家口，连张北和张家口中间的大坝上，也没有布置队伍，所以我的骑兵一直冲到大境门外。我进张北是1935年12月31日白天，第二天是1936年的元旦。田中玖是元月初旬到的张北。

张北距张家口约120里，中间有一道大坝，从张北往南走50余里上了梁顶，再往南约70里全是下坡。我在这个梁顶布置了一团人，警戒张家口的二十九军，并派便衣侦察其他情况。因为田中玖是我最初接触的日本人，我看成知己朋友，所以用不着等我要求，他便向关东军司令部替我说了好话。占领张北没有多久，便对我的部队真给装备起来，一次拨来1.2万支"韩林春"式步枪，30多门野炮，30多门重迫击炮，30多挺重机关枪，100多挺轻机关枪，还有日造的"拐把子轻机枪"四五十挺。

当这批武器在2月间由沈阳运来以前，田中玖曾开上自己的卧车去了

大坝梁顶上好几次，他把汽车停下，张家口也开出一辆小卧车，我的兵以为是张家口日本领事馆的，不敢制止，不敢盘问，只站在老远的地方保护他们的安全。我接到类似这样的几次报告，感到里边有重大秘密，便托在张家口经商的一个朋友王子玉替我了解从张家口开出的汽车里边坐着谁。原来，王开设着一个“东鲁汽车公司”，往来通辽和林西搞运输。我占领多伦后，“东鲁”的汽车也跟到那里，我占领张北后，又在张北和张家口之间开行。王是山东人，二十九军里有他的熟朋友。调查结果，知道是察哈尔省政府主席刘汝明的秘书杜运宇和田中玖会谈，其他情况没有打听出来。杜也是山东人，在日本留学时娶了一个日本老婆，由于他很早就当了汉奸，所以张家口沦陷时曾代理过察哈尔省政府主席，伪“蒙疆政府”成立以后，他一直担任司法部长。

由于刘汝明和日寇暗中勾结，关东军拨给我的武器，不是由沈阳经承德用汽车运来张北，而是用火车运到张家口，我派日本人驾驶的汽车接运。“七七事变”以前的弹药服装，都是如此的运法。所以给我拨的1.2万支步枪被刘汝明留下2000支，运到张北的30门野炮，也给刘汝明运回张家口8门。这时我的8000多人，一律都换上新枪，子弹堆满仓库，大概拨来2000万发。我叫尹宝山师驻在商都向绥东警戒，刘继广师布置在外围，保护张北县城。《何梅协定》签订以后，华北各重要城市都有了日本特务机关，张家口是由领事馆代替特务机关，归绥的特务机关长是羽山少佐，张家口的领事和归绥的羽山，均受张北的田中玖指挥。田中玖有时对我也吐露一些真情实况，在1936年3月间，就叫我准备进犯绥东。他说：“德王已被傅作义从绥远撵出，对于察哈尔长城以南的地方，咱们暂不攻打，但是对于绥东则必须占领，这样你们复兴蒙古就有了地盘。日本军队还不能出面参加，需要德王和你以及王英与冀东方面共同出兵，他们都没力量，进攻绥东以你为主力，关东军所以装备你就是为此，你要作出贡献。”

田中玖和我说了这话不久，有一天上午七八点，突然叫我跟上他和羽山少佐坐飞机到归绥上空侦察。这时傅作义以建筑环城马路为名，在归绥旧城构筑了国防工事，我们飞到旧城上空，飞机盘旋很低，我都能用肉眼

看见碉堡，田中玖和羽山少佐均拿出照相机把底下的一切都拍入镜头。飞机飞到西河沿时，见一个女人在院子里挥动日本国旗，羽山笑着和我说："这是我的老婆。"我们侦察完毕，往武川飞的时候，飞机发生了故障，便在归绥北面红山口以东的小尖山前面的平滩上落下。附近的老百姓有好多人正在耕地，谁也不敢过去观看。傅作义因为标榜着"有事不怕事"和"无事不惹事"的对日主张，亦未派出骑兵来盘查。我们都很着急，田中玖和羽山跳了下去，寻找飞机的毛病，叫我坐在机舱中不要露面。好在飞机是丢了一个螺丝，修了半个多钟头，即继续发动，飞向张北县。

乌珠穆沁会议以前

我于1935年底进入张北后，到翌年4月24日"乌珠穆沁会议"决定将我的队伍改编为伪"蒙古军"前这一阶段，由于我把察北完全控制，日本人又给了那么多的武器，比在多伦时，渐渐引起各方面的重视。首先是宋哲元想拉我过去，曾托我的团长陈景春向我试探，我怕宋哲元把陈拉走，占领张北后，即由刘继广部将他拨归尹宝山指挥，调到商都南壕堑驻防。因为宁得罪远亲，不得罪近邻，听见宋哲元在北平给他母亲过寿，我主动叫陈景春代表我前去祝寿，送了一架我亲手在围场打住的15两重的梅花鹿茸，宋赠了我一块价值400元的怀表。后来宋哲元说他子弹困难，我叫陈景春送到柴沟堡车站30万发，宋以为我倾向于他，故最后托陈景春对我劝降。

陈景春对我说："宋主席对你非常钦佩，特地派代表来跟我接头，希望咱们和他们合作在一起抗日，故来向你报告。"陈景春比我年长，我说："大哥！咱们暂不谈别的，我先问你，宋哲元能给我二十九军的军长吗？能给你扩充枪马齐全的一师骑兵吗？"陈说："我头脑简单，没有想到这个。"我说："宋哲元并不比我大，我也不见得比宋哲元小，他虽是蒋介石的干儿子，在日本人跟前还不如我吃香，咱们要直接找老蒋，我不拐宋哲元这个弯。"陈景春问我："难道咱们不抗日吗？"我说："我叫

你送给他子弹难道是叫他杀中国人吗？”我并说：“现在日本人正给咱们扩充，最好不要节外生枝，到了一定程度和适当时机，我自有办法。你不要以为我和德王已经联合，这完全是扯淡，他们把我按汉人看待，我也以汉人自居。”我还说：“咱们现在是戴着假面具，没有揭破就尽量装着，多装一天能多得到补给，到了装不下去以后，再反正也不迟。有这一万枪支人马，谁也欢迎咱们，不要愁拿上一颗肥猪头找不见庙门。”陈景春认为我说得很有道理，以后便不跟我谈论此事。

继宋哲元之后，傅作义也派代表来跟我接洽。因为察北沦陷和冀察两省“特殊化”以后，张家口成了一个策动侵犯绥东的地方，故傅把绥远省政府的交际处长刘云峰调到张家口担任办事处长。这个人很能钻营，不知用什么方法和“东鲁汽车公司”的经理王子玉拉上关系。一天刘继广叫我到他的公馆中去吃饭，说是顺便谈一件要紧事情。我到了以后，看见王子玉和一个穿便衣的陌生人也在刘继广那里。刘继广向我说：“这是子玉的朋友，绥远傅主席的代表刘云峰处长。”刘指着地上堆的成箱整篓的糕点水果对我说：“傅先生知道李司令官在察北非常艰苦，特派我来代表他向您问候。”寒暄过后谈到正题，我一听是傅作义闻听我和刘汝明弄了日本人很多武器，他因受阎锡山压制克扣，也想诓骗一些武器弹药，以扩充自己的力量，故打发刘云峰来向我“问道儿”。我说：“羽山不是在归绥吗，你们可以和他直接去谈。”刘说：“羽山是少佐，不如田中玖大佐在关东军说话有力量。”我说：“你想和田中玖接谈，恕我不能给当介绍人，要找其他关系拉线，谈的时候应该张大口，数目越多越好，傅主席为了爱国走这条路，我对他很表同情。”刘云峰只见过我一次，我叫王子玉在张家口买了一些回敬傅作义的礼物。

由于我刚愎自用，除了主要依靠汉人给我扛着八九千支枪，在政治上可以说非常孤立，故只好认贼作父。德王因1936年1月25日国民党政府公布了两个“蒙政会”的组织大纲，指定绥境“蒙政会”设于伊盟的伊金霍洛，察境“蒙政会”设于锡盟的嘉卜寺。并且因傅作义支持西公旗的石王，派兵占了乌拉山里边的梅力更庙，将倾向德王的依喜达克登尔大喇嘛

击毙，给他很大的难堪。他因“蒙政会”分裂，不能在绥远立足，曾在我占领张北不久，在苏尼特举行一次所谓“滂江会议”。因为德王本人和其左右，从我和他开始合作以后，许多大事都对我回避，老瞒着我去搞，所以这次会议既没有让我前去参加，也未告诉我开会的内容。据我判断无非是更进一步投靠日本，撕破脸充当汉奸，企图坐伪蒙的傀儡儿皇帝。为了首先对傅作义进行报复，把已策划组织的伪“察哈尔盟”变成事实，好为进犯绥东做借口。他在召开“乌珠穆沁会议”以前，突然坐汽车跑到了张北。

在1934年金永昌和于兰泽到多伦策划组织伪“察哈尔盟”时，卓世海未敢担任伪盟长，现在他在百灵庙已经待不下去，当我占领张北不久，卓就主动派人向我联系，说是想回家看看，试探我是否对他支持。由于我不是察哈尔人，他回来和我利害不冲突，故叫他放心回来。他于2月间到了张北，住在熟惯的商号里边，没有回镶黄旗，一直要等到德王到来。我不愿意替德王领导的这一帮蒙古人卖命，对于他们演的丑剧，只做旁观者。卓世海和我没谈别的，我也不对他打听一切，我们维持着普通朋友的关系。

蒋介石为了叫德王悬崖勒马，服从他的察绥分治主张，除了以救济察北和锡盟的雪灾为名，给察境“蒙政会”拨了八万元赈款，并派白云梯由南京来苏尼特劝止。因为伪“察哈尔盟”一旦成立，绥东五县就会发生问题。继派吴鹤龄和尼冠洲前来张北，阻止卓世海就任伪职。吴是喀喇沁人，尼是察哈尔人，白是跟着德王由苏尼特来到张北，吴和尼两人相随着由张家口来到张北，等到德王来到以后，他们两人才露了面。随德王来到张北的，除了白云梯，还有东苏尼特旗的郭王，布里亚特的迪鲁瓦喇嘛和“蒙政会”的包悦卿。德王住在张北特务机关长田中玖那里，他没有过来看我，也没叫我去看他，和他同住的还有由长春刚从飞机下来的关东军参谋田中隆吉。白、包和郭王以及迪鲁瓦，都下榻到我的司令部，白和包是内蒙古的知名人士，郭王是个笃信喇嘛教的人，迪鲁瓦带领的布里亚特人那时正流浪在宝昌一带。

第二天伪“察哈尔盟”就要成立，晚上卓世海带着尼冠洲来见众人，尼的仪表和谈吐相当文雅，他说他不同意这个盟的成立，我才知众人这次

来张北是专搞此事。尼说出此话，卓世海没有搭理，郭王和迪鲁瓦因为听不懂汉话，都闭着眼睛念佛，白云梯和包悦卿亦不表示意见，我当然更不好意思打听。客室中沉默了一阵，我叫厨房给开饭，饭后卓世海和尼冠洲辞走，金永昌从特务机关来到，我问："尼冠洲是何许人？"金说："他是跑到南京的察哈尔部的一个总管。"来我这里的人都各怀着心事，郭王和迪鲁瓦打坐养神，包悦卿不住气地抽鸦片，我见白云梯躺在炕上无聊，便和他闲扯起从外蒙古往内蒙古运枪的往事，我并且很冒失地问他为什么由左向右转，他没说出个"所以然"来，只是我提起伪"蒙古自治军"的白云航，他说是他的弟弟。

第二天早晨吃过饭，众人叫我也去参加伪"察哈尔盟"的成立典礼。举行典礼的地方，在一个有三间土房的小院里边。这三间土房两明一暗，是特务机关叫我放的刘县长派人把住户撵走，做了未来的伪盟公署。我们走进外间，已经先到了20多人，打开里间的门一看，德王和两个田中在说话，德王这才向我打了一个招呼。不久卓世海来到，也走进去和他们嘀咕，我识趣地走出那三间土房，众人亦跟着我到院子里边散步。我发现20多个人里边，有一个长着鹰鼻子的人，跑到墙拐角望着天上的白云沉思，我看见他的相貌长得非常阴险，由不得对他上下打量，金永昌走到我的跟前对我悄悄地说："这就是吴鹤龄。"不久卓世海出来，叫众人进去开会，卓站在桌子后边，我们都站在桌子前边，卓宣誓完毕，两个田中和德王都来致辞，伪"察哈尔盟"就这样成立，出来时门口已挂上了牌子。

这天德王的气色很不好看。我们送他和田中隆吉到北门外飞机场坐飞机回苏尼特时，他神情紧张地把我拉过一旁，对我说："你给吴鹤龄弄五箱汽油，叫他赶快坐上我从苏尼特开来的汽车走，上边有15个兵保护，越快越好。"我知道这里边有问题，因为机场上的人很多。故未向德王打听，只说了一声"好吧"。白云梯、包悦卿、郭王和迪鲁瓦都没有走，我领上他们回司令部去吃午饭。饭还没有摆好，外边的卫士便来报告，说是有一个姓吴的人坐着一辆卡车前来，要五箱子汽油，我叫副官给搬去五箱，因为事情紧急，没有留下他和众人在一起吃饭。我们正吃饭时，西门

的卫兵给副官处打来电话，问有一辆汽车要出城，允许不允许出去，副官处向我请示，我说："不许拦阻。"原来日本的小顾问们给四门下了命令，不准随便放汽车出城，吴鹤龄因西门走不出去，改走北门，北门外是飞机场，汽车来往很多，才跟着好多汽车混出张北县城。

白云梯、包悦卿、郭王和迪鲁瓦以及尼冠洲，都于饭后乘商车回张家口，白云梯等都是在我司令部门口上车，尼冠洲因住在卓世海那里，是从街上上的车。我要出城送他们，白云梯等在门口拦住，都很沮丧地说："你事忙用不着了。"他们这部汽车是包的商车，于下午1点多钟离开张北，到了3点多钟的时候，田中玖叫我和刘继广以及驻在张北的两个团长去特务机关开会。他说："刚才开出张北的一部汽车，走在离城约18里的地方被胡匪给抢了，还打死一个蒙古人，你们赶快派队伍去追。"我一听非常吃惊，不知被打死的是白云梯还是尼冠洲，总是他们因为阻挠伪"察哈尔盟"成立，遭了日本人的毒手。我们从特务机关出来，刘继广和两个团长问我："追到什么程度为止？"我说："追什么！出去绕一个圈就回来。"队伍开出去不久，我回到家里躺在炕上抽鸦片烟，盘算当天下午发生的一些事情。突然田中玖的卧车开到，他亲自从车上扛下一捆日本的"将校呢"，气喘吁吁地走进我的卧室。他说："这个给你，你给团长以上的军官都做一套，这是关东军的赏赐，你收下吧。"我知道他是杀了一个蒙古人以警告其他蒙古人，又怕我带的大小汉奸产生兔死狐悲之感，故拿上"将校呢"安慰我们。他再没提汽车被劫的事，我也装糊涂，扯了一些闲话，他抽了一支烟便辞走。

我对内蒙古这些所谓知识分子，虽然越接触越感觉他们滑头，但是到了这个节骨眼上，又关心起吴鹤龄的安全。便赶快给嘉卜寺的宝贵廷打电话，我知道田中玖的表弟草野谷在德王的警卫团当顾问，我怕吴鹤龄去苏尼特走进嘉卜寺遇害，叫宝贵廷派出人拦阻汽车，让吴鹤龄直赴苏尼特。宝问我是什么意思，我说："这是你们王爷叫我传达的命令。"果不出我所料，我刚吃过晚饭，便被田中玖叫到特务机关闲扯，直扯到三更天才叫我回家。因为嘉卜寺距张北县400多里，他怕我夜深人静给打电话，哪知

道我在晚饭以前就通知了宝贵廷。我为此事一夜未曾睡觉，第二天就叫胡宝山给我调查汽车被劫的真相。原来张北的特务机关由我派出一排蒙古兵守卫，据守卫的兵向胡吐露，在伪“察哈尔盟”成立的那天下午，特务机关的日本人大杉，从他们排里挑出10个人，都带上武器上了汽车，外边用帆布盖着开出张北南门，去追赶那辆商车，追到小孤山附近叫商车停下，大杉问：“谁姓尼？卓盟长请你回张北去。”尼冠洲下了商车走到大杉跟前，当即被大杉掏出手枪击毙，让那辆商车继续开往张家口。尼冠洲是否也像韩凤林那样脚踏两只船，我不很清楚，只是知道因为伪“察哈尔盟”的成立，他是最先流了血。

大杉带着10个兵打死尼返回张北，没停留多久，便继续开出西门去追吴鹤龄。吴鹤龄的车开得很快，大杉望见吴鹤龄的车距离嘉卜寺不远，才连夜折回张北。因为时在半夜三更，宝贵廷没有重视这事，根本没打发人拦车，所以吴鹤龄的车开入嘉卜寺。草野谷接到田中玖的电话，看见吴带着15名苏尼特兵，自己不敢下手，叫宝贵廷下手，弄得宝左右为难，直撵吴鹤龄赶快走。吴因疲劳不堪，又受了惊怕，知道在嘉卜寺相当保险，所以赖在宝贵廷的团部不走，等到第二天天亮，才坐上汽车到了苏尼特。以后吴鹤龄任了伪“蒙疆政府”的政务院长，宝贵廷也升了伪“蒙古军”的师长。吴曾被人们目为伪蒙疆的宰相，但是他肚子里撑不开船，由于宝给他下过逐客令，故对宝始终怀恨在心。对我暗中搭救他也没有表示过谢意，认为我是德王的部下，应该对他进行保护。我就是在日本人的威胁下不得不和类似吴鹤龄的这一帮人共事，于1936年4月24日“乌珠穆沁会议”以后，参加了德王在嘉卜寺成立的伪“蒙古军政府”，在我的个人历史上，又进入了一个新的罪恶阶段。

（1966年）

抗战前我勾结日军的罪恶活动

德穆楚克栋鲁普

从“九一八”事变以后，我为了实现个人的政治野心，逐步走上了背叛祖国、勾结日军的罪恶道路，为日本帝国主义势力深入内蒙，把持军事，操纵政治，垄断经济，制造了方便条件，给内蒙古人民带来了无穷的灾难。经过解放以来党的改造、教育，使我认识到自己的罪恶严重，同时也体会到只有在中国共产党、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下，内蒙古人民才得到解放，才有真正的自治和繁荣。现先将我在“七七”事变以前的罪恶活动写出来，今后还愿继续写述，以告罪于全国人民。

百灵庙蒙古“自治”运动的前后

1. “九一八”事变后日军最初对西蒙的阴谋活动

“九一八”事变后，日军侵占了东北四省，内蒙古东部各盟旗也随之沦陷。继而日军的侵略魔掌又伸向西部各盟旗，首当其冲的是与热河接壤的锡林郭勒、察哈尔两盟。起初以“满蒙联合”为口号，企图诱使各盟旗王公加入伪满，继又以所谓大蒙古主义煽惑各盟旗王公，说什么“收复故土”“恢复成吉思汗的旧业”，等等。日军除派遣特务间谍深入各盟旗进

行秘密活动外，还不断派遣军政人员前来进行政治拉拢，威胁利诱，无所不至。

在百灵庙蒙古地方自治运动以前，日军拉拢蒙古王公是以锡盟盟长索王（索诺木拉布坦）为主要对象的。伪满洲国成立后，日本关东军曾派依田四郎到乌珠穆沁右旗劝诱索王“归向”伪满。嗣又派参谋田中玖带同蒙语翻译金永昌前来劝诱索王赴伪满参观，并要求在锡盟设置特务机关，安装电台。索王因在“九一八”事变后曾派人到海拉尔向凌升探询日本对蒙旗的态度，凌升表示说：“日本人最厉害，最好不要同日本人合作。”从此索王对日本人存有戒心，因而使日本人的两次诱骗阴谋皆未能得逞。

当时日军虽以索王为拉拢的主要对象，对我这个副盟长（我当时是苏尼特右旗札萨克兼锡盟副盟长）也并没有放过。早在1930年冬，驻在张家口的日本特务盛岛角芳等曾以游历为名，到我旗以及贝子庙、浩特济左旗、乌珠穆沁右旗进行活动。1931年夏我到北平时，盛岛和日本军事教授英佐在扶桑馆请我吃饭。席间盛岛盛赞成吉思汗的“丰功伟业”，以迎合我、煽动我。1932年，日本陆军大将林铣十郎、大佐松井石根、函介笹目到我旗“游历”，到后却冒充喇嘛，长期潜伏在我旗庙上做谍报工作。盛岛也常来我旗、贝子庙、乌珠穆沁旗等地活动。

2. 向蒋要内蒙古军权、政权均未如愿

我早就抱有掌握内蒙古封建统治大权的政治野心。“九一八”事变后，我看到国民党政府无力顾及边陲，就想联合各盟旗王公，趁机向国民党政府讨价还价，以扩充自己的实力，提高自己的地位。1931年冬，蒙古各盟部旗联合驻京办事处处长兼蒙藏委员会蒙事处处长吴鹤龄，将他一手制定的“蒙古各盟部旗组织法”呈请国民党政府明令公布。国民党政府制定这个组织法的目的，是加强它对内蒙古的控制，这对于实现我的政治野心显然是不利的。于是我就以锡盟代理盟长的名义（其时锡盟盟长索王在病假中），托滂江电报局长徐茂侯代拟电稿，致电国民党政府反对这个“组织法”。同时派锡盟驻张家口办事处处长补英达赖赴北平，面见国民党陆海空军副总司令张学良，洽请拨给枪支弹药等；并联络包悦卿、贺喜

业勒图默尔根（号颖伯，即小卓王）、达密林札布（太仆寺旗前任总管）等，以蒙古旅平同乡会的名义，致电国民党政府，一面反对吴鹤龄的“组织法”，一面吹捧我“素孚众望，洽顺舆情”，应出任“蒙旗宣抚使”。包悦卿、达密林札布二人并到南京活动，大肆吹嘘，说我拥有五千骑兵，是蒙古具有实力的人物。

这两次电报的拍发和包悦卿等的吹捧，引起了蒋介石对我的注意。1932年秋，蒋派他的亲信桂永清和军政部派到察盟以枪换马的余玉琼、彭秉离等前来我旗访问。这时包悦卿也由南京北返，陪桂永清一同前来。桂永清对我恭维备至。包悦卿将蒙古旅平同乡会曾电请派我出任“宣抚使”事和桂永清谈了。桂对包悦卿说：“我看德王是个年轻有为的王爷，宣抚使是老年人干的事，他干这个干吗？依我之见，应当组织军队，扩充实力，并在蒙旗先组织一个骑兵师或旅，当一个中将师长或旅长，不比干宣抚使好吗？”包悦卿以此话转告我，我当下表示首肯。桂就给蒋介石打电报，并将电报原稿交由包悦卿转与我看，全文记不清了，仅记得有“将来收拾蒙事者必属此君（指我）”一语。桂对我这样重视和吹捧，使我非常高兴。后来他表示想去看索王，我就派我的专用汽车把他送到乌珠穆沁右旗。他回来向我说：“我看索王凝神注目看人的神气、静听别人谈话的态度，是一个具有成见、十分固执的人，可能对你的事业有障碍，希望你注意。”他临行时，又对我说：“静候佳音吧，蒋委员长可能召见你。”

果然他走后不久，蒋介石就打电报要我前往武汉去见他。我就偕同补英达赖、韩凤林、丁我愚等前往武汉。到武汉后，次日即前往见蒋。蒋在谈话中表示对我很关怀的样子，但是关于桂永清所说组织蒙古骑兵之事，并未详谈，仅嘱我和秘书长杨永泰、参谋长曹浩森接洽。我就令韩凤林拟具蒙古骑兵师编制计划和所需要的武器，送交行营办公厅。杨永泰和曹浩森接见我时，说要给我一个“蒙古保安统监”的职务。我当下想到：索王是锡盟保安长官，我如担任保安统监的职务，地位就在索王之上，可能引起索王的不满，不如担任蒙古骑兵师长既实惠又相当。当即向杨、曹表示：“我此次来见委员长，不是专为要官而来。”杨永泰马上表示不甚愉

快的神气，没有再作什么回答，我就辞出归寓。

我在武汉参观游览了几天后，行营秘书邓文仪来见我说："关于编制蒙古骑兵师事，委员长指示以后再行考虑；至请发武器一节，可以拨给机关枪四挺、步枪数百支，可在此具领，另拨迫击炮二门，须到南京军政部洽领。"我遂派丁我愚前往行营军械部门领到机关枪四挺；所发步枪数百支，因均系破旧之物，未即具领，请另补发。

在武汉告一段落后，留下丁我愚洽办未完之事，我就偕同补英达赖、韩凤林等返北平，依据蒙藏委员会关于"重选盟旗代表、改组办事处"的命令，进行重选代表、反对吴鹤龄的活动。这时，除锡盟已确定郭尔卓尔札布、补英达赖为代表外，乌盟也确定拉希色楞为代表，伊盟确定僧格林沁为代表，并均已先后到达。其他各盟旗代表就在北平酝酿重选，结果又确定贺喜业勒图默尔根、多尔吉为哲盟代表。呼、昭两盟因既已沦陷，又无适当人选在北平，没派代表参加。组织就绪后，就赴南京请愿。国民党蒙籍中委白云梯、克典额等想利用晋京代表请愿的声势和取得蒙旗地方实力的支援，特怂恿军政部长何应钦来电邀我赴京洽商蒙事。蒙藏委员会总务处长陈敬修也来北平迎接班禅赴南京，特到嵩祝寺见我，表示欢迎我和班禅同车南下。这时吴鹤龄已被蒙藏委员会委员长石青阳解除了蒙事处处长职务，调任参事闲散之职，并命令他重选蒙旗代表，改组办事处。吴鹤龄在这种压力之下，就匆忙由南京赶来北平，请于华亭（蒙名罗布桑车珠尔，系吴岳父的喇嘛弟弟，后还俗为"镇国公"）出面奔走联络，托班禅的堪布和乌盟的德瓦根敖等居中调解。吴鹤龄偕同于华亭曾亲到嵩祝寺和我见面，接着又由班禅出名宴请我们，堪布们代表班禅陪同我们聚餐，并劝我们合作。继又由德瓦根敖、拉希色楞等出面，在撷英番菜馆宴请我们，进行调停，但我俩均未表示接受。

我和班禅同乘专车到达南京后，一面见何应钦洽办请拨武器之事，一面和晋京请愿代表商洽进行反对吴鹤龄、改组办事处之事。吴鹤龄又请巴文峻出面调解。巴曾到中央饭店见我说："吴鹤龄业已表示愿意奉令改组办事处，他只担任卓盟代表，其他各盟旗代表均由新代表担任。"我没有

接受巴文峻的调停，并内定补英达赖为新的办事处处长，准备接收。后来因白云梯与石青阳争权夺利，改组办事处之事就被搁浅下来。我表示要整装回蒙，以示对抗。

为时不久，蒋介石由武汉返回南京，先在励志社宴请我和各代表，继又由桂永清陪我到中央军校和他谈话。桂永清把建立中央军官学校张北分校计划递请蒋阅看。蒋略加翻阅即放在一边说："现在决定在张北设立分校（按张北分校后来没有办成），特派桂永清按照黄埔的精神办理，培养蒙古方面的军事干部人才，为编设蒙古骑兵师做准备。"继又说："蒙古三公制度是可以存在的，希望不要为此操心。"

现在回想起来，桂永清到我旗访问时为什么向我建议组织蒙古骑兵呢？我到武汉见蒋后为什么杨永泰又提出给我蒙古保安统监名义呢？蒋在南京见我时为什么又提出建立张北分校呢？据我现在的看法，蒋介石这样重视我是有原因的，他对于我的职位问题的前后几次变动，也是有其用心的。在蒋看来，我旗是通往蒙古人民共和国的要冲，如在我旗组织起一部分武力，不仅对于附近的杂牌军队能起牵制作用，而且对于"防共"也有必要。所以蒋介石特派桂永清到我旗察看情况时，才有向我建议组织蒙古骑兵之事。至于我到武汉见蒋后，杨永泰又提出要给我蒙古保安统监名义而不给我以蒙古骑兵师长的实权，则又是想利用我做招牌而不愿叫我掌握实力。蒋在南京中央军校和我谈话时所提出的建立张北分校的计划，实际上是叫桂永清为他培养军事干部，掌握实权。后来1949年我到南京时，桂永清已当上了海军总司令，他特设宴招待我，席间他情不自禁地说："如果依照我从前的计划，在内蒙古组织起五万骑兵，东北不会叫共产党拿去，也不会造成今天这个局面。"足证当时蒋介石是要假手我插足内蒙古组织骑兵进行反共的。

在南京见蒋后，我即将韩凤林留下当教官，并以需用军事人才为名，向高级教育班交涉，要出了正在受训的蒙古学生云继先。又向军政部具领迫击炮两门及武汉行营许可的步枪几百支。还到中央政治学校蒙藏班参观，和正在求学的蒙古青年见了面，对他们进行拉拢。

这时，从蒙古人民共和国逃亡的迪拉瓦还在南京，我和他常相过从，他对我有很大的影响。

我上次到武汉见蒋是想取得蒙古的军权，这次赴京请愿是想取得蒙古的政权，但均未如愿以偿，于是便想搞自治，以实现我的政治野心。我偕同一部分代表回到北平后，又和旅平蒙古知识青年作了广泛的接触，招收了二十余名蒙古学生，由云继先、于福赓和云敬圣带领着随我一同返旗，着手培养人才，蓄积力量，准备待机而起。

我回旗后，即在西营盘成立了蒙古干部学生队，委派云继先、于福赓二人为教官，把从北平招来的学生一律编入该队受训，把从武汉和南京所领到的武器拨归该队应用。这时我认为即便中央军校张北分校成立起来，毕竟是国民党中央的系统，一切须受他人的监督，不如自办一个学生队，训练自己的干部方便。不久，陈绍武、陈国藩、霍宝书、乌鹏、王泽春由绥包一带前来我旗，丁我愚、亢仁等也相继前来。我和他们常相聚谈，共同研究时局，并决定由锡盟联合乌、伊两盟发动内蒙“自治”，以期实现我在内蒙古掌握大权的野心。

3. 策划内蒙“地方自治”运动的经过

我虽然罗致了一部分蒙古青年作为我的骨干，但自知我的职位不过是副盟长，声望不高，年纪又轻，号召各盟旗参加，必须得到“年高望重”之王公的同情和支持。特别是在锡盟进行“自治”，首先必须取得盟长索王的赞同和杨桑（杨桑曾任过锡盟盟长）等老年王公的谅解。杨桑向以我的前辈自居，认为我好大喜功，时常流露不满之意，曾有“锡盟出了一个苏尼特王，不知什么时候闯下乱子，锡盟前途殊堪忧虑”之语。盟长索王对我也是不满的。因此，必须设法说服他们同情“自治”，最低限度不致出头阻挠“自治”。我反复考虑结果，认为通过班禅来说服他们是个最妥善的方法。回忆起来，这个方法还是郭道甫和我谈过的。当1929年我随同班禅去沈阳面见张学良洽拨武器时，曾与郭道甫（这时郭任东北蒙旗师范学校校长）常相过从。他曾煽动我说：“外蒙独立前曾有哲布尊丹巴这个宗教领袖，在蒙古民众中形成了中心信仰。反观内蒙没有中心信仰，

以致历次运动都无成就。现在听说班禅的堪布们正请中央用武力护送班禅回藏，一时尚恐不能实现，趁此机会，应当联合各旗集资在蒙地为班禅建庙，请班禅留在内蒙，作为宗教领袖，形成中心信仰，对我们进行蒙事是会起到一定作用的。”

郭道甫这个建议，我很以为然，返归锡盟后，即和盟长索王商量。索王也极表同意，当即派我和松津旺楚克（浩济特左旗札萨克郡王），代表锡盟前往北平联络各盟旗王公，商洽为班禅在内蒙建庙，挽留班禅在内蒙长期居住，各旗王公一致表示赞成。这时班禅正在北平，郭道甫也因事来平，我们就去面见班禅，确定在锡盟和哲盟各建庙一所。嗣因“九一八”事变发生，哲盟已经沦陷，遂将各旗凑集的10万余元，在我旗和乌珠穆沁右旗为班禅建庙两所。在1931年并请班禅前来我旗过冬，1932年夏在锡盟各地讲经。这样做，既取得了班禅对我的好感，也使锡盟各旗王公对班禅有深刻的印象。

迨至1932年，我正和那班青年研究进行“自治”运动，设法说动索王同意时，适班禅由乌盟百灵庙前来我旗，并要去贝子庙、乌珠穆沁右旗等地讲经。我认为机不可失，遂请班禅帮助我，同他前往乌珠穆沁右旗，说服索王。我陪同班禅到达后，索王对我谈田中玖要来设置特务机关和电台，问我怎么办。我不敢同他直接谈“自治”的事，答复他说：“班禅佛爷正在此地，何不请求佛爷指示明路。”索王就同我去见班禅，请示对策。班禅说：“前次德王和我说的联络锡、乌、伊三盟会商蒙事，很好，现在正是时候了，积极去做就对了。”索王当下也表示赞成。于是第一步说服成功，就请索王以盟长名义拟成公文，派我代表锡盟去见乌盟盟长云端旺楚克（云王），随后并加派乌珠穆沁右旗的协理若乐格尔札布一同前往。我遂偕同亢仁、丁我愚、阿乐腾格尔勒等驰赴百灵庙，先派员送去公文并向云王表达请其出面倡导“自治”之意，云王当时还徘徊不定。恰在此时，蒙藏委员会蒙事处处长巴文峻等一行前来宣抚，经四子王旗等地到达了百灵庙，亢仁当即将我等候云王前来研究倡导“自治”问题告知巴，我也请巴去劝说云王。巴文峻知道“地方自治”的名义尚在国民党中央许

可之列，遂允前往劝说云王。云王这才表示愿意与我共同倡导“自治”，并率同其弟根敦札布和仕官沙拉巴多尔济、那逊瓦齐尔等前来百灵庙。这时乌珠穆沁右旗台吉若乐格尔札布也赶来参加，遂于1933年7月26日在百灵庙举行了第一次“自治”会议，8月24日发出通电。9月28日，举行第二次“自治”会议。不久，国民党政府派黄绍竑、赵丕廉来百灵庙，经过许多周折，终于决定设立“蒙古地方自治政务委员会”，并于1934年4月下旬在百灵庙举行了成立典礼。

蒙政会成立后，由于委员长云王（云端旺楚克）、副委员长索王和沙王（沙克都尔札布）皆年老多病，我即以蒙政会秘书长的身份代行委员长职权，把蒙政会的大权抓到手中。这样，我也就成为日军的主要拉拢对象了。

4. 日军在多伦召开蒙古王公会议并对我加紧拉拢

当时日军对于内蒙西部各盟旗王公所进行的种种威迫利诱阴谋，是企图诱使各盟旗加入伪满或者在它的卵翼之下建立傀儡政权。因此，它对于我们发动的“自治”运动最初是不感兴趣的。当我们在百灵庙举行“自治”会议时，潜伏在我旗的日本间谍笹目曾向韩凤林表示说：“你们发动自治太早了，时机还未成熟，不如等到我们日本军的力量达到这里时再发动为宜。”当黄绍竑、赵丕廉来百灵庙，决定成立蒙政会后，因为我对这个决定极不满意，除通知各盟旗选派代表到南京请愿外，并派韩凤林前往北平日本使馆办事处，探询对内蒙“自治”的态度。韩凤林回来报告说：“日本使馆的紫山武官说现在中日之间存在的问题很多，不断发生冲突，但仍保持邦交，内蒙自治日本不便出面干涉，言下颇为冷淡。”我听到韩凤林报告后，还以为也许紫山武官是日本的外交人员，不便表示对内蒙“自治”的态度，乃又派补英达赖前往伪满面见溥仪，并通过溥仪的介绍与日本关东军吉冈安置参谋接洽，托词购买枪支，探询日本关东军对内蒙“自治”的态度，也没有得到明确答复。

特别值得提到的是，当黄绍竑、赵丕廉二人来百灵庙期间，日军为了加紧拉拢各盟旗王公“归向”伪满，特由驻在北平的特务机关长松室孝

良和驻在多伦的松井大佐在多伦召开蒙古王公会议，邀请锡、察两盟的王公和总管参加。会议原定1933年10月1日举行，嗣因交通不便，时间迫促，届期未能到齐，改为是年旧历十月一日举行。我当时因为热衷于“自治”运动，正在百灵庙主持第二次“自治”会议，所以对松室孝良召开的会议并不十分重视，仅派札兰阿乐腾格尔勒代表前往参加，观察会议情形和探询日本对蒙政策。据阿乐腾格尔勒回来向我汇报说，参加这个会议的有索王代表胡图里管旗章京、驻张家口办事处处长宝道新和乌珠穆沁左旗的多布丹公。锡盟其他各旗前往的多为管旗章京、梅勒等，盟长和各旗札萨克都没有去。察哈尔保安长官卓特巴札普也是派一副官为代表。东部盟旗参加者，有伪满的多伦警备司令官李守信、兴安西省警备军代理司令官乌古廷，还有联络工作人员金永昌、于兰泽、吴尧臣等。松室孝良在会上讲话，竭力挑拨民国后的汉蒙民族关系，怂恿各盟旗加入伪满。他说：“成吉思汗向西进兵曾打到欧洲，建立雄跨欧亚威震世界的赫赫武功；反之，向东发展就受到挫折，例如元朝东征日本曾全军覆没。根据这个历史教训，现在你们应当向西发展，我们大日本帝国愿意大力帮助你们收复长城以北的故有疆土，再进而联合西部各盟旗，加入‘满洲国’，或组织共同政府与满洲合作，希望你们蒙古要主动走向这条途径。”松室孝良讲话后，与会代表除表示愿意与伪满合作外，还提出了两个问题：（一）东部盟旗在“满洲国”仅得到东、南、西、北四个兴安省的组织，连蒙古二字都没有了，怎能吸收西部各盟旗？（二）既然满蒙合作，为什么不称“满蒙国”而称“满洲国”？松室孝良解答说：“四个兴安省既然不能吸收全部盟旗，应当在‘满洲国’中央扩设蒙古行政机构，在地方增设行政机关。至于改‘满洲国’为‘满蒙国’问题，因牵涉到国内和国际问题，需要慎重考虑，我很难作出回答。”与会者认为各盟旗长官均未参加会议，他们无权作出决议，只有将这次会议精神和松室孝良的意见，各回本旗报告，再行研究决定。

阿乐腾格尔勒还带来松室孝良给我的信函，对我发动内蒙“自治”表示祝贺，并以所谓大蒙古主义来煽动我，要我“收回”长城以北的蒙古

"故土"，"恢复"成吉思汗的"伟业"。这就充分说明，日本帝国主义对西部盟旗王公，在用满蒙联合的阴谋诱归"满洲国"未成之后，又改以所谓大蒙古主义作为煽惑的口号了。

黄绍竑、赵丕廉离开百灵庙后，我偕同韩凤林返归我旗转赴乌珠穆沁右旗，向索王报告经过，潜伏在我旗的日本特务笹目亦搭车同往。到达后恰逢盛岛角芳也在该旗。据韩凤林向我报告，笹目指责盛岛说："你还在此地干什么？现在蒙古的中心人物是德王，是我找到的主要争取对象。"笹目为了拉拢我，从乌珠穆沁右旗返归我旗后，就回国组织"善邻协会"，旋又带同前川、野中等来到我旗，送我收音机、电台等礼物，并在我旗和贝子庙等地设立"善邻协会"的分支机构，以办理卫生文化事业做掩护，暗做特务活动，拉拢各旗王公。如这时阿巴哈那尔旗协理巴萨尔高尔达，就和驻在贝子庙的"善邻协会"负责人野中拉上了亲密关系，后来得以当上伪蒙疆银行总裁的重要职位。不久，"日本东京善邻协会"本部理事长井上璞前来我旗访问，我就通过他和"善邻协会"的介绍，派陈国藩、暴德彰、乌鹏、霍宝书、李成俊、云瑞龙等赴日留学。

盛岛角芳也于1934年夏潜来百灵庙，住在迪力瓦领来的外蒙人聚居的瓦齐尔达拉部落，邀我前往晤谈。我即以到野外试验电台为名，偕同韩凤林前往相见，由韩做翻译。盛岛告我说：前次补英达赖向关东军接洽购买枪支一事，关东军准备无价送给步枪2000支，现已运到林西，叫我派车运回。盛岛走后，我即派汽车前往林西洽运，计第一次运回200支，都是捷克式新枪，第二次运来的却是套筒式旧枪，因此再未洽运。

1934年夏，我和韩凤林由百灵庙返归我旗，途中遇见两个赴百灵庙的西洋人，据他们说："听说有两个'满洲国'高级军官来到你的王府。"我返旗时来人已走，我的长子都格尔苏隆说，来的是"满洲国"兴安南警备军司令官巴达玛拉布坦、兴安西警备军代理司令官乌古廷和一个日本军官。我和韩凤林乘小汽车赶到阿拉善图庙始将他们追上，当在庙上相见。那个日本军官可能是本间或植山，现记不清了。我用蒙语问巴、乌："东蒙情形怎样？"巴答说："日本帮助我们组织了兴安警备军，设立了兴安

军官学校，情况还好。”接着他问我：“西蒙情形怎样？”我答说：“现在蒙政会虽已成立，在绥省却不断发生冲突。察省当局也在嘉卜寺增设化德县，意在化我。”乌古廷说：“日本军将来可能西进，望你与之合作并予协助。”我答说：“这要看看日本是否愿意帮助我们，再作决定。”

5. 韩凤林被杀及对我的影响

百灵庙蒙政会成立后，仅领到开办费2万元，用以维持办公和职员的生活，每人支给15元生活费，仅够伙食之用。尽管屡次向国民党中央政府有关部门请领经常费和建筑费，亦无结果。我因急欲解决这个迫切问题，特密派陈绍武前往庐山面见蒋介石，一则报告日本人进出西蒙，请示如何对待；再则请拨经临各费及枪械电台等物，以济急需。我并嘱陈绍武将伪满巴达玛拉布坦和乌古廷二人同我见面一事向蒋报告，并且故意夸大其词说，据巴、乌表示，日本方面不久就要西进，攻打察东，要我从速表明态度，以实力相助。我企图借此危言耸听，以促使蒋介石重视内蒙问题，并探询他的对日态度。结果蒋介石准予拨给每月经常费3万元、建筑费12万元及枪械电台等物，嘱向南京有关部门洽领。至于怎样对待日本人进出西蒙问题，蒋介石只笼统答复说，要以“不卑不亢”的态度相机办理，并嘱陈绍武转告我，他不久即来绥远巡视，嘱我和云王前往晤谈，还叫陈绍武给我带来复信一封，内容和对陈绍武所说的大致相同。

不意就在这个时候，发生了韩凤林被捕事件。在韩案发生以前，蒋介石蓝衣社的特务李才桂带了一批特工人员，以“内蒙旅行团”名义前来百灵庙。我要韩凤林负责招待李，但韩对李态度傲慢，李极为不满。同时，日本人常来锡盟和百灵庙拉拢我，我因韩是日本士官学生，便由韩担任日语翻译。李才桂可能因此认为韩凤林从中拉我勾结日军，便报告了蒋介石。当韩凤林到北平戒大烟瘾时，第二天就被宪兵三团派官兵十余人来韩家将韩捕走。

韩被捕后，蒙政会驻平办事处处长包悦卿曾面见何应钦质问韩究犯何罪，要求释放。何应钦矢口否认说他不知此事，允为注意访查下落，设法营救。但韩终未得释，仅由北平军分会给韩的家属送去500元，作为救

济。蒙政会成立后，我曾派包悦卿、郭尔卓尔札布赴平敦请何应钦就任指导长官，何应钦答复不久来绥转赴百灵庙。韩案发生时，何应钦适来绥包视察，白海风劝我往迎何前来。我因韩凤林被捕，负气不去，仅以电报相邀。何复电称急待返平，无暇前来。为了救援韩凤林，我曾径电蒋介石要求释放，并说李才桂与韩案有关。蒋来电答复说："韩案发生，蒙胞既然怀疑才桂，显见才桂有不洽蒙情之处，应即撤销其内蒙旅行团团长的职务。"不久李才桂就离开了百灵庙。

到了是年秋天，蒋介石将到绥远视察，在他未到之前，先派萧振瀛带着金丝猴皮袄等礼物前来百灵庙，邀我和云王赴绥相晤。我同一些亲信研究可否赴绥。多数认为我与绥省当局的关系既不甚好，外边还有谣言，深恐赴绥被扣，劝我不要前往。嗣我又与陈绍武单独商量，陈极力劝我前往，同蒋进行拉拢，并商洽解决绥蒙之间的纠纷问题。我也认为既系蒋介石相邀，谅绥省当局不会把我怎样，遂和云王、包悦卿、陈绍武等赴绥等候见蒋。

蒋介石由宋哲元陪同到达归绥车站时，我和云王曾到车站迎接。蒋下车后首先与云王和我握手，接着又召见我和云王，包悦卿、陈绍武也随去。蒋先问云王蒙政会成立之后诸事如何，云王答称："我是年老多病，诸事多亏德秘书长帮同办理。"蒋又面向我说："方才云王说，你帮助他很好，今后仍希你尽力帮助云王，做好蒙政会工作。"继又指着陈绍武向我说："你前次派他到庐山所要求之事，想都和你说了吧，今后如有什么困难，尽管向我说，我当设法解决。"我当即将韩凤林被捕之事提出，要求蒋解决。蒋即答复我说："这事我返京后当详为查问，待到一月后总会得个水落石出。"接着我又向蒋表示，蒙政会愿献军马300匹，答谢政府许可"自治"和关怀蒙古的盛意。蒋也表示接受。继而绥远各界首脑集会请蒋介石讲话，邀我和云王、包悦卿等参加。蒋讲话后，邀请云王和我讲话，云王推托未讲，我遂登台致辞把蒋介石大捧了一番，大意是说："自清朝以至现在，国家最高元首只有两位到达我们这个边远地方，前次是康熙，这次是蒋委员长，但是康熙是为征服我们蒙古而来，蒋委员长是为帮

助我们蒙古而来，我们表示竭诚欢迎。”我用蒙语讲完后，由包悦卿用汉语翻译。蒋介石听了我这套吹捧之词，自然十分高兴。

我从归绥见蒋后返回百灵庙，当用蒙政会的经费购买军马300匹，派补英达赖、刘建华送往南京军政部。约摸一个月的时间，接到以“北平民众锄奸团”名义印发的一个传单，大意是：“韩凤林是勾结日本、背叛党国、出卖民族的汉奸，实属罪大恶极，为全国人民所痛恨，已经做了断然处置，沉之大海。”我接到这个传单，和丁我愚研究，认为这是蒋介石耍的一个花招，他不好正面答复我，所以用这种手段作为变相的通知。我虽推断韩凤林已死，但还抱万一希望，同时韩的家属又要求我营救，于是就叫丁我愚拟具了一个电报，详述李才桂来百灵庙做侦察活动和不满韩凤林的情形，以及韩到北平时被宪兵三团逮捕的经过，以云王和我的名义，再电请蒋介石予以释放，并坚决表示如再不释放，我等实在无以对同仁，只好恳请辞职，以卸仔肩。这个电报发出后，蒋介石复电责备我们说：“君等任意推断，肆意要挟，尚知国家有纪纲否？”使我很不痛快。

我曾令稽查处主任李凤城检查蒙政会内部人员来往信件，发现云继先给朱实夫来的一封信，其中大意说：“韩凤林被捕后，秘座（指我）对实夫兄怀疑甚大，应加注意。对保安总队长一职，务要尽量争取，我们谁干都可以，务使不要落于他人之手。”同时又据曾在干部学生队受过训的人员向我告密说：云继先、朱实夫联络在蒙政会任职的土默特旗籍人员，策划掌握保安队的官兵，争取保安总队长的职位。因此，我对云、朱有了怀疑，云、朱对我也有了戒心。这就种下了后来云、朱策动保安队兵变的种子。

1934年秋天，日本特务头子土肥原贤二乘坐飞机前来我旗活动，其目的是想拉拢我进一步投靠日本。他对我说：“你进行蒙古工作怎样？有没有困难？如有困难时，可向我说，我当尽力帮助。”接着他又自吹自擂地说：“我到哪里，哪里的中国官员都怕我，因为中国政府的事情都瞒不了我。”我就把韩凤林在北平被宪兵三团逮捕的事情告诉他，希望他帮助调查了解一下。他很自负地说：“我能有办法知道，俟我详细调查一下再行

告知你。”过了一个时期，他通过驻在我旗的特务机关长宍浦转告我说：“国民党中央宪兵第三团团长蒋孝先赴庐山向蒋介石请示机要工作时，蒋介石就命令蒋孝先速把韩凤林设法逮捕处死。蒋孝先即密电驻在北平的宪兵第三团吴团附负责处理。当韩凤林来平时就有特务人员尾随前来，韩到达时即被逮捕，当天晚上即行枪杀。”

我在韩凤林未被蒋介石暗杀以前，很想凭借蒋的势力来扩充自己的力量，因此尽量和蒋拉拢，对日本方面则采取应付的态度。迨韩凤林事件发生后，我感到依靠蒋介石来扩充实力，等于与虎谋皮，已不再存幻想。我一度采纳蒙政会电台总台长关起义所提的多边外交的建议，派刘建华赴广州和正在搞西南独立的胡汉民、陈济棠集团取得联络，请其支援内蒙“自治”。刘建华到达广州后，把我大吹大擂了一番，竟说我在内蒙握有3万骑兵云云，但也没有什么结果。他只是得了胡汉民赠送的旅费500元，返回百灵庙时，给我带来一个用象牙刻有胡汉民、陈济棠、萧佛成等十数人名字的精致赠品和信函一封，信内虽表示愿意赞助，但没有实际支援。我也认为西南与蒙古相距甚远，仅能声援，无补实际。从此，我同国内各方面没有再做什么联络，干脆进一步与日本人勾搭起来了。

6. 我进一步勾结日军及吴鹤龄所谈蒋介石准备放弃黄河以北一事对我的影响

我曾把企图利用日本的力量来扩充实力的打算，分别同亲信干部陈绍武、丁我愚等商量，他们都表示同意，愿意跟着我走。于是，我首先决定秘密派宝贵廷赴伪满招兵。

我和宝贵廷事先商量好，叫他故意在职员中散布不满情绪，提出辞职，我则故意向职员们斥责宝贵廷的要挟，准其辞职。这样散布烟幕之后，宝贵廷就于1934年冬带着我给伪满察东警备军司令官李守信和日本驻在多伦特务机关长植山的信密赴多伦，在植山和李守信的协助下，从东部各盟旗招兵买马，秘密练兵。我把招来的一部分士兵先在李守信的隶属下成立一个团，由宝贵廷任团长，后又派去乌云飞、任殿都、云麟、巴图等充当连排长，并计划逐步扩充。

不久，日本关东军把宝贵廷从多伦叫去，告知他现已决定把驻在乌珠穆沁右旗的特务机关长宍浦调任苏尼特右旗的特务机关长。宝贵廷遂偕同宍浦前来见我说明来意，经我准许在我旗设立日本特务机关和架设电台，以资加强联络。我和宍浦研究保密办法，结果商定，宍浦化名石田三雄，仍以“善邻协会”理事名义做掩护。我和日本的勾搭便由此有了正式的固定关系。

接着日本关东军蒙事处第二课长石本寅三与参谋田中隆吉等前来我旗。见面晤谈时，田中隆吉特在一张纸上写上“满洲国”和“蒙古国”几个大字，拿着向我说：“我们日本已经帮助满人建立了‘满洲国’，现在还要帮助你们建立‘蒙古国’，今后日、满、蒙可以共同合作。”我对他这一套说辞自然很感兴趣。

1935年夏，我在百灵庙蒙政会接到傅作义的电报，邀我前往绥远参加蒙旗长官会议；同时也接到蒙政会驻绥办事处处长亢仁来电说，傅作义还邀请何应钦参加指导这次会议，劝我务要前往参加。但当时我因成见已深，不愿赴绥。关起义向我建议说：“您既然不愿去，何不趁着何应钦未到绥远时，前往北平去见他。”我认为这样既可以躲避参加会议，也可借此机会探询何应钦对日本的态度，并要些武器，于是就偕同关起义返经我旗，取道张家口赴北平。

见了何应钦，我假意说：“现在日本人进出西蒙，强在我旗设置特务机关和安装电台，进行政治活动，势甚猖狂。我甚感力量薄弱，无法抵抗。我依照蒋委员长的指示，以不卑不亢的态度对待日本人，反为外界人士所误解，使我至为难过。唯今之计，只有请你拨发武器，编练军队，准备抗日力量，以资御侮图存。”何应钦劝慰了我一番，并敷衍我说：“请拨武器，编练军队，准备抗日一节，我认为无济于事，中央有这些军队还抗不了，你们蒙古编练一点军队顶什么用？依我之见，不如请中央拨给经费，从事教育、卫生、实业、交通等建设事业为宜。”过了一天，何应钦又去嵩祝寺回拜我，所谈也不出上述范围。接着何应钦又派人给我送来1万元，我即交给关起义5000元，做筹购毛织厂机器之用。

当时新闻记者也常来见我，询问日本在蒙地活动的情形。我答说："日本在蒙地设置电台，搜集情报情形是有的。"我和新闻记者的谈话在报端披露后，引起日本方面的注意，即有日本大使馆驻在北平的参赞渡边到嵩祝寺见我，带着质问的语气说："你既然和我们日本合作，就应保守秘密，为什么把我们在你旗设置电台的情形都说出来，竟然登载报上，实在不大妥当。现在我已经迫使何应钦撤走了中央宪兵第三团，赶走了蓝衣社头子曾扩情，取缔了民众抗日运动，希望你回去加强日蒙之间的合作，不必再和南京政府打交道。"我对他的质问很不满意，即向他分辩说："我和新闻记者谈话，仅说了使人易知的设置电台情形，并没有泄露我们之间的秘密，如果连设置电台的情形都不能说，那不是欲盖弥彰吗？"渡边看我对他的质问表现出不满的神气，马上又和颜悦色地向我说："我准备请你吃饭，请你赏光。"我说："我可以参加，但是只请我一个人不妥当，为了避免嫌疑，最好把萧振瀛和北平市长袁良也邀上才好。"渡边说："可以。"翌日我和萧振瀛、袁良参加了渡边的宴会。嗣后我又见着萧振瀛，他在闲谈中说："中央宪兵三团叫渡边给赶走了，真是大快人心。"又向我买好说："我和何应钦说了，给你1万元和机关枪等武器。"这时我又接到傅作义的电报，邀我在北平公毕返百灵庙时便中到绥参加蒙旗长官会议，我推说公务甚忙，不能参加作复，就由军分会领到机关枪四挺返旗。军分会的军械处长周濂到车站送我，并转达何应钦的话对我说："你前次曾向何代委员长要求多发给新式机关枪，何代委员长说，现在这类机关枪都用以'剿共'，不能多拨。"

我回旗之后，日军因这时势力尚未深入西蒙，需要"借重"我，宍浦即来见我解释说："渡边在北平和您所谈的话，带有责备的意味，是他不知我们这里的情形和我们进一步的关系，贸然说出来的，希望不要误会。"不久，我就前往百灵庙蒙政会主持会务。亢仁由绥前来报告我说："这次傅作义在绥召开蒙旗长官会议，特邀你参加，意在消除隔阂，商洽解决蒙绥之间存在的问题。何应钦虽未亲自参加，特派何竞武代表前来，蒙旗王公阿王、潘王等均未参加，你如前来很可能得到傅作义的礼遇和尊

重，既可利用这个机会提高你的声誉，压服其他王公，也可利用这个机会商洽解决一些问题，但是你未参加，是错过机会了。”我这时正热衷于和日本勾搭，对此也不放在心上。

日本关东军为了进一步拉拢我，特派小野寺少佐等送我飞机一架，日本满铁株式会社总裁（忘其名）也同时派员前来赠我整套的电影、照相和放映机一台。1935年夏，我旗举行敖包会，中外人士参加者甚多，记得有民主社会党首领江亢虎、英国记者琼斯、德国记者梅和伯、德华洋行经理（忘其名）等，日本也来了一些人参加，乘坐飞机两架环绕敖包会上空。琼斯等欧美记者为我和大会拍照片赠我，甚为活跃。会后琼斯和其他外国记者赴多伦采访。这时日本帝国主义已把蒙古视为禁脔，岂容他人染指，所以暗下毒手把琼斯杀害了。

在我未赴北平见何应钦之前，宍浦就向我说，关东军参谋副长板垣征四郎要求和我晤谈。我答复他说：“这时外面谣言甚多，板垣这样重要人物前来，最易惹人注意，恐不大妥当，我如前往会他更不方便，最好等等，以后再说。”我由北平返旗后，宍浦又向我说，板垣要求晤谈甚切，希望约期见面。我遂约定于是年9月在乌珠穆沁右旗和板垣相见。这时适值陶克陶（汉名白广瀛，系苏鲁克旗人，曾留学日本玉川学园，伪满时期初任伪蒙政部属官，后被日本关东军聘为嘱托）随同印度人奈鲁从日本经由伪满各地前来我旗，准备前往印度。我因缺乏日语翻译，就把陶克陶留下当翻译。我按约定时间，偕同陶克陶、宍浦等乘坐汽车前往乌珠穆沁右旗，先同索王会晤，商定这次板垣前来，应当把东西蒙合并建立蒙古国的大问题提出来和他谈判。板垣偕同河边大佐、田中隆吉参谋和蒙语翻译金永昌等乘坐飞机到达后，我们就在索王府的大蒙古包中和板垣等进行会谈。我向板垣说：“前次田中参谋前来我旗，曾提到帮助我们建立‘蒙古国’问题，我们很喜欢，希望日本帮助我们早日实现，并希把东西蒙古合并起来，完成蒙古独立建国。”板垣答复说：“蒙古独立建国，我们日本是愿意帮助的，但东部蒙旗是满洲的领土，满洲是独立的国家，我无权答复。但为了帮助你们筹划建国，可先派三个顾问前来帮助你们。”索王马

上拒绝说："这不是'满洲国'第二吗？"板垣答称："那么，我们以后再详细研究吧。"此次会谈未能获得圆满结果，即告结束，板垣旋乘飞机返回关东军。

从此以后，关东军的特务人员中岛万藏、中泽大喜、金永昌、于兰泽等常来百灵庙蒙政会，陶克陶也和他们拉拢在一起，进行特务活动。中岛万藏有一次用汽车拉着蒙古包，要在百灵庙设置特务机关。我认为这样做目标显著，不甚妥当，没有让他架设蒙古包。但是他们长期在百灵庙居住，日本飞机亦常来常往。有一次陶克陶酒醉，公然在蒙政会上大喊大叫说："我是大日本关东军的嘱托，大满洲帝国的官吏，谁如动弹我，就是反满抗日。"从此日本特务人员在百灵庙蒙政会的活动遂成公开秘密。

1935年秋，百灵庙蒙政会举行第二次委员会议，各委员多来参加，中岛万藏、陶克陶、金永昌等趁机劝我与日本正式合作，希望早日决定。特别是陶克陶强调说："这是日本既定的政策，将来非走这条路不可，与其将来被动地走这条路，不如现在主动地走这条路为宜。"我当时曾向吴鹤龄、尼冠洲等一部分委员提出这一问题，征询他们的意见。吴鹤龄谈了下面一段故事。

吴说，他在南京时，曾参加国民党中央党部召开的一次特别秘密会议讨论对日问题，除了中央委员外，还有一部分军政人员参加。冯玉祥劝蒋介石抗日，参与会议的人也有主张抗日的。这就把蒋介石惹恼火了，马上站起来说："在我国历史上，宋曾亡于元，明曾亡于清。这次日本侵略与前两次不相同了，因为日本是文化科学发达的国家，假设我们没有准备好就起来抗日以至亡国，是不易复兴的。不能把国家大事，作孤注一掷。必须先安内然后才能攘外，要有准备有计划地抗日，否则必陷国家于万劫不复之地。因此，我主张在我们没有进行抵抗的时候，就是把黄河以北的土地丢掉了，都没关系，还可利用国际干涉，收回失地。"接着他就叫军政部长何应钦起来报告。何应钦先把中日两国的实力作了比较，强调"抗则必败，败则必亡"，大意是说：以现有武器而言，仅能打上几个月，抗战以后，黄河以北必然丢失，长江流域亦不可保等语。

吴鹤龄说："根据这次特别秘密会议中蒋、何的讲话，我深切感觉到中央把黄河以北都准备不要了，蒙古当然更在不要之列。在此时期，我们和日本合作是可以的，但此事关系重大，需要日本方面派主要人员前来，或者我们派负责人员前往，共同商谈，缔结协定，作为日蒙合作的根据，不能仅凭几个日本特工人员一说，就贸然从事。我也打算离开南京到蒙古来工作。"尼冠洲当下表示赞成吴鹤龄意见，我也很以吴鹤龄意见为是。从此以后，我就亲自出马，同日本关东军进行勾结了。

（陶布新　记录整理）

（政协内蒙古自治区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供稿）

伪蒙古军政府成立前后

德穆楚克栋鲁普*

一

亲赴长春与关东军勾结

伪蒙古军政府的成立，是我勾结日本帝国主义，建立伪蒙疆政权的正式开始。当时虽已有了在蒋政权隶属下的“蒙政会”，但不能满足我的政治野心，并且蒋介石杀了我的得力干部韩凤林，令我非常不满，又加在西公旗事件和特税问题上，我与绥远当局的斗争也着着失败，使我更为气愤。因此，在百灵庙“蒙政会”时期，我就和日本方面暗行拉拢，企图凭借日本的力量，扩充实力，以达成建立“蒙古国”的妄想。到了1935年冬，我便亲自出马，和日本关东军直接勾结。这时我由百灵庙返锡盟苏尼特右旗，日本关东军特来电报邀我前往伪满新京（长春）商谈要事，我即偕同迪力瓦、陶克陶和驻在我旗（苏尼特右旗）的日本特务机关长宍浦、中岛万藏等乘飞机前往，面见日本关东军司令官南次郎和西尾参谋长。旋即和板垣副参谋长、田中隆吉参谋等商谈，结果商定：日本帮助西部蒙旗先搞一个“独立局面”，继而建立“蒙古国”，并送给50万元和5000支枪，

---

* 作者曾任伪蒙古军政府总裁。

作为扩编军队之用。

我由长春返旗后，就和宍浦商量关于搞“独立局面”，成立统一机构问题。浦建议说：“现在日、蒙既经合作，统一机构必须从速建立，我看最好是进一步强化百灵庙蒙古地方自治政务委员会（简称蒙政会），作为统一指挥机构。因为这样做是承认已成事实，易于发挥统一指挥的作用。”当时我认为这事有和蒙政会委员长云端旺楚克（云王）研究的必要，就带了10万元前往百灵庙交到“蒙政会”上，作为扩编保安队之用，并向云王报告赴长春和日本关东军接洽的经过。云王说：“既然这样做了，就应本着‘怕就不做，做就不怕’的精神继续进行，但必须慎重从事，力求稳妥为宜。”接着我又说：“现在亟须成立一个统一指挥机构。一个办法是成立‘蒙古军总司令部’，一个办法是强化蒙政会，你看哪一个办法好？”云王说：“在你盟（锡盟）那边成立蒙古军总司令部，联络上较为方便；在百灵庙这边强化蒙政会，作为统一指挥机构，不大方便。”意思是怕傅作义反对。

我由百灵庙返旗后，适田中隆吉来和我商谈这一问题，我提出要成立“蒙古军总司令部”，强调这是我和云王商洽所得出的意见。田中隆吉主张成立“蒙古军政府”，强调这个名称响亮，包括政治和军事，可以指挥行政和部队。讨论结果意见还没有统一起来，他就急于要走，说是主持进攻察东之事。我就着手筹备成立伪蒙古军总司令部。

日寇策划进攻察东经过

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东北四省之后，就成立了伪多伦警备军司令部，任命李守信为司令官兼察东自治长官，率领三师人马伺机进犯察东。日本帝国主义为了制造进犯察东的借口，故意挑起了张北事件。扮演张北事件的主要角色的本信亲说：“张北事件是多伦特务机关故意制造的，根据张家口领事馆与察哈尔省政府约定，凡属日本人进入察省地区，必须持有张家口领事馆的证明和加盖察省政府印信的护照。但在1935年夏，我和日本商人三名，由多伦前来张北，未带察省政府的护照，强要进城，守城

士兵阻挡，不令通行，因而发生口角，被守城卫兵把我等押解到察省部队中看守。张家口领事馆得讯后，强调这是对日本人的侮辱，提出强硬的交涉。”经中、日双方进行谈判的结果，在缔结协定条款中规定宋哲元的正规军从张北、宝昌、康保、商都、沽源等县撤出，由当地保安队维持地方秩序。这样一来，察东便成了“特殊化”地带。日本关东军就趁此机会，派田中隆吉前来多伦，促使李守信率队于1935年冬进犯察东。当进犯沽源时，当地保安队曾奋勇抵抗，把伪多伦警备军的参谋长程云山击毙。李守信又加强兵力进攻，并有日本飞机在上空盘旋助威，投弹轰炸，当地保安队终因兵力单薄，陆续撤退，李守信便很快地占领了察东六县，控制了察哈尔东部八旗，进驻张北县城。此时需要建立行政机构，统辖所属旗县，当由我以“蒙政会”名义下令成立“察哈尔盟公署”，任命卓特巴扎普为盟长，达密林苏龙为副盟长，并定于1936年1月1日举行“察盟公署”成立典礼。

白云梯、吴鹤龄之来

这时国民党中委白云梯落选，政场失意，潜住天津，想来蒙地活动。住在我旗的日本特务机关长浦，特派中岛万藏乘坐飞机，前往天津把白云梯接到我旗，意在拉他下水，以资号召。吴鹤龄也因活动国民党中委未成，欲来蒙地活动。但吴鹤龄这个人心眼多，为了取得蒋介石的谅解，好脚踏两只船，特去面见参谋总长朱培德，说：“听说德王已和日本拉上关系，蒙政会那边情况可能有变动，我想去一趟，劝说他不要胡闹，别上日本人的当。”朱培德当时将他这一番话转达给了蒋介石，蒋即召见吴鹤龄，说：“你要去蒙地走一趟是可以的，但务要随机应变，能够设法制止日本西进更好，如不能制止时，能够设法使其缓向西进就行。只要你能做到这一点，就算完成了你此行的使命，也算你的一项功劳。”（这段话是吴鹤龄在日本投降后，才告知我的。）于是吴鹤龄便与新当选的国民党中委尼玛鄂特索尔（尼冠洲）衔着蒋介石赋予的使命，离南京北上。他们到达北平时，我正在百灵庙，曾接到吴鹤龄要来的电报，我复电欢迎他速

来，就返归我旗。

陶克陶特向我报告说："曾说吴鹤龄来，要从中破坏蒙、日合作，日本方面决定要处置他。"我听到陶克陶报告后，就去特务机关找宍浦说："我听说你们有处置吴鹤龄的计划，千万不可这样做，因为吴鹤龄是我叫他来的，希望他帮助我们工作，你们要处置他，对于以后蒙古人前来参加我们的活动，影响不好。"宍浦答复我说："既然你这样说了，我们一定尊重你的意见，决不处置他。如果蒋介石的蓝衣社派人把他杀了，可与我们无关。"我觉得宍浦的话仍有杀害吴鹤龄之意，遂将此事告知迪力瓦，希望他出些主意。迪力瓦很郑重地提醒我说："吴鹤龄曾与你意见不和，发生过冲突，如果这次为日本人所杀，外界可能怀疑是你所为，你就有口难辩，怎也洗刷不清了。务要从速电知吴鹤龄按照约定时间到达张北，你好从中保护。"我很以迪力瓦之言为是，即给吴鹤龄去电报，约定务于一日正午12时即"察盟公署"举行典礼时到达张北，万勿有误。迪力瓦旋又向我叮咛嘱咐说："你仅约定时间在张北与吴鹤龄见面，以便从中保护，我认为还不够周密，应该派可靠的人率同卫队前去保护，接他来王府才妥当。"我遂又派李秀山率同卫队乘坐大汽车一辆，前往张北保护吴鹤龄，并接他来我旗。我即偕同达密林苏龙，乘坐飞机到达张北，这时尼冠洲已先期到达，吴鹤龄果也如约前来。见面之后，我很想把日本人方面预谋杀他的消息告知他，但这时李守信、卓特巴扎普和田中玖（日本人）等都来和我周旋，我又去李守信的部队中送去劳军费1万元，紧接着又参加了"察盟公署"成立典礼，总未得到机会和吴鹤龄个别密谈。举行典礼后，我又催促吴鹤龄速赴我旗，吴还强调说："你知道我是一向素食的人，虽然带有厨子来，还得整理一下用具，忙什么要走呢？"我很着急地拽着他的衣襟说："现在你要听我的，我叫你走，你就快走，万勿延误！"尼冠洲在旁也劝吴鹤龄说："德王爷很诚意地劝你走，你就走吧，不要固执啦。"谈至此，我即赴飞机场乘飞机返旗。

吴鹤龄也在李秀山率队的保护下，偕同张绍庭、于宝恒等乘坐汽车起程，到达城门时，因未持出城许可证，守城警兵拦车不准通行。吴鹤龄

当即派员到“察盟公署”托请尼冠洲取到出城许可证，守城警兵始验证放行。车开出张北几个小时，天又傍晚，快到化德时，见后边有汽车灯亮，似在追赶，因吴鹤龄所乘汽车速度较快，后边汽车灯光不久就看不见了，当晚宿于化德。

这时宝贵廷正率一团士兵驻守化德，他的日本顾问烟草谷接到张北特务机关长田中玖扣留吴鹤龄的密令，即催促宝贵廷执行。宝贵廷婉言拒绝说：“吴鹤龄不是到别处去，而是到德王府去，德王并派有卫队保护，我不能下手扣捕，如果非要扣捕他不行，可以径向德王交涉。”烟草谷见宝贵廷不执行，急得直跺脚说：“这是特务机关长的命令，如果不执行，就要受到处分，非执行不可。”宝贵廷说：“我如执行这个命令，无法向德王交代。并且吴鹤龄跑不了，要抓他很容易，何必急于在此地扣捕。”烟草谷见宝贵廷坚不执行，虽然十分着急，但因当时日本帝国主义势力才伸入西蒙，尚须尊重蒙系军官的职权，迁就宝贵廷的意见，不能以顾问资格直接指挥士兵，他手下虽有几个亲信随从，也不能把拥有几十个卫队的吴鹤龄扣捕，遂即作罢。吴鹤龄却得在化德安全度过一宵，翌晨乘车到达我旗。我当即安排他住下。

吴鹤龄到我旗第二天，我把接到尼冠洲被杀的电报转给他看，他才恍然大悟，对我感激地说：“我在南京已给蒙政会要下10万元的建设费，本想领到后再来，但是接到你的电报，嘱我不要候领10万元，务要从速前来，这次又这样地保护我，你把我看得比10万元还重要。”我当即安慰他说：“这是我很需要你帮助的，所以希望你从速前来。这次对你略尽保护之责也是应当的，何必感谢，今后希望你安心居住，不要有所顾虑。”

尼冠洲被杀事件经过

尼冠洲是明安旗的佐领，为卓特巴札普的得力助手，时常代表察哈尔盟到外边进行联络。尼为人擅长辞令，善于交际，好做政治活动，因此名望逐渐提高，成了察盟中头角峥嵘的知名人士，在国民党政治场合中，都视他为蒙旗地方上的有力人物。吴鹤龄一向同他过从甚密，引为知交。

他当选国民党中委后，吴鹤龄当然更和他拉近，以资互相支援。吴鹤龄衔蒋介石使命，前来蒙地活动之事，可能是与他共同商量后所做的，所以，他们二人一同离南京北上。到达北平时，尼冠洲还以新当选国民党中委资格，对来访记者发表谈话，表示此次来蒙，是为了宣抚蒙旗归向中央，因此，就引起日本方面的注意。当他来到张北后，卓特巴扎普倚为自己的唯一臂助，委以“察盟公署”总务厅长之职。日本方面也知尼冠洲是“察盟”的有名人物，拉他下水参加“察盟”工作，在政治上可能引起一定的作用，也同意他任此职。尼冠洲因新当选国民党中委，当然倾向国民党中央，表示推托不就，却劝说卓特巴扎普勿受日本人愚弄，要有自己的主张，特别是在参加“察盟”会议上，提出很多为日本方面所不愿接受的问题，更引起日本人的嫉恨。

据吴鹤龄对我说：在参加“察盟公署”成立典礼时，尼冠洲指着成吉思汗遗像前所供的九只羊说：“我们蒙古人所能决定的就是这九只羊供品，其他一切都是日本人所做的，都受日本人操纵把持，我看你跟我回到张家口过年去吧。在此地能够干什么。”假如这话为日本方面侦知，当更对尼冠洲嫉恨在怀，定要置之于死地而后快。

我从陶克陶的报告中，仅知日本特务机关要处置吴鹤龄的消息，不知有杀害尼冠洲的阴谋。同时我更认为，尼冠洲有卓特巴札普的保护，不致发生意外，所以只顾保护吴鹤龄的生命，没有注意尼冠洲的安全。在我返旗后不几日中，白云梯借故要去张家口，尼冠洲也要返回张家口度春节。白云梯之走，虽未引起日本方面的注意，尼冠洲返张，却招致日本方面的怀疑。认为他从中破坏“日蒙合作”，会泄露机密。日本特务机关遂决心暗下毒手杀害他，预先派出警兵，换穿便衣，冒充土匪，在万全坝上埋伏等候。当白云梯和尼冠洲分乘汽车先后到达万全坝上时，这几个冒充土匪的人，持枪拦住走在前面白云梯所乘的汽车，打开车门，略加询问，即行放过。接着又持枪拦住尼冠洲和梁芝祥所乘的汽车问道：“哪位是尼委员？”尼说：“我是尼委员。”这几个冒充土匪的人又说：“请尼委员下车，我们有话说。”尼遂下车，当即被一枪打中要害身死。这几个冒充土

匪的人，遂弃尸道旁，扬长而去。对梁芝祥却未加追问，仅受一场虚惊。后来梁芝祥对我谈述这个惨案经过时，犹有余悸。

尼冠洲被杀后，外界曾有谣传，说尼冠洲当选国民党中委后，蒋介石曾召见他，告知对日进行妥协计划，叫他北来和日本方面暗中接洽进行，嗣又怀疑这个人不可靠，深恐泄露机密，遂又派蓝衣社人员将尼冠洲刺杀，以资灭口。据我推测，这个谣传是日本特务机关故意散布的烟幕，掩盖他们暗杀尼冠洲的阴谋。由此可见，日本帝国主义不但用阴谋毒辣手段，把尼冠洲置之于死地，而且散布阴险欺诈的烟幕，以欺骗、愚弄蒙古人。

在苏尼特右旗成立伪蒙古军总司令部

“察盟公署”虽经成立，毕竟是地方政权，仅能指挥所属旗、县，不能号令其他各盟协助扩编军队。为了成立统一的指挥机构，我从张北返旗后，就从百灵庙“蒙政会”调来中坚干部超克巴图尔（陈绍武）、赛吉尔胡（丁我愚）、玛哈希力（赵文儒）、乌勒吉图（张秉智）、札拉嘎木吉（白景）和原在我旗的陶克陶、金永昌、于兰泽、补英达赖、郭尔卓尔札布等，进行筹备成立伪蒙古军总司令部工作。决定改元易帜，用成吉思汗纪年（经查对《王公表传》，这年正是成吉思汗七百三十一年），制定蓝地右上角红、黄、白三条为象征的“蒙古旗”，表明脱离了中国的辖属，走上“独立自治”的道路。实则是走上背叛国家、投靠日本帝国主义的道路。

经过积极筹备就绪后，即定于1936年旧历正月十八日举行伪蒙古军总司令部成立典礼。典礼是在我的王府大蒙古包中举行的，一切都仿照成吉思汗大祭的仪式，在大蒙古包中正面悬挂起成吉思汗遗像，遗像上面挂着很长的哈达，遗像下面供桌上摆着九只整羊及其他供品等，蒙古包门上交叉竖起两面“蒙古旗”。典礼开始时，规定一律实行叩拜礼。我率领蒙古职员向成吉思汗遗像行了叩拜礼后，参与典礼的日本人宍浦、前川等也跟着行了叩拜礼。我看到这种情形，真是得意忘形、欣然自得，便向坐在我旁边的郭尔卓尔札布说：“你看日本人都向我们祖先磕头了！”行礼后，我就以成吉思汗三十世孙的资格宣读“誓词”，“誓词”的主要内容是：

“我誓愿能继承成吉思汗的伟大精神，收复蒙古固有疆土，完成民族复兴大业。”我宣读“誓词”后，本来预定由关东军西尾参谋长代表日本方面致“祝词”，只因这天降雪甚大，天气不佳，他没有及时赶到，暂行宣布散会后，西尾才乘飞机来到我旗，乃再召集职员开会，西尾遂当众宣读“祝词”。“祝词”大意无非是“日蒙携手，亲密合作”等语。但他“祝词”中所提到的是祝贺成立“蒙古军政府”，不是祝贺“蒙古军总司令部”的成立，这又说明在名称上还没有统一起来，仍然“各行其是”。西尾致“祝词”后，就摆上全羊席招待他，宴会后，他就乘飞机走了。

伪蒙古军总司令部成立后，我就责成陈绍武等制定总司令部组织大纲和安排主要人事。因甚感人手不足，特从伪满约来仓都仍（包海明）、瑙门达赉（高庆春）、图木勒巴特尔（刘定一）、恩和阿木尔（包崇新）等，由北平约来特克希卜彦（王宗洛）、莎彦毕勒格图（陈靖寰）、那苏图（王庆三）、忽克金（陈化新）等。在组织大纲中，规定“蒙古军总司令部”最高首领为总司令，大家推举我担任总司令，李守信为副总司令，下设军务、政务两部和一个秘书处，另外还由日本人组成顾问部，负“指导”军事、政治之责。军务部长派李守信兼任，其下设一、二、三课。第一课课长敖云章（未到任），第二课课长王宗洛，第三课课长于兰泽，分管军政、军令、军法、军械、军需、参谋、作战等事项。政务部长由我自兼，其下设内务、财政、文教三处。内务处长金永和，财政处长包悦卿，文教处长郭尔卓尔札布，分管民政、礼俗、宗教、文化、教育、财政、交通、实业等事项。秘书处处长补英达赖，下设一个秘书室和文书、人事、会计、经理四科。机要秘书陶克陶，秘书陈绍武、丁我愚，文书科长赵文儒，人事科长张秉智，会计科长旺尔克札布，经理科长孟昭义。顾问部主任顾问村谷彦治郎。军事顾问山内，财政顾问稻茨，文教顾问崛井德五郎。这就是伪蒙古军总司令部的组织概况和主要人事阵容。这时吴鹤龄因日本方面还不谅解，没有派他担任重要职务。

伪蒙古军总司令部成立后，首要工作是招募士兵，扩编军队，除派宝贵廷、乌云飞赴卓、昭两盟继续招兵外，并派包悦卿赴哲盟招兵。其次，

因是年锡盟大雪成灾，成立了雪灾救济委员会，以郭尔卓尔札布为主任，发出通电呼吁救灾，募集救灾款。这年冬末春初之际，降雪甚大，天气奇寒，平地积雪尺余，草原多被覆盖，水井为之冻结，牲畜遭受冻饿而致死者甚多，牧民生活受了很大影响。因此，一面派员赴伪满募集赈款，一面通过“善邻协会”在日本国内募捐，并以“雪灾救济委员会”的名义，向国内各界呼吁救济。结果从日本和伪满方面募到赈款20余万元，从国内募到赈款4万多元，由赈济委员会华北方面负责人何绍南，亲自送到百灵庙“蒙政会”者1万余元。关于这项赈款的使用，我采纳了吴鹤龄的建议，决定集中使用，不可分散救济。所以这项救济款并未用在救灾上，以后由吴鹤龄把持，用来作为毫利希亚（蒙语，其意为合作社）的资金，不仅吴鹤龄借此大发其财，就是他的手下人罗厉甫、戴宗元也成富翁。罗厉甫在北京广置房产，大开商店，成了有名的罗二爷。

日本特务机关长浅海

这时日本特务机关长换成了浅海少佐。这个人飞扬跋扈、粗暴蛮横，把日本帝国主义者的本来面目充分暴露出来，居然以征服者神气出现，对我指挥命令，毫无礼貌，对蒙古族职员更是采取高压手段，见面非打即骂。大家初则避之，不敢挫其锋，继因浅海的蛮横态度，有加无已，均表不满。有一次在冰天雪地中，浅海召集全体职员讲话很久，冻得大家手颤腿战不能支持，接着他又进行考试，就地出题，限时答卷，看见有的人站立姿态不稳，就掴耳光，或用拳头猛捶其胸，简直把蒙古族职员当牛马看待。由于浅海对人的态度蛮横，引起大家的极度愤慨，纷纷向我表示不能忍受浅海的侮辱。有人提出：这是复兴蒙古，还是出卖蒙古？我们是成吉思汗的子孙，还是裕仁的奴仆？要求离职回家，不愿在此地工作，以免时遭侮辱。有的主张与浅海抗争，不要示弱。我与陈绍武等研究对付浅海的对策，认为浅海的态度蛮横，定有接近他的蒙古族人为之出谋划策。而当时通晓日语接近浅海的蒙古人中只有金永昌和陶克陶二人，并认为陶克陶还在青年，不无一点血性，不致出此下策；而金永昌一向对浅海低声

下气，表示恭顺服从，并常为浅海当蒙语翻译，宣扬浅海的好处，他可能对浅海献策：在日“蒙”合作开始时，应当用高压手段和严厉态度，对待王公和青年，以树立威严，便于今后压服、控制。陈绍武向我建议，为了对付浅海的蛮横，安定大家的情绪，一方面在金、陶二人之中，必须拉一个，打一个，陶克陶虽是关东军的“嘱托”（日语原意也为委托办事，但在此是一个职称，指专为日本特务机关搞特工），毕竟还是青年，易供驱使，而金永昌老奸巨猾，不易驾驭。唯今之计，应当拉陶排金，并向陶克陶说明我们团结起来是反对浅海，不是反对日本，叫他向关东军反映浅海的粗暴蛮横，影响“蒙、日合作”甚大，应当从速调离其职务。另一方面，应召集中坚干部秘密会议，号召大家“加强团结，努力民族事业”。我很以陈绍武的意见为是，表示同意这样做。同时我对浅海的做法和金永昌的行为也是不满的。因为我原来是妄想利用日本的势力，实现我的“统一蒙古”、掌握大权的野心，还以为自己不是日本的傀儡呢。金永昌在浅海面前卑躬屈膝、阿谀奉承，我很看不起他，对于陶克陶却有好感，因他曾向我透露日本特务机关谋杀吴鹤龄的消息。对于浅海的做法和态度我更是不满意的。他任我旗特务机关长后，曾去乌珠穆沁右旗面见索王说：“今后蒙古的事情完全由德王负责去做，希你不要从中阻挡。”他说这话的意思是对索王的恫吓，对我的支持，但我认为他这种说法很不妥当，因为索王一向对日本没有好感，不愿与日本“合作”。经我采用很多办法，才说动他同意“蒙、日合作”。我认为对他应当迁就和尊重，以资号召，不意浅海竟出以威胁恫吓之意，这会使索王怀疑浅海对他的恫吓是出于我的教唆，会离间我和索王之间的感情。同时我也感到浅海的态度非常蛮横，对我毫无礼貌，动辄指挥、命令。因此，我就同意了陈绍武拉陶排金、反对浅海的建议，由陈绍武拟具一个以“加强团结，拥护领袖（指我），内除奸细（指金永昌），外抗强权（指浅海）”的誓词，在我王府的西跨院房内召开中坚干部秘密会议，张挂成吉思汗像，备有奶酒。计被邀签名参加者有陶克陶、陈绍武、丁我愚、赵文儒、孟昭义、刘定一、包崇新、白景、王庆三、张秉智、包海明、高庆春、吾力吉卜林、陶克托胡

（陶布新）等。首先由我发言，大意是“忠心为蒙”、不畏强权等语。继而宣读誓词，由参加者签名画押后，面对成吉思汗像，举手宣誓，痛饮奶酒，大有歃血为盟之势。会后我切嘱大家，必须严守秘密。

经过这次会议，果然得到了效果。一般干部便由动摇中安定下来，对浅海的蛮横态度，多置之不理，有时也起而抗衡。浅海对人的态度也较为缓和。迁至化德时，日本关东军即将浅海调走，另派田中玖为特务机关长。现在回想起来，我在这个问题上，犯了很大错误，并有罪恶。我投靠日本，浅海就暴露了日本帝国主义者的狰狞面目，当即招致蒙古族青年的不满。我搞的所谓“独立局面”，大有“树倒猢狲散”之势。这本来已经值得我深思和觉醒，但我为政治野心所驱使，正在陶醉于“蒙日合作”之中，认为浅海既然态度蛮横，换一个态度温和的特务机关长或可好一点。结果赶走了态度蛮横、做法强硬的浅海，换来了一个貌似温和、手段毒辣的田中玖，还是照样执行侵略蒙古的政策。我运用召开中坚干部秘密会议宣读誓词的方式，麻醉了蒙古族青年，使大家从动荡中安定下来，跟我一同走上投靠日本帝国主义的道路，既误导了很多蒙古族青年，又断送了西部蒙旗，真是罪莫大焉。

二

在乌珠穆沁旗召开“蒙古大会”

伪蒙古军总司令部在苏尼特右旗成立后，由于僻处牧区，交通不便，指挥失灵，非常影响工作的进展。并因人口稀少，物资缺乏，房屋不多，在供应和居住上多感困难。而且我曾听到田中隆吉说过：西尾参谋长参加典礼后说，西苏尼特旗这个地方，人口稀少，一片荒凉，怎能成立“蒙古军政府”。这时吴鹤龄也向我建议：“既然日本关东军喜欢‘蒙古军政府’这个名称，我们就成立‘蒙古军政府’吧，何必强调非叫‘蒙古军总司令部’不可，弄得在名称上不一致！”同时我感到，关于和日本关东军

接洽的经过、“蒙古军总司令部”成立之情形、今后如何开展工作等问题，均有向各盟旗报告和讨论之必要，于是就责成吴鹤龄拟具成立“蒙古军政府”和建立“蒙古国”草案。在建立“蒙古国”草案中，特别强调领土完整、主权独立，要以原有盟旗（包括东、西盟旗）为领域，以葫芦岛为海口。恰好这时田中隆吉又来我旗，我就将建立“蒙古国”草案交给他，请他转交关东军研究并帮助实现。当时他把这个草案随手放在衣兜里，可能未向关东军反映，后来到了化德，他又把这个草案原封未动地交给我说：“此事以后再说，现在应当集中力量打绥远，只要把绥远拿下来，建国问题就随之解决了。”

我和吴鹤龄等研究，为了讨论“蒙、日合作”及今后如何开展工作问题，急需召开一次有西盟全部盟旗参加的“蒙古大会”，并为了迁就索王能够亲自参加以资号召起见，决定1936年4月24日在乌珠穆沁右旗，召开第一次“蒙古大会”。这样决定之后，就以“蒙古军总司令部”的名义，下令锡、察两盟各旗札萨克和总管，务要亲自参加；以“蒙政会”的名义，通知乌、伊两盟各旗及阿拉善、额济纳、土默特等旗，派主要人员参加。届时到会参加者，计锡盟有我和索王、松津旺楚克、雄诺敦都布、林沁旺都特、巴拉贡苏隆、索特那木道尔吉、多布敦、道尔吉、桑都克道尔吉、贡桑等。察盟除察西四旗未派员参加外，察哈尔东部八旗都参加了，计有卓特巴扎普、特穆尔博罗特、哈斯瓦齐尔、色楞那木济勒、穆克登宝、补彦、阿由尔札那、萨穆丕勒诺尔布等。乌盟参加者有沙拉巴多尔济、葛什克达赖等。并把在“蒙政会”秘书厅任科长的伊盟达拉特旗人那逊德勒格尔约为伊盟代表，把在“蒙政会”实业处任科长兼参议的额济纳旗人苏宝丰约为额济纳旗代表，还把阿拉善旗前来“蒙政会”洽领枪械的陈那逊巴图约为阿拉善旗代表。李守信、吴鹤龄、金永昌、于兰泽、陶克陶等以“蒙古军总司令部”的军政首脑资格参加。这时吴鹤龄为了取得日本方面的信任，特利用他的岳父于华亭（是卓盟喀喇沁右旗闲散王公，曾任北洋政府众议院议员）与索王的旧关系，尽力说劝索王同意和日本“合并”，亲自参加大会。索王非常讨厌日本帝国主义，但这时看到“蒙日合作”已

成事实，就听从了吴鹤龄的劝说，同意了我的做法。我听说索王曾向他旗的协理图桑阿表示说："现在已做成这个样子了，德副盟长这样做自有他的见地和他的道理吧，今后我们不必干涉他了，任凭他放手去做吧。"

吴鹤龄在大会筹备工作上，出谋划策，审查提案，表现得特别积极活跃。在部分代表到达之时，他曾和我说："代表已经到了大部分，不能叫他们闲着，闲着就要出问题，应当召集他们开会，招待他们宴会。开会宴会，宴会开会，这是我在南京跟国民党学到的一套办法。"因此，他就和到会的代表们整天开会，讨论问题。迨到代表们到齐举行预备会议时，推选我和索王、李守信、卓特巴扎普、沙拉巴多尔济为主席团，吴鹤龄在大家推举下担任大会秘书长。他在掌握会场、进行讨论、通过议案中，起了一定的作用。

在预备会议上，先酝酿协商主要议案，次又有人提出如何筹措军政各费。吴鹤龄主张，可向日本人借款1000万元，作为军政各费。这样协商和安排后，就在索王大蒙古包中举行正式大会，首由索王作简单的发言，说明召开此次大会的意义。继由我报告和日本关东军接洽的经过，"蒙古军总司令部"成立及改元易帜的情形。接着就讨论议案，最主要的有下列各案：（一）关于建立"蒙古国"和先在嘉卜寺（化德）成立"蒙古军政府"，以资整军经武，收复蒙古固有疆土案；（二）关于实行征兵，扩编军队，组织"蒙古军"案；（三）关于实行统制经济，开发资源案；（四）关于成立蒙古生计会，组织救济新村案。因在会前已经酝酿成熟，都顺利通过。嗣由吴鹤龄宣读察盟代表中提出将化德县改为"德化市"，由察盟划出归由"蒙古军政府"直辖案。卓特巴札普提出异议说："化德是察盟统辖的一个县，是谁未经我这个盟长同意，竟敢'张松献地图'，提出这个议案来！我是不同意的。"吴鹤龄看到这种情况，马上把原文又念了一遍说："这个议案没有人正式签名盖章，应当另议。"卓特巴札普也再未说什么，这个议案就暂时搁下了。

在大会进行中，日本关东军参谋田中隆吉、横山顺等乘飞机赶来参加，我向田中隆吉作了个别谈话说："索王等最不愿意的是你们派来顾

问，过问蒙旗行政，希你以来宾资格在大会上讲话时，说明现在派来的日本顾问是帮助蒙古筹备建国，以俟工作就绪，就将派来的日本顾问一律撤回，决不干涉旗政。”田中隆吉果然照我的嘱咐，在大会上讲了话，并将带来的八音子手枪多支，分赠各盟旗有实力的代表，以资拉拢。接着我们又向田中隆吉提出，向日本借款1000万元。他答复说：“你们蒙古有石油矿吗？如有石油等矿源时，借款1000万元那是容易办到的。”从他这几句话里，充分透露出日本帝国主义要把蒙古作为吸取原料、销售商品、投资赚钱的殖民地的阴谋。

田中隆吉在大会中看到吴鹤龄的活跃情形和所发挥的作用，对他非常重视，很想拉他为日本做些工作，曾向吴鹤龄说：“我们日本人中，曾经有人主持杀了尼冠洲，我认为这件事做错了，希你不要因此有所顾虑，今后应当放手进行‘日、蒙亲善’工作，我想请关东军给你一个‘嘱托’，你的意向如何？”吴鹤龄推托说：“这是你对我的关照，但我对此没有什么意思。”田中隆吉当下虽然没有说什么，但在面部上表现出不甚愉快的神色。

大会最后一天进行选举，选出云端旺楚克（云王）为伪蒙古军政府主席，索王和沙王（伊盟盟长莎克都尔札布）为副主席，参与大会的代表都在“选任状”上签名盖章，表示郑重，当晚即以全羊席招待田中隆吉、横山顺和参与大会的全体人员。会后由我率领一部分代表到百灵庙把“选任状”送交云王，并请他今后主持指导工作。云王表示：“我是年老力衰，德薄能鲜，深蒙大家推戴，无限感奋，希望大家共同去做，特别希望德秘书长（指我，我是蒙政会秘书长）多负责任。”这时国民党中央政府已准云王辞去“蒙政会”委员长职务，调任国民政府委员，“蒙政会”由副委员长索王执行委员长职务，实际上由我负责。

成立伪蒙古军政府

第一次的“蒙古大会”召开后，我即派王宗洛率同职员数人前往嘉卜寺接收化德县房屋，进行筹备伪蒙古军政府工作。不意化德县小林顾问拒

绝腾房，发生了波折；嗣经与化德县特务机关长田中玖交涉，才把小林顾问的气焰压下去，开始腾房，进行修理。经筹备就绪后，就于1936年5月12日举行伪蒙古军政府成立典礼。参加典礼者除各盟旗代表和前“蒙古军总司令部”职员外，还有日本方面参加者日本关东军今村参谋副长、田中隆吉参谋，化德特务机关长田中玖、日本顾问村谷彦治郎等。举行升旗典礼时，首先由我讲话，说明依据“第一次蒙古大会决议”，成立“蒙古军政府”的意义。继由今村致“祝词”，祝贺“蒙古军政府”的迁移，强调“日、蒙亲善”，协同一致，完成“蒙古军政府”所负之使命。礼成后，即大排宴筵，招待日本来宾及各盟旗代表。

伪蒙古军政府人事安排，依照“蒙古军政府组织法”规定，由云王、索王、沙王以正副主席名义，任命我为总裁，负实际责任，掌握军政大权，实行独裁制。总裁下设一个办公厅，参议、参谋两个部，军事、财政、内务、实业、教育、交通、司法、外交八个署，一个顾问部。办公厅主任补英达赖，军事署长王宗洛，财政署长德古来，实业署长王揖唐，内务署长索特那木道尔吉，交通署长于兰泽，司法署特穆尔博罗特（特大海），外交署长陶克陶，教育署长金永昌，后将金永昌调任驻伪满代表，由郭尔卓尔札布继任教育署长，参谋部长李守信兼，参议部长吴鹤龄，顾问部主任顾问村谷彦治郎，军事顾问山内，财政顾问稻茨，外交顾问山本倍亲，教育顾问崛井德五郎等。嗣因总裁工作繁剧，又设四个帮办，由李守信、吴鹤龄、补英达赖、陶克陶等担任，帮同我处理军政事务。并派陈绍武为内务署帮办，吉致祥为教育署帮办，帮同署长处理署务。后又增设一个侍从处，由丁我愚为少将侍从处长。乌古廷由伪满来蒙后，暂派为参谋部主任参谋。这是伪蒙古军政府的主要人事安排。

组织伪蒙古军

伪蒙古军政府成立后，首要的是搞军事工作，就是招兵买马，扩充军队，由我亲自主持进行，军事署长王宗洛负责办理实际工作。把李守信统率的原有部队，和由伪满各旗招来的士兵，以及在锡、察两盟各旗征到

的士兵，重新编为两个军，八个师，一个警卫师，一个炮兵团，一个宪兵队。伪第一军军长李守信，统率一、二、三、四各师和一个直属炮兵队，计第一师师长刘继广，第二师师长尹宝山，第三师师长王振华，第四师师长宝贵廷，直属炮兵队长丁其昌。伪第二军军长由我自兼，统率五、六、七、八各师，计第五师师长依恒额（依绍先），第六师师长宝彦图，后由乌云飞（突布格尔勒）继任，第七师师长穆克登宝，第八师师长包悦卿，后由札青札布继任，警卫师师长雄诺敦都布，后改为第九师由包海明继任师长，炮兵团团长王云五，宪兵队队长刘建华（那木尔），预定全部都是骑兵，总兵力达1万余人。并为了培训中下级军官，特在我旗东营盘成立伪蒙古军官学校，由我自兼校长，从各部队和各盟旗中选拔蒙古族青年，进行训练。

为了考验部队训练成果，特于是年9月在化德飞机场举行阅兵典礼，计参加被检阅的军队，除伪第一军派来部分部队外，伪第二军所属各师大部参加。由我亲自检阅部队分列式。日本军参谋长板垣征四郎也来参加检阅，表示满意。板垣旋即乘坐飞机分赴伊盟札萨克旗和阿拉善旗定远营，说是去见沙王和达王（达理札雅），做拉拢工作。我检阅部队后，赏给士兵每人银洋一元，以资鼓励。并事先派兵打来黄羊多只，就地野餐，表示慰劳。我参加阅兵典礼后，回想在国民党政府隶属之下，等于讨饭，今天要上几支枪，明天要上几门炮，仅欲编练一师人马而不可能。这时凭日本的力量，居然能够握有两军人马，万余骑兵，如再扩而充之，虽不敢妄想恢复成吉思汗伟业，也能把“蒙古民族复兴起来”跻于国际强盛民族的行列，我自己也做一个“民族英雄”。幻想及此，真是自鸣得意、喜形于色，有些飘飘然了。

但在得意之中，不如意的事情也就随之而来。首先，日本特务机关长田中玖，以伪第一军经费不足为借口来威胁我。有一次他带着伪第一军的参谋长刘星寒前来见我，说是军费不足，叫我设法筹措。我知他是故意给我出难题，就赌气把伪第一军的经费都批准了，并增批了一些军费，反责成他也设法筹措。他看我面有愠色，也带着不耐烦的神气，一声不响地走

了。又因伪蒙古军政府成立了公路局，任命张绍庭为局长，负责办理化德至张家口及各旗县之间的运输。一般商人都愿搭乘公路局的汽车，不愿搭乘日本“满铁”的汽车，以致“满铁”汽车公司生意冷淡。田中玖为了使日本人经营的“满铁”汽车公司垄断交通运输，赚取高额利润，曾向我提出不供给公路局汽油，由公路局自行购买，想用这个办法，迫使公路局停办歇业。我当时认为在张家口还能买到汽油，因而置之未理。不久田中玖走了，田中隆吉来了，才又供应汽油。更因我这时比较信任陶克陶，不信任金永昌，金永昌便和田中玖拉得很近，说我和陶克陶的坏话。

记得陶克陶曾说过这样一段话：“田中隆吉有一次把我叫去，正言厉色地向我说：‘田中玖说金永昌曾向他反映过，说你曾向蒙人表示，蒙古为了自己的利益，跟谁都可合作，既可和日本合作，也可与外蒙合作。现在你说这话可不行。’我当时答复田中隆吉说：‘这话是前在多伦时，和金永昌等研究蒙古问题时说的，是在蒙、日未合作以前的话，不是在蒙、日合作之后说的。’田中隆吉反嗔作喜说：‘那时说的没关系。希你不要顾虑，我是信任你的。’”

陶克陶述说这话之后，又感慨地说：“我们的金永昌先生真厉害，如不是田中隆吉谅解我，我可能就遭田中玖的毒手了。”这又说明，田中玖是想用打击陶克陶的手法，去掉我的助手，给我颜色看，幸亏得到田中隆吉的谅解，才归无事。但这不是田中隆吉比田中玖好，而是因陶克陶这时确实成为田中隆吉忠实的走狗，绝无另走外蒙古路线的意图，所以田中隆吉故意把这套话告知他，叫他感恩图报，进一步为日本帝国主义效劳。

其次，令我不如意的事还有：（一）因为从伪满各旗招来的士兵，多是土匪、地痞、流氓、游手好闲之徒，纪律不好，在举行阅兵典礼时，竟在化德街上发生了抢劫案。士兵打人骂人之事，更是层出不穷，给当地人民造成不良印象。（二）在编制和配备上，各方意见很多，争要军马，争要装备，例如第七师师长穆克登宝是察盟人，利用地方上的关系，先购足了军马，第五、六两师的人就表示不满说：“我们师是先编制的，反而军马不足，有的部队仍在徒步。而第七师是后来编成的，却配备了足够

的军马，很不公平。”意见纷纭，烦言啧啧，叫我很难处理，至感烦恼。（三）宝贵廷一度暂代伪第二军军长，迨发表他为第四师师长后，就解除了他暂代军长职务，因而对我也有怨言，向人发牢骚，我听到后也很恼火，想把他调到伪蒙古军官学校工作。并叫王宗洛暗地调查他有无煽动军心事情。王宗洛接受我的指示后，一方面告知王云五（王宗洛的胞兄）炮兵团长预做准备，以防不测；一方面调查宝贵廷的言谈行动。嗣后向我报告说，宝贵廷并无煽动军心、图谋不轨事情，仅在饭馆酒醉时发过牢骚，我才未调动宝贵廷的职务。（四）在征兵上，锡盟各旗都按照“第一次蒙古大会”决议，把应征士兵按期送来入伍，只有乌珠穆沁右旗，因为保安队官佐都青阿、敖恒等反对征兵，在该旗蒙民中散布怨言说：“现在蒙古军政府向我旗征兵要马，是我旗协理托克托胡勾通德王、吴鹤龄等投靠日本，扩编军队之所致，我们应当反对。”号召被征旗民杀害托克托胡，因托克托胡事先得讯逃避他处，始得幸免。继而都青阿、敖恒等又率领被征旗民到索王府请愿，要求免除兵役。这时索王正病重，不得已抱病出面苦苦劝说，才将这事平息，不久索王也就病故。（五）乌珠穆沁右旗官员们为了应付差事，于是年冬特在林西一带雇用些兵痞，代替该旗应征旗民入伍。李守信见着我说：“我的林西旧部属都来了。”我对该旗这种应付差事的做法很不满意，严令该旗务要依照“蒙古大会”决议，把应征士兵送来。该旗官员们迫于我的命令，又设法说服了都青阿、敖恒等，率领应征士兵，前来我旗西营盘入伍。这是我勾结日本帝国主义后，在征兵问题上遭到乌珠穆沁右旗反对的一段经过。当时我很不满，现在回想起来，投靠日本帝国主义，强行征兵要马，招致蒙古人民的反对既是应该的，也是必然的。

和伪满洲国及“冀东”缔结协定

在“外交”工作上，主要是和伪满及“冀东防共自治政府”缔结协定。伪蒙古军政府成立后，田中隆吉就向我建议，应和“满洲国”缔结协定，我即偕同李守信、吴鹤龄、金永昌、陶克陶、卓特巴扎普、雄诺敦都

布、索特那木道尔吉等，分乘飞机两架赴长春。

到达后，先访问日本关东军参谋长板垣征四郎，伪满国务总理大臣张景惠、外交部大臣张燕卿、宫内府大臣熙洽、军政部大臣于深澄、蒙政部大臣齐默特色木丕勒等，无非是周旋与宴会。继而就和伪满外交部谈判缔结协定问题，计日本关东军方面参加者有田中隆吉，专田参谋；伪满方面参加者有外交部大臣张燕卿，次长大桥忠一；伪蒙古军政府方面参加者有我和陶克陶。谈判开始时，首先由我和张燕卿分别致辞。张燕卿在致辞中，强调应以日本为中心，达成“满蒙合作”。我在致辞中，着重从过去历史和当前局势，说明“蒙满合作”之必要。接着就进行讨论，在政治、经济等问题上，没有什么分歧，仅在军事问题上有点争论。我提出“蒙古军政府”甫经成立，实力未充，如果受到威胁的时候，请“满洲国”出兵援助，当威胁解除的时候，“满洲国”即应撤兵。大桥忠一争辩说：“从外交惯例上说，‘满洲国’为了援助蒙古，实行出兵或撤兵，应当有一定的程序和规定，不能你们叫我们出兵就出兵，叫我们撤兵就撤兵。”田中隆吉插言说：“不必在这个问题上争执吧，本着‘满蒙亲密合作’的精神，按照德王的意见办理也无不可，我看就这样办吧。”因为田中隆吉知道，伪满蒙缔结协定，不过是走形式，出兵或撤兵还得由关东军作最后的决定。谈至此就告结束了。

又经分别酝酿协商，结果缔结了以共同防共、军事同盟、互派代表、经济提携为内容的“蒙满协定”，由我代表伪蒙古军政府签字，由张燕卿代表伪满洲国签字。这个协定的内容，大致如上所述。因协定原件，在化德退却时丢失，详细内容记不清楚了。嗣即根据这个协定，伪满洲国派玉春为驻伪蒙代表，伪蒙古军政府派金永昌为驻伪满代表，双方开始建立了“外交关系”。同时，伪满中央银行在化德设立办事处，发行伪满币，在伪蒙古军政府行政力量所及的地区，流通使用，由此双方也发生了经济关系。这次日本关东军和伪满外交部，还派员陪同我们到奉天参观兵工厂，在东陵举行盛大的招待宴会。旋又到大连游览，到王爷庙访问。缔结协定后，我单独一人去见了伪满皇帝溥仪。关于我和溥仪的关系，下面再谈。

我同伪满签订协定后，返回化德不久，田中隆吉又向我建议，应派“外交署长”陶克陶赴“冀东防共自治政府”缔结协定，好向他们交涉支援经费。于是我又派陶克陶代表伪蒙古军政府赴“冀东”与汉奸殷汝耕谈商，结果缔结了以“政治上共同防共，经济上互相支援”为内容的协定。田中隆吉即根据这个协定，从“冀东防共自治政府”弄到100万元，作为伪蒙古军政府的经费。

我与溥仪的关系

在这里，需要补述我和溥仪的深切关系。

在我年轻时期，因受封建社会遗毒很深，忠君思想至为浓厚。但我承袭苏尼特右旗札萨克亲王之后，已入民国时代，无君可忠，就把忠君思想寄托在溥仪的身上，非常盼望溥仪复辟。记得我16岁时，我的姐夫穆特贲阿任察哈尔十二旗群的巡防马队统领，掌握数百蒙古骑兵，参加了张勋复辟活动。有一次他和我说：“我不久就到北京保护皇上登极，你有什么奏折或对皇上有说的话，我可以替你转奏。”我当时因为年轻，没有作出什么表示，后来张勋复辟失败了，穆特贲阿逃到外蒙古避难，株连他的兄弟六人被杀，我还深以在张勋复辟事件中，没有贡献自己的力量为憾事。

迨至冯玉祥驱逐溥仪出宫，溥仪迁到北京日本公使馆避难时，我曾偕同补英达赖去北京，通过外蒙古驻京王公那彦图的介绍，去见溥仪。因溥仪正准备转赴天津，仅得一面，未得多谈，聊表慰问之意就辞出了。我和补英达赖就急忙返回张家口，向商家筹款一万元又到北京，前往日本公使馆，见到了溥杰，表示愿到天津面见溥仪。恰巧这时溥仪从天津来电话，向溥杰询问他母亲的疾病，溥杰趁便在电话中转达了我的意思，溥仪答称：“可以前来相见。”我遂和补英达赖把一万元纸币用布袋缠在腰中，外穿宽大衣服，密赴天津，住在华石斧家。经过接洽联络，在日“租界”张园见到溥仪，当即将所带一万元进献，并致慰问之忱。所得到的是数句奖勉之语和赏喝牛奶一杯。但我毫无不满之心，还以为在“皇上”蒙难之时，得尽献款之诚，是为臣属应尽的义务，感觉无上的欣慰。在溥仪当上

伪满皇帝后，我特穿上清时的蟒袍和马褂，戴上朝珠与顶戴，拍照叩拜的跪相，派我旗协理钟昆赴伪满送给溥仪，表示尊君的“忠心”。我于1935年冬赴长春和日本关东军接洽时，先和溥仪的侍从武官张海鹏见面，谈到张勋复辟失败，不胜感慨，谈到“皇上”又复“登极”，无限欢欣。接着又见了溥仪，行了叩拜礼，于心甚慰。

当我代表伪蒙古军政府到长春来“缔结协定”，本有“两国相交”的意味，应当尊重自己的“身份”。但顾念过去的关系，对溥仪个人仍愿以“君上”事之，以“臣属”之礼相见。因此，当我单独见到溥仪时，还是行了叩拜礼，溥仪也挥手让座，温语相加。我们二人面对面地谈了很多的话，内容我现在记不很清楚了。嗣我看见侍从人员均已退出，只有我们二人在座，又向他说：“日本人对皇帝怎样？在我们那边，日本人气焰嚣张，仅是一个化德县顾问小林，竟敢拒绝腾房，阻挠军政府的筹备，对于往来化德的蒙人，也横加干涉，不予便利，使我非常气愤，曾向田中隆吉提出不要小林顾问。田中隆吉答复我说：‘小林顾问不好，改就行了，何必不要他。’我又反驳说：‘你们日本人不好，改了就行，为什么我们蒙古人凌升有错就杀了呢？’”溥仪说：“你这话太硬了。”谈至此我即辞出归寓。

接着田中隆吉来和金永昌等商量，说溥仪要封我为“亲王”，征询叫什么亲王好。金永昌说：“封为武德亲王最适宜，因为武是采取成吉思汗圣武皇帝的武字；德是采取德王的德字，把武德二字结合起来，是表示德王继承成吉思汗伟业的意思，一定适合德王的口味。”于是田中隆吉就采纳了金永昌的建议，转知“宫内府”办理，溥仪又召见我，亲自授予“武德亲王”《钦任状》，我即拜领接受，表示谢恩。我返寓后，仔细看看这个《钦任状》，上面还有溥仪的署名，我很奇怪，怎么皇帝封号还自己署名呢？认为不合前清封王只盖大印、皇帝不署名的惯例，足见这个不伦不类的《钦任状》是出于日本人的指使，不是溥仪近臣的主意。这时吴鹤龄也知此事，带有不满的神气对我说：“这时封你为‘武德亲王’有什么用处？还不如赠给你一枚勋章，表示‘蒙满亲善’，符合国际礼节。”我当时对吴鹤龄虽没说什么，而脑子里却在这样想，这个“武德亲王”，

必要时也有用处，如对守旧的老年王公杨桑等宣扬一下，很可利用溥仪的“钦封”，提高我的身价，把向以前辈自居的老年王公杨桑等的气焰压下去。我虽有这个想法，但这时我认为自己已经掌握了伪蒙古军政府的军政大权，杨桑等对我也比以前尊重，不再遇事阻挠，我也就没向他们宣扬此事，遂把这个《钦任状》束之高阁了。后来我又去伪满“访问”，拜见溥仪时，对他作了交代说：“现在皇帝在日本帮助之下，已经登极，再也用不着我效力了，我今后把忠于皇帝之心，忠于蒙古事业。”溥仪也以“贵宾”之礼待我，宴会时，口称我为“贵主席”了。

关于“凌升之死”

上面我谈了一些我和溥仪的关系。顺便谈谈关于“凌升之死”的问题。1936年旧历正月十八日，在我旗举行伪蒙古军总司令部成立典礼后不久，田中隆吉又来我旗，商洽扩编军队之事。提到所需经费时，他说：“蒙古统一指挥机构已经成立了，亟须筹措经费，现在兴安北省省长凌升因通苏案被捕，听说他的财产很多，可以没收他的财产，作为军政府的军费。”我当即拒绝说：“凌升被捕，对于蒙古人心和西进工作都有影响，最好不要严究，应当从宽发落。至于我们所需经费，满可设法另行筹措，绝不可把没收凌升的财产充作我们的经费。”田中隆吉见我不但不愿接受这样来路的筹措经费，反有营救凌升之意，立刻转了话锋，向我解释说：“凌升虽然被捕，我想康德皇帝出头一说，也就没事了，希你放心。”谈至此，他即告辞而去。

同年4月24日，在锡盟乌珠穆沁右旗召开伪蒙古大会，准备正式改元易帜，成立伪蒙古军政府，当时我和索王、卓特巴扎普、吴鹤龄等提出以大会全体代表名义，要求释放凌升，预定关东军代表到达后，即提出这一问题。在大会进行中，日本关东军参谋田中隆吉、横山顺等赶来参加。刚下飞机后，吴鹤龄就将大会准备给关东军打电报、要求释放凌升情形，向田中隆吉等报告。田中隆吉答复说：“时间来不及了，大概今天就把凌升处决了。”接着他到屋里又继续解释说：“对处决凌升，本来我是不同意

的，在关东军参谋会议时，曾讨论处理凌升问题，我这主管蒙事的参谋主张不杀，把前次你和我说的‘应当从宽处理凌升，以免影响西进工作和蒙古人心’之言都说了。但是主管关于苏联事情的参谋都主张杀，最后实行表决，我是少数，只有服从多数，结果就决定把凌升处以死刑。这是我们内部处理凌升的经过情形，我都明白地告诉你们。”我们听他说明以后，认为既已把凌升处决，没有再向大会提出这一问题的必要，仅在会外时间告知了大家。索王、卓特巴扎普等，都和凌升有交情，闻听之后，不胜叹息。嗣后陶克陶向我说：“田中隆吉和横山顺闲谈时说，杀凌升的事，给西蒙人的印象很不好。”

“蒙古军政府”成立后，我偕同李守信、吴鹤龄等赴长春，在日本帝国主义导演下与伪满缔结了一个所谓“满蒙协定”之后，即到大连参观，曾和业喜海顺（业王）见面，招待我们参观的日本军官小野寺问业王说：“业王爷对蒙古事情有什么意见？”业王说：“蒙古事情我不知道，我只知有满洲国。”当时使我甚感诧异，一向好谈蒙事的业王，现在也守口如瓶，表示冷淡。这充分说明凌升被杀后，东蒙王公明哲保身、惧怕日本、应付场面的心理。

改化德县为“德化市”

在“内政”上，将化德县改为“德化市”。关于化德县设置问题，我从前就曾表示过不满，因为化德县所在地原叫嘉卜寺，正和我旗接壤，而我的名字汉语译音是德穆楚克栋鲁普，人又称我为德王，头一个字都是德字，如果仍称化德，就意味着我为这块地方所化；如果改称德化，就意味着这块地方为我所化。在百灵庙“蒙政会”时期，包悦卿曾将我不满“化德”二字的意思，向察哈尔省政府主席宋哲元的亲信萧振瀛提过，萧振瀛当向包悦卿解释说，化德县这个名称是从崇礼、尚义等县次第排列下来的，绝无化及德王、侮蔑德王的意思。既然德王对“化德”这个县名有意见，我马上建议宋哲元主席更改，希你转向德王解释，不要误会。果然为时不久，我就接到国民党内政部的通知，说将“化德县”改为“新民

县”。但内政部虽有明令更改，因“察东事件”已经发生，没有来得及更改化德县的牌子，当地人仍称化德县。因此，我于伪蒙古军政府成立后，就决心将化德县改为“德化市”。并因卓特巴扎普对此有意见，特派吴鹤龄前往明安旗卓特巴扎普家中，婉言劝说疏解，卓特巴扎普始答应将化德县从察盟划出，改称“德化市”，归由伪蒙古军政府直辖。我遂任命李守信兼任伪市长，张子荣（卜琳弼里格图）为伪副市长，听从伪军政府直接指挥，管理“德化”市政。

成立伪蒙古生计会

正式成立伪蒙古生计会，发表吴鹤龄兼任“会长”，并把募得雪灾救济款悉数拨作该会基金，由吴鹤龄负责主持设置“德化商店”，收购灾民的牲畜皮张，转售部队制作军装，筹划集结灾民组成救济新村和重点植树造林等事。不意因此却引起陶克陶、金永昌的不满。他们向人发牢骚说：“这笔资金，是我们到‘满洲国’募得的救济雪灾款，曾向‘满洲国’各界呼吁救灾奔走募集，并向国务总理大臣鞠躬致谢，尽了很大的努力，受了很多辛苦，费了很多唇舌，为什么现在归由吴鹤龄掌握？究竟如何花用，应当问个明白。”并带有不满的神气前来质问我。我当时不由得也就无名火起，顺手把桌上放着的一个茶杯摔碎，很生气地说：“仅仅这一点灾款的处理，你们都不信任我，居然提出质问，今后怎样共图大事！”金、陶二人碰了我的硬钉子，也就神色黯然而退。由于我对吴鹤龄的支持，虽把金、陶的气焰压下去，但因此引起金、陶和吴鹤龄之间的钩心斗角、争权夺利的矛盾与冲突。

设立伪蒙古学院

设立伪蒙古学院，任命郭尔卓尔扎布为“院长”，陈绍武兼教导主任，分设师资、电报、补习各班，招收蒙古族青年施行短期训练，培养急

需的干部。同时在张北设立伪察哈尔青年学校，聘任日本人为教官，侧重用日语教学，进行奴化教育。并由伪教育署主持，选送留日学生。计有胡尔钦毕力格、博和温都苏、卓里克图、都固仍仓、赛春阿、都格尔扎布、德勒格仍贵等十名，被送往日本东京，先在“善邻协会”补习日本语文，继即分送日本大专学院深造，培养通晓日语的各项“人才”，促进“日蒙亲善”。还在“德化”设立“蒙日语文讲习所”，鼓励职员学习蒙日语文。

汉奸王道一的下场，日寇以杀人为儿戏

在治安上，“德化”特务机关长田中玖，在伪蒙古军政府成立后，招募当地土匪头子王道一，企图用以扰乱绥东治安，做进犯绥远的前哨。不意王道一率领匪众投归日本后，在扰乱绥东方面未起多大作用，反在尚义一带为非作歹，影响后方治安甚大。田中玖为了收拢当地人心，使对日本有好感起见，特将王道一诱捕枪决。这是王道一做汉奸的下场，同时也说明日本帝国主义的狠毒，汉奸如不为其所用，便置之死地。又据伪军法处长关荫南说，在未挑起绥东战争以前，唯恐在押的军事犯扰乱后方，日本关东军密令指示伪蒙古军的大桥雄熊参谋，亲来通知关荫南，将寄押在张北监狱的91名军事犯，开具名单，宣布罪行，一律执行枪决。关荫南认为其中有的军事犯系属轻微犯罪，仅判六个月徒刑，已经在押三个月，再有三个月就可释放出狱，恢复自由。对这类罪犯如也执行枪决，未免冤屈，引起官兵不服，而致动摇军心，反为不美。大桥强调这是关东军的命令，必须执行，不能变更或拖延。又经商讨一番仍由大桥提出意见说：“为了执行关东军命令，只有将91名军事犯绑赴人烟稀少的张北山下行刑，在行刑前一律松绑，任其散漫乱跑，后边用机枪扫射，跑了的就算跑了，打上的活该命死。这样处理既可使一部分罪犯活命，也算执行了关东军的命令，你我严守秘密，不可对外言说。”关荫南认为再强调原来意见，也是无用，只好同意这个办法。这样执行结果，仍然打死了19名，其余72名四散逃逸。由此可见，日本帝国主义者的惨无人道、草菅人命。而日、伪执行人员也就视人命为儿戏，任意屠杀。

设俱乐部，公开烟赌

日本帝国主义者一方面虽以“确立后方治安”为名，任意屠杀，另一方面却在各县城镇设立俱乐部，公开放赌，抽取头钱，名义上是做特殊用途的开支，实际多饱充了经办者的私囊。并公开卖鸦片，毒害人民。由于烟、赌的公开，聚集很多游民，不分昼夜，吆五喝六，吞云吐雾，一塌糊涂，弄得鸡犬不宁，秩序紊乱。而无辜人民因而倾家荡产者有之，投河上吊者有之，卖妻鬻子者有之。身体羸弱者更不知凡几，贻害人民，莫此为甚。当时有人出面反对公开聚赌，主张取缔俱乐部，而主管其事的日本人反说中国人天性好赌，设立俱乐部，正是投其所好，满足需要，并可从中抽取头钱，增加税收，做特殊用途的开支，拒绝取缔俱乐部。实际上，日寇是想用烟赌毒害中国人民，使之意志消沉，身体衰弱，不思反抗日寇，不战而亡我中华民族，其用心十分狠毒。

进犯绥远的部署

1936年10月，“德化”特务机关长换成田中隆吉。他指使王英组织的所谓“大汉义军”已经初步编成，而伪蒙古军也已初步编练就绪，便主张并要亲自主持进犯绥远。他和我说：“‘九一八’事变时，东北军一打就跑，我们没费多大力气，就占领了东北四省，建立了‘满洲国’。绥远军更是不中用的，可能一吓唬就跑，很快就能拿下绥远，可速责成陶克陶组成接收委员会，准备接收吧。我计划叫王英部队打前锋，利用汉人打汉人，你们蒙古军督后，做第二线的支援部队，即或发生冲突，蒙古军也可少受损失。”我当时认为他的看法也有可能性，并为了早日占领绥远，实现建立“蒙古国”的妄想，也就赞同田中隆吉进攻绥远的计划。王英是志在河套，企图早日当绥西的一路诸侯，表示愿意承当打前锋，于是进攻绥远的问题便确定下来。接着，田中隆吉就直接指挥王英部队进攻红格尔图，由我命令李守信率领伪蒙古军第一军进驻南壕堑，做第二线的支援部

队，把伪蒙古军五、六、八、九各师布置在尚义、“德化”一带，守护后方。这时把百灵庙视为后方军事基地，除其他军需器材不计外，仅面粉一项，就运去两万多袋。在派遣驻守百灵庙部队问题上，我曾很是踌躇。先想派战斗力较强、由东北各旗招来的士兵编成的师前去，深恐纪律不好，在乌盟蒙民中造成不良印象。经反复考虑，认为百灵庙虽是后方军事基地，而名义上仍是国民党政府隶属下的“蒙政会”所在地，傅作义不会派兵来打，于是就把甫经编成的伪蒙古军第七师派去。因为这个师的士兵，都是从“察盟”各旗征来的蒙民，虽训练较差，战斗力较低，而纪律好。结果把第七师派去后，并把原派的包俊山所带的一连调回。

向傅作义发出宣战性的通电

这样部署之后，我就以我为伪蒙古军总司令、卓特巴扎普为副司令的名义，于1936年11月5日对绥远省政府主席傅作义发出宣战性的通电。这个通电是由吴鹤龄起草的，其全文如次：

绥远省政府傅主席勋鉴：自从在蒙古境内设置省、县以来，蒙旗之权力日趋衰微，蒙民之生计日陷贫穷。为了挽救蒙古于危亡，乃于前年要求自治，当承中央之援助，准于设立蒙古地方自治政务委员会，颁布自治原则八项，蒙众欣慰，举国同情，而独贵省始终猜忌，另眼相加，屡次企图破坏自治，其最显著者列举如次：

（一）贵省各项税收，关于在蒙地及向蒙民征收部分，依中央颁布之蒙古自治原则，一律劈分蒙古若干成。当时蒙政会为谋地方之和洽，谅解贵省之困难，仅要求在百灵庙蒙政会统辖地方劈分特别税。中央对这项特别税，曾有分配命令，贵省竟擅自变更划线，夺去丰镇、兴和、集宁、凉城、陶林五县税收，借口多端，曲解明令，经议年余，分文未给。当时中央对贵省已分配特别税，举办各种事业，而蒙政会因未得税收，以致经济困难，原

定各项事业，不能举办。贵省对蒙古地方自治，如此暗中破坏，早已引起蒙古民众之不满。

（二）前年所发生之西公旗事件，纯粹是蒙古内政问题，蒙政会责成主管盟长和平解决，乃义属当然，而贵省独越权干涉，操纵石王，扩大事态，纠纷不已，企图分化蒙旗，推翻自治之居心，不问可知。今春蒙政会奉中央明令，撤回驻在西公旗之保安队，以免发生冲突，并请中央转令保护麦力更召活佛尼达克丹大喇嘛。不意数月后，大喇嘛及其家属从众，被贵省派兵袭击，竟致杀害。如此破坏蒙古自治荼毒蒙人惨剧，凡属蒙族，莫不痛心。

（三）蒙政会保安队系呈请中央编成，专负保卫地方之责，何等重要！而贵省今春竟利诱该队中不良分子起而叛乱，收归贵省，更于前月装备叛乱官兵，诡称反正，进攻百灵庙，企图毁我自治发祥地，为各旗驻在百灵庙之保安队击退。当由贵省派兵掩护，酿成叛兵互相仇杀，死伤数百名之多，贵省利用无知蒙人，客留贵省，仇视蒙人，为何如此之甚！

（四）百灵庙蒙政会系全蒙自治机关，深受中央扶植蒙古之至意，全体蒙人视为第二生命，凡属人类，对之莫不寄予同情，不忍加以危害。独贵省阴谋破坏，居心推翻，甚至捏造是非，耸动中央，擅用乌、伊两盟名义，淆惑中央视听，从而产生绥境蒙政会，以致我蒙经营多年之百灵庙蒙政会，归于毁灭，引起蒙民丧失对中央之好感，似此误国殃民之举，令人太息痛恨！

（五）贵省前于破坏我蒙政会之际，我蒙对贵省并未究明是非，因为命令虽然出自中央，主谋系出贵省，我蒙仍本服从中央之意志，终于在锡盟盟长公署所在地，成立察境蒙政会，清理百灵庙蒙政会之债务，隐忍退让，毫无不利贵省之行为。而贵省对我蒙反倒愈加压迫，在察哈尔西部一带，百灵庙以南地方，挖掘战壕，修筑炮台，做种种军事上之设施，给锡、察两盟及百灵庙

一带无辜蒙民生活上以严重压迫，贵省实欲置全体蒙民于死地而后快。

总之，蒙古愈退让，贵省愈压迫，迫使蒙古已退无可退之地，蒙古民众均希诉诸武力，争取最后生存。本会同仁始终以和洽地方为重，只有一线和解之可能，绝不能轻启战端，累及民众。特提出下列要求，希贵省谅察，迅作答复。

（一）察哈尔右翼四旗，原由察哈尔部管辖，现在该部依中央颁行之蒙古自治原则改盟。为该盟土地之完整及锡、察两盟民众到绥东五县（丰镇、兴和、集宁、凉城、陶林）地方，买卖粮食、煤炭、牛马、皮毛等便利计，即日将察盟右翼四旗，退还察哈尔盟，归本会管辖，以资名副其实。

（二）百灵庙蒙政会结束工作，尚未完竣，留有职员及保安队数百人，为安定所留员兵和附近居民之人心，免除其生活上压迫起见，请将百灵庙以南一带地方军事设备、经济封锁，即日取消，恢复原来和平状态。

（三）百灵庙蒙政会保安队原有之步枪、轻机关枪及弹药，均属中央发给。今春贵省煽动该队叛乱时，将武器押收归绥、武川等处保管，应即如数退还百灵庙蒙政会。

（四）现在百灵庙蒙政会整理债务之结果，所欠员兵俸给及商民债款计达20万元，是项巨款蒙地无所从出，中央拨给也有困难，贵省年应劈给蒙古之特税20万元，应速发给。

（五）今春百灵庙兵变为首各员，蒙政会已发有逮捕令。现在该员等均在贵省任职，证明当时兵变确属贵省嗾使，希将各叛徒一律遣返百灵庙，以便处分。贵省袭击麦力更召及惨杀大喇嘛之官兵，均属杀人凶犯，应一律撤职查办，以明法纪。对以上两案前后受害之数百蒙人及其家属，一律发给抚恤金，以慰冤魂。

以上五项系蒙古为了生存至不得已之要求，贵省若反省与承认压迫蒙古之错误应即克期实行。否则蒙古虽弱，亦做最后之抗

争。如演成事变，责任完全应由贵省负担。特此电达。

察境蒙政会委员长德穆楚克栋鲁普

副委员长卓特巴札普

歌（十一月五日）“印”

傅作义的复电

这个电报发出后，旋即接到傅作义的复电如次：

嘉卜寺察境蒙政委员会德委员长勋鉴：歌电阅悉，自来辩论事理，有强辩夺理者，亦有颠倒是非者，接诵大电，深悉尊处于各案之是非尚未明了，兹特分项撮要答复如左，幸详查焉。

（一）绥特税系代中央征发军费之税收，自治八项原则劈分地方税之规定，该税本在不应劈分之列。北平军分会特示优待，派员调查，规定五项办法，贵会迄未实行，是贵会不肯按中央规定而劈分，并非绥方不予劈给。至商驼改道，系因贵会拦路苛征，自断商运，具有事实可指。

（二）西公旗事件，第一阶段由于贵会派兵帮助叛逆曼头围攻王府，并有来历不明之飞机助战，致该旗横受糜烂，中央命令撤兵，贵会均未置理。第二阶段本章大喇嘛等返庙，与石王等已订约相安，不知何故，当王道一扰犯绥东之时，该喇嘛忽勾结非本国国籍人，在梅力更招兵运械，建筑机场，意图与绥东王匪相呼应，大喇嘛于八月八日攻击王府，而石王十三日始行反攻，当战争结束，确有非本国籍人在内，此事谁违中央，谁肇乱源，社会周知，勿烦曲解。

（三）百灵庙保安队哗变，系在察北改元易帜之后，时间事实，昭昭于社会，该青年等为执事平日所培植，其思想行为度为执事所深晓，中途脱离，当自有故，云等通电对执事在察北行动表示惋惜，而誓不合作，执事更应自省，不尤他人。

（四）绥蒙易制，也在察北变乱之际，尔时乌伊官民既畏丧失国土，贻蒙古之害，又不愿与地域不同者共此多事岁月，中央俯顺多数蒙人之情，始行分治，目下旗众相安，边防无恙，与察蒙相较，自有真正得失。

（五）分治命令既颁，贵会既不通令迁锡，复在六县易帜改元，组织军政府，接引伪蒙军入察，近又向庙会大批增兵，乃来电云"本其服从中央之素志，以地方和平为重"，且责绥方自卫之不当，似言行不无矛盾。以上就见质敷陈其要，至对来电要求及期待于左右者，即执事是否以国家为前提，察北今日成何局面？且察该四旗本多年隶察，相安无事。自张北六县脱离察省管辖，该四旗官民始惶然呈请中央，颁定改隶之令。执事对义既有期勉，义敢不以诚反求于执事，倘执事以国家为重，使察北六县仍归察省管理，恢复旧规，则虽中央明令在前，悬想四旗必仍愿还隶旧制，其他要求自更不成问题。盖今日边土安危，责在执事，而不在义，义服务国家，只知有公，不知有己，同在中央隶属之下，向不存地方与私人之见。执事如摆脱现状，不受利用，幡然有所表现，则往日之罪，义当负之，愿即负荆以请，并立解职，以明心志。否则不但四万万同胞对执事怀疑，即执事左右也难保不做爱国之事。刻所馨祝者，宁义谢罪以保执事令名，勿义免过而执事有负于国。时迫事急，祈执事熟思而力图之，国家幸甚！边防幸甚！

绥远省政府主席　傅作义　庚（八日）

如意算盘没有打对

这时蒋介石也来电报指责我，电文内容大意是："披阅歌电，不胜诧异，台端在电报中所述各节，多属绥境蒙政会之事，应由该会与绥省商洽解决。台端职为察境蒙政会委员长，应管察境蒙政会之事，何必过问绥蒙间之问题。今竟陈兵相见，台端所谓积年倾心内向者，不知将何以自解？

务希以国家前途为重，即日停止军事冲突，听候中央处理。”这时前方军事业已接触，意在拿下绥远再说，对蒋、傅来电再未置复。田中隆吉还从伪满航空株式会社调来几架飞机，盘旋空中，侦察助威。

田中隆吉是这次战争的主谋者和指挥者，我和王英是这次战争的仆从和附和者，特别是田中隆吉是以行险侥幸心理对待这次战役的。认为上有飞机盘旋，下有王英部队攻打，后有伪蒙古军督战，这样虚张声势地一威吓，傅作义军队就可以撤退，大则可以唾手而得绥远，乘胜西进，小则也可以扩大占领区域，而壮声威。不意这个如意算盘没有打对，绥省方面既有傅作义的第三十五军的兵力，又有国民党晋军的支援，总兵力有三万余人，而伪蒙古军是新经编成的，训练很差，担任前方作战的王英部队又属乌合之众，战斗力更差。总计伪蒙古军和王英所率领的“大汉义军”的兵力不过一万五千来人。日本帝国主义者仅在伪军部队中配备少数顾问和指导官，并未开来大批日军相助。从数量上看，是众寡悬殊；从质量上看，是优劣分明。因此，由雷中田率领进攻红格尔图的王英部队，围攻数日，未能得逞，迨至绥方援军到后，进行反攻，王英的部队便败退下来，集结在商都休整，李守信立刻派尹宝山率领伪蒙古军部队进驻商都，和傅作义军对抗。

百灵庙战役

这时我得到伪第七师师长穆克登宝的报告，说是傅军孙兰峰旅，正在百灵庙以南集结，等候炮兵部队一到，就可能进攻百灵庙，伪蒙古军第二军的日本顾问烟草谷下令叫死守百灵庙。我接到报告后，认为烟草谷让死守百灵庙，命令不妥。因为新经编成的伪蒙古骑兵，不能死守百灵庙，应乘绥远军不备之际，进行奇袭截击。我很想乘坐飞机前往百灵庙布置，只因有紧急事务待办，未能及时前往。到了这年11月23日晚，孙兰峰旅就进攻百灵庙。“蒙政会”汽车司机张岱带着一架机关枪在南山头上配合部队射击，松秀带着伪蒙古军游击队（系迪克丹大喇嘛死后逃来的士兵编成的）在康熙营盘一带山上守护，其他团队亦准备迎击。不意驻在百灵庙的

日本特务机关人员首先逃跑，遇见松秀下山领取子弹，误认为有变，竟开枪打死，这时四面枪声顿起，百灵庙遂入混乱状态。伪蒙古军第二军日本顾问烟草谷和第七师师长首先退却，所属官兵也随之溃退，第七师野崎顾问说他是最后撤退的，并说用刀劈了一人，究竟所劈何人，没有说明。第七师官兵退却后，集结在锡拉木伦庙和布拉图庙两地休整，百灵庙遂为傅军占领。

石玉山金宪章等反正

田中隆吉为了挽回颓势，又令集结在商都的伪军王英部队，再攻百灵庙。而王英部队的副司令雷中田"自告奋勇"，情愿率队前往，不意这时伪军石玉山、金宪章旅长等，已和傅作义有了联络，待机而动。他们到达锡拉木伦庙时借故未往。雷中田仅率1000多人，再度进犯百灵庙。雷中田虽然"立功"心切，还给我来信，自称"卑职"，以明心迹，但其士兵看到送他们的汽车均已开走，是不管他们的死活，因此都不愿为日本帝国主义卖命，果然一经接触，即行败退，雷中田当即被击毙。败退官兵也到锡拉木伦庙集结。这时我不愿意第七师和王英部队混合驻扎一处，除派伪军事署长王宗洛乘坐飞机前往该庙，慰问部队并查清情形联络部署外，特电令穆克登宝，将该师驻在锡拉木伦庙的所部官兵，调到布拉图庙集结，不料指挥王英部队的日本顾问小滨大佐坚不许可。穆克登宝陈说，这是奉"德总司令"的命令，正在指挥部队开拔之际，第七师野崎顾问竟抽出军刀进行威吓说："驻守此地的部队，都归小滨大佐统一指挥，必须听从小滨大佐的命令，否则就以军刀相见。"穆克登宝在野崎威吓之下，马上软化了，不敢再力争，只有俯首听命，把我给他的命令抛在脑后。穆克登宝虽然对小滨大佐表示恭顺服从，而小滨大佐对穆克登宝却不信任，当即将第七师在山上和要路所布置的岗哨，一律换成王英部队的士兵担任。这时王英部队的旅长石玉山、金宪章等，既感到投靠日本帝国主义后屡吃败仗，前途渺茫，又受傅作义的策动，遂乘步哨更换之际，发动所属官兵暴动起义，将日本顾问小滨大佐等20余人全部枪决，并袭击驻在该庙的第七

师官兵，连长李春林、若格尔札布等和数百士兵，均在出其不意的袭击中死亡，石玉山、金宪章遂率领部队投归傅作义。穆克登宝却在兵变中，带着大批未发的军饷偷偷溜走，不但得了活命，还发了一笔横财。他谎报军饷在战乱中丢失，后来用此款买了一辆全新的贝克牌汽车。第七师在这次变乱中死亡数百官兵，蒙受很大损失，我和穆克登宝受到察盟蒙民的责难，他们编出歌谣来咒骂我们。这是我勾结日本帝国主义挑起绥东战役的结果。

锡拉木伦庙事件发生后，前方战事既然失利，后方军心也多不稳，田中隆吉正拟弃守“德化”，反来欺骗我说：“我们日本军快来了。”我问：“这是真的吗？”田中隆吉说：“真的！真的！日本军快来了。”田中隆吉不但欺骗我，也用欺骗的手法拉拢李守信。有一次，他对李守信说：“你叫李守信，我叫李守义吧，我们是情同骨肉的亲兄弟呀。”这充分说明，田中隆吉为了拉拢人欺骗人，什么卑劣的伎俩都能使出来，我却甘受田中隆吉的欺骗而不觉醒，反认为田中隆吉比别的日本人强，对蒙古甚为热心，现在回想起来，真是愚不可及。

“西安事变”后缩编伪蒙军

正值田中隆吉仓皇失措，对我们欺骗拉拢之际，不意发生了“西安事变”，张学良、杨虎城在西安扣留了蒋介石，实行兵谏抗日。田中隆吉得到这个消息，喜出望外。在一天黎明的时候，他仅穿裤衩，披着大衣，到伪军事署向王宗洛说：“张学良在西安把蒋介石扣留了，中国从此要发生内乱，对我们作战前途有利。”旋又到了我的住室，报告了这一消息，并征询我对“西安事变”的意见。我即将吴鹤龄请来共同商量，田中隆吉极力主张给张学良打电报，杀了蒋介石。我和吴鹤龄一致主张说：“现在前方战事失败到这个样子，后方军心也有动摇，与其劝张杀蒋，莫如趁此机会呼吁停战言和，作为缓兵之计。”田中隆吉见我俩不同意他的意见，也就转了话锋说：“这样也好。”于是就由吴鹤龄拟具电报稿，记得内容大意是指责张学良、杨虎城容共抗日，劫持最高领袖，紊乱国家纲纪，因此，特呼吁全国一致声讨，营救“领袖”。并呼吁在“领袖蒙难”之际，

停止蒙绥地方之争。“西安事变”解决后，傅军即停止进攻，伪蒙古军也退守原地，双方进入相持状态。

这时日本关东军把田中隆吉调走，派来第二科科长武藤章主持“德化”特务机关，就和我研究整顿部队问题。他主张把伪蒙古军九个师缩编为六个师，每师配备一个山炮连，以便集中兵力，发扬骑炮兵联合作战的效能，并答应每师拨给四门山炮。当时我也认为武藤章的主张有道理，合乎军事原则，而且蒙古军还可能多得几门炮，用以加强部队的编制装备。但我总想扩编伪蒙古军，不愿缩编，并感缩编各师之后，人事上不好安排，因而同意每师配备炮兵连，不同意缩编为六个师。武藤章见我坚不同意，再未强调缩编，也未配给山炮就回去了。关东军另派森岗大佐继任“德化”特务机关长，为时不久，“德化”特务机关长又换成河崎大佐，这时因为部队中既有金宪章及石玉山等反正，其他部队也有不稳状态。我向人表示：“我们是以蒙古为前提，谁对蒙古有利，就跟谁合作。”这话也许到了河崎耳朵里，因此，河崎在一次会议上讲话说：“蒙古只能和日本合作，不能和别人合作，假如有人认为蒙古既可跟日本合作，也可和别人合作，甚至与苏联亦可合作，那可不行。”从河崎这几句话里，充分说明日本帝国主义已把蒙古视为禁脔，不容他人置喙，特别注意防止苏联的影响。这是对我们提出的严重警告。实际上我当时认为，苏联是可怕的，像我这样封建王公出身的人，当时是决不会走苏联这条道路的。我感觉河崎有点神经过敏，很想上台讲话驳他，但是我话到嘴边又咽下去。

河崎大佐到任后，对于配发伪蒙古军山炮问题，未曾提及，我也再未追问。为了加强军事指挥机构问题，特在伪蒙古军政府之下，又成立了伪蒙古军总司令部，仍由我任总司令，李守信任副司令，任命乌古廷为参谋长，刘星寒为参谋副长，其下设副官、参谋、军需、军械、军法、军医六处，副官处长张启祥，参谋处长崔守堃，军需处长崔景岚，军械处长纪树勋，军法处长关荫南，军医处长李××。并为了简化层次，便于指挥，将伪第一、二两军编制取消，由伪总司令部直接统辖各师，并将部分师长作了调整，因第六师长宝彦图和李明远意见不合，都调任参议，另派乌云飞

继任师长，把警卫师改称第九师，第七师因在百灵庙战役和锡拉木伦庙变乱中损失甚大，师长穆克登宝撤职，另行补充训练。对其他各师也进行调整，准备待机而动。

“七七事变”以后一度撤出“德化”

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发生，日本帝国主义集中力量进攻平、津、华北，对内蒙古方面还未派来大批日军，绥远方面傅作义军趁此时期展开进攻。由董其武率领部队进攻商都，商都伪军尹宝山率队迎击，战斗甚为激烈，双方均有伤亡，终因傅军攻城甚急，尹宝山被迫撤退，商都遂为傅作义军占领。尹宝山在撤退途中，井得泉团长又率队反正投归傅作义，这对伪蒙军事方面又增加了不利影响。这时反正的石玉山率部进攻“德化”，察省主席刘汝明也派部队进驻万全坝上，军事形势顿形紧张。关东军特把田中隆吉（这时任联队长）从朝鲜调回来，主持军事，急忙采取紧急对策。在刘汝明方面，听说田中隆吉秘密进行联络，允给四门大炮，才缓和了刘汝明派队进攻。但石玉山部队迫近“德化”，而驻守“德化”的伪蒙古军，仅有包海明率领的第九师少数部队。我当即命令王宗洛武装军政府职员，帮助第九师防守“德化”。日本特务机关首先焚烧文件，纸灰飞扬，汽车发动隆隆作响，显是做退却准备，因而谣言百出，秩序大乱，无法维持，于是我又下令叫王宗洛带同伪蒙古军政府职员，向察盟镶黄旗撤退。吴鹤龄掌握着伪蒙古生计会汽车，于兰泽掌握着伪交通署的汽车，纷装物品，争先撤退，各机关职员更为动摇，有的领了枪支争抢汽车撤退，有的顾不上领枪也随着撤退。先于8月14日晚，向察盟镶黄旗拉白庙撤退，继即撤到多伦。我于大家撤退的翌日上午，曾由包海明陪同视察山上工事，下午我才偕同徐荣侯（时任滂江电报局局长）返回我旗。徐荣侯说：“没有什么动静嘛，怎么都撤退了呢？还没到最紧急时期，这个也撤退，那个也撤退，成什么样子！”

在大家撤退之后，包海明仍率第九师少数部队防守“德化”，嗣因石玉山部队愈益迫近，已听见枪声，也就率队撤退，“德化”遂为傅作义军

占领。这次“德化”撤退是非常仓促的，枪支既未全部带出，弹药亦未焚毁，重要文件更未焚毁或带出。甚至苦心训练多日的军乐队，也未令其撤退。后来傅军进占“德化”时，该乐队却装备整齐，奏军乐欢迎。

我返旗后，听说马占山率领军队进至土木尔台，深恐进攻我旗，特派赵文儒前往联络，并让徐荣侯、王石青（专聘教我子侄的汉文教师）主持，在我旗挂上察境蒙政会的牌子，权作应付之计。我这样安排后，即往补英达赖家。途中遇见陶克陶乘坐汽车找我，我遂偕同他到补英达赖家中。这时日本关东军参谋长东条英机到达多伦，一下飞机就问河崎大佐：“德王现在何处？”河崎一时答复不出，东条对他痛加斥责，并追问失守“德化”的责任。河崎为了卸责，很可能把失守“德化”之责，推到伪军事署长王宗洛身上。东条旋即派出飞机各处寻我。我乘坐汽车赴多伦，到达哈丹布图庙时，见有飞机盘旋空中，大概就是寻我。但这并不是日本关东军对我特别关心，而是日本帝国主义势力初经伸入西蒙之时，极需我这块招牌，作为他们统治内蒙古的工具，一时还不能弃掉。

我到达多伦后，心情是非常恶劣的。认为初和日本“合作”，就遭受惨痛的失败，对日本关东军所谓对蒙古的帮助，有些失望。这时我忽然想起迪力瓦在“德化”和我说过的话：“你如跟日本人合作不来，不如趁早出走，周游世界各国，宣传蒙古问题，把蒙古问题提到国际政治舞台上。依靠世界各国解决蒙古问题，比靠日本一个国家解决蒙古问题好。”我回味迪力瓦这套话，觉得颇有道理，就转和吴鹤龄商量，表示不愿再和日本“合作”下去，想返我旗另作打算，没有把迪力瓦之言告知他。他认为我仍想和蒋介石拉拢，当即劝我说：“你的动作打算，无非是再想和蒋介石拉拢，据我看来，中国是打不了日本的，并且蒋介石并不想认真地打。在百灵庙蒙政会第二次委员会议时，我曾将蒋介石和何应钦对日妥协的意图，向你谈过，并且日本人决不会甘心失败，从此善罢甘休。现在日军既已占领平津，预料不久就会派兵到蒙古来。与其等到日本打过来，再与日本合作，不如现在主动地和日本合作下去，看看局势演变，再定行止。”经过吴鹤龄这样“痛陈利害”，婉言劝说，我遂将返旗想法打消。仍又收集“蒙古军政

府”的旧部，重整旗鼓，借用多伦喇嘛庙恢复办公。

“德化”失守后，傅的部队又向前进攻康保，张北方面也有援绥晋军孙长胜骑兵旅对峙。田中隆吉面对这一情况，甚为焦急，特用客用飞机一架运兵，一次空运六名日本兵到达张北，计运了十余次，才运到60多名。刘汝明听说日本军一到，便将布置在万全坝上的部队撤走，绥远军亦再未向前进攻，张北方面战局暂时又入稳定状态。田中隆吉听信河崎之言，认为弃守“德化”是王宗洛的责任，表示要加以惩治。嗣经王宗洛亲往张北面见田中隆吉，说明弃守“德化”是奉我之命，并非个人擅自主张，田中隆吉始予以谅解。

在日寇指挥下进占绥远

到1937年10月，大批日本军由多伦正向西开。听说阎锡山因重视山西老家，特把傅作义的第三十五军调往雁门关内，原驻绥的傅、阎军队，即开始准备由察北和绥东撤退。伪蒙军便乘机反攻，我在多伦坐镇，用蒙文编成的密电指挥各师前进。先行集中伪蒙古军的炮兵，把在康保一带的绥军打退，继占领了“德化”和商都，迫近了陶林。当时率队进攻陶林的刘建华（刘系汉人，蒙名阿木尔，当时任炮兵队长）曾向我说：“我们的炮兵打得很准，在进攻陶林时，一炮打中门炳岳（中央骑兵第七师师长）的司令部，门炳岳着慌即率队撤退，陶林遂为我们占领。”这时李守信率领一部分伪蒙古军进到集宁，我和吴鹤龄、陶克陶亦由多伦率领伪蒙古军政府职员到达张北。据陶克陶向我报告说：“据田中隆吉表示，他也掌握了绥军撤退的动态，因为他们的译电员能够译出绥军各部队之间的密电，就是你们德王的蒙文密电译不出来，不知是怎么编的。”由此可见，日本关东军不但常听绥军的军事秘密，就是我和蒙古军各师之间的密电也在其暗查之列。这充分说明对我仍不放心。后来我为了免除日本方面对我的怀疑，特将蒙文译电本送给了他们，表示坦白。

我到达张北后，将伪蒙古军政府主要人事作了调整，尽量起用少壮人员，任命陶克陶为办公厅主任，陈绍武为内务署署长，张秉智为交通署署

长。并由陶克陶率领职员随军前进，做慰问部队和接收工作。我率领数名职员，前往锡盟和百灵庙一带，会同雄诺栋都布等，发动各旗保安队，组织“蒙古各盟旗联合军”，计划从草原南下进占绥远。很快与伪第九师包海明会合，逼近武川。李守信率领的伪蒙古军，也因傅作义移防山西，地方上仅有“国民兵”等少数部队，乘机向西进攻，仅在集宁、丰镇、旗下营等地发生过一些小的战斗，很快就迫近绥远省城，把日本军抛在后边。这时沿平绥路进犯的日本军，除命令李守信缓向西进外，桑原中佐（驻绥特务机关长）特乘飞机到达百灵庙见我，叫我通知第九师和盟旗联合军缓攻武川，等候日本军从凉城开到，再一致行动。他们的表面理由是，不要孤军深入，以防不虞。实际上是怕伪蒙古军抢先占了绥远城，丢了日本军的面子。因此我只有等候日本军到达，才于是年10月14日占领绥远省城，10月17日占领包头。同时武川亦为日蒙军占领，我即发表徐荣侯为武川县县长，其他各县由随军的政治接收班临时委派县长。我由百灵庙到达绥远省城时，吴鹤龄、陶克陶、王宗洛、德古来等已率领伪蒙古军政府职员先期到达，遂和日本方面共同商谈，组织成立了伪蒙古联盟自治政府。这时派遣和马占山取联络的赵文儒，也由包头返抵绥远，向我报告说，马占山表示，决不向苏尼特右旗进兵，并用白缎写了一封信郑重表示此意。随着我军事的进展，马占山率队西撤，我跟他到了包头。由此可见，马占山颇有拉拢我之意。否则，他若当时进兵，占领我的王府是易如反掌的。

总之，我在这一时期中，投靠日本帝国主义，开始建立伪蒙政权，挑起绥东战役。战事失败后，又在“西安事变”时通电拥蒋，指责张、杨两将军容共抗日，“七七事变”后公开投日，卖国求荣，复在绥远组成伪蒙古联盟自治政府，帮助日本帝国主义侵占我国神圣领土，成为千古罪人，抚今思之，愧恨万分。

（1965年）





第2章 | 日本操纵伪政权合流

伪察南自治政府的始末

左　宝

1937年“七七事变”后，国民党军队由南口溃退。8月27日，日寇占领张家口市，9月底，张家口地区各县均沦入敌手。原察哈尔省主席刘汝明（国民党二十九军一四三师师长）和他的军政要员均逃之夭夭。当时张家口市商会执行委员于品卿以商界“代表”的名义，带领一小撮所谓“地方绅士”之流，手持自制的日本国的膏药旗，前往张家口郊区迎接日军进入张家口市。日军进城后，由于品卿带头组织有11人参加的“察哈尔治安维持委员会”，并于8月30日在张家口市正式成立。于品卿因迎接日军进城“有功”，让他担任“维持会长”。

一

日寇占领张家口后，推行了“以华制华”的反动政策，扶植汉奸于品卿于1937年9月4日在张家口成立了“察南自治政府”，以红、白、蓝三色星条旗为“察南自治政府”的表证。于品卿当上了主席，杜运宇当上了副主席，最高顾问是日本人金井章二。机构有官房、民生厅、财政厅、建设厅、教育厅、警务厅、保安厅、总务厅、民政厅，各厅下设处，如总务处

处长陈玉铭。“首府”设在宣化，把宣化变为“蒙疆”地区的反动统治中心。将原察哈尔省所属的宣化、万全、怀安、涿鹿、蔚县、阳原、赤城、龙关、延庆、怀来10个县均归于“察南自治政府”管辖之下，人口约200万人。

随后“晋北、蒙古自治政府”也先后出笼。1937年9月13日成立“晋北、蒙古自治政府”，“首府”设在大同，统治的地区有大同、阳高、天镇、左云、右玉、平鲁、山阴、浑源、广灵、灵邱、怀仁、应县、朔县13个县，夏恭当上了“主席”。内蒙古的德穆楚克栋鲁普（以下简称德王）于10月27日组织起“蒙古联盟自治政府”，下辖巴彦塔拉、锡林郭勒、乌兰察布、伊克昭、察哈尔五个盟的36个旗、20个县和归绥、包头二市。“察南自治政府”是日寇侵华的忠实工具，是彻头彻尾的汉奸政府，它的统治期虽然很短，其罪恶却是极大的。“察南自治政府”成立之后，提出四项施政纲领：（一）日察可一；（二）铲除共党；（三）民族协和；（四）民生向上。在这四项施政纲领的实施中，察南的经济资源如煤炭、铁矿、油料、粮食、牲畜均成为日寇侵华的战略资源，支援了日寇的侵华战争和以后的太平洋战争。而察南地区人民生活逐日下降，完全沉沦为日寇的殖民地。

察、晋、蒙三个伪政权出现后，在察、绥、晋三省相连地域形成了三个“自治政权”。日本人为便于控制这三个伪政权，于1937年11月22日，召集察南、晋北、蒙古三个所谓政府的“代表会议”。“察南自治政府”代表于品卿、杜运宇到会。会上达成了“为促进蒙古、察南、晋北三政权的相互善邻关系，加强相互关系的产业、金融、交通等重要事项的联络，达成这三个自治政府的政权紧密联合共同防共，民族协和与民生向上的协议”。并本着“相互谅解”的精神，于1937年11月23日成立了“蒙疆联合委员会”，原察南、晋北政府主席于品卿、杜运宇、夏恭当上了“总务委员会”委员，日本关东军大特务头子金井章二任最高顾问，原“蒙古联盟自治政府”主席德穆楚克栋鲁普当上了“总务委员长”。

二

日本帝国主义强使察南、晋北、蒙古三个伪政权合流，除了谋取掠夺资源的便利条件外，还为了便于统治。统一这三个伪政权是金井章二的阴谋。

日本人金井章二是日本派遣到中国的特务。他认为，察南、晋北、内蒙古三个地区的风俗、民情、文化基本相同，在经济上和地理上都与其他中国地区不同。在经济上内蒙古是它们的伙伴，况且，平绥铁路已经使这个地区连接在一起，这一地区就是后来被日本称为“蒙疆”的地区。金井章二向其主子汇报中说，“蒙疆”的地域北接外蒙古，南达陕西、宁夏，人口约250万人，其中蒙古族20万余人。同时商品运输量的80%是通过大同做东西走向流通的（指察南和内蒙古），所以切实巩固这一地区的统治，对于日本帝国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这里还有蕴藏量丰富的大同煤矿、龙烟铁矿以及冶炼厂，是日本重要的战略物资来源。为此，日本关东军总部同意了金井章二将察南、晋北、内蒙古三个伪政权合并为一的建议。

三

察南、晋北、蒙古三个伪政权合一后，日寇以为这样可以使三个伪政权服服帖帖地服从“蒙疆委员会”的领导，但由于原三个伪政权各自为政，相互矛盾，虽然在名义上建立了“蒙疆委员会”，实际上是貌合神离，各行其是。1938年6月份，三个伪政权头目德王、于品卿、夏恭访问了日本国。他们回国后，日本人对三个“巨头”还是放心不下，又将察南、晋北、蒙古“自治政府”并称为“蒙疆联合自治政府”，德王为“主

席”，于品卿、夏恭为“副主席”。取消了“蒙疆联合委员会”。以张家口市为首府，以黄、蓝、白、赤四色七条旗为蒙疆政权的表证。下辖36个旗、20个县和归绥、包头二市，并采用成吉思汗纪元年号（1939年为成纪734年）。到1941年6月1日，根据日本人的旨意，将“蒙古联合自治政府”改为“蒙古自治邦”，大汉奸、原“察南自治政府”“主席”于品卿又当上了“蒙古自治邦”“副主席”。这个伪政权建立后，日本人规定，只允许对内称“邦”，对外称“联合自治政府”。

1943年秋，将伪察南政厅改为宣化省，伪省长刘继广担任，次长由日本人泽田贞一担任（次长相当副省长，但掌握大权），“省会”由张家口移到宣化。而伪察南政厅的办公地址（今张家口市委党校院）做了德王“主席”的王府。同时把伪察南政厅长官陈玉铭调任为“蒙古自治政府”参议，并将张家口市改为“蒙古自治邦政府”“政务院”直辖的“特别市”，伪市长崔景岚。伪察南政厅所辖一市十县（相当“察南自治政府”地盘），伪察哈尔盟公署所辖张家口的县有张北、康保、尚义、沽源、崇礼五县。

四

1942年8月31日，“蒙古自治邦政府”建立后，日本帝国主义为了实施“蒙、汉、回分治”的政策，便于他们从中驱使利用，特设立了“回教委员会”“兴蒙委员会”和“兴亚院”。

“回教委员会”内设总务班、指导班，下设调查、宗教、文教、卫生四个股，各伪盟公署亦设“回教班”，利用回教为他们的殖民统治服务。早在回教委员会成立前，就成立了“西北回教委员会”，在张家口等地均设分会。

“兴蒙委员会”，是日本人利用所谓“复兴蒙古民族”，为了进一步笼络伪蒙政权和蒙古军等傀儡组织的官吏继续充当其侵略帮凶而设立的。

然而当时伪蒙政权中一些汉人官吏却啧有烦言，他们认为，“蒙古自治邦政府”内不应再设什么“兴蒙委员会”，既有“兴蒙委员会”，就应有“兴汉委员会”，才算公平合理。

另外，在日本侵略者统治期间，于1938年1月建立日本对中国侵略计划的指导和决策机构——对华院。它的任务是用集中统一的专门机构来全权处理日常事务和统一各项政策。后来因这个机构“对华”这一称谓对中国人的侮辱太明显了，为了掩人耳目，于1938年12月16日，又将“对华院”改为“兴亚院”。并在各地设“联络部”，负责“指导”当地伪政府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活动，以及处理“日本与中国”方面必要的行政事务。实际上这个机构是灭亡中国计划的总机关，也是一个大特务机关。

五

“察南自治政府”成立之后，日本侵略者除在政治上压迫，还在经济上大肆掠夺。他们把察南地盘作为政治上“防共第一线”，经济上“羊毛、煤铁、兽皮等物资的宝库”。日本官方人士说：“若能尽量开发，将来不难成为东亚的宝库。”

日寇从1938年至1945年投降以前，在近八年时间内，从察南、晋北、内蒙古（统称蒙疆）地区掠夺了大批物资运回日本国。

日本帝国主义在八年当中从“蒙疆地区”运回国去的主要物资有：

（一）铁矿。1937年上半年运回日本国的铁矿有7万多吨。从龙烟铁矿运回日本国的铁矿石300万吨以上。

（二）煤炭。从1938年到1945年上半年，日本侵略者在“北支那”的“开发株式会社”设在张家口长清路，指挥开发一切资源。日寇每天从大同、下花园拉走至少有三列火车煤炭。一列火车为50个车皮，每个车皮50吨，一列火车可拉2500吨，每天就是7500吨，这样一年可拉走煤炭270多万吨，八年内共拉走煤炭2000万吨以上。其中，1938年大同、下花园、大青山

煤田产煤约100多万吨，日本运回国去的就有35万多吨。

（三）兽皮。“蒙疆畜产股份有限公司”1944年5月1日至1945年4月30日的“年度决算报告”所载数字表明：仅一年间掠夺牛羊皮321532张。此外，还有骆驼皮、牛头皮、牛腿皮等共31种，270640张。按当时公家的价格计算，价值约2.96亿元（伪蒙疆币），按市价计算约合29.6亿元。

（四）兽骨。仅1944年5月1日至1945年度内，就收买牛骨、胶骨、材料骨合计806384千克左右。

（五）兽血。从1944年5月1日至1945年4月30日，共收购各种兽血49634千克；还有兽脂34431千克。

（六）牲畜。据1945年8月统计，日寇掠夺“蒙疆地区”牲畜113万多头；畜皮378万多张。

（七）畜毛。日本侵略者在投降前共掠夺到畜毛4450多万千克。

（八）食盐。日寇每年运往日本国的食盐达80多万担。

（九）农产品。日本侵略者将“蒙疆地区”的小麦、黍子、豆类等总产为164568039石，1/3以上运往日本。

资料来源：《蒙疆年鉴》《北支·蒙疆现势》《蒙疆特殊会社概况》《察南自治政府史》《张家口地区党史资料选编》。

日本侵略华北时期的伪蒙古军政府

李泰棻

日本侵略华北时，制造了两个伪组织，即察北的伪蒙古军政府和冀东的伪冀东防共自治政府。这两个伪组织虽然都做了日本侵略华北的先驱，但在发展过程中还是有所不同，这里只将伪蒙古军政府部分作一记述。

伪蒙古军政府

伪蒙古军政府发生与发展，应当分作以下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内蒙自治政务委员会”时期。这个委员会成立的中心人物是德穆楚克栋鲁普。他原来是察哈尔省锡林郭勒盟西苏旗的札萨克，清朝时期，受爵亲王。幼年曾经在北京的贵胄学堂读书；历任第二届国会参议院议员，段祺瑞执政时参政院参政，北伐以后又任察哈尔省政府委员。他是一个性格顽固、不甘寂寞的人，在内蒙“王公”中，最为突出。1929年，他曾亲自到沈阳，见过张学良。张赠送他一小批军械。回旗下后，他成立了“乌滂守备队”。虽然只有一二百人，但已经有了军队的初步组织。随着，他又到了南京，蒋介石派了受过特务训练的热河青年丁我愚、陈绍武、陶立滨等随他于1932年到了旗下，名为帮助他，实际上是监

视他。不久，又发展他为“国民政府委员”，以示优遇。但他并不以此为满足。他每见生客，总是穿着清朝那一套王公的礼服，脑后垂着从来没有剃过的发辫。这种亲王的头衔，民国早已否认，但在旗下，被他们奴役多年的蒙古族人民，还是不敢不承认的。所以，德穆楚克栋鲁普仍想利用它作为统治内蒙古的凭借。在他对我的谈话中，曾经郑重地说：“无论哪一族，凡是住在中国疆域以内的，都是中国人；也自然都有统治全中国的权力。历史上，我们蒙古建立过元朝；满洲人建立过清朝，汉人统治过若干朝，这是事实。不但过去如此，将来也会如此，谁有能力把中国搞好，谁就可以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就应该拥护他。反之就应当打倒他。但是大汉族主义者，往往鄙视元朝清朝，认为是外族入主，这是不公平的。不过，在今天说，蒙古人没有这种人才，也没有这种野心，但是，言语、风俗、习惯、生活种种的不同，理应自治，这是有必要的，也是合理的！”我回答他说：“自治固然可以，但自治和独立是有分别的，如您的逻辑所言，各族人都有领导全国的权利，那么，各族人也自然都有服从全国政府的义务。”他并没有反驳我的话。不过从他的谈话中，是可以看出他的野心的。

蒋介石派来的丁我愚没有照着蒋介石的宗旨监视德穆楚克栋鲁普的行动，相反，他们鼓动联络内蒙古“王公”，要求自治。

东三省和热河省境的内蒙古各旗已在伪满的统治之下，无从下手。此外绥远省境有乌兰察布盟、伊克昭盟共辖13个旗；宁夏省境，还有阿拉善独立旗。“德王”联系结果，除阿拉善旗的达理札雅外，都赞成这一主张。1934年，他们联合发表宣言，向南京政府要求“高度自治”。这时，华北已受日寇重压，蒋介石只顾“剿共”无暇顾及边疆，于是派内政部长黄绍竑亲到百灵庙，发表六项原则。同时，根据原则，成立了“内蒙自治政务委员会”。其组织内容要点如下：

（一）察绥各旗旗长（各旗原有“王公”）均为该会委员；

（二）以年岁最长、资历较深的云端旺楚克（简称“云王”）为委员长，德穆楚克栋鲁普为秘书长；

（三）该委员会的经费每月定为五万元，由南京政府按月拨付。

但云端旺楚克老朽无能，一切会务多由“德王”主持，会址设于百灵庙。“德王”常驻会，“云王”只间一到会而已。

与此同时，对该委员会又设了一个监督机关，定名为“内蒙自治指导长官公署”，并特派何应钦兼任长官。因为何这时正任“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的委员长，所以，长官公署也就设在北平。对内蒙古情况毫无所知，想找一个熟悉内蒙古的人替他跑跑。

第二阶段，两个“蒙政会”时期。阎锡山继任长官后，和何应钦大不相同。他统治绥远已经有了将近10年的经验；“王公”中如云端旺楚克和沙克都尔札布等都到过太原和阎见过面，他们对阎，比对蒋介石自然亲切得多，所以绥境十三旗长是可以听他“指导”的。但“德王”和他毫无关系，而且别具野心，万难由他指使；而“蒙政会”的实权又旁落在他的手里，所以阎非去掉他不可！

蒙政会的经费，在阎任长官后，就改由阎筹措拨付。阎就指定从青甘烟土过境（指绥远）税中，划出2%作为“蒙政会”的经费；其实际数目，比原来的五万元还多。但为了排除“德王”，迄不按月拨款，甚至一文不予；“德王”派代表敖云章到太原坐索，数月也没结果，“德王”大愤，但又无可奈何！

这时，阎就想法把“蒙政会”分裂为二：一为“绥境蒙政会”，二为“察境蒙政会”，并以“德王”为察境蒙政会的委员长。这样，“德王”就必须离开百灵庙，自然对于原来的会务就不能过问，从而，也无法操纵绥境的“王公”了。

“德王”对这一措施非常不满，但又无能抵抗，只得离开百灵庙，回察组织察境蒙政会。偏偏阎又指定化德县为“察境蒙政会”的所在地。化德是宋哲元主察后才设治的新县，地广人稀。宋从他的原籍山东乐陵移民若干，拨付土地，资助农具，等等，让他们在此成家立业。宋的用意如何，姑且不论，但“德王”认为县名“化德”，那就是取义在“同化德王”，因而使他非常恼恨。而阎又指定以此为蒙政会的所在地，他认为这是有意开他的玩笑，甚至是故意侮辱他。所以，他没有到化德，而是在他

的王府组织了察境蒙政会。察境的“王公”不多，由他操纵是不成问题的。

由此，他始而对蒋介石不满，继而对宋哲元、对阎锡山都不满，居恒怏怏，因此日本鬼子就乘虚而入，和他挂上了钩。

第三阶段，伪“蒙古军政府时期”。日本自从在张家口设立了日本领事馆以后，便积极对内蒙古各地进行调查。这些调查人员，有的伪装商贾，有的伪装僧道，他们都娴熟汉、蒙语言，且有混入中国籍的。直到“七七事变”以后，这些人们都变成侵略中国的官吏或译员。伪满成立后，东盟已经归到日寇统治之下，只有察哈尔以西各盟旗，还未入他们的虎狼之口。因此，便多方寻找可以为他们服务的内蒙古“王公”。日本人不止一次地到过“德王府”，但在德去百灵庙以前，并没有任何具体的条件。德从百灵庙回到王府，懊恼非常，察北的日本特务机关长田中，就到了他的府下。“德王”想利用日本的势力，扩充军队；日本想利用“德王”的力量统一西盟。当然他们就渐渐接近。1935年，“德王府”已经有了伪组织的雏形。

在宋哲元被免去察省主席之后，日寇就调了李守信部驻在多伦。这年冬，察北日本特务机关长田中又指挥李守信部占领了察北九县的大部。那时察省主席兼三十八师师长张自忠明知李部只有骑兵，脆弱得不堪一击；但为顾全宋哲元在冀察的活动只能退让。不久他也调充天津市长；刘汝明接任察主席后，也就不谈此事了。

1936年，田中让“德王”和李守信部合起来，因为李守信是热河的蒙古族。同时给了他们50万日金作为扩充费。“德王”在日本支配之下，组织了伪“蒙古军政府”，自为“军政府”的“总裁”兼伪蒙古军“总司令”，李守信为“副总司令”，乌古廷为“总参谋长”。共编八个师，除李守信原有军队扩编为四师，以刘继广、王振华等任师长外，“德王”又编了四个蒙古师。其中三个师兵源系从东北招募；剩余一师，则自本盟召集。四个师的士兵全属蒙人，计：第五师师长依恒额（朝阳人），第六师师长宝音乌勒吉（朝阳人），第七师师长穆克登宝（锡盟人），第八师师长包悦卿（通辽人）。又在“军政府”下设立了“办公所”（主任补英

达赖）和两部，计：参谋部，部长乌古廷（兼任）；参议部，部长吴鹤龄（热河蒙古人）。又设立了六个署，计：内务署，署长陈绍武（代理）；外交署，署长陶克陶；财政署，署长德古来；司法署，署长（未派人）；军事署，署长王永贵；实业署，署长昌都泠（代理）。

伪组织成立以后，把化德县的县城改名“德化市”，定为“军政府”的所在地。“德王”系直接归日本关东军司令部指挥，以贯彻他们的“满蒙政策”。但对中国政府和察省，仍用“察境蒙政会”的名义。因为不如此，他们的人员和物资，不能通过张家口和平津。其驻平“办事处”，也同样挂着“察境蒙政会”的招牌以资掩饰。宋哲元明知内幕，然碍于日寇，不敢过问。

“七七事变”以后，傅作义退出绥包，“德王”进到绥省，改组伪军政府为伪“蒙古联盟自治政府”，并改绥远为巴颜塔拉盟。该伪政府共辖五盟，计：巴颜塔拉盟、伊克昭盟、乌兰察布盟、锡林郭勒盟、察哈尔盟（以大马群总管们的辖境合改）。推云端旺楚克为该伪政府的“主席”，“德王”退为“政务院长”，李守信为“蒙古军总司令”。但这是华北沦陷以后的事，这里就不多说了。

（1960年8月8日）

伪蒙古联盟自治政府始末

德穆楚克栋鲁普*

伪蒙古联盟自治政府的成立与改组

1937年7月7日，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卢沟桥事变，占领平津后，侵华日军就派板垣师团进攻南口。打开南口后，继续向张家口进兵。日本关东军又派出酒井机械化部队，通过多伦、张北等地进攻张家口。这时，我和李守信也纠合伪蒙古军的主力，先占领了化德，接着即配合日军向西进犯。在两路日军分进合击及伪蒙古军的配合下，于8月29日占领了张家口。先由于品卿、杜运宇等组成“治安维持会”，继而即在日军操纵下，成立伪察南自治政府。这时日本关东军参谋长东条英机特来张家口与板垣征四郎会见，接着又集中两路日军向西进犯，于9月13日占领大同。先由夏恭、马永魁等组织“治安维持会”，继而即在日军操纵下，成立了伪晋北自治政府。

板垣师团占领大同后，即南向进攻山西太原，酒井部队则进攻绥远。这时伪蒙古军集中主力在平绥路配合日军作战，并分出一部分兵力去进攻陶林、武川。伪蒙古军全系骑兵，往往走在日军前面，做了日本帝国主义军队的前驱。在日、蒙军配合进攻下，10月14日占领了绥远省城归绥，10

* 作者曾任伪蒙古联盟自治政府政务院长、主席。

月17日占领了包头。吴鹤龄、陶克陶、吉尔嘎朗（德古来）、特克希卜彦（王宗洛）等，也由张北率领伪蒙古军政府职员到达旧绥远城。

这时，我正在百灵庙组织伪盟旗联合军进占武川，企图为进占归绥卖力。旋接到吴鹤龄和陶克陶等来电，催我赴绥，商洽“建国”大计等重要问题，并说“万勿因小而失大”，即派飞机来接。我即以“蒙古各盟旗联合军总司令”名义，委派随从人员徐荣侯为武川伪县长，并发布了安民布告，然后乘飞机到绥。

经与吴鹤龄、陶克陶等商量，决定于10月28日召开第二次“蒙古大会”，讨论建立伪政权问题。确定通知参加的人员是：一、各市、旗、县民众代表一名；二、各旗札萨克或总管；三、各伪市、县长；四、经许可之地方代表和团体代表；五、各盟长、副盟长；六、伪蒙古军总司令、副司令、参谋长、参谋副长、各师长、各处长；七、驻外代表；八、伪蒙古军政府主席、副主席、总裁、主任、部长及各署长。把召集开会通知以伪蒙古军政府名义发出后，一面组织第二次“蒙古大会”筹备会，由特克希卜彦负责进行筹备；一面我和吴鹤龄、陶克陶、吉尔嘎朗等与日本方面商洽成立伪政权问题。迨至锡、察两盟“代表”到达后，我们就提出“蒙古独立建国”问题，请日本驻绥特务机关长桑原中佐和伪蒙古军政府顾问部主任顾问部村谷彦治郎，转请日本关东军研究决定。村谷答复说：“蒙古独立建国问题，关系重大，牵涉国际上《九国公约》问题，需要关东军和日本国内慎重研究，一时不能确定。”我和各盟旗“代表”们又提出：“‘蒙古建国问题’，即经第一次蒙古大会决议，田中隆吉参谋也早有帮助的诺言，这次田中隆吉到达张北，也曾为此问题，向驻大同的东条参谋长请示，据说俟攻占绥远后，就帮助建立‘蒙古自治联盟国’。现在已经攻占绥远省城，而蒙古建国反倒成了问题，我们身为盟旗的代表，还在此地做什么，各自回旗就算了。”村谷急切地答复说：“你们这样说，不是连关东军的话都不听了吗？希望大家耐心等待，不要急于回去。”

当时我认为村谷彦治郎和桑原特务机关长职位不高，对于“蒙古建国”这样大问题，自然不敢提出什么主张，因而我曾和日本驻在归绥的部

队长酒井隆商量，希望他居中帮助。我向他说：“蒙古建国是田中隆吉的诺言，为什么现在又不算数呢？”酒井隆答复我说：“田中隆吉这个人非常冒失，他主持进攻绥东时，我正在天津，曾去信劝他不要这样做，但他不听，一意孤行，结果遭受失败。至于‘蒙古建国问题’，关系重大，非经日本帝国政府研究并经御前会议，不能作出决定。田中隆吉仅是关东军的一个参谋，怎能决定这样大的问题？他当时敢于应承你们，是因为非常需要你们。所以你们要求什么，就答应什么，实际上是不顶事。”嗣后，我又和吴鹤龄等研究，认为“蒙古独立建国”既然一时不能实现，即可以“蒙古军政府”作为政权机构，不再成立新的政权。理由是：蒙古原有领土还未完全“恢复”（伊盟尚未沦陷），现在仍是军事时期，所以提出仍以“蒙古军政府”为政权机构比较合适。经和日本方面商量，仍然不同意，授意我们成立与察南、晋北相同的伪政权。

我又与吴鹤龄、陶克陶等商量，应该成立什么样的“政权”问题。吴鹤龄说：“我们就组织‘蒙古联盟自治政府’吧，因为我们现有几个盟，是联合各盟实行自治的意思。我总觉得，田中隆吉说的‘蒙古自治联盟’很别扭，不如反转过来叫‘蒙古联盟自治’较为通顺。”我同意了吴鹤龄的说法，就责成他拟具“蒙古联盟自治政府”组织大纲，规定设主席、副主席；下设政务院，管理政务；设蒙古军总司令部，管理军事。拟好后交由桑原和村谷等转请日本关东军研究决定。

嗣即接到日本关东军的电报通知，表示同意，但仅列有主席，没有副主席，并指定我为伪政务院长，李守信为伪蒙古军总司令。吴鹤龄看过之后向我说：“日本关东军这种做法，是居心挑拨。人事安排，本来是我们内部的事情，应由我们自己决定，可是他们却越俎代庖，先为指定了。并且在‘蒙古军政府’时期，你是总司令，李守信是副司令，这次日本关东军却指定李守信为总司令，这就使我们很为难，但也不好再变动。假如不照关东军指示行事，必然招致李守信的不满。”接着他又说：“主席一职本应由你担任，但必须云王（云端旺楚克）表示不就，才为妥当。要不我去面见云王，劝他自动让出主席一职，推崇他为元老，你看怎样？”我当

答复说："云王年高望重，仍宜推为主席，我当政务院长就行了。"我说这话不仅表示自己的"谦虚"，实际上在当时的情况下，仍以云王任伪主席为宜。因这样既便于号召各盟旗王公，又符合日本关东军的意旨，但实权仍归我掌握，云王不过徒拥虚名。对我个人来说，是有利无害的事情。并为了避免内部发生矛盾，也就依照日本关东军的意见，内定李守信为总司令。

这样商定之后，各地代表均已到齐。计锡盟参加者：伪副盟长林沁旺都特、札萨克松津旺楚克、雄诺敦都布、布达巴拉、巴拉贡苏隆、多不丹等；察盟参加者有：伪盟长卓特巴札普、总管达密林苏龙、色楞那木济勒、诺尔布札那等；乌盟参加者有：伪副盟长巴宝多尔济、沙拉巴多尔济、德瓦根敦、拉希色楞、额尔克道尔吉朗等；土默特旗代表有：亢仁（默尔根巴图尔）、森额等；伪蒙古军政府参加者有：吴鹤龄、补英达赖、陶克陶、特克希卜彦、吉尔嘎朗、乌勒吉图（张秉智）、超苦拔都尔（陈绍武）等；伪蒙古军参加者：李守信、乌古廷、刘星寒、刘继广、尹宝山、王振华、宝贵廷、依恒额（伊绐先）、萨音巴雅尔（包悦卿）、仓都固仍（包海明）、札青札布（戴选青）、阿尔弼吉呼（张启祥）、崔宇塑、崔景岚、纪树勋、卓里克图（关荫南）等；地方团体代表参加者计有：贺秉温、李春秀、贺云章等；各伪市、县长参加者计有：刘连升、徐荣侯、亢锦荣等；"蒙古旅平同乡会"则有赵那苏图（赵汇川）、李丹山、桑宝（包维翰）组织代表团前来，祝贺第二次"蒙古大会"的召开并慰问军政人员；"外宾"参加者有：日本驻绥特务机关长桑原中佐、伪满驻蒙代表玉春、伪察南自治政府最高委员于品卿、伪晋北自治政府代表田汝弼等。遂即召开预备会议，推选我和云王、沙王（沙克都尔札布）、李守信、补英达赖、卓特巴札普、林沁旺都特、巴宝多尔济、吴鹤龄等为主席团主席，特克希卜彦为大会秘书长。

当提出沙王为主席团主席时，卓特巴札普还提出异议说："沙王没有来，为什么还选他为主席团主席呢？"吴鹤龄当即答复说："已经派飞机接去了，很快就会到来。"卓特巴札普也再未说什么。迨飞机返回后，沙王仅派一个什么事也主不了的代表来了，吴鹤龄带着抱怨口气说："沙王

怎么没来呢？这里正等着他。”尽管沙王没有躬亲参加，仍然选他为主席团主席。意在利用他的名义，拉拢伊盟各旗归向伪蒙政权。

主席团虽已选出，大会急待开幕，但伪主席一职还未做最后确定，是否设置副主席一职也未得到解决。经和桑原中佐及村谷彦治郎商量，他们则以官小职微，不敢决定，允向关东军请示。一直到1937年10月28日，开会的那天上午，日本关东军参谋长东条英机才乘飞机赶来参加。下机后与欢迎人员略作寒暄。桑原、村谷、吴鹤龄、陶克陶等，即迫不及待地向东条征询关于内定谁为主席及是否设置副主席的意见。东条答复说：“内定云王为主席，德王为副主席就行了吧。”于是酝酿多日颇费踌躇的谁当伪主席、副主席问题，经过东条英机淡淡地一语就解决了。这充分说明，云王的主席和我的副主席是日本关东军一个参谋长加封的，通过大会选举，不过是走走形式而已。

我们把东条英机让至大会堂休息室略事休息后，即举行开幕式。先由我致开幕词，说明召开第二次“蒙古大会”的意义。继由“贵宾”东条英机、于品卿、田汝弼、玉春等致“祝词”。所有“祝词”，无非是“日蒙亲善”“满蒙合作”“民族协和”“共存共荣”等语。接着讨论的议题是：通过伪蒙古联盟自治政府组织大纲和成立宣言。经用蒙、日、汉语宣读后，无异议通过了。下午的议事主要日程是，推选主席和副主席。由李守信提议，推选云王为主席，我为副主席。用一刹那征询大家的意见，与会代表默不作声，也就宣布无异议通过了。接着通过对于日本和伪满发出感谢电，并对来宾和文官科长以上、武官团长以上人员授予纪念章。因云王有病未参加，我即当众宣誓就职，大会就告结束。当日在大观园设宴演戏，表示庆祝。兹将大会通过的两个文件伪《蒙古联盟自治政府组织大纲》和《蒙古联盟自治政府成立宣言》录后：

蒙古联盟自治政府组织大纲

第一条：蒙古联盟自治政府设主席及副主席；主席及副主席由蒙古大会就蒙古德高望重、有大勋劳于蒙古复兴运动者选任

之。主席为蒙古联盟自治政府之主权者，主席遇有事故不能执行职务时，由副主席代行之。

第二条：蒙古联盟自治政府以蒙古固有之疆土为领域，暂以乌兰察布盟、锡林郭勒盟、察哈尔盟、巴颜塔拉盟、伊克昭盟及厚和豪特市（按：即呼和豪特市）及包头市为统治区域。

第三条：蒙古联盟自治政府以“防止共产、民族协和”为基本方针，以生、聚、教、兴、养、卫六事为施政纲领。

第四条：蒙古联盟自治政府仍旧使用前蒙古军政府之旗章。

第五条：蒙古联盟自治政府应用成吉思汗纪元年号，但使用旧历。

第六条：蒙古联盟自治政府设于厚和浩特。

第七条：蒙古联盟自治政府与地方之权限，依均权之原则，另以法律定之。

第八条：蒙古联盟自治政府组织法另定之。

蒙古联盟自治政府成立宣言

蒙古是有土地、有人民、有组织之民族，有创立元朝伟大光荣之历史。迨至明代，虽然退居朔漠，尚且保持均衡之地位。清初更援兵诸部，兄弟封藩，其固有之土地、人民、主权，毫未损失。及至民国成立，标榜五族共和，我蒙民秉性纯厚，相信待遇平等，竭诚拥护，矢志弗渝。但二十余年来，竟视我蒙为外藩，设置省县，土地瓜分净尽，党政专横，主权侵蚀无余，以致蒙民之生计日趋贫穷，盟旗之权限日趋凋零。生存几至无望，尚何平等之有！因而群情激愤，不避水火，一致奋起要求高度自治，延续一线仅存之命脉。几经呼吁奔走，获得百灵庙蒙政会之自治。明虽允准，暗实切恨，阳借扶助之名，阴运摧残之机，军阀之暴敛如故，疆吏之挑拨日甚，或则大军压境，张出席卷之威，或则经济封锁，迫近灭亡之路，类此荼毒事实，实属罄竹难书。二十

余年之竭诚拥护，只得到歧视与压迫，设如依此推移，蒙古将何以生存！且自中国革命以来，军阀割据，内乱频仍，人民涂炭，百业凋敝。近更外交失策，国事日非，启衅邻邦，仍复分据疆土，骨肉相残，何暇顾及边疆。我等念祖宗之伟业，为民族之生存，不能垂手待毙，自贻伊戚。因于去春在西乌珠穆沁旗召开蒙古大会，决议成立蒙古军政府并编练蒙古军，外防共产，内安生民，一载以还，规模渐具。今秋中日失和，疆吏乘机谋我，当为防卫计，不得不整军经武，幸赖全体将士之用命，庆得友邦义军之援助，仅及数月，得以收回长城以北之故土，此实天予苏生之良机，言念及此，不胜欢欣。从而奋然兴起，勇往迈进，力图更生，特召集各盟、旗、市、县长官及军民代表，在绥远城举行第二次蒙古大会。经大会决议：本太祖成吉思汗民族融洽、一致合作之精神，即日成立蒙古联盟自治政府，以蒙古固有疆土为领域，以严防共产、民族协和为基本方针，以生、聚、教、兴、养、卫六事为施政纲领，本互惠互助、共存共荣之精神，敦睦友邦，以期确立东亚和平，实现伟大理想。推选云端旺楚克为主席、德穆楚克栋鲁普为副主席，负责组织成立蒙古联盟自治政府，特此宣言，以昭大义。凡我全体官兵及将士，希一致拥护，体现我蒙为国家为民族之至情，贡献人类之和平，不仅蒙古之荣幸，抑亦全世界之光辉，天人共鉴，誓志勿渝。

第二次“蒙古大会”结束后，即派员修葺绥远省政府旧址，作为“政府”厅舍。但因伪“蒙古”联盟自治政府“组织法”未经关东军确定，迁延一月之久，还未组织起来。我曾去找桑原特务机关长，请他催促关东军速为确定，桑原说：“我已催促了，迄今尚未答复。”并把给关东军的电报给我看，证明他已经催促过。我虽然非常着急，但也只好耐心等候，并嘱桑原再行催促。结果还是等候了多日，日本关东军才把伪“蒙古联盟自治政府组织法”核定下来。规定是：政务院长负责制，下设总务、财政、

保安三部。与伪政务院平行机构有伪蒙古军总司令部和咨询建议性质的伪参议会。于是我就按照这个组织法着手安排主要人事，除依照日本关东军意旨以主席名义任命李守信为伪蒙古军总司令外，并任命吴鹤龄为伪参议会议长，陶克陶为伪总务部长，下设总务、内务、教育、外交各处，总务处长图木勒巴塔尔（刘定一），内务处长李丹山，教育处长陶克托胡（陶布新），外交处长赵那苏图。发表吉尔嘎朗为伪财政部部长，下设会计、税务两处，会计处长乌勒吉图（张秉智），税务处长巴雅尔（吴相文）。发表特克希卜彦为伪保安部部长，下设警务、司法两处，警务处长昌都泠，司法处长卓里克图（关荫南）。专为主席办事的有秘书处，由赛吉尔胡（丁我愚）任处长。并由日本人组成顾问部，最高顾问是金井章二，因在张家口搞"蒙疆联合委员会"，始终未到任，由次席最高顾问宇山兵士负实际责任。总务顾问是中岛万藏，财政顾问是栉部正晖，保安顾问是大园长喜。另外还设有一个伪司法局，任刘永誉为局长。这是伪蒙古联盟自治政府组织概况和主要人事安排。

1938年3月24日，云王因病逝世，搞了一个遗嘱如次：

余幼时即以民族复兴为职志，虽年老体衰，努力民族自强，不敢稍懈。不幸为病魔所缠，竟自不起。我政府副主席以下文武百官切切铭记，协同全体民众，向敦睦邦交，民族复兴迈进，切望完成建国大业，特此遗嘱。

这个遗嘱原文是蒙文，我特为云王举行奉安典礼，发动各机关团体备花圈、挽幛，前来祭奠。我亲为执绋，并以"吾将何之"四字为挽，率领文武官员公祭。伪满皇帝溥仪特别题赐"世笃忠诚"四字，青年职员们很不满意，认为这仍是以臣属之礼对待"云故主席"。我为了敦睦"蒙满邦交"，还是主张悬挂起来，表示尊重。

为选举继任伪主席，特于是年7月1日召开第三次"蒙古大会"，推选我为主席，李守信为副主席，我特发表就职宣言如次："本副主席受大

会之推选，继任蒙古联盟自治政府主席，自知德薄能鲜，深恐不堪胜任，唯有继承太祖成吉思汗之伟大精神，遵奉历次蒙古大会之使命，依据防止共产、协和民族之基本方针与生、聚、教、兴、养、卫六大施政纲领，不辞艰苦，努力以赴。冀望友邦各国及各政府，以互惠互让、共存共荣之精神，赐予指导协助。全体官民将士，须一致团结，同心协力，完成复兴大业，实现东亚和平。海枯石烂，宿志不移，天日在上，其共鉴之。”

我继任伪主席后，深感伪政务院的三部组织较小，认为应当扩大和加强，形成具有“国家”组织形态。日本帝国主义则为了适应战时体制，搜刮战略物资，加强控制各项工作，认为更有进行机构改革的必要。因此即于是年8月1日实行机构改革，改革的原则和办法是：一、废除政务院的总务、财政、保安三部制，实行一厅四部制，即总务厅，民政、财政、保安、畜产四部制。总务厅主管总务、企划、主计、人事、外交等工作，为一切行政机构的中枢，就是采取总务中心主义，以期确立中央集权制度，加强纵的统治和横的联系。二、网罗对“蒙古运动有功劳者”及汉族有代表性的人士，组织“政务委员会”，作为伪主席的咨询机关，以资调整蒙汉关系，沟通各方意见。三、废除盟公署的总务、民政、财政、教育四厅制，改设一个官房和民政、畜产、保安三厅制，以明确施政重点，密切“政府”与盟、盟与盟之间的联络。四、将“巴彦县”（过去归绥县）合并于“厚和”市，并将“厚和”市升格为特别市，以便逐渐发展为国际都市的“新兴首都”，作为政治、军事、经济的中心。五、各县配备以纯蒙古族人编成的保安队，负确保治安的责任，确定军、警责任的区分。根据以上原则，改革后的伪蒙古联盟自治政府的主要人事阵容如次：我任伪主席兼政务院长；李守信任伪副主席兼伪总司令；秘书处处长仍为赛吉尔胡。伪政务院下的总务厅长为陶克陶，下设五个处，总务处长仍为图木勒巴塔尔，人事处处长乌勒吉图，主计处处长霍克济胡（霍翰甫），企划处处长金谷勒模（金养浩），外交处处长仍为赵那苏图。伪民政部部长特克希卜彦，下设内务、教育、建设三个处，内务处处长札拉戈穆济（白景畲），教育处处长仍为陶克托胡，建设处处长恩和阿木尔（张绍庭）。伪

财政部部长仍为吉尔戈朗，下设两处，理财处处长李丹山，税务处处长仍为巴雅尔。伪保安部部长换了雄诺敦都布，下设警务、司法两处，警务处处长仍为昌都冷，司法处处长仍为卓里克图。伪畜产部部长郭尔卓尔札布（郭王），下设牧业、畜产两处，牧业处处长哈斯瓦齐尔（肖佩玉），畜产处处长米济道尔吉（黄葆庆）。直属伪政务院的机构还有地政局，没有发表局长，由顾问黑泽隆世代行职务。伪司法局长仍为刘永誉。“驻满代表”金永昌，因任伪“蒙疆联合委员会”委员，继任代表为恩和布林（吴恩和）。伪参议会议长仍为吴鹤龄，派往日本留学。

伪蒙古联盟自治政府的反动统治与设施

在伪蒙古联盟自治政府时期，为了巩固我的统治权，在内政上、军事上、文教上也有些变革和设施。我总觉得取得盟旗王公的拥护和伪蒙古军的支持，是我的政治资本。因此，特别侧重盟旗行政的加强。至于汉人居多的各县，日本人把持得很紧，我想管也管不了，干脆就任凭日本人摆布。我在盟旗内政上的设施，首先是设置伪巴颜塔拉盟（巴彦塔拉是富饶平原的意思），管辖的区域计有土默特、正红、正黄、镶红、镶蓝五旗及“巴彦”（归绥县）、萨拉齐、清水河、托克托、武川、陶林、丰镇、集宁、兴和、凉城等县，包括旧绥远省政府所统辖的大部地区，是五盟中人口和收入最多的一盟。补英达赖自被解除伪蒙古军政府办公厅主任后，本是满腹牢骚，伪巴颜塔拉盟公署成立后，我任命他为盟长，才心满意足，不发牢骚了。伪巴盟的主任顾问开始时是安宅，后为泽井铁马。伪盟署下设总务、民政、财政、教育各厅，发表超苦拔都尔（陈绍武）为总务厅长、贺云章为民政厅长、李树声为财政厅长、李春秀为教育厅长。嗣于1938年秋实行机构改革，又改设伪官房和民政、保安、劝业三厅，调任贺云章为官房主任，超苦拔都尔为民政厅长，默尔根巴图尔为保安厅长，李树声为劝业厅长，调李春秀为伪蒙古联盟自治政府参议会参议。

第一，对于旗县并存、蒙汉杂居的地方，我曾想采用蒙汉分开的办法来统治。具体就是说：以铁道为界，居住在铁道以南的蒙民，移至铁道以北，居住在铁道以北的汉民，移至铁道以南。经和补英达赖、默尔根巴图尔等商量，他们都不同意我的意见。认为这样办理，是叫蒙汉民众大搬家，牵涉面广，困难甚多，不易办到，甚至还可能引起蒙汉人民的反感。因此我才没有发布命令强制执行。结果还是沿用属人主义的蒙汉分治政策。例如土默特旗和“巴彦”等县所统辖的区域，是蒙汉杂居，其中的蒙民归旗管理汉民归县管理。对于察西四旗和集宁、丰镇等县，也是采取蒙汉分治政策来统治蒙汉人民。至于各县、市伪县、市长，大多数是任用汉人，除了蒙人韩绍祖当过萨县县长外，其他各县均由汉人中的绅士之流充任。伪“巴彦县”县长亢锦荣、伪集宁县县长张书常就是一例。这是为了拉拢汉族上层人物，调整民族关系，起到巩固伪蒙政权的作用。至于各旗总管，当然都是任用蒙人，例如土默特旗总管先是亢仁，后为森额，察西四旗总管都是留用旧人，为的是驾轻就熟，便于统治。

第二，设立伪厚和、包头两市，由伪蒙古联盟自治政府直辖。自占领绥远建立伪蒙政府后，就把归化和绥远这两个名称取消，改为“厚和豪特”，并建立为市，作为伪蒙政府所在地，发表贺秉温为伪市长，是酬劳他在日蒙军占领绥远时出而“维持治安”的“功劳”，也是想通过他笼络商民，拥护伪蒙政权。奈因他发财心切，仍愿继续做鸦片买卖，把他调任为“土药公司”理事，由李春秀继任伪市长。也是想通过李春秀这个老官僚，拉拢满汉人士，拥护伪蒙政权。嗣因“厚和市”是伪蒙政府所在地，是政治文化的中心，将其升格为特别市，并把“巴彦县”撤销，将其所属地方归“厚和市”管辖，扩大伪“厚和市”的统治区域。至于包头设市的原因，主要是为适应经济上的需要，不过政治和军事的因素也与设市有关。因为包头是平绥铁路的终点，黄河水运的渡口，为皮毛百货的集散地，而且是军事上的前哨，日蒙军集中驻地。日本帝国主义者为了搜刮战略物资，掌握经济命脉，供应军队所需，更愿加强包头的行政组织。因此，特设包头市，任命刘继广为伪市长。

第三，加强各盟行政机构。盟在清朝时期本是各旗“会盟”的地方，不是一级行政组织。在国民党政府时期，蒙藏委员会虽制定过蒙古各盟部旗组织法，也迄未施行。伪蒙古联盟自治政府成立后，除伪察盟公署早已设立确定为行政组织外，对于锡、乌两盟也确定为行政单位，在贝子庙（现锡林浩特）设立伪锡盟公署，我仍兼盟长，任命林沁旺都特为副盟长，中村浅吉为主任顾问，下设伪总务、民政、保安、畜产各厅，除总务、保安、畜产各厅尽量任用当地人员为厅长外，并派蒙汉兼通的玛哈希力（赵文儒）为民政厅长，管辖区域仍为原来十旗。在百灵庙设立伪乌盟公署，任命巴宝多尔济为盟长，沙拉巴多尔济为副盟长，山本信亲为主任顾问，下亦设伪总务、民政、保安、畜产各厅，除总务、保安、畜产各厅尽量任用当地人员为厅长外，并派墨尔根巴图尔（宝道新）为民政厅长，管辖区域除原有六旗外，又增加了一个固阳县。至于伊盟地区虽在伪蒙古联盟自治政府组织大纲上规定为统治领域，但未被日军占领，伪蒙政权的行政力量仅能达到准格尔、达拉特两旗的河东局部地区。在伪蒙联盟政府建立后，国民党伊盟副盟长兼杭锦旗札萨克郡王阿拉坦鄂齐尔（阿王）派员前来和我联络，探询他是否可以来，我答复说：“请阿王自己考虑吧，这时如来我当然欢迎，如果脱身不便，暂时不来也可以，反正迟早是要收复伊盟的。”当时我固然愿意早日占领伊盟。日军为了向西扩张侵略势力，进犯伊盟更是心切，因此特派伪蒙古军的潘井指导官和团长图们巴雅尔率领一团骑兵，前往杭锦旗迎接阿王。阿王是做官心切的人，为了急于得到伊盟伪盟长的地位，就于1938年春初前来。我当即发表他为伊盟副盟长代行盟长职务，黑泽隆世为主任顾问，暂在包头成立伪伊盟公署，下设伪总务、民政、保安各厅，除总务保安各厅尽量任用当地人为厅长外，特派我的得力干部吉尔格朗（吉致祥）为民政厅长。发表奇子祥为准格尔旗西协理代行札萨克职务，章巴多尔吉（章景文）为达拉特旗的札萨克。日本方面又拉拢了达拉特旗的保商团长森盖林沁，发表其为伪鄂尔多斯挺进军司令，企图通过阿王等策动伊盟其他各旗归向伪蒙政权。

第四，在内政设施上，我到达绥远城建立伪蒙政府后，曾经幻想，

日方既然表示“帮助”蒙古，必然帮助发展经济和文化事业，因此很想把绥远旧毛织厂接收过来，预备叫贺云章为经理，把原有工科学校等文化教育机构也恢复起来，用以收拢人心，巩固统治。不意占领绥远不久，日本军就把旧绥远毛织厂拨归“满铁”会社经营，并将旧工科学校的机器也都拆卸给了毛织厂，把旧绥远省立第一幼稚园做了日本军御用的“厚和”旅馆。我曾提出交涉，日本方面总是支吾其词，不作明确答复。日本帝国主义的“工业日本，农业中国”的侵略政策，具体到内蒙古，更是要把内蒙古作为供应原料、销纳商品的殖民地。因而绝不允许恢复工科学校，培养工业人才。至于产业、金融、交通事业，都归“蒙疆联合委员会”直接掌握，分别交由日本企业机构经营。例如平绥铁路就由“满铁”会社管理，“蒙疆银行”、邮电事业、矿产开发、畜产收购等，都由日本资本家投资直接经营。

在文化教育上，我是侧重蒙人教育。为了培养急需“人才”，特就大台什村旧有的农科学校原址，设立“蒙古学院”，任命郭尔卓尔扎布为院长。郭调任伪畜产部长后，由金永昌继任院长，由那苏图（王庆三）任教导主任，吾勒吉卜林任事务主任。在专业设置上计有旗务、师资、师范、电报、补习各班，我特亲笔书写“勤敬忠诚”四字为“院训”，有时还到该院亲临“训话”，希望在院的青年学生们对我有深刻的印象，毕业后供我驱使。并在市内大会堂后边设立“蒙古文化馆”，任命伊德钦为馆长，吸收地方绅士郭象伋等为馆员，分设总务研究、图书、印刷各组，进行编纂小学教科书、课外读物、发行文化专刊等工作。我为了训练王公子弟，又特设一个蒙古族学校，由伪民政部长特克希卜彦兼校长，调任超克曼度夫（汪文林）为教导主任。由伪保安部筹设中央警察学校一所，任萨彦毕勒格图（陈靖震）为主事，训练警官和警务人员。为了培养通晓日文的各项“人才”，选送蒙古留日生10名，下令锡、乌两盟各设蒙古青年学校一所，责令各旗一律设立小学一所，卫生所一处，一律设置无线电台，加强通信联络。

第五，在军事上，我也知道充实武装力量，是加强统治的主要工

具。因此，对于各旗保安队发给新枪，充实装备，并派伪蒙古军官学校毕业的学员充任教官，从事训练工作，居中掌握官兵，希望对我能起拥护的作用。对于伪蒙古军方面，我虽然放弃了总司令，改由李守信继任，但我认为伪蒙古军还是我的政治资本，故不惜增加蒙民负担，为之征兵买马，总是力图扩充，不愿缩小编制。记得在“蒙古联盟自治政府”末期，日本方面主张将“蒙古军”各师一律“蒙古化”，把“蒙古军”由汉族人编成的第一、二、三师改编为驻在各县的警察队，我很不以为然，认为第一、二、三师虽然多数是由汉族人编成的，各师军官均与李守信有密切的关系，但在绥东战役和占领绥远各县的行动上，曾出过很大的力气，多数都效忠于我，其中背叛我的毕竟是少数，所以我提出反对。但因日方持之甚坚，争执无效，也就只好如此。日方把第一、二、三师改编为靖安警备队，设两个集团，第一集团团长为郭光举，第二集团团长为门树槐，集团之下设大队、中队和分队。这个警备队，完全部署在后方汉民居多的各县，用以镇压汉族人民，而把由蒙古族人编成的第四、五、六、七、八、九各师，则改称为某某部队，多部署在包头、百灵庙及锡、乌两盟的边境地带，配合日军防止国民党的反攻，并切断中国共产党的国际联系。

1938年春，傅作义率部突然打到一间房一带，距离“厚和市”很近。这时驻在凉城的伪蒙古军第三师团长慕兴亚背叛我归降傅作义，以致谣言纷起，人心恐慌。我为安定社会秩序，收买人心，亲在小教场召开的民众大会上讲话，强调在此春夏之交，农作物正在生长时期，傅作义军竟不惜踏毁庄稼，糟害青苗，突来进行扰乱。我是想用这样挑拨性的言辞，引起当地人民对傅作义的反感，转而拥护伪蒙政权。我正在兴高采烈地讲话时，忽然刮起一阵大风，把飘扬在讲台前的蒙古旗撕成两半，我当时迷信地认为这是不祥之兆，象征蒙古政权要垮台。幸而为时不久，傅作义军就撤退了，这才又转危为安。

第六，对于汉民居多的各县，日本人虽然抓得很紧，不叫我管，但是对于能够买好人心的事情，还是想过问。例如，日本人在各县城镇地方设

立的赌博性质的俱乐部，为地方公正人士所反对，因此，我曾下令取缔俱乐部。但是各县日本顾问总是不理会，当然我的命令也不发生作用，不过我却因此博得了一些人的奉承。在1938年夏天的时候，久旱不雨，我特到“厚和豪特”舍力图召焚香祈雨，表示关心民疾，用以收买人心。

旧阴谋，新花样——我向日本要权未遂

在伪蒙古联盟自治政府时期内，我向日本要权，也有过几次“冲突”。原因是我虽说当了傀儡，还想掌握伪蒙政府的军政大权，实现我统治蒙古的野心。日本方面自然是把我这个傀儡当作他们侵略蒙古的招牌，要我对他们的指挥俯首帖耳。因此，我便和驻在内蒙古的日本军部和当权的日本政客发生过几次“冲突”。首先是在占领绥远城、武川、陶林等地问题上，引起日本军部的不满。占领绥远城、武川、陶林等地，固然是日本侵略军起了主要作用，但配合日本侵略军作战的我的伪蒙古军，因全系骑兵，行动迅速，往往走在日本机械化部队的前面，假如不是日本军部阻止前进，等候日本部队，很可能先行到达。又如我在百灵庙组织“各盟旗联合军”攻打武川，和当地守军井得泉（原系伪蒙古军的团长，在“七七”事变后投归傅作义军）部队接触时，由伪蒙古军官学校毕业生道毅德尼玛等率队冲锋，当时被击毙，因而后退。我又命令伪蒙古军第九师从陶林进兵，准备再次攻打武川。迨至仓都固仍（包海明）率队到达后，听说井得泉已准备撤退，武川业已唾手可得。我计划拿下武川，即进攻绥远。不意这时桑原特务机关长乘飞机到达百灵庙，让驻在百灵庙的军事顾问山内转告我说：“现在占领凉城的日本军，正向绥远开拔，候日本军到达后，再行攻打绥远，较为稳妥。务要阻止第九师前进，以免孤军深入，而冒危险。”并且说“蒙古军已经作战很累，应当休息”。桑原这些话，虽然说得很好听，似对伪蒙古军关心，不叫受到损失，实际上这时绥远各地傅作义的三十五军业已调往山西，其他正规部队多已撤离绥远，仅留国

民兵等地方团队维持局面，这种情况当为日本军部所侦知。因为绥远城很易拿下，因此日本方面计划叫日本军率先入城，不愿叫伪蒙古军先行到达，所以特来阻止伪蒙古军进攻。当李守信率领伪蒙古军主力到达平地泉，第八师师长札青札布和第九师师长仓都仍率领伪蒙古军到达陶林时，日本军部也是严令停止前进，让等候日本军到达再行进攻。根据以上情况，我和包海明等曾向人夸说伪蒙古军的“勇敢”，在占领绥远城、武川、陶林等地立功很大。不意这话竟引起日本军部政治参谋大桥雄熊的不满，说我有意抹杀日本“皇军”的“战绩”。记得在伪蒙古联盟自治政府成立后，日本外务省官员大桥忠一到北平，嗾使吴佩孚出山，后便窜到“厚和市”视察情况，前来见我时说：“我这次到北平，是专为做吴佩孚的工作，便中前来看看你这老朋友。”我问他：“你工作得怎样！”他答说：“不行！吴佩孚比你还硬，要的条件太高，如果他要出来主持华北局面，要求日本军全部撤退。这个条件怎能接受。”接着他又向我买好说：“我在军部听说，你在占领绥远城等地时，称赞蒙古军的‘功劳’，军部却认为你有意抹杀‘皇军’的‘战绩’，对你很不满意。我以老朋友的资格劝你，不要和军部起摩擦，因为你和军部摩擦，是对你不利的。你如对军部不满意时，可到日本国内待一个时期。”由此可见，我指挥伪蒙古军进攻陶林、武川、绥远城等地，固然为了实现我的政治野心，其实本来是为日本帝国主义卖力气，做日本帝国主义西犯的马前卒，不想因为夸说伪蒙古军的“功劳”，竟惹起日本军部的不满和猜忌。这充分说明日本帝国主义的蛮横。同时也说明，充当日本帝国主义统治下的伪蒙政府主席，只有看日本军部的眼色行事才行。

其他几次“冲突”是：

一、当日“蒙”军联合西犯时，由伪察盟安宅顾问组织“政治接收班”，随军前进，委派伪县长，恢复地方秩序，出安民布告等。例如集宁、丰镇、归绥、包头等伪县、市长，都是由安宅率领的“政治接收班”临时委派的。伪蒙古军政府虽然也组织两个随军工作班，一个是由陶克陶等率领的一部分职员，由张北出发到达张家口，沿着平绥路随军前进，做

“宣抚”工作。一个是由郭尔卓尔札布率领的一部分职员，由张北出发，经化德、苏尼特右旗、锡拉木伦庙等地到百灵庙，接收武川，做“宣抚”工作。不想我以伪蒙古各盟旗联合军总司令名义，发表徐荣侯为武川伪县长，却引起安宅顾问的不满。他说这是他所率领的“政治接收班”的职权，我委派县长不应当。好在生米已经做成熟饭，没有把徐荣侯更换。

二、在伪蒙古联盟政府成立后，日本宪兵队竟把设在“政府”后院的直属电台的报务员葛孟库、陈寿山二人逮捕。我听后很恼火，认为既未取得我的同意，又未说明原因，竟将“政府”直属电台报务员逮捕，是对我的藐视，是侵犯“政府”职权。我当时就把总务顾问中岛万藏和最高顾问的秘书和佐良之助请来，叫他们立刻去和日本宪兵队江草队长交涉，把葛、陈二人放回。中岛与和佐应付我说：“现在时间已晚，城门业已上锁，恐怕叫不开城门。”我驳他们说：“你们别瞎说了，你们还叫不开城门？显见这是托词，你们如果不愿去，我就亲身去办交涉。你们如去，我就在办公室这里等着，直到把葛、陈二人放回，我才离开这里去休息。”中岛与和佐二人见我持之甚坚，又怕我亲身出马去交涉，惹出更大的麻烦，于是他们二人就答应着去了。两个小时工夫，就把葛、陈二人用汽车送回来，中岛与和佐也坐汽车回来向我复命。我没再问是怎么交涉放回的，为什么把葛、陈二人逮捕，反正放出来就算完事。

三、有一次，因为预算问题和宇山兵士发生了“冲突”。在伪蒙古联盟自治政府时期，日本人一律是顾问和辅佐官，不充任正式官吏。我还妄想不叫日本人掌握实权，特别不叫掌握人事权和财政权。人事处长乌勒吉图曾和我说：“人事顾问（忘其名）要求看公文，并说他是人事顾问，连关于人事的公文都看不着，什么事情也不知道，最高顾问要问他，他如何答复呢？”我说：“还是不叫他看好，他看了就要盖章，无形中便成为制度了，不能开此先例。”我对人事权虽然抓得很紧，但自宇山兵士来任最高顾问后，在一个时期内，虽对人事不加过问，却极力抓财政权。日本顾问部先作出了预算指标，强令各部接受，伪民政部经费要得多，而预算指标列的少，特克希卜彦极力争要，我也坚持非多给不可。宇山兵士却斥责

民政顾问岸川兼辅无能，不能掌握民政部事务，责成他非按着预算指标通过不可，因此闹成僵局。我听到后也很生气，就把宇山兵士请到我的办公室里进行谈判。我质问他说："蒙古联盟政府的事情，是你当家还是我当家？要是我当家，我就有最后决定权；要是你当家，我就回旗去。"宇山兵士说："你是主席兼政务院长，我是你的顾问，当然是你当家。"我又说："那么，为什么我主张列入的教育经费就不算数呢？"宇山兵士说："这件事好办，容我和有关顾问们商量商量。"结果重新列入蒙人教育复兴费10万元，我也再未说什么，这场争执就这样作了结束。从此宇山兵士改变了做法，对我极力敷衍，并要深入各盟视察，表示愿意"辅佐"我好好地干一场。我也给各盟打电报，说宇山兵士是很好的顾问，叫各盟旗准备欢迎他。有一次，我和他及其他顾问在蒙古会馆聚餐，我表示不同意"蒙疆联合委员会"的成立和该会的做法。宇山兵士说："'蒙疆联合委员会'的做法我们可以不管它，不是还有联盟政府吗？我们只要把联盟政府的事情做好就行了。"并表示把旧绥远省立第一幼稚园做了日军御用的"厚和旅馆"，把旧绥远省立工科学校的机器拆走做了兵营等做法是不妥当的，说这对于收揽人心有影响。不意宇山兵士说过这些话之后，没几天就被调走，由伪畜产部顾问泉名英（系日本退役少将）升任最高顾问。据我推测，宇山被调走的原因，是他对我有迁就的倾向，这就不符合日本军部的高压政策。他表示不应把学校作为兵营或旅馆，显系对日本军部的批评。这些事被日本军部知道了当然对他不满意，所以很快地就把他调走了。

四、在扣捕色林保问题上，我和日本特务机关发生了"冲突"。色林保原系西公旗的协理兼保商团长，在百灵庙"蒙政会"时期，因为西公旗争夺札萨克职位问题，他和石拉布多尔济（石王）结成一党，以绥远当局为靠山，与"蒙政会"对立。迨至日"蒙"军占领绥远，建立伪蒙政权后，色林保又投靠日本特务机关，对我采取置之不理的态度。日本特务机关则因他在西公旗掌握一部分武力，可供利用，对他极力拉拢袒护。色林保每到"厚和"就住在特务机关，简直把我不放在眼里，使我甚为恼火。为此我就命令伪司法处长卓里克图，到日本特务机关去要色林保，想

加以制裁。卓里克图前去交涉，不想特务机关的工作人员岩崎竟为色林保保镖，抗不交出。嗣又经中岛万藏出面，向特务机关说明色林保在西公旗事件中的情况，特务机关方面才了解色林保过去与“蒙政会”搞过对立，并考虑到：为了袒护一个色林保，惹起我这个“主席”的不满，很不适当，于是卓里克图又去交涉时，便提出条件说：“可以将色林保交由政府处理，但要顾全特务机关的面子，不要到特务机关扣捕，要在别的地方设法诱捕。”有一天，色林保为了拉拢日“蒙”军政人员，企图展开政治活动，在凤林阁饭庄请客，中岛万藏和卓里克图均在被邀之列。卓里克图得到这个机会，便预先布置下军警，待到宴会开始后，把岩崎悄悄请出来，说明要进行扣逮色林保的布置，要求岩崎最好把色林保交由“政府”处理，否则就指挥军警进行扣逮。岩崎初则不肯，只管摇头，但最后还是接受了卓里克图的要求，亲乘汽车把色林保送来，我即交由卓由克图送到监狱，管押近两个月。然后由我旗（西苏尼特旗）派来保安人员，将色林保带至我旗监管，后因病死在我旗。

从伪蒙疆联合委员会到伪联合自治政府

我和日本方面最大的“冲突”是关于“蒙疆联合委员会”的设立问题。在蒙古（伪蒙古联盟政府）、察南、晋北三个伪政权相继成立后，行政上虽不相隶属，但都在平绥铁路线上，交通、金融、产业都有密切的关联。日本帝国主义为了加强控制这三个伪政权，掌握经济命脉，搜刮战略物资，就在日本军部操纵下，成立伪“蒙疆联合委员会”，特由伪满调来金井章二主持筹备成立事宜。并通知三个伪政权，各派代表“缔结协定”。由“察南自治政府”派出代表于品卿、杜运宇二人，由“晋北自治政府”派出代表夏恭、马永魁二人，“蒙古联盟自治政府”的代表，日本方面内定为卓特巴札普、陶克陶、金永昌三人。

这次在日本军部和金井章二的指使下，通过三个伪“自治政府”代表

“协商”的形式，于1937年11月22日缔结伪协定如次：

一、本会称蒙疆联合委员会，处理关于各政权有关联的产业、金融、交通及其他重大事项。

二、联合委员会设总务委员会及产业、金融、交通各专门委员会，与必要之职员构成之。

三、总务委员长总理并代表联合委员会。

四、联合委员会置日本顾问一名，参议及顾问若干名。

五、联合委员会之决议，须经关系委员、最高顾问及关系顾问之同意，始为有效。

六、联合委员会发布有关指导统制命令，须以联合委员会名义行之。各政权为了援助易于执行，得分担义务。

七、联合委员会得管理各政权委托之公有财产。

八、非经各政权之同意，委员不得脱会。

九、本协定用日文、蒙文、汉文作条文，如有疑义，依据日文解释之。

缔结协定后，即正式成立伪蒙疆联合委员会，由日本军部派金井章二为最高顾问并代理总务委员长职务。任命村谷彦治郎为参议，卓特巴札普、陶克陶、金永昌、杜运宇、马永魁等为委员，分管总务、产业、金融、交通等事项。

到了1938年8月1日，在金井章二的操纵下，通过伪“蒙疆联合委员会”的会议形式，决定实行机构改革，把几个“专门委员会”改为总务、产业、财政、保安、民生、交通六部。由卓特巴札普任总务部长，派野田武为总务顾问；由金永昌任产业部长，派高津彦次、森田清为产业顾问；由马永魁任财政部长，派寺崎英雄、久间猛为财政顾问；由陶克陶任保安部长，派伊藤祐为保安顾问；由杜运宇任交通部长兼民生部长，派满尾君祐、赤板亮一分任交通和民生顾问。进一步强化和扩大了“蒙疆联合委员会”的组织与职权。其强化的程度，是由协商性质的结构，变成行政组织；其扩大组织的范围，是由代管产业、金融、交通扩大到管理民政和保安，形成了蒙古、察南、晋北三个伪政权的太上机关，公然发号施令。

我对伪“蒙疆联合委员会”的成立，起初是采取置之不理的态度，委员派谁就派谁，来了通知或指示，合乎我心意的就执行，不合乎我心意的就放在一边。记得陶克陶担任“蒙疆联合委员会”委员后，返回“蒙古联盟自治政府”和我们几个人闲谈时，竟扬扬得意地说：“我是蒙疆联合委员会委员，是管你们的。”我都毫不介意，还认为他不敢藐视我，因为他虽是伪“蒙疆联合委员会”委员，但在伪蒙古联盟自治政府中，他是总务厅长，我是主席兼政务院长，仍是管他的。他说这话不过是对在座的其他人员表示得意而已。总之，我对“蒙疆联合委员会”的态度，不敢积极反对，只有消极抵抗。

1938年秋，日本军部决定，令金井章二陪我和于品卿、夏恭、李守信等“访日”，日程业已作了安排。我这时正在锡盟巡视，没有按照他们规定的时间到达张家口，日本军部的政治参谋大桥雄熊很着急，就责陶克陶催我火速前来。陶克陶竟发牢骚说：“在这紧急的时候，德王却回到锡盟巡视不来，把他杀了算啦。”（这话是李守信告诉我的）这说明陶克陶已经不为我所用，完全站在日本军部方面去了。

我到了张家口便起程，经北平、山海关、奉天（辽宁）、朝鲜等地，渡海到达日本下关车站。我对日本国内欢迎人员“致辞”时，总是说“蒙古”，不说“蒙疆”。我讲完话后，我的随身翻译吉尔嘎朗译成日语。金井章二在旁边，马上向新闻记者和欢迎人员解释说，方才德王所说的“蒙古”就是“蒙疆”，使我很感不快。日本内阁总理大臣近卫文麿招待我等一行宴会，宴前我和近卫周旋闲谈说：“现在蒙古民众都不愿意‘蒙疆’这个名称，仍愿意用蒙古代表新的政权。”正在说这话时，招待人员给近卫送来“挨拶子辞”（系“应酬致辞”之意），近卫看过之后，见上面所有“蒙古”二字都换成了“蒙疆”，因我方才说过反对“蒙疆”之言，近卫似有觉察地踌躇了一下。但近卫“致辞”，仍是把原稿宣读一遍，可能金井章二又预先做了工作。

这时板垣征四郎任日本内阁陆军省大臣，东条英机任陆军省次官。当他们约定和我见面时，虽然都是旧相识，因为金井在座，只说些应酬之

言，未谈重要问题。见面后，板垣的亲信人员（忘其名）和正在日本留学的吴鹤龄说："德王和板垣大臣过去就曾相识，为什么见面时没说心里话，未谈重要问题呢？其中不无原因。"吴鹤龄答复说："会见时因有他人在座（指金井章二）不便谈吧。"这个日本人顿然领悟说："啊！原来如此！那么，我向板垣大臣说，再约德王单独见面。"吴鹤龄将此情况具以告我，于是我就和吴鹤龄商讨"扩大蒙古政权"和"实现蒙古建国"问题。当经提出两个方案：第一方案，以"蒙古联盟自治政府"为基础，向外长城纯蒙旗地带发展，放弃内长城以南汉人居多的察南、晋北地区，进一步扩大"蒙古政权"，逐步实现"蒙古建国"。第二方案，以"蒙古联盟自治政府"为基础，吸收察南、晋北两个"自治政府"，进一步扩大伪蒙政权，逐步实现"蒙古建国"。起初我是主张第一案，吴鹤龄极力主张第二案。并强调说："察南、晋北过去都是蒙古地方，为什么不要呢？我们蒙古现在没有力量，如果有力量的话，连北平、河北都想要呢！"接着他又告诉我说："我来到东京后，为了实现蒙古建国，曾和日本朝野有名人士作过多方面的接触和联系，曾向他们建议，对中国实行'分块统治'的政策。像'北京临时政府''南京维新政府'这样的政权，无妨多来几个。有的日本人非常赞成我的说法。"当时我感觉到，吴鹤龄的野心比我还大。但又意识到，吴鹤龄向来主张"捡到筐里就是菜"，他是特别注意现实利益的人。他所说"连河北、北平都想要"之言，不过是强调不要放弃察南、晋北的陪衬语而已。经吴鹤龄反复陈述理由，我也觉得目前吸收察南、晋北，扩大伪蒙古政权，比较接近实际，易于实现，也就再未说什么。吴鹤龄便将第二方案定为甲案，第一方案定为乙案。当板垣再次约我见面时，即将这两个方案亲手交给板垣，并说明这两个方案的内容。板垣答复说："俟经详密研究，再行答复。"过了几日，板垣又在陆军大臣官邸召集我们，答复关于"蒙古建国"问题。他说："关于蒙古独立建国问题，时机还不成熟，条件尚不具备，俟将外蒙'收复'，实现内外蒙的统一，才能帮助蒙古独立建国，这是我们大日本帝国的对蒙古的国策，希望大家相信。"这话虽然是板垣支吾其词，用以安慰我妄想"蒙古建国"和

实现“大蒙古主义”的迷梦，但也暴露出日本帝国主义无止境的侵略野心。等我访日返蒙后，曾接到吴鹤龄的来信，说是板垣同意甲案，并由陆军省通知驻在张家口的日本军部实行。

金井章二见我到处仍是只说“蒙古”，不提“蒙疆”，当然非常不满。他认为“蒙疆”这个名称，是日本军部和他金井章二主张应用的，非在日本国内展开宣传使人周知不可。当我“访日”行将结束，东京放送局约我向日本全国广播时，金井章二认为这是强制我把“蒙古”改说成“蒙疆”的好机会。他虽未对我直接警告，却派人对吉尔嘎朗恫吓说：“德王在日本，不许再说‘蒙古’，不许再说‘建国’。他如果再这样说，你也不许给他译成日语，要把‘蒙古’二字一律改称‘蒙疆’。如果你不这样办，小心你的脑袋！”这时正在东京留学的朝克巴达尔夫（陈国藩）前来看我，听到金井所派人员恫吓吉尔嘎朗之言，也很气愤地说：“日本人真厉害，连‘蒙古’二字都不叫说，还能谈到其他吗？”但我在广播中还是只说“蒙古”，不提“蒙疆”。我在“访日”期间，也曾见过日本天皇，我说的是“感谢日本的援助”，他说的是希望“协力维护东亚和平事业”。都是应酬之语，没有谈到实际问题。

我“访日”回蒙途中，想到金井章二在日本东京控制我只许说“蒙疆”，不许说“蒙古”，不许说“建国”的种种说法，有很大的反感，越想越不是滋味。我总觉得，“蒙古”与“蒙疆”二字，不是微不足道的字义问题，而是有重大意义的政治和民族问题。因为“蒙古”二字不仅代表民族，更代表土地、人民。而且一提起“蒙古”二字，世界上是无人不知的，这是历史上早就确定的名称。如果改称“蒙疆”，就意味着仍是中国的边疆，不是“独立”的“蒙古政权”，是隶属中国的地方政权。在向国民党中央政府要求自治时期，我把“复兴蒙古民族”“实现蒙古自治”作为号召蒙人参加的两块金字招牌。迨至投靠日本帝国主义后，又把“复兴蒙古民族”“实现蒙古建国”，作为号召蒙人参加的两个幌子。用这“蒙古”二字，笼络不少的青年为我所用，可以说是我的“得意杰作”，是我在政治舞台上有用的幌子。而在“访日”时期，却连“蒙古”二字都不能

说了，今后将何以号召蒙人，言念及此，不胜烦恼。

我等一行回到张家口后，适逢举行“蒙疆联合委员会”成立周年“纪念典礼”，约我前往参加。我开始托故不去，金井章二很着急。因为这时日本北支（华北）派遣军的参谋长（忘其名）、伪满代表等很多来宾都来参加祝贺，我如不参加，显见其中有了裂痕，对日本方面所宣传的“日蒙亲善、密切合作”是个讽刺。金井特又连次派人前来劝我参加。我在大家一再相劝之下，才勉强迟迟前往。我到典礼会场时，所有参加人员和来宾均已先行在座等候，我到后才开始举行典礼。我并没有讲话。

我由张家口回到“厚和豪特”后，前来参加“蒙古联盟自治政府”成立周年纪念典礼的各盟盟长、各旗札萨克、总管等，因为等我回来听取“访日”的情形，尚未返任。我就召集他们开会，提出反对“蒙疆联合委员会”问题，大家均表同意，并经决定由各盟旗送来盖有印鉴的公文六份，备我使用。各盟旗首脑返回后，即陆续送来，就是尚未归属伪蒙政权的伊盟各旗，也由阿王设法弄到盖有印鉴的空白公文。唯有察盟盟长明安旗总管卓特巴札普送来的印文没有署他自己的名字，仅有总管代理人署名。听说他向人表示说：“我们反对‘蒙疆联合委员会’反不动嘛！何苦来此一举。”我收到各盟旗送来的印文之后，就责成伪民政部长特克希卜彦起草反对“蒙疆联合委员会”的公文，提出的理由是：张作霖曾当过“蒙疆经略使”，对东部盟旗横加压迫，强制开垦。引起蒙人对“蒙疆”二字的极大反感。现在仍沿用“蒙疆”二字，作为代表新政权的名称，是对蒙古民族的莫大侮辱。这个公文拟就后，又译成蒙、日两种文字，并把蒙文的一份，写在盖有各盟旗印鉴的公文纸上，作为主件，把日文的一份作为附件，总共制成六份。我计划寄给日本内阁首相、外相、陆相、参谋本部、驻在张家口的日本军部各一份，自留一份。即将付邮时，旋又考虑到直接向日本国内首相等寄送，不大妥当，结果仅寄给在日本留学的吴鹤龄一份，嘱他相机办理。适在此时，日本特务机关派人向陶克陶的秘书张锦堂密探此事，并表示愿出重资购买该项公文稿件。陶克陶忙来和我说：“你联合各盟旗反对‘蒙疆联合委员会’之事，日本方面已经知道了，曾

向张锦堂询问并要出资购买公文稿件，怎么办呢？”我答复说：“这有什么可怕的！我正要把这反对的公文送给日本军部，他们既要出资购买稿件，告诉张锦堂可以卖给他们，赚他们一笔钱。”张锦堂得到我的许可后，就将公文底稿抄了一份交出去，听说仅给报酬50元。由此可见，日本帝国主义为了掌握我们内部情况，什么卑劣的手段都能使出来。

待我将反对“蒙疆联合委员会”的公文送交日本军部后，日本军部便通知我到张家口去商量事情。我到张家口后，大桥雄熊前来看我，我便谈到不同意用“蒙疆”二字作为机关名称问题，并反对设立“蒙疆联合委员会”的措施。大桥雄熊说：“现在预定请你当总务委员长，所有一切事情，你都交给我们吧。”翌日，莲沼兵团司令官又约我相见说：“关于‘蒙疆’问题，我们可以商量解决，你何必发动各盟旗联合反对呢？”我把反对“蒙疆”公文的内容，又向他作了说明，并强调这是各盟旗的意见，不是我个人的意见。最后，莲沼也表示请我当“总务委员长”。我和莲沼会谈后，大桥雄熊又约我到另一会客室里，向我解释：“‘蒙疆’二字，有今昔之不同。张作霖任蒙疆经略使时期，应用‘蒙疆’二字，是意味着压迫你们，今日用‘蒙疆’二字，是意味着日本帮助你们建立新的政权。”我仍是坚持我的意见，表示不同意他的说法，结果是不欢而散。

我和莲沼、大桥会谈后，经反复考虑，认为日本军部是想用让我当“总务委员长”的方法，封住我的口，不再反对“蒙疆”。我为了不在各盟旗中留下只顾个人升官的口实，于是又调动人马，通知各盟选派代表，到张家口日本军部面见莲沼兵团司令官、田中信一参谋，反对沿用“蒙疆”二字作为代表伪蒙古政权的名称，并说明我不就“总务委员长”的理由，嘱陶克陶作他们的翻译，务必把盟旗代表的意见表达出来。谁想陶克陶自任“蒙疆联合委员会”委员后，早已倒向日本军部方面。并因大桥雄熊政治参谋的态度蛮横，说话强硬，是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的代表人物，陶克陶只有顺从其意，不敢做丝毫的折冲，不但对于盟旗代表们所说的话没有完全翻译出来，还有可能从中捣鬼。金井章二也对“蒙疆”二字任意曲解，说“蒙疆是蒙古之疆域”意思，既能包括察南、晋北，代表新的

“政权”，又能起到“协和民族”的作用。并且“蒙疆”二字早已成了常用的习惯语，你们蒙古还是蒙古，不会因为沿用“蒙疆”二字而把蒙古取消了。因而各盟旗代表林沁旺都特等，到张家口进行反对“蒙疆”问题的活动，没有达到我所预期的目的。

我虽因为策动各盟旗反对“蒙疆”，招致日本军部的不满，但这时他们还须利用我这块招牌，统治内蒙古地区，因而又授意陶克陶劝我就任“总务委员长”。陶克陶深恐自己劝不动，特把李守信搬出来，一同前来劝我说：“现在金井已表示愿意辞去代理总务委员长一职，请你前往就任，如果仍然表示不就，恐怕影响不大好。胳膊还能扭过大腿吗？现在日本军部方面已经说好了，还是到张家口去就任吧。”这时我也考虑到，胳膊怎么也扭不过大腿，既然日本军部已经这样决定，各盟旗代表反对也不行，也只好就任了。因而就向李、陶二人表示说：“就任就就任吧。”但我以为，就任仪式可能要通过推选形式，不意我到张家口后，陶克陶早和日本方面作成圈套来捉弄我。

1939年4月29日晨，陶克陶特来请我到日本军部“商量要事”。我到后，大桥雄熊就迎出来和我说：“现在就举行任命式。”金井章二等先已在座，莲沼兵团司令官在几个人当中严肃地站立着，田中信一参谋长陪侍一旁，大桥雄熊就宣布任命式开始。首由金井章二表示，辞卸代理总务委员长职务，继由莲沼宣布，任命我为“总务委员长”。当时我虽知道受了欺骗和玩弄，心中充满了苦恼，但是面对这种情况，也只好接受任命，没有表示不就。这就显露了我的外强中干、色厉内荏的奴隶性。任命我为总务委员长后，莲沼又以司令官名义，给我赏金一万元，我也就接过来。我返寓后，认为今天举行任命式，事先既不和我商量，临时又不叫我知道，诓我到了日本军部后，就突然来了一个任命式。把我玩弄到了这个地步，越想越难过，就拿起威士忌酒来喝，一气喝了几碗，喝得东倒西歪，酩酊大醉。这时陶克陶前来见我，我一看见他，不由得无名火起，把怒气完全泄在他的身上，猛然打了他一拳，并严词责斥说：“今日举行任命式，你为什么事先不和我说，反和日本军部做成圈套，来欺骗玩弄我！”陶克陶

推说事先不知道，就抓个空隙溜走了。

嗣后，我把被任命为总务委员长的经过，写信告诉了吴鹤龄，嘱他向日本陆军大臣板垣征四郎反映。不久，接到吴鹤龄复信，说板垣表示，日本军部这个做法不对，不应采取任命的方法，惹得德王不愿意。我认为板垣还“同情”我，因而胆子又壮起来。有一次，在张家口又和大桥雄熊见面，我根据“访日”时给板垣的甲、乙两案的内容，谈到扩大和强化伪蒙政权及实现“蒙古建国”问题，大桥面带狞笑而用嘲弄的口吻说：“你们蒙古独立得啦。”我猛然听到他的话还很惊讶，怎么他也说出允许“蒙古独立”的话来？紧接着他又说：“干脆你们蒙古独立，我们日本军撤退好了。”结果又是弄得不欢而散。

我返寓后，回味大桥所说的话，是给我软中有硬的钉子碰，是对我的藐视和嘲弄。我这才深深感觉到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的可恶，再不能“合作”下去，便打算出走。那么究竟向何处去呢？经过左思右想，既不愿走向苏联或蒙古人民共和国，也不想投向中国共产党，而是仍想投靠蒋介石。因而通过军统特务在“蒙疆”工作的高荣和马汉三等，又和蒋介石发生了一段关系。因为这是后一个时期发生的事情，准备在写《伪“蒙疆联合自治政府”的成立与瓦解》一文中，再做详细的叙述。

我既然打算出走，对于日本方面的所作所为，也就不过问了，更不争执了，日本方面说啥就是啥。“被休的媳妇，不管牛犊隔奶”这句蒙古族谚语，很能表达我当时的消极心情。例如，这时日本方面提出，以“蒙疆联合委员会”为基础，将蒙古、察南、晋北三个伪政权合并，在张家口成立统一的“蒙疆政权”，并主张不用“蒙古联盟自治政府”原有的旗号，另制新的政权旗号。这本来是我不同意的。我的主张一直是以“蒙古联盟自治政府”为基础，吸收察南、晋北两个“自治政府”，撤销“蒙疆联合委员会”，在“厚和豪特”成立“统一”的“蒙古政权”。并主张仍用“蒙古联盟自治政府”的原有旗号，不另制定新的政权旗号。这两个方案是截然不同的，应当争执。只因我这时一心想要出走，不唯没有力争，反顺从日本军部的意旨，于1939年6月11日和于品卿、夏恭等面见莲沼兵团

司令官，表示我们三个“自治政府”愿意合流，成立统一的新政权。结果就在日本军部和金井章二的操纵下，于是年9月1日实行合并，在张家口成立了伪“蒙疆联合自治政府”，把“察南自治政府”改为“察南政厅”，把“晋北自治政府”改为“晋北政厅”。虽然降为地方政权，仍保持原来机构。仅把“蒙古联盟自治政府”裁撤，由伪蒙疆联合自治政府直接统辖锡、察、巴、乌、伊五盟，并将“厚和”市划归巴盟管辖，把包头市划归伊盟管辖。至此，不但“伪蒙古联盟自治政府”寿终正寝，连我妄图依靠日本帝国主义，建立“蒙古帝国”的迷梦，眼看也将破灭了。

（1965年）

伪蒙疆联合自治政府的成立与瓦解

德穆楚克栋鲁普*

一、伪蒙疆联合自治政府的成立

伪蒙疆联合自治政府成立于1939年9月1日。

在成立之前，我当“主席”的“蒙古联盟自治政府”“察南自治政府”和“晋北自治政府”三个伪政权之上设有“蒙疆联合委员会”。而该“委员会”直接听命于日本陆军省“兴亚院”驻蒙分支机构“蒙疆联合部”和张家口日本军部。

“蒙古联盟自治政府”成立在前，我又自恃投靠日本在先，日军进犯察、绥地区和西部盟旗时，又卖过力气，并有“蒙古军”和各盟、旗王公为后盾，在军政机关方面虽已采用日本顾问制，但我和蒙古职员尚有一定“权力”，所以有时我就撒娇卖乖地不受蒙疆联合委员会的指挥。就是察南、晋北两个伪政权，对于“蒙疆联合委员会”的“指示”，在执行上也不全都是不折不扣的。日本军部为了取消“蒙古联盟自治政府”和削弱“察南”“晋北”两个伪政权的权力，加上这三个伪政权统治的地区毗连、关系密切，张家口的日本军部为了进一步控制产业、交通、金融等重

* 作者曾任伪蒙疆联合自治政府主席。

要部门，加强殖民统治，搜刮战略物资，认为应该加以“合并”，在张家口建立统一机构，便于日本军部就近监督指挥。另外，日本和德、意结成“防共”轴心后，本以进攻苏联为目的，在制造张鼓峰和诺门罕两事件中，知道苏联力量的强大，于是由企图进攻改为防御。而“蒙疆”地区北部，正与蒙古人民共和国毗连，日本帝国主义把这一地区划成“防共”的“特殊区域”，企图切断共产党的国际联系，特将“蒙古”“察南”“晋北”三个伪政权合并，以资集中力量，发挥“防共回廊”的作用。同时，通过“蒙疆联合自治政府”这个御用工具，更可加强殖民统治，搜刮重要战略物资，建立兵站基地，作为再度侵略蒙古人民共和国和进攻苏联的跳板。

在三个伪政权合并问题上，我和日寇是有过主奴之争的：日寇主张以“蒙疆联合委员会”为基础，撤销“蒙古联盟自治政府”，与“察南”“晋北”两个伪政权合并，在张家口成立一个统一的“政权”。莲沼兵团司令官“任命”我为“蒙疆联合委员会伪总务委员长”时，就是实现这个主张的先声。当时，我想以“蒙古联盟自治政府”为基础，取消“蒙疆联合委员会”，吸收“察南”“晋北”两个伪政权，在呼和浩特（厚和豪特）建立“蒙古自治国”。因此，我与日寇多次发生过主奴之间的争论（详见《伪蒙古联盟自治政府始末》）。由于反对“蒙疆联合委员会”的失败，感到不能再和日本“合作”下去，一心打算出走，从此我在三个伪政权合并问题上，就不再和日本军部争执了。

1939年6月11日，我邀同“察南”“晋北”两个伪政权的首脑于品卿、夏恭二人，依照金井章二之嘱，前往日本军部面见莲沼兵团司令官，表示三个伪政权“愿意合并”。但我对“建国”问题仍不死心，还想趁合并机会谋求实现，密派我的秘书朝克巴达尔夫（陈国藩）和伪满“驻蒙代表”李义顺联络，取得通过伪满进入日本国内的证明，到东京和吴鹤龄进行建立“蒙古自治国”的活动。朝克巴达尔夫所带的草案是他和吉尔嘎朗（德古来）连夜拟具的。我主张要求建立“蒙古自治国”，吉尔嘎朗恐怕不易实现，主张要求建立“自治国”或“自治邦”，并嘱朝克巴达尔夫到东京

后，请吴鹤龄斟酌实际情况进行。吴鹤龄也认为应要求建立“蒙古自治邦”。他们向日本陆相板垣征四郎处活动之后，适日本军部政治参谋大桥雄熊也返日，向陆军省请示三个伪政权的合并问题。吴鹤龄请大桥帮忙，大桥答复说：“我是代表军部为了要求建立蒙古自治国而来，偏遇你们又来要求建立自治邦，现在‘国’不能成了，‘邦’也不能成了，仅允许成立联合自治政府。这都是你们闹坏了，可别埋怨我们！”于是“建邦”“建国”问题就又搁起来了。

日本军部和金井章二确实有过建立“蒙古自治国”的活动的准备，因为三个伪政权合并后，曾使用过印有“蒙疆联合自治国”而又抹掉“国”字改印“政府”二字的公文用纸和封套。根据这一点来看，才知道是有过建“国”的酝酿和筹备的。即从日寇对华政策来说，当时是采取分割统治的办法，事实上已在东北制造了“满洲国”，在华北制造了“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在华南制造了“维新政府”，也许有过建立“蒙古联合自治国”的打算。为什么又中途变卦了呢？绝不会如大桥雄熊说的那样简单，可能出于两个企图而变更：一是由日本首相近卫文麿发表“善邻友好，共同防共，经济提携”的声明，想用政治攻势诱降蒋介石媾和；二是这时汪精卫可能与日寇有了秘密活动，日寇为了政治诱降蒋介石或实现利用汪精卫分割统治中国的阴谋和策略，“蒙疆”也就不能成“国”，所以就变更了。

我派朝克巴达尔夫密赴日本，并向日本陆军省要求允许召开第四次“蒙古大会”，讨论三个伪政权合并问题。当由日本陆军省军务局长田中隆吉出面答复，表示同意，并向吴鹤龄说：“听说德王老和日本军部摩擦，他们（指日本军部）要杀他呢！希转告德王，今后不要再和日本军部摩擦，以防生命危险。”这不过是田中隆吉恫吓我，叫我俯首帖耳地作日本军部的忠顺傀儡而已。

朝克巴达尔夫返回后，我就草草召开了第四次“蒙古大会”，表示同意三个伪政权“合并”。至于建立什么样的“统一”伪政权，算作大会“授权”我这个“主席”全权办理。我在9月1日前赴张家口商洽“合并”问题时，已决心不再和日寇争执，金井章二提出来早已准备好的三个伪政

权合并方案（如“政府组织大纲”“施政纲领”“旗帜”等），我连看也不看，就表示同意。他提名卓特巴札普当伪政务院长，我本来不怎么同意，口头上也说：“好！好！好！”表示甘心愿意饰演这幕傀儡剧的主要角色。

我虽然这样恭顺服从，日本军部仍恐我演不好这出傀儡戏，特于“蒙疆政府”成立前一天，由金井章二负责预作排演，把我和于品卿、夏恭召集在一起，说业由日本军部内定我为“主席”，于、夏为“副主席”。又说“合并”必须强调“基于民意”，明天就举行“推选式”和“合并典礼”，应当事前“演习演习”。于是金井章二指于品卿说：“你应当说，我代表察南170万民众推选德王为主席。”指夏恭说：“你应当说，我代表晋北150万民众推选德王为主席。”指我说：“你应当说，我代表蒙古联盟自治政府区域内300万民众，推选于品卿、夏恭为副主席。”最后，又吩咐说：“这是在推选式上你们三位正、副主席应当讲的话。在举行政府成立典礼时，由夏副主席宣读政府成立宣言，由于副主席宣读政府组织大纲和施政纲领，并希德主席先讲话，说明合并的意义和经过。”于、夏当时应承了。我这时的心情，实在不愿意讲话，当表示推托之意，结果就由金井章二担当报告合并的意义和筹备经过这场戏的角色了。接着他又嘱咐一些话，甚至开会的一般常识，都不厌其烦地告诉我们。在这出傀儡戏中，金井章二真是很负责任的一位“导演”。

到了9月1日，仍由金井章二主持举行仪式，把我和于、夏二人请到“蒙疆联合委员会”最高顾问室，在日本军部田中信一参谋长、大桥雄熊政治参谋等少数人参加下，举行推选式。进行的程序和在会上的发言，一如前一天的预演，一言一动都没有变更，仅是增加照相这最后一幕。从此我就当上了“蒙疆联合自治政府”主席，于、夏二人就当上了副主席。接着举行“蒙疆政府”成立典礼。我和于、夏二人就以正、副主席身份出现，在莲沼兵团司令官、“来宾”、地方首脑和“蒙疆联合委员会”全体职员参加下，首由金井章二报告三个伪政权合并成立为“蒙疆联合自治政府”的“意义”和筹备经过，由于品卿宣读所谓“政府组织大纲”和“施

政纲领”，由夏恭宣读所谓“政府成立宣言”，继由莲沼及“来宾”等致祝词。所有这些，也是按照事先排演的进行，没有什么变更。

“推选式”和“成立典礼”举行后，我就依照金井章二提出来的名单，任命卓特巴札普为伪政务院长和各伪部局长以上官员，及“察南”“晋北”两个“政府长官”与巴、察、锡、乌、伊各盟盟长。接着就由伪政务院长卓特巴札普召开“政务院会议”，通过伪政务院、参议府和地方行政机构官制。确定张家口为“首都”，用成吉思汗纪元年号，规定统治区域，说明政府“旗帜”制定的意义。兹将蒙疆政府组织大纲等件摘录于后：

（一）蒙疆联合自治政府组织大纲：（1）蒙疆联合自治政府以蒙疆地域为统治区域，团结东亚各民族；（2）新政权称为蒙疆联合自治政府；（3）新政权首脑称为主席；（4）新政权以发扬东亚道义，尊重民意，为施政之大本；（5）首都设在张家口。

（二）蒙疆联合自治政府施政纲领：（1）宣扬东亚道义精神，并期其实现；（2）大同协和诸民族，大施经论；（3）振兴民生，确保安宁，保障人民幸福；（4）从共产主义“毒害”中解放诸民族，以资强化“防共”战线；（5）团结友邦，同志相契，以奠定东亚新秩序。

（三）蒙疆联合自治政府的旗帜：向来蒙疆各政权各自有代表旗帜，现在伴随蒙疆联合自治政府的诞生，应有代表整个区域统一政权的表征。因此，特制定从上而下横条黄、蓝、白、赤四色七条的政府旗帜。黄色象征汉族，蓝色象征蒙族，白色象征回族，中间赤色象征日本。就是以日本为中心，大同协和汉、蒙、回各族，作为代表政府的表征。

（四）蒙疆联合自治政府的领域：规定依据从来的“蒙疆”的区域为领域，确定地方行政机构为两个政府、五个盟，其中察南政府管辖原属十县和张家口一市；晋北政府管辖原属十二

县和大同一市，巴颜塔拉盟管辖原属十一县、五旗和“厚和”、包头二市；察哈尔盟管辖原属八旗、八县；锡林郭勒盟管辖原属十旗；乌兰察布盟管辖原属六旗和固阳一县；伊克昭盟管辖原属七旗和五原、临河、东胜、沃野四县（实际当时伊盟政权的政令仅能达到黄河以北，乌加河以东的准格尔、达拉特二旗部分地区）。

（五）蒙疆联合自治政府成立宣言：维成吉思汗纪元七百三十四年九月一日，合并蒙古、察南、晋北三治，肇建蒙疆联合自治政府，转移运会，秉济时艰，开大同大顺之宏图，奠长治久安之丕基。为此，特昭示境内各族民众，敬告东西邻邦及世界各国：我蒙疆地域乃历史上著名之故疆，民风朴素，资源丰富，人民勤劳勇敢，安于农耕牧业久矣。况且地势挟天险而兼大陆，幅员依长城而跨北海，唯自民国成立以来，军阀割据，残民以逞，凌虐百端，民不堪命，二十年来，委诸虎狼，徒供饲饵而已。

蒋也何人，不择手段，伪定一时，开府南京，以联苏容共为国是，以割据抗日为至计，开罪友邦。进行抗日以来，连遭败北，仅保残喘于岷峨之间。而彼虎狼乘此空隙，时欲吞噬瀚海百旗之野，咆哮跳跃，薄我门墙，窥我堂奥，赤化之祸，行将临头。

我蒙古、察南、晋北三治，夙具同戚同休之心，誓图防共安民之治，必须标本兼治，通力合作，因而肇建蒙疆联合自治政府，以期防止共产，协和民族。爰承友邦日本之提携，密切联系日、蒙、满、华达成巩固之一环，向建设东亚新秩序迈进，发扬东亚道义之精神，光被世界，增进人类之福祉，功垂金帛。特将政府组织法及其他重要法案公布，通告各族，昭示内外，莫不咸庆是赖，并希东西邻友及世界各国，幸垂鉴察。天日在上，其共鉴之。

二、伪蒙疆自治政府组织和主要人事安排

依照伪蒙疆自治政府组织法规定，主席是最高首脑，由我担任，和我并列的是最高顾问金井章二。其下是于品卿、夏恭两副主席。主席的办事机构是秘书处，由村谷彦治郎任处长。在主席、最高顾问领导下，设有管理政务的伪政务院，由卓特巴札普任院长。与伪政务院平行的机构，有管理军事的伪蒙古军总司令部，由李守信任总司令，还有咨询建议性质的伪参议府，由李守信兼任议长，聘任杨桑为名誉议长，特任吴鹤龄为参议，由村谷彦治郎兼任伪参议府秘书处处长。伪政务院设有总务、民政、治安、司法、财政、产业、交通七部和一个牧业总局。总务部长关口保；民财部长松津旺楚克、次长大场晨之助；治安部长丁其昌；司法部长陶克陶，次长波多野义雄；财政部长马永魁、次长日比野襄；产业部长杜运宇；交通部长金永昌、次长伊藤祐；牧业总局长郭尔卓尔札布、次长泉名英，后为柏五郎。由伪院长和各部、局长组织政务院会议，讨论决定有关重要政务事项。实际上，任何事必先经日系伪总务部长和各部、局日系次长的研究决定后，才能提到政务院会议上。对于提出的事项，只能通过，不能否决。至于我这个“主席”的权力，仅是公布法令、教令、教书、大赦、特赦、授勋等，虽然还有“主席统率军队”的规定，实际上是无权过问，真是高高在上的傀儡。至于两个“副主席”更是无事可干。伪政务院还设置了两个咨议，一个是特克希卜彦（王宗洛），另一个是雄诺敦都布。因为他二人曾任伪蒙古联盟自治政府的部长，合并后没有适当的位置，只好给予咨询名义，置诸闲散。

直属伪政务院的机构有“蒙疆学院”，由伪总务部长关口保兼任院长，副院长是日本人田边寿利，专司训练培养效忠日本的中下级职员。有“驻外代表部”和“办事处”，“驻满代表”是恩和布林（吴恩和），后

为李丹山；“驻日代表部”的代表是日本人，后为特克希卜彦。驻北京的“外交机构”是办事处，处长是日本人。还有地政局、审计局，局长都是日本人。至于各伪部、局机构的情况是：民政部管辖的直属机构有蒙古学院，院长仍由金永昌兼任；蒙古文化馆，馆长仍是伊德钦；治安部管辖的直属机构有中央警察学校，校长是日本人早根务男。司法部的直属机构有各地法院和检察厅及各地监狱；财政部直辖的机构有蒙疆银行，总裁是萨音巴雅尔（包悦卿），继为巴萨尔，后为寺崎英雄；经济监视署，署长先是巴彦泰，后为于兰泽；税务监督署，署长开始是日本人，后为霍克济呼（霍翰甫）；产业部直属的机构有专管鸦片、盐业的清查榷运总署，署长是吉尔嘎朗。至于大同炭矿、.电业、铁道、交通、畜产、食品等名目繁多的会社或公司，有的是日本资本家投资经营，有的是日“蒙”合资经营，理事长多由日本人担任。少数会社的理事长是由蒙人或汉人担任，也是管不了事的，大权都操在日系副理事长的手中。

伪司法机关分为三级，设在中央的有最高法院和最高检察厅。在“蒙疆政府”成立时，最高法院院长和最高检察厅长还未发表，我乘机向金井章二说：“补英达赖是蒙古的元老，现任巴颜塔拉盟盟长，仅是简任级，应当给他一个特任官。”金井说：“现在特任官的缺都没有了，仅有最高法院院长一缺，可以发表他。”我说：“补现任盟长是行政官，按制度上说不能兼任司法官呀。”金井说：“我想个变通办法发表就是了。”果然为时不久，金井特把法院官制中关于行政官不能兼任司法官的规定修改，提到政务院通过后，发表补英达赖为伪最高法院院长。伪最高检察厅长开始是刘继广，后为金永昌。伪巴盟高等法院院长是卓里克图（关荫南），伪巴盟高等检察厅长是那苏图（王庆三）。伪“厚和”地方法院院长是李介庵，伪“厚和”地方检察厅长由那苏图兼任。其他各地伪法院院长和检察厅长的姓名都不记得了。

伪地方行政机构主要人员是：察南政厅长官陈玉铭，次长竹内元平；晋北政厅长官田汝弼，次长前岛升；巴盟盟长补英达赖兼，副盟长亢仁（默尔根巴图尔），参与官泽井铁马；察盟盟长由卓特巴札普兼，副盟长

特穆尔博罗特，参与官简牛耕三郎；锡盟盟长是林沁旺都特，后由兴蒙委员会委员长松津旺楚克兼任，副盟长是补达巴拉，参与官中村浅吉；乌盟盟长初为巴宝多尔济，后为林庆僧格，参与官是山本信亲；伊盟盟长阿拉坦鄂其尔，参与官黑泽隆世；至于各伪县、旗长的安排，仍是采取蒙汉分治政策，旗札萨克或总管一律是蒙古人，县、市长是汉人或回民。人数很多，不再列举。

三、我和蒋介石秘密勾结

前面说过，我曾与日寇发生过主奴之争，特别是在“蒙疆联合委员会”问题上的争执以后，我就有了出走的打算。这时，日本驻在张家口的特务机关长酒井隆，因我的态度突然消沉，也引起他的怀疑和注意，我就更不能不谋早日出走了。但是，走向何方呢？反复思考，既不愿走向苏联和蒙古人民共和国，更不愿投向中国共产党，想来想去，还是认为以投靠蒋介石为宜。因为我知道，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反动政府，还承认蒙古封建制度的存在，还掌握着大量的军队，有统治中国的力量。更认为我和蒋介石还有过一段政治关系，总觉得他还赏识我。总之，是反动的封建阶级本质支配着我要重走这条路。出走的方向决定了，又考虑采取哪条路走向重庆。我计划从我旗走向蒙古人民共和国边境，一夜间就可以到达，是神不知鬼不觉的事情。到蒙古人民共和国后，再取道苏联转赴重庆，认为这样走比较稳妥。出走的方向和计划决定了，就寻找线索进行联络。忽然想起伪“厚和”市警察局长那木尔（刘建华）曾向我说过，蒋介石派来工作人员，劝我与其联络。因为当时日本人还敷衍我，使我过得去，我就对刘建华严词拒绝，表示绝不搞这一套，以免惹起麻烦和危险。以后刘建华也再未和我提及此事。这时我既然决定出走，觉得刘建华是联络引线。恰巧此时，迪力瓦由张家口要去“厚和”，我就嘱咐他秘密告知刘建华找寻蒋介石派来的工作人员，我不日前往“厚和”与之相见。接着我以视察巴

盟为名前往“厚和”，刘建华见我说，有蒋介石派来的高荣少将，现在萨县工作，已经取得联络，近日即来此地。我当即密嘱刘建华，一俟高荣到后，在新城建设厅巷我的官邸相见。俟刘建华陪同高荣见我时，我把打算出走的方向和计划告诉高荣，希望我到达苏、蒙时，重庆能照会苏、蒙准许我通过，转赴重庆。高荣当即答复我说：“这个事情很重要，需要我亲自去重庆请示蒋委员长。”我问他说：“什么时候能答复我？”高荣说：“往返需要两个多月的时间。”他走后，刘建华向我报告说：“高荣见您后，认为得到意外收获，现已返重庆进行联络去了。”过了两个多月的时间，还不见消息，使我甚为焦急，正打算找刘建华问讯时，刘建华特到张家口报告我说：“好险哪，听说高荣返经平津，几乎被捕。但是还好，高荣逃脱了，我们的事情还不致败露。”嗣后高荣再也未来见我，这一段秘密联络，就暂告中止了。

高荣虽然杳无踪影，联络一时中断，但驻在陕坝的军统负责人员马汉三（当时化名马龙文），潜来“厚和”活动。这时和军统发生关系的有伪巴颜塔拉盟公署官房主任贺云章、科长梁芝祥、托克托县长肖兆庚、蒙古军总司令部副官处科长吴君玉等。但做我这方面工作的主要是梁芝祥。约在1939年末，我因事到“厚和”，梁芝祥送来重庆方面给我打来的极密电报，我记得原文大意如次：“佛君（是我的化名）南来，抗战军民，无不欢迎，唯取道北路，殊不相宜。最好取道包头，渡过黄河，这边派白海风率队迎接。”报尾署名是贺耀祖。我嘱咐梁芝祥说：“这是极为秘密而且是关系重要的事情，希望你不要对任何人说。”梁芝祥很郑重地对我说：“请主席放心，我保证在任何情况下，绝不泄露。”我返回张家口不久，梁芝祥又来见我，带来蒋介石以军事委员会名义派我为蒙古自治委员会主席兼第八路军总司令，派李守信为热河省主席兼第十路军总司令的任命状。并对我说：“李守信的任命状是李叫我带给主席看的。为了避免检查起见，特由吴君玉穿着军装带到张家口交我的。”我当即把委任状收下，认为可以作为我出走通过外蒙和苏联的凭证。我问梁芝祥：“厚和还有蒋介石派来的工作人员吗？”他答说：“还有一个马龙文。”我当即嘱

咐梁芝祥速返“厚和”，通知马龙文密来张家口与我见面。为了避免发生差错，梁芝祥当场将他的名片取出一张，分为两半，一半交给我，一半由他带回交给马龙文，备作前来见我时的暗号和凭证。不久，马汉三即密来张家口，由赛吉尔胡领来见我。我看暗号凭证相符，就出而相见。我说：“前次我和高荣联络，提出取道北路通过外蒙、苏联，转赴重庆；嗣由梁芝祥给我转来复电，叫我取道包头这条路前往。经我详细考虑，认为这条路赴渝，很不妥当。因为这条路必须经过包头，渡过黄河，日本军警岗哨很多，并且我是主席，举止行动，惹人注意，很容易被日本方面察觉。请你把我的意见转达蒋委员长，仍准取道北路赴渝，并请蒋委员长照会苏、蒙，对我不要留难。”马汉三答应转告请示。并说军统在张家口的联络和掩护机关是私立华北医院，今后来往密电或文件，均由该院转递。又说：蒋委员长打听吴鹤龄在这里做何工作？我即指定旺尔克札布秘书负责联络，并编好电报密码交给他使用。马汉三走后不久，即由华北医院给我转来复电，大意如次：“德总司令（因为这时蒋介石已任命我为第八路军总司令），取道北路南来，绝不相宜，因为诺门罕事件业已和平解决，日苏关系已趋和缓，台端如果取道北路南来，通过苏联时，有被日本引渡过去的危险，仍宜另寻别途南来。如果无道路可寻，希毋庸前来，留在当地训练军民，忍辱负重，以待将来。”报尾署名仍是贺耀祖。我接到这个电报后，认为还有和马汉三面谈的必要，就叫旺尔克札布通过华北医院把马汉三找来。我和他说：“现在我已接到复电，知道蒋委员长不叫我取道北路赴渝，是对我深切的关怀，我至为感谢。今后只有按照蒋委员长的指示办理。并请你再次转请蒋委员长，准许在伊克昭盟也成立一个‘蒙古自治政府’。这样一来，那边的自治政府和这边的联合自治政府便形成对立的局面，日本方面为了避免那边的争取，可能放松对我的控制，我就可以腾出手来，进行‘训练军民，以待将来’的工作。”马汉三说：“我一定把你这个意见转报蒋委员长考虑。”

1940年春，日本军部调遣“蒙古军”各师开赴五原，第八师师长札青札布及第九师二十五团团长郭景春路过张家口时，曾来见我，乌古廷亦

在座。札青札布向乌古廷说："这次调遣蒙古军各师到五原作战，是帮助王英的绥西联军打天下，将是一场激烈的战斗。我们蒙古军是为谁而死呢！"我从他们的谈话中，知道五原将有战争发生，又引起我借机出走的念头，于是又叫旺尔克札布把马汉三找来面谈。我对马说："听说傅作义正在五原布置军事，这边日本军部也正在调动兵力迫近五原，战争行将爆发。请你和傅作义联络，把五原作战暂缓一步，我趁此机会以慰问前方军队为名，亲赴前线，找个空隙溜走，你看怎样？"马汉三答应立即同傅联络。可是，他走后，五原战争就发生了，我这个出走计划，又成了泡影。

我通过军统和蒋介石进行秘密联络，除了梁芝祥、旺尔克札布外，就是我最亲信人员赛吉尔胡、朝克巴达尔夫、超苦拔都尔也不详细知道，甚至对我的长子都嘎尔苏隆也未告知，仅把蒋介石给我的任命状带回我旗，交由我妻妥为保存。并计划出走时，才临时通知陈绍武、丁我愚、都嘎尔苏隆等跟着我走。就是梁芝祥、旺尔克札布二人，也仅负传递电报文件及进行联络之责，所有来往密电都由我亲自翻译，绝不假手他人。我和马汉三见面谈话时，梁芝祥、旺尔克札布、丁我愚等都不在场，把马汉三领进我的官邸，他们就躲开了。我认为进行得极为秘密，万无一失，但是这个事情终于败露了。

1940年春天，李守信前来张家口对我说："坏咧！坏咧！日本军警在'厚和'搜查'通敌'事件已经三天了。我们的事，可能都暴露了，你还不知道吗？"他这样一说，我也断定必然败露，但这个事情究竟怎样败露的，日本方面怎样发觉的，我是不知道其中的底细的。据我推断，可能在刘建华身上引起的。因为在五原战役中，日本军打了败仗，据说，策划这次战役的桑原特务机关长，在战场上自杀了。指挥这次战役的日本军部，为了泄愤和推卸责任，就在"厚和"、包头一带大肆搜查寻找"通敌"线索，偷听"通敌电台"，驻在"厚和"的日本宪兵队长去找"厚和"市的警察局长刘建华，质问他说："你曾推荐一个人（忘其名）在土默特旗工作，现在发现这个人是'军统'分子，有'通敌'的事情，但是这个人逃跑了。这个人既然是你推荐的，你可能知道逃往何处，希你提供线索，以

便进行逮捕归案法办。”刘建华是个狡黠的人，听了这话之后，马上答复说：“这还得了，我仅给这个人介绍工作，哪知人心叵测，竟敢干出‘通敌’这样重大的事情，真使我大吃一惊！我们警宪是一体，搜捕‘通敌’要犯，我与你有共同的责任。我一定用尽方法找寻这个人，找到以后，交你处理。”日本宪兵队长信以为真，当又嘱令从速寻找归案就走了。刘建华恐怕这事大败露后，株连到他的身上，就与吴君玉同到包头，乘坐“蒙古军”的汽车混出城门岗哨，渡过黄河，经过后套陕坝，投向重庆。日本人发觉刘建华逃脱，追查到吴君玉身上，在吴家中搜查出密藏的小型发报机和参加军统的名单，接着把贺云章、梁芝祥、肖兆庚等也逮捕下狱，供出我和李守信通过军统与蒋介石的勾结关系。这时马汉三正在张家口，但是不知他住在何处，无法通知他。李守信就故意放出风声说：“军统案件败露了。”马汉三听到这个消息，即从张家口逃脱。

我和李守信知道事已败露，认为与其坐待日本军警追查，莫如亲往日本军部自首承认。这样商量之后，李守信即去日本军部一趟，他回来时对我说：“我已经和岗部司令官说了，你也去说了吧。”我即偕同朝克巴达尔夫赴日本军部对田中信一参谋长说：“我今天来是对你谈谈我和蒋介石联络的一段经过，大概这个事情你也知道了吧。”田中信一说：“这事我也知道了，你为什么要和蒋介石联络呢？对我们有什么不满意的事情吗？”我考虑一下认为还从大的方面说较好，便答复他说：“因为我不满蒙疆联合委员会的成立，不满意取消蒙古联盟自治政府的合并方案，更不满意不许蒙古独立建国。适在这时蒋介石派人联络我，我就要求蒋介石许可蒙古独立。”对取道外蒙、苏联南下一节，避而未谈。田中信一进一步追问我说：“蒋介石如许可蒙古独立你怎么办呢？”这使我颇为窘迫，一时不知如何应答才好。正在筹思之际，朝克巴达尔夫在翻译时，看出我的窘态，即用蒙语向我提醒一下。我当即领会他的意思，便答复田中信一说：“蒋介石即便许可蒙古独立，我也不能凭信一句空话，就贸然从事。因为我知道蒋介石说话一向是不兑现的。要看看实际上能否实现，才能解决我的行止。”不意我的这番话正与梁芝祥的供词不谋而合。据梁芝祥获

释后对我说：他在宪兵队供称是蒋介石派人潜来策动我去重庆，我没有去。关于取道外蒙苏联一节，他因不知，也未供出。因为我的说法和梁芝祥的供词相符，田中信一便转怒为笑说："这个事情的经过我也全部知道了。蒋介石叫你走，你没有走，这就好。希望你不要为此担心，我对你完全谅解。"我这才像一块石头落了地，心境平稳下来，便又向他请求说："对于其他人员的处理，能够使我知道才好。"田中信一说："可以。"过了几天，田中信一邀我到日本军部，他拿出一个准备判刑的名单来。记得上面有梁芝祥、肖兆庚、贺云章，还有吴君玉、刘长荣、杨金声（"察南政府"的财政厅长）等，拟一律处死。我又请求说："这件事情应由我全部负责，其他人员均是从犯。既然对我谅解，希望也宽恕他们。"田中信一说："既然你这样说，对于其中的蒙古人，可以从宽处理。"我就提出贺云章、梁芝祥是蒙古人，肖兆庚虽不是蒙古人，但在蒙古工作多年，也等于蒙古人了。田中信一说："这几个人究竟如何处理，俟和有关部门研究后，再告知你吧。"不几日他又亲到我的官邸，仍拿出那个判刑的名单，对我说："贺云章业已病死（据×××从日本宪兵队翻译探听，说是被用凉水灌死的），梁芝祥、肖兆庚二名从宽发落，各判徒刑八年，其他人员仍处死刑。"我认为再提出要求也是无用，因此我就未再谈什么。日本军部就把吴君玉、刘长荣、杨金声等按"通敌抗日"罪名执行枪决了。同年5月，我想回旗安排一下，但又恐日本方面阻拦，就故意向村谷彦治郎（"蒙疆"主席府秘书处长）说我要回旗，试探他的口气。他如表示阻拦，我就不去，以免惹起日本方面的怀疑和阻拦。但试探结果，村谷并未表示阻拦，反为我准备车辆。我一看日本方面没有阻拦动向，就返回我旗，把蒋介石给我的任命状烧了。

这个案件处理以后，"蒙古军"总司令部顾问潘井少佐，曾向第九师师长包海明说，他曾参加过讨论处理这个案件的会议。田中信一参谋长主张对我和李守信不究，大桥雄熊政务参谋主张严办，经田中参谋长说明不究的理由是我俩是蒙疆的军政首脑，如果深究下去恐牵涉面广，影响太大。大桥还说："德王这次和蒋介石联络，可以从宽不究，如果德王要和

苏联和外蒙联络，那可不是玩的，一定要从严处理。”包海明把潘井少佐这番话告知吉尔嘎朗，吉尔嘎朗又转告我。这可能是日本军部有意识地授意潘井通过包海明转告我，无非是希望我死心塌地做日本帝国主义的帮凶而已。另外，是警告我不要和苏联、外蒙古联络。其实，这是日本军部的过虑，我当时只愿和蒋介石联络，绝不愿走外蒙古、苏联这条路。后来我为什么又去蒙古人民共和国？是因为走投无路。记得我曾和吉尔嘎朗谈述过这一段的经过，并表示对蒋介石感激心情。吉尔嘎朗说：“据我看蒋介石不叫你取道北路赴渝，不是对你的关怀，而是怕你和外蒙联络起来，给他增加麻烦，所以特用‘恐怕被日本引渡过去’这句话来吓唬你。”吉尔嘎朗和我说的这番私房话，是很有道理的，蒋介石在电报中叫我留在原地，“训练军民，忍辱负重，以待将来”，是期待我借用日本势力，组织蒙古武装，当时作为“防共之用”，将来用以“反共”，是想实现他不可告人的阴谋。可是我在日本投降之后，就离开军队去北平，假如日本投降时我掌握着军队，一定会按照蒋介石的指示，进行反共反人民勾当的。这个反动企图，当时虽未如愿以偿，待到1949年春，人民解放军已打到浦口，国民党反动集团迁到广州，我还趁此机会，企图东山再起，暗与美帝国主义勾结，收集残部，在阿拉善旗定远营拼凑起来一个“蒙古自治政府”，企图组织武装力量，再与人民为敌。但为时不久，宁夏便告解放，我和李守信率同残部逃至阿拉善旗西北部，因为缺乏给养，军队四出抢掠，牧民逃避一空，陷入几百里地无人烟的境地。我在重重罪恶之上又加上了纵兵殃民的罪恶。

四、“蒙疆联合自治政府”时期的“对外关系”

伪蒙疆联合自治政府成立后的“对外关系”，首先是与汪精卫伪政权的关系问题以及我的第二次“访日”和第三次访“满”，还有一些伪政权的对日和别的所谓“驻外”活动。

1938年12月18日汪精卫和其党羽陈公博等逃出重庆，先到越南河内再派人去香港发出通电，响应日本首相近卫文麿关于“善邻友好，共同防共，经济提携”的对华政治诱降声明。继即到达上海与日寇“讲和”，缔结卖国协定，并于1940年3月30日实行所谓“还都南京”，标榜中国领域内“分治合作”“反共和平建国”，参与“建设东亚新秩序”。日本侵华派遣军总部也声明今后对华政策不以蒋介石为对手，承认汪精卫伪政府是中国的“合法政府”。同时将以梁鸿志为首的伪南京维新政府随之撤销；以王克敏为首的伪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改为“华北政务委员会”，降为特殊的地方政权；关于“蒙疆”政权问题，日汪之间不能没有默契。汪精卫为了扩大他的权力，妄想做统治全国的首领，当然不愿蒙古独立，只承认“蒙疆高度自治”，日寇也不得不暂时迁就汪精卫的意见。

为了确定“蒙疆政权”和“汪精卫政权”的关系问题，“蒙疆”方面派出代表李守信偕同伪总务部长关口保、翻译陈有声等，汪精卫派出代表周佛海，在青岛缔结协定，并履行签字手续。这项协定的要点如次：（一）“蒙疆联合自治政府”根据近卫首相提出的“善邻友好，共同防共，经济提携”三原则，承认“新中央政府”（指汪伪政权）是继承中国法统的“正统政府”。认为重庆政权无论在法理上、实质上已降为地方政权。（二）“中央政府”承认“蒙疆”是日、满、汉、蒙各族强度结合的地方政权。鉴于历史的、国防的、经济的重要性，在“蒙疆联合自治政府”全盘施政既成事实的基础上，承认“蒙疆”高度自治。

李守信返张后向我详细汇报了他在青岛签字和与汪精卫会见时的情况。他说：签字仪式是在青岛一个宽阔的大厅举行的。当时日本华南派遣军参谋长板垣征四郎和汪精卫都在青岛，却没有参加签字仪式，是由他和周佛海代表双方签字的。签字以前也未进行谈判，签完协定之后，又签订了一个附件。这个附件载明的事项主要有三点：（一）“新中央政府”承认“蒙疆联合自治政府”沿用成吉思汗纪元年号；（二）“新中央政府”承认“蒙疆联合自治政府”四色七条政权旗帜；（三）“新中央政府”承认“蒙疆联合自治政府”在长城各口的驻兵权。签字之后，汪精卫、李

守信参加宴会，并限定他一人代表“蒙疆”参加，计参加宴会者还有王克敏、梁鸿志、周佛海等。宴会间只是闲谈漫话，毫未涉及政治问题。

宴会后，汪精卫又邀李守信单独会见。李守信和板垣住在一起，他就和板垣商量说：“汪精卫单独请我谈话，是要谈什么话呢？谈政治我不懂，谈军事我倒知道一些，并且见面时怎么称呼呢？他如叫我李守信，我就叫他汪精卫、还是称他为汪主席呢？如果称他主席，他是谁的主席呢？”板垣说：“管他是谁的主席，就称他主席吧。”于是李守信同他的随从副官郝贵堂去见汪精卫。见面时，郝贵堂要照相，汪精卫说：“这个人进来行吗？”李守信说：“他是我的随从副官，靠得住。”照完了相，汪开始谈话说：“李总司令，你辛苦了。”李守信说：“汪主席，你也辛苦了。”汪说：“彼此都一样，没有什么。”李又说：“早没见面，久仰大名。你可说是不避危险诋毁，一生为国家大事奋斗。”汪说：“实在抱歉得很，我很愧对全国父老。”接着，汪问：“你的防地安静不安静？”李说：“傅作义前年反攻厚和，去年袭击包头，都被我们蒙古军配合日军打退。”汪又问李：“你的部队有无困难，你可以向我说，咱们研究一下，我好替你解决。”李答：“咱们亲日，不能叫兵们跟上受罪，没吃的向他们要，没花的也向他们要。蒙古军的补给很好，武器装备也不太差。”汪见李不向他求援，就又问：“听说满人和蒙人之间有摩擦，有这个事吗？”李说：“满洲人是蒙古人的外甥，你知道不知道？”汪说：“我知道。”李接着又对汪说：“蒙疆有多少满洲人，恐怕你不明白。蒙疆的满人都住在厚和市的新城，现在剩下不到1000户，就产生了一个满洲人市长李春秀。我们那儿也照顾少数，讲究民族协和，因为汉、满、蒙、回、藏各族，都是中国人，没有摩擦那回事。”汪一听，再不吭声。待了一阵，汪又问李守信部队有无困难？李再次拒绝地说：“主席老问我有无困难，可见对我们蒙古非常关怀。我们的困难，可以就地解决，不愿给主席多添麻烦。”汪见李始终不向他张口求援，便扯了一阵询问关于我的生活起居的闲话，即由周佛海、褚民谊和梅思平等陪同吃午饭，饭后李守信即告辞离去。

这个协定原稿，金井章二曾给我看过。我不但不同意这个协定内容，根本就不愿和汪精卫伪政权打交道。因为当时我认为：（一）如果和他缔结这样的协定，虽然没有明确规定汪精卫政权和“蒙疆”政权是隶属关系，仅是互相承认、互相支持的关系，但在协定里指出，“汪精卫政权”与“蒙疆政权”是中央和地方的关系。这就意味着“蒙疆”是汪精卫伪政府统治下的高度自治区域，与我一向谋求“蒙古建国”、脱离中国而独立的主张相反。尤其使我不满的是，汪精卫已经承认了“满洲国”，却不承认蒙古的“独立”。因此，我主张对汪精卫政权采取置之不理的态度，不愿缔结这样的协定。（二）当时我还认为我之所以投靠日本帝国主义，是基于“民族立场”与日本合作，用“为民族复兴”这块遮羞布来掩饰自己的丑恶。另外，我认为汪精卫是国民党元老之一，在国民党中央曾担任过重要的职务，居然脱离抗战后方，投靠日本帝国主义，真是厚颜无耻，实在有点看不起他。（三）当时我还认为：我投靠日本帝国主义在先，汪精卫投靠日本帝国主义在后，他却要后来居上，当我的领头上司，把“蒙疆”地区划在他的统辖范围内，真使我有点不服气。不过我这时正与蒋介石秘密勾结，一心打算出走，因而对协定也没有表示反对的意见。汪精卫伪政权举行所谓“还都典礼”时，金井章二提出派伪政务院长卓特巴札普代表前往致贺，我也表示同意。

1940年春天，汪精卫以伪国民政府主席身份，偕同他的宣传部长林柏生等乘坐飞机前来张家口视察访问。前一天，金井章二对我说：“明天汪精卫主席来张，主席（指我）应到飞机场迎接并设宴招待，当然也要谈些话，希从早做好准备。”我为遥向蒋介石买好起见，推说有病，明天不能到飞机场欢迎。金井章二知道我的牛脾气又上来了，就讪讪地对我说：“既然有病，应当请医生看看，注意休养。”说完就走了。金井章二走后不久，日本军部就派军医官前来给我看病，我也谢绝了。推说我的病适宜服中药，不宜服西药。翌日汪精卫等一行果然乘飞机来张，我仍称病未去欢迎，仅由卓特巴札普代表我到机场迎接。汪精卫来张视察是事先得到日本军部同意的。我称病不见，既给汪精卫以难堪，更使日本军部下不来

台。汪精卫却向日本军部田中信一参谋长等表示说："既然德王有病，我去看看他。"大桥雄熊政治参谋当即给我秘书朝克巴达尔夫来电话，要我勉支病体，出而相见。我仍坚持不见。这可把大桥激怒了，当即用电话对朝克巴达尔夫说："现在汪主席就去看德主席，切望务要出面相见。如果仍然拒见，我们日本军部要用全副的武装力量把汪主席护送到德主席的床前。"这个电话说完之后，大桥雄熊就陪同汪精卫前来我的官邸，我只好勉强出迎至大门口与汪相见，让至客厅座谈。大桥雄熊坐在一边监视着，汪开始慰问我的疾病，嘱要诊治休养。继则说："蒙古过去是我们的同胞，现在是我们的同胞，将来还是我们的同胞。应当加强团结合作，共同致力'反共和平建国'。"我也淡淡地回答数语，相谈不到20分钟，汪即辞去，由金井章二、卓特巴札普等陪同在远来庄宴会。当日下午即乘飞机返平转宁，我未去欢送。在飞机场上汪还发表谈话说："我这次来张，承军政各界亲切招待，表示感谢。特别使我高兴的是，还亲往慰问德王的病情，看到他满面红光，一望而知是病情好转。"暗示讥讽我称病未去迎接之意。

不久，吴鹤龄由日本回来，我和他谈到拒汪的经过。他说：汪精卫真是个大浑蛋，全国军民都在抗战，他却前来投日。他之投日与我们不同，我们是基于"民族立场"与日本"合作"，他之投日是破坏全国抗战。并且我们与日本合作在先，汪之投日在后，现在又叫汪精卫来管辖我们，这等于叫我们随娘改嫁。吴他同我一样，这一套话，也是诵的同一套汉奸经。伪满"驻蒙代表"李义顺有一次和我说："德主席拒见汪精卫的消息，香港报纸亦有登载，标题是'德王拒见，汪逆碰壁'。"我当时听了还很得意呢。嗣后，听说汪精卫伪政府还颁布"蒙古自治法"，下达到"蒙疆联合自治政府"，日本人也未拿来给我看。大概这个"蒙古自治法"可能是触犯了日寇直接控制"蒙疆"的权利，所以采取置之不理的态度。

关于我的第二次访日。这次"访日"是为了参加祝贺日本天皇纪元2600年纪念典礼，报告"蒙古""察南""晋北"三个伪政权合并后的"蒙疆政情"及恳请今后的"援助"。陪同我的有金井章二、李守信和随

员等20余人。1941年2月11日由张家口出发经过北平、山海关、汉城等地，2月25日到达东京。日本松冈洋右外相及其他军政首脑人员到车站欢迎。日本外务省次官大桥忠一负责招待，与我接触机会较多，他在口头上表示尊重我的“权力”，因而我对他有好印象。我在日本东京的活动，无非是访问军政首脑，游览名胜，参观学校、工厂，到处受到日本各界的招待，可以说，对我是极尽笼络之能事。当我见到日本天皇裕仁时，他很尊重地接见我，在致辞中希望我致力“东亚和平事业”。我在答词中表示“感谢日本的支援”。但因见日本天皇时，我是身着蒙古长袍、坎肩便装，听说有的日本人背地议论我未穿马褂，不够隆重。当我参加日本外相招待宴会时，松冈洋右没有照例在宴前致辞，仅举杯说了“祝蒙古万岁”一句话。我在“访问”期间主要的活动，是与吴鹤龄前往陆军省面见陆相东条英机、军务局长武藤章、兵务局长田中隆吉（都是旧相识）。我和吴鹤龄当时提出改组“蒙疆联合自治政府”的方案。这个方案主要内容是：在“蒙疆联合自治政府”下成立两个“委员会”，一是“蒙古联盟政务委员会”，专管巴、察、锡、乌、伊五盟事务，这是为了恢复类似“蒙古联盟自治政府”机构，我好从中掌握，作为我的政治资本。二是“蒙疆自治委员会”，专管“察南”“晋北”两个伪政府的事务。这是因为察南、晋北两个地区日本人抓得更紧，我什么事也不能过问，干脆放弃不管。这个方案提出之后，并抄录一份面交近卫首相，他们当时没有明确答复。田中隆吉当着我和吴鹤龄的面说：“吴先生很能干，叫他当政务院长吧。”本来田中隆吉对吴鹤龄的印象不很好，为什么又主动提出叫他当“政务院长”呢？大概是因为吴鹤龄在日本三年期间经常和陆军省联系，并且学会了日文、日语，娶了日本女子做妾，对他的印象已经好转，叫他当“政务院长”是为日本帝国主义统治“蒙疆”人民又加上一个得力的帮凶。吴鹤龄又去陆军省探问对于我们所提出的改组“政府”方案作何处理，回来报告我说：“武藤章对我说，德王提出这个方案，是因为他愿意专办蒙古事。既然他愿意这样做，给他在德化设立一个专办蒙事的机构，叫他干不好吗？”虽然没有成为事实，但后来有“兴蒙委员会”之设，或即种因于此。

我在“访问”期间，还以个人身份访问过吉田骑兵监。因为吉田在包头担任日本驻军部队长时，我曾去包头“慰问”军队，他特开一例，把日本部队集合起来，列队欢迎我讲话，给我留下很好的印象。我觉得他和其他日本军人不同。当我访问他时，他除了殷勤接待外，并对我说：“我虽然离开了包头，但是对包头那里的事情，还时常打听，因此颇为熟悉。听说我走以后，继任我的中岛部队长做得很不好，逮捕了很多的人，并把为首的通敌人员王文治等杀了。我认为他这个做法太拙、太笨了，捕杀这些人有什么用？为什么不利用他们的组织和人员，反转来为我们搜集情报，窥探敌情！不是更能知道许多消息，使我们的耳目更灵通吗？”我当时还很佩服他的“见解高明”，现在回想起来，他的做法不过是更为阴险、更加毒辣罢了。同时也说明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在做法上无论软或硬，对蒙、汉人民都是不怀好心的。

我在日本“访问”游览一个多月，本拟在归途访“满”，只因东条英机要来“蒙疆”“视察”，就停止了中途访“满”，于当年3月16日返抵张家口。我返回后不久，东条英机就乘日机前来，我和他见面之后，没有谈到什么重要问题，他只是嘱咐我不要灰心，致力“东亚和平”和“蒙日亲善”工作。并说送给我步枪500支，叫我组织卫队。他走后不久，又派富永中将前来，适我返旗未得见面。我回张家口后，“兴亚院”联络部长官竹下义晴转告我说：“富永叫我转告你，一切不要灰心，仍要努力工作。”大概不久，我即把曾在日本士官学校毕业的哈丹布和（暴德彰）从伪蒙古军调来，担任我的卫队队长，并从第七、八两师调来精壮的蒙古士兵，组成了卫队，用东条英机送给我的500支步枪装备了卫队。

关于我的第三次访“满”。本来预定访日后即行访“满”，不意我偕同金井章二及随员等到达北平时，偶染重感冒病，不能坚持前往，中途折回，以致预定安排的访“满”通知，没有及时传达经过的各地，使伪满在奉天（辽宁的沈阳）迎接的人员扑了空，伪满方面难免啧有烦言。这种情况传到金井章二的耳朵里，又引起了对我的怀疑和不满。他曾向陶克陶等说：“德主席这次中途停止访满，使满洲国对蒙疆的印象不好。他是真

正病重不能坚持前往呢？还是别有用意呢？据我看德主席一向主张吸收外蒙建立大蒙古国，这次中途停止访满，可能不满意所订立的《日苏中立条约》吧？因为他认为在《日苏中立条约》中，日本默认了外蒙古独立。”实际上我没有这个意思，但也不便向他解释，只好听之任之。

1942年，适逢“满洲建国”十周年，我又偕同李守信等，做第三次访“满”，祝贺“满洲建国”十周年并感谢对“蒙疆”的援助。我等一行于这年4月21日到达“新京”（长春），伪满国务总理大臣张景惠，军政大臣于深澄，兴安局总裁札嘎尔及日本关东军参谋长等，均到车站欢迎。当我拜见“满洲国”皇帝溥仪时，他已不以臣属之礼相待，而以“蒙疆”“政权首脑”之礼，飨以国宴，隆重招待，在宴前致辞时，称我为“贵主席”了。我在访“满”期间，无非是参加庆祝典礼，访问各部大臣，游览名胜，没有什么重要活动。我访“满”回来不久，伪满洲国特派于深澄为团长，兴安局参与官博彦满都为首席代表，带同随员十余名，到达张家口做“回访”了。

此外还有一些“对外”活动是：（一）1942年日本政府在东京召开所谓“大东亚会议”时，参加的有中国伪国民政府主席汪精卫，伪满洲国总理大臣张景惠，菲律宾的傀儡总统洛克菲勒，缅甸的傀儡总理八博莫士，“蒙疆”因为没有“建国”，仅以地区的名义派民政部长松津旺楚克为代表，偕同翻译札奇斯钦（于宝衡）前往参加。嗣日本召开“大东亚经济会议”，“蒙疆”派财政部长吉尔嘎朗前去参加。（二）约在1941年8月间，“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长王揖唐要来“蒙疆”访问，吴鹤龄对我说：“听说王揖唐最不愿意改称蒙古自治邦和使用成吉思汗年号，我们要做一个大大的蒙古自治邦政府牌子挂上，等他来时叫他看看，刺激刺激他。”王揖唐到达后，仅是“敦睦友邻”性质，应酬访问一天就返回北平。嗣后朱深继任“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又派苏体仁来访，亦系拉拢关系应酬性质，没有什么重要事情可以记述。（三）“蒙疆联合自治政府”“驻外”常设机构，计有“驻日代表部”，过去概由日本人担任代表，仅和日本陆军省发生关系，日本外务省还不以外交机关看待。到了1942年，特派

特克希卜彦为代表，经过交涉才由日本外务省取得“外交人员”证明书三份，确定由代表、参事官、秘书官三人使用，其他人员还不发给。每当日本外务省召集各国使节团开会，宣布有关外交重要事情时，不挂“蒙疆政府”旗帜，经特克希卜彦出面交涉，才挂上。“驻日代表部”所办的经常事务，是管理“蒙疆”留日学生和登记审核日本国内入蒙经营工商业的资本家。特克希卜彦秉承我的意旨，常到日本陆军省、外务省联络，探听消息，遇有机会就进行“蒙古独立建国”的活动。但是“驻日代表部”有日本警视厅特派的名为保护实则监视的警察人员时常进入，有关重要的消息，不敢用信件传递，只有托付妥靠人员捎来报告我。此外在伪满“新京”设有“蒙疆驻满代表部”，也算是“外交机关”。在华北设有“驻北平办事处”，是联络性质的机关。

五、“蒙疆联合自治政府”改称“自治邦”与历次机构改革

“蒙疆联合自治政府”成立后，经过几次行政机构改革和主要人事变动。主要原因是“蒙疆”地区既然是日本帝国主义统治下的殖民地，各级伪政权当然是日本帝国主义统治的御用工具，每当日本驻军司令官或参谋长、最高顾问或总务厅长调动时，就有机构改革和人事调动。在历次“改革”机构中，有时也有我和吴鹤龄的意见，但须得到日本军部的承认，才能行得通，否则就遭到碰壁。下面记述几次较大的机构改革和主要人事变动：

（一）伪政务院的变动与成立“蒙古自治邦”

1941年春，吴鹤龄从日本回来，我提出叫他当“政务院长”，但金井章二不愿意，就去鼓动高桥参谋长不要承诺。高桥和我说：“叫吴鹤龄当政务院长合适吗？”我说：“既然叫我当主席，我很需要他帮助，并且这

是出于陆军省田中隆吉的意思，大概你也知道吧。”经我这样一说，高桥才无话可说了。金井章二见此计不售，就去策动卓特巴札普不要让出“政务院长”的位置。当我动员卓特巴札普把“政务院长”让给吴鹤龄时，无论如何劝说，卓也不愿放弃。并强调说：“在蒙古政府中，我是年纪最老的人，吴鹤龄是比我年轻的人，为什么要我把政务院长让给他呢。”说了几个钟头也无效果，最后我不客气地对他说：“这个事情和日本方面都说好了，你也说过吴鹤龄能干，你如不让，就是阻碍贤路。”这样吴鹤龄便当了伪“政务院长”，把卓特巴札普调任为伪参议府议长。

吴鹤龄当上伪政务院长以后，就协助我进行“蒙古建国”工作。吴鹤龄既是一个政治野心家，也是一个现实主义者。他主张“建国”要分成两步走：第一步是建立“蒙古自治邦”，第二步才是建立“蒙古国”。他在“蒙古军政府”时期，就草拟过“蒙古基本法”（似宪法）和“蒙古建国计划”。他在日本东京时，也秉承我的意旨，到处钻营活动“建国”，甚至不惜破坏祖国的统一，向日本朝野人士作过分割中国的建议。对于“蒙古建国”的“国体”和“政体”问题，也是作过研究，并且这样说过：“蒙古建国的国体问题，如仿照日本和‘满洲国’，应当采取君主国体或君主立宪政体，比较容易行得通。但如从远大目标说，我们不是还希望吸收外蒙建立大蒙古国吗？为了实现这个远大目标，应当采取民主共和国体。”又说：“无论采取共和国体或君主国体，主席（指我）当国家元首是没有问题的。建立蒙古共和国你是终身总统，如建立蒙古帝国，你是民选皇帝。”

关于“建国”的“年号”问题，我也再三考虑过。我认为最好是用“成德”二字。因为“成”是成吉思汗的成字，“德”是我名字的头一个字，合起来就是我“继承成吉思汗之德”。这与伪满皇帝溥仪登极后，应用康德年号表示“继承康熙之德”有同样的意义。我这个幻想和迷梦，简直狂妄已极，反动透顶了。

我们虽然作过这样的研究，吴鹤龄总认为一时不易实现，应当先把“蒙疆自治政府”改为“自治邦”，他就分向日本“兴亚院蒙疆联络部”

长官竹下义晴和日本军部高桥参谋长活动。日本方面起初还不同意，至希特勒进攻苏联后，才允许对内改称“自治邦”，对外仍称“蒙疆联合自治政府”。吴鹤龄把接洽经过告我，我仍坚持建立“蒙古自治国”。吴鹤龄劝我说：“主席别再坚持了，建立蒙古自治邦问题，好容易遇到德国进攻苏联机会，得到高桥参谋长的承诺。若再延搁，深恐过了这个村没有这个店，反而又成了问题。”我再未说什么，表示默许，日本方面也再无异议。即于1941年8月4日挂上“蒙古自治邦”的牌子，算是宣布成立。既未举行典礼，也未展开宣传，一般仅知有“蒙疆联合自治政府”，而不知有“自治邦”，我深感不甚惬意。吴鹤龄解释说：“蒙古建国问题事体重大，关系复杂，牵涉更多，必须逐渐实行，以求实现，第一步先成立蒙古自治邦，第二步再谋求建国。并且‘国’与‘邦’在汉文解释上虽有不同，但用蒙文翻译过来，都叫‘敖洛斯’，对蒙人也能说得下去。”他更进一步做试探性地说：“蒙古建国不但主席一再坚持，力求实现，就是我也是梦寐以求的。如果蒙古一旦实现建国，主席登了大宝座，我这个政务院长，还不是总理大臣吗？”

（二）最高顾问的调动

1942年1月，“蒙疆联合自治政府”最高顾问金井章二换成大桥忠一。金井章二的调职，固然在日本人内部有其矛盾原因，但与我之反对他也有一定的关系。金井章二是一个很狡猾的人，他知道日本在“蒙疆”实行反动统治，一时还找不到另一个适当的傀儡，仍有利用我的必要，因而在“蒙疆联合自治政府”成立后，对于某些事情也很敷衍我。例如，在汪精卫开始投日时，他曾和我说过：“蒙古建国之事，在汪精卫未建立政权之前，就应做成事实。”这话很合我的口胃。我提议要在纯蒙地带，建立一个新兴都市，作为“根据地”，他也表示同意，并到各处看过。但我总认为金井章二这个人口蜜腹剑、笑里藏刀，特别是在制造“蒙疆”问题上，使我最伤脑筋，对他成见已深。因而在访日期间，就向日本陆军省兵务局长田中隆吉说他的坏话，表示对大桥忠一有好感，有意请他来当最高顾

问。适至日本帝国主义发动所谓“大东亚战争”后，考虑到需要我调动蒙疆力量支援战争，就把我不愿意的人金井章二调走，把我欢迎的人大桥忠一派来充当最高顾问。大桥忠一到张家口后，没有先到日本军部请示机宜，而是先来见我。他的亲信人员提醒他，这样做会招致军部的不满。他却强调说：“我是德王特意聘请的最高顾问，当然要先拜德主席。”甚至连在张家口的日本神社，他都疏忽了，未去参拜，这更招致日本军部的反感。他上任之后，表示尊重我的“权力”，并对日系职员训话说：“你们把日本对蒙政策执行错了。在蒙古政府中，你们帮助蒙系人做事，不应对当地人藐视。”这样一来，在蒙疆政府当权的日本人，对他也心怀不满。同时他与驻在张家口的日本公使岩崎民男也发生矛盾。日本陆军省得知这种情况后，特派一个军官前来了解，听说也不赞同大桥的做法。这个人回去不久，陆军省就迫令大桥忠一回国。我听说以后，就去日本军部面见七田司令官表示挽留，七田坚决不肯，一定要撵大桥走。我见大桥后仍表示挽留他，并劝他暂时不要走。大桥对我说：“主席不必为我一个人惹了军部和公使馆，我还是走吧。”当大桥走的时候，岩崎公使和日本军部参谋部等均未到车站送行，仅派一两个中下级军官到车站应付一下，大桥理也不理就登上火车走了。大桥走后，吴鹤龄对我说：“咱们老蒙古就是心实，总认为大桥忠一好，金井章二不好，一切信任大桥忠一。但是他来了之后，我们什么权力也未得到，还失掉了一些权力。例如蒙疆银行总裁，向由蒙古人担任，大桥来了之后，说由日本人担任吧，结果寺崎英雄当了总裁，特穆尔博罗特任为副总裁。另一方面我们要让蒙古人当总务厅长，可是没办到。当他来的时候，我还问他，你还亲任总务厅长吗？最高顾问是在政务院长之上的，总务厅长是在政务院长之下的，你如感觉兼任不合适，可以仍由蒙古人担任总务厅长。他立即答复我说‘我兼，我兼’。由此看来，他是不管制度上是否合适，有权力的就抓，一点也不放弃。据我看来，大桥走了也好。大桥这一走连最高顾问也带走了，有什么不好呢？”的确，日本军部是用高压手段控制我，大桥忠一这个日本政客是用笼络手段软化我，统治蒙古的目的是一致的，只是方法不同而已。

（三）“蒙疆政府”的几次行政机构改革

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太平洋战争后，特在“蒙疆联合政府”内设立一个“总务委员会”，由总务厅长武内哲夫任主任委员，由各部、局、会日系次长分任委员，下设一个“弘报局”，担负宣传动员支援战争之责。1942年6月1日，日寇为了实现“蒙汉分治”政策，便于从中驱使利用，又进行机构改革。这次改革的要点是：1.撤销伪牧业总局，成立“兴蒙委员会”，专管盟旗属于蒙人的事务。2.将伪民政部、伪治安部合并为伪内政部，专管政厅、盟、县、市属于汉人的事务。3.特设“回教委员会”，专管拉拢回族和联络西北回族工作。4.将伪产业、财政两部合并为经济部，以便统一管理征用战略物资。5.将伪司法部改称“司法委员会”，将伪交通部改为伪交通总局。随着行政机构的改革，主要首脑人员也有很大变动：调任民政部长松津旺楚克为“兴蒙委员会”委员长，调任吉尔嘎朗和察盟劝业厅长穆克登宝为副委员长，调任村谷彦治郎为主任顾问；原财伪政部长马永魁调任伪经济部长；原伪治安部长丁其昌调任伪内政部长；伪中央警官学校校长早坂冬男调任内政部次长；原产业部长杜运宇调任伪司法委员会长官，伪司法部次长藤井五一郎仍任伪司法委员会次长；伪交通部长金永昌仍任伪交通总局局长；新任蒋辉若为“回教委员会”委员长，李郁周为副委员长；伪总务厅长关口保离职，暂由金井章二兼，嗣后又调来武内哲夫任伪总务厅厅长；武内哲夫离职，又由次长前岛升署理伪总务厅厅长；原伪司法部长陶克陶，原伪牧业总局长郭尔卓尔札布调任“参议”，伪产业部次长藤公平调任顾问。这次机构改革是高桥参谋长到任后主持进行的。关于伪司法部改称司法委员会，因未设一个委员，所以称司法长官。我实在感觉不合理，提出应当考虑。高桥参谋长说：“这次机构改革，谁都说好，我看就这样吧，不用改了。”对于“兴蒙委员会”的设立，汉人方面啧有烦言，认为“蒙古政府”内不应再有“兴蒙委员会”之设；既设有“兴蒙委员会”，就应有“兴汉委员会”，才算公平合理。

1943年秋，又进行机构改革。因经济部所管业务特繁重，乃补充为经济、产业、财政三部，调任“晋北政府”长官田汝弼为经济部长，任吉尔嘎朗为财政部长，调杜运宇为产业部长，把原经济部长马永魁调任参议。调任“晋北政厅”民生厅长文画君为司法委员会长官，调任金永昌为最高检察厅长，特任穆克登宝为交通总署长。各部、会、局又配了次长，陈有声、陶克托胡（陶布新）为总务厅次长，恩和阿穆尔（张绍庭）为交通总局次长，图木勒巴塔尔（刘定一）为产业部次长，超苦拔都尔为“兴蒙委员会”副委员长，张子荣为经济部次长，赛吉尔胡为内政部次长。同时把“察南政府”改成“宣化省”，由张家口迁至宣化办公，把“察南政府”原址，做了我的“主席府”，调任“察南政府”长官陈玉铭为参议，原最高检察厅长刘继广调任为宣化省长。将“晋北政府”改称“大同省”，调任巴颜塔拉盟劝业厅长李树声为大同省长，将张家口市升格为“特别市”，归政务院直辖，任命崔景岚为市长。在张家口升格为“特别市”时，吴鹤龄认为张家口这个名称不好听，想改称“怡和浩特”特别市，用蒙文解释是“大都”的意思。而用日文翻译过来，“怡和”二字是很不体面的意思，日、蒙等人都说不好，因而未改。为了在行政上配合日本帝国主义西进的企图，特在包头设置“西部临时行政区”，将包头市、萨拉齐、安北、固阳三县划归“西部临时行政区”管辖，由伊盟盟长阿拉坦鄂其尔兼任该区长官，与伊盟公署合并办公。阿拉坦鄂其尔这个盟长，由仅管准格尔、达拉特二旗河北局部地区，一跃兼上管辖三县、一市的长官，从此有地盘、有收入，有警察队的武力了。巴颜塔拉盟盟长补英达赖，因失掉了包头市和萨拉齐县的管辖权，甚不满意。再把省、盟的官房、民政、畜产、警务各厅的编制一律改为总务、民政、实业、治安等处，并把厅下科的编制也改为股的编制，缩小了行政组织。

“蒙疆联合自治政府”成立时，已确定张家口为“首都”。按常理说，也应把最高军事机构同时迁到“首都”，保持军事和政治的联系，但“蒙古军”总司令部仍在厚和。日本军部把“蒙疆”的军、政最高机构分开是别有用心的：一是“蒙古军”各师部署在包头、百灵庙一带，把总司

令部设在厚和就便于指挥；二是日本军部知道“蒙古军”是我的后盾，把最高军政机构分设两地，就减少我和带兵军官的接触，割断我和军队的联系，不能依据政府组织法“主席”统率军队的规定过问军事。特别是自从我和李守信秘密勾结蒋介石事件败露后，对我和李守信更不放心。因此，让李守信常住张家口执行副“主席”的职务，把我和李守信当作军事、政治上的傀儡，便于日本人一手操纵“蒙古军”的指挥权。我为了把军事和政治联系起来，吴鹤龄也想伸手抓军事、行政权，想在伪政务院下设“军政部”或“军事部”，日本军部仅准设立一个“军事联络部”。结果就这样决定了，“从蒙古军”调来突布格日勒（乌云飞）中将为部长，下边配备几个校级和尉级军官，办理有关军事联络事宜。这等于“蒙古军”总司令部驻张家口的一个办事处，什么实际权力也没有，是一个有名无实的军事机关。

（四）“主席、副主席”的改选和调动

按照“蒙疆联合自治政府组织法”的规定，主席、副主席的产生都要经过推选程序。但在1941年春，不知为了什么缘故，金井章二提出将夏恭副主席“依愿免官”，给予“前官礼遇”，调任为大同炭矿理事长。

迨至吴鹤龄当上伪政务院长后，看见夏恭“依愿免官”，“副主席”出缺未补，就想向掌握军事实力的李守信买好，就同我商量趁着这个机会，向日本人提出要求由蒙古人当“副主席”，我表示同意后，他就向金井章二提出这个意见。金井章二不客气地答复说：“你们要求蒙古人当副主席，要是晋北民众不向政府纳税怎么办呢？”吴鹤龄又向日本军部说，日本军部认为给李守信一个“副主席”的位置，便可常驻张家口，“蒙古军”司令部的日本人更便于工作。这样金井章二才表示同意。吴鹤龄为了符合“政府组织”法推选的规定，特向“察南”“晋北”两个“政厅”要求拥护李守信为“副主席”的推选书，于是李守信便算合法当选为“副主席”了。吴鹤龄为了拉拢李守信，不仅为他奔走“副主席”的位置，还把李守信的亲信旧部刘继广、李树声、崔景惠等安排在伪省、市长的位置。

这些人经常在李守信的公馆进出，关系非常密切，引起我的秘书朝克巴达尔夫的怀疑，提醒我说：“近来吴院长和李副主席走得非常密切，不知在搞什么？我是很注意这个事情。”但我认为吴鹤龄和李守信接近，无非是互相利用，还不致对我有不利的行为，因此，并未介意。

按照“蒙疆联合自治政府组织法”的规定，“主席任期三年”。我这个“主席”到了1942年8月底任期已满。因我认为仅由正副主席“互相推选”的形式，既不“体面”又不“隆重”，坚持应当召开第五次“蒙古代表大会”进行推选。日本方面大桥忠一也主张召开。于是同年8月31日在张家口召开第五次“蒙古代表大会”，推选我连任“主席”，于品卿、李守信为“副主席”。我发表了下面的就职讲话：“兹承蒙古大会推戴我为蒙古自治邦政府主席，深感责任重大，如临深渊。唯有不计功过，竭力奋勉，达成历次蒙古大会之使命，而符全体官民一致拥戴之殷情。大东亚战争系东亚解放之战争，我邦素与大日本帝国及满洲帝国有密切不可分之关系，辐车相依，休戚与共，协力完成兴亚大业，为我全体官民应尽之义务。必须坚定信念，精诚团结，一心一德，努力迈进，以期邦基之安定。”

六、日寇通过“蒙疆政府”对蒙汉人民的血腥统治

伪“蒙古”“察南”“晋北”三政权合并后的“蒙疆联合自治政府”，如从年号、旗帜和组织上看，摒弃中华民国年号，应用成吉思汗纪元；不用中国的国旗，只制四色七条的政府旗帜；保有“政务院”和七部的编制，俨然“独立”状态，脱离了中国的版图。但实际上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各方面均受日本帝国主义的严格控制，变成了日本的殖民地。随着合并后的伪政权的建立，更进一步加深殖民地化。日本帝国主义通过“蒙疆”各级政权对蒙、汉各族人民进行了血腥统治，哪里有半点独立的味道！

军事上镇压

日本帝国主义把“蒙疆”作为侵略中国西北的前哨，进攻苏联、外蒙的基地，特派一个兵团的兵力，分驻各地，把大部分兵力部署在包头一带，准备伺机进犯西北；把一部分兵力分驻张家口、大同、厚和（呼和豪特市）及其他重要地点，用以镇压各族人民。在张家口设立“蒙疆派遣军司令部”，负责统一指挥，并在张家口、大同、厚和、包头、多伦、百灵庙、贝子庙、西苏尼特旗、西乌珠穆沁旗等地设置日本特务机关或日本宪兵队，搜罗地痞流氓充当特务。因而特务遍布城乡，打入机关团体学校中，监视人民的言论行动，刁难商旅，调戏妇女。当时“巴颜塔拉盟”副盟长墨尔根巴图尔曾和我说，有个日本人（忘其名）率领警察特务搜查户口，竟把几个妇女关在屋中，迫令脱去衣服，赤身露体，供其玩耍作乐。我听见这个事情，曾请金井章二追查法办，当时金井章二也答应了。但过了几天，金井章二即对我说：“这个人已经应征入伍，无法追查了。”至于日本人带警察下乡，勒索、奸淫更是层出不穷，也从未听到受过什么处分。但在这一时期，曾发生日本军部逮捕据说是“违反纪律”的“蒙古军”第九师十几名士兵，处以枪决之事。该师师长包海明认为士兵不守纪律，应当归由本师处理，日军不应越俎代庖。当向“蒙古军”总司令部报告并请转向日本军部交涉，对越权处决该师士兵的部队长，给予应有处分，并且声言如不做公平处理，他就要带领该师士兵拉出去，激愤异常。经李守信转向日本军部交涉，高桥参谋长反说：杀了违反纪律的蒙古兵是应该的，对擅行杀戮的日本部队长竟纵容不究。李守信处在日本军的压力之下，只有忍气吞声，息事宁人。这充分说明，在日寇统治下，日本人做出无法无天的事情，可以逍遥法外，所谓“违反纪律”的蒙兵，便要受到极刑。

1939年冬，傅作义军反攻包头，包头几乎失守。日本南支派遣军参谋长板垣征四郎特来视察，岗部司令官和金井章二陪同到包头、厚和，我

听到后也乘飞机赶到厚和和板垣会见。当时包头日本驻军小岛部队长，为了推卸防守有欠周密的责任，推说包头内部有“通敌分子”，泄露机密，这是“政府”所管警宪防查不周所致，不是战斗部队日本驻军的责任。金井章二是政府的最高顾问，面对岗部司令官也推卸责任说：“中国军队的反攻，正是日军调动之时，一定有人给敌人供给情报，李总司令（指李守信）可能知道，并且应负一定的责任。”李守信也不相让，说：“带兵官的调动，军队的换防，这是常事，并且都是秘密进行的，敌人何以知道？我听说，敌人反攻时，包头的商务会给敌军驮运烙饼做给养，内部也有‘通敌’人员给敌军送消息，这是政府所管警宪防守不周的责任，与蒙古军无关。”这样推来推去，结果反而是包头地方倒霉。在小岛部队长主持下，逮捕各界人士甚多，计有伪包头市公署职员王文治等。金井当向我说：“在调查‘通敌’案件中，发现包头市长刘继广也有重大嫌疑，可能牵连在内。”我向金井说：“刘继广曾当过蒙古军第一师师长，在绥东战役和进占绥远出过力，就是他与是案有关，也应当顾念他过去的功劳，免予深究。并且他当过中将师长，军级很高，现在仍当包头市长，很不适当，应当设法调转职务，可否调他为最高检察厅长，请您考虑。”金井当时表示尊重我的意见。果然，不久，就发表刘继广为“最高检察厅长”。我为刘继广解脱，是从私人情感出发，希望他感恩图报，为我效力。至于其他被捕的爱国人士，有的判处死刑，有的判处徒刑，饱尝铁窗滋味，我就置若罔闻了。1940年春，在我通过军统勾结蒋介石案件中，刘长荣、吴君玉、杨金声被判处死刑，贺云章被非刑拷打死于狱中，梁芝祥、肖兆庚被判处徒刑，前已述及，兹不赘述。值得一提的是在抗日救国联合会的案件中，日伪宪警逮捕教育界人士和学生多人，受非刑拷打折磨而死者100余人，至日本投降，张家口第一次解放，得庆生还者仅20余人。对此案件我始终未曾过问。约在1944年，张家口日本宪兵队又将曾当过“蒙古军”第二师师长的尹宝山和陈生建逮捕下狱。这时因我勾结蒋介石案件暴露，自知有短处，深恐招致日本人的疑忌，就连要求宽恕也未敢正面进行，只是暗地设法营救，结果由李守信花了六万多元，买通张家口日本宪兵队长，

才把尹、陈二人释放。但尹宝山因遭非刑拷打，已成残废，在北平德国医院身死，陈生建也落了个孱弱的病体。还有百灵庙特务机关曾将乌盟茂明安旗札萨克奇默特色楞好若劳，以勾通外蒙的“罪名”逮捕，囚禁在特务机关内拷问取供。奇王被逼不过，自杀身死。以上几个案件，是我所知和所闻的事情，至于被日寇加以莫须有的罪名而残害的无辜人民就更多了。

日寇常以“确立治安”为名，抽调日本机动部队，配合“蒙古军”、警察队“扫荡”八路军，特设置重点于龙关、赤城、延庆和大青山一带山地，到处执行杀光、抢光、烧光的“三光”政策，杀害人民，惨绝人寰。八路军为了保护人民，常和日伪军警展开游击战，打死打伤日伪军警很多，就是日本的将级军官和警监也被打死过几个。因为死一个日本将级军官，就得举行一次“慰灵祭”，迫令“蒙疆机关”、团体、学校的职工和市民参加。我这个“主席”或“政务院长”就得前往致祭。记得在1944年的一个时期内，日本张家口警备司令官某中将（忘其名）被八路军打死，就以“光荣战死”的名义，举行过一次“慰灵祭”。因为连续举行“政务院葬”，“蒙疆政府”的礼堂，一个时期变成了葬礼场。最使人可笑的是日本人弄虚作假，自欺欺人。当时日本军部有一个日本天皇裕仁的弟弟北白川宫殿下，在张家口清河桥侧观看空军演习，被一架飞机失事坠落砸死，这是有目共睹的事情。而日本军部却说北白川宫殿下以金枝玉叶之身，“转战蒙疆各地”，“光荣战死”，就举行“慰灵祭”。驻在中国各地的日本派遣军的参谋长都来参加，并在张家口为北白川宫殿下建立纪念碑，迫令各界人民经过碑前，都要鞠躬默哀。各界人民在日寇淫威之下，只有绕路而过，表示消极抵抗。

日寇在“蒙疆”的主要城镇和交通要道，均派有日本军警把守，对来往行人严加搜抢，无理非难。又时常调查户口，夤夜闯入民宅，持枪恫吓，任意搜翻。还强迫实行保甲连坐法，一人有事，全村不安。压迫人民最狠毒、最凶恶的是日本宪兵队，假如被当成“国事犯”抓到宪兵队去，便受灌凉水、压滚杠、辣椒面熏、铁条烙、军犬咬、钉子钉穿脚骨等非刑拷打。当时蒙汉人民称之为阎罗殿，无不畏之如虎。总之，当时蒙汉人民

处在日本帝国主义淫威之下，真如日处愁云惨雾之中，人人提心吊胆，昼夜胆战心惊。

政治上控制

日寇在政治上所采取的策略，首先是找寻蒙汉败类，作为帮凶。其用人原则，对蒙旗是尽量拉拢封建王公阶级，如我和雄诺敦都布、松津旺楚克、郭尔卓尔札布、卓特巴札普、穆克登宝等，不是王公出身，就是旧时总管。对于地方蒙旗更是沿袭封建制度，任用封建王公担任盟长、札萨克职务。对于汉、回族尽量利用地主豪绅和工商业资本家等上层阶级，如于品卿、贺秉温、马永魁都是。资本家夏恭、田汝弼是晋北一带的地主豪绅，王英是后套的恶霸地主。对于旧时官僚政客和军阀也是网罗利用，如吴鹤龄、李守信、蒋辉若等。至于留学日本的亲日分子，也给予高位，如杜运宇、陶克陶、吉尔嘎朗等。日本统治“蒙疆”将近十年，就是通过这一类人作为帮凶。其次是政治上分化。日寇在表面上标榜“民族协和”，作为欺骗性的宣传，暗地使用挑拨离间伎俩：当着蒙古族人说汉族人不可靠，应由蒙古族人当权；当着汉族人说蒙古族人低能，应由汉族人执政。记得杜运宇就向我说过：“日本人对我说，如果不是我们日本人居中控制蒙古人，蒙古人对汉人的压迫统治更厉害呀。”并把当地人划分为蒙系、汉系、回系、满系，分别对待和使用，以期在日本人操纵指使下，达到互相牵制，供其利用。其三是“日本人中心主义”。在各级政权及各会社公司中，日本人自成一个统治的系统，掌握一切权力。凡是重要事情和机密文件，都是由日本军部或“兴亚院蒙疆联络部”通知“蒙疆联合自治政府”最高顾问或伪总务厅长，由伪总务厅长通知各伪部局会次长、各省、盟公署次长或参与官，各公司或会社的日系负责人，再由伪省、盟公署下达各旗、市、县日系参事官或顾问做秘密处理，不使当地人首脑知道。其中有的事情，需要当地首脑讲话时，给他做出文稿，让他当众宣读。所以各级伪政权、机关首脑，大都成了签名划行的傀儡，有时仅起传声筒的作用。就是特别接近日本方面的金永昌、陶克陶、杜运宇之流，也不能参加

日本系统的会议。卓特巴札普身为伪政务院长兼察哈尔盟盟长多年，如果问他伪政务院的事情，什么也不知道。有时他到伪察哈尔盟公署去，还先给伪盟公署顾问送名片，说是我上班来了。结果博得日本顾问称赞，说："达吉（卓字日文译音）桑是伟大。"

经济上搜刮

日本从经济上把"蒙疆"作为吸取原料、销售商品、输出资本的殖民地。日本国内垄断资本家，为了赚取高额利润，就地廉价采购原料，招雇低价人工，特在"蒙疆"设立株式会社或股份公司，直接操纵经济命脉。据当时日本出版的昭和十七年度《北支蒙疆年鉴》记载，除京包铁路由华北铁道株式会社直接管理经营外，由"蒙疆政府"直接统辖的计有"蒙疆银行"、大同炭矿、龙烟铁矿、电业会社等株式会社九所，准特殊会社10所，普通会社58所。其中，"蒙疆政府"出资占总数31%，"蒙疆银行"出资占10%，日本出资占总额57%，现场工地出资占总数2%。并且各会社的理事长或经理，绝大多数由日本人担任，其中虽有少数会社由蒙、汉族人担任理事长，也是由日系副理事长总揽大权。不但金融、电业、交通、煤矿、铁矿、畜牧等重要资源控制在日本人手里，就是食品、石油、烟草、面粉、洋灰、砖瓦、木材、火柴等也都由日本人掌握。特别是由"蒙疆政府"公布"鸦片管理令"后，设立"清查总署"，组织"土药公司"等机构，公开收购、贩运鸦片，而鸦片组合和烟馆更是普设城乡各地，以搜刮和毒化人民。各伪县市公署还在城镇设立官营赌博场，美其名曰"俱乐部"，公然设赌抽头，聚敛民财，因之倾家荡产者不知凡几，投河上吊者也不乏人。自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军费开支浩繁，日寇更巧立名目，增加税收，把这沉重的负担转嫁在沦陷区人民的身上：特公布"集谷管理令"和"家畜搬出取缔法"，强行粮谷"集荷"，垄断收购农牧产品，用极低的价格收购，残酷掠夺人民财富。而主管其事的伪官和奸商，从中压等压价，中饱私囊。大米、白面等细粮，拨归日军军用和日本人食用，当地人民只配给掺沙掺假、发霉的杂合面。还强行"棉布统制"，

收购价格甚低，出售价格甚高，黑市价格更昂，广大劳动人民无力购买，以致饥寒交迫，无以为生。牧业地区牲畜头数逐年下降，严重影响了牧民的生活。

文化上麻醉

日寇毒化蒙汉人民的思想、麻醉知识青年的手段，可以下列几方面说明：（一）实行奴化教育。以所谓“亲日防共”“民族协和”“发扬东亚道义精神”为教育方针，在学校中每日清晨举行“升旗典礼”，先向东方遥拜。经过日军岗哨，必须向“皇军”敬礼。通过日本“神社”，必须鞠躬致敬。每逢日本“天长节”等节日到来，各机关、团体、学校必须放假，悬挂日本国旗，举行“纪念仪式”。为了实行“工业日本、农牧业蒙疆”的侵略政策，仅准设立农牧业中等学校，禁止设立工业中等学校。（二）实行分化和同化教育。在中小学课程设置上，日文每周占七至十小时，而汉文或蒙文仅占三至五小时。专收蒙族学生的学校，限于学习日文和蒙文，不学习汉文。当时有的蒙古族人主张应学汉文，日本人说：“汉人文化不如日本文化高，与其学汉文不如学日文吸收现代知识快。”另外，在专收汉族学生的学校，限于学习日文和汉文，不准学习蒙文。更尽量设置日语补习学校、日语进修班等来普及日语，就是想用普及日语的方法，达到同化蒙、汉、回各族人民的目的。用限制学习蒙文或汉文的方法，阻止蒙、汉、回各族人民自然融合。（三）在张家口设立“蒙疆学院”，在伪省、盟所在地设立“官吏养成所”或“训练班”等，对现职官吏从政治上灌输奴化思想。为加强亲日教育，并组织“蒙疆兴亚协进会”“蒙古兴亚协力会”“蒙疆青年兴亚同盟”等团体，笼络各界人士，麻醉各族青年。更在城乡广泛组织“劳动奉公队”，强迫人民负担修公路、修工事等沉重的义务劳动。（四）利用喇嘛教、佛教、道教、天主教、耶稣教、回教、红十字会、青帮、一贯道、纯一善社等宗教团体和反动会道门，麻醉人民思想，进行特务活动。（五）设立弘报局、放送局，发行“蒙疆新闻”“蒙疆新报”“蒙疆通讯”等报纸杂志等，经常组织电

影宣传班，深入农村牧区巡回上演，大肆进行“亲日防苏、蒙日亲善”等反动宣传。自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后，更尽量宣传所谓“建立东亚共荣圈”“建立东亚新秩序”等，企图从人种、肤色、地域上来麻醉和欺骗人民，从而支援日本，反对美、英。

以上是日寇通过“蒙疆”各级伪政权对蒙、汉人民的血腥统治。我是“蒙疆政府主席”，当然是难辞其咎的。

我对于日本强加于蒙、汉人民的统治，做了很多的帮凶事情。择其要者，有如下列各端：

（一）调动人力，支援日本帝国主义发动所谓“大东亚战争”

1941年12月7日，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太平洋战争。“蒙疆自治邦”政府为了动员全部人民支援战争，特由伪政务院长吴鹤龄起草，以我这个“主席”的名义，于1942年1月19日颁发“兴亚教书”如次：“成吉思汗纪元七百三十六年十二月八日，盟邦大日本帝国天皇陛下，对美、英颁发宣战大诏。鉴于本邦与日本帝国有特殊密切关系，应一致努力，誓共休戚。况大东亚战争之开始，乃大东亚解放之天机，本邦为大东亚共荣圈之一翼，须尽共同奋斗之责任。凡我邦官民应愈加巩固团结，发挥总力，内竭奉公之诚，外尽协力之义，迅速完成兴亚大业，是所至望。”随着这个“兴亚教书”的颁布，就借口“确立治安”，加强“剿共”，从而搜刮战略物资。由于战争范围的扩大和战争局势的紧张，对蒙、汉人民的压榨，就愈加残酷。

过了一年，为了响应汪精卫政府参战（对美、英），仍由吴鹤龄起草，以我这个“主席”的名义，于1943年1月19日，颁发第二次“教书”如次：“维我盟邦大日本帝国，为求大东亚共荣圈之确立，以期东亚各民族、各国家共存共荣，业于成吉思汗纪元七百三十六年十二月八日对美、英宣战。本邦与大日本帝国夙有特殊密切之关系，为大东亚共荣圈之一翼。曾于成吉思汗纪元七百三十七年一月十九日颁发‘兴亚教书’，以期一致协力此次战争，与盟邦大日本帝国，誓共休戚。现在开战一年，大日本帝国业经取得赫赫之战果，美、英侵略东亚之势力殆将净尽。中华民国

国民政府（指汪伪政府）亦于成吉思汗纪元七百三十八年一月九日，布告对美、英两国宣战，披沥同生共死之诚，誓协力大日本帝国，由此大东亚战力更进一层强化，增添战争前途之光芒。我邦官民必须遵照兴亚教书之主旨，发挥总力，继续奋斗，各尽其责，确立治安，增强生产，以期本邦之隆昌。更应全力以赴，赞助盟邦，协力战争，排除万难，歼灭东亚之公敌，确立东亚共荣圈，是所至望。”因此，又开展以“确立治安，增加生产”为中心的罪恶活动，使各级伪政权机关整备警察队，编练“靖乡青年队”，加强乡镇街村伪基层组织，实行“保甲连坐法”，进行“剿共”。更加强化粮谷“集荷”，强迫“劳动奉仕”，并由“蒙古兴亚协力会”开展献机、献铜、献铁运动，支援日军作战。

（二）坚决防共

我在防共方面，不仅表现在言论上，而且表现在行动上。例如，在“蒙古联盟自治政府”时期，就把“防共”定为基本方针，“蒙疆联合自治政府”成立后，又把“防共”定为施政纲领，当众讲话时，更强调蒙古地区“防共”的特殊性。当“蒙古军”配合日本“剿共”时，我总是谆谆嘱咐带兵官努力完成“剿共”任务。特别是日本帝国主义在太平洋战争失利时，我为了巩固反动统治，谋求将来的出路，竟依照蒋介石对我“训练军民，忍辱负重，以待将来”的指示，有组织、有计划地扩编军队，组织武装，准备向八路军争夺胜利果实。

（三）进行民族分裂

我总认为“蒙疆”原来是蒙古地方，蒙古人是这个地方的主人，把汉、回人民当作异族看待，蒙古族应在其他各族之上。因此，在“联盟政府”时期，凡属伪政府处长以上的官员，都不肯任用汉族人，选送留日学生一律限于蒙古族族人。“联合政府”时期，选送留日学生蒙、汉、回族人数虽然有一定比例，但蒙古族人仍居多数。我曾想把铁道以南的蒙古族人移至铁道以北，把铁道以北的汉族人移至铁道以南，来一个蒙、汉大搬家。“兴蒙委员会”开会时，我又策动亢仁提出我这个意见，并把土默特旗青年分期分批移到纯蒙旗地带，学习蒙文蒙语，免受汉族“同化”。

亢仁等认为这样做，很易惹起麻烦，没有按照我的意图提出建议而作罢。在“蒙疆联合政府”时期，察盟参与官简牛耕三郎主持实行旗、县划界，我极力赞成，有的主管人不愿把蒙旗地方划归邻县，我曾力劝他们忍痛割爱，要为“长远”打算，现在宁肯失掉一些地方，可是从此割断汉民的移入，保持蒙旗地带的“纯洁性”。结果这次旗、县划界实行了。由此可见，促使蒙、汉分家，防止民族交流，我是有过于日寇而无不及。

（四）维护封建制度

日本在东北制造伪满洲国以后，特颁布“旗制实行令”，将札萨克制度改为旗长制度，把王公世袭政权逐渐转为地主阶级政权。但在“蒙疆”的做法，是极力维护封建制度。1940年8月29日至30日“蒙疆联合自治政府”召集各盟旗的盟长、副盟长、札萨克、总管等在张家口举行“蒙古会议”时，最高顾问金井章二在讲话中宣布：“蒙疆特殊区域的社会构成，是纯蒙地带，蒙旗制度，社会制度和历史沿革。因此，维护社会构成的阶级制度，是尊重现行札萨克旗制的存续。”

日本维护封建制度的措施，当然我是同意的。为了延续封建制度，还发表了“宣言”和“纲领”。

“宣言”原文如次：

> 我们祖先奄有欧亚版图，创立君临世界之大帝国，有光辉之历史。唯自元以后，势力衰微，不如往昔，然仍坚持蒙古民族之传统。近二十年来，更受边吏军阀百般之压制，缅怀太祖，自觉赧颜，不敢再事因循苟安。云王等各位先进，曾在百灵庙发起自治，但议民族复兴，复在友邦大日本协力之下，举‘防止共产，协和民族’之大旗，作复兴蒙古之前驱。我等应继承其衣钵，内则同心和爱，外则敦睦邦交，是我等自觉之使命。进而发展生产，增殖人口，振兴教育，致力厚生事业，拥护政府主席，建立东亚新秩序，发扬东亚道义精神，太祖有灵，当护佑之。

“纲领”的序文如次：

①我等缅怀太祖之伟业及发扬其传统精神，谋求民族之复兴。②我等巩固团结与友邦提携，以强化“防共”战线。③我等力求吸收世界知识，促进文化之发展向上。④我等勤俭自持，励精图治，促进生产之兴隆。⑤我等力求厚生事业之发展，以期民族之繁荣。

东乌珠穆沁旗札萨克多尔吉横征暴敛，压迫旗民，引起旗民之反对，下令将其免职。但唯恐动摇封建制度，仍令他的很小的儿子继任札萨克，叫多布丹暂时护理札萨克职务。乌盟乌拉特中旗札萨克林庆僧格当了盟长，呈请准由他的儿子雄诺继承札萨克职务。其子年龄尚幼，不合惯例，“兴蒙委员长”吉而成朗向我请示处理办法，朝克巴达尔夫趁机向我建议说：“蒙旗王公世袭的封建制度，应当逐步改革，现在应当把王公爵位和札萨克分开，实行袭爵不袭职。”我婉言谢绝了。吴鹤龄也坚持沿袭旧的封建制度，不应骤然变更，因而林庆僧格的呈请亦被批准了。由于日本当权者宣布尊重蒙旗的封建制度，不仅札萨克旗制一直没有变，还想把察哈尔有的总管也改为世袭。例如卓特巴札普因为自己当伪政务院长兼察盟盟长，呈请准叫他的年龄幼小的儿子任为明安旗总管。我起初还表示不肯，深恐引起该旗人士和青年人的不满，但经不起卓特巴札普一再请求，并为了敷衍他的面子及调和我们二人之间的矛盾，也就默认了。但青年职员啧有烦言，因而又以不到年龄为理由，准许他的儿子为记名总管。

我虽忠于日寇，只因在某些问题上有过意见，反招致日本军部和“公使馆”的不满。记得在召开第五次“蒙古大会”推选主席时，中岛万藏向我透露消息说：“岩崎公使曾对我说过，德王这个人老是不听话，总是嗷嗷不休，换另一个人代替他为主席不行吗？”日本军部政治参谋大桥雄熊是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的典型，有时就把本来的狰狞面目暴露出来。有一次，在“远来庄”饭店请他便宴，在谈话中涉及有关蒙古的事情，希望得

到他的支持，不意他却以很不耐烦的样子说："你老是蒙古蒙古的，蒙古干脆灭亡就得了。"我的秘书胡克金太知道这话不是滋味，不敢翻译给我听。我因与日本人时常接触，也能听懂一些简单的日语，知道他所说的意思，我这时却有了"涵养"，装作不知。

七、支持吴鹤龄与"蒙疆"垮台前夕的挣扎

我支持吴鹤龄当上伪政务院长以后，曾做了下列几件事情。

（一）设立"蒙疆豪利希亚"

日本既从军事上、政治上控制"蒙疆"，又从经济上成立"大蒙公司"和"蒙疆畜产公司"，收购牲畜皮毛，运售日用物资，从中获取高额利润。吴鹤龄为了抓经济权，特把原有的"蒙古生计会"加以整顿，仍由他兼任会长，聘请中岛万藏为顾问，在蒙古生计会之下，设立"豪利希亚部"，在各旗一律组织"豪利希亚"，经营收购牲畜皮毛并运销日用百货业务。这事着手进行以后，察盟参与官简牛耕三郎为了维护日商的利益，特提出反对意见说："蒙古王公们现在组织豪利希亚，是想从中获利当资本家。"我和吴鹤龄听到这话以后，便规定蒙民每人入股至少10元，至多3000元，来抵制日本人的反对。"豪利希亚"设立以后，吴鹤龄究竟从中赚了多少钱，我无从知其底细。他的亲信人员罗励甫可是发了大财。听说在北京就买了多处房产，并设立聚义银号。吴鹤龄对罗励甫不仅未加责斥，反尽力庇护和代为遮掩，时常夸说罗励甫如何能干，能办到别人办不到的事情。因为我支持吴鹤龄，曾引起日本军部的怀疑，冈村参谋就曾问过陶克陶："德王很支持吴鹤龄，是否他们二人有经济关系。"陶克陶答复说："德王支持吴鹤龄是政治关系，还不至于有经济关系。"这话是陶克陶向我说的。

（二）设立"蒙古留日预备学校"

我支持吴鹤龄设立这个学校的目的，是想培养忠于我们的人才，取

得蒙古族知识青年的拥护。先组织一个“蒙古留日学生后援会”，由松津旺楚克为会长，继而设立“蒙古留日预备学校”，由吴鹤龄兼任校长，莎音托布任主事，主持招收蒙古族青年，着重学习日本语文，补习一个时期后，便送往日本留学。这个学校确定是私办官助性质，资金来源大部分是“蒙疆政府”补助，少部分是私人捐献。我将“蒙古联盟自治政府”时期划拨尚未花用的“蒙人教育复兴费”五万元拨作该校基金。这时恰巧日本军部给我五万元，也悉数拨作该校基金。我将此款拨交吴鹤龄后，还向金井章二说明此事，金井说：“这是军部给你的钱，你怎么处理都可以。”同时，这个学校计划在10年期间，筹集基金1000万元，保送蒙古族留日学生1000名。我认为计划送这么多的留学生到日本去，是促进“蒙日亲善”的具体表现，必然得到日本方面的好感。不意金井听到以后说：“用这些钱，送这么多留学生到日本去，是给日本增加负担，对日本没有什么好处，因为在日本的留学生多是抗日的。”

（三）制订“蒙旗十年建设计划”

这个计划是吴鹤龄起草的，预定分期分批建设“蒙古新村”，其中的中心新村预定设在旗公署所在地。中心新村内政治上有旗公署，经济上有豪利希亚，文化上有中心小学，军事上有保安队，形成每个旗的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并于1943年组织三个“蒙旗建设队”，分在锡盟苏尼特右旗、察盟镶黄旗、乌盟的四子王旗开始建设。所有建设资金悉由“兴蒙委员会”支给，不叫所在蒙旗负担。我是尽力支持这个工作的。因为我和吴鹤龄及一部分蒙古中上层职员，认为蒙旗是我们的政治资本和根据地。并且日军在太平洋战争中已走下坡路，一旦失败，我们在蒙旗建设一些据点，好做东山再起的根据地，继续统治蒙古人民。

吴鹤龄虽然费尽心机，培植个人势力，拉拢晋北人士（如田汝弼、文画君等）和察盟总管（如穆克登宝、包楞那木济勒、阿由尔扎布等），想着巩固伪政务院长地位，但其为人度量狭小，骄傲自大，排除异己，特别是利用罗励甫等亲信，经营“蒙古生计会”和“豪利希亚”，从中赚钱肥己，更招致非议。被其打下擂台的陶克陶，调到伪司法部清水衙门的金

永昌，前伪政务院长卓特巴札普等，对他素即不满，便趁机起而攻击。补英达赖认为自己是蒙古“元老”，企图争取伪政务院长的地位。杜运宇为“亲仁会”[1]首领，察南一带颇有势力，因调动职务关系，对吴鹤龄已有不满。吴鹤龄的妹夫乌古廷，时任“蒙古军”总司令部参谋长，依仗吴的势力，把持军权，又使李守信与吴亦不无芥蒂。于是这几个人便联合起来攻击吴鹤龄，揭露“蒙古生计会”和“豪利希亚”的黑幕，由陶克陶出面向日本军部冈村政治参谋告密。冈村对于吴鹤龄把持政权和乌古廷把持军权的所作所为早已不满。恰在这时，乌古廷和其四弟乌臻瑞（伪第七师参谋长）在德化一带私购大批鸦片，乘坐汽车前来张家口，被日本宪兵队扣获。冈村得到这个把柄，便来向我告知。我认为既然冈村参谋长正式提出这个问题，不能等闲视之，就转向吴鹤龄商量说：“乌古廷这个人既不能令，又不受命，现在又出了私运鸦片的事情，就得撤换他的参谋长。”吴也同意，经我俩研究结果，认为包海明向与潘井顾问关系密切，不会得到李守信的同意，便决定叫宝贵廷继任参谋长。吴鹤龄失掉了掌握军权的乌古廷的支持，陶克陶等便群起攻击，更成了众矢之的。冈村参谋还采用陶克陶的建议，特把补英达赖找到军部，面许叫他当伪政务院长，用这个方法来抵制我支持吴鹤龄。补英达赖这时升官心切，既然得到冈村参谋的默许，就来见我说：“这回吴鹤龄下台，政务院长该轮到我了吧。”我只有默不作答。嗣后我又到日本军部与中川参谋长和冈村参谋商量伪政务院长之事。他们表示要我亲上第一线，主持“政务”。于是吴鹤龄便在各方攻击和日本军部胁迫之下，离开伪政务院长职务，由我兼伪政务院长。我为了维护吴鹤龄颜面，满足补英达赖的政治欲望，特在伪政务院之下，各伪部会局之上设置内务、军事、经济、司法四个长官，由吴鹤龄任内务长官，负责指导兴蒙委员会、内政部、回教委员会的事务；由副主席于品卿兼任经济长官，负责指导经济、财政、产业、交通各部局的事务；由副主席李守信兼任军事长官，负责指导军事、保安等事务；由补英达赖任司法

① 亲仁会——日本授意杜运宇组织的亲日团体。

长官，负责指导司法委员会、各级法院及检察厅事务。吴鹤龄因此却一气去了北平。补英达赖颇为满意，向人表示说："我现在总算和两位副主席平行了。"这一场互相倾轧、互相排挤、争权夺利的内部纠纷才算结束。

我在未兼伪政务院长以前，日本人麻生达男（蒙名麦德尔札布）、猪口和玛尼巴达拉等从伪满洲国来张家口，募集在王爷庙建筑成吉思汗庙经费，我在官邸宴请他们。宴后麦、猪两个日本人走了，我和玛尼巴达拉、朝克巴达尔夫等密谈关于日本失败后怎样谋求出路的问题。我们认为，日本失败后，国民党的军队必然反攻过来。趁着这个机会，东、西蒙要联合起来，共同谋求出路。至于集中地点，认为王爷庙偏东，张家口偏西，约定以林西、林东、经棚一带为集中地点。日本一失败，我们就把东西蒙的军队力量集中到这一带，组织建立一个"蒙古自治国"。

我兼伪政务院长以后，日本帝国主义在太平洋战争上连连失利，德国在欧洲战场上也是节节败退，第二次世界大战谁胜谁负已见分晓。我便依照和玛尼巴达拉的约定，组织力量，企图做最后的挣扎，谋求将来的出路。

（一）组织武装力量

我一向是迷信武力的，便从下列几方面组织武装力量：一是把"蒙古军"以蒙古族人编成的第七、八、九各师及直辖骑兵队、炮兵队，加以整备充实，作为基本力量。二是把从"蒙古军"划出、改编为各盟、省伪靖安警备队的一、二、三师归还原建制，并将各市、县的伪警备队改编成十六个旅，作为机动力量。三是把各盟旗所属的保安队，改编为五个警卫师，由盟长兼任师长，作为盟旗地方的防卫力量。我这个计划，因涉及伪内政部警察管理权，招致内政部次长早坂冬男的反对。嗣经与日本军部几次交涉，才得到中川参谋长的同意。早坂冬男才无话可说了。并为了统一指挥，在伪政务院之下设立"军事部"，由李守信兼任部长，由崔玉堃和郭勒敏色为次长。这时我有计划地把武装力量组织起来，有两个企图：一是把隶属不同、力量分散的武装集中起来，掌握在我的手里，阻击八路军；二是把分散的武装力量组织起来，易于灵活调动到林西、经棚一带，作为东、西蒙古联合起来建立"蒙古自治国"的支柱。

（二）设立“行政统监部”

为了把伪政府的文职人员集中在纯蒙地带，备作日本失败后另谋出路为我驱使，特在察哈尔盟明安旗设立“行政统监部”。并派出一部分蒙古族职员，着手勘察地址，准备房屋，运送物资，备作第一步退守的根据地，第二步再向林西、经棚一带集中。

（三）处理日伪军警残杀丰镇县九宫道徒事件

1943年9月，伪丰镇县警察署派员下乡，催交公粮、逼要烟土，迫令连夜送缴，无力缴纳者都被严刑拷打。九宫道的道士李伍仁等起而抗辩，也被殴打，因此激起全村民愤，聚众1000余人，手持斧头镰刀，群起暴动，打死胡姓翻译一人，打跑了警察队，缴枪十余支。丰镇县又调派伪军警300余人，将暴动的民众包围，开枪射击，结果打死打伤的民众甚多，焚烧民房数间。这次残酷的镇压，民怨沸腾，我兼理伪政务院长后，认为这是收买人心的最好机会，便提出将伪丰镇县伪县长、日系参事官、警察队长惩戒免官，以平民愤。内政部次长早坂冬男还不同意，我是坚持非办不可。这时我因有事回旗，暂由李守信代理伪政务院长，临行前对李守信说：“假如对丰镇县长、参事官、警察队长不实行免职，我就不回来了。”这时日本人由于太平洋战争失利，对我的控制比前松些，早坂冬男也就再不坚持了，结果是按我的意见实行。伪警察队长安恩达被免官后，特到张家口见我诉说委屈。我认为他是李守信的旧部且今后尚有需用之处，便安慰他说：“你的委屈我知道。这个事情不是你主持干的，而是日本人主持干的，但你是参与人之一，不得不把你免官。希你善体我意，暂时忍耐，今后遇有机会还会重用你。”我当面又给他蒙疆伪币一万元。这是我用明惩暗奖的两面手法，阳则示好被害民众，阴则奖励杀人罪犯，希望今后更好为我效忠。

（四）召开县长、绅士会议

我知道日寇强行的粮谷“集荷”是最不得人心的事情，因此，开县长、绅士会议，提出整顿粮谷“集荷”问题。我讲话说：“自从实行粮谷‘集荷’以后，把民众血汗换来的粮谷‘集荷’起来以后，不加妥善保

管，任令人马践踏、风吹雨打，以致霉烂损失，实在对不起民众。”我说这话的目的，是希望取得与会士绅的同情，并且通过他们为我宣传，博得当地民众的称赞，意图日本失败后，不致反对我。我讲话之后，与会绅士多表赞同。嗣又谈到处理丰镇县九宫道事件问题，表示惩罚失职官吏，对死伤民众甚为痛心。集宁县绅士张某（系张书常之父）说：“丰镇县九宫道不幸事件的发生，德主席非常痛心。我建议在肇事地点建碑一座，上书‘罪在吾身’四字，这是主席下罪己诏的意思，用以纪念这次不幸的事件。”当时对他这个恭维性的建议，我很感舒服，对他极口称赞，他也自鸣得意。但是参与会议的伪内政部次长早坂冬男，听到我的讲话之后，甚为不满，向伪内政部长丁其昌说：“德主席在绅士会议讲话时，有反对粮谷‘集荷’的意思，是不愿再对大东亚战争协力吧。”虽然他这样疑忌和不满，但还未正式提出反对而惹起大的麻烦。

我正在积极准备退守之际，太平洋战局日趋紧张，联合国军连续轰炸日本本土，欧洲战局更是急转直下，苏联红军很快解放了柏林。接着就出兵东北，打垮号称百万的日本关东军，帮助中国解放了东北人民。日本天皇裕仁于1945年8月15日宣布向联合国无条件投降。苏军蒙军很快进至锡、察两盟，张北县城，八路军也迫近张家口周围。这时李守信正在张家口，给宝贵廷拍发急电，叫把“蒙古军”各师调至张家口和阳高县一带。因为铁路已被八路军切断，调动军队确有困难，同时宝贵廷为谋个人出路，打算投靠傅作义，也不愿执行我和李守信调遣军队的命令。驻在锡、察盟的“蒙古军”已被苏蒙联军缴械，张家口仅有少数伪警察队，日本军部对我表示他们业已奉命投降，希望我们自找出路，并由中岛万藏前来向我和李守信等说：“谁如愿去日本避难，日本军部可以为之准备飞机。”嗣由李守信向张家口渡边警备司令官询问可否去日本？他答说：“不行！我们日本已是战败国，对战胜国就得无条件服从。人家如果向我们要人，我国就得交出来。”这时在张家口的各伪机关蒙族职员，纷集我的官邸，有的主张南下投靠国民党政府，有的主张北上投向蒙古人民共和国，有的主张就地等待八路军解放，议论纷纭，莫衷一是。我这时也是徘徊不定，经与一

部分蒙古族职员商量，决定分向各方面谋求出路。当前最好先派代表向苏蒙联军试探接洽，结果就派定亢仁、朝克巴达尔夫、特木耳都克什为代表前往接洽。但因一时仓促，既未带证明文件，也没有俄语翻译，就连把在押的外蒙政治犯放出来充当俄语翻译和联络人这个事情都未想起来。同时也认为以“蒙疆政府”名义发给证明文件，苏蒙联军是否接受也是问题。亢仁等三人就仓促乘上汽车，和日本军部联络通过军事前线，前往张北与苏蒙联军进行联络。后来听亢仁说，他们到了张北就被当成俘虏拘留起来。原因是他们虽然见到了苏军上校瓦斯列克和蒙古人民共和国少将色恩道并说明来意，但瓦、色表示说：“你们过去既与苏蒙没有联系，现在又无具体表现，更未带证明文件说明你们的代表身份，日本虽然宣布无条件投降，而前方军队仍在对峙，这简直是把关于国际交涉的事情当成儿戏，无法承认你们是代表，只有把你们当作俘虏对待，暂时拘留起来。”从此，即与我失去通信联络。适在此时，苏蒙联军的飞机飞临张家口上空，散发传单，痛骂我是日本帝国主义的走狗，官吏们是日本帝国主义的爪牙，号召群众起来斗争。我认为联络苏蒙这条路已属无望，又不愿迎接八路军解放张家口，只有走投靠蒋介石这条路。恰在这时军统特务王野人、梁芝祥和国民党绥蒙党部特派员于福赓、杨润霖等前来张家口，拉拢我和李守信等投靠国民党，并由王野人给我和李守信送来军统局的电报，内容大意是：“兹经请准派德王为蒙旗先遣军总司令，李守信为热察先遣军总司令。希即重整军队，严防共军，如果武器不足，应即收缴日军武器，装备军队。台端训练军民，忍辱负重有年，现在为党国效忠，正是其时，务要保卫绥察蒙旗地方，勿使共军得逞。”这时吴鹤龄也由北平返张，劝我不要和外蒙联络，应即赴平设法与蒋介石接洽。我也认为我曾和蒋介石有过联系，可能得到他的谅解，因此就决定先去北平。并由超苦拔都尔拟具电报，电请蒋介石派来飞机，以便前往重庆，交由王野人派人送到北平拍发。日本人知道我要走，为了“酬劳”，特由中岛万藏给我送来几车大烟板子，共15万两，让我分一部分给职员，一部分归我花用。我因为野心未死，仍想东山再起，深恐临行时拿上几车大烟土，落一个贩卖大烟土客的

名声，对于我的政治前途有影响，并怕分赃不均引起争吵的麻烦，就拒绝未收。但临行时带了蒙疆伪币三亿元、银洋三万元，到北平后，除分给大家外，给我买了一处住宅。至于三万银元，中岛万藏移交我花用，我听了中岛的建议，恐怕银元贬值，换成法币。结果法币贬值更大，很快就花完了。

我既然决定南下投蒋，于9月19日派人通知伪中上级蒙古族职员连夜在车站集合，我和李守信即率同到站职员，乘上备好的专车赴平。

在日寇统治下，成立了六年之久的伪蒙疆联合自治政府，随着日寇的失败而瓦解了。

（1965年）

说明：

1. 伪蒙古联盟自治政府统辖地区是：锡林郭勒盟、乌兰察布盟全境，察哈尔盟的部分地区和伊克昭盟黄河以北部分地区。首府设在绥远省会归绥市——今呼和豪特市。

2. 伪察南自治政府统辖地区是现在河北省蔚县、宣化周围各县和张家口市，首府设在张家口市。

3. 伪晋北自治政府统辖地区基本上是现山西省大同专区所属各县，首府设在大同市。

伪蒙政权的回忆

李守信*

我在伪蒙政权机构中，曾任“蒙古军”总司令，并兼任过蒙古联盟自治政府副主席和参议府议长，以及“蒙疆联合自治政府”副主席等职。因我专负军事责任，从不过问伪蒙的政治，故不知详情，仅就一些表面动态和现象，写成这篇回忆录，以供研究伪蒙史料的参考。

蒙政权内部的派系

从1936年5月12日，在嘉卜寺（化德县）出现的伪蒙古军政府（以下简称伪军政府）开始，它便是由日本帝国主义收罗了好几种类型的内蒙古反动人物拼凑而成的。其中包括封建王公、贵族或牧主、地主或“马贼”（蒙古土匪）匪首而转化成的文武官僚。从地理上区分，有察蒙、东蒙（东北四省蒙古族）和绥远三大派系；从历史上区分，又可以分为亲德（德王）、亲日和亲李（李守信）三大派系。

1937年10月27日，“蒙古军政府”在归绥改组为“蒙古联盟自治政

* 作者曾任伪蒙古军总司令等职。

府”（以下简称“联盟政府”）。1939年9月1日，这个“联盟政府”在张家口扩大为“蒙疆联合自治政府”（以下简称“联合政府”），又吸收了“察南自治政府”和“晋北自治政府”两个伪政权，并安插进好多日寇在东北培养起来的“满系”汉奸。但中央机构的主要成员，仍是“蒙古军政府”时的那个班底，表面上一直由蒙古族人当权。截至1945年8月20日，伪蒙政权随着日本投降而解体，根本没有发生过重大变更。

在伪蒙政权中，汉奸大部分亲日，以后他们便成了日寇统治蒙疆的忠实爪牙。特别是“满系”汉奸，遍布伪蒙政权的中层和基层，非常贪横，就如同成吉思汗当年征服欧亚大陆时蒙古人所豢养的色目人，比日本人和蒙古人还坏。加之蒙奸里边，以卓索图盟和哲里木盟人最多，他们多半通晓蒙、汉和日本语言文字，生活方式完全接受了东北汉族人的影响，故察绥两省和山西晋北的蒙汉人民，在日伪时代都有受东北籍汉奸统治的感觉。提起蒙人里的喀喇沁和科尔沁两旗中少数为非作歹者，以及蒙奸和汉族人里的辽、热两省的极少数歹徒、汉奸，均极憎恨和仇视。

这是因为察哈尔省的蒙古族人中，除了德王和少数几个总管，再找不出提笔耍枪的人才，必须延聘和联合东北蒙古族中的知识分子与“马贼”头子；而绥远的蒙古族上层正如绥远、察南和晋北汉族地主与资产阶级的代表一样，系由于家乡沦陷，被迫参加了伪蒙政权，一直处于附庸的地位。另外，东北蒙旗在京北和关东的范围以内，大部由牧业社会进化为农业社会，充当帝俄和日本的间谍，在卓索图、昭乌达、哲里木和呼伦贝尔等盟从事特务活动多年，“东蒙”上层的民族分裂主义倾向，比“察蒙”和“绥蒙”上层表现得强烈而突出，其中的一部分人和德王的政治野心相同。当1933年成立百灵庙的“蒙政会”时，就亲密合作到一起，所以他们和察哈尔的总管，形成伪蒙政权的核心和骨干。

德王最初系锡林郭勒盟西苏尼特旗（又称苏尼特右旗）的亲王。在1933年末到百灵庙筹组“蒙政会”前，便是锡盟的副盟长，并和锡盟盟长诺木喇布坦（西乌珠穆沁旗郡王），察哈尔部牛羊群总管卓特巴札布（字世海），担任了宋哲元主察时的察哈尔省政府委员。德王之所以后来能够

继外蒙古的哲布尊丹巴活佛，成为内蒙古民族分裂主义集团的首领，是因为“东蒙”在1933年春热河沦陷后，完全划归了伪满，王公官僚和知识分子与“马贼”头子大部被吸收到伪满的四个“兴安省”和“兴安军”里，故不能出头露面；“绥蒙”的王公官僚被蒋介石羁縻控制，归化城土默特旗有民族觉悟的知识分子多数是走共产党的革命路线，绥远没有蒙古人率领的胡匪部队，无人起来兴风作浪；他便趁此空隙，从西苏尼特旗到北平活动，以“察蒙”作为后盾和本钱，踏上中国的政治舞台。

“察蒙”、锡林郭勒盟的10个旗，以东西两个乌珠穆沁旗最为殷富，特别是西乌珠穆沁旗因拥有盐湖，可以说有“日进斗金”的收入。1945年日本投降时，西乌珠穆沁旗王府的财富，被苏军抄去好几百辆汽车，未拆箱子的新枪即达1800多支。所以锡盟的王公在“九一八”事变以前，完全唯西乌珠穆沁的索王马首是瞻。德王的西苏尼特旗经济条件不及西乌珠穆沁旗，但位于张库公路[①]的乌得至滂江两旁，交通便利，德王比锡盟的其他王公见的世面多，思想较为复杂。加上他幼年常住北京和张家口，聘请过一个山东省的举人做老师，读过四书五经和汉族的其他史籍，历史知识较多，政治野心较大。且在“九一八”事变前，就开始了政治活动，被人们视为没落的王公贵族阶级里的翘楚，统治察哈尔省的汉族官员对他非常重视。

德王还有一个倚为心腹的主要帮凶，即他的姨父补英达赖。此人虽是平民，一因裙带关系，二因比梅林[②]之流有处事经验和逢迎手段，所以出任了西苏尼特旗“乌滂守备队”的队官和锡盟驻察省办事处处长，执掌了军队并参加了政务。德王于1932年秋，树起“复兴民族”和“抗日救国”两面招牌，便是补英达赖陪他跑到北平，同年冬天德王去南京向蒋介石请愿时，补英达赖便潜赴大连，代表德王跟日本人进行初步勾结这些活动的得意之作。因此补英达赖在伪蒙政权中，自居开国功臣。

当时哲里木盟和呼伦贝尔盟已经沦陷，溥仪被日本人劫持到长春，

① 张库公路——张家口至库伦（今蒙古人民共和国的乌兰巴托）公路。

② 梅林——蒙古旧官制中的职称，相当于现在县（旗）的副县（旗）长。

组织起伪满政权，通辽也成立起“蒙古自治军”。锡盟的王公看到日本的“满蒙政策”势在必行，既然德王出来跟各方面联络，团结蒙古各阶层应付未来的事变，便从拥护索王转而拥护德王。并且索王以下的锡盟王公以及察哈尔的总管，都很给德王捧场，故德王主使到南京向蒋介石请愿的“蒙古王公代表团”，是由东苏尼特的郡王郭尔卓尔札布担任团长。索王由“蒙政会”到“军政府”，一直给德王充当傀儡副委员长和副主席。“蒙政会”24名委员中，连德王、索王在内，“察蒙”方面就占去了八名。1933年春汤玉麟放弃热河，同年夏我率伪军盘踞了多伦，因为形势逼人，“察蒙”的总管更成了德王的仆从。

察哈尔在内蒙古是一个特殊部落，其祖先林丹汗反抗清朝最力，被征服以后把王公取消，牧民除按照满洲军制编为八旗，另有商都牧群、牛羊群和太仆寺左右两个牧群，共是12个旗群，供清廷征调作战和给宫廷放牧牲畜。各旗群由非世袭的总管统治，并由直隶总督、张家口都统、山西巡抚和绥远将军分别管辖。总管都没有爵位，不能集中在一起会盟，清朝时很受歧视，王公称他们为牛倌、马倌。在乾隆年间就开始放垦设厅，早成了蒙汉杂居地区，牧民受汉族地主排挤，生活相当困苦，因此哲布尊丹巴在库伦称帝时，察哈尔部的人到外蒙古的很多。1914年北洋政府设立了察哈尔特别行政区，这12个旗群和锡林郭勒盟共同受皖、奉、直、晋军阀先后压榨。1928年察哈尔由区变省，又把西边的正红、镶红、正黄、镶蓝四旗和牛羊群的一部拨归绥远，分成察北和绥东两半。

德王为了统一内蒙古，并以给察哈尔部建盟争取12旗群的总管，把他们和札萨克列同等地位，且把“插花”在各旗群的“台站地”也让他们接管。因此12旗群里最出风头的牛羊群总管卓特巴扎布，一直和德王狼狈为奸，他与补英达赖以及索王死后出任锡盟盟长的东浩济特郡王松津旺楚克，便成了蒙政权里“察蒙”方面的三大巨头。锡盟的王公郭王、雄诺敦都布和察哈尔部镶黄旗总管穆克登宝与正黄旗总管达密凌苏龙等，以后也都成了“蒙疆政府”的军政大员。所以“察蒙”的总管，不论他们本人还是外人，都认为他们是德王的嫡系，并且伪蒙政权先在嘉卜寺成立，以后

又把“首都”由厚和移到张家口，“察蒙”人更以主人翁自居。“蒙疆政权”的五个盟，他们领导着三个，在中央机构中也占有好几个重要职位。

“东蒙”人参加“蒙疆政权”，分为德王招来、日本关东军派来和我给带来三种不同的来历。所以背景非常复杂，不像“察蒙”人和“绥蒙”人那样比较单纯。德王招来的“东蒙”人，王公很少，因为他在百灵庙组织“蒙政会”时，“东蒙”已经完全沦陷，王公都被伪满拴住走不出来，只能让寓居在北平的几个闲散王公担任名义上的委员。伪蒙政权建立以后，他们连名义也不敢担任了。德王的“蒙疆政权”和哲布尊丹巴的那个“蒙古政权”相较，僧侣的色彩也很淡，这是德王看到贵族僧侣阶级已经没落，尽管德王拖着发辫和穿着长袍马褂，不过是用以象征民族特点。他知道蒙古民族的新生力量，则是接受了汉族文化和日本文化的知识分子。所以他对“东蒙”流落在关内的失意政客和失业青年，加意接纳和收容，把其中的不少人都团结在自己周围。由于这些人颇具才干，并且隐蔽了政治面貌，很受德王信任和倚重，实际上比“察蒙”的总管还要吃香。日本关东军派来的“东蒙”特务，在伪蒙政权中人数很少，但因后台老板不同，以亲日派的姿态，和亲德王派的“东蒙”人，明争暗斗得非常激烈。后来亲德王派也表现了亲日，原来的亲日派便被战败，最后亲日派的首领陶克陶，叫亲德王的首领吴鹤龄赶出政务院。故“东蒙”的亲德王派在张家口的“联合政府”时期，相当飞扬跋扈，和“察蒙”的那些总管，有很大的摩擦与矛盾。

我带给伪蒙政权的人，亦被人们列入“东蒙”的范畴里。其实除了我出身于热河卓索图盟土默特右旗一个由奴才变为地主的蒙古族家庭，其余全是汉族官兵，所以我和我带来的人，也称为“汉蒙古”。因为我主要是抓枪，虽由“蒙古军”总司令兼任了伪政府的副主席，并一度兼任过伪参议府的议长，但很少过问政治。以后我的几个汉族部下，也被吸收到伪政府里边担任最高检察厅长、部长、省长和市长一类角色，由于和日寇与德王的关系非常肤浅，正如“绥蒙”的王公与察南晋北的汉奸一样，只是做官而不弄权，等于摆在那里的几个牌位。

群众的眼睛雪亮，主要替日本人统治“蒙疆”地区的，还是“东蒙”

喀喇沁部与科尔沁部的蒙奸，和东北辽宁与热河的汉奸。热河的汉奸里边除了我带来的那些军官，还有和喀喇沁蒙古人有关系的汉族文人。所以伪蒙政权很可以说是“察蒙”总管和“东蒙”喀喇沁部贵族地主阶级的知识分子，利用日寇侵华的机会，成立起的一家进行政治投机倒把、出卖民族利益的“德记”字号。我和我的喽啰们，一直被“德记”的老板与伙友看成替他们护院站门的保镖，受他们使用的“火包手”。

由“军政府”到“联盟自治政府”

德王于1933年7月，和“东蒙”的知识分子及“东蒙”的蒙古特务陶克陶等，在百灵庙叫嚷内蒙自治，筹组“蒙古自治政府”时，我已公开投敌，由热河进入察北，把“察哈尔抗日同盟军”压迫到长城底下，盘踞了多伦。其时日本关东军派“东蒙”喀喇沁部的蒙古特务金永昌和于兰泽，专做我的军队和察哈尔部的工作，并派科尔沁部的陶克陶，在多伦与百灵庙和西苏尼特旗之间奔跑。由于卓特巴扎布不敢表明态度，他们曾叫我兼任伪“察哈尔盟”的盟长，我怕影响掌握军队，没有答应。德王和我都是彼此闻名，还未发生横的联系。到1935年冬，我和德王才初次在多伦会面；1936年4月“乌珠穆沁会议”召开以前，方合流在一起。

我没有参加过以前在百灵庙成立的“蒙政会”，只是听说委员里就有了南京蒙藏委员会委员兼蒙古各盟旗联合驻京办公处主任吴鹤龄，和察哈尔省政府委员牛羊群总管卓特巴扎布，以及白云梯等“东蒙”的知名人士。补英达赖那时还未露头，在德王的背后筹划一切。“蒙政会”底下有秘书、参事两厅，民政、保安、实业、教育四处，和一个财务委员会，差不多都由德王招收的“东蒙”还未出名的青年知识分子把持。“察蒙”的总管在“蒙政会”的委员中，占去1／3。“绥蒙”的王公和知识分子参加“蒙政会”，原来就非常勉强，到1935年11月，蒋介石为了破坏德王统一内蒙，应绥远省方面的要求，实行所谓“察绥分治”，把百灵庙的“蒙政

会”分成归绥的“绥境蒙政会”和嘉卜寺的“察境蒙政会”。从此，“绥蒙”方面就和德王唱对台戏，成了德王的反对派。

在“察绥分治”以后，日本关东军嗾使我的军队，于1936年元旦前夕，进驻张北县城，把察北完全控制，给德王廓清长城口外的地盘。他因百灵庙不好立足，便回西苏尼特旗，自任“蒙古军总司令”。日寇为了给下一步进犯绥东做借口，于1936年2月，怂恿德王到张北成立“察哈尔盟”。当时蒋介石曾派吴鹤龄和察哈尔任过总管的尼冠洲，由南京来张北劝德王悬崖勒马。日寇不知他们是应付公事，故在“盟政府”产生和卓特巴扎布担任盟长以后，尼冠洲在回张家口的路上，被张北特务机关派日本人乔装胡匪杀害。吴鹤龄因德王营救，从张北逃往西苏尼特旗，才得免于一死。在这期间，白云梯也出现在张北城中，在我的司令部中住过好几夜。最后我听说，他是因和蒋介石闹别扭，从南京到百灵庙装作投奔德王。难怪他和吴鹤龄与尼冠洲不是一道而来，在张北对建立“察哈尔盟”也未表示自己的意见。日本特务机关对白云梯，还是调查了解得很清楚，所以白和尼同车由张北到张家口，仅将尼杀害而把白放走。

吴鹤龄从那时开始，便不离德王的左右，由“蒙政会”中的活跃委员，变成伪蒙政权里边的头等要角。4月，在西乌珠穆沁索王府召开的第一次“蒙古大会”上，露出他的含蓄的锋芒。那次会议是由索王担任主席和东道主，主要议程是讨论成立“军政府”。这是德王利用索王来团结“察蒙”的总管，并想取得索王在财力和人力方面的支持。所以在会议期间，德王每天都按副盟长对盟长的规矩，对索王极有礼貌。但会议的倡议和决定，都是德王问过吴鹤龄又教给索王向众人传达，所以“乌珠穆沁会议”和会议所产生的“军政府”，可以说主要是由吴策划而成。这次会议我亦被邀出席，看见会场上很少“绥蒙”方面的人，除了“察蒙”的总管外，剩下尽是德王从百灵庙带过来的那些“东蒙”的知识分子，还有陶克陶、金永昌、于兰泽这几个“东蒙”的特务。我坐在德王的下首，可以看出伪蒙政权是“东蒙”人捧出德王搞起的一个小朝廷。

“乌珠穆沁会议”产生的“军政府”，于5月12日在嘉卜寺正式成

立，虽然是过渡性质，而且是德王自起的国号，可是为了“代表”整个内蒙古，仍以云王、索王和沙王为正副主席，德王为总裁兼“蒙古军”总司令，实际掌握军政大权。并由吴鹤龄任参议长，特克希卜彦为参谋长（后由吴的妹夫乌古廷接任）；补英达赖以办公厅主任、卓特巴扎布以“察哈尔盟”盟长，都兼了“蒙古军”的副总司令；我那个副总司令比他们只是多兼一个第一军的军长；第二军的军长则由德王兼任，不过没有多少队伍。至于“政府”的军事、财政、民政和交通、外交、实业等署署长，由特克希卜彦（汉名王宗洛）、吉尔嘎朗（汉名德古来）、金永昌和于兰泽、陶克陶等分别担任，前两个人是德王在“蒙政会”时招来的“东蒙”人，后三个是日本关东军派来的“东蒙”人，并且除了吉尔嘎朗是呼伦贝尔盟布特哈旗人，其余和吴鹤龄与乌古廷全是卓索图盟喀喇沁人。

这时最受日本人信任的是哲里木盟苏鲁克旗蒙古族人陶克陶。他是受关东军的“嘱托”①，协助嘉卜寺日本特务机关长兼“政府”和“蒙古军”的最高顾问田中玖，监视德王和其他蒙奸的行动。所以翌年10月“军政府”在归绥改组为“联盟政府”以后，陶克陶便一跃而出任了以后由日本人担任部长的“总务部”部长，成为吴鹤龄的主要政敌。他在嘉卜寺曾建议日本特务机关长田中玖，像对待尼冠洲那样，把吴鹤龄也干掉，因德王在关东军政治参谋田中隆吉跟前为吴解释得免，故陶克陶迁怒于德王，由于惧怕我而未敢向德王进行打击和报复。

1937年10月中旬，日寇的酒井机械化师团把平绥路西段打通，即折返长春附近的公主岭。包头以东和大同以西以及张家口的长城以北，交给我的“蒙古军”防守，日军以后即按机动部队使用，分驻于张家口、大同、归绥和包头等几个据点。包头以西以南的半个绥远，一直控制在傅作义的军队手中，日伪只占了伊盟准格尔旗黄河以北的“河套”和达拉特旗黄河以南包头对岸的几个滩头村庄。伊盟七旗除杭锦旗的郡王阿拉坦瓦齐尔投敌，其余王公都打着抗日的旗帜，乌盟也只是占领了四子王旗、达尔罕旗

① 嘱托——意为特务。

和茂明安旗。乌拉特三旗成了拉锯的战场，先是西公旗和东公旗的福晋[①]都把小王爷带入后套，最后连中公旗的王爷兼云王死后的乌盟盟长巴宝多尔济父子，也被傅作义从后山抢救到陕坝。日寇就是先在半个察哈尔和半个绥远的土地上，叫德王把“军政府”改组为“联盟政府”，替他统治压榨此一地带的蒙汉人民。

“联盟政府”于10月27日在归绥正式组成，仍让云王担任名义上的主席。因索王这时已死，德王便担任了副主席，并兼政务院院长。把“蒙古军”总司令让出叫我担任，以调和我和他之间的矛盾。他本来计划叫吴鹤龄出任政务院长，因没有得到张家口日本“驻蒙军”军部的许可，让吴担任了与政务院平行的参议府议长。政务院下辖三部，由“军政府”时的军事署署长特克希卜彦任保安部部长，财政署署长吉尔嘎朗任财政部长，民政和交通两署的人都归并到总务部内，由陶克陶包办了一切。“军政府”的驻满代表金永昌，调往张家口的“蒙疆联合委员会”，交通署长于兰泽从此没落，充任了参议府的参议，后在张家口忧郁而死。

1938年3月云王病故。7月1日德王召开“第三次蒙古大会”，众人推选他担任主席仍兼政务院长，我被决定为副主席。不久我们到东京进行第一次访日，吴鹤龄坚决要留在日本考察，所以他没有归国，以表示崇日和亲日。吴所遗的参议府议长，补英达赖和卓特巴扎布都抢着要兼。德王为了使他们两个人均没有话说，便让我把参议府议长兼起。日伪军进入绥包，“察蒙”和“东蒙”方面对“绥蒙”以征服者自居，云王死了后，伪蒙政权里边再就没有“绥蒙”方面的人了。特别是拼凑底下的五个盟时，德王为了酬谢他的姨父补英达赖，把土默特旗和绥远中部九个市、县，察哈尔西四旗，绥东五县和固阳县，共是五旗15个县、市，给补英达赖成立了一个“巴颜塔拉盟”，补英达赖遂由平民变成盟长。

“巴颜塔拉盟”是蒙地精华区域，其中的武川县除了占有土默特旗的土地之外，还占有乌盟达尔罕旗与四子王旗的土地。这不仅“绥蒙”方

① 福晋——清王公的妻子。

面敢怒而不敢言，连“察蒙”的总管也为之侧目。尤其是“察哈尔盟”盟长卓特巴扎布，因为察哈尔仍被割成两半，更表示反对。德王自知理屈，后来伪蒙机构的大官以及对外出头露面的事，尽让卓去担任。如“联合政府”成立以前，让卓担任“蒙疆联合委员会”的蒙古代表；“联合政府”成立以后，德把“政务院长”让给卓；吴鹤龄从日本回来“组阁”，把卓调为“参议府议长”，并派卓和“察南政厅”长官陈玉铭，去南京担任汪精卫伪中央政治委员会委员，以消卓的气愤。

索王、云王相继病故以后，五个盟里除“察盟”和“巴盟”外的盟长，锡盟任命了东浩济特旗的郡王松津旺楚克（以下简称松王），乌盟任命了中公旗的郡王巴宝多尔济（巴王到陕坝，由云王的儿子达尔罕旗贝子沙拉巴多尔济继任为盟长），伊盟任命了该盟七旗王爷中唯一投敌的杭锦旗郡王阿拉坦瓦齐尔。因为伊盟有国民党的好几万军队防守，“蒙古军”虽曾于1938年春进入东胜和杭锦旗，但没有站住脚步，所以德王统辖下的伊盟公署设立在包头市内，除了有达拉特旗保商团长森盖林沁和准格尔旗贵族奇子祥率领的两部分比较能打仗的军队，行政上只辖有达拉特和准格尔两个旗公署。由于德王想叫伊盟的其他王公归附，故让康王的弟弟章巴拉多尔济代理达旗札萨克，奇子祥代理准格尔旗札萨克。

至于归绥和包头两个市长，由于归绥商务会会长贺秉温“维持”地方欢迎日军入城，归绥改称为“厚和”[①]市，即由贺秉温担任了市长。包头则

---

① 呼和豪特市名称沿革：1575年（明万历三年），蒙古俺答汗建成库库初屯城（今旧城，蒙语呼和浩特异译），明朝“赐”名归化城。1723年（清初雍正元年），设归化城厅。1739年（清乾隆四年），在归化城东五里建成绥远城，即新城。1913年，归化、绥远二城合并改称归绥县。1929年，改为归绥市。1937年，日本占领后，改称厚和豪特（亦呼和浩特异译）市，简称厚和。1945年，日本投降后，复称归绥市。1954年，正式改称呼和豪特市。蒙绥合并后称呼和豪特市。内蒙古自治政府与绥远省政府合并成内蒙古自治区，首府设此，称为呼和豪特市，至今。

是因为我的军队驻防，把守着西边的门户，加之当地的汉奸不敢出任市长伪职，故由驻防包头的“蒙古军”第一师师长刘继广（山东人）兼任了伪包头市市长。1939年9月1日，“联盟政府”扩大为“联合政府”，“首都”由厚和移到张家口，标榜蒙、汉、日、满、回“五个民族协和”。由于厚和新城有好几千户满民，包头有好几百户回民，且跟甘青宁新四省未断绝通商，故伪厚和市市长换成当地的满族旧军官李春秀，伪包头市市长由日本特务机关给派来一个东北回民金朝文担任。

五盟以下的旗仍由原来的王公、总管继任札萨克和总管，只是土默特旗的总管荣祥参加了抗战，由该旗的知识分子墨尔根巴图尔（汉名亢仁）担任了总管，并兼任了“巴颜塔拉盟”的副盟长。旗以外的县长，初由当地“维持会”的人担任，以后全由日本特务机关和德王以及补英达赖和卓特巴扎布安插了“满系”汉奸和“东蒙”蒙奸，以及“察盟”蒙奸的朋友。“厚和”市长在贺秉温和李秀春中间，德王还叫他的一个安徽汉族朋友徐荣侯任过一度市长。“联合政府”成立后，五盟两市仍维持着“联盟政府”时的状态，并且我的“蒙古军”总司令部一直驻在厚和未动，这是日寇要把军政隔开，德王也想叫我协助补英达赖看守“绥蒙”。

张家口的“蒙疆联合自治政府”

日寇在“联盟政府”建立以前，就随着他们军事上由东向西的进展，先在张家口建立了“察南自治政府”，后在大同又建立了“晋北自治政府”。察南政府是由张家口商务会会长、河北冀县人于品卿和刘汝明主察时的省政府秘书、山东黄县人杜运宇等组成。晋北政府是由大同前清的拔贡夏恭和大同商务会会长马永魁等组成。张家口的日本特务机关和日本“驻蒙军”军部，为了便利管理、摆布平绥路上的三个伪政权，于联盟政府改组还不到一个月，把卓特巴扎布和夏恭叫到张家口，和于品卿一同接受命令，于1937年11月22日，在张家口成立了一个“蒙疆联合委员会”，开

始把察南和晋北都划到“蒙疆”的范围内。该委员会下设总务、产业、金融和交通四个委员会，分由卓特巴扎布、陶克陶、金永昌、于品卿、杜运宇、夏恭、马永魁担任“总务委员会”委员，并且分工兼任产业、金融和交通三个委员会的委员，日本人金井章二为最高顾问，形成三个政权的上级衙门。

到了1938年7月，“蒙疆委员会”扩大组织，把总务委员会以外的三个委员会取消，增加总务、产业、保安、财政、民生和交通六个部，由卓特巴扎布兼总务部长，金永昌兼产业部长，陶克陶兼保安部长，马永魁兼财政部长，杜运宇兼民生部长和交通部长。在委员会里，卓特巴扎布、于品卿、夏恭、马永魁都是虚有其名，而陶克陶与金永昌和杜运宇三个人，才是该会的骨干。因陶克陶与金永昌系日本关东军豢养多年的特务，杜运宇在日本留学还娶回一个日本老婆的缘故。陶克陶在此一阶段，既是总务部长，又是“蒙疆联合委员会”的保安部长，可谓红极一时，经常坐着日本的军用飞机，在张家口和厚和之间飞来飞去。故“蒙疆委员会”的一切工作，主要是由金永昌和杜运宇两个人秉承最高顾问金井章二的意旨，操纵和监督三个伪政权。

“蒙疆联合委员会”设有总务委员长，日寇想叫德王担任，德王因为反对这个太上政府，故一再推诿而不接受。第一次访日便是为此想向日本政府提出交涉，并呼吁日本朝野协助他建立“正式国家”。东京方面虽然因金井章二不准吉尔嘎朗直译他的谈话，没有听到他的乞怜哀鸣，但是后来在“蒙疆联合委员会”的基础上，把“联盟政府”扩大为“联合政府”，从厚和搬到张家口，受日本特务机关后来改成日本兴亚院“蒙疆联络部”和日本“驻蒙军”军部有就近管辖。德王很不满足“自治”这个词，想赖在厚和不走以示抗议。经“驻蒙军”军部派政治参谋大桥雄熊和陶克陶到厚和对德王施加压力，而德王又恐怕日寇从蒙古人中另选“贤能”，因之，于1939年4月担任了“蒙疆联合委员会”的总务委员长，同年9月1日，在张家口就任“联合政府”的主席。

张家口的“联合政府”，是一个蒙奸和汉奸混合的伪政权，统辖五个

盟和“察南”“晋北”两个伪政权原属地区。“联合政府”在政务院和参议府之外，增加了最高法院和最高检察厅，政务院由三部扩大成七部，并且添了牧业总局、榷运清查署、税务监督署、兴蒙委员会、回教委员会和兴蒙学院等受正副主席领导的附属衙门，以及驻日代表部、驻满代表部和驻华办事处等外交机关。从表面上看，俨然一个国家局面。

联合政府比军政府和联盟政府的寿命都长。它从1939年9月1日成立，到1945年8月20日垮台，差10天存在了六年。初由德王和于品卿及夏恭三人，担任正副主席，卓特巴扎布为政务院长，吴鹤龄为参议府议长，我和乌古廷仍分担蒙古军的总司令和参谋长。夏恭死后没叫“晋北”方面出人，由我兼了一个副主席。政务院底下最重要的总务部，完全由日本人把持，由关口保和武内哲夫任部长和次长，将陶克陶调为司法部长。因“联合政府”是由“蒙疆联合委员会”蜕变而来，故由“晋北”的马永魁任财政部长，“察南”的杜运宇任产业部长，蒙古的金永昌任交通部长。原来任“联盟政府”部长的特克希卜彦和吉尔嘎朗，一个任了驻日代表部代表，一个任了榷运清查署署长。“察蒙”卓特巴扎布以外的几个首脑，和我带来的几个“汉蒙古”，也在这个新的机构中出现，这就是巴盟盟长补英达赖兼了最高法院院长，锡盟盟长松王兼了民政部长，东苏尼特旗的郡王郭尔卓尔扎布担任了牧业总局局长，刘继广由包头市长升为最高检察厅长，我和另一个师长热河赤峰县人丁其昌调任治安部部长。

原“察南”“晋北”两个政府在改组为政厅时，由于过去宣化府属10县的地主阶级和知识分子的代表人物，日伪时期除了参加抗战外，大部避居北平，“察南政府”是由寓居张家口的几个客籍人组成，现在于品卿和杜运宇参加了蒙疆政府，察南政厅长官一职地方无适当人选，“日本兴亚院蒙疆联络部”由伪满调来曾任次长的陈玉铭充任。晋北政府是夏恭和马永魁到了张家口后，把山西浑源的田汝弼（“安福系”政客田应璜的儿子，曾留学日本）担任“晋北”政厅的长官。

“联合政府”设立在张家口，受“日本兴亚院蒙疆联络部”和日本“驻蒙军”军部就近摆弄，内部是由日籍的总务部长关口保把守着主要的

关口，各部会局署由顾问变成次长或参与官的日本人主事。从政府的重要人选看，表现了几根骨头众犬争，没给“绥蒙”的蒙古人和绥远的汉奸空出一份，夏恭、马永魁和田汝弼相继死后，晋北的汉奸也不能分尝一杯羹了。除了察南的于品卿始终是个牌位外，杜运宇根子很硬，得另眼看待，“联合政府”里的要职，尽被“察蒙”“东蒙”人平分秋色。

我带来的“汉蒙古”能够参加联盟政府和联合政府，以后还领导了“宣化”和“大同”两省与张家口特别市，是因日本人和德王都怕我借水养鱼，而用官爵抽调我军队中的骨干。我的三个汉族师，以第一师较精锐，故他们从第一师下手，先把刘继广调为包头市长，我遂派炮兵大队长丁其昌担任第一师师长，去率领这个最能打仗的部队。在联盟政府扩大为联合政府时，德王既不愿“察南”和“晋北”往出提人，又怕最高顾问金井章二从伪满调人，特别是日寇和德王要把我的汉族师从蒙古军中拨出另编警备队，削弱我的兵权，使我没话说，提升刘继广为最高检察长，调丁其昌为治安部长。崔兴武和我驻在承德担任过办事处处长的热河阜新人李树声，德王想通过此人拉拢我的其他部下，除把他介绍给军统马汉三外，并继韩广森（河北南宫人，曾任张家口商务会会长）出任张家口“特别市市长”。

“察南”和“晋北”两个政厅，于1943年改为“宣化省”和“大同省”后，以地方人充任省长。大同省的省长由原来的“晋北政厅”长官田汝弼继任，宣化省的省长弄出怀安县的一个大学毕业生李焕瀛担任。原“察南政厅”长官陈玉铭，充任了汪伪政权的“中政会”委员。因晋北的马永魁病故，田汝弼继任了由财政部改成经济部部长，便调最高检察厅长刘继广为“大同省”的省长。李焕瀛死后把刘继广又调到宣化，把张家口特别市长李树声升到“大同”，李的遗缺由我的军需处处长（热河朝阳人）崔景岚继任。于是“蒙疆”五盟以外汉族聚居的两省和首都张家口特别市，似乎由我带来的“汉蒙古”进行统治，成了德王分给我的地盘。

“联合政府”成立后的第二年，即1941年2月，德王率领我们到东京二次“访日”，归国时即把吴鹤龄带回。吴在日本考察期间，学会日文日

语，娶个日本老婆，已经得到日本人的谅解。故在同年4月18日德王主持的一次会议上，决定让吴鹤龄和卓特巴扎布对调工作，叫吴任政务院院长，卓任参议府议长。首先把陶克陶踢出，推到参议府担任参议，将司法部和产业部取消，让原来的产业部部长杜运宇改任了司法部长官；其次是将民政和治安两部改组，合并为内政部，由原治安部长丁其昌担任部长，原民政部长松王调任为兴蒙委员会的委员长，原财政部改为经济部，交通部改为交通总局，由马永魁和金永昌分任经济部长和交通总局局长。此外任蒋辉若为回教委员会委员长，特克希卜彦和恩和布林为驻日、驻满代表部代表，将原总务部改为总务厅，由前总务部的次长日本人武内哲夫充任厅长。从此吴鹤龄成了德王小朝廷的“内阁”总理，专权用事。到1944年年底，他看见日本快要完蛋，才知难而退，躲到北平去“养病”，执政时间约有三年半之久。

吴上台后，和乌古廷把他们家乡热河喀喇沁的不少蒙古人和汉人，都安插到县政府和“蒙古军”的团部里。乌古廷虽然没摆弄了我，吴鹤龄却在德王左右言听计从，将“察盟”方面的人全排挤出“政务院”，安排到冷衙门里，等于闲散王公；将“察南”和“晋北”的汉奸也摒弃于圈外。自从田汝弼死了以后，“部长”之中便没有了“晋北”的人。但吴鹤龄不敢捋动察南的杜运宇，杜既有靠山又有才干，不仅担任“司法部长官”，还兼任了田汝弼遗留下的“经济部部长”。金永昌看见陶克陶失掉了权势，知道日寇把吴鹤龄视为头面人物，看陶克陶和他是一般的特务，以后也变成了随风倒，在吴鹤龄前不敢表示有恃无恐，直至“联合政府”垮台以前，尚能保全官职。

我因有枪杆子撑腰，吴鹤龄对我和我的人颇为客气，故丁其昌得以蝉联下去，刘继广和李树声也能调出去领导“宣化”和“大同”两个“省”。可是他对副主席于品卿，却两样对待，“部长”以上的人都有专用卧车，于在开会时才派公用卧车接送。于在会上一言不发，会后便回他的商号中去当经理。他像“察蒙”的那几个总管一样，见了吴鹤龄高声话都不说，老是曲腰称“是”，连一个私人也无权举荐到“政府”里担任小

官。吴鹤龄任“政务院长”时代，其气焰炙手可热，所谓“蒙疆地区”愈加成了“东蒙”的蒙奸和东北的汉奸横行的天下了。

政务院院长吴鹤龄

吴鹤龄出身于喀喇沁右旗的一个蒙古官僚地主家庭。他父亲任过“扎楞”①，所以自幼即通晓蒙、汉两种语言文字。青年时即到北京读书，从北京的法政专门学校毕业后，还给蒙藏学校讲过宪法。1925年到1927年的大革命时代，他和白云梯处于对立的地位，白等主张取消王公制，他要维护封建制度。在1928年秋到南京向国民政府请愿，提出“内蒙自治”的要求，当时受到蒋介石的赏识，委予“蒙藏委员会”的委员；又受到“东蒙”王公的推荐，当了驻京办事处主任。

德王在未出穹庐以前，就知道要想在政治舞台上高爬，必须延揽人才，求得文人武夫的辅佐。因而1929年秋，他从西苏尼特旗到北平，初出风头，便装作求贤若渴的样子，给蒙古族青年的印象是谦恭下士，便有以后被吴鹤龄称为“小鬼们”的“东蒙”青年陈绍武、陈国藩、丁我愚、于宝衡、瑞永和陶立宾等，先后在北平和南京追随他的左右。这时吴已经和白云梯、李永新齐名，德王早有耳闻。在南京见吴后，一睹风采和一听谈吐，两人一拍即合，相见恨晚，从此德王就把吴鹤龄视为自己未来的“辅弼”。

1933年德王在百灵庙打起“内蒙自治”的旗帜，国民党中央于同年10月派内政部长黄绍竑前往百灵庙进行巡视，吴鹤龄以两面手法讨好蒋介石和德王。这时他已是内蒙古的驻京代表，当内蒙古要求脱离察、绥两省实行自治时，宋哲元和傅作义主张必须由察、绥两省节制，双方争执各不相让，使谈判陷入僵局的时候，吴鹤龄由南京前往百灵庙，替国民党中央

① 扎楞——旧蒙古官职，相当县以下的区长。

进行斡旋。可是再度谈判开始，他又站在内蒙古方面力争脱离两省实行高度自治，弄得黄绍竑无法接受。后经班禅出面调停，才决定了成立“蒙政会”的折中办法。由于吴鹤龄应付灵活，竟将国民党中央骗过，因而1936年春德王在察北建立“军政府”前夕，蒋介石又打发他前来劝阻。吴鹤龄看大利不占小便宜，他担任了“蒙政会”委员和驻京办事处长，对于国民党中央拨给“蒙政会”的经费物资，从没有揩油装腰包，在内蒙古的官僚政客里很少有这样的“操守”，因而更取得了德王的信任和倚重。

1936年2月，吴鹤龄由南京到察北，他在张北阻挠察哈尔建盟没有成功，同行的尼冠洲被日本特务杀害，他被德王营救脱险，护送到西苏尼特旗后再没有回南京。4月，“乌珠穆沁会议”召开以前，我到西苏尼特旗去找德王，见吴被招待在王府东小院的三间静室里。他整天阅读线装古书，不和旁人来往，因为多年茹素，在吃饭时也不出小院，装作道貌岸然，只是德王常去看他，二人谈到深夜才散。当时他很不引人们的注目，在“乌珠穆沁会议”上才显出他的“才干”，被蒙古族人誉为“圣人”，并更加遭到日本特务机关的猜忌。

“军政府”成立后，日本特务机关长兼最高顾问田中玖，认为吴被蒋介石打发来操纵德王，曾和陶克陶计划派刺客杀他。德王为了他的安全，又把他弄回西苏尼特旗，故吴虽任参议府参议长，但不在嘉卜寺上班办公。日本关东军的政治参谋田中隆吉来到嘉卜寺，德王说吴忠于蒙古民族的“复兴事业”，已经和蒋介石完全断绝关系，他敢以身家性命作为担保。并说：“你们既然承认错杀了尼冠洲，对团结蒙古人建立东亚新秩序造成很大的损失，如果再把吴也干掉，蒙古的知识分子谁还敢来嘉卜寺为军政府服务。”经德王的再三解释，田中隆吉才叫田中玖把吴放过，并且在改组“联盟政府”时，让吴担任了参议府议长，给以后“组阁”创造了条件。

吴鹤龄在归绥的时候，把妻子从喀喇沁老家中接出，住到新城深居简出，很少参加社交上的应酬。“政府”开会时，也是打着一般的官腔，没有会议即不上班，回家闭门读书。他因为精神苦闷，偶尔下旧城到我的家

里吸鸦片，并和任过绥远通志馆馆长的归绥汉族文人郭象伋，研讨内蒙古的历史沿革。此人不仅小事聪明，而且对大事也有一定见解。他在我家初吸鸦片时，一分钟就把打烟泡学会，以后抽得上了瘾，问我要上药丸毅然戒绝。他从郭象伋那里借到不少古书，把长城内外各县的志书完全看过。他向我说："元朝之所以失败，明朝的鄂尔多斯部之所以没有成功，就是只会焚掠残杀，不懂得用政治收买汉族人心。我们要想在此一区域能够长久待下去，应该仿照清朝康熙皇帝的做法。"

我在这些方面，对他颇为钦佩，觉得这样的一个人投降了日寇，未免可惜。有一次我问他："你为什么也和我们落水到一起？"他说："我在南京时，见军政部挂着一张全国地图，把标志军队布防的箭头，都搁在黄河南岸，证明国民党已把华北放弃，将蒙古扔掉。并且听说蒋介石因全国人每人平均只有五颗子弹，故不敢抗战，要进行曲线救国。何应钦主张退守黄河以南，以争取外援，叫他暂缓投降。我感到抗战没有前途，就跑回来了，想协助德王拯救咱们的民族，使得少受一些灾难。"他对别人也是如此说法，让蒙古族人和日本人听见都不刺耳。

"联盟政府"成立时，德王由副主席兼政务院长，让吴鹤龄任参议府议长，就打算叫吴"组阁"。因为当时日本人对吴还很怀疑，同时陶克陶也以"开国功臣"自居，看到自己在哪一方面也比得上吴，所以到处对吴造谣中伤。德王既怕日本人，又不敢得罪陶克陶，他们遂用了一个以退为进的办法：在我们第一次"访日"时，把吴鹤龄留到东京进行"考察"，实际上叫日考察他。我们第一次"访日"，大概在1938年年底，吴在日本待了两年，到1941年2月，我们二次访日时，即把他带回张家口。吴鹤龄走时把参议府议长辞掉，走后归绥的日本特务机关还派宪兵搜查过他的新城的住宅。因为吴不留痕迹，结果一无所获，所以1939年扩大组织"联合政府"时候，他虽然身居国外，但仍给他留下一个参议的位置。

吴鹤龄在东京的两年期间，日本方面按"外宾"对他招待，他很快就学会日文和日语，并娶了日本老婆。他之所以娶日本老婆，完全是表示亲日。我们二次"访日"时，他住在一幢很雅致的小楼里。他指着那个日

本女人，用汉话和我说："我半年就学会日本话，她快两年还听不懂中国话。我跟她结婚，是他们的人给介绍的，故她来我这里，负有监视我的使命。经过我对她体贴，她对我很忠实，已经在精神上脱离了日本国籍，成了咱们蒙古的女人了。去年日本的宪兵还不断来我这里，在楼底下向她要关于我的情报。她什么也不说，逼得没办法的时候，只是痛哭，我把耳朵贴在地板上，听得非常清楚。宪兵走后她跑到楼上，把经过一五一十地都告给了我。"由此看来，吴很会应付环境。他在东京期间，从事社交活动，和日本的一些权贵人物来往，最后终于使日本"兴亚院"由怀疑转变为信任。

在吴出国期间，陶克陶以"联盟政府"总务部长和"蒙疆联合委员会"保安部长的双重身份，大肆贪污。分配的经费节余时，他比德王分得还多，竟达到30万元，数字相当惊人。他改任了司法部长以后，仍然受贿和揩油，并且顾头不顾尾，连日本人也敢吃喝。"联盟政府"的最高顾问宇山兵士托他向我借了两万元，他就从中克扣了5000元，因此声名狼藉，引起日寇和蒙奸的公愤。吴鹤龄的这个政敌，没有经过吴的打击而自己倒了下去，所以吴从日本回来不久，就由参议府议长调为政务院院长。

吴鹤龄执政以后，先是引用自己的亲信故旧，硬往政府各部门中插入，分布了好多羽翼。他和我的参谋长乌古廷是郎舅关系，乌古廷引用的多是喀喇沁的武人和"东北讲武堂"的汉族同学；吴鹤龄引用的除了老朋友和老同学外，还有他二弟吴椿龄在喀喇沁培养的蒙汉族学生。

在吴鹤龄引用的私人中，有一个蒙古人戴仲元和一个汉族人罗励甫最为吃香。我忘记了他们所担负的职务，人们都称他两个为吴鹤龄的"哼哈二将"，一个给吴在张家口和北平倒卖房产，一个给吴在天津、北平做投机倒把生意。我在张家口上堡的那所院子，就是戴仲元倒卖给我的。戴是以房产做抵押放高利贷，到了业主无力赎回，便以低价卖给他，他再以高价售出获利。吴鹤龄干了一年多政务院院长，看见日寇挑起太平洋战争，感到德王的政权好景不长，趁此不大捞一把尚待何时，便叫罗励甫利用"政府"的公款，大做买卖。由于罗闹得太不像话，遂引起"察蒙"方面

的反对，因此吴鹤龄还向德王闹过一次辞职，经过德王给他下了一跪，他舍不下捞钱的机会，才又厚颜无耻地继续干了下去。

原来察绥两省和山西的雁门关外沦陷时期，出口大宗皮毛、牲畜、粮食、煤炭、盐碱和鸦片。这些战略物资和土特产品，除了由日本的“驻蒙军”军部和日本的各种“株式会社”控制之外，也由“政务院”经管一部，详细情况我不大了解。我只知伪蒙每年卖给“华北”15万头羊，按“华北”的伪钞折价，由罗励甫负责此项牲畜交易。罗励甫收到羊款以后，他不马上交给“蒙疆银行”的“北平办事处”，而是将款套购成黄金、布匹，等待“华北”伪钞下跌到一定的程度，才带回张家口结账。这样罗励甫从中获得了暴利，蒙古王公、总管都蒙受了重大的损失，结果卖出一头羊，用羊价买不回一张羊皮。乌盟在朝中无人，巴盟和察盟产羊很少，补英达赖和卓特巴扎布碍于德王的情面，不好意思顶撞吴鹤龄。锡盟不但产羊很多，而且盟长兼“兴蒙委员会”委员长松王从不让人，因而在一次正副主席和盟长们召开的会议上，当众把此事端出。

我比德王爱交际应酬，在归绥和张家口的院子，都较德王的公馆讲究吃喝，雇有山东厨师和备有鸦片烟灯，“政府”的一些首脑们，均爱到我的家中聚谈。那次会议的正题目，是向各盟征兵，以补充“蒙古军”的缺额，在我的客厅中举行。可能是几个盟长事前开过小会，大家坐定未谈正题以前，松王劈头就提出卖羊的事情。吴鹤龄说：“我不知道此事，可以叫罗励甫来给大家交代。”松王的秘书当即给“政务院”打去一个电话，罗还以为是吴对他吩咐别的事情，所以带着一个公事包走来，以致嚅嚅嗫嗫地无话可答，吴便以蒙语替罗解释，使罗好能措辞。松王一看此种情形，手指着吴和罗，用汉语挖苦地说：“噫！叫他交代，你给翻译，哈哈你们两个人……”弄得罗愈加呆如木鸡，吴更面红耳赤，无地自容。德王和补英达赖与卓特巴扎布等都不吭声，我看陷入僵局，便用“不要谈你们的羊了，先说我的兵吧，如果没有兵，狼来吃羊谁给你们打”的逗趣话，才给吴鹤龄解了围，松王也就坐在沙发里面。

不料讨论到兵上，会场又起了风波。德王私心很大，处处偏袒他的西

苏尼特旗，给西苏尼特旗拨的款项多，向西苏尼特旗要的差事少，早就引起锡盟九个旗的王公不满。松王由于怒气未消，便在征兵数额上和德王争执起来。此次向锡盟征兵400人，本来数字很少，松王偏说锡盟没有如此众多的适龄壮丁，很使德王难堪。德王由于松王奚落了他的宠臣，也恼羞成怒，板起主席的面孔，非叫松王答应不可。松王说："你如硬要，我把喇嘛给你送来。"德王说："我保护宗教，不要你的喇嘛。"两人在会场上吵起了嘴。吴鹤龄是想给德王找台阶下，问松王："少出几个行不行？"德王因松王和他发态度是由于吴引起的，所以说吴"你少插嘴"。吴鹤龄一听此话，把满肚怨气都向德王发泄，他对德王说："你是元首，我是院长，元首当众羞辱院长，这成什么体统？我现在向你告退，请你另选贤能。"说完拂袖走出客厅，到我的卧室中吸鸦片。我装作劝解，也跟着他走进去。

吴躺在我的烟榻上，很伤心地和我说："主席给我这样的钉子碰，我这个政务院院长怎能再担任下去？"我只是说："你多抽几口消消气吧。"我们正说话中间，德王亦从客厅中跑了进来，他什么话也没说，便"扑通"一声跪在床前，将手搭在吴的腿上，吴抽了一个烟泡，才跳下床把德王搀起，两个人沉默了十几分钟，我便把德王拉到客厅中重新开会。我将锡盟征兵的名额，由400人削减为300人，松王再没说负气的话，会议草草结束。散会后德王和吴因各怀心事，坐上汽车各自回家，其余的人被我留下吃饭，便在餐桌上纷纷议论起来。

松王首先说："他给吴下跪，等于给所有的王公丢人。"卓特巴扎布也说："他就认得吴是人才，把咱们都当成土包子来看待。"我亦因德王给吴下跪，联想到他削我的兵权，利用日本关东军与"驻蒙军"军部向我施加压力，思想上受上很大的刺激，由于补英达赖在座，没好意思发泄心中的牢骚。这顿饭是用德王和吴下酒，所以每一个人喝得很多，因为均有受德王驱使和被吴利用的精神苦闷。此一场闹剧是吴"组阁"以后第二年上演的，地点在我下堡的院子里，时间是1942年。吴虽被"察蒙"方面反对，但他被德王视为一刻也不能离开的灵魂，吴也舍不得"院长"这个高

官肥缺，在家里待了几天又去“政务院”上班。

日本投降的前一年冬天，吴的宦囊已经很满，一方面看到日本快要完蛋，恋栈无好下场；另一方面日本人怕他留在“蒙疆”给德王和我出主意，也有意把这个危险人物排除出去。他便以养病为名，辞职躲到北平观风。日本投降以后，他除分到很多日本丢给蒙奸的物资外，还把德王和我耍弄到重庆，重新进行政治投机。蒋介石委他军委会蒙古宣导团主任，他的妹夫乌古廷也担任了东北行辕的少将高参。辽沈战役结束以后，他俩把北平的财产都变卖成黄金，完全转移到台湾。1949年夏德王和我到阿拉善旗，又搞“内蒙自治”，他俩去阿旗绕了一次，知道凶多吉少，便从兰州坐上飞机逃走。在伪蒙群魔里，吴、乌是两个得了实惠而现在仍然逍遥法外的战争罪犯。

德王对待蒙奸、汉奸的态度和手段

首先，德王对汉人怀有成见，除我这个“汉蒙古”外，认为其他的汉奸都不可靠，特别是日本人给安插进的“满系”汉奸和一些留日的汉人，都示意蒙奸要严加防范。跟日本没有历史渊源，由“维持会”冒出的汉奸，如张家口的于品卿、大同的马永魁、“厚和”的贺秉温等，德王和补英达赖对他们很不客气。贺秉温因为当了“厚和”市市长，到处受气，感到居官不如经商，等到“土药组合”成立以后，他便跑到张家口担任了这个“组合”的理事长，又经营了他原来的烟土生意。德王因读过汉文书，见了大同的夏恭，比对别的汉奸稍稍有些礼貌。此外对于杜运宇这个汉奸，因为杜的根底硬和能力强，德王另眼看待，有时也采纳他的意见。例如张家口最初也有聚赌的“俱乐部”，把“首都”弄得乌烟瘴气，就是经过杜的建议，由德王下令驱逐到崇礼县的。

其次，德王把“察蒙”的蒙奸，当成自己的嫡系，尤其对他的姨父补英达赖，可以说言听计从。政府由厚和移到张家口之后，补在厚和、张

家口中间来回奔跑，一方面替德王监视我和“绥蒙”的王公；另一方面参加德王的各种机要活动。德王给补英达赖成立“巴颜塔拉盟”，引起“察蒙”总管特别是“察哈尔盟”盟长卓特巴扎布的反对。他为此让补和卓结为儿女亲家，以缓和这种矛盾。不料补英达赖的儿子赵宝纲，把卓特巴扎布的姑娘休弃，两个人弄得更加不和，开会时补出席卓就不出席。以后德王挑大官叫卓特巴扎布去坐，但又引起锡盟盟长松王的醋意。由于松王只兼着一个“兴蒙委员会委员长”，所以松王后来团结锡盟的其他王公，反对德王和吴鹤龄，把壮丁充实他的“防卫师”，而不愿给“蒙古军”补充缺额。日本人叫各盟成立“防卫师”，我忘记是诺门罕战役以后，还是张鼓峰战役以后，日本人为充实边防，想把蒙古人武装起来防苏。我曾建议德王趁此多向日方要些武器，德王恐怕盟长们有了军队，愈加不听他指挥，结果没有积极进行。后来日本人变卦，以致把机会错过，只是盟长们挎起战刀，士兵仍使用着旧枪。

再次，绥蒙的王公只有乌盟达尔罕旗的云王（云端旺楚克）、四子王旗的潘王（潘德恭扎布）和伊盟杭锦旗的阿王（阿拉坦瓦其尔）一直和德王合作。云王虽被德王拥为“蒙政会”的“委员长”和“军政府”与“联盟政府”的主席，但云王死了以后，并未重用他的儿子沙拉巴多尔济，只是叫沙贝子任了乌盟的副盟长，中公旗的巴王（巴云英）到了陕坝才升为盟长。四子王旗的潘王死了以后，也只是让他的儿子索那穆绰克珠尔袭任了该旗的札萨克。杭锦旗的阿王，一直被德王搁在包头，尽管他的“防卫师”战斗力不弱，亦没有叫他参加德王当副主席、主席的“政府”。

厚和城土默特旗的蒙古知识分子，文化程度和领导才能，并不低于喀喇沁和科尔沁的蒙古知识分子。因为他们多数是德王的反对派，走着革命路线或参加了抗战阵营，故德王对土默特旗的人民按被征服了的汉人来看待，让补英达赖去进行统治，只把一个参加过百灵庙“蒙政会”的默尔根巴图尔，安排为土默特旗的总管，兼“巴颜塔拉盟”的副盟长。默在日伪时期，从不出头露面，所持的态度和普通的汉奸差不多。土默特旗还有一个知识分子贺云章，因留学日本的关系，被留用为归绥毛织厂的厂长。他

虽给德王拉过皮条，但没有被德王重用。贺因和国民党的军统特务来往，跟补英达赖手下的梁致祥与萧兆赓一案，被日本特务机关扣捕，梁、萧经德、补保释，贺由于没人给说情，被日寇用凉水灌死。这正如同“厚和”日本特务机关扣捕起120多名教员，每天三三两两地拉到新城东门外活埋，我叫补英达赖出面营救，他说“咱们不管汉人”一样。

最后，德王最重视“东蒙”的蒙奸，根据不同的来历分别对待。在百灵庙“蒙政会”前后拥戴或投效他的知识分子，大都倚为股肱，如吴鹤龄真有才干，让他“组阁”出任政务院院长；乌古廷和宝贵廷善于投机，先后担任了蒙古军的参谋长；吉尔嘎朗和特克希卜彦为人很正派，故一直让吉经管财政，并兼了兴蒙委员会的副委员长，特克希卜彦先主持军事，以后出任了驻日代表部代表。还有一个“东蒙”知识分子包悦卿，他在蒙政会任过财务委员会主任委员，军政府时代任过蒙古军第八师师长，以后任蒙疆银行总裁，1937年夏在多伦病故。此人如果活到联盟政府和联合政府时期，地位也不在吉尔嘎朗和特克希卜彦以下。

吴鹤龄称为“小鬼们”的“东蒙”青年，给德担任随员和秘书，每天晚上在德的公馆中办公，和补英达赖在一起，跟德王商讨大事。吴拟出的各种底稿，都经他们修改后才明文规定，故他们和吴时常发生摩擦。其中有陈国藩的内兄丁我愚，则是派到西苏尼特旗给德的小王爷都嘎尔苏龙担任小丞相。因德领导了蒙古伪政权以后，即把他的札萨克职位，让给他的长子。上述的这几个“小鬼们”很能迎合德王的心思，德王弄下的不少造孽钱，多被他们五鬼分尸。吴鹤龄辞职以后，他们也采取了吴的手段，把日本“会社”用来向蒙旗换取皮毛的物资，都堆到张家口东山坡上的仓库里，不给各旗分发，想从中牟利。我建议德王让运盐骆驼和勒勒车[①]的回脚向各旗运输，他没有理睬，结果日本投降时，给张家口的地痞流氓和苏联军队做了“好事”。

由日本关东军派到德王政权中的几个“东蒙”特务，除会说日本话

---

① 勒勒车——内蒙古民间用的木轮牛车。

外，几乎没有一个有才干的，并且品行极端恶劣。陶克陶是个大流氓，喜怒哀乐完全表现在脸上，他的内心活动，很容易被稍微善于察言观色的人看出。金永昌尽占人的小便宜，而不会弄大的钱，把好几十万存在邮局里，结果全变成废纸了。于兰泽在投日以前，曾到南京投奔过蒙藏委员会的乐景涛。德王对于这几个人，在表面上不敢得罪，像对待杜运宇那样，有时也听他们的话，等到他们渐渐不被日本人信任之后，就跟他们疏远。在"厚和"改组"联盟政府"时，便没给于兰泽要职。到张家口扩大成"联合政府"不久，又把陶克陶踢出"政务院"，把他俩都打发到"参议府"。只金永昌能看风使舵，由亲日转为亲德捧吴，保住了一个"交通总局"局长。如同把我的两个卸任师长尹宝山和陈景春，也安排到"参议府"，以示不忘旧人，并且使得他们能在"蒙疆"地区继续鬼混下去。

因为"蒙疆"的武力基本上掌握在我的手中，所以德王对我和我带来的"汉蒙古"，曾使过不少笼络和收买的手段。他知道我是地主出身，很爱土地和牲畜，故表示要从他的西苏尼特旗给我拨地，让我派人前去设立"窝铺"[①]。我对他说："领了你的土地，岂不是成了你的奴才。"他见我拒绝接受，又要我买羊到西苏尼特旗放牧，我因盛意难却，托百灵庙驻防的宝道新，从达尔罕旗买了5000多只羊，他叫牧工给放得很好。因为德王在"厚和"纳范玉英（金娥子）为外室，他的女儿迁怒于我，把我的好羊偷换走，使我的羊群受了很大损失。我只赶到"厚和"200只，让"蒙古军"总司令部的大伙吃掉；剩下6000多只和德王的全部牲畜，都在日本投降以后，被苏军赶到了外蒙古。

德王为了收买我的部下，不仅把我的亲信刘继广、丁其昌和李树声等抽调到政府里担任了部长、省长和市长，而且把他们和几个仍在带兵的汉族师长都介绍给军统华北区区长马汉三，秘密接受了蒋介石的委任状，给他们另找政治出路，以削弱我的力量。蒙古军除了三个汉族师，还有六个蒙古师。这几个蒙古师长起初分亲德和亲日两派，以后他们多数都倾向

① 窝铺——在野外从事农、牧业生产盖搭的临时住所。

了我。德王为此于联盟政府时期，曾在他的西苏尼特旗仿照蒋介石庐山训练团的办法，想把蒙古军师、团长以上的军官，分批弄到王府去受训。因为订出禁止吸食鸦片等纪律，并且让他们和他在一起过住帐幕、吃炒米的艰苦生活，他能坚持下去，大家都感觉吃不消，徒引起日本特务机关的怀疑，并没有给蒙古军官灌输进去些什么，并且收到相反的效果，只办了一期再没继续办下去。

（1966年）

伪蒙古联合自治政府纪要

李泰棻

一

1937年10月14日，日寇侵入绥远省城，贺秉温就以商会会长资格，担任了维持会的委员，从而又任了归绥市的市长。贺秉温系归绥县人，一生做烟土商，由土业公会会长，进而为商会会长。

在日寇入绥后不久，德穆楚克栋鲁普（下称德王）和伪蒙古军也进入绥远，并得到日军支持，预定将伪蒙古军政府改组为伪“蒙古联盟自治政府”，由德化迁到归绥。为此于10月27日，强迫召开了第二次蒙古大会，当时内蒙西部各旗代表及绥远维持会代表300余人参加会议，议决改组为伪“蒙古联盟自治政府”，以绥远省城归绥市为“首都”，并改名厚和；同时发表宣言，其要旨如下：

蒙古民族，固有其土地及人民，且在元朝，创造了伟大而光荣的历史。明代虽退归朔漠，尚保有其与各族的平等地位。迨于清朝，更以分藩兄弟，保有旧疆，并未损失寸地。民国成立，标榜五族共和，我蒙人欣获平等待遇，亦诚拥护不渝。孰知二十稔以还，政府竟以蒙古为外府，省县设治，割土几尽；党政专恣，

剥削无穷；以致盟旗生计，日趋凋落。蒙人义愤填胸，因有高度自治之要求。然自百灵庙树立自治机构以来，政府阳为允准，实则蓄意摧残。疆吏百般挑拨，甚至大军压境；或用经济封锁，令我穷途无路。长此以往，岂非危险之极！因之，去春乌珠穆沁第一次蒙古大会议决，建立蒙古军政府，编制军队，辑抚蒙民。一载以还，规模已具。近数月中，又得友邦义军协助，恢复蒙古长城以北之故土。今由各盟、旗、市、县长官及军民代表议决，建立蒙古联盟自治政府，以保有蒙古领土、严防共产及协和民族为基本精神，以安定生、聚、教、兴、养、卫六事为施政纲领，并坚持和睦友邦，共存共荣，以实现东亚和平之初旨。天人共鉴，此志不渝！

伪政府主要人物如下：

主席	云端旺楚克
副主席兼政务院长	德穆楚克栋鲁普
蒙古军总司令	李守信
参议府议长	吴鹤龄
政务院总务部长	陶克陶
政务院财务部长	吉尔嘎朗
政务院保安部长	特克希卜彦
政务最高顾问	宇山兵士
军事最高顾问	高场损藏

至翌年（1938年）3月24日，名义上担任伪主席的云端旺楚克病逝。7月1日第三次蒙古大会，又议决以德王继任主席，李守信兼任副主席。以下人事，皆无变更。

伪蒙古联盟自治政府成立时，察南、晋北各已成立伪自治政府，他

们有感于产业、金融、交通等项，各自为政，诸多滞碍，就在日寇发动之下，由三个伪组织的代表察南于品卿、晋北夏恭[1]、蒙古卓特巴札布于1937年11月22日在张家口协议，成立联合委员会，其协定条文如下：

（一）本联合委员会，称“蒙疆联合委员会”，处理有关产业、金融、交通及其他重大事项，各政权将原有权力一部分委交本会行使之。

（二）联合委员会设总务委员会及产业、金融、交通各专门委员会；其委员会由各政权的特派委员及其他必要职员组成之。

（三）总务委员长为联合委员会之代表，总理本委员会之会务。

（四）联合委员会设日本最高顾问一名，顾问、参议若干名。

（五）联合委员会的决议，须得关系委员、最高顾问及关系顾问之同意。

（六）联合委员会之统制及指导，均以命令行之。

（七）联合委员会之经费由三个政权分担。

（八）联合委员会受各政权之委托，得掌管其共同财产。

（九）非经同意，不得脱离本委员会。

（十）本协定分缮日、汉、蒙三种文字，遇有条文疑义解释时，须以日文为根据。

其人员如下：

① 于品卿，河北南宫县人，在张家口经商，本任商会执行委员，被日寇选为伪“察南自治政府”最高委员之一。夏恭，山西大同县人，清末拔贡，包揽词讼，勾结官府，被选为伪“晋北自治政府”最高委员之一。

总务委员长（暂缺）

总务委员会委员：卓特巴札布、陶克陶、金永昌（以上伪蒙古联盟政府代表人）；于品卿、杜运宇（以上伪察南自治政府代表人）；夏恭、马永魁（以上伪晋北自治政府代表人）

产业委员会委员：陶克陶、于品卿、马永魁

金融委员会委员：陶克陶、杜运宇

交通委员会委员：金永昌、夏恭

最高顾问：金井章二

参议：村谷彦次郎

到了1938年7月19日，伪委员会决议扩大组织，改订原协议第二条，除产业、金融、交通外，增财务、民政、警务三项；并将各委员会改称为部；同时新设民生、保安两部。其人员如下：

总务部长：卓特巴札布　　产业部长：金永昌

财政部长：马永魁　　保安部长：陶克陶

民生部长：杜运宇　　交通部长：杜运宇（兼）

日本顾问：野田武（总务部），高津彦次、森田清（产业部），寺崎英雄、久间猛（财政部），满尾君佑、伊藤祐、赤坂亮一（交通部），野田武（民生部兼），伊藤祐（保安部兼）

这次扩大组织，而总务委员长仍暂缺员；到了1939年4月29日，德王始就了这一伪总务委员长的职务，为他下一步做“伪蒙疆联合自治政府”的伪主席打好基础。

1939年9月1日，由蒙疆联合自治委员会又演变而为伪蒙古联合自治政府。其成立宣言，大意与前伪蒙古联盟自治政府宣言相同，唯最后强调“防共、协和及厚生诸点为施政之本；而以巩固日、满、蒙、中之联系，同向东亚新秩序建设而迈进为旨归”。又为表示“日、回、蒙、汉四民族

协和的精神”，规定了“黄（代表汉族）、蓝（蒙族）、白（回族）、赤（日本大和族）、白、蓝、黄”等色上下相间的“国旗”。

其组织大纲如下：

（一）新政权以蒙疆地域为中心，以东亚民族构成之。

（二）新政权称蒙古联合自治政府。

（三）新政权之首长称主席。

（四）新政权本东亚之道义，施政以民意为大本。

（五）首都定奠于张家口。

同时，蒙古、察南、晋北三个伪组织共选德穆楚克栋鲁普为伪主席，夏恭、于品卿为伪副主席。德王就职誓词如下：

余在神佛照鉴之下，愿本建设精神，遵守组织法及诸法令，努力于防共、协和及厚生之大业，向建设东亚新秩序而迈进，以期巩固建国之丕基于永久。谨誓！

成吉思汗纪元七百三十四年九月一日

德穆楚克栋鲁普

伪府成立后，原伪察南及晋北两自治政府改为两个政厅，直隶伪政务院。而原伪蒙古联盟自治政府所辖地区则分为五个盟，也直隶伪政务院。其辖区如下：

察南政厅辖张家口（市）、万全、宣化、蔚、阳原、怀来、怀安、涿鹿、龙官、赤城十市县。

晋北政厅辖大同、朔、浑源、应、阳高、天镇、左云、怀仁、山阴、灵邱、广灵、右玉、平鲁十三县。

察哈尔盟公署辖正蓝、正白、镶黄、镶白、太仆寺左翼、太

仆寺右翼、上都、明安八旗。

巴彦塔拉盟公署辖正红、镶红、正黄、镶蓝、土默特、集宁、凉城、萨拉齐、包头、兴和、武川、丰镇、托克托、陶林、和林格尔、固阳五旗十一县。

锡林郭勒盟公署辖东乌珠穆沁、西乌珠穆沁、东阿巴嘎、东浩济特、西浩济特、东苏尼特、西苏尼特、东阿巴哈纳尔、西阿巴哈纳尔九旗。

伊克昭盟公署辖杭锦、乌审、准噶尔、郡王、札萨克、达拉克、鄂托克、五原、临河、东胜、沃野七旗四县。

乌兰察布盟公署辖四子王部落、喀右翼、茂明安、中公、东公、西公六旗。

其各部门官长如下：

主席最高顾问金井章二	参议府议长吴鹤龄
蒙古军总司令李守信	蒙古军参谋长乌古廷
最高法院院长补英达赖	最高检察长刘继广
政务院院长卓特巴札布	咨议雄诺敦都布、特克希卜彦
总务部部长关口保	次长武内哲夫
民政部部长松津旺楚克	次长早坂冬男
治安部部长丁其昌	次长藤井武一郎
司法部部长陶克陶	次长日比野襄
财政部部长马永魁	次长大场辰五助
产业部部长杜运宇	次长中西实雄
交通部部长金永昌	榷运清查总署长吉尔嘎朗
牧业总局长郭尔卓尔札布	最高检察所次长隈光孝道
最高法院次长安布恕	榷运清查部署副署长高须进一
税务监督署副署长岛田三郎	

各地方官长如下：

察南政厅长官陈玉铭[①]　　次长武藤公平
晋北政厅长官田汝弼[②]　　次长森林雄次郎
巴彦塔拉盟盟长补英达赖　　察哈尔盟盟长卓特巴札布
乌兰察布盟盟长巴宝多尔济　　伊克昭盟盟长阿尔坦额其尔
锡林郭勒盟盟长松津旺楚克　　土默特特别旗总管默勒根巴图尔
张家口市市长韩广森[③]　　厚和市市长李春彦
包头市市长金朝文

二

伪蒙政权自始至终是完全由日本培植并由日本支配一切的，但这伪阵容内的主要人物，因其来路不同，派别也很分歧。现在约略分述如下：

就其大者而言，有德王和李守信两派。这两派原来是由日本特务机关分别培植的，到了伪蒙古军政府成立后才合了流；再到伪蒙古联盟自治政府成立后，德主政而李主军。然在第一次合流时，德王自兼第二军，其四个师长依恒额、包悦卿、宝佐臣及雄诺敦都布等，都是德王的人；后来虽然人事有变，仍然不外这个底包。可以说德王的实力，早已培基于蒙古军内；李守信所能指挥如意的，还只是他原来的第一军。然自伪蒙古联合自治政府成立后，李守信的势力也渐渐伸入了政界。他的旧部刘继广、丁其昌（原第一军的师长）等都做了最高检察长和内政部长；后来李本人也继夏恭之后做了副主席，而刘继广、李树声等又分别任了大同、宣化两省

① 陈玉铭，原系伪满官吏，曾任伪察南治安维持会委员。

② 田汝弼，山西省浑源人，日本农业专门学校毕业。

③ 韩广森，河北冀县人，曾任张家口商会会长。

（察南、晋北两政厅所改）的省长和张家口特别市市长，从而李的势力也渗入德王的范围。因此德李之间尽管有些矛盾，大体上还能合作。

单说德王这一派，以地区分，可别为东蒙、绥蒙、察蒙三派。

东蒙派是以陶克陶为首，自始就是以甘当日本特务的姿态出现的，完全以日本特务机关的意志为依据，经常伺探德王、李守信等的言语行动向他主子报告；甚至依靠日寇，欺压德、李等人[1]。但至后期，德王等渐得日寇的谅解，把他的大权取消，只畀以参议府参议的名义。东蒙还有热河一派，如吴鹤龄、金永昌（日本士官学校毕业）、乌古廷（东北讲武堂毕业）等，原想借着德王搞些事业，并非真想投靠日本，日寇也并不很信任他们，特别是对于吴鹤龄。德王早想用吴主政，但内遭陶克陶的反对，外受日本人的阻挠，不能如愿，只好派吴到日本考察。这说明东蒙两派完全对立，因而德王与日本之间也曾有较大的摩擦。

绥蒙派王公留在原旗未动的，既入于日寇侵入范围，只得跟着下海；但他们不积极活动，很少参加张家口伪中央政权，因为他们并不拥护德王，德王也不信任他们。

察蒙派德王以下，以补英达赖、卓特巴札布为首，有松津旺楚克、雄诺敦都布等人。他们或系德王的亲戚，或系札萨克、总管，唯德王之马首是瞻。德王自然信任他们；日本人也利用他们容易驾驭，所以他们始终占有高位。五盟中除伊、乌两盟外，其他三盟盟长均为此派人物所盘踞。最特殊的是补英达赖，他既不是札萨克，也没任过总管，而且不是巴彦塔拉盟的蒙民，德王以姻娅关系，硬拼凑了五旗、十一县（原为绥远省政府的辖地），划为巴彦塔拉盟，让他做了盟长。这是德王破天荒地任用私人，深为蒙人所不满。

此外还有两个无派别的，第一个是杜运宇[2]。他以山东人流落到张家口任职，在伪政权成立前后，他和日本，蒙古全无往来。因察南维持会的旧

---

① 陶克陶的行为，李守信几次向我说过。

② 杜运宇，山东济宁县人，日本早稻田大学毕业，妻系日本人。刘汝明主察时任财政厅秘书，日寇入张后，被选为察南伪组织最高委员之一。

关系，加入了这一伪组织，历任各部，但始终不参加以上各派。有时在无关日本国策问题方面，他还敢同日方争论。如对于车站警士胡乱打人以及小日特的不法行为，他对日方曾提过“必须依法惩办”的要求，从而此风稍戢。第二个是默勒根巴图尔，他是土默特旗完全汉化了的蒙古人，卒业于北京大学；和杜运宇一样，那时都在壮年。但他沉默寡言，对其他蒙派无所联系，只和德王有直接的关系。解放战争时期傅作义到绥远后，他就到了解放区，听说做过内蒙政府民政部的副部长。

随着时势的要求，日本方面认为伪政务院的组织，已经不适用了。为了加强效力，精简机构，日伪于1941年6月1日，公布了改订政务院官制十九条，同时改组了伪机构。

卓特巴札布调长伪参议府，吴鹤龄调长伪政务院。吴在日本两年，不但学会日语，而且娶了一个日本妻子，和日方有了进一步的勾结。这时他已回国，而陶克陶从此下台。伪政务院以下人员是：

总务厅长——武内哲夫（兼） 次长——陈有声

回教委员会[①]委员长——蒋辉若 副委员长——曹英、李郁周

驻日代表部代表——特克希卜彦 驻满代表部代表——恩和布林

驻华办事处处长——市村隆吉

中央学院院长——黑岩义胜（少将）

司法委员会长官——杜运宇 次长——住安国雄

交通总局局长——金永昌 次长——中西实雄

兴蒙委员会委员长——松津旺楚克 副委员长——吉尔嘎朗穆克登宝

内政部部长——丁其昌 次长——武内哲夫

① 回教委员会设总务班和指导班，指导班下设调查、宗教、文教、厚生四股；各盟公署各设回教班。“西北回教联合会”直属于回教委员会，在张家口、大同、厚和及包头均有分会，早在回教委员会以前成立。

经济部部长——马永魁　　次长——沼野英不二

这一时期前后的地方重要人员如下：

察南政厅长官——陈玉铭　　次长——泽田贞一
晋北政厅长官——田汝弼　　次长——森井雄次郎
察哈尔盟盟长——卓特巴札布　　副盟长——色楞那木济勒
参与官——森一郎
巴彦塔拉盟盟长——补英达赖　　副盟长——默勒根巴图尔
参与官——简牛耕三郎
伊克昭盟盟长——阿尔坦额其尔　　副盟长（缺员）
参与官——黑泽隆吉
乌兰察布盟盟长——沙拉巴多尔济　　副盟长——林沁僧格
参与官——木村祐次郎
锡林郭勒盟盟长——松津旺楚克　　副盟长——补达巴拉
参与官——久光正男
张家口特别市市长——韩广森

在此以后，直至日寇投降，三年有余，这一伪政权的内外方面组织和人员，略有变更。即司法委员会又改称司法部，调宣化省长文画君为部长。经济部长马永魁死后，调大同省长田汝弼继任；田死后，又调杜运宇继任。察南和晋北政厅，在1943年以后都改为省。宣化第一任省长为李焕瀛[①]，李死后，以文画君[②]继任；文调司法部后，以大同省长刘继广调任。大同第一任省

① 李焕瀛，河北省怀安人，直隶法政专门学校毕业，回县后参与县政多年。日本侵入后，初任本县伪县长，继调伪察南民政厅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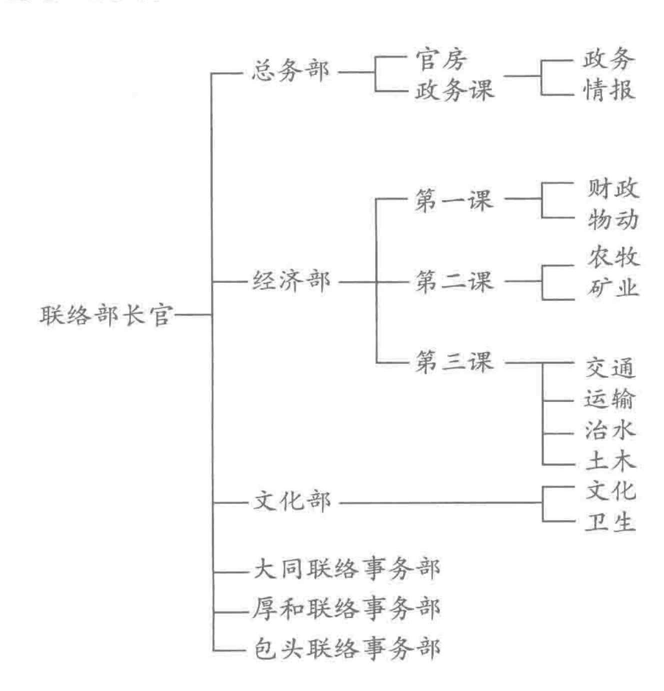
② 文画君系清末拔贡，和夏恭同年，山西省浑源县人。日寇入侵后，夏恭拉他出来任伪组织的厅长。

长，仍由原长官田汝弼改任；田调经济部后，以刘继广继任；刘调宣化后，以张家口特别市长李树声继任。这就是日寇投降，伪政权解体以前的变动；至于无关紧要的组织和人事，当然也不免有所更张，那就不谈了。

三

在日寇侵略中国的初期，是以日军的军部，直接通过伪组织统治各地。后来日本设立了兴亚院这一机关，作为侵略亚洲统一计划和指挥的中枢，在华北和蒙疆都设有分部，名为兴亚院华北或蒙疆联络部。蒙疆联络部的组织如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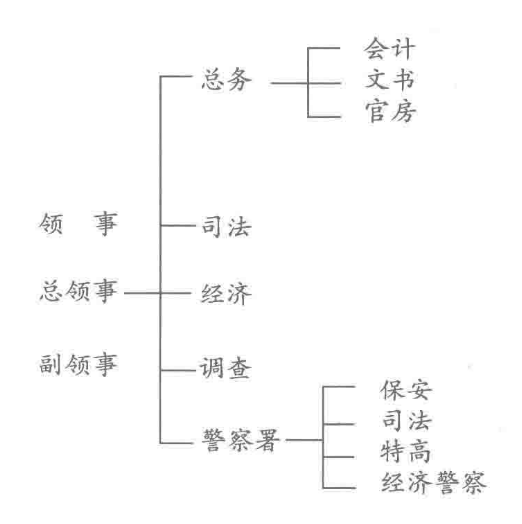
首先，联络部就是统治伪蒙古自治政府的最高机关，伪政府的最高顾问是承联络部长官之命行事的。第一任长官是竹下义晴中将，1941年11月，竹下他调，以岩崎民男继任。更后又把兴亚院联络部取消，改为日本驻蒙古公使馆，岩崎民男少将改任公使。但这是换汤不换药的统治方法，其本质是绝无二致的。



其次，配合统治的有日本新旧领事馆。为了管理侨民，通过外交关系，在别国城市里，开设领事馆，是很平常的事。但日本设领，特别是张家口设领，纯粹是为调查、研究，从而侵略这一地带服务的。远在1923年，那时日本在张市的居留民不过数人，就设立了驻张领事馆，经过了荒井、根津、山崎、桥本四个领事，一直搞的是鬼鬼祟祟的勾当，地方政府也有所闻，但并未严加防范。日寇侵占热河和“七七事变”时，曾两次闭馆。到了日军进入张家口时，重升格为张家口总领事馆，以森冈任总领事。随着日军西侵，10月分设出张所于大同、厚和和包头。1939年5月，厚和出张所升格为总领事馆，包头升格领事分馆，大同未变。其总领事馆的机构如下：

危害中国人民最甚的，就是警察署的特高（高等特务）和经济警察。领事馆的警察署本是为日本居留民而设置的，没有任何权力管中国人。但高等警察经常借口反日思想，欺侮勒索；而经济警察又借口暴利，帮助日人，讹诈商民。

另外，日本在张家口还设有军司令部，其司令官为中将级（根本博曾任司令官），名义上是指挥驻在蒙疆的日军，但关于配合作战，往往也涉及伪蒙古军，从而伪蒙军就得受他们的指挥。至于伪蒙军的扩编与分合，更须事先得到日本军部的同意，那就不必多说了。



四

1939年终，汪精卫从重庆脱出，勾结日本，期图在沦陷区内建立一个统一的伪政权。他仍然利用“以党（国民党）治国”，以“国民政府”为名，与蒋介石的重庆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相对立。在他次年3月30日“还都”以前，曾与伪华北及伪蒙古当局有所协商。关于与伪蒙协商的情况是这样：

汪方以周佛海为代表，蒙方以李守信为代表，在青岛交换意见后，约定如下：

（一）“中央政府”基于既成事实，承认蒙古联合自治政府的高度防共自治权。

（二）其关系间的细节，将来由“中央政治会议”再议；中央政治会议开会时，蒙古可以派代表出席。

后来南京伪国民政府成立之际，伪蒙政府曾发表声明，大意如下：

今次事变，澎湃东亚全土，咸以反共为契机、和平为愿望。今次国民政府成立后，善邻相环，对东亚新秩序建设的具现，更加有力。我蒙疆以友邦日本之绝大支援，早已崛起，成为防共特殊地带；并已阐明铲除共产党的决心，以期为东亚协同整体，尽我一环的努力。

今新中央政权的新国民政府于本日成立，树立和平救国之旨，与东亚永久和平之东洋道义实相吻合。谨祝其前途无量并对汪精卫主席挺身而出的爱国至情，表示敬意。

自新国民政府成立后，重庆伪蒋政权即将濒于溃灭；人民久陷暴政，痛苦呻吟，倘尚不知悔悟，定遭惩处。我蒙古联合自治

政府，基于其特殊性，坚持高度自治，但愿参翼新国民政府，协力于兴亚圣业之完遂。

从这个声明中，可以看出伪蒙还是要与伪汪政权分庭抗礼，当然这也就是日本所谓满蒙政策的本质。日寇妄想让满蒙都成为“国”，分别在他统治之下，北抵苏联，南制中国本部。因此，伪蒙与伪满都是互驻代表、互相亲善、互换物资、互任人员。

在伪满庆祝“建国十周年”时，也就是1942年4月，伪蒙主席德王率伪蒙古军总司令李守信、内政部长丁其昌、参议府参议吉尔嘎朗、主席府秘书处长村谷彦治郎、总务厅参事中岛万藏、主席府秘书旺尔克札布、朝克巴达尔夫等14人，于22日到达伪满的新京长春。当日向伪满皇帝溥仪作非正式的觐见；次日，溥仪在东便殿正式接见。德王对伪满给伪蒙的支援，说了一些感激的话；并“对满洲国十周年寄予真诚的庆祝”，随即敬献赠品。溥仪答谢，并分别去嘉乐殿及别室宴会。下午，德王等又到关东军司令部访司令官梅津表示感谢支援。当晚梅津宴请伪蒙代表团全体，由伪满国务总理大臣张景惠和部长们作陪。梅津致欢迎词后，德王致答词，大意如下：

自蒙古政府肇造以来，基于日蒙亲善的宗旨，关东军对我们的支援，是口难尽述的。举其大者，从百灵庙自治运动直至蒙古军政府的成立，均依关东军为后援，即以后的绥东、张北及绥远诸战，也和关东军的支援有着莫大的关系。以上这些，关东军都体现了日蒙协力的精神，为日蒙两民族的亲善，树立了牢不可破的基础。饮水思源，实深感激。今后我蒙古愿在大东亚共荣圈内，诚心诚意献出我们所有的力量，为东亚大理想、皇军大胜利而努力！

为了对德王访问的答礼，伪满派治安部大臣于琛澄为专使，率随员

伪兴安省长博彦满都、外交部调查司长何春魁、兴安省参事官乌云达赉、总务厅理事官松山外吉等11人，于6月9日到张家口。次日，谒德王于伪主席府，最高顾问大桥忠一，伪副主席于品卿、李守信均在座。午后，到伪政务院访问伪院长吴鹤龄及伪兴蒙委员长松津旺楚克；晚间，德王设宴招待。11日，于琛澄等至兴亚院联络部访问，随即回任。

这一“满蒙交欢”的丑剧，实际编剧者是日寇的兴亚院，导演是梅津与岩崎；德王、溥仪以下，不过是傀儡演员而已。

在前一年9月18日，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长王揖唐率随员六人，曾至张家口与德王会谈一次，谈话内容极为空泛。以后伪华北建设总署督办苏体仁虽又到张市访问，但亦只是普通酬应。伪蒙所派往华北的答拜人员不过金永昌之流，非但德王不往，即伪院长级的使者亦不作公式的答拜。这是日寇防止伪蒙与华北、南京伪组织任何团结的具体表现。

但德王曾亲对我说过：“在保持特殊情况，也就是用人行政自主之下，承认南京政府为最高宗主权是可以的，但必须有所等待。”当然，他的有所等待是希望得到日本的同意，而日寇对此是决不会点头的。

回忆在伪蒙疆政府时期

奇天祥*

伪蒙疆政府的产生，同伪满洲国一样，都是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满蒙政策”的排演，牵线人自然是日本军国主义者。傀儡的主角是德穆楚克栋鲁普（德王）、李守信、吴鹤龄辈。自命为“成吉思汗继承人”的德王，早有分裂祖国独树一帜的活动。他以内蒙古民族的“自治”“自决”来标榜，不论在“百灵庙自治”时期，“德化军政府”时期或归绥的“蒙疆政府”以及流亡到阿拉善旗的“自治政府”时期，都是这种罪恶活动的再版。他使内蒙古人民在日寇和反动派的刀光血影里受了十多年的灾难。

德王最得意的时代，莫过于日寇纵横于祖国的大片土地上奴役中国各民族最黑暗的时代。这时伪蒙疆政府拥有：锡林郭勒盟、察哈尔盟、乌兰察布盟、巴颜塔拉盟、伊克昭盟（伊盟仅有准格尔旗一部和达拉特旗一部）以及1939年合并晋北和察南两个傀儡政权为大同省、宣化省、张家口市。人口600万，其中蒙古族人不足30万。这个伪组织是完全靠日本的刺刀来维持的，不仅在外貌上由“皇军”保护，在骨子里也须仰仗“皇军”配备一套人马，才能组织成这个庞大的傀儡机构。

伪蒙疆政府的各个单位和机构内，有数以万计的日本人官吏，他们完

---

* 作者曾任伪伊克昭盟警察第一大队长。

全控制着每一个机构的军事、政治、经济、组织、人事等实际大权。伪蒙疆的大小蒙汉官吏，都仰承日寇的鼻息。1941年春天，我和森盖林庆（当时我是伪伊克昭盟警察第一大队长，森盖是第二大队长）到张家口伪治安部（后改内务部）报告工作时，发现除伪部长丁其昌和几个点缀品似的蒙汉职员外，几乎四百多名职员都是清一色日本人。自然所用的公文都是日文。我吃惊地盘问一个蒙籍职员："你们怎样做工作？"他笑了笑说："我们没有什么事可做，这里都是日本规矩！"在招待我们的宴会上，日人武内次长向我们解释："蒙古是个小孩，非有大量日本人帮助不可，等到蒙古成了大人，日本人自然要交给蒙古人的。"一旁坐的丁其昌不住点头哈腰连称："对！对！对！"

日本人也经常对我宣传说："我们一定要帮助蒙古人独立，现在首先要培养很多蒙古官吏。"不可否认的是他们也确实培养了一批善于窥测主人心意、奴颜婢膝以适应他们所需要的"才干之士"。

日寇刚侵占绥远，伪蒙疆政府宣布在归绥（日伪改为厚和特别市）成立，迫使各蒙旗王公来庆祝"大典"，那是最热闹的时候。1937年冬天，在沦陷区的各盟旗王公，都提心吊胆地出席了这个会议。只有伊克昭盟因黄河沙漠的天然条件，日本的势力达不到，因此由各地败溃的国民党军数万人马都相继逃入伊克昭盟地区。伊克昭盟王公也动摇于两者之间。日伪方面却尽量在伊克昭盟各旗活动，争取上层分子"归顺"。当时准格尔旗负实际责任的是东协理代理札萨克奇文英和西协理奇凤鸣。他们两个也同来归绥庆贺"大典"。

奇凤鸣是我叔父。他早在德王搞百灵庙自治时期就和德王有联系，同时，他还到百庙灵一次，表示拥护云王、德王的"自治运动"。后因绥省主席傅作义的压制，才没敢妄为。这次他去归绥，我家正好住着由绥远逃亡出来的国民党绥远省党部委员陈国英，陈对我叔父赴绥投向日伪却表示了谅解。他向我说："处于你们这个环境，和日本来往是对的。"他似乎还称赞我叔父的投日是英明呢。

那次到归绥庆祝"开国大典"，伊克昭盟七个旗中，仅有准格尔旗

两个协理、达拉特旗的森盖林庆、杭锦旗的阿拉坦鄂齐尔（伊克昭盟副盟长、杭锦旗的王爷）。但阿王因为在“百灵庙自治”时期仅得一个实业处长的位置，异常不满，以后他就向傅作义靠拢，同伊克昭盟盟长沙王搞起一个“绥境蒙政会”，这次他投机去归绥，就受到伪官吏的打击，最后甚至禁止他回旗，在包头设立个伪伊克昭盟公署，名义上他是代理盟长，实际上形同软禁。

日伪对伊克昭盟盟长沙克都尔扎布（沙王）很重视，特地由包头特务机关派了一架专机，由日本特务内田等亲去札萨克旗迎接。沙王婉言拒绝，只派了奇文卿等几个代表。沙王不去归绥，打破了日伪不战而“收复”伊克昭盟的计划，特别是打击了日伪方面“策士”的预料。吴鹤龄（当时是最高参议）老羞成怒，对沙王的代表们大骂：“你们沙王爷一直想搞垮百灵庙的自治，所以得到蒋介石数十万元的收买，就同几个出卖民族的王爷在绥远又搞了一个绥境蒙政会，打算分裂蒙古民族的团结。今天我们在‘皇军’的帮助下，已成立了蒙古人自己的政府，你们还想看风头，过几天收复了伊克昭盟，看你们王爷往哪里跑！”

伪官吏的下马威，打击了目击当时情景的准格尔旗两个协理奇文英和奇凤鸣。他们又看到日伪处处威吓和傲慢，尤其在大会场外，“皇军”的坦克、大炮示威，更使他们惊心动魄。不久他们就悄然返旗了。但沙王还是派了他旗内章京（加克尔齐）僧格林沁代表自己常住在包头的伪伊克昭盟公署，担任了会计科长，一直到僧格林沁在包头逝世。沙王对日伪藕断丝连的应付，受到了抗日阵营内青年们的反对，沙王不得已宣布撤销了僧格林沁在旗内的章京职务，对大家表示了抗日的决心，但在另一次札萨克旗会议上，又秘密提升僧格林沁为西协理。我叔父奇凤鸣也同样是阴阳两面，一面让我和驻扎在我们附近的国民党军打交道，一面又密令我们保安第一大队长黄俊德和日伪联系，争取主动。

吴鹤龄吹嘘用武力“收复”伊克昭盟的话，倒不是无的放矢。就在1937年冬末，由伪蒙古军总参谋长乌古廷指挥第八师等骑兵猛扑东胜县，准备一举攻克伊克昭盟的中心地，以便威胁伊克昭盟各旗“归附”（因伊

克昭盟受黄河沙漠的阻隔，不利于机械化部队的行动，日军未出动）。但他们的如意算盘打错了，不仅东胜军民有抗敌御侮的决心，就是札萨克、郡王两旗也有敌忾同仇的认识，在敌伪军围攻东胜正紧张时，遭到扎、郡两旗保安队腰击，致使伪蒙古军大败溃折，此役几乎活捉乌古廷。从此，日伪军再没敢深入伊克昭盟腹地。旋吴鹤龄也被他的政敌陶克陶打击，东渡日本学日语去了。

我叔父阴阳两面的应付，给准格尔旗带来很大的灾难。国民党军队在我们统辖地区愈聚愈多，番号也极为复杂。我是和这些抗日"英雄"们打交道的，但是有应酬不暇之势。他们要粮要草要大烟，可以说无所不要，至于抗日不抗日倒与他们无关，甚至他们很直爽地说："这里不好，到那里去（指归日伪），反正有枪杆子就有办法。"两年后，大汉奸王英东山再起，由天津到包头成立"绥西联军总司令部"，并派人到伊克昭盟作广泛的活动，而这些"抗日军"大多数投入王部（计有乌青云、陈秉义、王拴子等）。

这些抗日"英雄"，都是所谓"国军"。他们蹂躏地方，压迫蒙汉人民，同我们准格尔旗的保安队的摩擦，也日甚一日。别的不说，只说一件"侮辱国旗"事件吧。有一天"国军"忽然要升旗了，并且命令保安队也照样去做。保安队当然不明白弄这些玩意儿干什么。既然"国军"有命令，为了彼此友好吧，就照章执行，派了个弟兄，看一看国旗的样式和人家升旗的举动。这位鲁莽的年轻士兵，将青天白日国旗的十二个月牙，数成了十四个，回来照样用红布缝制了一个，栽起高杆举行起升旗典礼来。但不会唱国民党的国歌。这些天真的保安队认为反正是唱一下歌，扯起旗来就算，大家站起队来，唱了一阵哥哥妹妹的山歌，将国旗升上去。事被"国军"侦知，就来兴师问罪。保安队也不甘示弱，恶语回复，最后索性将国旗扯下，一火焚之。这种举动，严重地藐视了爱护国旗的"国军"的尊严，指着保安队队长质问："你是不是中国人？"但是落后的保安队长，连这种最浅近的知识也没有，他回答："不是，我是个蒙古人。""国军"军官又问："难道蒙古人不是中国人吗？你不知道五族共

和吗？”说实话，当时的准格尔旗军民，地处偏僻，落后保守性很大，许多常识确实不知道。

在我叔父被马占山部白三阎王（白凤翔）所执而自杀以后，我借口收容保安队，乘机跑到准格尔旗河北岸地区（是准格尔旗一个区，现划入土默特旗），收罗我叔父统辖下的保安队五百多人（虽然和白打了一仗，但人马武器损失并不大）。通过一次形式上的选举，我由一个挂名的上尉参谋成了保安总队长，继承了我叔父的实际权力（只是缺少一个法定的协理委任），我从此当了日伪的帮凶。

恰巧这时，伪伊克昭盟公署派了一个日本人心亥，代表伪伊克昭盟公署来准格尔旗宣慰。他认为我率士来归，是与他的“宣慰”分不开的，就建议我去包头，由他一力承担我的“要求”。于是我“名正言顺”地成为准格尔旗协理兼保安总队长。

是年夏末，伪蒙疆政府在归绥召集各盟旗县的王公开会，主要商议晋北、察南两个傀儡政府和伪蒙疆政府合并的问题，我算是王公代表，另派第二大队长奇庆林为准格尔旗的“人民代表”，参加了这次会议。

会议是由德王主持的，他是伪蒙疆政府的主席兼政务院长（这时云王已死）。

德王自从利用日本的刺刀登上主席宝座后，自己尽量扮成一个神圣不可侵犯的“救世主”，在三个傀儡政府合并以后，他还向驻蒙疆日军司令官莲沼中将提出要求：希望“皇军”协助，将伪满所属的呼伦贝尔、昭乌达、哲里木等几个盟划入伪蒙疆政府。莲沼很幽默地说：“满洲国是蒙疆政府最亲密的盟邦，目前还不宜有此交涉，‘皇军’赫赫战果，不久就会结束在支那的战役，那时‘皇军’就会替您收复外蒙，您就是全蒙古的大皇帝了。”（此语系日军驻萨拉齐县部队长山崎英次大佐亲自给我说的）

三个伪政权的合并，领土虽然增多，可是大批大批的日本人也来了，塞满各个单位，控制得更加严格，将“立国”“有功”的蒙古族中下级官吏一下排挤出去，不少人成了领干薪的伴食之官。他们无油水可揩，仅靠工薪是不够挥霍的，虽然当时物价还没有飞涨，可是这些人一般都有打

牌、吸大烟的嗜好，在他们手头拮据时，也要对景伤情，发两句牢骚。

但是日本人的权力并不因这些人“抱屈”而有所抑制，反又将李守信的基本部队一、二、三师全改编成“靖安警备军”（武装警察队），伪蒙古军只有第四、五、六、七、八、九师六个师了，而这几个师并非李的嫡系，全是纯蒙古族人编的部队。他的基本人马隶属于伪治安部，但充满日本指导官，控制着组织、人事、财政、指挥大权。李守信虽然是伪蒙政府副主席兼伪蒙古军总司令，但无权统率其嫡系部队。好在这个胡子头儿爱的是玩姑娘、抽大烟，只要满足了他的荒淫享受生活，其他也不计较了。

我带的准格尔旗保安队既然归顺了日伪，日本人当然要进行改编和教育一番，以显示“皇军”恩威并用。1939年10月，伪伊克昭盟公署警务厅派来日人杭锦科长等七八人，准备着手改编我的保安队。几经磋商，确定了保安队的精锐（年轻力壮无不良嗜好者）全改编成伊克昭盟伪警察第一大队，由我担任大队长，分四个中队，共计四百六十人。但这个警察大队不是行政警察，而是武装战斗警察，以警察官的肩章：警正、警佐、警尉补、警长、警士来排列，所负的任务是替日本人打前锋卖命。

警察队全部给养由上面供应，留下一部保安队，算是维持准格尔旗河北岸一隅之地的军队。

傅作义的部队由河曲经过准格尔旗南部开到后套，在陕坝、五原、临河等地整训了一个时期，准备就绪，举全力在这一年冬天进攻包头。但大战在包头揭幕后，不足一千的“皇军”，却阻止了傅部的前进。傅所指挥的国民党嫡系门炳岳的第七骑兵师，配合傅部进攻萨拉齐县、破坏铁路，准备和傅东西呼应，夹击包头，但由于路线错误，在一个寒冬漆黑的夜里，冲入准格尔旗河北地区我的防地内，保安队自然仓促应战，门部也莫明其妙地和我们展开了每一个村屯的争夺战。战争的激烈出乎我们意料，但我们保安队顶住了这支武器精良、训练有素的“铁帽子军”（门部骑七师都戴铁盔），这主要是保安队痛恨国民党军队蹂躏准格尔旗人民，涂炭其家属，故能努力作战。后来在胡宗南的七分校《王曲月刊》上，曾登过这一战役，称：“抗日劲旅，在遭到准格尔旗投敌的军民的袭击，战斗甚

为激烈。”这个糊涂仗，牵制了门部攻萨拉齐县，破坏铁路的任务，使日本援军开到包头“转危为安”。在我们保安队几个进行改编工作的日本人，面对此突然而又最激烈的战斗，吓得目瞪口呆。他们估计敌人炮火这样猛，人数又这样众多（当时号称一万人，实际四千多人），而且又是正规化的战术，无论怎样保安队是支持不了的。因此，他们深怕全军覆没，自己也活不了，把他们平日的矜持的面孔，一下变成可怜相，哀求似的向我建议：“大队长，突围跑吧，不然通通地死了。”杭锦科长通过翻译向我说：“您下命令全部撤退吧，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其实我早考虑过突围的事。不过两方已形成犬牙交错，大部已掺杂在一起，敌我已分不清，命令势难下达各队。同时，我很明白，多年来跟我叔父的那些老队长，顽固性强，我在他们的心目中是个童稚的后辈，万一命令下达后，他们倚老卖老地不服从，我在日本人面前反而会失去威信，况且家眷都在，也是我顾虑的地方，又仗着我地形熟悉，乘的是骏马，在最严重时期，我想也能冲出去。因此，不理睬日本人的建议。最后，我索性向日本人表示：“我不能离开准格尔旗父老们独自偷生，假如你们愿突围的话，请你们先走吧。”日本人自然不敢单独行动，反过来又赞扬我有“从容就义”的精神，与大日本的“武士道精神”一样。

战斗两日后，双方都已精疲力尽，保安队的弹药恐慌也严重起来。我正在进退两难的当儿，日本援军开到（主要为了在我们部队中的日本人安全）。开来的日军汽车七八辆，还有坦克三辆，人虽不多，但炮火异常猛烈，压住了门部的炮火。我乘机命令保安队反攻。这时，在我们保安队的七八个日本人也活跃起来，居然也“挺身而出”，敢和保安队站在一起，勇敢地冲锋了。门部经过连日的激战（在和我们战斗前，已和日军战斗数次），也疲乏不堪，只好向准格尔旗黄河南岸撤退，伤亡和武器损失很大，甚至把电台也扔掉。我们的力量也只能将骑七师驱逐出我们防地，就算万幸，而日军也任务紧急，匆匆地连夜奔向包头。

门炳岳退到准格尔旗河南岸，整顿好部队后，又发出向我进攻的命令。这时准格尔旗有两人替我“解围”，郝勇功（原准格尔旗保安队营

长）、傅存仁（准格尔旗地主）相继访问了门炳岳，并解释了我“被迫”归日的经过。门考虑了一下，大约是感到再和我纠缠会妨碍攻占萨拉齐县的任务，只提出交还他失去的一座电台（实际这座电台扔在百姓家中，我派人找回）。就令郝勇功带路，由我们西面（未经准格尔旗防地）直奔萨拉齐县，但为时已晚，日人的兵车源源由东开到，控制了交通线，包头也开始了反攻，傅部被迫退去，损失伤亡很大。傅部这次进攻包头，事先准备工作是精密的，但在战术方面是有缺点的。转龙藏是包头的制高点，但未抢占（实际没有一个日军守护），铁路也未令各地游击队破坏，让日军大批开到，将山野重炮设在转龙藏，猛轰“国军”阵地，加上安北、固阳返回的日军残部，攻击了傅军的指挥部，使“国军”陷入混乱。伪蒙军原打算反正（驻包头伪蒙军第一师郭大刁部反正未遂，其部下于团长率部反正），但“国军”未很好地争取，日军大部开到后，迅速地控制了伪蒙军（曾架上重机枪在伪蒙军第一师师部，迫令其进攻“国军”），促成了“国军”重大的伤亡和迅速的败溃。

经此一役，日人对我保安队非常重视。日《朝日新闻》大肆鼓吹此次战役，谓：“准格尔旗保安队英勇善战，其大队长年轻勇敢，能沉着指挥。”日寇也对我尊重起来。在未战以前，日寇轻藐地问我：“你的几岁？噢，漂亮的小孩啊！”战争以后，却伸起大拇指：“你的大大能干。”表示佩服，而且从此也不和我正面冲突了。旋即给我发下三八式步枪370支，轻机枪二十多挺，装备子弹大量送来。为了鼓励我的效忠“皇军”的“功绩”，伪蒙疆治安部次长（日本人）特地来嘉奖了我一番，并允许经费和武器弹药保证满足供应。日本人对我的信任，增强了我给他们当走狗的决心。

不久，留在抗日区的准格尔旗代理札萨克奇文英，派他的亲信持着他的信来见我。内称：“国军自从消灭我弟凤鸣官府后，现又集中力量压制我，目前境况恶劣，万难应付，请侄（称我为侄）代求‘皇军’出兵援……”我明白奇文英所说的困难是实情话，因国民党军虐杀我叔父后，又变本加厉地压制他，在准格尔旗河南岸驻重兵，隔断我们的联系（也许

是怕他投日），又用了各种不同的花样欺侮他，剥夺他的权力，他才喊出归日伪的口号。但我对他也是不谅解的，当白凤翔解决我们后，白部张参谋长向我说："你们的事，过错在你们旗的内部，奇文英拍电中央，报告你们投敌，请中央派兵迅速解决。我们才奉命来此。"这话也许是他们的挑拨，不过我们两方是有宿怨的。

日军驻包头的司令官小岛中将特为奇文英请求援助的事召集了伪伊盟公署的参事官、警务厅长、驻包头的特务机关长，以及"鄂尔多斯挺进队"司令森盖林庆和我开会研究。会上，我和森盖坚决要求"皇军""收复"伊盟。其他日本人是缄默不发一言（也许是怕小岛）。小岛先询问我俩的计划、打算和办法，然后引我们大家走到十万分之一的军事地图前，严肃而又装成很威风的样子说："蒙疆只剩伊盟一块土地未收复，皇军当然有责任帮助来完成这个任务。可是最大的困难是收复后固守的问题，皇军不能用大部军力来守这个交通不便地区，靠蒙古军恐怕力量不济。最近后套的失败，说明蒙古军还是抵抗不了中国军队的（日军侵占后套后，交给伪蒙古军固守，被傅部收复）。假如你们伊盟能团结起来，装备好武器，在那个适宜你们活动的地区上，能否保守你们的家乡呢？"接着他的代参谋长小林中佐反复地问我们在伊盟的驻军番号、人数、装备、国民党军队和共产党边区的关系。因为我们说的使他很多地方不满意，可见他们早有这方面的细致情报。最后，他估计在伊克昭盟的抗日军最少有三万人，而我们各旗的保安队最多一万人，武器、装备、训练更悬殊很大，加上西面的傅作义军和南面的八路军等，都是主要威胁。他说来说去的意思是：怕八路军占据了这块地方，使各盟旗在国民党挤迫下"赤化"，那样更会糟糕。

小岛在快散会时，向我们做了"收复"伊克昭盟的保证说："这问题很重大，皇军要做进一步的考虑，不过你们要放心，皇军是一定会收复伊克昭盟的，希望你们做好准备，尤其是策动各盟旗的王公们来打'中国军'，因为伊克昭盟各旗都是在困难中挣扎。"小岛做了郑重"保证"，我们自然心喜，同时想到国民党军队欺压伊克昭盟军民，也给我们制造机

会，我回复了奇文英的代表，并交给了他“皇军”的指示，让他做好准备，策应“皇军”，“收复”伊克昭盟。

我刚回旗下，傅作义特派王任之由后套来见我，说什么我叔父的死是白凤翔因想侵夺我们家产才造成的，“中央”和傅先生绝没有指示，你的“归日”是被逼迫的，“中央”都能原谅。假如你现在反正，给你很高的地位。同时他又要求我派代表到后套见傅，说你所要求的都能答应。我本来这时已死心塌地给日伪当走狗了，但我的“帮闲客”李仲深、席良、刘士奇等都劝我和傅联系，对我将来的前途一定有好处。再说，向傅要些武器、经费，扩充自己的力量，这不是更好吗？这个如意算盘是不错的，我采取了他们的意见，请席良、李仲深代表我去后套拉拢一番，主要目的是要东西。

李、席去后套仅给我带回一件“司令”的委任状（我记不清是什么司令名号了）。和“皇军”给我的“恩惠”对照，觉得“皇军”真是对我们太“深厚”了。我自投日伪后，和伪伊克昭盟公署民政厅长（伪伊克昭盟公署的四个厅是警务厅、民政厅、畜产厅、教育厅）吉尔嘎朗友谊很深，他是吴鹤龄派，吴和陶克陶（伪蒙疆总务厅长，以后任交通部长）斗争很激烈。在日本人面前争宠，互相诽谤打击很厉害，最后因陶克陶会日本话吃香，吴被挤下台，到日本学日语去了。因此，吴派大受排挤。可能吉感到这点吧，和我结成友谊，可以对付陶，因我算一个有实力者，又得到日本人的信任。我刚归日伪时，欲得准格尔旗协理的委任，那时阿王因我未给他送厚礼，坚决不同意，但实际权力不在阿王之手，不过听说阿王还在德王面前进谗，说我年岁太小，不能胜任，怕各旗不服。吉尔嘎朗也在德王面前顶他，说我虽然年轻，那是率领军队归顺我们，又经过准格尔旗军民一致推选来的，这与各旗关系不大，我们不应该以个人好恶，否认人家来归顺我们的诚意，况且日本人已同意了，我们不应该无理取闹。这样算决定了我的政治地位。

我曾几次在德王幕中钻营，也浅近地了解到内幕一些事。在表面上看，大家好像很忠心拥护他似的，实际上钩心斗角，内部矛盾倾轧得很厉

害，都想利用他做自己升官发财的工具。而德王本人在政治场合上的才能经验不足，且又不能主持公道，处处表现出偏私于王公，尤其对锡林郭勒盟的王公，更是偏袒。在化德成立伪军政府时期，召募来数千蒙旗的流氓、土匪等军队，编为伪蒙古军第二军（第一军李守信），把锡林郭勒盟那些不学无术的王公都选拔为中、少将师长。国民党军队进攻时，这些胆小如鼠的王爷们，个个心惊胆战，不仅不敢率部应战，反而潜逃回旗（有的借口回旗养病，或请喇嘛念经脱身回旗），影响官兵战斗情绪。当时的日本顾问田中提出撤换这一批无用的师长，代之而起的是所谓“后起之秀”军校学生出身的蒙古族青年（日本士官较多）。

1941年（或是1942年），被排挤在日本学日语的吴鹤龄学成归国，并携带回来一个日本姨太太，在伪政府内大肆活跃，几个回合后，陶克陶已不支，大败下台。吴提出成立“留日学生后援会”，支持和鼓励蒙古族青年留日，多培养帝国主义忠实爪牙。又成立“豪利希亚”（合作社），用蒙旗出产的皮毛牲畜换日军的烟茶布匹等日用品。这自然是有利于日本人的。吴鹤龄此举，也提高了他的政治声望。

另一方面，吴为了取得日本人信任，大肆渲染日本的进步，说日本是“天堂”，是“名符其实”的“东亚领袖”和“亚洲救世主”。我也深受其影响，要求赴日参观或学习。我赴张家口市由吉尔嘎朗（时已升伪总务部次长）领着见了一次吴鹤龄。这位久仰的“政客”，这时已将老朽的伪政务院长卓世海挤下台而担任了院长，执行着“内阁总理”的事务。我自己想，可能他也有拉拢我的意思吧，和我表示了亲近。他支持我去日本参观。于是我参加了“蒙疆政府赴日参观团”的行列。去日本参观的有乌兰察布盟盟长林王、巴彦淖尔盟一个总管富贤德、察哈尔盟一个哈斯巴其尔、“鄂尔多斯挺进队”司令森盖林庆、中公旗协理巴图毕力格、伊克昭盟达拉特旗东协理乌勒济巴雅尔等和我十几个人、两个日本人，一个翻译。在日本两个多月，看了些冠冕堂皇的东西和资本主义工业表面上的繁荣发展，夸赞日本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中了不少毒素。

同年秋天，又去参加伪满洲国十周年纪念“国庆”节日，伪蒙疆政

府的代表团团长是“兴蒙委员会”的委员长松王，副团长是“绥西保商督办”蒋辉若上将，五十多个代表团员，乘坐专车赴伪满首都“新京”（长春）。

这时“新京”打扮得五颜六色。但“满洲国民”脸上看不出什么欣喜的样子。最奇妙的是“皇帝”上场：广场上设下整齐的酒宴，穿着整齐的各色各样礼服的“友邦”代表团鸦雀无声地坐在指定的位子上，忽然扩音机里喊了一声“起立”，溥仪身穿佩戴着上将衔的伪满军服上场了，紧接着一声“敬礼”，大家忙着又低下头来。满天鸽子飞扬在广场上空，嗡嗡地大编队飞机凌空而过。伪满洲国内阁总理大臣张景惠双手端着“大诏”，敬奉在“皇帝”面前，然后鞠躬而退。“皇帝”御音朗朗念诵了一番“诏书”。这幕丑剧，颇折腾了一阵子。

1942年春天，伪伊克昭盟公署警务厅来电话叫我去包头，说有要事相议。应命到后，伪伊克昭盟公署和特务机关负责人，向我和森盖（他也应命从达拉特旗西碾房来此）说：“目前情势有利于我们到敌区活动。皇军的意思是让你们各率领自己的部队出发，这是收复伊克昭盟的好机会。”我当时不知葫芦里卖的什么药，认为给日军当个前锋这也是应该的事。于是我应许下来。森盖比我是老奸巨猾得多，他先强调他的防地的困难，然后说回去准备，当然他是想看我以后的发展如何，再作出决定。

回旗后，我不自量力地率领我的主力向准格尔旗河南岸渡河突击。国民党守河军虽有四个连，但很快就被我们全部消灭。准格尔旗召湾一带，很快就被我们掌握。数日后，我因病返回河北党三窑子家住。部队在召湾一带修筑工事待命。想不到我的病转成伤寒，一病数月，急坏了日本人，这时“东北挺进军”五师全部开到，腐败的国民党军队，战斗力非常弱，士气很低，对我们阵地，始终无法攻克。而且在国民党逼迫下的札萨克旗和乌审旗保安队起义了，这就牵制了他们的力量。

我这次的“胜利”，又得到日本人的奖励，给我发了一枚“警察最高功劳章”，以奖励我叛国的“功劳”。

同年秋天，我去参加“豪利希亚”在张家口的大会（我是准格尔旗

“豪利希亚”理事），会上，吴鹤龄用三种不同的语言（蒙、汉、日）滔滔不绝地斥责了各旗王公利用“豪利希亚”贪污中饱的事。有的王爷（各旗“豪利希亚”都是王公们主办）丢失了“豪利希亚”基金，有的将用皮毛换来的布匹等就在张家口市卖了。有的旗借机向牧民加重负担，闹得乌烟瘴气，一片糊涂账，德王也气得不住抱怨。吴鹤龄说：“日本人早已说过，王公们搞‘豪利希亚’肯定闹不好，今日果真如此，我真不明白你们安的什么心。百姓们都不信仰你们，你们还能再当王爷吗？”最后，吴鹤龄有重点地斥责了茂明安旗。另外奖励了伊克昭盟准格尔旗和达拉特旗（因两旗将得来盈利作为学校经费）。

休息时，我在德王公馆（“豪利希亚”会议一般都在德王公馆开）闲逛，看见一部分人在编写蒙古字典。询之，知在德王亲自主持下编写。我说：“主席日理万机，还有工夫搞这个吗？”一个官吏笑着回答：“主席也只能管一管‘豪利希亚’，编一编字典，别的事日本人全包揽了。”

日本发动了太平洋侵略战争后，在军事上打了几个胜仗，多设了几个傀儡国，要表示一下盟主的威风了，东条召集了几个傀儡首脑，开“大东亚会议”，邀请的有六个“国家”。汪精卫代表的“新中国”、张景惠代表的“满洲国”、巴莫代表的缅甸、谷勒尔代表的菲律宾、包鲁斯代表的印度，泰国是一个亲王殿下，东条居中而坐，高唱一阵“大东亚共存共荣”（电影宣传当时情形）。不意这个傀儡剧因未邀请德王，把他气坏了。他秘密鼓动“豪利希亚”的王公们选出代表到日本驻蒙军司令官那里请愿。代表中有乌兰察布盟的林沁僧格盟长和伊克昭盟的森盖，但那个老气横秋的日本司令官非常蛮横，向林盟长说：“看你愁的把你那条小辫子还掉了呢（当时许多王公有辫子），你最好多注意一点你们盟内牲口事吧，早一点打下草，不然牲口就会在大雪天冻死的。”这个啼笑皆非的场面，代表们还要九十度鞠躬，表示感谢。

半年后，日军赠送给德王五百支日造三八式枪，算是回答他未参加“大东亚会议”的歉意。

日寇污辱和欺压伪蒙疆官吏是经常的事。伪人员为了贪图衣食禄位，

都忍气吞声，不敢反抗。最有趣的是察哈尔盟一个副盟长，因自己的汽车被属下一个日本人抢坐，发生口角，让这个日本人打了一顿耳光，而且把他的眼镜也打坏了。事后他向人哭诉："打我几下不要紧，把我二百块钱的眼镜也打坏了！"一时传为笑柄。

日本人内部的争权倾轧也很厉害，尤其在直接抓伪军的权力上。我数次给日本出力，大约得到信任，都认为在我头上能做一次政治买卖吧，包头特务机关和伪伊克昭盟公署警务厅（后改治安处）争起我们这部分力量来。特务机关先后派中岛、石飞、内田来准格尔，名义虽是交换情报，实际劝我归特务机关领导，保证供应比伪伊克昭盟公署强。给我番号是"鄂尔多斯战斗队司令"，和"鄂尔多斯挺进队司令"森盖一样。这使我左右为难，两头都怕。伪警务厅派来的人，对特务机关的人很注意，经常问我："他们和你说了什么话？"伪伊克昭盟公署日本人警告我，特务机关不应该干涉准格尔旗，那是"越权"，"你也不应该和特务机关联系，否则会影响你的前途"。后来官司打到驻包头日军司令官那里，决定准格尔旗和达拉特旗两旗军队都应该归入伪伊克昭盟公署，否则会对未"收复"伊克昭盟各旗影响很大。他们都是怕"皇军"，虽然包头特务机关长是日军的中佐，就让"皇军"一言而定。森盖也由"鄂尔多斯挺进队"少将司令转成"伊盟警察第二大队"队长了。

但包头特务机关权势很大，直接控制的几个"上将"："东亚同盟军"总司令白凤翔，"绥西联军"总司令王英，"绥西保商督办"蒋辉若。王英和我最熟悉，他约我到包头他的办事处（他的总司令部在西山嘴）殷勤招待我。实际我和他的"友谊"完全建立在彼此利用的基础上，我对他根本没有好印象。在我童年时期（1926年），王英就率他的三十一军，奉张作霖命令进攻山西河曲。但他和准格尔旗当时统治者那森达赖有宿怨，借出兵山西，向准格尔旗挑衅，于是发生了进攻准格尔旗的战争，准格尔旗人民遭受到最严重的兵灾。我家被他洗劫一空，给我幼小心灵中留下了创伤，在今天握手言欢时，那幕惨剧常反映在我脑中。但我今天的目的是对付我最恨的仇人、杀害我叔父的白凤翔。我打算拉拢王英和白对

抗，因白和王在扩充军队、霸占地盘问题上矛盾很大。白凤翔投日自称率部一万二千人，这当然是虚张声势，但赢得日本人重视，他驻在固阳洋教堂后，即升官晋爵，“招贤纳士”，大事铺张，尽量策动绥西土匪、地痞、流氓，扩张自己部队。他收罗极多极广，弄得团营长不知其数，将校官多如牛毛。这自然损害了王英及王部下土著势力。以后两人摩擦得几乎兵戈相见。我打算利用这种矛盾，报仇雪恨。另一方面我几次组织人打算刺杀白凤翔，因白出入警卫森严，未得下手。王英拉我的目的是扩展未来的权势，他的谈话直爽地表现出来。他乐观地分析时局说：“德、苏是两败俱伤，美国是最后胜利，国民党必然利用日伪来替他们打天下，那时绥远要出现一个‘绥人治绥’的崭新局面。有号召能力的人，必然乘时而起，内可抵制山西人再统治绥远人的局面，外可抗拒共产党的侵入。”说到这里，他得意地哈哈大笑，使劲拍着我说：“老弟，时势造英雄呀。你在地方上很有号召力，可不要错过机会，干一手呀。”又说：“你如看得起老哥来，咱们有福同享，患难与共，我王英和谁相处都是永远和好。”这就是说他已物色好我这样有“号召力”的人，完全有资格和他患难相共的。我也少不得说了些言不由衷的话：“只要您看得起我，在您高升时候，我会给您摇旗呐喊的。”

1944年以后，日本人已普遍感到他们走下坡路了，对伪蒙疆政府不得不作出某些让步，打算使这些傀儡官员们有些权力来共同支撑这个危局。李守信要求将自己的基本部队第一、二、三师，由“警备部队”再恢复原建制，置于自己管辖之下。德王要求扩编伪蒙古军。这时日本人逐渐已无力控制，且各地游击队闹得很凶，乐得顺水推舟承认，借以博取伪官员们好感，使其为己卖命。这一让步，乐坏了伪官员。不少具有奴才本性的人，居然认为“皇军”实在无领土野心，是诚心诚意地扶助蒙古人。其中最典型的是挨了日本人打，并打坏了他价值二百元眼镜的察哈尔盟副盟长，实际日本人同意增加伪蒙古军，他就有利可图。伪官吏都同样，只要分得日本人的一杯残羹，就会乐得手舞足蹈地不知所以了。

伪军的扩编，成了伪高级官吏争权夺利的机会。最突出的是德王、李

守信、吴鹤龄、乌古廷的争军权。吴鹤龄是个野心很大的人，自恃有些反动才能，常翻云覆雨，玩弄德王、李守信，他们早有矛盾，不过因都受着日本主子的重压，还不十分显著。自扩编伪蒙古军方案落实后，吴为了攫取兵权，坚持主张在伪政务院长下设立一个军事部，由伪蒙古军总参谋长乌古廷兼任，这无疑是吴、乌联盟，抢占德王、李守信的“军政大权”。德王、李守信也不愿受愚弄，由暗斗发展成公开冲突。日寇始而冷眼旁观，继而感到有支持德王、李守信的必要，因他俩在伪官员中影响比吴、乌大。结果吴、乌自然被挤下台。吴调成没官署的“内务长官”（因人设事），乌成军事参议。李守信兼军事部长，德王兼政务院长，宝紫宸（宝贵廷）升总参谋长，不甘寂寞的陶克陶看到自己的“政敌”下台，也赶忙出来活动。

1944年秋，伪蒙古军扩编第一阶段初步就绪，除将伪靖安警备军编成伪蒙古军外，五个盟编五个防卫师。锡林郭勒盟为第一师，盟长松王为师长；察哈尔盟为第二师，盟长卓世海为师长，副盟长为副师长；乌兰察布盟为第六师，林盟长（林被俘后，沙盟长兼师长）为师长；巴颜塔拉盟为第十六师，盟长补英达赖为师长；伊克昭盟为第十二师，阿王为师长；这些对军事莫名其妙的老官僚又穿上军装，挂上军刀，要能文能武地排演一下。此外，特地又派来大批所谓“本科”出身的参谋长、处长之流，分派在各师，扶助师长们组织司令部，军事“正规化”了。

伪伊克昭盟第十二师编成六个团，即原六师十六团、十八团，森盖部编一个团（森盖是少将旅长），达旗章锦文团，我部编成两个团（我兼任两团团长）。编“蒙古军”，伪官员们一般都同意，因派来的日本人少（每团一个日本教官），控制不严格，军官权力大些。

这时陶克陶突然派其舅父（大商人）来包头，通过伪十二师参谋长满仓介绍，和我拉拢（自然也和森盖拉拢），并以托我收买河南岸黄金为借口，提出要和我们“合作”（当然是政治合作，不是经济合作），并邀我去归绥“总司令部”和他二甥（陶的二弟）伪蒙古军情报部长都伦仓会晤，协商给我编一个旅的事。当然意在要我支持陶。他帮助我，我乐得应

承，反正互相有可利用的机会就利用，谁和谁也没有一定的感情。

1944年冬天，由于看到日寇日暮途穷，都明白靠山要倒下来，势非再找主人不行。我又和傅作义恢复了几年来隔断的关系。傅派苏伯安到北平，途经我处。据苏说：傅有六个军的实力，准备大举反攻，请我做好准备。苏到天津找齐燮元等伪官员（那时齐燮元已被日本人撤去军权）联络，日本人也没有怎样，仅派人跟随，不令其自由活动。后苏由王英防地返后套。

1945年春天，国民党绥远省党部委员高乐山来我处做开展敌区工作。高在抗战初期和我有一面之识。他来时给我带来第十二战区委我河防司令的委任，并向我要全军名册。他说："国军反攻在即，你要准备好策应工作，绥远万不能让共产党插足，傅长官准备给你绥南专员，将来你的责任重大，你需要立功报效傅长官。"

几天后，我去包头和森盖谈起改弦易帜以应付危局的事，他不胜感叹。他和我合计，我们两人的部队决不东开（当时消息调我们东去），离开家乡，不容易掌握住自己的部队，必要时两个部队靠拢，合起力量来，在政治上可以互相呼应，在军事上做到攻守同盟，彼此要协力同心，保持自己的权力。

这时各伪官们都在惶惶不安，加上游击队的活跃，日伪军力不敷，运用不灵，百灵庙游击队深夜潜入，杀死日寇首席指导官，萨拉齐县游击队里应外合攻入县府，伪蒙古军第八师师长扎青扎布"剿匪"战死，第七师参谋长被俘放回，这都是半年来日寇在军事上走下坡路的证明。上下都已一筹莫展，成了"风声鹤唳，草木皆兵"之势。在张家口的伪高级官吏们，也愁眉不展，齐集于李守信的官邸，不是吞云吐雾，就是八圈麻将，再不然就是酒肉征逐，谈古论今地交换情况，一致认定日本已无力再战，失败是意中事。大家只好依靠这个握实际军权的胡子老哥来求生存。因此最后唯一幻想就是依靠这股力量，灵活地做好投机"买卖"，将来好摇身一变成为内战"英雄"。

1945年5月10日早晨———是我记得最确切的一天，李守信突然由归绥

总部来电话限我当天就去。我不知道什么事这样严重，就忙乘马到萨拉齐县，坐当日晚车抵归绥，下车到都伦仓家，盯着他问发生了什么事，叫我这样急急赶来。他笑着说："明日见总司令吧，大概是军情大事。"次日谒李，他很客气他说："目前时局非常紧张，我们兵力是愈来愈感到不够分配，听说你有一定号召力，可以多编练军队，人越多越好，武器装备不成问题，你最好直接归总司令部。"接着又说："听说准格尔旗河南岸能用大烟换黄金，你给我换几千两，因为我在北平定购下一座德国制枪弹机器，非黄金不能买到。"我也不考虑其言如何，满口应承办理。

接着6月中旬，德王又来电叫我去张家口，这时李守信也在张（因李在两头公馆住）。这次见德王，他的那种神圣不可侵犯的面孔也变了。他谦虚地问我部队的装备、人的士气，以及扩充的办法。他很郑重地问："你的部队能调到察哈尔盟来吗？"不管我内心如何打算，我还是满口应承："只要主席有命令，任何地方我也能去！"他颔首微笑，表示满意。

晚间又到李守信公馆，在他烟榻上恳谈。他让我先防守铁路沿线，在必要时可迅速来张集中，又不断询问我他的一个老朋友黎明（国民党国防部某厅长）消息如何，并又表示今后只要蒙古人有办法必须团结一致，爱护"领袖"（指德王）。他自己和德王是如何"莫逆"交好。我内心明白他俩要互相仰仗、借重，维持自己的地位，才"莫逆"起来，同时谁都看出来，他们内心是多么空虚惊慌。他们的地盘权力也是极不巩固的，万一日寇投降或溃退，他们的有限兵力，决不能控制广大的伪蒙疆区域，何况自己多年来未接近部队，日寇在时，还能互相利用，维持他们傀儡式的统一局面，但已危机四伏，各自为政了，霎时就会分化崩溃。他们现在虽然拼命扩充人，抓军队，打算集中起来运用，但无济于事。

伪政府和伪总司令部人们态度也变了，在我看都有些不大自然似的。和我认识的伪军政官员，尤其是德王、李守信的亲信幕僚们，纷纷询问伊克昭盟的情况、"国军"的企图（当时在我对面的国民党军队），许多人还关心地劝告我"多加小心"，说去年冬天乌兰察布盟的林盟长全家被傅作义的骑四师俘去，主要是"大意"，今天你只有将部队集中到交通线附

近，进可以走，退可以守。又有些人向我宣传：几年来日本人在军政方面控制得太严格，使德主席和李总司令这两位军政领袖有才无处施，现时局紧张，日人让步，英雄才有了用武之地。军队的扩编，向正规化目标前进（指加紧训练），政治上的集思广益（指德王最近常召开各旗各界士绅座谈会），封闭“俱乐部”（这种“俱乐部”是日本人统治伪政府腐化中国人民的政策之一，在许多城镇内设下“俱乐部”，让中国人民公开赌博，使人民陷入此火坑，自杀和受害者不计其数。有趣的是门上还挂个“日本人禁止入内”的招牌，似乎是在敌寇侵占地，还有中国人特权地方。在日伪崩溃的前夕，德王假仁假义宣布撤销）。又说这两位“领袖”仁厚宽爱，度量很大，更加“礼贤下士”，团结各族各界的人民来共赴“邦难”（这时伪蒙疆政府已冠上一个“自治邦政府”的不伦不类的名称，说是和“国家”一样了）。我听到这些话好像要巩固我对德王、李守信的信仰，又觉得这是“人之将亡”的哀鸣。

这时伪蒙疆政府兵力，大约三万人左右，武器装备都还可以，唯素质很低，加上部队成员大多是兵痞、流氓、惯匪等，官佐极端腐化，军纪更加坏，抢劫已成风气，其中伪蒙古军第八、九两师，奸淫虏掠更加无所不为。日寇的投降，使伪蒙古军政人员手足无措，随即大部力量分化而自灭了。

我这篇回忆，因事隔多年，多半不能详细记录，错误难免，希知者多加指正。

（1965年）



第3章 | 伪蒙疆政权统治内幕

有关“善邻协会”的材料

巴达荣嘎*

“善邻协会”是做什么的

1931年，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侵略战争，侵占我国东北以后，其魔爪又从热河伸向察哈尔、绥远的同时，在西部蒙古地区出现了一个“善邻协会”。这是为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我国内蒙古地区搜集情报、打急先锋的反动机构。

伪蒙疆政府成立以后，这一机构更以“大日本善邻协会”的名义出现在伪蒙疆的各盟、旗、市。“善邻协会”的本部设在日本东京淀桥区四丁目170番地，全称是“财团法人善邻协会”。它是以日本陆军退伍军人井上璞中将为首组织起来的，其成员主要是日本财阀、浪人、退伍军人。他们是日本陆军大将林铣十郎一派的人，也就是以林铣十郎为后盾，并通过他和日本陆军省挂钩，为他们搜集有关内蒙古各方面的情报。他们又把这些情报材料编写成《蒙疆年鉴》介绍给日本国内的财阀、资本家们，便于他们到内蒙古各地投资，进一步从经济上掠夺内蒙古。他们的野心不止内蒙古，而是以研究蒙古民族的名义，连青海、外蒙古的情报也没放过。

---

* 作者系私费留日学生。

他们编写年鉴或翻译外国人所著的有关蒙古的著作，也都是为搜罗蒙古的情报。所有这些充分暴露了日本帝国主义不仅侵占我国东北，进而还要侵占整个中国以及外蒙古和苏联的野心。“善邻协会”编写的《蒙疆年鉴》后来改为《蒙古大观》，“善邻协会”的理事长井上璞给这本书写的序言赤裸裸地暴露了日本帝国主义的这一侵略野心。他在序言里写道：“自去冬在蒙疆地方成立了三个自治政府以来，我国上下对蒙疆的关心则忽然高涨，不仅在新闻杂志上的报道更加活跃，在全国各地也相继开展有关蒙古的各种展览会或讲演会，居住蒙古地方的我邦人数也日益增多。这种现象从实现我国大陆政策的角度来看，真是使人无限地欣快。我们从1934年开始着眼于蒙古，为当地蒙古人开设病院，设立学校，指导畜牧业生产，从事提高他们的文化工作已经五年，但仍感到进行得很缓慢。蒙古的地理条件具有很复杂的国际关系，处在微妙的地位。因而，如以肤浅的认识去对待蒙古问题，就可能给我国政策带来百年大患。对蒙古进行工作的人，必须对蒙古有深刻的认识，温暖的同情心，洋溢的热情……”井上璞的所谓要有“深刻的认识”是真，“温暖的同情心”和“洋溢的热情”，则是要以伪善的面孔掩饰他豺狼的面目。

“善邻协会”在西部蒙古地区设立的一些医院，究竟给蒙古人治了多少病，减少了多少痛苦呢？实际上还不是搜刮老百姓，还不是拿蒙古老百姓的生命做医学试验吗？经他们治疗的结果，蒙古人的疾病毫未见少，反而增加，以致人口逐渐减少。经他们指导的畜牧业生产毫未进展，反而减产。他们伪装指导畜牧业生产，实际上是一群一群地赶走了蒙古人的牛马羊。

“善邻协会”除了从经济上给日本帝国主义的财阀、资本家们提供大量详尽的材料，以便他们进一步掠夺以外，还培养出不少为帝国主义侵略政策服务的忠实走狗。“善邻协会”在日本开设了一所善邻高等商业学校，容有200余名学生。该校所讲授的课程，除了传授商业贸易方面的基本知识以外，就是积极地学习中国话、蒙古话，并详尽地介绍内蒙古的产业。除此以外，对学生加强军事和武士道精神的训练，其中特别着重剑

术、柔道的锻炼。

善邻高等商业学校毕业的学生绝大部分都被分配到伪蒙疆和华北各地。该学校刚开办的时候，学生来源并不多，报考的人很少，但经“善邻协会”不断地大肆宣传到中国华北和“蒙疆”的好处，报考的学生逐渐增多，学校的收入也大为改观了。

所谓对蒙古族学生的培养

“善邻协会”不仅培养了不少为日本帝国主义忠实服务的日本学生，同时还以“提高蒙古人的文化”“培养蒙古青年”为名，从伪蒙疆搜罗去不少蒙古族留学生。一开始，他们把从伪满洲国去的蒙古族留学生也都集中到一个善邻高等商业学校附设的善邻学堂。善邻高等商业学校又附设了一个特设预科，专门为那些蒙古族学生补习日文及其他数理化等课程，为考入其他学校打基础。在善邻学堂集中的蒙古族学生大致可分三类：一类是伪满洲国的留学生，大部分是私费。虽然说是私费留学生，但都是由“蒙民厚生会”或者其他什么“协助会”等资助的留学生，经费都出于蒙古各旗人民。其中家里有钱的是私费，后来都变成了伪满洲国官费留学生，只有入私立大学的一部分仍是私费。一类是，伪蒙疆派去的官费留学生。三是“善邻协会”从内蒙古西部地区搜罗去的，从外蒙古跑出来的活佛、大喇嘛们带来的小喇嘛，这些小喇嘛年龄小，没有什么文化，学两年日语以后，就上日本小学。他们的一切费用完全由善邻学堂供给，也就是完全由“善邻协会”负担。据说这些人后来都当了日本的特务或宪兵，在伪蒙疆横行霸道，祸害百姓，有的可能潜入了外蒙古。这些人上了日本小学以后，满脑子被灌输了日本“大和魂”思想、“武士道精神”。“善邻协会”平时对他们严加管束，很少叫他们和其他蒙古族学生接触。

对其他蒙古族学生的训练、教育一般也都是灌输日本帝国主义法西斯思想。笼统地说是法西斯教育，但达到这一教育目的的教育方法是各式各

样的。在善邻高等商业学校特设预科学习的蒙古族学生必须受严格的军事训练。首先从形式上，不准留发，一律剃光头。不管是教日文、教数理化或英语的教师，都在我们这些蒙古族学生面前大肆宣传“日本民族是优秀民族”“日本的皇室、日本的国体、日本的天皇是万世一系”“日本人民都是天照大神的后代”，因而“不同于凡人”“最优秀的民族”，等等。尤其修身课的教员讲起课来就讲神道、国体，简直讲得津津有味，满嘴冒沫，讲得那种肉麻劲儿，叫你觉得都难受。这种情况，不仅在善邻高等商业学校特设预科是这样，各类、各级学校都是这样。从小学都这样进行教育是他们坚定不移的教育方针。

除了通过课程灌输“神道”，大讲特讲“君臣之道”外，还要利用一定的时间，进行集体训练。我记得，我到日本的第二年夏天，“善邻协会”利用暑假把所有的蒙古族学生都带到静冈县的海岸兴津镇，住在那里的一个大庙兴津寺里。名义上是避暑，实际上是集训。领队的是善邻学堂的长官（也叫舍监）内藤五郎，是退伍的陆军大佐。我们到海岸住在庙里以后，他把我们完全交给了那里的和尚指挥。每天早晨天刚蒙蒙亮就起床，跟着和尚们去坐禅念经，光着脚坐在硬板子上，闭上眼睛合掌念经。我们当中谁也不会像弥勒佛那样盘腿坐禅，大家都感到很苦恼，后来，老和尚算是可怜了我们，叫我们用普通的盘腿方式坐禅。念的经是把日本的历代天皇的名字都念下来，一直念到他们的“今上”天皇——昭和天皇为止。然后闭目养神，庙堂里鸦雀无声，除了黑色花肚子的蚊子嗡嗡声以外，什么也听不见，活活地挨蚊子叮也不能动一动。地下有一个值班和尚扛着一根像军用棍似的二米来长的棍子，来回踱来踱去地巡走。他看到谁要不专心致志地静坐，或者在那里打盹，换句话说，谁若不顺他眼的话，就用他那根棍子在你背上啪啪打下去。被打的人还得更加挺起腰板，不皱眉头，“心情舒畅”，要感到被“神棍”打几下是无限的“光荣”和“荣幸”，要以“感恩”的心情，就像蒙古人见到活佛、格根叩头叫他们摸一下脑袋时的心情来接受这些棍子，这才“真正体会”了“日本精神”。我们怕挨打就尽量克制自己别打瞌睡。我们当中也有个别溜须不顾命的人，

表现自己“体会”了“日本精神”，忠实于日本而挺腰板特意挨那几根棍子的。我们里面会说俏皮话的人，对这样的人下了个评语说这是“耗子舔猫屁股，溜须不顾命”。一连坐好几个钟头，念经这一关好容易熬过去了。第二道关是吃早饭。吃早饭时，要跟庙里的老和尚一起吃。早饭都摆在桌上，盛在碗里以后，老和尚敲木鱼，大家又异口同音念起般若经，还要念些别的“感谢神恩”的经，不过表达吃的每顿饭都是“神恩赐”的。念完经敲第二次木鱼时，双手合十说声“领受”才开始吃饭。老和尚吃得少，没等我们吃饱，他吃完了就敲木鱼。我们也就赶紧把碗里剩下的饭扒拉完撂下碗筷子，说声“领受了”。洗完碗筷以后，还得听老和尚讲道。快吃午饭的时候，才能到海里去游泳。每天吃完午饭以后，才感到有点自由，因为午餐和晚饭老和尚是不跟我们一起吃的。吃完午饭睡午觉起来以后，整个一个午后，可以自由地在海里游泳。除了游泳，我们就在长官的率领下，参观附近的名胜古迹。但不论到哪里首先要参拜“神社”或寺庙，还得要听“神道”“武士道精神”的宣传。然后，由长官大吹、大宣扬他们怎样培养教育蒙古族学生。这样，取得当地豪绅们的招待，小者茶话会，大者招待会。会上必须有一个蒙古族学生代表全体留学生致感谢词，要表示为实现“大东亚共荣圈”而努力的决心。

在那些宣传鼓动、灌输“武士道精神”的方法之中，最离奇古怪、最使人气愤的是，竟有人恬不知耻地说什么“成吉思汗是日本人”。当时我们听着实在气愤，我们私下说，我们蒙古人只有这么一个成吉思汗又叫他们给抢走了。他们荒谬的根据是：日本历史上镰仓幕府时代，其头头源赖朝有一个弟弟是武将叫源义经。源赖朝掌握大权以后，怕他弟弟篡位，要杀他弟弟。他弟弟发觉后，就逃跑到北海道投靠藤原麾下。源赖朝知道后要讨伐藤原，源义经出于无奈渡过日本海逃跑，后经西伯利亚到蒙古，随即统一蒙古而即位，称成吉思汗。当时我们既缺乏历史知识，更不知道日本历史，只得瞪着眼睛，敢怒而不敢言地听那些日本人信口开河。但内心还是很不痛快。可是从日本人的角度来看，我们的这种不满、气愤是太奇怪了。成吉思汗如果是日本人的话，蒙古人和日本人的关系不就更密切

了吗？还有比当上日本人更光荣的事吗？可是，偏偏我们这些蒙古族学生不识抬举，还要反驳人家，那就更无知了。后来，我学了一些日本历史才知道源义经根本就没有横渡日本海逃到哪里去，而是他投靠的藤原怕源赖朝讨伐他，就把他杀掉，把首级献给源赖朝而了事。但在日本有不少被上述荒谬言论迷惑住、信以为真的人。为侵略成性的帝国主义服务而歪曲事实、颠倒黑白的所谓历史学家，也大有人在。这些厚颜无耻的老爷们既可笑，又可恨。他们就是指着这种满口胡说或撒谎来讨好于日本帝国主义主子而混饭吃的。但捏造出来的、不符史实的东西毕竟没有说服力，反而引起蒙古族学生的怀疑和反感。日本人也可能考虑到了这一点，以后的调子就变了。他们开始大肆宣传成吉思汗的伟业，不再说“成吉思汗是日本人”了。他们赞扬成吉思汗，说他是横跨欧亚两洲卓越的军事家、政治家，说世界史上虽然有过亚力山大和拿破仑也不能和成吉思汗媲美。这是我们亚洲人的“光荣”，“我们应该发扬成吉思汗精神，成吉思汗精神是完全符合日本武士道精神的”。他们又说：“蒙古民族是英勇善战的民族，如果深刻地领会日本武士道精神，再发扬英勇的民族特点，加上友邦大日本的帮助，那么就会所向披靡，一定会争取独立，对大东亚共荣圈就会做出不可估价的贡献。那时，亚洲就是亚洲人的亚洲了，世界大同就必定实现。”经日本人这样宣传，很多蒙古族学生的的确确被迷惑住了，也真出现了“领会武士道精神”“发扬成吉思汗精神”的人。我记得那是1943年的事情了，那时我在广岛学习。有一天在日本朝日新闻第二版上看到以“成吉思汗的后裔”为题，报道一个伪蒙疆德王派去的蒙古留学生的事。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这个蒙古族学生在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学习，有一次野外演习时，把战刀鞘给弄丢了，他回来报告了队长。在战场上丢掉刀鞘是等于丢掉武器，这是“玷污了武士道精神”，也“不符合成吉思汗精神”。日本队长申斥了他一顿，然后叫他去找刀鞘。这个学生看样子由于“领会武士道精神相当深刻”，所以他当时就表示找不到刀鞘就誓死不归。他在深山密林里瞎摸索一夜也没找见刀鞘，看样子是不敢回去见队长了。于是他就下了决心，实现了他的誓言，真正体现了“武士道”的切腹

自尽的精神，也“尽忠”于祖先成吉思汗。他把演习用的纸弹头的子弹推上了三八式枪的枪膛，脱了鞋袜，枪口对准了自己的胸膛，一闭眼，一咬牙，下了狠心就用脚拇指一蹬，就听“啪”一声，自杀了。他的日本队长见他一夜未回，就打发人四处寻找这个“成吉思汗的后裔”，结果离营地不远的一个山坡上发现了他，一看左肋部渗流出的血已被太阳晒干糊住了伤口，人还有呼吸，解开衣服一看，纸弹头未能打穿骨头，仅仅是皮肤伤。经过几天的治疗人完全好了。可是日本人却如获珍宝，在这个“成吉思汗的后裔”身上却大做起文章来了。说他具体“体现了武士道切腹成仁的精神”“是成吉思汗的优秀后代”。不仅登报嘉奖，还赏了不少东西给他。他简直成了个“英雄人物”。但在其背后，隐藏着更大的阴谋。他们想把所有的蒙古族学生都要变成那样的“英雄人物”，听他们驱使。

日本人在大肆宣传成吉思汗的同时，还鼓动支持蒙古学生祭祀成吉思汗、印发成吉思汗像，叫蒙古族学生佩戴成吉思汗纪念章，灌制“成吉思汗歌”叫蒙古族学生唱。不知是哪一个才子编的“成吉思汗歌”，歌词极其反动，充满了侵略和屠杀。除了这些以外，日本学者们，主要是历史学者以矢野仁一为首的一帮家伙又抛出了“满蒙非中国”论，主张“蒙古独立”是理所当然的事。“善邻协会”又把伪满洲国派去的蒙古学生也都集中在一起，经常宣传“满蒙非中国”论，主张“蒙古独立”，然后再把外蒙古也“合并过来”，等等。同时，平常不叫我们接触汉族留学生，尽量找些借口制造蒙、汉留学生之间的矛盾，其结果使得蒙古族学生的头脑里就消失了祖国——中国的观念。

争夺蒙古族学生

伪满洲国驻日本大使馆在东京建筑了一所四层楼的留日学生会馆。在此以前所有的蒙古族学生都集中在“善邻协会”开设的善邻学堂，伪满洲国派去的留学生也住在那里。“善邻协会”以蒙古族学生的名义做招牌

也成功地创出了善邻高等商业学校的牌子，报考该校的日本学生越来越多了，收入也逐渐增多。他们通过各种关系把蒙古族学生保送到各类学校。伪满洲国大使馆眼看这部分权利被“善邻协会”夺过去是不甘心的。因而就来一个突然袭击的办法，对所有伪满洲国籍的、尚未入学正在补习日文的留学生进行甄别考试。考试合格者保送到日本各地的官立大学，不合格者送到私立大学，或者送回国，而“善邻协会”保送的学校一般都是私立的。因此，伪满大使馆的这一决定既有吸引力也挺吓人。考试合格可以被保送到官立大学，还得补助费，不合格的话就入私立大学，很有可能被送回国。这种情况下，“善邻协会”只得答应伪满籍的蒙古族学生都到大使馆去参加甄别考试。结果合格者不问本人志愿如何，都被保送到日本各地大学或高等学校，不合格者一般都安插在东京市内各个私立大学。并且留学生会馆成立后，把伪满洲国的蒙古族留学生都收容到留学生会馆。从那时起，伪满洲国大使馆管理我们了。学生会馆的一些日本人就大讲特讲“日满一德一心”，伪满洲国也就从日本帝国主义的友邦逐渐升级到亲邦。伪满大使馆虽然夺过去一部分蒙古族学生，但大部分从伪蒙疆派去的蒙古族学生仍然被掌握在“善邻协会”手里。因此，伪满的蒙古族学生也未断过来往，不仅这样，还组织了留日蒙古族学生同乡会。祭祀成吉思汗或其他纪念节日的活动时，也都集合在一起。对此伪满大使馆也是欣然答应的，因为他们在总的灌输法西斯教育方面是没有矛盾的。不论“善邻协会”、伪满大使馆，对留学生的训练、讲道都是一样的。所差者对蒙古族留学生是用成吉思汗做招牌，而对汉族学生则以孔子、孟子做招牌大讲特讲“王道乐土”。什么“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啦，又扯出什么日本人和中国人是“同文同种”的谬论。更可笑的是，所谓大学教授们讲中国哲学史的时候，公然唱出类似“成吉思汗是源义经——日本人”的口号，说“孔子是日本人”。说“孔子是日本人”的“理由”是：孔子人虽为中国人，但其学说在日本大有生气地被传播，因此可以说他是日本人。当时我们亲耳听到这些话，真是有点气愤，感到日本人的所谓教授们也太恬不知耻了。我们留学生当中议论说，日本人眼睛里有名望的人，不管你

是哪一国、哪一朝代，反正都是日本人。在日本各大学里都要讲四书五经，大讲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大义灭亲之类的东西，尤其日本人的汉学家不论到哪里讲话，三句话不离孔孟学说。除了四书五经以外，各大学里还有一门必修科目，就是“国体学”（修身、国民道德）。别的课程都考满分，但“国体学”如果不及格，那么你就休想毕业，可能还要被扣上一顶“思想不良”的帽子。通过讲课灌输“日本精神”“神道”以外，在他们的大学和高等学校里还设有学生课，专门管理学生的思想动态，并直接与警察骑兵有密切联系。

“善邻协会”在伪蒙疆横行跋扈

“善邻协会”的理事长井上璞在《蒙古大观》的序言里恬不知耻地说什么，为了发展蒙古民族的文化、经济，在蒙古各地建立学校，开设医院，指导蒙古人的畜牧业生产。但实际上侵略成性的、万恶的日本帝国主义究竟在蒙古地方干了些什么呢？他们假借指导畜牧业生产，赶走了蒙古人的牛马羊群，建立学校给蒙古人灌输日本法西斯教育，开设医院也就是便于他们拿蒙古人的肉体做试验品而已。他们开设医院、建立学校的经费还不是出于蒙古族劳动人民的身上吗？通过他们的各种设备是便于剥削压榨蒙古人民，也便于他们安插自己的人。他们从日本国内带来很多不三不四的浪人、流氓，安插在他们在蒙古地方开设的一些机构。这些家伙到了蒙古地方就横行霸道，无恶不作。在日本人看来本是一个无名小卒，在自己日本人面前是低声下气的家伙们，到了蒙古地方便耀武扬威起来。日本人从小受的教育就是这样，下级无条件地服从上级，在学校里上级生可以随便打下级生。被打的人直立不动，这叫作“阶级服从”。另外，日本人对被压迫民族的人民是惨无人道的，抱着极大的民族优越感，处处表现他们弱肉强食的强盗本性、豺狼本质。对他们越害怕、越软弱，他们越欺侮你。你跟他们硬了，他们就怕你，只不过换个方式，将来暗中陷害你。这

就是他们的外强中干，纸老虎的本性。但如不彻底消灭日本帝国主义，那么，他们的专横跋扈是断不了根的。

我记得那是我到日本的第二年，1937年，就是在前面所介绍那样，“善邻协会”利用暑期训练的名义到静冈县兴津寺坐禅念经的时候，“善邻协会”从东京带着自己的炊事人员去给我们做饭、烧澡堂。其中的头子是“善邻学堂”长官内藤五郎大佐的亲信，过去在他手下当过兵，名叫石仓。他也是毫无例外，有强烈的民族优越感，对蒙古族学生是根本瞧不起的。那时我们轮流摊值日帮他们挑水烧澡堂。有一次不知为了什么事，我们一个刚从“蒙疆”去的同学哭着回来了。我们问他，他说他到澡堂去洗脚，叫石仓给打了个嘴巴。当时我们有三四个同学在屋，听到以后，实在气愤，也不管三七二十一，跑进澡堂一看，石仓那个家伙正在那里擦地，我们不由分说，一拥而上，七手八脚把他按倒在地上，没头没脑地揍了一顿，揍得他嗷嗷叫着求饶才放手。当天晚上内藤就召集我们训话，说我们打人不对，我们里面也有人顶他几句，他就开始骂我们，就这样不欢而散。会后我们一致提出石仓做的饭就是不吃。第二天没有人去吃饭，老和尚也奇怪，内藤着了慌，很快答应叫石仓回东京去。石仓走了以后，我们都以胜利的心情去吃饭。但几天后，等训练结束回到东京一看，石仓老家伙还在，对我们很傲慢的样子。于是我们又提出同一个问题，石仓如果在一天，我们就一天不吃饭。“善邻协会”没有办法，每天给我们买面包吃。那时我们几十个同学倒挺齐心。团结的主要动力，就是蒙古人不能丢人，不能受侮辱，不能示弱，不论成年小孩都很团结，谁也不去吃饭。我们的条件也简单，就是不吃石仓做的饭，别的面包还是可以吃，或者换掉石仓我们就吃饭。结果事情闹大了，内藤五郎软硬兼施也无济于事，“善邻协会”的理事、能说善辩的法学士、律师大岛丰亲自出马跟我们谈判。主要目的要把石仓留下，我们的条件是要石仓滚蛋。大岛讲了一天话，他抽了三盒烟，嘴都冒白沫也没说服我们。最后，理事长井上璞亲自出马，一个一个地叫我们，连威胁带利诱。我记得井上璞把我叫去说：“你是私费留学生，将来可以把你保送到任何一个大学，你不要跟着别的学生捣

乱，打石仓时还有你，那不要紧，我们不追究这个。你如果跟别人这样干下去对你是不利的，你说一说，你们里面谁是主谋？谁先提出不吃饭？”我那时刚到日本，日本话说得还不大好，我只回答，我不知道，大家怎样，我就怎样。不吃饭的问题是大家一致提出来的，对我不利也好，叫我回国也好，我是不能给石仓低头示弱。我是伪满的留学生，实际上他们也管不了。别的同学也一个一个被叫去。还有十几岁的小孩子也被叫去，但他们也都按我们的说法说了。最后，“善邻协会”实在无法，只得把石仓赶走了。可是第二年暑假回伪蒙疆的同学回来说，石仓到锡林郭勒盟苏尼特旗“善邻协会”当上了小官，在那里可跋扈了。我们听了以后，都很泄气，从东京把他撵走了，到了我们自己的故乡反而高升了。当时我们哪知道其中的道理呢？现在才明白帝国主义反动派及其走狗，如不把他们连根拔掉，别说单独打他们几个人，就是宰掉他们几个，也是解决不了根本问题的。“善邻协会”之所以能够那样横行霸道是他们有帝国主义做后盾，还有出卖祖国的民族败类们组织的伪政府给他们做帮凶。

我在善邻学堂只待了一年多的时间，以后就到了广岛。至于“善邻协会”的内幕详细情况知道得很少。写这个材料时，时间比较紧迫，因此没能够达到系统地介绍，只是把一些自己记忆里的片断的事实罗列出来。文字方面，更有很多词不达意之处，更没有什么系统的批判。这个材料仅供专门写这方面的材料的人参考之用。

（内蒙古自治区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整理，2000年5月16日）

伪蒙疆时期傅增湘修成《绥远通志》经过概述

白光远[*]

北伐以后，热、察、绥三个特别区被改为行省，一切典章制度都与内地无殊。当李培基主持绥远省政的时候，地方士绅纷纷上书，倡议绥远应该修编省志。经过反复研讨，筹划经费，决定创立绥远省通志馆，并以郭象伋为馆长，阎肃为副馆长，荣祥为主任编纂，李泰棻为总，白映星、陈志仁、杨令德、张竹卿、王森然、金松伯等担任编纂。赵国鼎、刘继尧、王印、王庆、韩桂等担任采访组采访员。自1931年7月开始筹备，择定大盛魁北院为馆址，购买图书及各种办公用具，至8月20日正式宣告成立，编纂与采访各员均按馆章分别进行工作。1934年6月底，该馆已满三年，原拨经费已经用完，而工作量仅完成一半。当由郭象伋馆长报请省政府核示。省府会议一致认为馆务不可中断，决议续拨经费，并令进行改组。李泰棻遂辞去总纂一职，王森然、金松伯亦随李他去。馆中另聘韩葆忠、王文墀、张树培等担任编纂。到1936年初，《志稿》已完成十分之八强，馆中认为可以请省府预觅方志专家进行审核，以期撰稿与审稿同时并进。当由省府

---

* 作者时任伪蒙疆政府总务部总务处工作。

傅作义主席以重金聘请傅增湘为总纂。到1937年5月，除省县疆域图尚未制成外，全稿已陆续交傅增湘接收。双方商定编修经费和完成期限。由傅增湘在北平聘专人负责，分类编修。计当时聘定吴延燮、夏仁虎、瞿宣颖、谢国桢等专修一志或兼纂二门，并请史念祖等三人合撰地理，张寿林、夏纬明、何鸿亮等分别担任工、商、农、矿产业等类的编修工作。编修地点，就规定在北平西四北石老娘胡同傅增湘的“藏园”。每月共同交换意见三次，其余时间都在自己家中编修整理。

1937年7月7日，日本帝国主义制造了卢沟桥事变以后，大举向中国侵略，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这样退，退，退……一泻就是几千里。1937年10月间，绥远沦陷了。修志的事情，因绥远、北平之间关山阻隔，消息不通，遂告中止。这时阎肃、荣祥等绥远省通志馆大部人员均已出走，只郭象伋还留在归绥。他把通志馆的摊子整顿一下，暂时将一些原始资料搬回家中保存，日伪接收部门并不过问这件事。郭象伋还请求继续开馆，但毫无结果。1938年夏，伪蒙古联盟自治政府最高顾问宇山兵士发现这一问题，立即召见他的高级幕僚黑泽隆世，命其赶快联系，即日复馆，一切人事安排、经费开支，都由日本为侵蒙所设的“文化特别开支费”内全部支付。

黑泽隆世领命以后，即乘车亲赴郭象伋家会晤，并商谈复馆事宜，同时请郭象伋立即向北平傅增湘处写信，探询《绥远通志》保存情况。不久，得到傅的复信，说明《通志》原稿基本上还完全（仅地理志有一部分不完全）。黑泽隆世得信后，如获至宝，当即返回复命。日本顾问、参事官等人，连日召开秘密会议，商讨重修《绥远通志》，以便借助于各种资料，便于侵华。但当时伪蒙疆政府首脑德穆楚克栋鲁普（德王）等，大都不同意重修和印行《绥远通志》。他们认为这些旧东西，没有什么保存的必要，况且过去史书之类的资料，其内容总是以汉族为中心，对蒙古民族的种种记述，都是带有侮辱性的，所以不愿意接收，不主张编修。宇山、黑泽见此情势，恐怕形成僵局，遂上告于伪蒙疆“太上皇”金井章二（当时伪蒙疆委员会的最高顾问。伪蒙疆委员会统辖三个伪政府即“察南政

府”“晋北政府”和“内蒙政府”）。后经金井章二和日寇内蒙驻屯军最高司令官几度磋商，终于达成协议，准予立即复修。德王等反对不得，只好同意。他们还在所谓“裁决书”上画押签字。

一切准备就绪，急电伪蒙古联盟自治政府驻京办事处处长敖云章与傅增湘联络，请其继续编修整理，至于所欠的两万元修志费，完全由“政府”负责，保证不差分文。同时还转告傅增湘，在最短时间内，黑泽隆世要带上书信和礼物，和郭馆长一同前往，代表最高顾问宇山兵士，赴平慰问。

黑泽隆世为修成《绥远通志》的事，一年之中往返六次。《绥远通志》于1939年3月完成，最后全书修成6志，列36门，统子目70，全志有116册，共约200万字。地图、金石等另附于外。

当书成之日，还举行了隆重的接收仪式。出席这次会议的，除了全体编修人员和伪蒙疆驻京办事处的全体人员以外，日寇文化侵略机构“东方文化研究所”的负责人桥川时雄也参加了接收仪式。会后还在北平八面槽最大的东兴饭庄举行了招待会。会上给傅增湘献上酬劳金10000元（不在修志费内）。最后摄影留念，题名“绥志修成图”。

会后将原稿和修成本，分两部装运。原稿交国际运输公司保险邮寄，定本（修成本）交由日寇军部专门运送，交伪蒙疆政府顾问部。

关于《绥远通志》定本印刷事宜，也是经过慎重研究，先计划由北平京华厂印刷，嫌纸张不好，时间太长（为期二年），改由“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奉天印刷厂印行，也觉得不十分保险。经过跟日寇军部和日本帝国政府反复研究，最后决定运送日本东京，委托日本全国最大最好的印刷厂，负责承印。事情就这样决定了。但自1943年到日本印刷以后，便没有下落了。

为什么日寇这样热衷于《绥远通志》，而不惜以10万巨金（印刷费不包括在内）重修呢？这是他们在文化侵略上的一种掠夺手段。多年来日寇在对华文化侵略上，成立“善邻协会”“东亚同文书院”，“满铁”经济调查研究机构等，专门培养大量的“中国通”（需熟悉中国风俗习惯，学会中国语言文字，并研究我国各地的商业行话和方言土语），向中国进

行深入细致的侵略活动。他们除了研究中国的典章制度、历史和文物、矿山资源外，还特别注意民间野史和各地习俗，以及当代上层人物的性格特点、生活习惯、兴趣爱好、家庭情况、社会关系，以至当时军阀官僚有几个姨太太、他最喜欢哪一个，也都在日寇调查研究之列。日寇特别重视《绥远通志》的编修，自然也是为其总的侵略目的服务。尤其把“满蒙”看成所谓“生命线”，所以更是要致力于这方面种种资料的搜集与研究。

当《绥远通志》的初稿（原始本）运回归绥之后，日寇各文化机构都派遣一部分精通中文的日本人前来参阅，并详细地做笔记。特别对于乌、伊两盟十三旗的“恳务”资料，研究的人员更多。平时这部初稿，存放在“顾问室”保险柜内，由黑泽隆世亲自掌管，不能随意借阅。

我当时在伪蒙疆政府总务部总务处工作，亲身参加过接收《绥远通志》这件事，前后搞了两年，知道得比较全面。现在将傅增湘作的《绥远通志序》录出，以作本文的结束。傅增湘这篇序言对《绥远通志》成稿经过叙述甚详，但在序文中对日酋进以阿谀奉承之词，或是其不得已而为之吧？这篇序文曾刊载于日伪时期北平出版的《中国之论》上。

傅增湘：《绥远通志序》

绥远地域，自元明以后，久为蒙古诸部所居。迄于清初崇德，土默特部率众内附，始有驻防设官之制。然其命名也，实自乾隆四年筑城始。嗣是土地日辟，生聚寖繁，遂增设厅治，属诸晋省。故凡关于往古之沿革与今制之推行，咸附见《山西通志》，而专编纪述乃寂无闻焉。清末以防边大计，倡言设省，顾议而未行。民国初元，划为特区，制同专阃，设官行政，与腹衷无殊。逮至已巳，南北混一，始建行省，布制颁章，规模灿备，隐然为北方雄镇矣。盖自秦汉云代设郡以来，历数千年，战伐频仍，废兴靡定，几经毅辟硕臣之谋画，名王贵种之材武，与夫人民吏士之奋厉艰勤，使荒寒广漠之乡，日进于熙洽丰昌之治，斯岂偶然而致也哉。夫以

年代之久远，盛衰治乱之循环，其留贻于史迹者至钜且重。设不为之画一整齐，勒诸简册，则往者何所传信，而来者何以取鉴耶？近者兹邦贤士大夫，留情文献，时有撰述，如《归绥识略》《绥乘》之属，播传于时。然或削稿而待刊，或成书而不备。且以制度频更，当事未遑著述。辛未之岁，李君培基来主省事。以省制既定，修志未容濡缓。爰创立通志馆延郭君象伋主领馆事，阎君肃副之，以荣君祥主任纂修，更聘李君泰棻专任总纂。义例一遵部章。顾以造端宏大，始事艰难，边庭僻远，古事既苦于徵寻，近代军兴，文卷复多经散佚。乃议定古近二者，涂径区分，古代者搜求往籍，参与旧闻，得其大凡，宜可依据。近代者则各地分行，取诸实验，近而县局，远届盟旗，东西首涂，二道齐发，耳目所经，籍记于册，再阅寒暑，巡察始周。从事诸人，沐风露、犯冰雪，毡帐驼城，车尘马足，旅途况瘁，迥非恒人所堪，而采获周祥，亦视传闻为审。惟采访之功甫讫，而编辑之役尚遥，义例之外，所成者只金石二卷，余皆浩博无涯，端待沓理，适以帑金匮乏，而资用浩穰，数逾巨万，长此迁延，杀青无日。甲戌之岁，乃议改弦，仍依郭荣二君，分筦修辑。汰浮节冗，程课精严，期以二年，先完初稿。日有程，月有报，终以二君督励之劳，至二十五年丙子之冬，而志稿一百二十册已编录蒇事矣。先是丙子之春，志稿方成泰半，时主省政者，为傅君作义，锐意兴作，以省志事属创举，不仅为地方文治之渊源，将垂为百代流传之典则，参稽论定，不厌其祥。乃遣使人，奉书币远来旧京，以总纂之任，属诸增湘。窃维齿暮学荒，何足参斯大著。而来札雅意肫勤，兼之申以宗谊，遂面见然承命。旋即命驾出关，躬陈主旨，并小住绥垣，与志馆诸贤，考询端绪，因以备谙频岁搜访之难，与诸人首功之力。故不越数岁，而草创成编，其事为足佩慰者也。未几载稿言旋，方期息影山中，专事研削。会有家事撄心，俄然中沮。讫于岁暮，全稿赉来，发箧陈书，勤加考览。因拟具重修之法，上书当道，备陈原稿繁富，评瞻可征，而体例宜商，稽寻未备，有门类宜并者，有分目宜增者，有冗复宜芟者，有疏漏宜补者，有伪失宜正者。千条万绪，亟待考求，眇尔孱庸，岂能包举。谓宜博访耆硕通儒，与夫专门英俊，庶得

分力课功，完此大业。旋奉来章，悉予嘉纳。遂乃广约胜流，翕集相助，如吴君廷燮、夏君仁虎、瞿君宣颖、谢君国桢，或专修一志，或兼纂二门。又约史君念祖三人，合撰地理，张君寿林、夏君纬明、何君鸿亮分任工商农矿产业诸类。而撰订条纲，商榷事例，则张君国淦翊助为多。结社于藏园，月恒再三集。发舒旨论，辨证异同，得失藉以相资，条理期于共贯。兼迓馆长郭君入京，下榻园中，时有疑难取便商讨。方谓齐心协力，庶几克日观成。无何卢沟变起，人情震惊。郭君既急装北归，余人或仓皇返里，或僻迹乔居，即留滞都门者，亦意趣萧寥，兹事遂尔中辍。独夏君于风鹤告警之中，闭门属草，文献全志，如期撰成。夫惟大雅，卓尔不群，斯足尚矣。惟时京绥千里，兵戈阻绝，邮书往复，悉付浮沈。追维付托之殷，重以散止为惧，乃尽收旧稿，与馆藏故书，同扃秘库。倘兵烽之不息，将敝帚以自珍。顾望徘徊，经匝岁。昨秋塞外来人，衔旨慰问，披诚相语，始末具详。已而蒙疆顾问黑泽隆世君，翩然戾止，审知蒙旗诸部，合缔联盟。宇山先生，以东方贤杰，总挈政机，因启新邦，眷怀旧治，既徇舆情，先恢志馆，并驰使命，下访鄙人。重蒙黑泽君，礼意殷拳，雅相契重。喜遗编之尚在，惜新撰之未成。仍属不才，始终其事。并谓边疆创造，百废方新，大而因革损益之故，细而采风问俗之方，咸待是编，综其条贯。前事固可作师资，群情尤殷于企望，幸资众手，早奏全功。因与约定程期，珍重而别。由是再集旧人，仍理前绪。惟世纷初定，人事不常，史君三人，撰辑将竟，携稿远适，不可追寻。何君言旋蜀中，迢遥莫致。乃延张君星烺总阅地志，而以其妹月烺及王君光炜，把君△△，就其原稿，分别增删。其余旧者或须重检，新者多待改编。又别引吴君丰培与及门孙生楷第、韩生敏修，刘生文兴助我裁定。更于校阅之暇，手辑文征，为卷十二，较之旧编，差为赅备。计始自秋初，讫于腊尽，穷搜极览，昕夕靡宁，目力昏眵，手腕欲脱，栗陆半载，缮录始成。然芜类未芟、差讹不免，虽殚尽智能，编排粗了，而才识疏谫，愧负已多。总核全书，分为六志，列三十六门，统子目七十，析卷为次，凡百有十六，而以舆地诸图，金石列品，别为影写，附着于编。呜呼，可谓难

矣！溯自志馆倡立，于今七年，鄙人膺命，已三经载。省志既前无所因，县志亦成者无几，幸赖郭君主持馆事，奋凿空之力，肆焠掌之勤，钜细毕赅，辑存文字都上万万。洎鄙人承命以后，删繁节要，方具条流，而忽丁国难，志气销沮，私计当戎马之秋，宁复重雕虫之技，徒工削扎，好等覆瓿。仍图政府群公，创业方殷，未忘前典，宇山先生，中枢赞治，雅意修文。而黑泽君尤能具怀古之深情，引斯文为己任，知志乘为地方之史，古今掌故系焉，失今不图，后将何述？故内参谋议，俯纳舆情，使一线之绪，垂绝而复延，百卷之书，历劫而不泯。从此布在方策，流传万篇，开朔方纪事之元，为行省图经之殿。匪特兹邦士庶同感盛谊而怀欣，即载笔诸人，亦幸钜编之终就。用敢申述源流，重告来者。至于编定旨趣，别载例言，兹不复赘举焉。岁在已卯三月江安傅增湘序。

（1987年）

军统特务与汉奸伪军勾结的一些情况

宗化民*

抗日战争时期，蒋介石集团消极抗日，积极反共，与日寇的前哨——伪军秘密地勾结。特别是军统特务机关，高级特务拿着蒋介石给汉奸的委任令出进伪军“司令部”，特务们又经大汉奸加委“高参”“嘱托”“咨议”一类职务。我所知道的日寇侵略华北阶段至1945年日寇投降期间，平绥路沿线及河南汉奸伪军与军统勾结情况如下。

一、军统与汉奸伪“蒙古军总司令”李守信的关系

远在1934年，军统高级特务马汉三奉戴笠之命与汉奸李守信勾结。马汉三拿着蒋介石的密令，派李守信为“先遣军骑兵司令”。李守信既是日寇的伪“蒙古军司令”，又是蒋介石的“司令”。马汉三充任伪军的“高参”，在察北一带做特务工作。1937年日军侵占华北，李守信部驻平绥路沿线，日寇将察（晋北也包括在内）绥两省划为伪“蒙疆联合自治政府”，由德穆楚克栋鲁普（德王）充“主席”，李守信充“副主席”兼

---

* 作者曾任国民党政府国防部保密局派驻天津站上校督察。

“蒙古军总司令”并叙“上将”，蒋介石为李守信汉奸部队留“中央军五十八军”的番号并派李守信为“军长”，由马汉三转达，马汉三又充伪军“嘱托”。我于1939年和其他15个同学由北平去兰州受军统特务训练（“中央警官学校兰州特训班”），由李振宗持马汉三介绍信找伪蒙军“师长”兼“包头市长”。汉奸刘继广早知有学生要通过，他拨车一辆、伪官兵各一人，护送我们出包头城，通过日军防地到达傅作义防地转往兰州。

1945年“八一五”日本投降后，蒋介石召集德穆楚克栋鲁普及李守信到重庆，委派李守信为“热河人民自卫军总指挥”。在北平，李守信与马汉三形影不离（马汉三充军统华北办事处长，对外以“北平行营”督察处长出名），李守信赠送马汉三大批财物及最新式的汽车。戴笠到北平乘坐的车就是李守信的。第十二战区司令长官部调查室主任史泓，每次由归绥到北平住在伪蒙军师长朱恩波家，朱恩波的儿子由史泓委派校级军官。

汉奸李守信摇身一变为“中央军的总指挥”，他以后以别号李自忠出名。他到热河大批收罗留散的伪蒙军伪警察，企图帮助蒋介石建立反动军队，进攻解放军。热河朝阳的军统组长龙超协助李守信建立反动军队，一度兼充“人民自卫军第三支队司令”。保密局在承德建立热河特务站时，龙超充站长，马汉三介绍李自忠的参谋长刘继广充少将通讯员，该站副站长宗化民刚到热河李自忠就赠给指挥部上校参议名义。

1947年秋蒋介石又将李自忠的“热河人民自卫军”改编为“骑兵第三军”，李自忠充“军长”，直到1948年李部在东北被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完全消灭。

二、汉奸王英与军统

王英是绥西后套的恶霸大地主，投降日寇认贼做父出卖祖国当了大汉奸。日寇委派王英充“绥西联军总司令”，驻在包头以西，军统委派绥远籍特务史宜亭充王英匪部的“参谋长”。史宜亭曾企图夺取王英军权，二

人发生摩擦才分开。但是军统与王英在抗战时期关系始终未断。1943年军统五原办事处包头组长龙宗信在包头活动，王英给以参议名义，王英对经过他地区的军统特务表示欢迎拉拢。王英虽做汉奸，在五原临河一带有数百顷水田，蒋介石却暗示该地地方当局保护他的财产。

三、汉奸白凤翔与军统

白凤翔又名白三阎王，是热河的著名土匪，曾由张学良收编为东北军的骑兵师长，以后又充蒋介石的“热河先遣军总指挥”。“七七卢沟桥事变”，日寇侵占华北，白凤翔投降日寇。日寇委派白凤翔为“东西同盟军上将总司令”。他领着伪军驻在绥远的固阳黑教堂一带，经常与军统特务勾勾搭搭。军统五原办事处派遣特务冯兰亭，带着蒋介石委派白凤翔为“骑兵司令”的电报住在黑教堂。白凤翔的副官长徐宗尧任军统高级通讯员，白凤翔的家眷妻妾三人住在西安，由胡宗南派人保护。三个女人经常往返于西安及沦陷区黑教堂。白凤翔因吸食鸦片、白面，毒瘾太深，于1942年春中毒死去，他的汉奸部属姜兴周充任军统的组长，吕瑞祥充译电员，徐宗尧一跃而为军统高级特务华北站站长及日寇投降后的河北省会警察局长、解放前夕保密局北平站站长。

四、汉奸李英与军统

李英也是土匪头子出身。起初他和他的叔父李福和共同集结土匪五六千人投降日军，日军委派李福和任伪皇协军“总司令”，李英充第一路“司令”，驻在河南彰德一带。李福和死后，李英执领乃叔汉奸军队，日军改派李英为“剿共军总司令”。李英出卖祖国屠杀人民更凶恶，他与军统特务机关又在勾搭，由汉奸变为特务的徐宗尧成为李英的座上客。李

英的部下康亚夫（又名康健东）兼军统华北站通讯员，李英的下属“旅长”李文伯（又名李墨林）兼充军统华北站通讯员。1945年日本投降后，汉奸李英逍遥法外，在北平做寓公，他的部下康亚夫充军统“长春策反专员”。李英于1947年南京一行，特务头子毛人凤（保密局长）亲自接待，并派李英为保密局热察特别站站长，康亚夫由“专员”改调热察特别站副站长，李英的汉奸旧部分别充任特务内外勤的站员、组长通讯员等。

（1965年4月）

回忆伪蒙古军汽车队历史片断

胡·巴吉尔*

一、伪蒙古军建立的概况

1936年，锡盟苏尼特右旗王爷德穆楚克栋鲁普（以下简称德王），是国民党政府“百灵庙蒙古地方自治政务委员会”秘书长。1936年2月在苏尼特右旗德王府，依仗日本帝国主义的势力，成立了所谓的“蒙古军总司令部”。同年5月在化德县（蒙古名嘉卜寺）宣告正式成立了“蒙古军政府”。“军政府”成立之后，便由德王亲自招兵买马，扩充军队，把原李守信统率的部队和从东三盟招来的新兵及锡、察两盟征来的新兵，合起来编为八个骑兵师，一个警卫师，一个炮兵团，一个宪兵队，但都有缺额，实数六七千人，号称一万余人。从军部至连队都配有日本顾问、指导官、教官等多人来监督、指挥、训练。其军费、武器装备等多由日本关东军从伪满洲国（东北三省）掠夺的物资中供应，极力扶持傀儡政权，达到中国人打中国人的目的。

1937年7月，日本侵略者发动卢沟桥事变后不久，侵华的日本关东军板垣师团攻陷南口，向张家口进犯，东条机械化部队由北路出古北口，经多伦、张北，从背后向张家口进犯，同年8月侵占了张家口。

---

* 作者曾任伪蒙古军汽车队上士汽车助教等职。

二、日伪军西侵绥远及建立“特设队”

张家口被占之后，日本关东军参谋长东条英机特来张家口会见板垣征四郎（日军师团长）等人，研究了进攻计划，决定集中两路精锐日军配合德王、李守信部队，以所谓“闪电式作战”顺平绥铁路线西侵。德王、李守信、田中隆吉等迅速纠集伪蒙古军各骑兵师和炮兵团配合日军行动。吴鹤龄等由多伦率领伪蒙古军政府职员到达张北县城。德王为了新形势的需要，将伪蒙古军政府主要部门和部队进行了部分调整，尽量起用他所亲信的少壮人员。任命李守信为蒙古军总司令，乌古廷为参谋长。并在张北县组成了一个由伪蒙古军直辖领导的汽车、装甲车混合的特设队。队长李铁生，日人山本、禄川为主任教官，官兵百余人，装甲车七辆，配有轻重机枪，汽车十余辆，一面训练，一面随军运输武器弹药、给养等。这就是以后的伪“蒙古军自动车队”（汽车队的前身，以下简称“汽车队”）。同年（1937年）9月，日伪军进攻察北、绥东各旗、县、镇时，该“特设队”承担了重要的运输任务。

当时驻守在察北、绥东的国民党部队将领指挥失措，节节溃退，使敌军顺利地占领了绥东集宁等地。

1937年10月中旬，日伪军占领了绥远省会归绥市，把归绥改为“厚和”（今呼和浩特），日伪在这里一面西进包头等地，一面调整机构，巩固其统治地位。

三、伪蒙古军汽车队的组成

1938年初，伪蒙古军总司令李守信、参谋长乌古廷、日本最高顾问高场等对所属机构进行了整编。除原来的各骑兵师外，在厚和豪特（呼和浩特）组成了伪蒙古军炮兵队（原炮兵团）、汽车队（原特设队）、通信队，宪兵队、军官学校、军医院、军械修理所等，都直属伪蒙古军总部领导，以上统称直辖部队。总司令部、顾问部设在归绥旧城北门西顺城街，宪兵队、军械所、军医院驻旧城，炮兵队、汽车队、通信队、军官学校都设在旧城北门外小校场。

当时的汽车队是从张北县成立的特设队，又改为汽车训练处而来的。同年初，“总部”下令由各个部队中，抽调20岁以下的青年士兵充实了上述各直辖队。我是从后编第七师二十团抽调到汽车队当学生兵的。和我一起抽调来的有100余人，都是从各师抽来当学生兵。这批新兵主要进行汽车驾驶、检修和必要的军事训练。经过短期训练后，挑选了50名学员（其中有我）派赴伪满洲国奉天（现沈阳市）日人经营的“奉天同和自动车工业株式会社”培训。6个月后结业，返回厚和豪特小校场汽车队，作为骨干人员，都晋升为上、中、下士司机、班长等。我担任上士汽车助教，训练第二批学兵。这时的汽车队总队长是李铁生，副总队长王守义，日本主任教官天野博，中队长王汉林，副中队长孙均旺和欧宪章，日本教官吉光、山本、尾森等，还有其他蒙汉下级军官多人。他们多数是德王的军官学校毕业生，共有官兵300余名，汽车40余辆，大都是日产三吨货车和几辆破旧不堪的装甲车，还有少数的美制福特、雪佛兰货车和一台小轿车。这些车辆每年有所更新，交替下来的旧车拨地方使用，使军车保持完好状态。

1939年初，汽车队设两个分队，即平地泉分队，队长胡海，副队长宝庆章，士兵40余名，汽车10余辆，驻集宁县城；包头分队，队长李德，副

队长陈巴图，士兵40余名、汽车10余辆，驻包头市内。总队直辖一个中队（连队），中队长王汉林（连长），副中队长欧宪章（副连长）下设三个小队（排），第一小队长额林沁多尔济，第二小队长是我，第三小队长宝国忠，还有数名管理军佐，有官兵100余名，汽车20余辆，日本教官今平等数人。这个汽车队是支以蒙古族为主（占70%以上）、由日本人严密控制的、武器弹药装备雄厚的部队。

四、伪蒙汽车队的任务与活动

（一）平地泉分队：它的主要任务是为驻在绥东地区的各伪蒙古军部队运输武器、弹药、被服给养等军需品，为伪蒙军第三师、第七师、第九师的各个团、连队驻地服务，把铁路线运来的物资，由集宁运往土牧尔台、德王府、滂江、二连（额仁达布素）、东苏旗、贝子庙（现锡林浩特）；由集宁运往卓资山、凉城、大土城、陶林、乌兰花、隆盛庄、丰镇、兴和、尚义、张北、张家口、商都、化德、宝昌、多伦等地。当时，道路状况极差，有的地方有简易公路，没有公路的地方就走大车道，给沿途村庄带来很多负担和骚扰。

（二）包头分队：担任绥西地区伪蒙古军第八师各团，及其他部队的军用品运输任务。它的运输路线是：从包头市开始至固阳、百灵庙（现达茂旗所在地）、原乌盟中公旗海流图、却金郭勒等地，包头至东公旗、大佘太，包头至西公旗、公庙子、西山嘴，包头至伊盟达拉特旗树林召等地。因为这些地方都有伪军驻守，凡属人员调动、部队换防、拉运军用物资等都由汽车队往返运送。

（三）厚和（今呼和浩特）总队直辖的汽车中队，担任大青山以北地区的伪蒙古军第五师、第六师和绥南地区的伪靖安警备队等部队的运输任务。它的运输路线是：厚和至武川、百灵庙、中公旗，厚和至武川、六合营、乌兰花、王府、锡拉木伦庙（现四子王旗大庙），厚和至萨拉齐、

包头，厚和至喇嘛湾、清水河，厚和至和林、凉城。每次运输按班、排轮流调派。若整排以上出发时，有连长或副连长及日本教官跟随，排长只能依他们的意图指挥车辆（旗语指挥）。因为这个中队（连队）的运输路线大都处于八路军游击区，尽管采取各种戒备措施，但也经常受到游击队的阻击，尤其是运送弹药武器，时常被八路军缴获，对于车辆、人员毫不损害，放回原队。这主要是因为伪军内部有我党地下工作人员。当时伪蒙军骑兵五师师长是乌力吉敖喜尔，在其师部做商贩的赵大爷（毕力格巴图）经常坐该队汽车去各地采购商品，和车队官兵们相处得很好，在生活上常给予照顾，所以这个队的士兵们亲切地称呼他“赵大爷”。赵大爷的人员坐车及运输商品，大都通过这个队捎脚而且分文不要，也不受日伪军警的检查。因为这是军车，检查站卡军警无权过问，这就方便了赵大爷的活动。解放后，毕力格巴图担任内蒙古自治区公安厅长、党委书记，我们才知道他当时是在进行党的地下工作。

这个汽车队在运送各个部队军用物资返回空车时，还可以拉运当地的土特产品进城，如粮食、碱盐、皮毛、肉类等，其运费作为本队的伙食补贴。当时不允许军车参与商业运输，所以只能小规模地偷运一些。

五、伪军政当局对汽车队的重视

德王、李守信等对汽车队极为重视，经常过问这个队的工作、生活情况，频繁调动军官，安插亲信。每次阅兵都有汽车队的步兵分列式和汽车武装分列式，并授予奖状、奖金，经常给以表彰。因这支部队是由经过挑选和训练的蒙古族青年人组成，有一定技术的机械化运输队伍，是培训汽车、装甲车驾驶员的单位，所以在服装、伙食、粮饷等方面都比其他部队优越。

六、伪蒙古汽车队的结局

1945年8月15日，日本帝国主义无条件投降，伪蒙疆政府随之垮台。德王、李守信投靠国民党政府，命令所有伪军驻守原地，听候改编。这时，国民党反动派为了夺取胜利果实，派兵遣将，勾结伪军，阻止八路军收复失地。伪蒙军总参谋长宝贵廷公然下令所属伪军驻守当地，抗击八路军，迎接“国军”进城。不几日国民党部队进入包头、归绥市，将伪军统一编为所谓“十路军”，派赴各旗县与国民党部队配合向新解放区进攻，准备发动新的内战。这时，伪汽车队的车辆都收归国民党第十二战区司令长官部，官兵改为骑兵，归属十路军派往和林攻打八路军。出发前，汽车队的部分官兵不愿再打内战，我乘此机脱掉军装，放下武器，逃回原籍。在该队进军和林时，中途由副连长宝庆章等率领班长白宝荣、色冷等部分士兵向八路军投诚，走向革命道路。其他一些士兵看到这种情景，也纷纷弃械逃离该部。这时的总队长杨森扎布感到士兵逃亡，众叛亲离，前途渺茫，后果不堪设想，也率领自己的少数亲信官兵向八路军投诚，受到欢迎和优待，有的遣送回东北解放区家乡。剩下的官兵东奔西散，各谋其生。使德王、李守信苦心经营的伪蒙古军汽车队就此告终。

（1987年）

伪蒙疆时期的一大血案

聂德俊*

伪蒙疆时期，日寇于1940年、1943年两次在呼和浩特（旧名归绥、归化，伪蒙疆改为“厚和”）大批逮捕无辜人民，特别是文教界人士，毒刑拷打，百般折磨，造成了骇人听闻的屠杀大血案。我就是罹难幸存者之一，身经“厚和”日本宪兵队、张家口日本柑柏部队军法处和察南监狱三个不同处所，真是虎口余生。现将亲身经历和见闻写下来，以志这笔永远不能忘记的血债。

为了整理这个资料，笔者曾先后走访了阎继璥、阎培昌、贾学清、岳淮、李香、张宝华、祁维德、卜辰、续吴山、韩凤岐、王友三、王之云、关和璋、黄昌、张荫廷、王永胜、赵振仑、王贤敏等，也在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处特务的档案中，搜集了一部分材料，并到包头军分区访问了周服礼同志，还特别走访了马南风厅长、田思明局长、张旭主任等，进行了研究。但错误遗漏，仍恐难免，尚请知者批评指正。

---

* 作者曾任小学教员，参加抗日救国会被捕，关押在日本监狱多年，抗战胜利后到华北联大学习。

一、血案发生经过

1938年冬，中共地下工作者在呼和浩特组织“绥蒙各界联合抗日救国会”，作为党的外围组织，秘密吸收会员，开展对敌斗争。同时也帮助财神庙老道王性真、阴阳道王永茂和理门公所[①]郭久城等，组织“蒙疆道教会”，发展会员200多人，不少“抗救会”的会员参加了“道教会”，作为掩护。“道教会”会址设在财神庙内，地下工作的负责同志亦居于此。

呼市是当时的伪巴颜塔拉盟的首府。盟师范学校的抗日救国会，逐渐吸收了周服礼、何树声、任希舜、王贤敏、贾秉公、阎勇、富养源、云华、杜思温、阎培昌、武恒年、武恒娴、黄恒娴、卜秉等150多名学生为会员；周服礼、何树声并被吸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40年2月，周服礼、何树声、任希舜、卜秉、王贤敏、黄媚梅、王林等秘密赴延安学习去了，学校的工作由武恒年负责。周服礼等赴延安学习后，被巴盟师范学校发现，即向家长追问学生去向，家长都推说不知。学校日本顾问安藤、福布、杜边、小仓等，认为问题严重，随向伪巴盟警务厅报告，他们判定归绥城里一定有一个共产党的庞大组织。于是，便派专人在学生中进行侦察，这就是抗救会被侦破的一开端。学生会员中出现了叛徒。燕缦云是巴盟师范的一名十六七岁的女学生，是抗日救国会的会员，对周服礼等赴延安学习的事情，她完全了解。就在这个时候，她被伪警务厅的警尉韩长胜威逼利诱，竟与韩姘居，并将周服礼等赴延安的事情完全泄露。她亲到旧城大什字认出抗救会的负责人刘伟，指给敌人，刘遂

① 理门公所——旧中国时期，一种群众性社会组织，以戒烟酒作号召，吸引社会下层人参加，派系复杂。这种组织对革命起破坏作用的多，但革命组织有时利用它，也起进步作用。

被敌人逮捕了。因此，抗救会的秘密从学校开始暴露了。燕缦云不久和伪巴盟公署顾问静藤以及“蒙古军”连长祁连胜，都相继发生了关系，最后和祁结了婚，现仍跟祁住在包头。

还有一个叛国投敌的败类孔广和。他曾于1938年任东北军骑兵支队的队长，1939年任东北军第一师的师长。他受白凤祥派遣，由河曲绕道来归绥，进行收买土匪的工作，不久就招收了2000余人。孔广和同年冬季被茂林太[①]伪警察署扣捕，送“厚和”日本宪兵队后，即叛国投敌，充当了日本宪兵队的“嘱托”（特务）。1940年初，孔某和抗救会负责人刘鸿雄、贾恭认识后，刘、贾二人便将孔广和看作一个可以争取的对象，动员他参加抗日救国的工作。不料，孔却死心投敌，用两面派手法，一面与刘、贾二人联系，一面在日本宪兵队的军曹河野的指挥下，侦察刘鸿雄、贾恭的活动情况，随时向敌人汇报。因此，在1940年7月17日，日寇大搜捕时，孔广和亲自参与了这一大逮捕的罪恶活动。

日伪当局根据巴盟师范学校学生失踪的事情和韩长胜、孔广和的侦察报告，以及叛徒刘伟的出卖，召集日本宪兵队、警察局、伪蒙古宪兵队、特务机关联合组成“搜查本部”，负责人是日寇河野、杉本、大桥等人。参加这个搜查本部的尚有警尉白玉等。

1940年7月13日清晨，日本宪兵和特务突然把巴盟师范学校包围起来，把学校所有的中国教师和学生整整包围了五昼夜，每天总有两三次汽车开到校门外，每次都根据侦察名单扣捕十几名教师和学生，前后共捕师生200余人。

日寇根据韩长胜的报告，决定先行扣捕失踪学生的家长。1940年7月13日，先扣捕了王贤敏的父亲王忠诚和他姐姐王惠敏，接着又扣捕了何树声的父亲何奎煜。7月16日夜间，河野、神奇等率领特务扣捕了黄昌、赵文华、黄笑竹、黄瑛（七岁）、黄厉（以上五人系黄媚梅的父母、兄弟、妹妹）。周服礼的父亲周葆久和家人闻风逃脱。卜秉的哥哥卜辰在伪巴盟公

① 茂林太——旧归绥县第三区政府所在地。

署任小职员，敌人用“出张”（出差）的名义，将卜辰诱至张家口逮捕，日夜加以刑讯，追问卜秉的去向。由于卜辰并不知晓，经两昼夜毒打，亦无结果。第五天即解回“厚和”日本宪兵队。这时日本宪兵队已捕了不少人。卜辰之妻李自祥也被扣捕在宪兵队。

这一惨案从1940年7月至1941年5月22日为止，将近一年的时间，被逮捕者竟达400余人，仅在“厚和”日本宪兵队被刑讯而遭残害至死者即百余人。剩余300来人，死的死，放的放，最后将我等51人于1941年5月22日解送张家口日本柑柏部队军法处。复经三个月的监禁，于同年8月22日将我等28名分别判处二至十年有期徒刑，送察南监狱执行。判处死刑的16名，抽血后，活埋在张家口南的万人坑。释放二人，被敌人收买利用的四人，病死在军法处的一人。

1940年以后，抗日救国会通过当时乃莫齐召小学教员谢振业（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学生）开展了工作。谢又和我地下工作人员邹广胜、老黄取得联系，邹、黄二人为给我大青山游击队购买物资，化装成商人，以贩卖药品作掩护，经常来往于大同、天津、北平等地。归化城东北保尔合少村的一个小铺，是物资转运站。这个小铺的王掌柜，在一次运送物资中被敌人扣捕。由此，谢振业及其弟谢振华亦被捕。谢振华被敌人打死在狱中，谢振业与同狱的富养源从新城伪警察署越狱逃出，因受酷刑伤重，未得走脱，复被敌人捕获，谢服毒身死，富被打死。

在敌人这次大逮捕中，巴盟师范的白国华、罗世杰二人亦被捕。这两个贪生怕死的败类，竟将当时在归绥的中、小学教员开列名单，说他们全是抗日救国会的会员。于是，敌人由警佐方田藤吉郎负责，带领日寇田村等，于1943年7月12日午夜又在全市展开了大搜捕。一夜工夫扣捕了100多人，审讯期竟达一年又十个月之久，直至1945年5月5日才结案。全案共捕了170多名，分别押在监狱、宪兵队、伪市公署“留置场”“搜查本部”、新旧城警察署等六个地方。其间曾组织了九个法庭进行审讯，在审讯中，刑讯逼供、百般拷打，在被捕的170多名中，被活活打死的占一半，释放者为数寥寥。判刑者49名，其中被判徒刑五年以上者5名，送张家口察南监狱；

其余44名送归化市第一监狱。送察南监狱者有：阎继璈、董文平、沙文良、王登魁、毕裕珍。他们被送往察南监狱后，拨到龙烟铁矿厂打石子，敌人怕他们逃跑，不久又送回察南监狱，和抗救会第一次被捕入监的难友相会，至1945年8月22日，同时获得解放。

二、厚和市日寇刑法种种

“厚和”日本宪兵队设在旧城东顺城街东口路北井儿巷的隔壁，豢养着一大群翻译、特务，门口经常守卫着两名鬼子兵。在军曹河野的驱使下，不断地进行灭绝人性的逮捕、刑讯、残杀。里边有八个监牢，每个监牢16平方米。屋顶、地面、左右隔壁都是木板的，砖做的后墙。前面是高大的大木栅，木栅中间留有八寸见方的小洞口，专为取送碗筷和零星东西使用；右角有一个尺半高的牢门，经常锁着一个大锁。屋内另一角放着盛满屎尿的便桶。牢里跳蚤成群，空气腥臭难闻。大栅栏前是走廊，经常守卫着两个鬼子兵。牢里的“犯人”有增无已，经常圈着满满的中国人。一旦被抓进去，先行登记，然后搜身，帽子、裤带、财物全没收。特务领你到既矮又小的牢门口，打开牢门，让你脱去鞋袜，爬着才能钻进去。牢里无分炕地。本来一间牢房最多住上八九个人就够满了，只因敌人无休止地抓人，人多房少，拥挤不下，除一部分人押往监狱和蒙古宪兵队外，每间房挤住十七八个人。敌人并不管你挤不挤，一股劲地往里塞，白天紧紧地挤坐，不许说话。如发现说话，鬼子便以长竹竿子，伸进栅里，照头上扑打一顿。夜间少铺没盖，和衣倒睡。人多地方小，大家必须面朝一个方向一齐倒睡，两腿弯对弯硬挤着睡。力气小、身体弱的人，挤也是睡不下，只好坐着；鬼子发现又是打骂，不得已还得硬往下挤，只挤得个个人肚皮扁凹，喘不上气来。

这里的饮食简直是不如猪、狗食。每日上午9点、下午5点给喝两顿有限量的稀粥。味咸苦，吃了舌干口渴，不吃饿得肚子痛。饮水一日给两

次，每次每人仅一勺。难友们忍受着饥渴之苦。

有一天，鬼子以消毒为名来折磨我们。在那地冻天寒的时候，敌人突然将我们200多人放了出来。房上地下站满了持枪的敌人，这些家伙个个怒目监视着我们，让我们排成两行站在院中，强迫我们脱去衣服，个个人脱得精光，寒风吹得电线“呜、呜”地叫，赤裸裸的身体，任凭寒风侵袭，只冻得个个心抖肉颤。隔了一会儿鬼子用喷雾器，喷湿了我们的衣服，之后，又向我们周身大肆喷射，只喷得身上水珠直往下流。这种刑法，我们叫作消毒刑。就这样被折磨了一个多小时后，让我们抱上衣服回牢房。牢房地板上水淋淋地坐不下，只好站着打哆嗦。

这里是鬼子、翻译、特务的世界。对“囚犯”不分昼夜地刑讯手段毒狠残忍。在夜阑人静时，时时可以听到难友们受刑难忍的惨叫声！

日本宪兵队的刑法极为残酷，刑种繁多：（1）烧烤：把铁器烧红，烫肌肤，烙乳房；有时把烧红的炭块放在身上，直将皮肤烧出油来，淹灭炭火。（2）吊打：用绳捆住大拇指，也有从背后捆住双手吊起来打。（3）灌凉水、辣椒水、煤油水：把人仰面朝天捆在梯子上，头上横放一条长凳，水桶放在凳子上，细水长流，直灌口鼻，闭气水四流，吸气喝一口，如此一桶一桶地灌下去。灌过半小时后，肚子胀起来，这时肚子上放一块木板，敌人站在木板上硬踩，只踩得肚里的水夺口而出。这一招使受刑者最痛苦。（4）困：敌分三班人马来拷问，一连三四天不让休息。只要一闭眼，马上就动刑，搞得人精疲力竭。（5）渴：水是人生一日不可缺少的东西。敌特却不给喝水，用渴来折磨人。（6）冻：把衣服剥光，在数九寒天里，站在雪地上、冰滩上挨冻。（7）鞭打：脱去衣服，用皮鞭抽打。（8）狗咬：鬼子喂着许多洋狗，用刑时把狗唤来，只要一打手势，狗就扑上来撕咬，直咬得肉破血流。（9）过电：用两筒干电池，通两根电线，敌特手持电线，在难友们身上一起一落，弄得人痛痒难熬。（10）栽坑：地上挖深坑，头向下吊起来，霎时便会气绝身死。（11）在指甲缝插竹签。（12）压杠子：让人跪在地上，杠子放在腿弯处，两头站上人硬压，只要一压便气绝身亡。（13）穿笔杆：将四个指头捆住，把蘸水钢笔杆插在指

头缝里，硬往进挤，疼痛难忍。（14）饿：三四天不给吃东西。（15）图钉扎：把图钉撒在洋灰地上，脱去鞋，推进室内，让狗咬，脚上、身上扎满了图钉。（16）假枪崩、刀砍：把人拉到血迹斑斑的深院，让跪在地上，静等一死。敌人用枪刀作势吓唬人。（17）铺冰、卧雪：脱去衣服，坐在冰滩上、雪堆里。（18）浇冷水、浇开水：在冬天里，敌特用冷水由头到脚泼去，然后又用开水浇在身上，先冻后烫，不几天，身上满是脓血。（19）钻水缸：在冬天，把衣服剥光，让人站在水缸里冻着。（20）杠子打：两人按着，一人双手抡杠，使劲打，死过去，用凉水泼过来再打，有不少人的腿被打断。以上种种，伤重致死者很多。

总之，敌人的刑法，世界罕闻，惨绝人寰。受刑者九死一生，生者受尽折磨，死者状极凄惨。

三、人民英雄和民族败类

这里，略述几位英勇不屈的人和他们可歌可泣的事迹；也略述另外一些人的悲惨遭遇；最后附带说说一两个民族败类的丑恶行为。

刘鸿雄原名刘王典，呼市郊区滕家营子村人，生于1907年。1926年在太原国民师范求学时加入共产党。1932年至1933年，参加了东北抗日义勇军、察哈尔省抗日同盟军的抗日活动，并先后担任过支队长、团长等职务。抗日同盟军被解散后，返回故乡任小学教员。1938年潜入归绥，通过抗日同盟军时期老同事的关系，打入日寇心脏——特务机关，以少校参谋作掩护，开展革命工作。刘鸿雄会同其他同志，组成了绥蒙各界联合抗日救国会，领导归绥人民进行了抗日救国的秘密活动。

1940年7月17日，敌人开始了大搜捕。他奔向财神庙，想把藏在大殿牌匾后面的秘密文件取出，不料进庙即被扣捕。甘心认贼做父的孔广和在日寇河野的直接指使下，参与了扣捕、拷打刘鸿雄同志的罪恶活动。

刘鸿雄被捕后，敌特用了烧、拷、吊、打等残酷刑法来折磨他。但

他在敌人面前昂首挺胸，高声大骂不止。鬼子、汉奸、特务被骂得恼羞成怒，手持大杠继续打，打得几次死过去，几次用凉水泼过来。他苏醒过来时仍是不住口地骂，敌特又是不住手地打。经过十余天的严刑拷打，直打得皮开肉绽，遍体鳞伤，腿臂骨折，奄奄一息。当他苏醒过来缓过一口气的时候，仍然要骂，并高呼“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就这样，直到气绝身亡。

贾恭，汉族，生于1909年。1938年参加革命，抗日救国会领导人之一。当时他任伪农会草料股股长，他经常利用工作之便，购买枪支、子弹、药品、衣物等，秘密运给大青山游击队。1940年9月间，被敌人在城北厂汉脑包村扣捕，解回日本宪兵队，昼夜不停地进行审讯。敌人在审讯中问：“谁组织的救国会？”他说：“贾恭。”敌人又问：“谁介绍你参加救国会的？”他说：“贾恭。”他把敌人所质问的问题都承揽在他一人身上。敌人对他用火烧、杠子打，百般刑法，始终得不到任何口供。一天，敌人将他的儿子贾学曾带到关他的牢门外，将小洞口打开喊道：“贾恭过来。”贾恭从小洞口伸出头来，看见儿子站在面前。敌人问贾恭说：“你认识他吗？”贾恭干脆地回答说：“不认识。”又问：“他是你的儿子？”贾随答：“不是。”这时贾学曾看见父亲已经泣不成声。敌人见贾恭连儿子都不肯相认，猛然将小洞口上的插板放下，正好卡住贾恭的脖子，抓住贾恭的头发，这个一拳，那个一掌，打得他头破血流，拔掉许多头发，脖子也被卡破了，卡得出不上气来。几个特务又将他推出门外，按倒在地上，鬼子手持大杠，打得他两腿断成数节。贾恭同志终于1941年阴历正月二十日被鬼子惨杀了。

贾恭被杀害以后，敌人还不准他的家属领尸体，经托人查询，方知已扔到狼神庙[1]附近。家人去狼神庙找到尸体一看，遍体伤痕累累，已无人的模样，其情形惨不忍睹。

杨森，抗日救国会秘密通讯员，是杨业澎（解放后担任过内蒙古军

---

① 狼神庙——在呼市公园后街齿轮厂。

区副政委）的父亲，《王若飞在狱中》一书中所称的“革命老人”就是他。当时他在伪厚和电灯公司充司炉工人。1940年7月被捕，敌人用尽各种非刑，打得老人死去活来，他只承认是抗日救国会会员，再不说别的。敌人问：“谁让你参加抗日救国会的？”他说：“中国人民让我参加抗日救国会的。”又说：“你们要侵略，我们就抗日救国，各为其主，理所当然。”他理直气壮，坚贞不屈。鬼子说：“老头，只要你不骂人，就放你回家。”老人的回答是：“鬼子、汉奸净做坏事，怎能不叫人骂！”最后被送到张家口日本军法处判处死刑。

张克敏，汉族，土默特旗五里坡人，共产党员，是抗救会的骨干。当时任乡村小学教员。1940年7月17日，听到捕人的消息后急忙骑自行车要到财神庙通知叶茂逃走。行前家里人说：“街上乱哄哄的，自己也该躲一躲，快别去了。”他却说：“救国会的同志们要紧。”骑自行车直奔财神庙，刚走进庙院即被敌人扣捕。被捕后，关进日本宪兵队，饱受敌人的灌水、冻、饿、杠子打等酷刑。他除了承认是救国会的会员外，没有吐露丝毫的秘密。于1940年5月22日送张家口日本莲沼兵团司令部、柑柏部队军法处，监禁三个月后，判处死刑。同年8月底被日寇抽血后，拉到万人坑活埋了。

郑化国，汉族，当年50多岁，呼市知名人士，抗日救国会的骨干。当时任伪厚和农会会长，也是推荐党的地下工作者叶茂同志任伪教育股督学的介绍人和保证人。叶茂逃脱，他即被捕，敌人对他用尽了种种毒刑。一次在审讯中把他的衣服剥光，皮鞭打，火铲烫，随又把他的胡子、阴毛一齐拔掉，用洋狗咬，撕破肉皮，露出白骨。他一直破口大骂。经过三四天的酷刑拷打，直至被打死，始终未透露出半点真情。死后家人去领尸体，只见半个身子和一条腿上的肉全被狗撕光，全身血肉模糊，毫无人的模样。

魏大贤，汉族，山西阳高人，中国工业大学毕业，抗救会骨干。他以私人资格在小北街三十四号十王庙内开设了一个新华毛织厂。抗救会联络站就设在他家。他被捕后，家产全部被掠夺，在日本宪兵队饱受各种酷

刑，不几天即被打死。其妻魏孟氏被判刑三年，其女魏友梅被判刑五年。他厂里的工人王高被处死刑。魏孟氏母女二人入察南监狱后，于1943年6至9月先后死在狱中。

赵新民，是伪厚和税务局职员，因年纪大被革职，家庭生活极为窘迫。富有爱国思想，非常仇恨日本帝国主义，经助产士李克敏的介绍参加了抗日救国会。赵新民夫妇和儿子赵振仑，女儿赵宝珍（13岁），一家四人，都被逮捕。敌人在押解途中，赵新民向他儿子赵振仑说："我要以死来对付日本鬼子，你可别忘记了报仇啊！"

日寇杉本审讯赵新民，首先问："抗日救国会的头子是谁？有多少会员？"赵新民毫无惧色地说："抗日救国会的头子是谁，我不知道！救国会的会员多得很哪！"杉本说："好，你就把救国会的会员的名字说说吧！"赵新民答复得很干脆："会员确实不少，可是我不知道他们的姓名。"杉本命特务白玉和宪兵将赵新民推出门外，几次灌凉水，死而复苏后痛斥敌人："你们这伙吃人的野兽，要杀、要剐由你们，想要我招供万万不能。老子死了，也是光荣的！"敌人无计可施，便把他扔在院子里冻着，灌水后又在板凳捆上了六七个小时。当天晚上6时许，又换河野来审讯，河野采取精神战术，将赵振仑提出，把赵新民从板凳上放下来，装腔作势地好言相劝了一番。又让翻译递给赵振仑一张纸和一支笔，河野说："你快快写出救国会会员的名单来，马上放你们回家，不然就打你爸爸，让你亲眼看看。"赵新民听了敌人的话愤怒地说："振仑，你可不能给他们写，如果你写了，就不是姓赵的儿子！"赵振仑拒绝了敌人的要求。河野听了赵新民的话，再次用刑，白玉翻译等像疯狗似的挥起大棒，无情地扑打。16岁的赵振仑眼巴巴看着自己父亲受苦刑，边哭边叫"爸爸"！并趴在爸爸的身上，替父挨打，可是敌人越打越凶狠，赵振仑站起来夺去白玉手中的木棒。

赵新民同志愤怒地说："你们这些汉奸、走狗！不得好死！你老子至死也不会屈服。"白玉和狗头翻译再次毒打赵新民，而赵新民同志也更加使劲地骂。赵振仑边哭边叫"爸爸别骂啦，别骂啦"。赵新民瞪大了眼睛

厉声说："你不让我骂，你就不是我的儿子，我也不是你的爸爸。"他边说边用腿踢开赵振仑，更加愤怒地大骂起来。鬼子、走狗手持大棒一齐扑打，直至赵新民的两腿打断，口吐鲜血，才住手。赵新民伤势严重，危在旦夕。敌人虽然使用各种手段拷问了一天和一个晚上，得到的只有赵新民的痛骂。

赵新民的腿被打断，不能行动，几个特务将他推到三号牢房。将赵振仑推出门外，剥去身上的衣服冻着，只冻得他浑身颤抖，说不出话来。深夜12时，鬼子们才将赵振仑送回二号牢房。

赵新民被送回三号牢房后，因伤势严重，延至第三天早晨，赵新民光荣地牺牲了。

敌特折磨死赵新民后，对赵振仑也不轻易放过。过了几天又过堂，他年纪虽小而胆量却很大。敌人一再追问抗救会的人员，但他始终没有供出一个人来，敌人打他、吓唬他，他毫不示弱。敌人在无计可施的情况下，让李克敏当面对质，承认自己是会员。于1941年5月22日，送张家口日本柑柏部队军法处判徒刑三年。

赵振仑的母亲、妹妹被释放后，家里的财产和所住的房子，全被肖翻译霸占，逼得她们过上了流浪生活。万般无奈，他母亲忍痛将13岁的女儿赵宝珍给了车站工作的何姓做了童养媳，迄今下落不明。赵谢氏卖掉亲生女儿后，回到河北定兴县娘家居住，在辛酸、艰苦的岁月里，忧奋致疾，不久病故在娘家。

赵振仑的右足被敌人打伤，入狱后整整三年，流脓流血。出狱后经医治无效，只好锯掉，成为残废，解放后参加了革命，后在北京市人民银行工作。

马多善，苏虎街小学教员，于1943年7月被捕后，敌人为了逼供而下了毒手。一次过堂，正值严冬，日寇福奇指使特务将马多善的衣服剥光，福奇亲自用皮鞭子抽打。皮鞭梢子上结有一个疙瘩，打中马的后脑勺，沾去一大块肉皮，流血不止。打完后，扔在院子里冻着，继而将他推进雪堆里，当他挣扎爬起来时，又把他推进雪堆，并用雪埋起来。如此反复数

次，敌人又提出一桶凉水，由头上浇下去。这时马多善已冻成“冰棍”，失去了知觉，回牢后已经半死不活了，顿时肚脐抽缩在肚子里，疼得他满地打滚，不住口地骂鬼子。两三个小时后即气绝身亡。

路履丰，是音乐教员，被捕后，经历了种种酷刑。一次过堂，鬼子问：“谁是共产党？”他说：“我不知道。”鬼子立即指使王翻译，将他的衣服剥光，推到院里。几个特务又将他抬起来，头向下栽进水缸里，水缸里直冒水泡。几分钟后，又拉出来，如此反复数次。这种刑法，比灌水还厉害。敌人把他从水缸里拉出来，又用皮鞭和棒子毒打，直打得死去活来。从此他的神经错乱，昼夜大骂敌特，终因受刑惨重不数日死于“厚和”市公署“留置场”。

何麟书，满族，东落凤街小学校长。被捕后，日寇提审，遇着出名的打手贾大棒子做翻译。日寇问什么，他都说不知道。鬼子饬令贾大棒子打，贾拾起大棍，不停地毒打，直打得晕倒在地，还叫来狗咬。第二天鬼子又把他捆起来灌水，一直灌了九桶凉水，随后又用皮鞭和三棱棒子毒打。直打得血流不止，回牢后不到一天即死亡。

李世奇，伪实业中学的教员，扣捕后关押在新城“搜查本部”。经日寇中菅过堂，令特务把水洒在背阴地，冻成厚厚的冰，将李世奇的衣服剥光，让跪在冰上冻着，然后再用凉水泼在他身上，继而又用一壶开水浇。用刑毕，李已不省人事，随即抬回牢里。经过几天后，遍体肉皮糜烂流脓流血，满身没有一点肉皮颜色。历时22天，于1944年3月3日死亡。

刘匡，伪实业中学的教员。被捕后，经日寇田村、贾大棒子过堂，敌特将他捆起来，手提一壶开水浇在他的头上，头发全部脱落，几天后，流脓流血，头上的蛆直往下跌，经十几天后，于1944年旧历五月初八死亡。

梁福润，南柴火市小学教员，抗日救国会的骨干，系贾恭的女婿，贾学清的丈夫，为抗日救国会做了不少工作。被捕后受尽敌人的各种酷刑，但他坚贞不屈。一次，敌人将他吊起来，吊得两臂不能动，在严冬季节里，剥光了衣服，推到院里冻着，并以凉水浇在他的身上，冻得他像冰棍一样。又有一次，敌人用锥子在身上扎，扎得他满身是窟窿，血流不止，

继而用棒子乱打。其中有一棒打在他的后脑勺，立即倒地，后脑壳已被打塌，脑浆溢出，当时身亡。

岳浦，汉族，呼市人，当年28岁，住九龙湾大北巷，是贾恭的妻姐夫，抗救会的骨干。曾任山村小学教员，后又转入电机厂工作。于1940年12月7日（阴历十一月初九）被捕。敌特在其家翻箱倒柜，挖地三尺，大肆检查后，并将其妻李香带到日本宪兵队。岳浦夫妻被捕，家里留下七个月的婴儿，因无奶吃而饿死。岳浦于1941年8月底在张家口被日本柑柏部队军法处判处死刑，抽血后，被活埋在张家口万人坑。

黄素芳，毛织厂的女工，被捕时已怀孕七个月，因受刑惨重而小产在日本宪兵队。于1941年8月底被张家口日本柑柏部队军法处判处死刑，被活埋。

绥蒙各界联合抗日救国会前后两次被捕人员中，在“厚和”日本宪兵队、“搜查本部”审讯期间，被日寇的酷刑惨杀者100余人。以上只作了个别介绍。下边再写写被敌人残害的其他几个人的遭遇。

章济人，蒙族，土默特旗厂汗秃力亥村人。当时任伪实业中学的校长，于1943年7月11日夜间被捕。在狱中押了48天后，转到新城“搜查本部”，由日寇方田审讯，在审讯中，身经吊、烧、灌水、棒子打、冻、饿等刑法。在1943年7月1日那天，从早到晚整整受刑一天，最后将他捆在梯子上灌凉水，突然下了含有冰雹的大雨，敌人跑回屋里，章济人仰面朝天在暴风雨雹的袭击中痛苦挣扎，敌人却以此取乐。大雨经两小时之久，雨过天晴，敌特们用杠子将梯子拉在行道旁，才把绳子解开，两个人把他拖到屋子里，跪在三棱棍上两个多小时。方田又从铁柜里取出一支大枪，装上子弹，枪口对准章的脑门说：“今天你的不说，死了吧！死了吧！”用枪毙吓唬他。随后又用八人杠压得他昏死过去，敌人又用几桶凉水从头浇下去，把他泼醒过来，再用木板子把他身上砍得皮开肉绽，血流不止。这时方田态度突然改变，给他找了块新毛巾蘸上水，擦去身上的血，伤口处涂了些“二百二”（红汞药水），找了一套棉衣让他穿上。方田假惺惺地用温和的语气说：“以后说实话吧，不要受这样的罪啦！”遂即送回牢

房。在10月初下雪天又过堂，因无口供，用铁棍乱打，两臂打得肿成碗口粗，剥去衣服拉到院里冻他，又用两桶凉水从头到脚浇下去，冻得他失去了知觉。敌人又端一碗开水浇在他的脊背上，使活肉皮变成死肉皮，直流黄水，第二天脱衣时，衣服和脊背黏连在一起，待脱下衣服后，脊背上扯下一尺多长的一条肉皮。敌人又一次用烧红的铁钩子烫他的双手，手心和手背烫成焦黑色。最后判刑七年。他虽然生命尚存，但受伤惨重，隐患极深，伤疤满身，眼花耳聋，手足麻木，右手不能写字，造成严重残废。解放后由于党的关怀，参加了工作。

陈翟氏，家庭妇女，伪农会书记员陈凌云之妻。陈逃跑后，敌人将她扣捕，以百般刑法施加于她。有一次敌人剥去她的衣服和裹脚布（她是小脚），剥得赤身露体，用皮鞭打到院里，逼她坐在冰滩上，冰肉冻结在一起，敌人生生地把她拉起来，这样翟氏的臀部和脚外侧的肉皮全被扯破，从此便溃烂成疮。稍见好后，将她送到张家口日本柑柏部队军法处，坐监三个月后释放，但因受刑惨重，回家不久即病发身死。

贾学卿，女，汉族，呼市人。当年28岁。是贾恭之女，贾学曾之妹，梁福润之妻。她的丈夫和父亲都被日寇惨杀，她的哥哥被处死刑。她被捕后，遭到敌特的酷刑拷打，但她意志坚定，毫不屈服。她受了灌水的毒刑，死去活来，又受到电刑，鬼子用烧红的铁棍，烫她的乳房和腿部。鬼子还把两团刺儿铁丝扔在地上硬把她拉上去跪在上面，又把一根粗杠子放在她的腿腕子上，两个敌人站在两头，折磨得时她昏死过去，敌人用凉水把她泼醒，又用狗咬和灌辣椒水来折磨她。敌人又把她拉到宪兵队后院，让她跪在地上，鬼子挥舞着明晃晃的战刀说："现在你的死啦！死啦！不过你现在说实话还不迟。"贾学卿说："你们快些杀了我吧！"敌人用刀背在她脖子上砍了两下。日寇的重刑拷问和死亡威胁都没能使贾学卿屈服。她经受了多种多样的酷刑，坐了四个月的监牢后被释放。迄今她伤疤满身，后定居呼市小东街，人称"贾老太太"。

阎继璥，男，汉族，呼市人。当时任伪巴盟师范学校的校长。赴延安学习的学生走后，他负嫌疑最大，因此于1940年7月17日被捕，和我押在一

起。他经受了三个多月的不断刑拷，受尽敌人的百般折磨后，因无口供而释放。1943年7月11日，他第二次被捕。敌人数次提审，受到更加严重的酷刑，灌水、吊、打、压杠子、狗咬、过电、冻、烧、饿等刑法，应有尽有。每次受刑，都是死去活来。有一次，敌人把他的腿打得皮开肉绽，满身是血，白骨外露，腿肿得很粗，生命难保。敌人见他将要死去的时候，才把他拖入医院，剥去骨头上的坏肉，把肉皮缝好，最后，敌人判处他五年徒刑，送张家口察南监狱。1945年8月22日，八路军解放张家口出狱。参加了华北联大学习。呼市解放后，得到党和政府的照顾，在一中任教员。因受伤惨重，隐患发作，而退职休养。

孟桂香，女，南柴火市小学的教员。被捕后，在一次审讯中，汉奸翻译贾大棒子将她的衣服剥光，仅留下一个裤衩，鬼子上去把她的裤衩也撕烂，扔在一边。孟趴在地上，鬼子端来一盆凉水，用手往她臀部泼，以此取乐。又一次，贾大棒子提她过堂，这时她精神失常，两眼红得像火球一样，一言不发，瞪大眼睛步步逼近贾大棒子，张大嘴要咬他。贾大棒子见她那种疯癫模样，有些害怕，便作揖告饶地说："孟桂香奶奶，饶了我吧！"从此以后再不提她过堂了，不久被释放。她被捕前已怀孕，因受刑而在"搜查本部"小产。

小学教员阎葆昌、阎润昌、阎培昌弟兄三人，于1943年7月间遭逮捕。阎培昌被捕后，在新城警察署得了伤寒病，病愈不久，即将他提到"搜查本部"，过堂30多天，每天都受刑，打得鲜血淋淋，伤势严重。鬼子遂又将将他二哥阎葆昌提出，让阎葆昌劝说其弟，遭到阎葆昌的拒绝，鬼子便把阎葆昌吊起来拷打，敌人边打边对阎培昌说："你不说就打他"，阎培昌一言不发，敌特三个人用棒子更加劲地打，直打得阎葆昌昏死过去才作罢。最后他俩各判徒刑二年半。阎润昌因受刑惨重，病死在狱中。

孙宝山，从日寇的虎口中逃出，却被国民党杀害。南柴火市小学校员孙宝山被捕后，受到敌特的严刑拷打，在旧历四月十八日新城东门外奶奶庙会这天，敌人又提审。孙宝山被敌人乱打一阵之后，将他扔在院里不加理睬，孙宝山趁敌特不在意，便撒腿奔跑。由于这里距会场不远，为了逃

命急步如飞，奔入庙会场。敌特发现后，立即追赶，此时孙宝山已混入人群，杳无踪影了。孙宝山从庙会人群中逃跑至东村，发现了敌人，马上返回向西逃走，到了后套。他满以为重见天日，谁想到“国军”一口咬定他是敌探，竟被枪决。

最后说一下民族败类白国华和罗世杰。白国华绰号“白毛”，人们一提到“白毛”，无不切齿痛恨。尽管他曾两次被捕，但是这个坏蛋，是坏话说尽，坏事做绝。他第一次被捕时，任伪巴盟师范学校的训育主任，在敌人面前奴颜婢膝，毫无一点民族气节。最后成为忠实于敌人的走狗。周服礼是抗救会在学校的领导人，很多次斗争是在周服礼领导下进行的。因此，“白毛”为献媚敌人，便以“反蒙抗日”的帽子扣在周的头上，引起很多学生强烈的反对和憎恨。他虽然对“大东亚共荣圈”的侵略政策很卖劲，但始终没有得到鬼子的信任。当学校抗救会组织暴露后，他也遭到逮捕，同样受到严刑拷打。在敌人的严刑下，他供出不少人，断送了很多人的生命。白国华被捕后和阎继璥、王性真、王凯俊、聂德俊等管押在宪兵队五号牢房，由于他的卑鄙出卖行为，不久即被释放。但在1943年6月又被敌人诱在大同予以扣捕。与此同时，巴盟师范学校教员罗世杰也在怀仁被捕，送到大同日本宪兵队。白、罗分别押在牢里。他二人被捕后，因受严刑拷打，各自将伪“厚和”各中、小学校的校长、教职员尽其所知开列了名单，说他们都是救国会的会员。敌人根据白、罗二人开列的名单，于1943年7月13日午夜开始，将市内各中、小学校的教员逮捕了170多人。全市各中、小学校因而陷于停顿状态。他俩献出名单后，敌人继续追问抗救会的组织情况和活动情况，他们回答不出，敌人继续多次用刑毒打，直到打死。

四、虎口余生

现在再说我自己的遭遇。我是1941年2月1日被捕的，1945年8月22日八路军解放张家口，我被释放，历时四年半还多。先后经过“厚和”日本宪兵队、张家口日本柑柏部队军法处、察南监狱三个监牢的苦难生活，经历敌人各种惨酷刑法和三次严重的疾病摧残，真是虎口余生。

在厚和市日本宪兵队

1941年我被捕时，27岁。我是厚和市姑子板人，原籍土默特旗点什气村（在察素齐东五里），当时任“厚和”市朱尔沟小学的教员。被捕以后，关进日本宪兵队的“留置场”五号房间。一进牢里，臭味扑鼻，看见个个人脸色苍白，愁眉苦脸。在十几个人中，只认识阎继璈一个人。我坐牢一个多月后，即患伤寒，口鼻流血不止，十几天没有吃饭，人事不知。鬼子见我奄奄一息，把我从牢里拖到走廊的砖地上，听任死亡。幸亏有杨文炤大夫（现在呼市玉泉区医院工作）天天给我打针、吃药，约30多天后，病情见好，但仍不能吃饭，只想喝水。而鬼子每天只给两次水喝，在我渴得无法时，看见旁边放着鬼子洗手用的肥皂水，我乘鬼子走开的机会，迅速用双手捧起盆来连喝几口。这样一连几天，精神终于好转了，随即又把我圈进牢内，不几天就提我过堂。4月初的一个早晨，金翻译唤我到杉本办公室，杉本问一句，金翻译给翻一句。由于我病刚好，耳聋听不见，只是在一边发怔，杉本发怒，将我推出门外，特务们按倒我，杉本亲手用大杠子打，一直打到我昏死过去，然后用一盆凉水泼醒过来。当时我想活不下去了，拿定主意，只求速死。所以，我说：“你打死我也不知道。”敌人听了更加发怒，又继续打，打得我三死三活。敌人认为打不出口供，只好说：“回去想想，明天再说！”我回到牢里，疼得一夜没有睡

觉。第二天又审讯，杉本把火炉子里烧红的火钩取出，往我的左脸上烫，听得肉皮吱啦吱啦地响，但我主意已定，想咋样就咋样吧。敌人见我不招供，将我捆在梯子上灌凉水，灌了三桶水后，肚子胀了起来，敌人站在我肚子上踩，之后，又把我弄回办公室继续审问，我还是不说。敌人见我死不承认，便把岳浦叫来，和我对面坐下，这时杉本指着岳浦问我说："你认识他吗？"我说："认识。"岳浦说："救国会是我介绍你参加的，承认救国会会员并不是丢人的事！"我才承认是救国会会员。

我被捕入宪兵队，举家痛哭不已。为了搭救我，父亲到处求人说情，经人介绍找到特务范广谦，他住井儿巷二号，送给他许多礼物，其实是黑地送暗财，根本无效。但是父亲并不灰心，不久又找到我的叔伯姐夫齐平治认识的翻译，他对我父亲说："聂德俊正在闹病，借闹病机会可以保出来，不过需要花钱才行。"我父亲为营救儿子，便将赖以为生的两匹骡马变价，交给齐平治。我父亲当时以磨面为生，倾家荡产，汉奸们却借机发财，钱一到手，便无音信了。由于特务勒索，使我家债台高筑，生活无着，我妻因气、吓，得了疯症，父亲日夜愁虑，急得掉了牙齿，母亲卧病不起。一个团聚欢乐的家庭竟陷入了病疯交加、愁苦不堪的境地。

1941年5月22日，日本宪兵队将我押送张家口日本柑柏部队军法处，三个月后，判刑四年，送察南监狱。入狱不久，即患泄肚，转为痢疾，终日不思饮食，骨瘦如柴，步履艰难。在难友们的照顾与关怀下，逐渐好转起来。我于1944年又得了"黄病"，全身变黄，浑身无力，不思饮食。在神志清醒时，想的是争取活下去。看守主任张国卿一再鼓励我："聂德俊别害怕，监狱里得'黄病'的人死不了，我见过好多人得过这种病，都好啦，你放心。"还给我买了"棉茵陈"草药一大包，让我每天泡水喝。喝了半月之久，大见功效，黄色逐渐退去，身子也恢复了健康。

1941年5月21日，鬼子和翻译来到牢里，根据手拿的名册，询问了一部分人的住址，其中也问了我。第二天开完早饭后，鬼子翻译好多人，突然将八个牢门都打开，翻译手拿名册，把昨天询问的51个人（内有妇女9人）都叫了出来，院里堆放着家里送来的夹、单衣服，让个人去寻找并穿

起来，分两行站好。这时宪兵、警察等手持机枪、手枪等武器，在房上地下包围着我们。究竟要干什么，人人捏把冷汗。敌人用手铐把我们两人一铐铐了起来，紧接着三辆大卡车开进院里，让我们一对一对地上了汽车。宪兵、特务手持武器在车的两边押着。汽车驶出门外，门外人山人海等着“看”。当时我心想，人群中一定有我家的人吧！我心情激动着，总想最后看看亲人，看了半天并未看见家里一个人。我想，父亲、母亲、妻子、儿子，你们再也休想见我了。想到这里痛上心来，伤心泪夺眶而出。汽车一直开到火车站，上了军用站台，这时我们才明白，是解送张家口。

1941年5月22日下午4时许，我们步上军用客车。上车后，每人发给两个干焙子，给一点点水喝，舌干口渴，实在难活。我们戴的洋手铐，不动则已，一动就紧一扣，越动越紧，越动越疼。因此，我们都小心不敢摇动，有的人没有注意，结果手腕红肿起来。

火车快到孤山，时间正当半夜，突然山上响起枪声。监护我们的敌人一时惊慌失措，认为这是八路军在劫火车，敌人让我们趴倒在车上，火车顿时停了下来。约20分钟后，火车又继续前进了。第二天早晨火车到达张家口车站。此时张家口莲沼兵团柑柏部队军法处，早已准备好大卡车在站台旁边等候。我们下了火车上汽车，鬼子兵押在汽车的两边。转眼汽车开到莲沼兵团司令部柑柏部队军法处。从此我们又开始了另一种苦难生活。

在日本柑柏部队军法处

我们被带到柑柏部队军法处的一个小院中，到处是紧张而阴森的气氛，听不到一点儿说话的声音。抬头一望，只见院子的上空笼罩着密如蜘蛛网的铁丝网，连插翅的麻雀也休想飞过去。真可谓“天罗地网”啊！这就是日本军国主义的监狱，是柑柏部队军法处的“留置场”。它的面积约1000平方米，东西南北四面的房子毗连在一起，房内有几十间的牢房和四通八达的走廊。走廊的地上铺着长条毛毯，为的是看守巡查时，走起路来没声音。院内设有理发室和洗澡间，靠墙筑有一个长条洋灰水池，供“犯人们”每日洗脸或洗衣服之用。这里经常押着好多中国人和日本兵。

我们来到这里，说话的权利已完全被剥夺了，如果有人说一句，便遭到鬼子的毒打。特别是刚刚来到这里，不知将来究竟如何，人人感到自危。从现象看，只能是凶多吉少了。这时肚子饿得难受，大家不约而同地拿出路上剩下的干焙子吃。由于没有水喝，舌干口渴难咽下，只吃了一小部分。剩下的几十个焙子，正想收起来做干粮，不料鬼子骂道“不许拿”，于是马上全部没收，埋入地下。鬼子取出铐子上的钥匙，一个一个地开了锁，把几个妇女带到另一个地方，然后让我们把身上的衣服全脱光，折叠好，用裤带捆上，写了名字放在一边。鬼子把我们带到洗澡间，三人一班，依次洗澡。看来这是好事，但池中水太热，连手脚都伸不进去，大家都不肯下水。可是鬼子手持板子，逼着我们往里爬，进得慢了就挨打。

洗完澡，就理发。院子里早已放下好多桌子，让理完发的人赤着身子在桌子上仰面朝天在桌子上，原来是要给我们剃阴毛。所有的人都被剃光了，然后每人发给一身白衬衣，一套黄色卡叽布的日本军服，毛毯一块，枕头一个。我们穿好衣服，抱上毯子、枕头，回到牢房里。看来，这里的生活条件比“厚和”日本宪兵队要好些，有铺、有盖、有衣穿，每个人身上都是干干净净，室内卫生也很讲究。条件虽好，但也是在坐牢受罪，尤其“坐”的罪和“饿”的罪更是难熬。

这里的监房炕、地不分，铁窗户、木栅门，每间房七个人。我们吃罢饭，彼此正在交谈之际，突然鬼子带着翻译走进来，把我们集合在一起，讲解在牢里应遵守的规则，怎么样吃饭，如何睡觉，如何铺床叠被，如何受检查，如何坐，等等。讲完后鬼子让各自回房演习。睡觉时，不准齐头并摆，主要是防止说话。让我们一行四人，另一行三人，睡成梯形，即第二个人的头，靠第一个人的屁股，以此类推。晚9点就寝的时间到了，但还不能随便睡下，睡觉也有一定的规矩：值班的看守用中国话喊：“休息的预备。”我们一听到这声号令，立刻按照办法，把毛毯打开，叠成一个睡筒，放在规定的位置上，先脱去外衣，站在枕头前，等候第二声口令。鬼子隔一会儿又喊：“休息。”这才允许钻进被筒里，睡的姿势也有规定，

必须面朝天，不准蒙头，更不准说话。在那静静的夜晚，屋里寂静无声，电灯照得通明，谁也睡不着。这里离火车站很近，火车开动和汽笛的声音，打破了深夜的沉静，这种声音冲击着我们每个人的心。就在此刻开始了“甜蜜”的幻想：什么时候能坐上火车回到那可爱的故乡，和父母妻子欢聚一堂，重享那天伦之乐！又想：没有祖国就没有家了。只有抗日战争胜利了，才能实现我们的理想。但转念一想，全案被捕者400多人，300多人死的死、放的放了。敌人认定我们51人是“罪大恶极”、坚决抗日的分子，是不会轻饶我们的，看来释放回家是在做梦，很可能判处死刑。越想越睡不着，越睡不着越想，如此想了一夜，鬼子在来回地走。

第二天早6点，鬼子大声叫喊：“起嗷！”我们马上起床，穿好衣服，按规定叠好毛毯，按照一定的间隔距离靠墙放整齐。接着就倒便桶，倒罢便桶，看守按牢房次序，一个房一个房地把人放出来。我们出来后穿上鞋，自动站成一列队形，听候鬼子指挥。鬼子用日语喊：“立正！向右转，齐步走！”我们根据鬼子的指挥动作，稍有迟慢就要挨打。走到院里洋灰池旁边，鬼子又喊：“向右转、洗面。”我们就手捧凉水洗上二三分钟，鬼子又喊“哟西！”（好啦）即行停止，紧接着喊：“向右转！齐步走！”我们走进走廊，鬼子又喊：“立定！向左转！（正好对准挂毛巾的地方）擦面！”我们取下毛巾，擦完脸，把毛巾放回原处，然后鬼子又喊：“东方遥拜。”让我们举起双手，像念弥陀佛式的姿态祝祷“大日本天皇万岁”。但我们心里祝祷着：“祖国万岁！”“抗日战争胜利！”作罢“东方遥拜”后，听口令回牢房。就在这洗脸的时间里，鬼子兵在牢房里把铺盖全抖开，进行检查毕，又站在牢门口，等候检查身体。先将衣服脱去，把衣服放在地上。这时已成光腚，然后一个一个地检查；一个兵检查衣服有无东西；一个兵检查身体。我们举起双手，腿弯曲，成骑马式，手心向前向后转两次，张大嘴，向左右转两次，并要嘴里喊出：“啊！啊！”的声音，看你手里、嘴里、耳朵里有无东西；然后来一个向后转，又让蹲成骑马式，检查屁股缝里是否夹上东西；然后又让向后抬两足，检查足趾足心有无东西。至此，才算完成一个人的检查程序。这时鬼子喊：

“哟西！”我们抱上衣服，光着身子往牢里走。有的鬼子拿你开心，就在这走进牢房的时候，在屁股上猛踢一脚。每日早晨都要检查一遍。我们回到牢房，先穿好衣服，再叠好被检查过的毛毯，然后面对自已的铺盖，盘膝打坐，两手放在两腿上，两眼向前看，不准左顾右盼。七个人端端正正地坐着，活像庙里泥菩萨。腰板挺直，四肢不准乱动，坐得腰疼腿酸。如此天天坐，真叫人痛苦难忍。这样的“坐功”，整整91天。

我们静坐在牢里，消逝着苦难的岁月。在那寂静的牢房里，突然听见炊事员送来碗筷的声音，时间正是8点。炊事员端来菜和汤，大米饭一小碗，一份一份递进牢里。所有牢房饭菜都齐备后，鬼子发出第一声口令“哟西”。我们听到这个口令后，都跪起来，眼看着饭不敢动，当鬼子发出第二声口令“嘣”（吃的意思），这才能拿起筷子吃。如果有人不听口令先吃一口，鬼子看见马上就无情地扑打一顿。吃完饭后，自行坐下。炊事员来收拾碗筷时，有一个人站起来，如数递出。我们天天在“坐”，这才是名副其实的“坐牢”。除大小便的一点自由外，绝不允许移动一下，有的难友本来不大小便，可是为了活动活动，只好起来蹲在便桶上。我因坐得实在腰痛得没有办法了，双手向后托在地板上歇了歇腰，被鬼子看见了，拿根长竹竿，狠命地打了我一顿。中午12点又开饭，动作程序不改样，吃罢饭又坐下。每日午后四点钟有一次“放风”时间，鬼子按时把大家放出，到院子里转圈走动，先慢慢走，后快快走，然后跑步。有的难友因刑伤未愈，不能跑步，鬼子用棍子硬打着跑。这样活动20分钟后，回到牢里再坐下，直到6点才开饭。9点钟入睡，一切动作如前。如此一成不变地机械生活，度过91天。

来到军法处后，鬼子都给我们编了号，我被编为“95”号。每天早晨交接班时，呼号点名两次。在点名时大家都站起来，鬼子手持名册，一个房一个房地点名。如喊95号，我即答：“哈伊！”（有、在、到的意思），天天如此。

有一个难友徐凯，因受刑惨重，来到这里不几天即死去了。死了后，给装在一个塔形的棺材里，鬼子很迷信，给焚香点烛、烧纸、念经，第二

天埋葬了。

日子久了，鬼子和女监的妇女搞得很熟，她们比我们“自由”得多。她们饭量小，能吃饱。不挨饿也不挨打，我们既挨饿又挨打。到了深夜，鬼子把青年妇女叫到看守屋里去玩弄。如王××、魏××、黄××等就是这样。

这里的生活真是度日如年。记得当快要宣判时，一天夜里，王惠敏（女犯）等穿上看守的衣服，化装成鬼子，从女牢一号到八号牢房。经过我们五号牢房，给他父亲送信说：“最近就要判决！”大家听了都说：“要死要活有盼啦。”隔了几天，果然提审了。天天在叫人复审。在复审中，不动刑了。经过半个月时间，于1941年8月22日吃罢早饭，便将我等28人叫出。这时大家都互相看有谁没谁，并在猜疑，被叫的好呢？不被叫的好呢？究竟是要判刑呢？还是要处死呢？不一会，鬼子将我们28人押解到法庭，让我们整整齐齐站在法庭下面，台上坐下十几名日本军官，其中一个是少将，其余都是校、尉级军官。五六个翻译在台下两侧，好多鬼子兵手持武器，包围着我们。当法庭宣布开庭时，首先由一个翻译宣布“开庭”，接着一个日本军官手拿判决书，宣读我们的“罪状”。大意是：中日是同文同种，大东亚共存共荣兄弟之邦，我大日本皇军，奉天皇之命，协助蒙古民族，打倒旧政权，建立了新政权。蒙疆政府和蒙古民族，在日本皇军协助下，除暴安民，建立王道乐土，使民众得到安居乐业。因此，大日本皇军，受到各族民众的拥护。唯有共产党盘踞大青山一带，造谣生事，蛊惑群众，企图打走大日本皇军，建立中国人民的中国，推翻新政权，恢复旧政权，组织抗日救国会，在“厚和”展开“反蒙抗日”的破坏活动。经侦察破案，将不肖之徒全部扣捕。经审讯，潘启祥等28名罪犯，证据确凿，供认不讳。反蒙抗日，罪大恶极，本应处以死刑，唯我皇恩浩大，姑念尔等一时思想糊涂，受了共产党的欺骗，误入歧途。为了挽救你们，给予改过自新的机会，特分别处分有期徒刑如下：潘启祥十年，任全八年，刘明贞、魏友梅五年，聂德俊、胡三娃、郭友诚、蔡青山四年，魏孟氏、李玉山、陈跃光、白素春、陈士英、赵振仑、高太馀、范玉栋八名

三年，陈涌智、王永胜、卜辰、梁玉英、王正廷、徐恩元、张锡仁、张荫廷、于清泉、莽兆元、岳准、杨泽等十二名二年。宣判完毕，将我等28人带到院里，即用两辆大卡车送入察南监狱。从此结束了军法处的苦难生活，步入另一个人间地狱。

我们28人被判决，送入察南监狱，其余22人分别走了不同道路：陈翟氏、王忠诚被释放。魏民、王惠敏、武静汉、鲍麟芝四名叛徒，被释放后，供日寇驱使。

魏民（刘伟），山西代县人，被捕后，叛变了革命，出卖了组织和同志，给敌人写了无数材料，将他所知道的秘密，全部透露给敌人。因此，他得到鬼子的“优待”，每天给他吃饭馆送来的饭，住在很讲究的宿舍，冬天宪兵队给他做了一套黄色新棉服。在宪兵队大院里，随便出入，俨然是个了不起的人物。送张家口日本柑柏部队军法处后，被释放了。敌人使他和王惠敏结了婚，成了叛徒夫妻。王惠敏以释放其父王忠诚为结婚条件。王忠诚之所以能被释放，就是这个原因。武静汉也是为敌效劳的“有功之臣”。换得伪张家口毛织厂厂长的职位。其妻鲍麟芝亦享同样“厚禄”。

现在让我把坚决抗日的英雄张克敏、革命老人杨森、贾学曾、岳浦、王高、宫傅荫、王性真、王永茂、王永禄、李克敏、杨连桂、吴杰忱、黄素芳等16名的下落介绍如下：除判刑送入察南监狱和被敌人收买释放的以外，牢里只剩下他们16个人。他们根本不了解我们28人、4个叛徒和被释放的2个人的下落。对他们如何发落更是难以捉摸。到8月底，鬼子把他们放出来，假借验血为名，每个人都抽了五六百毫升的血。本来他们已经虚弱不堪，再抽那么多的血，怎么能受得了呢！他们被抽血后，身体更加软弱无力，有的竟孱弱得迈不开步。在回牢房途中，摇摇晃晃走不动，只好爬进监牢里。敌人为什么这样做呢？原来是处决他们，并就便补充血库。第二天早晨，鬼子兵把他们16个人抬出来扔在汽车上，拉到张家口南十余里的地方，在万人坑里活埋了。又一说是被刺刀挑死后埋了。

他们虽然被鬼子惨杀，但是他们的精神是与世长存、永垂不朽的！

关于抗日救国会，被敌特破坏搜捕所涉及的地区，不仅归绥一带，京

包线沿线各大小城市均被涉及。如包头、萨县、集宁、丰镇、陶林等处，其中以陶林、大同为最。当归绥进行大搜捕之后的七个月，即1941年12月4日，曾在大同扣捕了200多人。据说，与归绥被捕人员中的曹文英有密切关系。后来判刑者送察南监狱的有任杰等20余人。

在察南监狱

察南监狱在张家口的西山坡下、河槽两岸。院中心筑有一个六角楼，通往六个号筒，一百几十个监房。另外还有女监、少年监、新监。这所监狱规模很大，单是驱使囚犯做苦役的工厂即有九个。监狱外还有一个砖瓦厂。院内有礼堂、炊场，还有一个杀人的绞刑场。监房设置完全一样：铁窗户、木板床，便桶放在地上，臭气熏人。囚犯来来往往，经常圈2000多人。环境卫生极为恶劣，加之心情不爽，饭食不佳，患病者甚多，跑肚拉稀极为普遍。疾病流行，春秋尤甚。只要染病在床，患者九死一生。

我们28人坐汽车来到察南监狱，下汽车后，押到六角楼下，看守长手拿名册，点名验收。接着杂役（快要期满出监做零活的犯人）们，抱来很多灰色的单衣服和又脏又破的棉被褥，每人发给一套。让我们抱上这些东西走进监房。狱卒大声说：监狱规定，所有衣服、被褥一律用公家的，个人的东西一律交回保管。随之我们脱去自己的衣服，穿上囚徒的服装。因衣都是灰色，上身俨若道袍，穿起来好像个和尚。爱说笑的难友说："我们是出家人，可别想家呀！"杂役们给送来碗筷，一笸箩小米干饭，青萝卜菜汤，每人一碗。我们是新客，对监狱的一切规矩全不懂，事事都要从头学起。杂役们和我们是一个立场，有事好商量。当他们送米饭菜的时候，我们便问："这是打份吃呢？还是管饱呢？"他们说："想吃多少吃多少，不打份。"这对挨饿已久的人们来说，是多高兴啊！大家边吃边说："只要能让吃饱饭，苦难的日子就好熬啦，人们常说，吃饱饭不想家。"因此，头一天第一顿饭，每人都吃了三大碗，这是我们被捕以来吃

到的第一顿饱饭。吃罢饭，看守把门给打开，让我们到六角楼下，排成一列队形。面前只见铁镣放了一大堆。看守一个一个问："你判了几年？"我说："四年！"杂役给递了一副不轻不重的铁镣，让我坐在铁砧子旁边，杂役将镣环套在脚腕子上，穿上铆钉，"叮叮当，叮叮当"地砸起来。无情的铁锤，砸得我心抖肉颤，泪如泉涌。从这时起，这副铁镣整整和我伴随了四年。

每个人所戴的铁镣有轻有重，轻者二三斤，重者四五斤、六七斤。轻重按刑期长短决定。我们被钉完铁镣后，站起来都迈不开步，走起路来卡得肉生疼，不得已只好弯着腰，手提镣环慢步往回走。走进监房，上了木床，这时一个个垂头丧气，一语不发了，隔了一会儿，我首先打开沉闷的气氛说："唉！我们还不如牛马自由呢！"接着又有人说："这就是亡国奴的滋味！"也有人说："活着就算便宜，好好锻炼身体，等待未来的光明吧！"长期被封闭起来的嘴，得到说话的自由，你一言我一语，谈了起来。谈到受刑经过，案情内容，某人坚贞不屈，某人投敌，一时仿佛在开讨论会。

敌人给我们扣的"罪名"为政治军事犯。凡是政治军事犯，监狱规定三个月内不准下工厂做工。这样我们只好蹲在监房里谈天说地。我和判十年徒刑的潘启祥、八年的任全、四年的郭久诚等住在一个监房里，彼此受刑多，经历多，本案情况了解得也多。

现在让我再谈谈监狱的清规戒律吧。在监房里贴着十要十不要的"犯人须知"，违者按情节轻重给予如下处分：打饭、独居、蹲暗室、戴手铐、上好汉床等。这里的看守有两种人：一种是具有正义感和民族感的，把我们坐监看作是光荣的，是爱国志士。因此，对我们处处照顾。如看守主任张国卿，低声和我们说："你们都是英雄好汉，虽然坐了监也是光荣的，请你们好好注意身体。"我们有时做些违犯监规的事，遇上他也是视而不管，闻而不问，如有困难，背着鬼子给解决。类似这样的人为数不少。另一种是甘心效忠于敌人，毫无民族气节的败类，把我们看成危险的人物。冷酷无情，吹毛求疵，到处寻找毛病，神气十足，经常打人骂人。

监狱里最怕的是犯人炸狱、越狱、烧狱。因此防范极严，每日早晚看守交接班时，首先要呼号点名，我的编号是“476号”。点罢名还要检查一次铁镣、身体和室内外。日日如此检查，主要是为了防止逃跑、自杀、行凶、纵火、暴动等事件发生。

监狱生活，每天早晨6点打铃起床，起床后打扫炕、地，倒便桶，接着就洗脸。洗脸时走廊下放着一个大木盆，倒水后，把门打开，一个牢房一个牢房地洗。一盆水供六七十个人洗。洗罢脸无事可做，我们就做起柔软体操，锻炼身体。每日在上午9点、下午5点开两次饭，7点就寝。

杂役们对我们很好。他们见我们戴上了镣，走不了路，就把出监者留下的“镣磨”送给我们戴，戴上这种工具，行走就方便了。我们戴上镣后，裤子脱不下去，他们亲手教给我们脱的方法。诸如喝水、吃饭等处处关心我们。

监狱生活每况愈下。每天只能吃两顿高粱面、黑豆面的窝头。由此而引起了严重的肠胃病，跑肚拉稀，病人日增，死亡率达到40%多。全监囚禁着1700多人，每年死亡者，即达七八百人。我们28人即死去了15人。即刘明贞、魏友梅（被判五年）、郭久诚、蔡青山、胡山娃（被判四年）、魏孟氏、陈耀光、白素春、李玉山（被判刑三年）、王正廷、梁玉英、张锡仁、于清泉、莽兆元、徐恩元（被判刑二年）。

春冬季节死人最多，每日平均十几个人。正如难友们所说“只要一跑，生命难保”（跑即跑肚拉稀）。囚徒死后，抬埋队把死者由后门抬到西山坡，把所穿的衣服剥光，扔到浅沟里，埋上几锹土就算了事，随之成群的野狗将死者拉出吞食。因此，西山坡白骨堆积成山。每当夏季，臭气冲天，路过行人均掩鼻而过。

度日如年的三个月终于蹲够了。我们开始参加了工厂的劳动。劳动项目是：织毯子、纳鞋底、糊火柴盒、织袜子、织布、织毛巾、裁缝、纺线等等；还有砖瓦厂、炊场的劳动。我们开始劳动是糊火柴盒。这个工厂的主管看守是白世雄（回族），外号叫白阎王，为人心狠手辣。第一天上工，他给我们训话：“你们都是有知识的人，也是反蒙抗日的军事犯。不

管你过去是龙是虎，现在却是犯人，来到这里，是龙的低头，是虎的卧下。现官不如现管，监狱的规矩你们全知道，如敢违犯，定打不饶。”这个丧心病狂的败类，一时确乎威风凛凛，杀气腾腾，简直不可一世。自然难友们表面上对他畏惧，实际上对他恨之入骨。他给我们规定每天必须糊700个火柴盒。否则，就定打不饶。

难友郭久诚因病未完成定额，白世雄立即责问：“为什么没有糊够700个？”郭答：“我有病了！”白又说：“病了也得完成任务！”郭久诚气愤地说：“官家还不使唤病人呢。”白阎王一听，登时大怒，手持三尺大板，立着板棱使劲地乱打一顿，打得他不能行动，收工回牢不能走，我把他搀回牢里。郭久祥是厚和市大召当家喇嘛，徒弟有好几十人，日常受人尊敬，今天遭到毒打，本来有病，这就气上加气，病上加病，从此卧病不起，日渐加重，不几天就死去。本来他在宪兵队受刑够惨了，但未丧命于日本人之手，而今却被民族败类白世雄打死。

另一个看守主任吴敬芝，对待被监禁的难友略好于白世雄，但也是个坏蛋。我由糊火柴盒工厂转入织布工厂后，他让我给他偷布和毛巾，我虽表面答应，但实际并未给他偷，因此对我怀恨在心。他到这个工厂临时值班，故意寻找我的毛病。监狱规定：军事犯根本不许可送吃的东西，但天天是高粱面窝头、黑豆面窝头，吃得人们肠干烧心。到了冬天，人们总想吃些抵抗寒冷的辣椒面。辣椒面成了难友们最爱吃的调味品。这种东西不仅可以御寒，并且还可以增加食量。这时，我成了工厂里的杂役，搞这样的东西很有条件，于是我找工厂的陶工程师帮助我买。陶工程师给买来一大包，我把它分成小包，给难友们每人一小包，吃饭时，吴敬芝来到工厂，看见难友们菜汤里有红色的辣椒面。他马上追查辣椒面的来源，追来追去自然就追到我的头上。吴敬芝面目狰狞地对我说：“今天我要处分你！”我气愤地说：“好吧！你别生气，这点小事，难道再判我四年徒刑不成吗？”吴某叫出好多看守，喝了一声：“给我把衣服脱下来！”好几个看守剥去我的裤子，按倒在地，吴敬芝手持打狼用的白蜡杆狠命毒打，打断一根又一根，打得我皮青肉肿不能移动才住手。打完后，把我放在六

监单独监禁起来，并向日本鬼子报告了我偷买辣椒面的情况。这件事，被张国卿知道了，他亲自到六监安慰我，并向鬼子说了些好话，这才把我放了出来，恢复我回工厂的劳动。

时隔三个月，吴敬芝患伤寒死了。这真是未经人诛，天也不容！难友们无不拍手称快。

张家口的冬天，朔风凛烈，寒气袭人。一般人家中早就生炉取暖了，但我们住的是终年不见火焰的冷冰房，穿着不堪御寒的破棉衣，铺的盖的仅一层，规定军事犯不准用私人被褥，故意让我们受冷冻，再加上我们戴着铁镣，棉裤裆里留着一条缝，寒风吹得两腿疼。白天在工厂里劳动，晚间回监房睡觉，脱去破烂的棉衣，咬紧牙关，钻进冰凉的破被里，浑身冻得直发抖，卷起两腿，铁镣冰得两腿疼。第二天打铃起床，卷起铺盖，褥子下面和床板上面，印着湿晶晶的一个人影（这是体温和床板下寒气接触后潮湿的）。看看玻璃窗和铁棍都积有又厚又白的一层霜，监房简直像冰窖一样。为此，我们编了一副对联：

两顿高粱面不饱，
一夜冷冰房足冻。

冬天如此，夏天总该好一些吧？其实不然，冬天受冷冻，夏天更难熬。每届夏令，你一进牢房就可以看见墙上血迹斑斑，白墙简直变成了花墙，这是囚徒们抹杀臭虫的血痕。监狱的臭虫个大，有尾巴，人们真是望而生畏。监狱的臭虫、跳蚤很繁盛，每到夜晚便成群结队出动，咬得我们满身起疙瘩，痛痒难忍。由于臭虫骚扰休想夜间安眠，多数人被臭虫咬得生了疥疮。加上便桶放在房里，室内臭味难闻，苍蝇成群飞舞。白天整日劳动，总是打盹瞌睡，萎靡不振。

监狱里环境卫生恶劣，传染病非常流行，严重地威胁着人们的生命。人们都想尽办法同死亡作斗争。在那恶劣的处境中，除了寻找食物、药品补充营养外，只有加强锻炼身体。为此，我们每天早晨起床后，在那狭窄

的牢房里，伸臂、揉腰、弯腿，展开柔软体操运动，直到满身大汗为止。这是保持身体健康唯一的方法。因此，我们一直在坚持着。其次，我们想尽一切办法，公开地和秘密地搞些滋补和预防疾病的药品，如鱼肝油球、阿司匹林、止泻剂、苏打片、胃舒平等。除此之外，还秘密搞些有营养价值的食物，办法是通过看守往家里写信要钱和吃的东西。家里寄来后，由看守转交，当然这样做，要给看守一定的报酬。另外，就是采取换的办法，和看守做交易。有时拿自己的衣物换；有时偷上敌人工厂里的产品换。用自己的东西换是有限的，偷敌人的产品换是大量的、经常的。再次是我们在糊火柴盒时，偷喝面粉浆糊，在织布、织毛巾工厂偷浆线用的白面在工厂烙成烙饼吃。

生活在敌人的监牢里的难友们，是同生死共患难的朋友，有着深厚的感情，互相关心照顾，犹如手足兄弟。一人的药品大家用，换来的食物共同吃，没有独自享受的。一人有病，大家想尽办法给治疗，给搞些好东西吃。喝水、吃饭彼此相互照顾，无微不至。

既然是“犯人”，自然一切自由全被剥夺了。我们从被捕起，一直无法见到家人。只凭通信联系，但通信又有规定，每月只准写一次，先写申请，待批准后，发给你一个带信皮的通格信纸，并由看守送来笔和墨，写好后，送给监狱看守长和鬼子检查合格后，才能发送邮局。自然信的内容只能是上天言好事了，否则，即被扣留。

我们入监不久，即1941年12月7日，日本偷袭珍珠港、新加坡，对英、美宣战。为此，监狱集合犯人在礼堂召开所谓“庆祝会”，会上由刘逆麟凤典狱长朗读“大日本天皇陛下诏书”，刘读毕静默三分钟。这是让我们默祷所谓“大东亚战争胜利”“天皇万岁”。从此每月8日举行一次。日寇每得到暂时的胜利，就颁“大赦令”。我们原以为可以得到减刑，提前出狱，不料敌人对军事犯明文规定：“罪大恶极，不予赦免。”而我们大家一致说：“不接受敌人的恩赐，鬼子是兔子的尾巴——长不了。我们要自求解放！”

1945年美、英转守为攻，日本节节败退，塞班岛被围，日本军队七万

全部被歼，塞班岛也被美军攻占。敌人又在监狱里召开追悼会，而我们却由衷高兴。

监狱里虽然被封锁极严，但国际战争的消息总还是听到些的。第二次世界大战越来越紧张了，轴心国日渐衰败。为了更深刻地了解世界形势，我们通过搞到的报纸，并把战争形势略图抄画下来，前后对照，相互分析。

我们在强迫劳动中，对工具、原料故意进行破坏。如我在九工厂时，曾故意将三四个大线轴的线头搞乱，使其不能使用，有时把织布机弄坏。工厂的工具、原料遭到大量的糟蹋。

1945年8月22日，是我们终身难忘的日子。从这一天起，我们结束了亡国奴和囚徒的生涯。

这一天的早晨，炮声隆隆，枪声时断时续，难友们高兴得又蹦又跳。正在这兴高采烈的谈笑中，突然来了几位全副武装的八路军，随即将监狱中的“政治犯”“军事犯”全部释放出来。我们50多人，由八路军的几个同志陪同，到了张家口警察局（已由公安局接管）。首先由苏奕然局长向我们表示亲切的慰问，并当即交给我们两项任务：第一，协助八路军搜集敌人遗弃的枪支；第二，好好地学习、休养。话虽不多，但说得我们内心暖乎乎的。当时到公安局的难友是：抗救会第一次被捕人员：潘启祥、任全、聂德俊三人。抗救会第二次被捕人员有：阎继璥等五人，大同市抗救会被捕人员任杰等20余人。此外尚有涞源县被俘的八路军马田利等20多人。

我们50多人在公安局的领导帮助下，成立了难友队，聂德俊被选为队长，任杰为副队长。我们到了公安局后，打开了库房，每个人挑选了一套新军装，每天坐上汽车，到原日本驻军兵营里搜集枪支并担任守卫工作。我们本当服从领导安排好好休息，但是我们这一伙出笼之鸟，身心初获解放，在极度欢乐之下，要想安眠怎么可能呢？大家共庆抗日战争的胜利，酒肴俱全，待遇优厚，大家欢聚一堂，吃酒猜拳，欢乐、兴奋的情绪，确乎是秃笔难书。一连几日，通宵达旦，都是如此。

搜罗枪支工作完毕，就开始了学习、休养。每日吃营养丰富的饭菜，同志们兴致勃勃，无不感谢毛主席和共产党。经过两月之久的学习、休

养，根据每个人的意愿和文化程度，分别分配了工作和保送华北联大学习。个别人愿意回家的，组织上发给路费、自行返家。

我和阎继璈等及大同市的马绩等20余人，进入华北联大学习。察南监狱在西山坡，华北联大在东山坡，当我们到了华北联大学习，有人诗意颇浓地说：

啊！共产党，毛主席，
你是我们的救命星！
脱离阴森苦难的西山坡，
踏上了民主、自由的东山岭，
幸福、愉快、新生。

五、结束语

伪蒙疆时期这一大血案，从1940年7月起，前后被捕人员五六百人，现在仅就我个人记忆和调查了解到的有237人（姓名如附表），其中109人惨遭敌人杀害（其中被打死者49人，死在监狱的44人，处死刑的16人）。在237人中，教员101人。从以上数字看出，敌特对教育界的摧残最大。其次是电面厂、毛织厂、铁路等。

被捕人员中有蒙、回、汉、满各族人，其中有工人、教师、农民、商人、医药卫生、宗教、妇女，各族各界都有。从年龄看，有老年、青年、少年、儿童，还有婴儿。其中有不少人，全家被捕，举家惨遭杀害，造成灭门绝户。有四个妇女在怀孕期受刑，小产在监狱里，所生小孩三个死亡。怀孕的妇女是：云华、霍爱珍、孟桂香、袁继璞4人。云华于1943年9月18日在新城“留置场”分娩，给孩子起名为“念生”，今年21岁，现在呼市毛织厂当工人。他就是出生在监狱里唯一活着的人。

那些甘心认贼做父，坚决与人民为敌的汉奸、蒙奸、走狗、特务等一

小撮出卖民族利益的败类，他们在日本帝国主义、国民党反动派彻底垮台后，到处逃躲、隐匿，企图逃避人民的惩罚。但是绝不允许双手沾满人民鲜血的刽子手们逍遥法外。所有的刽子手，先后均被逮捕，受到应得的惩罚。如：特务周俊刚，日寇投降后，由贾学清联合了20多名寡妇（丈夫都被杀）向国民党法院控诉，在人民群众的压力之下，判处周犯死刑。

白玉、孔广和、刘永祥等犯，在解放后，逃匿各地，在我公安部门严密侦察下，分别在兰州、东北鹤岗市等地一一扣捕，于1958年4月25日在呼市执行枪决。

特务张桂芝被判刑20年，赵鹏被判刑15年，戴俊、马荣各判刑10年。韩长胜于1958年在保定扣捕法办，王秉政在太原扣捕法办。

察南监狱的汉奸、走狗，如：刘麟凤，于张家口解放后畏罪自杀，白世雄、那焕璋已被扣捕法办。

还有几个叛徒，如：魏民判处死刑，缓期执行；王惠敏判处徒刑5年，武静汉判处徒刑15年，燕缦云判处徒刑3年。

（1965年）

敌伪蒙疆政府时期亲历记

孟锦章*

"蒙疆政府"用鸦片毒害人民

"蒙疆政府"（张家口）在1937年以前，为旧中国察哈尔省政府，委有主席统治一切事务。自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了东北，还不满足，又有"七七"卢沟桥事变。在这次战斗中，华北将领赵登禹、佟麟阁两位爱国英雄为国牺牲。故在北京西城区有赵登禹路、佟麟阁路，为永久纪念，这两位将军历史垂名，千古不朽。

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了华北，而国民党反动派蒋介石集团，不但放弃守土之责，仍调遣东北军"围剿"红军。他以卖国求安，不抵抗主义，签订了梅津协定。华北不准驻守军队，只许成立治安军和保安队维持地方。

在这个时候，蒙古德王和日本帝国主义勾结，在张家口成立蒙疆傀儡政府。政治、军事、经济各方面，均在日本帝国主义操纵之下。

他们为了侵吞经济、毒害中华民族，命"蒙疆政府"制定种植鸦片条例。"蒙疆"地区平原肥沃土地的40%以上，迫令农民种植害人的鸦片烟。因此不顾民生而想发横财者，云集"蒙疆"，和伪政府签订收购手续，自

* 作者曾任兴蒙面粉厂经理。

出资本，甘愿上缴政府30%，其余仍归政府统一收购。这样，人民就倍受摧残。

在张家口堡子里成立“土药组合”，公推贺秉温为董事长，其他收买人为董事，内设若干科，所用办事人员，非亲即友，不用外人。由张家口至绥远烟区一带，共成立15个“土药公司”。每个公司经营两个县份，由“土药组合”各董事分担各“土药公司”经理、副理、协理、监理等重要职务。下设总监定一人，会计、出纳、庶务各股，办事员、晒烟夫若干人。

每年自七月份起，由各“土药公司”在他们经营之县，选适地点设立收买处若干个，派主任、保管、会计各一人，办事员及晒烟夫若干人。收买处成立后，即函请该烟区的县政府酌派干警四名，以便保卫和弹压卖烟者“捣乱”。

烟户在炎热之天，手提烟罐，经过十里、八里之路，到了收买处累得满脸通红，浑身是汗，心想公平交易，卖钱回家，哪想该收买处昧了良心，不是公平合理的。假如烟户携去有100两水分之货，确实能以晒出80两干来，经监定顺口一喊40水，就等于净60两干了。内中剥削的20两，除与公司留半数外，其余就归他们按大小份分肥，烟户敢怒而不敢言，怨声载道，无人敢诉。

收买处收烟，仅有三个多月的时间。他们所剥削之数，实在惊人。

每个“土药公司”，差不多都设有十几个收买处，每个收买处都能给公司剩余一二万两干货，统计起来足够二三十万两之多。除提出2/10上缴“组合”外，剩余之数，则偿总监定、会计、出纳、庶务等各一万元红利，再偿办事员、晒烟夫等各500元。净余之数，则该公司经理、副理、协理、监理等几人平均分肥，计每人都能分得一等货四万多两干。

他们把收买之烟，经烟夫晒干，用油纸包装起来，100两一包，除应缴“政府”及统一收购办理完毕外，私自剩余之数多半用保险方法，运到平津两市出售，每人都能卖几十万元。因此他们都在北平置了房产，并把自己住宅修饰得非常华丽，大多数都要一个和两个小老婆，每日花天酒地，捧坤角、说大鼓书的姑娘、娼妓等，每场非千即万。均好巨赌，一动就有

过几万元的码子。

他们还在张家口桥东大街开一个中央饭店（现在解放饭店），新建三层楼房一所，计房一百二十余间。公推荐礼县土药公司协理阎景尧为董事长。由土药组合派李百川为经理，下设会计、出纳、庶务各一人。茶房（服务员）若干人，都是他们的亲友，未有外人。称名是个饭店，实际等于保险公司，无有一位是善良客人，除贩卖毒品，就是活动贪污差事的。因柜上与当地公安机关、日本宪兵队、领事馆等，皆有行贿情事，每次查店到房间时很少，然后即到经理室内，招待香烟、茶水、瓜子、糖等，还不断零花钱，因此每天差不多都客满。

该饭店内，设有中西餐，每楼都备有大烟枪十几支，茶房每班都准备若干个大烟泡，以供客人之用，大有利润。总有人不分昼夜打麻雀。

贩毒品客人，经常买土药组合的鸦片。

“伪蒙疆政府”还成立了清查署，专为缉私鸦片，如查获私藏和偷运者，除没收其原货外，还一倍罚十倍，不交者送法院。

每到烟秋时，清查署即派人到烟区各县协助收买处催烟户卖烟。如查有私藏的，有照章处罚的，也有互相贿赂的。一般烟户都好吸鸦片，因此自己均愿多少留一点，私藏起来。一看见清查署人到家时，未待问他，而自己就心惊胆跳，再加上对他们蛮横的威胁，话不投机，举手就打。有很多烟户将私藏的拿出来，则他们有入腰包，有稍数处罚而受贿的，积少成多，他们每人都发了横财。

由张家口开往北平各次车，自宣化开始检查客人，从客人身上由上至下摸了一遍，然后再检查行李和包袱。还有女检查员，看着女客人形迹可疑，就叫到厕所内检查。凡是检查出来的鸦片，并不完全上缴，自己都留一部分。还有由北平去张家口、大同等地的穷苦人，回来带些粮食、土豆、鸡子等，他们也百般地刁难，多少给点好处，才能无事，不然就要被没收。

伪“蒙疆政府”控制了鸦片的买卖，拟订收售鸦片价格，规定收买时除去水分，照干货计算。一等烟每两八元，二等烟每两七元，三等烟每两

六元，次等烟每两四元五角。但照一等货出价的很少，二三等的最多，而他们出售时，则又提高上去，这又是剥削烟户的一个手法。伪政府在张家口出售时，每两都超过买价一倍。

“蒙疆政府”每年所得的上缴和自己统一收购土药公司的鸦片烟，除外埠土药店和大烟贩子亲自到蒙疆政府购买外，他们借着日本宪兵队和军队的势力，运往平津两市和上海各地出售，价格比原地高出一倍和两倍。平津两市，土药店、大烟馆比比皆是，陷害了不知有多少男女青年同胞。

更有发横财者，大伸其手腕活动，勾结当地公安机关和日本宪兵队、日本部队、治安军大官僚等，制造坯子和吗啡。所以那个时候，吸上瘾的人家产荡尽而流落在街头巷尾，身披破麻袋片，以维残生者，笔难胜举。

日本宪兵、汉奸残害欺诈，张家口市内民不安生

张家口市内，凡是巨商、稍富之家，每天都过着心惊胆战的生活，因日本宪兵队中国翻译和公安机关人员勾结日人，千方百计地各处诈财分肥，都以与八路军有联系为罪名，敲诈金钱，举不胜举，今例一二如下。

（1）1939年10月间，张家口上堡、恒兴公粮栈被日本宪兵队敲诈2000元。原因是由乡下卖粮的大车跟来二人，想买货就大车回去。晚间住在粮店内，被宪兵队罗姓翻译知道了，就同队内操长去盘查，然后又检查，把自己手枪暗放在粮垛中，转了一个弯就把手枪拿出来，找掌柜的问这枪哪来的，掌柜吓得当时一句话也说不出来，随后带到队内，严刑拷打，花了2000元才保出来。

（2）1939年12月，张家口桥东商务街武家，在上堡开一布店，家中有一个19岁上高中的女儿，长的美貌。日本宪兵队罗姓翻译看见后就起邪念，同该队军操晚间去武家，问前几天你由口外回来跟你同来那两个人是干什么的，武掌柜说是我们主顾，来办点货回去。罗说：你别胡说啦，那两人是八路军探子，已抓进队里，他俩已把你说出来啦。随后就把武掌

柜带到队里，打了一顿。但第二天，罗叫鲍翻译去武家装好人，想法把姑娘说到手。鲍就去武家对老太太进行威胁，想把那高中女生给罗。武太太说这事不能啊，孩子早就有人家了。鲍一听又说，那么就得花钱我给办一下，也就答应了。过了两天，罗同鲍到武家去，就说罗和队内副官哀求有一天，好歹答应放出，但是须送他1000元才行。老太太就请他俩下午再来，到柜上取钱去。以后他俩把钱拿走，人就回来了。

（3）张家口上堡清真寺街一号杨家，老头七十多岁，家中有个孙子在北平朝阳大学上学。暑假回家，到张家口火车站下车刚出站外，就叫日本宪兵队带到队内，说他是共产党，严刑拷打，也未问出口供。在日人未在眼前时候，罗翻译问他家住处，随后往杨家送信。老头听见后就理直气壮地对罗说，哪有这么一回事，我同你到队里讲讲道理。到了队里，日本操长就把老头骂了一顿。老头就问，你们据什么证明说我孙子是共产党？这句话把日本人气坏了，就把老头狠狠地打了一顿。以后听说他当过县长，家中有钱，罗翻译私自和老头说，我给你想法活动吧，如是老头就求他给办，共花了2000元才将俩人保出来。

（4）我有一位朋友张步印，住桥西武城街山东馆巷17号，自己开帽铺，经常去北平办货。1941年7月被察南政厅庄警佐的特务抓去，硬说是临去北平时，到怀来县下车进堡子里暗与八路军送情报，结果花了500元放出。

日本宪兵队、地方保安队无恶不作，凡是他们出去回来时，每人都掠百姓钱财和金银首饰，并将百姓好牲畜和大车赶回来出卖，还有的把善良百姓有钱的人抓来，先打后要钱，扣个通八路军“罪名”，花了钱才能放回去。

保安队走到哪里，不是征粮，就是要草，从中变钱使用，百姓稍有不愿意，马上就以通敌罪带走，以后花钱才能放回。

张家口兴蒙制粉股份有限公司成立及被骗

本人（孟锦章）于1939年5月，应张家口崇礼县土药公司经理王大鹏函邀担任该公司庶务股长，月薪120元，吃公司伙食。转年7月20日以后，曾随经理等到外县收买处视察收买情况。我亲眼看见烟户卖的烟很糨。而经谢监定随便一喊30水，则就净干70两了，旁边正有一位警察看着，而烟户也不和监定争多论少。我认为他们真昧着良心，剥削得太厉害。

1941年6月，王经理拟派我担任万安县安家堡收买处主任，我未愿就，7月1日辞职，共在该公司连红利在内得有一万五千多元。在这个时候，中央饭店董事长闫景尧和我商量，把他接办的面粉厂兑给我，共合伪蒙币15万元。我说经济无办法，他叫我找王大鹏给想法必成。如是晚间我到王大鹏家里将兑面粉厂事向他一说，他满口答应找各收买人共凑十几万元，愿入股也可，不然算借用。过了几天，连他自己2万元在内，共凑有11万元，加我自己手中1.5万元，还差2万多元，我又向东北老家亲戚等借有3万元，这才把面粉厂兑过来。

面粉厂楼上下共房一百二十余间，院内自来水井两面，中岛式面粉机28台，附动力石磨14面，500匹马力总电动机一台。洗麦大锅四口，周围砌有洋灰大池子，每口一次能洗小麦500斤，以及其他应用的工具俱全。

面粉厂重新组织实行董事制，更名为张家口兴蒙制粉股份有限公司。设董事长兼经理一人（孟锦章），董事七人，均是本人亲友。聘请“蒙疆银行”业务经理李长义、业务主任姬克明两人为名誉董事，每月各给车马费30元，并送给面粉两袋。

本人外甥李德绪为庶务股长，友人之子刘思惠为会计股长，亲戚李金明为出纳股长，友人于长仁为业务股长，又经厂内旧友洛河（日人）介绍他哥哥洛河佑吉为监理。以上几人均聘为董事。因张家口有面粉组合，每

周开两次会，我不懂日语，故才用洛河佑吉为监理，代表我出席开会。他们五人均给报上2万元资金。共有职工三百多人。

因无钱购买小麦，遂将厂子不动产和设备等，托银行业务经理李长义抵押10万元，统共为25万元资金。

据情呈请“蒙疆政府”转呈日本大东亚省，于1941年11月才批下来，在同年12月下旬正式生产，每昼夜生产1000袋面粉，每袋20元，有利润一元五角多。

公司成立后，我鉴于那时的当地公安机关和日本宪兵队对各工商业敲诈情形很多，为了业务顺利计，在生产头一天，就邀请“蒙疆政府”经济部察南政厅、警察局、蒙疆日报、日本宪兵队等，在桥东万福春饭庄吃酒。开办以后，为联络感情起见，每月至少也得请日本宪兵队副官、警察局特务科长（日人）在日本料理馆吃几次酒。就这样，我公司始终免受他们敲诈。

1942年3月份起，增加生产，每月生产面粉四万五千袋。至同年6月提出10万元将“蒙疆银行”押款付清，撤回不动产。同年11月又提出11万元付土药公司经理经手代借之款。1943年5月又提出3.5万元汇回东北还账。

1944年1月，我想提出5万元回北京买一所住宅，在这次本厂监理洛河佑吉就不同意，我俩吵了两次架，结果让我提出3万元，才在北平前外打磨厂里买十几间小房。自此以后，洛河佑吉就和我有了意见，他勾结于长仁要想法算计我。对于我的行动，他俩均注意。

因我的亲友李德绪、刘思惠、李金明三人，差不多每天晚间都聚在柜房里间小屋内开小会，据说是共产党搞地下工作的，可是我不知道。以后被洛河佑吉及业务股长于长仁知道了，就报告伪察南政厅警佐庄某派人去抓。这事被我的友人周乃东知道了。他是察南政厅一等警佐，亲自到家告诉我，当晚七点多钟他雇一辆轿车，叫他们三人坐在车里，他自己骑自行车送到沙岭子车站，然后坐火车跑回北平。

因他们三人跑了，庄警佐未抓着，洛河佑吉又说我公司是专为掩护八路军地下工作的，以后又报告宪兵队、伪警察局等，当时就说已跑了三

人，这是一个铁证。

在1943年6月间，由东北跑来两学生，怕伪满洲国抓他们当兵，走到延庆县遇见八路军劝他俩参加，以后被宪兵队“围剿”时，就把他俩抓住带回队里严刑拷打，打的浑身无一处好地方。这俩人一位姓商，一个姓侯，本想去张家口中央饭店找闫董事长的。以后老闫听说，就商量我同他去宪兵队保这两人。我当时顾全朋友面子，又知他俩被打得死去活来，很是可怜，并未考虑到后来有嫌疑的事，当即同他去见宪兵队渡边副官，说这两人确是来找老闫谋事情的，走到延庆县被八路军掳去了，请把他俩放出来。副官说是我们好好了解一下吧。第二天我就和老闫在日本料理馆，找一位同副官相好的姑娘，托她给副官打电话来喝酒，当晚就去了。我们几人大喝半夜，由姑娘帮助讲情，渡边答应明天由中央饭店写保条就释放他俩。很顺利地就将这两个青年保出来了。

我受“土药公司”王经理所托，还由警察局特务科长手先后保出来两个“嫌疑犯”。

因为有以上几件事情，洛河佑吉就到日本宪兵队、伪察南政厅、伪警察局等机关报告我“私通八路军”，并把公司作为掩护工作地。

在1945年4月30日晚间我正在中央饭店打牌，约八点多钟，宪兵队翻译清水龙男（朝鲜人），就到中央饭店告诉我，可能有人来抓你，赶快收拾跟我上车站坐九点急行车去北平吧。如是我坐九点车跑回北平。临走时我和清水龙男说，如知道有人去北平抓我，请你到武城街山东馆巷17号找张步印，叫他往北京西单西长安饭店打电话找孔焕章即可。第二天我到长安饭店开一个房间，报的孔焕章名字。在当天十一点多，张步印打来电话，我接过来一听，他说今天有两位“朋友”去北平，请招待招待。我放下电话算完店饭钱就马上到前门车站去天津友人刘思惠家中，住有两个多月，病在那里二十多天。

记得在7月12日我又回张家口去。当晚六点多钟，先到友人张步印家中。他正躺在炕上吸鸦片烟呢，一看见我进屋，就坐起来对我说，自你走那天夜间十一点多钟，察南政厅庄警佐就同白鸟指导官去中央饭店抓你，

知道你回北平了，他们第二天就去北平找你，以后你由天津来信我才放心。又说，可惜你交的那于长仁，这个小子太坏了，听你公司“么先生”对我说，这完全是他勾结洛河佑吉使的坏，自你走后，他俩很高兴，每天下饭馆。在本月初他们把公司卖给蒙疆政府了，共5800万元，据于说先交洛河佑吉500万元，他分送给日本宪兵队长、察南政厅老庄、警察局特务科长，大概还送给经济部某人，共花有三百多万元，并给于长仁25万元，还送他面粉机两台，石磨四面，在边路街11号租了一个门面房二十多间，自己开个小面粉厂，他不在我西屋住了，家都搬到厂子里去了。

我听了这些话后，气得好久未说出话来，那时我脑子都乱了。正在这时于长仁来了，一看见我坐在屋里，他脸就红了。我问于，听说洛河佑吉把公司卖蒙疆政府了，于就说我当时劝他不要卖，他说听他太太、哥哥说时局情况不好，所以才卖了，先付他500万元，他送给有关系的人好几百万，还给我25万，电机两台，石磨四面，我在边路街十一号租一处门面房开一小面粉厂，明天你去看看吧。

以后于长仁说咱俩去洛河佑吉家里去一趟，当面和谈一下。我就和他到洛河家去。一进屋，洛河佑吉和他太太很客气地给鞠个躬，就笑着说，孟先生你可回来了，这两个多月真把我和于都想坏了。他满口中国话，把我的气都说散了。随后就叫太太做菜烫酒，三个人坐在炕上一面喝酒，一面说话。他把公司出售的情况向我道一遍，又说先付500万，我请客用了三四百万，给于25万元，其余的款在八月二十号如数付清，还有不多日子了，那时领下来，还希望偿我几百万，以便做点别的买卖。接着于就和他说了一大套日本话，然后又对我说，咱们是朋友，不要打架，不要听别人的闲话，并叫他太太拿出2万元交我，说先拿去用，过几天用时再来取。又问太太来未来，我说跟来了，他就说于你明天送孟五袋面先用。

我当时把钱装起来，心里也就没有别的主意。在那时候我就不应该听他们一面之词，本应当去伪政府经济部了解一下，究竟卖多少钱，已付多少，其余何时付就对了。赶到“八一五”日本投降后，解放军到了，我托人到“蒙疆政府”一问，才知道款在八月初旬如数拨到张家口正金银行，

由洛河佑吉完全调回北平去了。

这时有一友人姜惠民同晋察绥军区总务处招待所长于大中到我家去，给我一介绍，说是老乡，沈阳大东关的人，东北讲武堂毕业。并说，我把你公司受骗情形对老于说了一下，他说介绍你去见总务处佟铮处长，他是沈阳小南关的人，请他向政府了解一下，要是能把未付之款付给你那不就好了吗。我对他俩说，我已托人给问了一下，据说款早被洛河佑吉调回北平了。他俩就对我说，别听一面话，你写份材料给佟处长，请他给好好打听一下。我就写了一份材料同他俩人去见佟处长。佟处长很客气地说，老孟同志，你把这份材料放在这里，过几天我给你了解一下，叫咱们老于通知你吧。

过有半个多月，姜惠民同于大中找我去，说公司款真在八月五日如数付给日本人了。又对我说，老于他们想托你给租几处房子开买卖，听说你在市内很有信用，人缘很好，才来找你给办一办。以后我在桥东租了三层楼房一所，他们开一个正大商店，聘请姜惠民为经理，又在武城街中间租有二十多间门面房，开一个西北电料行，想请我当经理。我当时由于公司马马虎虎就叫人家给骗卖了，心中总是不痛快，所以就未干。

过了些日子，姜惠民又同于大中找我说，据佟处长说老孟同志人很老诚，他对开面粉厂有经验，咱们请他给作一份预算，若是相当，请他当经理。我当时如回北平交通还不十分方便，就答应了。我给作了一份1.5亿边区票子的预算，后经他们生产科长李沂说是预算太大，未愿做。

1946年元月，西北电料行为谢客，在万福春饭庄请客。因开市时我送给一面大玻璃砖镜子，也就给我一份请帖。那天我和姜惠民、于大中、佟处长坐在一桌上，姜惠民对老佟说，去冬你不信孟老弟话，面粉厂未办了，今年想办你拿3亿也办不下来，因为那个时候刚解放物价都便宜，人心未稳的原因，佟处长就说机会过去，以后再说吧。

我在1946年旧历五月初四回到北平，当时托于大中在西北电料行开一份去北平办货的路引（通行证），走到康庄车站以后就用不着了。

我回到北平后，就到西城大乘巷胡同内小乘巷胡同四号找洛河佑吉，

我一进院就有人对我说，洛河佑吉已回国有半年了。他住的房子是租东北人何毓芳的。此人是日本留学，在张学良时期当过河北省实业厅长，听说洛河佑吉回国时，不准带太多的钱，把钱都存何毓芳名下，因我无有凭证也未便找人家。

以后听张家口来朋友说，在傅作义所部占张家口时，于长仁被征兵累吐血死了。

（1964年1月6日）

日本帝国主义的毒化政策

库益菴

追至“七七事变”，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我国占据我华北后，把察哈尔省、绥远省和山西雁北13县，划为“蒙疆地区”。各地成立伪自治政府，并在张家口成立伪蒙疆政府，利用汉奸德王为主席，汉奸蒙人李守信为副主席。它的组织机构，什么财政部呀，什么行政部呀……简直和一个国家组织一样，如大同商人马永魁汉奸任伪蒙疆政府“财政部部长”即其一例。在大同成立伪晋北自治政府，由汉奸夏恭（大同人，清举人，刀笔吏）任委员长，并有日人最高顾问前岛主持政权。内设各厅，如：伪财政厅厅长由汉奸崔学闵（大同人）担任，伪民政厅厅长由汉奸吕登瀛（阳高县人）担任，伪警察厅厅长由日人担任，伪文教厅厅长由日人担任，文教官由汉奸古典（大同人）担任。各厅均有日人顾问若干人，“指导”办事。此外，还设立伪大同经济监视署、伪大同清查署、伪大同警察署，各署长均为日人担任。除警察署由当地警察厅管辖外，经、清两署均直接归张家口伪蒙疆政府管辖。伪工作人员，分日系“满系”和本地人。各厅内部组织，分科分股。凡设科长的，日系居多，“满系”次之。凡任股长的，“满系”居多，本地人次之。各县均成立伪县政府，县长由汉奸担任，日方并派参事官一名，主持政权。县辖的伪警察所、伪街公所、伪乡公所，都是他们的基层组织。发号施令者名义上虽为中国人，而实际则为

日人所操纵，汉奸不过傀儡而已。在沦陷八年当中，其政策法令，简而言之，不是欺骗，便是利用；不是压榨，便是统治；不是伪亲善，便是伪提携；不是强迫，便是掠夺；不是奴化，便是毒化等。

1937年冬季太原失守时，我正在太原东山附近一带，同眷属一块儿逃难。迫不得已，始由太原回到原籍大同。我虽未亲历其境，内幕不详，然在他们的铁蹄统治下，观其苛政实施的面貌，亦如见其肺肝然。他且不谈，只就其毒化政策而言。

日本帝国主义侵占我华北后，把军队分布在沿铁路线和各县城及重要村镇。凡政权所及的地方，任意迫害和蹂躏广大人民。日本帝国主义者利用伪政权，强迫农民种植鸦片，每年收割多少，都要卖给他们的伪清查署所成立的“土药组合”。按质量的高低，实价收买，不准农民卖给别人和走私。在种植前，由伪清查署规定每村按土地亩数多少，按比例种植，并把土地分成上、中、下三等，确定每亩应卖给他们的两数。例如大同乡村每亩好地，须卖给鸦片70两，中地50两、下地30两。各村下种后，伪大同清查署又派人员丈量种植鸦片的亩数，以便核定收买的标准。在丈量地亩当中，他们的翻译以及所用的工作人员，敲诈勒索，无所不为，农民苦不堪言，不种不行，种也活不下去。及到收割后，农民把货晒好，送到各县所成立的“土药组合”或分庄，任他们监定质量的好坏，任他们决定两数和价格，层层剥削，处处损失，弄得农民高兴而来，扫兴而去。还有的农民，因卖不足应卖的两数，往往受到伪清查署人员拷问毒打，甚至灌凉水等的非刑。

各村农民因种植鸦片，吸食者亦日益增加。县城居民因吸食公开，几乎家家有灯，人人作为应酬品，好像一般人吸纸烟一样，毫无顾忌。人们在这醉生梦死中，面色憔悴，精神萎靡，倾家破产，卖妻卖子的事屡见不鲜。在这沦陷八年当中，伪蒙疆区内所收的鸦片数量，虽不知其详，然以大同伪晋北自治政府所辖的13县估计而言，每年在100万两以上。如果以全伪蒙疆来估计，则在500万两以上。这样的惊人数字，它们究竟运到何处？作何用途？据当时人说：“各地组合所收的鸦片，交在各地的清查署，又

都运到张家口清查总署，再由日人运往北平和占领区销售了。”有的说：“每年种植的鸦片，它们运到日本，做成‘吗啡’卖给德意轴心国在军事医药上使用。”还有的说：“运到北平制成‘坯子’再做成料面卖给中国人吸食。”传说虽不一，但可断言，日本帝国主义者绝不会把这些毒品运到他们本国，让他们的人民吸食。

伪清查署所成立的“土药组合”，是委托鸦片收买人代收之机构。这种收买是发国难财的好机会。逐鹿的人，不是汉奸，便是富商，不是当过翻译的，便是和有权的日人有联系的。每年在发表鸦片收买人前，这些逐鹿的人，都云集在伪蒙疆张家口清查总署，奔走权门，贿赂运动，特别各地日本宪兵队的门径，独占上游。如大同13县的鸦片收买人剧中兴（山阴县人，汉奸，日本大同宪兵队大狗腿，当时人称之为剧司令），历年都是大同日本宪兵队所介绍。鸦片收买人得到委托许可证书后，分赴各地组织“土药组合”。其内部分设经理、副经理、会计、总务、监定、保管等各股，这种“组合”全依剥削农民、欺瞒日人而从中牟利，浑水捞鱼。如：该组合收买鸦片时，明明称得是一两，而他们硬说是七钱，明明是上等质量，而他们偏说是下等货，七折八扣，左剥右削，不卖给他们不行，卖给他们要受这样的剥削，可怜的农民只好任他们宰割。其对伪清查署交鸦片时，按原收价，发给他们三成物资（布匹、糖类等）。这些物资均以低价卖给。七成伪币，以原收鸦片最高价发给。这种办法，他们有利可图。然其最大的利润，则在舞弊，就是把各地的分庄和其组合直接所收的鸦片，收集在一处。收买人串通他所用的内部人员，按偷换鸦片计划，在夜间一齐动手，把所收的鸦片，由库拿出，用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法，把原鸦片每百两掺入沙土或底膏三四十两，然后把偷梁换柱的鸦片，按股分肥、利益均沾。

伪清查署规定“组合”收买期为三个月，农民逾期不交者，查出以私货论，没收充公，处以罚金和拘留。并一面严禁走私，在沿铁道线对上下火车旅客实行盘问和检查，一面还派伪工作人员下乡检查农民谁存私货，凡种植鸦片的农民，挨门逐户地均受其搜查。他们并扬言说：“我们空手

而来，哪能空手而回。”弦外之音，暗示你们没有鸦片，有钱也行。农民不堪其骚扰。

日本帝国主义用鸦片毒害中国人民还不算，更进一步，变本加厉地把鸦片制成“坯子”做成“料面”加快速度地灭亡中国，使中国人民一倒不复翻身，永远做他们的奴役，任他们宰割，这种阴谋的企图，手段的毒辣，越来越看得明显了。在伪蒙疆区内各地，日本帝国主义者把强迫农民种的鸦片，由“土药组合”收买，送交伪张家口清查总署后，他们用化学原料“醋酸”，秘密制成“坯子”然后又做成“料面”，在各地公开或密卖。大同城内有个王姓院内就是一个集中卖“料面”的地方，每天每到出卖前，人山人海地聚在该院门前，男男女女，老老少少，大贩小卖，穷的富的，以及各色人等，都去那儿购买。一个夏季的早晨，我因事走过该门前，以为该院内发生事故，不料从旁打听细情，才知是出卖料面的场所。进院一看，全院有二三十间空房，当时却是人满满的，有的正在购买，有的正在吸食，有的蹲着站着，有的坐着躺着，有的欢天喜地，指东画西，有的内心忧虑，愁眉苦脸。卖料面的朝鲜浪人们，因生意兴隆，忙得不亦乐乎……形形色色的现象，不一而足。

在当时，各地吸食毒品的人太多了。以大同一地而言，平均每四人中，就有一人吸食料面，比吸食鸦片的人还多。而且不少吸食鸦片的人逐渐改吸“料面”，因为料面吸食方便，省时间、过瘾快，因此有毒品嗜好的人常说：“宁吸‘料面’，不吸‘鸦片’。”岂知料面的毒害强烈性更大呢！凡吸料面的人，几乎时刻离不开它，瘾大者日挥百元，瘾小者也得一元。积日累月，年复一年，身体骨瘦如柴，吹灰无力，不吸它宛如临死的病夫，气息奄奄。吸之则立时精神振奋，自觉有劲，好像健康无病的人心身爽快。久而久之，家产为之荡尽，初则妻子离散，乞讨偷盗，继则被唾弃，死于路旁。如大同城内西南隅北米凡籽巷，有富商之女名古秀珍者，少年时代生得俊美，人才出奇，父母爱之如掌上珠，当时人称之为“云中西施”。父死，因母溺爱，染鸦片嗜好，后改吸料面，没有几年竟把万贯家产付诸一吸，最后流落街头，乞讨偷盗，身肿头破，死于路旁。

日本帝国主义者“只许州官放火，不准百姓点灯”。他们强迫农民种植鸦片也好，暗制料面也好，坏事也得由他们独揽。当他们在京包线和北同蒲线严禁走私的时候，禁网严密，苛刑峻法，无所不用其极。可是百密之中，难免一疏。我在1940年的冬季，因事正在北平旅馆寄住，常听说“蒙疆‘棒儿队’发财容易命难保”。我以为这些“棒儿队”是日伪机关所组织的一些小汉奸给它们做爪牙的。不料，事出稀奇，言之伤心。有一天和留平的同乡谈起“棒儿队”，他们说，“棒儿队”是指偷运毒品的人。他们因为日人对火车旅客稽查过严，没法偷运，运贩毒品的人，或被人用金钱雇用的，或自行运贩的。他们把毒品——“坯子”“鸦片”装入卫生袋（又名保险套）内，外用线捆好，一个袋内，可装毒品二两，把它塞入肛门里，一个袋和一个袋连接起来，好像一个棒儿一样。偷运的人，三五成群，为了互相招呼，住店要住熟栈，卖货要找熟人，故人称为“棒儿队”。在伪蒙疆沿京包线和附近，用这方法偷运毒品者，每天不下几千人。日本帝国主义利用种鸦片卖料面的政策，不仅毒害了我们中国人民，侵占了我们的土地，而且还要灭亡我们的种族。这种罪行史实，谈起来真是切齿痛恨。日本帝国主义豺狼成性，惨无人道，独霸的野心赤裸裸地原形毕露。他们称王道霸，倒行逆施，欺压人民，使我们天天处于愁云惨雾之中，感觉到处都是残破败落，到处都是灾难痛苦，疮痍满目。日本帝国主义的毒化政策所造成的灾难，我们是永远不会忘记的。

（1963年8月28日）

伪蒙疆的军事幼年学校

博彦满都*

“七七事变”后，德穆楚克栋鲁普（德王）依靠日本人的势力，成为伪蒙疆自治政府的主席。

德王从他多年的政治生涯中认识到：要想巩固自己的统治，就需要有忠实于自己的军队和军事干部。于是一上台，便着手组织整顿伪军，同时创办军官学校，培养军事干部，他自己还兼任了军官学校的校长。但是日本人对他并不放心，怕他的权力过大，又管政又管军，不易掌握。同时考虑到占领区的蒙古族青年还没有接受日本的奴化教育，怕引起麻烦。因此，主张先办幼年学校，等有了毕业生再办军官学校，这样可以使蒙古族青少年彻底奴化。同时不让德王兼任学校的校长职务，这样就可以分散德王的权力。

这样，德王亲手办的隶属于伪蒙疆政府的军官学校，草草毕业了两期学生就宣告结束了。并于1939年下半年着手筹建隶属于伪蒙古军总司令部的“幼年学校”。

我原在伪蒙古军第八师二十二团任上校团长，奉伪蒙古军总司令部的命令，于1939年10月25日就任了军事幼年学校的校长。这所学校是个完全军

---

* 作者曾任伪蒙古军团长、军事幼年学校校长等职。

事性质的少年学校，校址设在锡林郭勒盟苏尼特右旗的德王府（现在的温都尔庙）。

1940年6月17日，学校正式开学。除由我任校长外，哈丹巴特尔为生徒队长（学生队长），喜吉旺森莫、宝音德力格尔、清巴图、恩和莽来、巴图敖齐尔、敖秀山六人为教官，日本人井上为主任教官，还有两个日本教官。嘎日迪和清巴图二人为副官，乌日根仓、乌力吉那仁、孝生嘎为嘱托（此三人是用优厚工资为条件从伪满洲国聘请来的），达来巴雅尔（汉名赵景贤）和阿民巴图为上士，管理总务。

第一期生徒（学员）招了60名，候补生徒若干名。生徒的主要来源是伪蒙古军中内蒙东部籍官兵的子弟。他们入学后被编为一个生徒队，称第一区队。由一名蒙古族教官任区队长。

学校开学后，进行正式教程。主科除了普通中学的语文、算术、地理、历史外，还进行军事训练。生徒的服装与伪蒙古军的制服一样，只是没有枪支。

每天早晨升旗（伪蒙疆旗）时，生徒在生徒队长和区队长的带领下，整队站在旗下宣誓："为复兴蒙古民族在元朝时的事业而努力，为日蒙亲善，实现大东亚共荣圈而奋斗。"

当时，"幼年学校"从建校时起，就围绕着重视蒙语蒙文教学和彻底实施奴化教育的矛盾，展开了斗争。

当时在教学方法上，每天除了两小时自习，日文一节，汉文一节，其余四节和操练均用蒙语。这和日本人当初的意图完全不符，使日方大为不满。认为这种教学法，重视蒙语、蒙文，冷淡日语、日文，对蒙古族进行奴化教育大为不利。

在学生和蒙古族教职工中也因这一问题引起了风波。多数学生和教职员出于民族感情，迫切要求学习本民族语言文字。而蒙古族教官清巴图是个亲日分子，则极力主张重视日文，少学蒙语蒙文。

为了解决这一纠纷，我曾和主任教官井上会谈过几次。我说，作为蒙古人不会使用自己本民族的语言文字，却要致力于外国语言文字，这是没

有什么实用价值的，同时也是不易为人所接受的。这不仅不会受到蒙古民族的欢迎和拥护，相反会遭到激烈的反对，这对日本也不利，请考虑。井上当时在嘴上表示同意，但在背后仍鼓励和支持清巴图。

生徒队长哈丹巴特尔就是因为支持我的观点，而于1941年春调转伪蒙古军总部。

哈丹巴特尔调走以后，我用说服教育的方法，渐渐地使清巴图的态度和观点有所改变，不再主张重日排蒙了。

1942年春季，总部派来了一位区队长索达那木道尔扎。他一到校便主张把教学方法全部改为日本式的，鼓动学生起来反对对民族语言文字的重用和学习，并大肆宣扬日本如何强大，“日本精神”多么使人敬佩，日本文化是文明，蒙古族青年应该好好地学习日本民族的一切，首先应该好好学习日语，否则蒙古民族的复兴永远只能是可望而不可即，等等。我曾对他多次进行说服工作，但毫无效果。索达那木道尔扎的这种宣传，马上引起了学生的激烈反对。

1943年6月，第一期学生毕业了，并升入了厚和市（呼和豪特市）伪蒙古军军官学校，“幼年学校”的第四期学生也入学了（入学后被编为第四区队）。

开学后不久，在9月里的一天，索达那木道尔扎到第二期学生的班里讲课。跨入教室刚要走上讲台时，随着值日生喊“立正”口令的同时，一个学生突然从背后拦腰抱住了他，几个学生上前抓住了他的双手，迅速夺下了他的手枪和军刀，并用毛巾堵住了他的嘴，学生们一边呼喊着“打死索达那木道尔扎，铲除绊脚石！”一边拥上来，把索达那木道尔扎痛打了一顿。

当我听到消息赶来时，索达那木道尔扎已被打得浑身是血，人事不省地躺倒在地上了，看来伤势很严重。当下我便命令校医赶快进行抢救，并回转身把第二期学生训斥了一番，命令他们全体马上回宿舍反省。

事件发生后，利用学校的电台给伪蒙古军总司令发出电文，把事件的详细经过作了报告，并请求派人前来解决处理。与此同时指派了一部汽车

把索达那木道尔扎马上送往厚和进行治疗。可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主任教官井上跑来向我报告说，第三期学生也准备闹事，他们截住汽车，要索达那木道尔扎把命留下，同时还扬言要把日本教官一同打死。

听到这一消息，我准备马上把全校学生都集合到礼堂听我作报告，趁学生们听报告的机会，把索达那木道尔扎用汽车偷偷送走。井上认为不如请求上级派飞机接走更为妥当。我说这也好，当下便给伪蒙疆政府发出了电报。下午飞机便来了，当下我便指令几个人赶快把索达那木道尔扎抬上飞机送走，一面把全校学生集合到礼堂里给他们作报告，指出了事件的严重性及不良后果。

这时伪蒙古军总司令部派来调查这次事件的参谋副长郭勒敏色（现改名为高乐明山）和一名日本顾问，已经来到了学校。当下我便向他们报告了事件的经过和事件发生前的学校情况，接着他们便对第二期的每个学生进行了讯问。学生们都说自己是事件的主谋，校长、队长、各蒙古族教官和嘱托都没有鼓动，没有帮助策划。

经过一个星期的调查，郭勒敏色和日本顾问从学生嘴里什么也没问出来，就回总部去了。

在总部派人来调查之前，井上曾要求我从第二期学生当中处决15名，以示镇压。我说这绝对不行。首先，问题还没有弄清楚，还有待于调查其中详细情况。其次，如果总部要追查责任，那么首先应该由我负，因为我没有尽到对他们的教育之责，不能因此而处决学生。同时，我们在事先都没有对学生的情绪予以应有的重视。听到后一句话，井上考虑到这事与他也有牵连，也就不再坚持了。

在事件发生后，学校里的日本人也很惶恐，因为学生们在拦住送索达那木道尔扎的汽车时，曾扬言连日本人一块儿收拾。

1943年9月，伪蒙古军总司令部根据事件的后果和调查报告，命令校长博彦满都、主任教官井上“重检束”（禁闭）两个星期，生徒队长喜吉旺森莫“重检束”一个星期，第二期的全体生徒反省一个星期。同时命令校长博彦满都调往伪蒙古军第九师任参谋长，主任教官井上和生徒队长喜

吉旺森莫也调往他部重作安排。我调走后，由胡尔查任校长，柳夏（日本人）代理主任教官。

索达那木道尔扎于几个月后也被调离了学校，到伪蒙古军察哈尔防卫师任新职，后来听说他于1946年在张北县被镇压。

第二期学生打索达那木道尔扎的事件，纯系出于民族情感。这批学生毕业后升入军官学校。1945年日寇投降后，由于接受了中国共产党的影响和引导，于1945年10月25日准备起义，不慎有人告密，为傅作义所镇压。

“幼年学校”的第二期学生于1941年5月入学，名额40多人，入学后被编为第二区队。第三期学生于1942年5月入学，名额50多人，入学后被编为第三区队。第四期学生于1943年5月入学，名额60多人，入学后被编为第四区队。每一区队由一名蒙古族教官任区队长。学生来源主要是锡盟、察盟、乌盟、巴盟、伊盟等地的各阶层蒙古族青年和少年，也有少部分学生来自内蒙古其他地区。

从“幼年学校”出来的学生，日寇投降后多数参加了革命，少数到了蒙古人民共和国或者回了家。

这些学生到蒙古人民共和国的情况，后来听说是这样的：“幼年学校”的在校师生听到日寇投降的消息后，教官们主张往南走。走了一天后，听到蒙古人民共和国已出兵对日作战，学生们便主张往北走到蒙古，遭到教官的反对，于是学生们打死了日本教官和几名蒙古族教官，全部往北跑到了蒙古。

（潮克记录整理，1966年）

忆“陆军幼年学校”的学习生活

和希克*

一、幼年学校的概况

德王为了培养伪蒙古军的年轻军官的后备力量，1940年7月，在锡林郭勒盟西苏尼特旗德王府西营盘设立了伪“蒙古陆军幼年学校”。该校的人员编制和课程设置以及教育训练的方法，完全仿效日本陆军幼年学校的模式设计的，直接归伪蒙古军总司令部领导。第一任校长是中佐博彦满都，日本主任教官是柳下，生徒队长是少佐哈丹巴特尔。每期招生60名，编为两个区队，各设一名少尉区队长，直接负责区队的教学与训练工作。校内设有无线电台和医院，担任学校的通信联络和卫生保健工作。课程分为学科和术科两种。所谓学科是主要学习中学的蒙文、日语、数学、物理、历史和地理等课程；所谓术科是主要学习基础军事理论、基本的军事技能、军事体操、剑术和刺枪等科目。师生与同学之间，同学与同学之间都严格地实行下级绝对服从上级，下期生见着上期生要行军礼并服从他的命令，稍有反抗的表现或行动，就要受到严厉的制裁。除了日常的军事训练外，还经常进行昼夜间的非常军事演习，为了培养学生的“武士道精神”，这

* 作者曾在“陆军幼年学校”学习。

种军事演习往往是有意地选择极端恶劣的气候进行。经常召开“武道大会”进行剑术和刺枪的比赛，优胜者获奖。早晚点名之际，点名完毕后，边唱军歌边跑步一小时。集合或紧急集合时都有一定的时间，超过时间就要受到严厉的惩罚。同一区队的几名学生违犯了校规，集体也要受到打骂。吃饭、睡觉、走路和坐卧姿态都有规定，稍有违犯就打骂。学生进办公室必须严格按照军人礼节，不得稍有差错，甚至挨打时也得采取规定的挨打姿势。挨打时不准哭，越哭打得越厉害，并且骂你缺乏“武士道精神”，一直打到不哭为止。吃饭时，也按照日本人的生活方式必须先用日语喊一声“我要吃了”。学生的衣食住行的费用完全由校方负担，每月还有伪蒙疆币13.75元的津贴费。寒暑假归乡时，全是免费乘车。

每周末检查一次各区队的内务整顿情况，也就是检查室内外及个人卫生。每月由校军医官检查一次学生的身体健康状况，记入卡片，并向上级汇报，如果发现学生患有花柳病等传染病时，立即给予开除处分。每周设有轮流的值星军官和值周生，负责检查督促全校的日常学习和工作的任务。每周有两节劳动课，搞校院内的清洁卫生和校田的种植收割等农活。学生患轻微的病，由校军医官负责给予治疗，病重者转送呼和浩特“蒙古军”总医院进行住院治疗，病愈后立即返校学习。每招收一期学生，由上期生选派学习成绩优秀和组织能力较强的两名学生，去担任该期生的指导生，协助区队长搞工作，力求成为他的有力助手。夜间在每区队学生宿舍内设四名不寝番（夜值日生），分前后夜两班，担任宿舍内外的警卫。学校东边驻扎着伪蒙古军第五师二十六团，担负德王府和幼年学校的安全保卫。每周末检查一次学生武器保养情况，不合格者受到严厉惩罚，尤其在演习中遗失武器、弹药或者皮带等物，立即交给军法处法办。每周还有学生轮流到教官家里当勤务兵。

为了加强法西斯思想教育，每周由校长讲一节精神训话课。日本主任教官讲数学课和生徒心得（类似现在的中学生守则）。每学期末由区队长针对学生在德智体等方面的具体表现进行一次严格的考核，并把核定材料报送生徒队长审查后归档存案。此档案材料，秘密地跟随你一生，但你一

生也看不到你的档案，是绝密文件。期末考试中前五名优秀生发给奖品。每个学生发一支樱式步枪，除了实弹演习之外，平时不发给子弹，以防学生中发生叛变等意外事件，而且这种樱式步枪是粗制的训练武器，实战中不能使用，打三四发子弹后就要爆炸。在日常的教育与教学中特别强调军风军纪，衣冠必须整洁端庄，风姿伟武，要表现出军人的气概，必须绝对服从上级的命令，不得有丝毫的违抗行为和表现。在星期日或假日经常组织小型军事技术比赛和野游打猎等活动。每日的朝会和晚点名时，必须先向日本天皇进行“东方遥拜”，向他表示无限的忠诚。每教室内都悬挂着成吉思汗和韩凤林遗像以及德王的“忠诚正直”等亲笔题词。

考试制度非常严格，学年考试两门课程不及格者，留级学习；毕业考试两门课程不及格者，不发给毕业证书，留级或分配到部队当班长。

每期学生毕业时，邀请军政要人、社会名流来校参加毕业典礼。在庄严肃穆的毕业典礼上，校长和主任教官讲话后，就请贵宾进行讲演。进行最后一次的武士道精神的教育，灌输为德王和日本天皇“捐躯效忠”的军国主义思想。最后在军乐声中，由校长给前五名优秀毕业生发给奖品，再给全体毕业生发毕业证书和毕业纪念相册。

二、日本教官嘴里喷射出来的毒气和黑雾

日本士官学校毕业生、阴险狡猾的柳下主任教官，在1942年调到伪蒙古陆军军官学校当主任教官去了。他的接任者是井上主任教官，据井上自我介绍，他也是日本士官学校毕业生。他毕业前夕，曾参加过日本军的政变事件，政变失败后，被捕入狱，监禁许多年。后因“九一八”事变发生后，日本军事当局迫切需要有指挥才能的年轻军官，因此，把他提前释放，派他到前线当中级指挥官。临释放前，日本陆军监狱长给他吃了一副绝种药，因此他已40多岁尚无后代。日本关东军完全侵占我国东三省后，认为他在政治上不可靠，令其退伍，让他当在乡退役军官，并将他派到幼

年学校当主任教官。他确实学识比较渊博，既能教日本文学，也能教高等数学，军事知识和技能那就更不用提了。他能言善辩，口才也比较好，是一个典型的法西斯军官。

他在朝会上，经常给学生讲“国内外形势”，借此鼓吹日本帝国主义建立“大东亚共荣圈”和“王道乐土”的“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每逢日本侵略军侵占我国的大城市或重镇时，通过举行“庆祝会”之机，大肆吹嘘日本的“丰功伟绩”，以此来向学生灌输“亲日”和军国主义思想。只准学生唱法西斯军歌，不准唱流行歌曲。他说唱流行歌曲，会使人沉浸在爱情生活中，心变得软绵绵的，不能锻炼成为“真正的武士”。讲历史课时，他说：“成吉思汗和天照大神是亲兄弟，成吉思汗派他弟弟天照大神去治理日本的，日本大和民族和蒙古民族是同种同族的民族。因此，我们日本大帝国的天皇陛下，派我们来中国帮助蒙古人，复兴蒙古的。”他用这些荒唐的甜言蜜语给学生灌输“亲日”思想，以期达到其同化蒙古民族的罪恶目的。在他面前学生讲日本话，他就高兴得得意忘形，如果学生讲蒙古语，他就暴跳如雷，大骂一顿。他讲数学或军事课时，结合课文大肆宣扬日本的科学技术和武器如何如何先进，比苏联和英美都发达，以此来向学生灌输崇日恐日思想。

德王和伪蒙古军总参谋长乌古廷经常来校“视察”。每逢他们来校时，学校都要举行隆重的欢迎仪式。他们在学校吃饱喝足以后，给学生作报告。每次都是讲些日本是我们的“善邻友邦”“救星”“日本天皇的光照下，复兴蒙古”等陈词滥调，别无其他新鲜玩意儿。有时，还邀请一些日本高级将领来校给学生讲日军的战史与目前时局等问题，给学生灌输崇日思想。日本教官是通过这些阴险卑鄙的教育手段，向学生施放军国主义思想的毒气和黑雾的。

三、第一期学生的抗日歌声

第一期的布力格德、棍仓敖力布、苏达那木等同学，用蒙文编写了第一期学生歌。歌词中有这么几句话："从四面八方飞到锡林郭勒草原上的小鹰啊！等到翅膀长硬，翱翔在蔚蓝的天空之际，一定把大草原上的一切害人虫吃光，把辽阔无边的草原建设成人间乐园……"他们编出这支歌后，我们第一期学生很快就都会唱了。在课余时间，都不约而同地唱起这支歌来，抒发自己热爱家乡的真挚情感。不知什么原因，井上主任教官知道了这歌词的大意，有一天，他把布力格德等编歌的同学叫到办公室，气色恼怒地问："'一定把大草原上的一切害人虫吃光'这句话的含义是什么？"这些同学回答说："害人虫指的是大草原上的天然害虫，别无他意。"井上睁大两只狗眼睛恶狠狠地说："你们对我们的日本天皇不忠诚，不说实话，用花言巧语欺骗我。我命令你们今后绝不准唱对我们大日本帝国抱有敌意的歌曲。今后，我再听到此歌声，一定要严惩不贷。"这些同学回来后，把井上的这些话原原本本地给全班同学传达了。从此，同学们不敢在校内唱了，假日郊游或寒暑假回家后，再尽情地欢唱这支心爱的歌。

四、日本法西斯劣根性的大暴露

教剑术的饭冢日本教官，在剑术比赛中，有时，被我们第一期的剑术练得好的萨音巴雅尔、孟和巴特尔、宝音图和阿民勿力图等同学打败。他就怀恨在心，以后一定要寻找时机，找碴儿对这些同学进行打击报复。有一次，塔青布同学把来校进行比赛的日本角力能手摔倒了，这个所谓的日

本“大力士”很不服气，再三地和这位同学较量，结果皆以失败告终，第二天，他夹着尾巴灰溜溜地走了。他走后，井上主任教官把这位同学叫到他的办公室大骂了一顿，指责他是损害了大和民族的“尊严”，犯了“怒其主”之罪。通过这两件小事，可以看出日本法西斯的野蛮兽性和狭隘劣根性。

五、第四期学生成立抗日政党，积极开展抗日除奸活动

第四期学生入学后不久，学生中形成了主张抗日的激进派和主张教育救国的消极派。在这种历史背景下，在1944年春季，第四期学生卓力格图（现住锡盟正蓝旗，是解放军离休干部）、阿拉坦阿古拉（又名梁永富，原任内蒙古话剧团干部，前年因公伤逝世）、拉喜敖力布（现任锡盟民委主任）、色旺扎布（现任内蒙古大学副教授）、阿勒德拉图、纳庆、勿力吉等同学和西苏尼特旗女校教师布仁色音、纳色音朝克楚、德力格尔朝克图等，成立了一个以抗日除奸为宗旨的内蒙古青年党。

有一次，轮到卓力格图同学担任值周班长，在他值周期间，同班的一位同学在宿舍里丢了东西，向他报案。他听完遗失物品的经过后，深入宿舍进行了一番调查之后，断定为教育救国派的一位同学是盗物者，命令他把赃物交出来。这位同学坚决不承认，并向教育救国派的领导人汇报了这件事。该派的领导人立即找卓力格图据理驳斥，极力推翻他的判决。双方各叙自理，互不相让，在班内引起了强烈的连锁反应，造成了极大的思想混乱，严重地影响了班集体的友谊与团结。过了数日后，遗失物品，在宿舍的某一角落里找到了，或者从另一位同学身上发现了，这我就记不清了。卓力格图听到此消息后，感到很难为情，立即跑到厨房拿菜刀剁掉自己的一个手指，把鲜血淋淋的手指交给被冤枉的同学，以表示赔礼道

歉。

卓力格图同学是一位勇敢、倔强、富有正义感的爱国蒙古族青年。他于1946年在锡盟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因为他有较好的指挥才能，作战勇敢，屡立战功，多次被评为战斗英雄。不久，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晋升为营教导员。在1952年“三反”运动中，被坏人陷害，给他加上种种莫须有的罪名，开除党籍、军籍，交给锡盟正蓝旗管制改造到万恶的江青反革命集团倒台为止。前几年，内蒙古军区给卓力格图同志彻底平反，恢复了他的党籍、军籍，定为十六级军队干部之职。现已离休，在锡盟正蓝旗从事牧业生产，过着幸福的晚年生活。

六、杀日寇报国仇，奔向革命前程

到了1945年，“幼年学校”的第一、二、三期学生，都升入呼和浩特的伪蒙古陆军军官学校。“幼年学校”的在校班级只有第四、五、六期学生和补习班。这时的校长是色德达力玛中校，生徒队长是都古楞仓少校。另外，还有日本教官三名，中少尉区队长有：那顺巴图、巴图敖其尔（现任锡盟畜牧局长）、额尔敦陶克陶、特木勒、仓杰扎布、宝音和布格、敖特根、那顺达来等以及三名军医官和两名文职教员。还设有附属医院和电台。每期学生有50多名，共有300余名。

幼年学校的内蒙古青年党，在1942年春天，派出两名同学，前往蒙古人民共和国进行联络。他俩走后，一直杳无音信，可能牺牲在途中了。在1944年秋天，继续派遣阿地亚（现任锡盟蓝旗旗委书记）和旺楚克（现任锡盟蓝旗民委主任）两位同学前往蒙古进行联系。他俩离校后，仍未归来。后来才知道，他俩到达乌兰巴托后，因无组织关系，被怀疑为日本特务，被捕入狱了。

1945年7月中旬的一个晚上，根据日本中尉特务主任教官稻永的指示，色校长发布了前往张家口进行野营训练的命令。事先卓力格图等同学窃听

了从驻西苏尼特旗日本特务机关打来的电话，已知其以野营训练为名，往呼和浩特转移的秘密。

知其秘密后，立即召开卓力格图、阿勒德拉图、拉喜敖力布、纳庆和色旺扎布等同学参加的紧急会议。会上，由卓力格图同学首先介绍了窃听特务机关电话得知的实际情况。他说："往张家口进行野营训练是假的，实际上是往呼和浩特转移。苏联红军和蒙古人民军快要打进来啦，我们应该做好迎接红军的准备工作。德王的大儿子指挥的二十六团，驻扎在我校附近，严密地监视着我们，我们一定要对他严加防范。我们用的樱式步枪无实战之用，并且没有子弹。以后要设法搞到学校的三八式步枪和子弹。在行军过程中，掌握有利时机，杀死日本教官，缴械蒙古教官的武器，举行起义迎接红军。"与会者热烈地讨论了他拟定的起义计划，最后统一了观点，兴高采烈地散会了。

当晚，在色校长的带领下，全校师生员工共300余人，在朦胧的夜色中，把武器弹药放在牛车、骆驼车上，给炊事员和杂勤工每人发给一支三八式步枪，令其保护日本教官安全。给第四期学生，配两挺轻机枪，每人发了四发子弹，仍背着樱式步枪，担任途中的警戒任务，浩浩荡荡往张家口出发了。在途中数次想干掉日本教官，因有炊事员和杂勤工的保护，并且日本人不在一起走，未搞成。夜间五六点钟时，行抵毕喜勒图庙，一查点人数，才知道行军途中掉队两名同学。校长立即派两名第四期学生沿着原路查寻其下落，在早饭前好容易才找回来。因为行军过分劳累，大家吃完中午饭，都昏昏沉沉地睡着了。利用这一有利时机，卓力格图又召开了阿勒德拉图、拉喜敖力布、纳庆、勿力吉、色旺扎布等20多人参加的紧急会议，部署了杀死日本教官的行动计划。先进行了明确的分工，卓力格图担任总指挥，并且，他和阿勒德拉图负责突击日本教官。勿力吉负责指挥轻机枪，肩负全校师生的安全保卫任务。拉喜敖力布和纳庆等同学，指挥各期的同学，夺取蒙古教官和炊事员等人的武器，并监视这些人的行动。还派色旺扎布去联系驻庙的30多名伪蒙古军。他会见其连长后，立即进行谈判，最后达成互不干涉、互不侵犯，"幼年学校"师生走后，绝对

给予保密等协约，返回后，将谈判情况汇报给卓力格图。

在毕喜勒图庙宿营后，生徒队长都古楞仓和三个日本教官住在庙内的一个蒙古包内，等他们睡熟后，卓力格图悄悄地爬进蒙古包内偷出三支手枪，只有稻永主任教官把手枪放在枕头下边睡着了，未能盗出来。

卓力格图先在庙的周围山上布置瞭望哨，然后在主任教官等住的蒙古包附近设了四名警戒兵，再独自一人端着三八式步枪闯进包内。稻永主任教官一听见脚步声就惊醒了，他一看见闯进一个端枪的人，赶紧往枕头底下摸他的手枪，准备反抗。卓力格图以迅雷不及掩耳的动作，开枪击毙了要做最后挣扎的稻永。生徒队长和两个日本教官听见枪声后，像惊醒的兔子一样往外逃窜。生徒队长都古楞仓和佐藤教官肩并肩地向前奔跑。卓力格图迅速端起三八步枪，瞄准佐藤射击，枪声响后，都古楞仓队长应声倒于血泊中了。他还在断断续续地喊着："同学们为什么事先不告诉我呀？你们为什么这样干呀？日本军方面知道这事件后，你们都活不成的。你们赶紧离开此地，往北跑吧！"卓力格图怀着内疚和沉痛的悲哀心情，迅速跑至都队长跟前说："队长，我打的是佐藤，因我的射击技术不高明，误伤您了，我实在对不起您啊！我有罪啊，请饶恕我吧！我一定杀死那两个鬼子，替您报仇，为国报仇。请您在九泉之下瞑目安息吧！"都队长听完他这几句话后说："我决不怪罪你们，只感到遗憾的是，今后不能和大家一起干复兴蒙古的伟大事业，来世再见！"我们敬爱的队长，说完这几句遗言后，面带笑容地离开了这动乱的世界。周围站着的同学，看见队长死了，都流下了眼泪，脱下军帽，向他敬礼。卓力格图也向队长的遗体行军礼告别后，举目一看，佐藤光着两只脚，正向南山拼命地奔跑。他和阿勒德拉图，选乘两匹骏马，每人手提一支三八式步枪，很快地追上了佐藤。鬼子立即跪倒在地上，苦苦哀求饶命，并且贼眼死盯着他俩的枪。这时，阿勒德拉图扣动扳机，一枪结束了他的生命，然后他俩掉转马头驰回庙内。同学们向他俩报告说："堀口日本教官跑进庙库羊毛堆里藏起来了。叫他出来，怎也不出来，你们收拾他吧！"卓力格图咔嚓一声，把刺刀安在枪上，飞步跑进庙库里，把堀口刺死于羊毛堆之下。然后叫同学们把稻

永和堀口的尸体，拉到山沟里，把都队长的遗体埋在庙附近的地里。圆满完成杀死日本教官的行动计划，并处理完善后事宜，卓力格图同学立即召集蒙古教官和杂勤人员训话。先命令同学们，缴了他们的枪支弹药，然后说明了去蒙古人民共和国闹革命的意图。并宣布愿意跟着学生去蒙古的留下来，一起去蒙古，不愿意者也不强留，请自便。他们听完训话后，都表示愿意跟着学生走。

卓力格图决定：从第四期学生中挑选精明强干的26名同学，先乘马回“幼年学校”，补充武器弹药和粮食之后，穿过锡林郭勒大草原，越过国境线，去乌兰巴托。第五、六期学生，年龄小，忍受不住途中的艰难险苦，因此，绝不能去张家口干“飞蛾奔火”的蠢事，暂回学校待命，由第四期学生包凤林负责管理这些同学。

全校师生在庙里共进晚餐后，由包凤林（现任内蒙古体育技术学校的讲师）带领第五、第六期学生往学校进发。走出30多里时，额尔敦特古斯同学回来报告说：“日本特务机关的部队，已经闻讯赶来为日本教官复仇。”这些年幼无知并无实践经验的小同学们，听了这个消息后，都沉不住气了，哭喊着向四处逃命。到天亮时，包凤林从附近的山谷里好不容易才找到了五六十名同学，领着他们往图牧尔台方向前进。早晨8时许到达图牧尔台城外，包凤林派一名同学进城，向伪蒙古军第五师师长报告“幼年学校”学生杀死日本教官来到此地。不久，从城里跑出来一个乘马的少尉军官，他下马后，立即命令学生放下武器。他缴完械后说：“不准学生回幼年学校，送回呼和浩特蒙古军总司令部进行处理。”学生坚决不同意他这种把羔羊送给狼口的恶毒做法，他就恼羞成怒，拔出手枪把乌克图同学腿部打伤了。额尔敦陶克陶区队长，看到这种悲惨的情景，产生了共鸣之感，拔出手枪，缴了他的枪，把他赶回城里去了。他率领学生转移到离图牧尔台20多里的伪蒙古军牧场宿营，让师生们吃饭休息。不一会儿，宝音图少尉带领三名护兵，奉五师师长之命，叫幼年学校师生进城见师长，并保证来去自由。于是，包凤林带领师生进城。五师师长和参谋长都亲自在师部门前热烈欢迎师生的到来，并和蒙古教官们亲切地握手，表示欢迎。

第二天，五师官兵和学生开往商都，抵达商都后，先与八路军部队接洽，后去苏联红军和蒙古人民军领导机关会晤。最后三方代表，把学生安排在粮站住宿，行动自由，把五师官兵当作战俘，圈在兵营里，让他们与世隔绝了。不久，八路军改编了第五师。“幼年学校”的学生，有一部分人参加革命部队，为解放全中国而战斗；另一部分人，由蒙古人民军护送到乌兰巴托，进入各类大中专院校学习深造。

再说，第五、六期学生出发后，卓力格图等40余名师生，学生都身背三八式步枪和250余发子弹，还带两挺轻机枪，骑着马或骆驼向幼年学校挺进。天亮后，大家都下马就地休息。卓力格图查点人数后，大吃一惊，原来，在夜间行军中，教官们利用天幕黑暗之机，都溜走了。现在只剩下刚嘎莫仁和敖特根文职教员了。同学们痛骂这些无耻的叛徒们一阵之后，继续往前急驰，下午6时抵达“幼年学校”牧羊场。吃完晚饭后，卓力格图和敖特根老师召集大家开会。会上他俩给大家分析了当前的政治军事形势指出：现在苏联红军尚未解放西苏尼特旗，驻德王府西营盘的德王大儿子指挥的二十六团，正虎视眈眈地注视着我们的行动。如果不改变行军路线，就有陷入虎口全体被歼灭的危险。因此，决定绕过巴仁那木，从德王府北边的白音敖包后头穿过去直奔国境。闯过白音敖包后，为了避免增加老百姓的负担和暴露目标，遇到村落也不敢进去，忍饥挨渴向前急进。突然听到后边人喊马叫之声，回头观察时，才发现他们的后边尘土飞扬，二十六团的一连骑兵跟踪追来。师生27人立即下马，把两挺轻机枪都捆在骆驼背上，各自占据有利射击地势，做好了战斗准备。接着卓力格图身带手枪独自去见连长进行谈判。临走之前，告诉大家说：“以枪声作为谈判破裂的信号，你们一听到枪声，就立即做好冲杀的准备。同学们静候我的胜利佳音，再见吧！”他微笑着迈着从容镇定的步伐，走向敌方的连指挥所。他走到连指挥所前时，连长手里提着一把盒子枪，以敌对的凶狠目光注视着这位不速之客的来临。卓力格图先向连长行了个军礼接着说：“连长别来无恙，近来军务很忙把？我是受同学们的委托，特来和您谈判的。”连长冷冰冰地说：“你有话就快讲吧，少啰唆！”卓力格图不慌不忙地笑着回

答说："请连长耐心点，我把心里话，详细地讲给您听听。我们幼年学校学生杀死日本教官是为国家、为蒙古民族报仇雪恨，这是我们中华民族的神圣权力和天职。古人说，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吧！现在苏联红军和蒙古人民军很快就来解放我们锡盟了。不可一世的日本侵略者，横行霸道的日子不会太长啦。我们是去外蒙干复兴蒙古的伟大事业的。您作为一个连的指挥官，头脑要冷静些，并且要有政治远见。不要再做亲者痛仇者快的蠢事啊！我们都是成吉思汗的子孙，为什么替即将遭灭顶之灾的日寇，自相残杀呢？我们现有50多人，还配有两挺轻机枪，你们才30来个人。我们在兵力、武器和士气方面是占绝对优势的。希望连长仔细考虑一下目前的形势，请最后定夺吧！"连长若有所悟地回答说："你刚才说的这一番话，对我这个大老粗，很有启发。我现在决定不和自家人打，你们赶紧往北走吧！并祝你们成功，再见！"卓力格图又说："我们撤出阵地20分钟后，请连长瞄准蓝天射击，以空枪表示送客吧！"学生走出一里多地之后，后边果然响起了一阵排子枪声。同学们高声喊着："谢谢，谢谢……"跃马扬鞭向北奔驰，在茫茫的大草原上，又开始了艰难的新的远征，肚子饿了吃草充饥，喉咙干了喝马尿，这样艰苦行军五六天。第六天的下午5时许，到达塔布琴塔拉。塔拉（草原的意思）的北边，有个孤独而寂静的小村落，村内只有两座蒙古包。大家走到村边时，卓力格图下令，叫大家下马就地休息待命。他独自走进蒙古包内，先向老牧民问好。然后说明我们是杀死日本教官投奔外蒙的"蒙古陆军幼年学校"的学生，我们四五天没吃没喝，想讨点吃的，还想打听点近来的消息。

老牧民细听他说的话后，满脸笑容地说："我们欢迎勇敢的小英雄们的到来！苏联红军和蒙古人民军很快就要来了。你们安心地休息一夜，明晨我领你们去国境。"当时，拿出来炒米、牛肉和奶豆腐等食品，热情地款待。学生们饱餐一顿美味的炒米和奶食品后，院内布置两名哨兵，看护马匹并进行警戒，其余的师生全进入了梦乡，都做着进入蒙古以后的甜蜜的梦。

翌晨5时许，卓力格图把色旺扎布叫醒后说："你睡得像死猪一样，一

睡着天塌下来也不知道了。半夜时分，在这附近蒙古人民军和德王部队激战了好几个小时。我现在马上就去找蒙古人民军，我未归来之前，你替我操点心吧！”他嘱咐完色旺扎布之后，带上手枪，独自一人去寻找蒙古人民军去了。上午11时左右，他才返回驻地。他立即集合部队说：“我已见到蒙古人民军的指挥官，他们很快就要来。我们把各种武器都架在院内，空手等待他们的来临。”不一会儿，就听见蒙古人民军的十几辆装甲车和许多卡车，发出隆隆的吼声，尘土飞扬，从远处急驰而来。同学们排着整齐的队列，热烈欢迎蒙古人民军官兵。一位蒙古人民军上尉下车后，命令其士兵搜查师生的全身，并缴了他们的武器，然后用汽车把他们拉到野营兵营。让师生住在临时兵营，并设两名哨兵进行监视，不准离开此地走远。再把卓力格图、阿勒德拉图、色旺扎布等同学叫去，上尉亲自进行审讯。问色旺扎布，你们为何而来？他答：“我们在1942年和1944年，两次分别派遣四名同学，来贵国进行联络，他们迄今尚无音信。我们不是和你们打仗来的，而是投奔你们搞革命来的。”审讯结束后，上尉可能打电报报告其上级，关于1942年和1944年两度派人去蒙古进行联络的事宜，其上级肯定了这一事实。因此，紧张气氛缓和下来了，哨兵已撤，但不准走远。让师生们住在兵营的里边，他们住在外边。生活上按上宾对待，学生也可以随意参观其武器和坦克。

第二天下午，上尉把卓力格图叫去说：“我们正在进行着激烈的战斗，暂时没有时间送你们去我国。我已委托附近的苏联红军，送你们回学校。德王府也驻着我们的部队，你们可做些保卫工作，帮助我们防止敌人的破坏活动。你和阿勒德拉图同学，给我们部队做去张家口和呼和浩特的随军向导。”卓力格图向上尉表示完全赞同他的意见，回来后，将上尉的意见原原本本地给师生们传达了。

翌晨，卓力格图、阿勒德拉图和刚嘎莫仁三位同学，徒步回学校。在途中实在渴得不行了，让刚嘎莫仁去找水，他俩在原地等候。寻水者走了半天，不见回来，他俩就无可奈何地忍着饥渴走回学校，给蒙古人民军当向导去了。刚嘎莫仁一直杳无音信，过了一个月之后，才和一位布力亚特

人一起归校了。

师生们回到学校之后，各处布置流动哨兵，严密地监视二十六团的活动。执行完哨兵任务后，去大庙里游玩，或者在校院内畅谈各自的未来的理想和志愿等，生活得很愉快。

回校六七天后，色旺扎布步行30多里，去西苏尼特旗女子学校的忽和格日勒图老师家做客，在他家快活地玩了四天。第五天早晨，突然从学校来了两名同学叫他返校。临走时，忽老师送给他两件军用毛毯，作为临别纪念。

色旺扎布返校后的第二天，蒙古人民军派来汽车，拉上26名师生和两名蒙古人民军的叛徒，抵达斯力宾古勒桥后，用布蒙上汽车，驶进一个高墙院内住下。门口站着荷枪实弹的哨兵，楼台上还站着两个哨兵。一看这戒备森严的情景就知道它是一个很不寻常的地方。对我们一开始按战俘待遇，生活不太好。从第三天开始，就对卓力格图、阿勤德拉图、色旺扎布等同学进行审问。他们异口同声地回答说："我们是伪蒙古陆军幼年学校的学生，于1942年和1944年，两次派四名同学来贵国进行联络，他们至今下落不明。我们最近杀死日本教官，历尽千辛万苦投奔你们来搞革命的。我们是真心诚意的，请谅解我们的赤子之心吧！"这次审讯结束后，学生们的生活有所改善，睡的是板床，仍按居留所待遇。后来才听说，这次审讯后，把1944年派来的阿地亚和旺楚克两位同学，从监狱里释放出来，送往疗养院休养去了。再过数天之后，把师生们迁至内务部第二招待所住。从此，过上了较高级的生活，睡的是钢丝床，也可以随意逛乌兰巴托市。到了3月份，卓力格图又寻其领导人进行谈判。领导人在会上说："你们是幼年学校的学生，以前还派来同学来此联系过，并有杀死日本教官的功劳。因此，你们与乌力吉敖斯尔的伪蒙古军部队，在待遇上有极大的差异，我们应该优待你们。但是，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实行的是计划经济。所以，我们今年无法解决你们的升学问题。今后你们就劳动去吧！我党的领袖们，在莫斯科学习前，也都曾经受过艰苦的劳动锻炼的教育，劳动也是一种特殊的学习机会，我们社会主义国家的教育制度的重

要内容之一。”

谈判后的翌日，卓力格图去10万日本侵略军战俘营当翻译。色旺扎布、阿斯根和白乙斯古楞等14名同学，去农场从事农业劳动。到达农场后，大家推举色旺扎布为劳动组组长。农场的生活条件极差，白天做十几个小时的繁重农活，晚上睡土炕，大家都累得面黄肌瘦，实在坚持不下去了，还病倒了好几个。色旺扎布目睹此种艰难的生活情形，实在忍耐不住了。他代表大家找农场场长说：“你们对我们不是按学生身份优待，而是仍按战俘对待。我代表大家向你提出强烈的抗议。”事后不久，场长请来乌力吉敖斯尔部队和蒙古人民军的代表，对学生进行说服教育。色旺扎布不服，又提出了反对意见。这两位代表就用逮捕色旺扎布坐牢的口气来威胁。色旺扎布毫不畏惧地说：“我们是为革命而来的，无罪的，而是有功的。你们凭什么逮捕我？你们这是背信弃义的卑鄙行为。逮捕我也是可以的，因为，政权掌握在你们手中，我们是手无寸铁的无辜学生。我们的枪被你们都缴回去了，我们现在只好束手就擒啊！我坐牢一点儿不怕。我死在牢中后，给我立个石碑，上面刻上：‘内蒙古青年色旺扎布来蒙古人民共和国搞革命，无罪坐牢而死。’这样我就死在九泉之下，也就瞑目了。但是，我还要提醒你们几句话，害死无辜的革命青年是有罪的，将来的历史会严惩你们的，血债要用血来偿还的。你们还要仔细地考虑考虑，此事件的后果与对国内外的政治影响。”代表们听完他这一番演讲后，默默无语地低着头走了。

第二天，蒙古人民军代表又来农场，举行宴会热情款待学生劳动队。酒过三巡后，代表问色旺扎布，你们今后想干点什么？他斩钉截铁般地回答说：“我们想学点技术或者给农场当更夫。”代表说：“我国目前劳动力少，因此，让你们来农场劳动，这不是劳动惩罚，而是在受光荣而艰巨的劳动教育，请你们不要误解我们的好意。明年一定让你们升学。”即将散席前，军代表站起来，庄严地向全体学生公布：“今后学生不搞农场的一般性的劳动了，当更夫，开拖拉机，搞机磨面粉等工作。”

色旺扎布当了拖拉机驾驶员，开了数月车后，被评为三等拖拉机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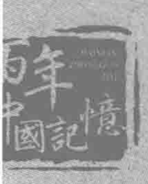
突然患肺结核病，吐血不止。农场将其病情报告乌兰巴托。经农场医生确诊为肺结核病后，持两级介绍信，赴乌兰巴托内务部第二招待所。内务部再派人送往疗养院治疗。住院后不久，卓力格图来院看望他。卓力格图亲切地对他说："我现在搞翻译工作。我们幼年学校的学生，今年都能入学，请您安心养病。"

色旺扎布在此疗养了两个多月后，调回乌兰巴托入学。他先入医校，后又转入师范学校的一年三班学习。"幼年学校"学生30多人和一些锡、察两盟的其他学校的学生，分别送入商业、工业和畜牧业等中等专业学校学习，只是党校不收我们这类学生。学校对我们内蒙古的学生，一视同仁，比本国生每月额外发给我们三元钱津贴费。虽然如此地照顾，但是，生活仍不习惯，吃不饱。实在没办法就得伸手向当翻译的同学要钱花。或者在假期内做些木排作业劳动，挣点儿钱改善自己的生活。内蒙古的学生两年去疗养院一次，本国生就没有这种待遇。色旺扎布就疗养过两次。1944年寒假派来蒙古的阿地亚和旺楚克二位同学到此后，就对他俩进行审问，怀疑他俩是日本帝国主义者派来的特务。阿地亚同学态度非常坚决，矢口否认特嫌之事。旺楚克同学说了些含混不清的言辞，立场有些动摇，态度不够明朗。因此，他俩被送进监狱，受长时期的折磨。1945年，蒙古人民军指挥官与卓力格图等同学谈判后，才搞清他俩的特嫌问题，放出监狱。将体弱多病的这两位同学，送往疗养院医治。1946年春季，才回乌兰巴托，和久别的亲密战友们见面。

1949年6月，色旺扎布等25名同学，从各自的学校毕业后，满怀喜悦和革命激情返回祖国，投入了新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中去了。中国共产党在1955年又把色旺扎布送往蒙古人民共和国乔巴山大学深造当研究生。他学习四年毕业后，蒙古人民共和国国家学委会授予他蒙古语言学博士学位。他在1956年，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现在是内蒙古大学的副教授，为培养四化建设的人才辛勤地劳动着。

（1984年8月3日）





第4章｜伪蒙疆政权的最终垮台

我所知道的伪蒙疆政权
WOSUOZHIDAODEWEIMENGJIANGZHENGQUAN

我和德王由张家口溃逃的狼狈相

李守信

1945年8月日本宣布投降前夕，我和德穆楚克栋鲁普（简称德王）正在张家口。由于日本封锁消息，对于8月8日苏联对日宣战和在以前美国向日本广岛扔下原子炸弹这两件大事，我和德王全不知道。迟至14日裕仁天皇下诏宣布日本无条件投降，15日上午10时，张家口日本驻蒙军司令官坂本博，才把真相通知给我们。8月10日裕仁已经接受了《波茨坦宣言》，抗战地区的各城市均响了胜利炮，傅作义派孙兰峰率领接收人员，11日从陕坝出发，12日到达王英司令部所在地的公庙子（在今乌拉特前旗境内），13日进入包头，就是这几天，我们还昏头昏脑地在张家口举行会议，研究伪蒙古军的扩军问题。就是：日本人应许伪蒙古军扩编为12个师，另把"蒙疆"境内的伪警察编为8个独立旅，亦归伪蒙古军总司令部指挥，以应付蒙疆的紧急状态。究竟因何而紧急，日本人没有向我们说明，我们一听扩充队伍都很高兴，也没有注意形势发生了什么变化。张家口日本驻蒙古军军部不仅对我们封锁消息，对他们的中、下级人员也欺骗隐瞒，不过他们的高级人员都沉不住气了。8月初，他们开始把家眷打发走了很多，11日以后也尽往平津溜跑。伪蒙政府的蒙奸汉奸，特别是日本特务机关的中国特务和张家口的警官，睹此情况感到不妙，也纷纷开小差离开张家口。过去我的上堡蒙古营子的家里，每天晚上高朋满座，可是这几天来客一天比一天

减少，门庭逐渐冷落起来。

我在日本投降前夕，仍想升官发财，这时他们叫我兼任了“蒙疆政府”新设置的“军政部”部长，好像把“蒙疆”的枪杆子全交给我执掌。另外，在这不久以前，日本驻蒙军给我拨了11万两烟土，叫我打发人去包头换成物资，运到天津套购黄金，再赴上海购买枪械弹药。我派秘书唐成良带了3000两前去包头，向达拉特旗的森盖林沁买了一部分药材，剩下的107000两，还堆在我的家中没有处理。我只顾在这10万多两烟土上打小算盘，没有预感到自己的末日已经来临了。8月10日至15日中间的一天，“蒙疆政府”举行最后一次正副主席和部长会议，讨论把伪警察改编为伪蒙古军的问题。由于“蒙疆政府”的小顾问们这时也对时局摸不清楚，会前据伪民政部长丁其昌和我说，他们很反对日本驻蒙军军部给了我这么大的兵权。开会时众人都出席了，会议上把伪蒙古军12个师的师长的委任状通过后，接着“蒙疆政府”的最高顾问大桥忠一提出了把伪警察改编为军队的问题。这时我便怀疑起日本为什么如此碗大汤宽，把伪警察也编给伪蒙古军扩大我的队伍？当然我高兴，但我又怕贪多嚼不烂，于是以军费没有着落为借口，表示负不起这项重任，想将他们一军，再要些烟土。由于大桥忠一没吐口，众人吵了一阵，未作出决议，即行宣布散会。德王的政治嗅觉比我还要迟钝，会后和我说：“日本人把警察交出，为什么你不要？”我说：“这里边一定有问题，咱们得研究一下。”“蒙疆政府”的另一副主席于品卿和司法委员会长官兼经济部长杜运宇，以及陶克陶等就在会后的当晚，悄悄离开张家口躲往北平。他们之所以听到风声不告诉我们，是怕我们把他们留下无法走脱。这几天我如堕入五里雾中胡思乱想，但不往日本投降上面设想，因而15日一听坂本博向我们说出那个“噩耗”，真像晴天打了一个闷雷。

15日吃过早饭，我接到日本驻蒙军军部的电话，叫我赶快前去开会，说是有要紧事商谈。当我步入坂本博的会客室的时候，德王已坐在那里，不大一会儿坂本博走进来。他的脸色非常阴沉，劈头就和我们说：“天皇昨晚下诏宣布投降，你们怎么办？”坂本博见我和德王都不吭声，他接着

说："你们要是跟上我们前去日本，我们可以保护你们。"我说："你们保护我们，谁保护你们呢？"坂本博被我问住，但又说："蒙古军怎么办？"我说："军队由你们的顾问掌握，我又被你们弄到张家口，出了错我不负责任。"他随即叫大桥雄熊参谋给归绥的小仓顾问挂电话，让把军队交给我的参谋长宝贵廷，电话回来说小仓已不知去向，日本人慌成一团。坂本博对大桥说："叫堀顾问代理小仓，军队保护机关，侨民往张家口集中。关于蒙古军的行动，听李总司令的电话指挥。"大桥走出去又回来，说是电话已经打通。坂本博去他的办公室，取来一张图纸递给我，他说："这是张家口地下仓库的图纸，里边有装备三个师团的武器弹药，原来是准备防俄用的，现在交给蒙古军。我们把人集合起来，即往北平撤退，你们把这些武器弄上，投谁也有出路。"坂本博把事情安排完毕，德王还痴痴呆呆地坐在沙发上不走。我对他说："等啥？走吧！"德王被我提醒辞出，竟不商量大事，而是跑回家中，先去办理自己的善后。

我回家以后看了看手表，是10点多钟。于是就让秘书唐成良指挥众人打包行李，并到车站交涉车皮，尽快装上汽车，往北平疏散和转移家属财产。我赶忙给宝贵廷挂电话，询问厚和（呼和浩特）的情况，宝说："日本人正准备装车逃走，咱们怎么办？"我说："张家口有三个师团的东西都交给咱们了，在厚和切勿捡他们的洋落，先把包头和厚和附近各县的人都集中到一起，叫们在路上遇见谁也不要打，绕开道往厚和开拔，晚上听我的电话，再决定下一步行动。"宝说："中央的人已经过河到了托县。"我问："是谁？"宝说："王匡一。"我说："赶快派车去接。"打完电话，我也卷起袖子和卫士、勤务兵、大师傅、老妈子们在一起拾掇财物。10万两烟土和其他箱笼，即装满两辆大卡车，两辆小卧车上面也装满了细软东西。还有我在察北宝昌县买了一道30多里长的山沟，有10万多亩土地，这年共收了二百五六十石地租，磨了100麻袋白面，还整装着300麻袋小麦，以及拆开箱子的7000两烟土，都装不上卡车。每一麻袋粮食都是一百七八十斤，我的那些卫士和勤务兵，被我平日都惯成了少爷，他们都干不了扛麻袋的重活。我一看卡车上的皮箱非常显眼，便把100麻袋面

粉，一个一个地从地上扛起，由他们众人舁上卡车，才将皮箱遮盖起来。剩下的300袋小麦和7000两烟土，我索性解开70条袋子，把麦子倒出一半，每袋塞入一块烟土板子，将倒出的麦子再装入麻袋缝，准备第二批往车站运送。全家20余人把东西打点停当，已经下午1点多钟，我的“蒙古军总司令”大将制服上，全挂满了灰尘。

草草吃完午饭，哪能顾上午睡，因为日本驻蒙军恐怕影响张家口的人心，让日伪家属一律于夜间撤退。我此时无事，便琢磨起心事：苏联对日宣战，出于我的意料，现在张家口北面虽然还听不见炮声，黑龙江那一方面一定已经打起来了。我和马鸣周前一年所议定的日本投降时，往外蒙边境集中伪蒙、伪满军队的计划已成泡影。当前我在张家口赤手空拳，除了几个卫士再没有一兵一卒，队伍大部留在厚和附近，小部驻在宣化一带；在察北和绥东的几个蒙古师，由德王和达密凌苏龙掌握，到了这个时候，不会跟我一致行动。为了光棍不吃眼前亏，我还得依靠日本人。因为他们把散布到平绥路上的一个厚宫师团，都集中到张家口以后，仍有很大的力量，伪军很难扯他们的后腿。和他们把关系弄好，倒能接收不少东西，况且我的家属、财产弄往北平，亦脱离不了日军的保护。至于我的部队到了张家口，下一步该往何处走，那就是依然要脚踏两只船，跟国民党和共产党都联络，和谁也不冲突，绝不防守张家口。打算将日军的地下仓库的武器起出，先上赤城、龙关一带的大山，站在高山顶上看二虎相斗，以保存自己的实力。不过最要紧的是，首先须把“蒙古军”集中起来。我一方面盘算，一方面叫卫士们给厚和挂电话，可是叫了好几次，都没有把线接通。

我正在愁思焦虑的时候，看门的人进来向我报告，他说外边来了一个八路军的代表，拿着一封信等待答复。我叫看门的把信要来，封皮写着：“日本驻军司令官、蒙古军司令官亲启”字样，信口没有封着，里边的大意是叫我们准备投降，他们要派员进驻张家口接收一切。信是由现在的陈毅元帅署名，我对此记得非常深刻。我以此事关系重大，便向看门的人说：“你告诉他，就说我主不了事，可以把信送给日本驻军军部。”由于好奇心驱使，我溜到门房的窗前，偷看八路军是个什么样子。原来是化装

成张家口市民的一个青年。八路军的送信人走后，我也去了日本驻蒙军军部，向坂本博报告了接到了八路军来信的经过，请示对此应当如何对付。他说："我们投降美国和蒋介石，绝不投降俄国人和八路军。现在我们已在张家口北面的坝上布防，掩护机关和侨民撤退。俄国人和外蒙军如果来到，我们就要抵抗；八路军要进张家口，也不允许。我们走了以后，希望你们把张家口交给国民党，千万不要投降俄国人和八路军，他们不讲信义。"坂本博和我说完，又把他的副官叫来说："把咱们的那200支比斯尼步枪，并装一大卡车汽油，送到李总司令公馆，拨给蒙古军用。"说完话我离开日本驻蒙军军部，在回家的路上，看见日本侨民的女人，都摆开拍卖东西的地摊，男人都缠着臂章，代替了警察的职务，持着枪来回巡逻，秩序维持得还很好。

晚上我把家眷财物，用四辆大小汽车，由唐成良带着四五个卫士，连人带车都打发上车站，即给厚和又挂了电话。这次总算叫通了，宝贵廷向我报告："日本军民全上了火车，连夜往张家口撤退。厚和至包头的铁路，已被八路军挑了，王臣一已接到了司令部，队伍也从外县撤了回来。"我说："队伍集中起来后，不要指望坐火车，八路军对厚和以东的铁路一定也要破坏。并且装车费时，要从厚和经过集宁的黄旗海子，直线奔张家口，今晚保护上家眷和炮兵出发，明晚就可赶来。"我正要往下说的时候，电线即被切断，从此和厚和失掉联络，后来听说他们开到旗下营后又折回归绥。我刚打完电话，德王和金永昌与丁其昌先后来找我，德王说："我从电报局接到蒋委员长来电，叫咱们各守岗位，他绝对既往不咎。你看咱们应该怎么办？"我说："蒋固然要应付，可是远水解不了近渴，日军一退，咱们便在八路军包围之中。应该派人和八路军联络，双方互不侵犯，他们不打咱们，咱们可以把张家口让给他们。"德王问我："叫谁去给联络？"我说："乌勒吉敖喜尔。"金永昌说："关于联络八路军的事，可得好好研究。"我说："金永昌，你少插嘴。"金一听我呛他，便夹着尾巴溜走。丁其昌一看我们俩商量大事，也跟着躲了出去。德王又问我："乌勒吉敖喜尔怎能和八路军拉上关系？我不清楚。"我说：

"乌给外蒙掩护过电台，俄国、外蒙和八路军是一家人。"德说："对！对！对！"说完即回去给乌勒吉敖喜尔去打电话。乌的"蒙古军"第九师在百灵庙驻防，他本人在厚和住家，德王不知用什么办法把电话叫通，乌坐着日本人撤退机关、侨民的火车到了张家口，和德说完话又坐火车回了厚和。乌回到厚和向宝贵廷、包海明等说我暴露了他的身份，主张把绥远的"蒙古军"投归外蒙，宝贵廷和包海明等主张投归傅作义的第十二战区，他们分成两派。结果，宝贵廷因为大青山的八路军下来要进入厚和，就替傅作义守了厚和，抗拒了八路军。乌勒吉敖喜尔把他的"蒙古军"第九师和正黄旗达密凌苏龙的第七师合到一起，也未配合八路军接收厚和与集宁，全投靠了在乌兰察布盟的外蒙古军队。以上这些事当时我全不知道，是逃到北平之后人们告给我的。德王把乌勒吉敖喜尔叫来，没让和我见面。16日他瞒着我派补英达赖、王宗洛和陈国藩到察北欢迎苏蒙军队，他那时的目的就是要把我甩下，带着"蒙古军"去投降外蒙古。

苏联虽然8月8日已经对日宣战，但是外蒙古的军队集结到边境，等待观望了一个礼拜，听见日本天皇下诏投降，于16日始南下，当即把西苏尼特旗王府占领，将德王的家属、财产完全弄往乌兰巴托。这天德王接到西苏尼特旗的告急电话，召开了紧急会议，我没有在场，决定派补英达赖、王宗洛、陈国藩、宝建新四位代表前去和苏蒙军谈判，要求允许他们接回德王家属、财产。补、王等四人于下午3时乘汽车出发。我等到晚上，还不见宝贵廷把队伍带到张家口。这时我的家中仍有300袋小麦和7000两烟土未曾运走，我期待队伍心急如焚，只有绕着这些麻袋转圈子。转到17日天亮，也听不见队伍到来的音信，我知道出了岔子，便去寻找德王。坐了一辆人力车，竟糊里糊涂地走进"蒙疆政府"，里边鸦雀无声，已经没人前来上班。院中堆着日本驻蒙军军部拨给的30万两烟土，叫丁其昌散发给所有的人员。丁不敢负这个责任，所以堆在当院没有处理，上边落满日本各机关焚烧文件的纸灰。他们16日烧文件整整烧了一天，17日早晨还未烧完，故纸灰从东山坡一带随风往下堡的街道上直飞。我一看"蒙疆政府"只剩下几个门岗，这才出来去德王公馆。那里的人很多，见我进去都不说

话了。正在发怔的时候，来了两架苏联飞机，盘旋在张家口高空，不敢往下低飞，扔下一颗炸弹，炸死一个妇女，撒了一些传单，即向北飞去。德王打发人出去把传单捡回，上边骂他是卖国贼和蒙奸。他说："这条路看来已经不行了。"因为他们都回避我，我没问他们传单上写些什么话，况且人家在背着我讨论事情，我待下去很不合适，遂和众人招呼了一下辞去。回家挂电话向日本驻蒙军军部的大桥雄熊参谋和丁其昌等打听外边的消息。

外蒙军队于17日这天，由苏联的一个中将指挥，上午乘汽车到达张北以北的白城子和公会一带，派出两辆摩托车，到张北城外侦察。守城的日本军队开枪打坏一辆以后，旋即放弃张北，往南面的坝上撤退。日军退走不久，该地的伪县长和商务会会长，打着白旗出城欢迎苏蒙军队。苏蒙军硬说刚才的摩托车是伪县长指挥警察打的，故把伪县长商务会会长就地枪毙。从西苏尼特旗连夜乘着快马前来给德王报信的家奴也说："苏蒙军在半道上把德王的代表截住，将补英达赖和宝建新放脱，把陈国藩用飞机载往乌兰巴托，把王宗洛和到察北不知去干什么的吉尔嘎朗交给当地活动的八路军，带往阿巴嘎旗看管。"我睹此情况，开始感到走外蒙和八路军的路线都没有希望，认为投靠蒋介石还可以苟延残喘。这时崔兴武的侄儿崔玉昆给我担任副官，他不知听谁说张砺生已经进了张家口。我因和张的代表郑立安有过联系，忙叫崔去调查张住在哪里，崔玉昆出去跑了一趟回来，原来是人们胡扯。到了晚上我对宝贵廷已经绝望，于是产生了两个念头：一是自己从张家口骑马转山头回厚和；二是到北平坐飞机回厚和。可是沿途及厚和的真实情况不明，又不敢前去冒险，所以这一夜仍是辗转反侧，通宵没有合眼。

18日白天，苏蒙军由张北向张家口发动进攻，在北面的坝上展开炮战。同时八路军的接收部队，也从东、南、西三面围上。因为日本人是由军队护路撤退，他们边走、边修、边打，从厚和和大同撤下的列车，不断开进张家口车站。伪大同省省长李树声感到我也没有办法，所以车过张家口时，他没有下车看我，就到宣化去找伪宣化省省长刘续广。蒙古军的堀

顾问和兽医处长杨海轩，这天也从厚和到达，他们是16日白天出走，一共走了两天两夜，下了车即相随着来找我。他们都说："宝贵廷变了心，要把队伍留下给傅作义守城。他们怕被八路军活捉，所以跟队伍脱离，劝我赶快离开张家口，往北平逃跑。"我说："我跟坂本博司令官同进退，苏蒙军和八路军马上进不了张家口。"把堀顾问送走，将杨海轩留下，不大一会儿，丁其昌来跟我告别，他说他要走了，可是扔不下我。我说："你先走吧，我得跟上日本军军部一齐走。因为我们到了北平，还得依靠日本人保护。"丁其昌走了以后，我把那300袋小麦，叫杨向日本驻蒙军军部要了一辆卡车，都搬到一家熟惯的粮店寄存起来，因为车站上尽往火车上装人，怕被日本宪兵给扔了下来。打落完毕，天已昏黑，突然有驻防察北的"蒙古军"第五师的两个团长郭景春和郭新德跑来，他们说："第五师已在阿巴嘎旗被苏蒙军解决，我们两个今天光身跑到张家口，德主席把他的卫队交给我们，叫我们于他走以后，维持张家口的秩序，等俄国、外蒙军或八路军进来办理交代。我们有人有车，您有带不走的东西，我们可以帮助您往车站上运，我们已替德主席把车装好。"我说："我的东西全走了，谢谢你们对我的关心。你们留在张家口，不怕俄国人和共产党吗？"郭景春说："我给外蒙送过电台，我不怕他们。"他们又和我扯了一些闲话。走后，我即给大桥参谋打电话，问询白天坝上的战况，看张家口今晚有无危险。大桥说："外蒙军很孬，已被皇军用大炮顶住。因为西边的侨民还没有完全到达，明天仍要继续抵抗，张家口的城防非常巩固。您安心睡觉吧，多会退却我来电话告您。"大桥叫我安心睡觉，我怎能睡着，又是一夜失眠，嘴干得生满了口疮。

19日天一亮，来了两架国民党的飞机，低空盘旋，上边的驾驶员高喊"中国人闪开"，扔下一个空汽油桶，射出一排示威性的机关枪子弹，把一辆火车头打穿了几个窟窿，即向东南方向飞去。空汽油桶里可能装着给德王和我的信，我没有派人去捡，因为我没有了部队，一切都是白搭。上午9点多钟，大桥来了电话，说是日军今天撤离，叫我准备马上上车，他们给"蒙疆政府"拨了三个车皮。这时我的几个卫士都保护着家眷去了北

平，身边只剩下一个名叫安慕卿的随从，其余全是大师傅和本地的听差。我给了他们每人100两烟土，叫他们把我带不走的东西按股均分，赶快搬到各自的家中，尽速离开这里。此时我的副官崔玉昆也不知去向，新来的一个兽医处长杨海轩，算是尚有一官一兵，三个人全换上便衣，每人腰中插了好几支手枪，带了五六百发子弹，乘着日本驻蒙军军部给派来的汽车，由上堡到了火车站。因为下着连阴大雨，街上布满污水泥浆，天空是一副灰暗头脸，愈加使人感到糟心异常。商店都关了门，很少老百姓来往，坝上炮声隆隆，日本兵在十字路口站岗。车站月台外边，排着五列车皮，中间夹着十几个冒烟的车头，长达四五华里，两边都有日本兵持枪警戒。这些车皮大都是敞车，里边尽坐着日本的妇孺，全被雨淋成落汤鸡，用帆布或雨衣盖着脑袋。因为流离失所，不知走向哪里，加之饥渴冷冻，故患病死亡的很多，尸体顾不上火化，全舁到道旁的田野扔弃，日本人忍痛不哭泣。我看真是惨不忍睹。

给蒙疆政府拨的是三辆三等客车，两边的椅子当中和过道上，全堆满德王的金条银元和烟土，最少也有2000多箱。我坐的那辆车，叠了好几层箱子，人们头顶着车篷，爬在箱子上从过道上来往。德王比我后到，他的那些秘书们早已逃走，只带着给他开汽车的喇嘛和葛兰芳等三四个听差。他见我坐在车上，许是怕我知道他带了这么多的财产，到达北平以后要耍赖跟他伙分，所以把头脸放下，很生气地说："你为什么不要车皮，坐在我的车上？"我说："我一共是三个光杆，要车皮干啥？这又压不坏火车，况且不是叫你背我。"他听我呛他，没和我坐在一起，到一个拐角上，随从给他铺了一块毯子躺下，我亦把眼睛闭起，各怀起心事。这天上午，张家口到北平的铁路还没有被八路军破坏，跑了一个多礼拜的于品卿，返回张家口，又要出来"维持"地方的秩序。他听说德王和我全部上车，跑进车厢寻找我们，板起"人民代表"的面孔，质问我们因何逃跑？他说："你们守土有责，扔下老百姓谁管？"德王被于品卿问住，低头答不出话来。我对于说："给他妈的巴子谁去守土？你能管了老百姓吗？"于知道我很野蛮，便再没说啥退了出去。接着伪张家口市市长崔景岚上来

送我，因为他给我当过好多年军需处处长，我说："你为什么不把行李带来？这是最后的一趟车了。"他说："我有责任，得办理交代。"我说："你的官瘾还没有过足，政府的高级人员早都跑了，我和德王一走，一切就都轮上你了。"他嘴上虽说："我回去安顿安顿。"可是表情仍对张家口恋恋不舍，他和我握手告别后，被于品卿勾引上又当他的张家口市长去了。

崔景岚走后不多一会儿，我的二太太的父亲也跑了上来。在15日夜晚我送他回家时，他们老两口还说不怕，可是他是一个居住在北平的满族人，非常胆小，见我一走就沉不住气了，将老伴扔下让我领上他回去。这时车上的人越来越多，因德王和我坐在那里，都不敢高声说话，各找空隙坐下。车上倒很安静，容许我继续闭目沉思。我想到了北平以后，先化整为零疏散人口和财产。北平的社会非常复杂，短时间内还显露不出。至于我今后怎么办呢？那只有再拉"杆子"（意为当土匪）。到绥远也好，回热河也好，如果国共合作起来惩治汉奸，和我同命运的人很多，我挑起来一干，不愁没有人跟我。如果国共从此分家，只要有人有枪谁也要我，我更有活动空隙，可以左右逢源。我投敌12年多，总算把命捞住了，虽然在察北扔下30里长的一道山沟、400匹马、5000只羊，在厚和和张家口扔下50万伪币买下的两处房屋；可是北平还有十几处院子，除了运去整整10万两烟土，尚有换成美金两万元的财产，以及其他贵重衣料皮衣和不少值钱的东西。所以我感到我当蒙奸，非常够本而且有赚头。想到此处，心安了许多，于是万念顿消，便昏昏沉沉地打起瞌睡。

睡到黄昏时候，被安慕卿把我叫醒。睁开眼睛一看，仍躺在德王的洋钱箱子上边。安说："日本军队从坝上退下来了，街上也有了枪声。"我从车窗上向北一望，汽车像两条火龙一样，在后边的隆隆炮声中，朝张家口的市区蜿蜒滚下，最后都排到铁道两旁。到了这时，火车响起汽笛，才在汽车掩护下，缓缓向前开动。由于入夜之后，八路军把张家口宣化之间的路轨挑了，并且炸了好几座桥梁，所以火车随走随修，比牛车还慢，四五十里地，竟走了一夜，于20日早晨，才爬到宣化车站。停车以后，先

跑上国民党的一个军统特务找我，他说：“我是王野人，热河抗战时咱们在开鲁见过面，前天我从重庆坐飞机首先到达北平，听陶克陶说，你不在厚和，和德王都在张家口。蒋委员长把你和蒙古军已经改编为十路军，让你担任总司令，我特来给你送委。我昨夜就到达宣化，因铁路破坏，不能前去张家口，只好在这里等你。现在你来了，咱们研究研究怎么办？”我见了王野人和接到“十路军”总司令的委任状，精神为之一振，对蒋介石撒出的钓我的鱼饵，犹如在汪洋大海中弄到一个救生圈。同车的人也都大睁起眼睛，不像在张家口车站停车时那样对我冷淡，均对我笑脸相迎，精神亦兴奋起来。接着伪宣化省长刘继广，伪大同省长李树声，伪蒙古军第三师师长宋鹏九，都上车来接我和德王，并欢迎王野人。“蒙古军”的那个堀顾问，不知他怎么知道蒋介石给了我“十路军”总司令的委任状，也从别的车上跑了过来，向我道喜祝贺。刘说：“日本军队在南口和八路军打上了，战斗结束，把路修好车才能开。先下车到城里去吃饭，好好休息休息。”堀顾问亦说：“咱们先去吃饭，开车时有人通知咱们。”德王听见蒋介石给了我“十路军”总司令，对他没有安排，心里很不高兴，不想下去吃饭，被刘继广上去拉了一把，才随着我们进了宣化城。

刘继广和李树声都是我在崔兴武东北军十七旅的旧同事，后来跟上我任了省长。开饭以前，我把他们和宋鹏九叫到一边，背着德王和王野人，四个人开了一个小会，决定让宋鹏九留下一团人，交给刘继广，收罗察东的警察，带上两团人，护送李树声回大同，收罗晋北各县的警察，弄起人都绕道往厚和集中。我到北平坐飞机回去。他们对我的指示，虽然嘴上没有表示不同意，但是脸上有忧虑的表情。我说：“俄国人和外蒙军队要占张家口，八路军也在接收城镇，乡下全是真空，路上很好走，你们要鼓起当初拉杆子的勇气。”我那时应该带上第三师向西开，但我不放心北平的财产，并且不愿西去冒险和受罪，故而执意去了北平。由于我本身腐化堕落，结果把“蒙古军”弄了个四分五裂，否则，宋鹏九的人不会在南口附近瓦解，宝贵廷的人也不会被傅作义吃掉。所以后来我光杆一人出关给蒋介石去组织“东北民众自卫军”时，认为在宣化非常失着。

我们计议完毕，便去吃饭，正吃的时候，又是15日给我送信的那个人，走进刘继广的门房，给德王和我送来八路军陈毅司令员的一封信，叫我们派代表跟上此人前去谈判。德王和刘等听见八路军的人来到跟前，都为之一怔。我这时已被蒋介石勾上，不愿跟共产党走，便叫刘继广的勤务兵把那人打发回去，说是“信看完了，等研究考虑以后再答复”。这是共产党再次争取指引我们，可是我们执迷不悟，认为蒋介石能保我们的大烟土和洋钱箱子，还想跟上蒋介石借尸还魂，继续骑在蒙汉人民头上，兴风作浪和作威作福。一切反动派都是失败以后，仍要捣乱，捣乱失败以后再捣乱，直至最后死亡。我和德王两个人也不例外。

因为众人发现了八路军的人，都心惊胆战，慌忙把饭吃完，连茶都没喝，就匆匆离开刘继广的省公署，在宋鹏九的军队保护下回到车站。上车等了两个多钟头，于中午12点钟开车，由于也是边走边修边打，到了北平的西直门，已是21日下午一两点钟。北平亦被八路军围上，由日本兵担任防守，下车以后秩序大乱，我与王野人、杨海轩和老丈人等也被挤得互相找不见了。安慕卿好容易跑出去给我找到一辆人力车，由于雨仍下着，街上水深过膝，道路非常难走，洋车夫在前边拉，安慕卿在后边推，穿街涉水走了好几里，才把我拉到什锦花园。德王到平后，没住他在北平买下的房子里，带着东西都到了雍和宫下榻。我和德王就这样结束了蒙奸生涯。

（1966年）

北平三年

德穆楚克栋鲁普

“蒙疆”政权随着日本投降而垮台，我于1945年8月20日离开张家口到了北平。表面上做了闭门谢客、销声匿迹、不问政治的寓公，实际上仍是野心未死，不甘心退出历史舞台，企图卷土重来。我狂妄自大地认为自己是“蒙古的中心人物”，仍以“民族复兴事业”为己任。因此便找寻机会，奔走联络，进行所谓“蒙古高度自治”的活动，实际上仍是做反共反人民的勾当。兹将我在这一时期的政治活动，分别叙述于下。

一、我和蒋政权官员们的联络

我到北平不几天，从广播中听到蒋介石讲话，谈到承认外蒙古独立及内蒙古自治问题，就大喜过望。认为趁此机会，仍可谋求“内蒙古高度自治”，便电蒋表示要亲往重庆，面报蒙事，请派飞机来接。蒋复电叫我和军事委员会驻平代表何其巩接洽，安排飞机前往。我即前往与何接洽。何说：“现在飞机正忙于运送接收人员和军队，日本的飞机尚未接收过来，实无飞机可派。”因此，又由乌臻瑞与胡宗南的驻平办事处联络飞机，结果胡宗南派高参刘庆曾乘飞机来接。

我在出发前，想把吴鹤龄留下，办理善后事宜，不意吴鹤龄却怫然作色地对我说："蒙古事情不是由你一个人包办，大家都有份。我正想乘这个机会，飞往重庆面见蒋委员长，报告我受他的指示在蒙工作的经过，洗刷我的污点，你却不叫我去，我是碍难从命，非去不可。"他既执意要去，我也不好强留。我就偕同李守信、吴鹤龄、乌古廷、超苦拔都尔（陈绍武）及随员色登道尔吉、郭木布札布、乌臻和等飞往西安，旋又由胡宗南派员送至宝鸡改成民航机飞往重庆。军统局特派马汉三率领数人，拿着军事委员会办公厅主任贺国光的名片到飞机场迎接，当即把我们安排在军统招待所"漱庐"居住。过了两三天，军统局局长戴笠特从南京乘坐飞机前来，为我等一行设宴洗尘。席间戴笠极力吹嘘"国军"力量的强大，说些"打共产党必操胜券"的大话。宴后又谈关于集结伪蒙军队进攻八路军的问题。继而贺国光前来访问，认为我们在"漱庐"居住不便，当由蒙藏委员会派蒙事处处长楚明善前来接我们转到蒙藏招待所居住。

到了9月10日左右，蒋介石就分别面见我们。当我前往见蒋时，蒋特从客厅中的座位上站起来，表示出很亲切的样子说："啊！你来咧，来了，快到屋里坐。"接着他就问我说："你们一同来了几个人？"我当具以实告。继而他说："吴鹤龄来了，好！我要见见他。"紧接着他就问我："你还有多少军队？"我说："现在蒙古军还有几个师，一个直属炮兵队，并又组织五个警卫师，还计划把警察队改编为十六个旅。"他又追问："现在你究竟还有多少兵呀？"我答："李守信当过蒙古军的总司令，俟和他询明情况后，再来报告委员长。"他说："噢！原来李守信就是你的总司令呀！"接着谈到承认外蒙古独立问题。我想趁此机会，请求许可"内蒙高度自治"，刚说了"我这些年来是在委员长的领导下，本着三民主义扶助弱小民族使之自决自治的精神，谋求蒙古民族的独立自主……"几句话，蒋就表示不耐烦的样子，他就扭转话题，问了些生活小事，就叫我和李守信一同吃饭。席间蒋向李守信询问"蒙古军"情况，尚有几个师旅和多少兵？李当据以回答。饭后，我又向蒋说："现在蒙古虽然仍是沿袭王公制度，但我想向民主进步方面做，以适应时代的精神。"

蒋说："蒙古的王公制度是可以存在的，只要有民主精神就行。"谈至此，我们就一齐告辞。

继而蒋又分别接见李守信、吴鹤龄和乌古廷。吴鹤龄见蒋时，也曾要求"内蒙自治"，蒋很不客气地说："你们做了日本的官，现在还没有下文，国民参政会有人对你们反对得很厉害，你们还要求自治呢？内蒙是蒙汉杂居的地方，你们自治，把汉人都撵出去吗？"超苦拔都尔见蒋时，蒋的侍从秘书曹圣芬因和他有同学关系，特别关照他说："见到委员长时，千万不要说'蒙古独立'，因为前次德王见委员长时，曾说过'谋求蒙古独立'之言，我在一旁侍立，看到委员长很不高兴的样子。蒋委员长嘱我转告你，关于德王的处境，他是谅解的，但是现在有人对德王很不谅解，你要好好地劝劝，今后最好保持缄默，忍耐一时，徐图未来。不要老唱高调，喊叫什么'蒙古高度自治'，给人以不良印象，自绝政治前途。至于德王的日常生活和政治前途问题，蒋说他一定随时照顾，叫他放心。"

我见蒋后又分别到各方活动，曾经拜访过陆军总司令何应钦、军政部长陈诚、外交部长王士杰、蒙藏委员会委员长罗良鉴、中央党部组织部长陈立夫、国民党中央委员陈果夫、考试院长戴传贤、监察院长于右任、中央党部秘书长吴铁城、参谋总长程潜等，无非谈些蒙旗情况。记得程潜对我说："你们不得已留在沦陷区，是可以原谅的。对于从抗战后方跑到敌人那里当汉奸的汪精卫之流，是不能饶恕的。"吴铁城还设宴招待我们，在宴席间他曾说过："你们对抗战虽然没有起到积极的作用，但在消极方面起了很大的作用。"

吴鹤龄见蒋后，就忙着组织"蒙古宣导团"，请商震转呈蒋介石核示，并征询我的意见，请我担任"宣导团主任"。我无心就任这个职务，就对他说："你干吧，我不干。"嗣后我去拜访商震，商震对我说："蒋委员长现去西昌巡视，我曾和张治中商量，给蒋委员长去电报，请示给你蒙旗宣抚的名义，当接来电，答复暂缓。"商将来往电报给我看，我见蒋答复他的电报中，给吴鹤龄和乌古廷各50万法币，并有令我等返平等语。蒋从西昌返后，又叫商震转告我，催促李守信、吴鹤龄、乌古廷等返

平，叫我留下，还有要紧的话说。于是李守信、吴鹤龄、乌古廷等就相继返平，我暂留重庆等候见蒋。经几次催促商震转蒋约期见我，总是推说有事，一再延缓。嗣楚明善由外蒙古返回，向蒋报告监督外蒙古举行公民投票经过，便中向蒋建议，每月给我补助生活费50万元，蒋当即批准，并表示叫我回北平，于是才约我再次见面。这次见蒋时，他突然问我："你马上就想内蒙独立吗？"接着他又自已改口说："你马上要想内蒙自治吗？"我委婉地对他说："现在外蒙已经独立，对于内蒙问题，总要有个办法才好，希望委员长指示。"他答应我说："俟把共产党解决了，蒙古的事情好办。"从此我认为要求"内蒙高度自治"问题，已归无望，在重庆不再活动，白天游山逛景，晚间观看电影戏剧，以消磨时光，又在重庆悠闲自在地逗留一个时期，才偕同超苦拔都尔、包登道尔吉、郭木布札布等回北平。

我返平后，有两个多月，国民党中央党部组织部长陈立夫给我和李守信、吴鹤龄及北平市长熊斌来电谓："奉总裁谕，对于在伪蒙疆政府的蒙籍官员，一律既往不咎，并予尽量安置，量才使用。"曾在伪蒙疆政府当过"内政部长"的丁其昌，从李守信处看到这个电报，认为自己是汉人，过去与国民党政府又无联络，当不在既往不咎之列，恐怕治以汉奸之罪，并且看到已把当过伪蒙疆政府"产业部长"的杜运宇（汉族）逮捕，丁其昌即于1946年旧历正月初一，用手枪自击头部身死。丁其昌这个人把国民党政府的法令看得太严重了，假如他不自杀，有我和李守信居中说情，是不会治以汉奸之罪的。

1945年冬，蒋介石到北平视察，我想去见他，派超苦拔都尔先去联络，回来报告我说，蒋介石很忙，无暇接见。但蒋把李守信找去，面令速到东北，召集旧部，募集新兵，尽量扩充武装，配合"剿共"。对我又不好意思太冷淡，特派他的侍从秘书曹圣芬到我的住所访问。曹对我说："蒋委员长一向主张内蒙可以实行高度自治，预备将来收复外蒙。"同年10月，国共进行谈判，缔结"双十协定"，1946年春又成立军事调停处执行部，听到有马歇尔建议把张家口划归八路军之说。我即电蒋，提出张

家口与蒙旗关系密切，为西北重镇交通枢纽，地势重要，不应叫八路“盘踞”，应从速收复，值此谈判之际，务请注意及此。蒋复电夸奖我“公忠体国”。我的秘书色登道尔吉看到这个电报，很欢喜地对我说：“你看！蒋委员长对你很奖励哪。”

1947年蒋又来平，我去见他，特为杜运宇求情说：“委员长既然对我原谅，对于在蒙疆工作过的无论蒙汉人，亦请给予既往不咎的宽容。曾在蒙疆政府当过部长的杜运宇，尚在监狱管理之中，希望予以释放。”蒋答复说：“可以，只要他不当共产党，准予释放。”果然为时不久，杜运宇就被释放出狱了。

1948年秋，辽沈解放，蒋介石特来北平布置军事，企图做最后的挣扎。我去见他，试探地谈到“内蒙高度自治”问题，他很颓丧地说：“如果共产党不灭，民族也没有了，国家也没有了。”我也就附和着说：“现在是戡乱要紧。”接着他又问我说：“你有什么困难没有？如果有困难可尽量向我说，我当设法解决。”他的意思是要给我一些钱。我说：“没有什么困难。”他又问我说：“你想到南京去吗？你想到杭州去玩玩吗？你还有什么话说没有？”我说：“没什么话可说。”就告辞而去，这是我在北平期间和蒋最后见的一面。

在这一时期，我和傅作义也有过接触。我初到北平时他曾经来过信，我到重庆后又给我去过电报，希望我督导伪蒙军队和蒙旗地方力量，协助他安定地方。1946年，我听说他到北平，就给他打电话表示要去看他，他说他要来看我。当他来到我的住所时，我谈到在五原战役前夕，想以赴前线慰问军队为名，借机出走的一段经过。他问我说：“五原战役后，我把被俘的刘大光放回去见你，并嘱咐他好些话向你说，他没有见到你吗？”我说：“没有。”接着他又问我说：“听说你在蒙疆政府时期，反对念汉文，有此事吗？”我说：“那时纯蒙地区的小学念日文或汉文我都反对，因为恐怕年龄幼小的学生，同时学习三种文字负担不了，所以只准念蒙文。”继而我请求他释放尚在管押的胡格金台（曾任伪巴颜塔拉盟总务处长），他说：“这事好办，我回去说说好了。”我又说：“有机会我想去

绥远看看。”他说：“欢迎你去。”他回绥远后不久，就来电说已把胡格金台释放了。以后傅还派王任之来请我到张家口去居住，我恐怕在他的势力范围之下，身不由己，没有表示意见。傅还派“张垣绥靖公署”驻平办事处处长李腾九给我送来五万元。傅作义就任华北“剿总”后，楚溪春对我说：“傅总司令很忙，没有时间来看你，很以为歉，叫我代他向你致意。”我和傅作义虽然发生多次的矛盾，存有成见，当时我却希望他“剿共”成功。这说明我反共到了极点，只要傅作义反共，我就可以消除成见，表示赞同。

当北平局势紧张时，华北“剿总”交际处长李腾九由超苦拔都尔领来见我说：“傅总司令早想和你谈谈，总因事忙抽不出时间来，特派我来看看你。北平局势现已日趋紧张，你打算到南方去吗？依我看大局业已如此，往南方去没有什么意思。”我说：“我也不愿意离开蒙古地方和民众到南方去，愿意到蒙旗去活动，但是现在张家口已经去不成，到什么地方去呢？”他说：“我把你的意思转达上去。”过了一二天，他又来见我说：“你既然打算到蒙旗去，最好由我们备一架飞机把你先送到绥远去，但明着走还不相当，应当改换衣着或穿军装去。”我说：“容我考虑考虑再说。”这次李腾九和我会谈，是含糊其辞的，究竟是什么用意，我也弄不清楚。

二、我和蒙旗人士的接触

1945年日本投降后，东部盟旗在苏、蒙军的支持下，在王爷庙（乌兰浩特）成立了东蒙自治政府。因苏、蒙有过须向中国政府请求许可的嘱告，特派玛尼巴达拉、桑杰札布等五代表前来北平，向国民党政府请求许可“东蒙自治”，北平行营当优予招待。军统特务梁芝祥见到玛尼巴达拉更是如获至宝，整日不离左右。适这时军统特务头子戴笠到平，当即由梁芝祥介绍玛与戴笠见面。玛和戴笠见面后曾对我说：“我和戴笠会谈结果很好，他说他一定向蒋委员长报告，并说蒋委员长是国际上的伟大人物，

只要你们拥护中央，进行反共，我想东蒙自治是好办的，可能获得蒋委员长的许可。”戴笠返回南京时即因飞机失事丧命。后来郑介民来平参与军统执行部工作，又经梁芝祥介绍玛尼巴达拉与郑见面，所谈内容如何我不知其详。但不久听说玛尼巴达拉曾接受梁芝祥的拉拢，军统所派的特务人员携带电台随他前往王爷庙秘密进行特务工作。嗣伍如恭格从王爷庙来平，带来东蒙自治政府主席博彦满都给玛尼巴达拉的密信，伍如恭格曾在伪蒙政府工作过，所以先把这封密信交给我看，记得内容大意是：“我等已和中国共产党内蒙负责人乌兰夫在赤峰见面了。希不要再和国民党政府方面请求许可东蒙自治，从速返回。”当玛尼巴达拉返回王爷庙的前夕，我曾先往看他，就住在招待他的屋中。次日临行之前，他特别嘱咐他的一行人员说：“那个中医大夫和他所带的必须随同我们一同走。”据我推断，这个中医大夫和所谓他所带的，可能就是军统所派的特务人员和电台。

玛尼巴达拉在北平期间，也曾表示请我到王爷庙去，共同致力蒙古自治事业。我答复他说：“我需要观看一下局势变化再说，如果将来我去时，在博彦满都之下当一个部长就行了，不要为我的地位问题费考虑。”玛当即指示他的随从人员说：“快把这一段话记下，这一段话很重要。”他和我谈到恢复百灵庙“蒙政会”问题时说：“吴鹤龄前来看我，说国民党某次全会上有过许可内蒙自治之议，我们正可趁此机会向中央请求恢复百灵庙蒙政会。可是我们这位德王爷连这个都不愿意做，不知他想干什么。这可不是我传闲话，是提醒你的注意。”的确吴鹤龄对我有过这个建议，但我认为“蒙政会”既是过去的事情，又是地方性质的自治，不能满足我的政治欲望。因我当时一心想进行“高度自治”，对于恢复“蒙政会”工作，已不感兴趣。

1945年冬，国民党察哈尔蒙旗党部主任特派员于绍文，为了报销领到的大宗党费和进行“策反”[1]活动，请我介绍锡盟十旗的国民党书记长的人

---

① 1945年，苏蒙联军从日本军手内解放了察哈尔各蒙旗，其后即移交给晋察北边区政府统辖。

选。我为了安置在我处居住的赋闲人员，以减少我对他们的供应负担，并从中拉拢蒙旗力量以供我的驱使利用，就给他开了一个名单，计介绍丹巴色楞为西阿嘎旗书记长，道尔吉色楞为西苏尼特旗书记长，还有根柱、色登道尔吉等。于绍文令他们深入蒙旗活动，其中有的人怕被八路军抓住，不敢前往，就在北平张家口两地鬼混，按月领薪。例如色登道尔吉和道尔吉色楞二人，不仅连谎报情况虚应故事都不做，与于绍文也不大亲近，后被解除了书记长的职务。唯有丹巴色楞很会应付，有一次说是要深入蒙旗，进行“策反”活动，实际上到大同绕了一个圈子而回，捏报一些情况，骗领国民党党费，居然得到赞许，把他调任为西苏尼特旗的书记长。并因他惯会奔走钻营，捏造情报，自我吹捧，还得到“张垣绥靖公署”的青睐。有一次他到北平见我，说是“张垣绥靖公署”要给他一个上校保安队长，并说只要我表示同意出名保荐就无问题。我因为有我的想法，没有答应，他对我很不满意。

约在1946年春，东阿巴嘎旗札萨克补达巴拉派旺吉勒巴睦到北平见我，并找札奇斯钦说：“补王已和外蒙取得联系并接受了蒙古人民共和国的使命，调查国民党这方面的情形。因此，特叫我来报告你，并叫我询问你这方面是否有办法？”我告诉他说：“要求内蒙高度自治，或有可能。但现在不宜乱动，应静待时机的到来，务要回去嘱告补王，目前不要盲目行动。”不意在国民党军进占张家口，“内蒙自治运动联合会”迁至贝子庙（锡林浩特）时，布里雅特部落总管仁亲多尔济组织反动武装，企图扰乱锡林浩特的安全，东苏尼特旗协理仲乃与仁亲也有勾结。这时补达巴拉不听我的嘱告，竟与仁亲勾结起来，进行反动活动。为时不久，这一股反动武装，就被当地人民组织起来的革命武装平定，补达巴拉被捕，仲乃后来畏罪自杀。仁亲率领残部逃至多伦，自居是锡盟代表，经由张家口到达北平，勾结军统特务马汉三，积极进行反动活动，并用剥削布里雅特部落人民的血汗所得来的金钱，买了一辆吉普车。我从张家口带来的亲卫队百余人，因给养无着，就拨归仁亲统带。但这100多人把枪交给仁亲后，就零星逃散，有的回了乌盟老家，有的流浪在土木尔台一带，没有起到什么作

用。这些人的暴乱，虽然不完全由于我的策动，却受到我投靠国民党走向反动道路的影响，我是不能逃脱罪责的。

国民党军占领张家口后，西苏尼特旗的梅伦佐领帕克巴在国民党特务人员刘铁夫的指使下，策动旗保安队排长根敦拉出士兵30多人到了土木尔台，梅伦嘎拉桑端都布也跟着跑出来。帕克巴和嘎拉桑端都布二人经由张家口前往北平见我，述说策动保安队的经过，并说阿拉坦瓦齐尔（我的侄子）对我不忠实，投降八路军，当了西苏尼特旗的旗长。我对他们说："我旗在八路军进入的情况下，阿拉坦瓦齐尔那样做就对了。"接着我又对嘎拉桑端都布说："你不是没有策动根敦拉出保安队吗？那你还可以回到旗里去。"他们二人对我的这番话，惶惑不解，便一同返回张家口，嘎拉桑端都布返回本旗家中，帕克巴不敢回旗，便在土木尔台一带逗留。我当时并不是真的同意阿拉坦瓦齐尔投向共产党，而是不愿蒙古族人为察省当局所利用。至于叫嘎拉桑端都布回旗，是希望他告知旗民，策动根敦拉出保安队之事不是我干的，以减少旗民对我的反感。

1947年察哈尔省的汽车队到达西苏尼特旗所在地达赖隙吉庙，旗长阿拉坦瓦齐尔因为傅作义业已占领张家口，就表现动摇，随着察省汽车队跑出来，经由张家口前往北平见我，看到我毫无办法，大失所望，深感后悔。阿拉坦瓦齐尔一方面受了札奇斯钦和达格瓦齐尔的拉拢，参加"蒙古青年同盟"；另一方面因在锡盟初经解放时，曾和外蒙古有过联络，嗣又转与苏联领事馆和外蒙古联络，做争取我走向蒙古人民共和国的工作。我曾问过他联络苏、蒙的情形，他对我说："我与达格瓦齐尔曾到苏联领事馆去过，苏联领事馆要给我50美元，我没要。"这时我虽然想投靠美帝国主义，但在人民解放军日趋胜利、国民党军日趋溃败之际，也想留一个退路，就听任阿拉坦瓦齐尔潜入蒙地，与蒙古人民共和国边境上的工作人员秘密进行联络。后来我从阿拉善旗的拐子湖前往蒙古人民共和国，就是由于阿拉坦瓦齐尔的引线和拉拢。

约在1946年冬，东苏尼特旗珠尔亥其喇嘛贡嘎到平见我和吴鹤龄，表示要组织地方武装进行反共。吴鹤龄认为贡嘎"倾心内向"，即向北平行

营反映，并领他到北平行营活动，请求发给枪械，返旗组织地方武装，进行反共。北平行营即转请国民党国防部批发武器。嗣后听说交由“张垣绥靖公署”代领转发，却没有发到贡嘎的手里，贡嘎企图组织地方反动武装之事，也就中途停止进行。

1947年春，曾当过西乌珠穆沁旗包衣达[①]的胡图凌阿到平见我，表示要进行反共。军统特务梁芝祥在我处见到了他，认为是奇货可居，就介绍他与军统在北平负责人马汉三见面，又由马汉三准备飞机把他送到开鲁与李守信联络，设法进入西乌珠穆沁旗。但他到开鲁不久，解放军就解放了开鲁，把他俘虏解送到王爷庙（乌兰浩特）去。适在这时内蒙古人民代表大会正在王爷庙召开，参与大会的西乌珠穆沁旗的代表等不知他在搞反动勾当，念在乡谊，出名具保，内蒙古自治政府就将他释放。不意他获释后，又在多伦纠集一些民族败类，组织反动武装，准备进入西乌珠穆沁旗。当他到达东浩济特旗[②]时，该旗地方进步人士就听到了这个消息，唯恐对中共内蒙古党委派在该旗的工作人员补旭等不利——因补旭等来到该旗后，帮助建立该旗人民政府，进行民主改革，争取团结各界人士，深得人心——大家对补旭等安全至为关心，就劝补旭等暂离该旗，免遭不测。补旭等表示坚持工作岗位，不能随便离开。并说：“如果胡图凌阿真有为蒙古之心，是可以争取过来，共同合作的。”当胡图凌阿到达该旗后，补旭等还出面与其开诚相见，劝他归向人民。但胡图凌阿在北平时既和马汉三有过联系，到达多伦后，“张垣绥靖公署”又助以枪械，因此一心反共反人民，不为补旭等劝告所动，竟指挥他所率领的反动武装，将补旭等杀害；又搜捕该旗进步人士，加以“蒙古八路”之名，杀害了数人。该旗进步人士桑嘎听说此事，躲到该旗北部，得免于难。胡图凌阿杀害补旭及地方进步人士后，凶相毕露，更加猖狂，倒行逆施，荼毒人民，强迫该旗蒙民参加他的军队，扩充反动武装力量达500余人。内蒙古自治政府特派军队前来

① 包衣达是旗级机关的小官员的职称。

② 东浩济特旗在今锡盟西乌珠穆沁旗西部一带地区。

围剿，胡图凌阿自知力不能敌，便胁迫该旗年龄尚幼的旗长米济德章楚布逃到张家口。“张垣绥靖公署”对于米济德章楚布这位“小王爷”备极礼遇，对于胡图凌阿又给以司令的头衔，并为之补充武装。于是他更加扬扬得意，又率队伍返旗，继续进行反共反人民的活动。胡图凌阿率领乌合之众到达该旗后，在乌兰哈拉克和喇嘛仓勒两地，一经与内蒙自治政府所派军队接触，便被打得落花流水，溃不成军，被迫退至中蒙交界地带，被蒙古人民共和国的军队解除了武装，把胡图凌阿送回西乌珠穆沁旗，受到当地人民的惩罚。迨至张家口解放，胡图凌阿之弟和该旗官员托克托胡等，带同米济德章楚布逃到阿拉善旗定远营去投奔我，我从托克托胡陈述中才知道这一段事情的经过。这一段事情虽不完全是我的亲身经历，但在该旗来说，还是一段重要史料。

三、我和美帝国主义的勾结

我在日本投降后就投靠了蒋介石。当时认为他既掌握大量的军队，又操纵着国家的政权，实力雄厚，不可一世，八路军绝非他的对手。同时还想请求蒋介石的恩赐，实现“内蒙高度自治”的迷梦。但又看到国民党反动政府的贪污腐败，民怨沸腾；国民党军队的士兵不愿打内战，士气十分低落。认为这样将把战事拖下去，拖来拖去，第三次世界大战必然发生。美国拥有原子武器和强大的武力，在第三次世界大战中有获胜利的可能。我基于以上错误的看法，就想转而投靠美国，企图依靠美帝国主义的力量，重上政治舞台。认为美国与蒙古远隔重洋，基于“远交近攻”的观点，不会像日本帝国主义和国民党政府那样压迫控制蒙古，我可以借用美国的力量。掌握“蒙古政权”后，就可为所欲为，实现继续统治蒙古的野心。因此，就寻觅和美帝国主义拉拢的引线。

1945年冬，美国特务人员拉铁摩尔来北平，因在百灵庙“蒙政会”时期，他和我就已相识，所以他到北平后，即到我的住所访问，适我外出未

见。后我去六国饭店访问，并对他说："你是知道蒙古事情最清楚的人，希望你在美国宣传蒙古问题。"他说："蒙古事情我是知道的，但是美国人和美国政府还不知道，得慢慢地来。现在我急于到别处去，调查一宗重要事情，关于宣传蒙古问题，以后再说。"他走后曾给我来过一次英文信，我叫包国义和札奇斯钦代我写了一封英文信回复他，来往信件内容大意，仍是关于宣传蒙古问题。继我复信之后，郭木布札布等几个青年人，曾给拉铁摩尔去信，请他帮助把外蒙古问题，提到联合国去。

到了1946年冬，陶克陶介绍美国新闻处特务人员李嘉胜前来见我，请我介绍两个蒙古族青年当电务人员，到王爷庙去做秘密工作。我曾给他介绍伊国璜和王桂丛二人。伊国璜去后不久，又返回见我说："在王爷庙做破坏民族工作，实感于心有愧，不愿再做这个工作，所以返回，再不想去。"王桂丛嗣亦返回，在平居住。嗣后李嘉胜特在六国饭店请我吃饭，在未进餐前他特赠我白银镯子一只，并给我介绍陪同吃饭的美国人白智仁和司马笑二人（都是美国新闻处的特务人员，白智仁以辅仁大学的学生名义作掩护）。宴席间李嘉胜说他要到日本去，我嘱咐他如见到麦克阿瑟将军时，务要请他把"蒙古问题"提到联合国去。

札奇斯钦曾经邀我在他家中和美国大使馆的女职员若斯冰见面，我向若斯冰说："现在外蒙业已独立建国，你们美国为什么还不承认呢？如果承认时，有美国使节驻在外蒙，不是可以得到一些消息吗？"她答复我说："因为马歇尔将军不愿意多一个倾向俄方的国家。"接着我请她在美国宣传"蒙古问题"，并给她写了一副蒙文对联如次："不因路远而不走，只要走就能走到；不因物重而不搬，只要搬就能搬动。"①

关于在美帝国主义操纵下的反动组织——"蒙古青年同盟"，据我所知是席振铎、贾鸿珠（纪贞甫）等组织成立的。听说起初还不愿意吸收喀喇沁人参加，但把札奇斯钦这个喀喇沁右旗人视为例外，特别吸收他参加。札奇斯钦去南京时曾给我来信，说是已和美国人进一步拉上关系。嘱

---

① 这是摘自成吉思汗语录，寓有请她注意"蒙古问题"之意。

我看过信后立即烧掉，没有谈到组织“蒙古青年同盟”问题。席振铎由南京来平，特给我送来法币200万元。我问这是谁的钱，他说这是我们大家伙儿的钱，也没有谈到“蒙古青年同盟”问题。实际上这笔款绝不是席振铎对我的慷慨资助，可能是美帝国主义通过席振铎用钱来拉拢我的。我知道“蒙古青年同盟”这个反动组织一些情况，还是道尔吉色楞告知的。道尔吉色楞在平一向就住在我的住宅，有一天晚上他回来得很迟，喝得酩酊大醉。翌晨醒来，我问他说：“你昨晚到哪里去了？怎么喝醉了？”他说：“昨晚我参加了‘蒙古青年同盟’当了盟员，大家聚餐都以酒来向我祝贺，我一时高兴就喝醉了。”我又问他：“都有哪些人参加呢？”他说：“有札奇斯钦、达格瓦索尔、郭木布札布等。”至于其他情况，因为他是甫经参加，又未担任重要职务，不很详细知道。嗣后札奇斯钦由南京返平前来见我，才听他说：“‘蒙古青年同盟’是以‘政治民主，经济合作’为宗旨。对于‘政治民主’美国人没意见，对于‘经济合作’美国大使馆的女职员若斯冰很不同意，经我详细解说才确定下来。”我虽然没有参加这个组织，但从此便和他们发生了关系，他们想捧我做招牌，我想把这个反动组织作为拥护我的政治团体，进一步和美帝国主义拉拢关系。

辽沈解放之后，北平局势渐趋紧张，美国新闻处在上海工作的特务人员马滋来平，札奇斯钦约我在赵宝纲（补英达赖的儿子）家中与马滋见面。我说：“你们美国如果愿意帮助蒙古的话，是否可以抛开蒋介石，我们直接进行联络。”他说：“完全可以，我们今后就直接进行。”嗣札奇斯钦请他接洽美国飞机前来接我离开北平，马滋答说可以。他回去以后，特接洽美国飞机一架由兰州起飞到平接我，并催促我马上就走。我因一时准备不及，而这时北平局势还未到非常紧张的局面，所以没有坐这架美国飞机离平。后来吴鹤龄和我说：“马滋说，他曾花了120两金子雇了一架飞机请一位空军上尉驾驶去接德王，德王却未乘坐前来，实在辜负了他的好意。”嗣后我在阿拉善旗进行“西蒙自治”活动时，又和马滋见过面，俟撰写关于“西蒙自治”资料时，再为详细叙述。

四、由北平到南京

由于我一心投靠美帝国主义，等待第三次世界大战爆发，企图卷土重来，再掌蒙古政权，故而到了北平解放前夕，还不想归向人民怀抱。当人民解放军包围北平城，局势非常紧张的时候，我电吴鹤龄请其洽派飞机接我。玛哈希力（赵文儒）、札拉嘎穆济（白景畲）、超苦拔都尔等知道我要走，特邀请我在东安市场“森隆”西餐馆聚餐，恳切地劝我不要走。其中以玛哈希力劝说最切，他对我说：“现在国民党军已经节节败退，解放军已经节节胜利，胜败之局，已见分晓，还走干什么？我听到乌勒吉敖喜尔说过，只要你归向人民，他负责保障你生命财产的安全。”我不但不为他们的恳切劝告所动，反狂妄自大地对他们说：“我是一定要走的，仍搞民族事业，一定要走。你们都知道我一向是以‘民族事业’为己任的人，不是计较个人生命财产安全的人。”札拉嘎穆济见我拿出“民族事业”做挡箭牌，就说：“你既然说到这个地步，我们再无话可说了。”玛哈希力也再不对我劝告。这时迪延其喇嘛也向我说：“北平苏联领事馆内，有一个过去在蒙旗从事教会工作的俄国人和我早就认识，他叫我转告你不要走，共产党进城后，苏联领事馆保障你的安全。”我这时虽然一心要去，但面对局势紧张的情况，又恐飞机不来走不了，陷入北平城中，就想一个退路，备作将来回旋的余地，就对迪延其喇嘛说：“你去对苏联领事馆这个人说，我是可以不走的，但如果南京派来飞机接我，我可是不能不走的。”后来，迪延其喇嘛把这个俄国人领来在嵩祝寺见我，所谈之话仍如上述。我更进一步拒绝他说：“我仍在国民党特务监视之中，希望你不要到我住宅来。”到了1949年1月1日，南京才把飞机派来，我在蒙藏委员会驻平办事处长何兆麟陪同之下，偕同迪延其喇嘛、副官图门德勒格尔等，在临时开辟的南苑飞机场乘上飞机直达南京。吴鹤龄和迪力瓦等特到飞机

场接我，吴鹤龄对我说："为了接你来京，我特面见总统府军事局长俞济时，请其速派飞机，他因事忙，总是支吾推托，表示派遣飞机有困难。我对他一再坚请说，听说现在已经派飞机把胡适接来，难道德王还不如胡适重要吗？如果把德王丢在北平不管，为共产党所用，恐怕对于中央不利吧。俞济时听到我这番话后，才答应马上转请蒋总统派飞机赴平接你。"继而我去见蒋介石，蒋对我表示抚慰和关怀之意。

有一天席振铎领我去面见美国大使司徒雷登，适蒋介石把司徒雷登请去商量重要事情，我仅见到了美国大使馆的一等秘书舒勒太斯，由席振铎当翻译，谈些有关蒙古的问题。翌日席振铎又来见我说："舒勒太斯对你的印象很好，说比蒋介石还强。"过了几天又由席振铎领我去会见了司徒雷登，我谈到要进行"蒙古独立建国"，希望美国帮助等语。司徒雷登用汉语答复我说："你的志愿很好，必然有志竟成，我一定把你的意见转报我国政府。"嗣后我在阿旗定远营搞"西蒙自治"前往广州请愿时，又到美国大使馆见舒勒太斯，他对我说："司徒雷登大使不在南京，他听说你来特用电报通知我，说把你前次所谈的意见，已经转报我国政府。我国政府答复，承认你能代表蒙古，今后进行蒙古工作要以你为对象。你现在已经搞起自治来，我们正研究要派一个代表，驻到你们那里。"但我回到定远营之后，时局已经紧张，美国大使馆没有来得及派人来。

我在南京时，迪力瓦与我常相往来，他曾表示想去印度，后来由于南京局势趋于紧张时，他忽来向我说："不去印度，改去美国，并且马上乘坐飞机要走。"我和吉力占太即到他的住所（章嘉驻京办事处）送行。吉力占太向我建议说："现在迪力瓦活佛就要去美国，你可以委托他当你的私人代表，以便与美国各方面进行活动，有机会时还可以晋见杜鲁门总统。"我甚表同意，就请吉力占太执笔写了一个蒙文的委托书，原文是："兹委托迪力瓦为我的私人代表。"写好后，就盖上了我的章交给了迪力瓦，请他代表我个人与美国各方面联络。我当时想通过迪力瓦这个人，进一步勾结美帝国主义。

蒋介石由于战事失败，被迫"退休"，李宗仁代理总统，孙科组阁

当了行政院长，白云梯当了蒙藏委员会委员长，他们为我安排了与各部首脑会见的日程，计曾见过吴铁城、朱家骅等，无非是一般的应酬联络，没有谈到什么重要问题。唯当我见到社会部谷部长正纲时，他对我说："因为有人主和，蒋总统走了。"我说："现在还有人主和，与共产党和得来吗？如果和的话，什么都是共产党的了。"他很赞扬我说："你的话是非常中肯的，你的见解是至为正确的，假如人们都像你似的就对了。"

我在南京时，曾向吴鹤龄表示想去西部盟旗搞"自治"活动。吴鹤龄向我建议说："你如果去最好在中央弄一个'蒙古各盟旗自治督导长官'的头衔，驻在兰州发号施令，才能得到各盟旗的重视，不要贸然就到盟旗去。"我当时没有表示可否。吴鹤龄认为我业已默许，就促动蒙古各盟旗驻京办事处处长乌云鹏去找孙科、吴铁城等活动此事，白云梯更热心帮忙。嗣后孙科设宴招待我，特约白云梯作陪，在宴席未开始前，我和孙科、白云梯在另一屋里谈话，孙科询问白云梯组织"蒙古各盟旗自治督导长官公署"之事，白云梯答称此事正在进行。宴会完了过后白云梯即责成蒙藏委员会的主管蒙事人员起草此案，并面令起草人员把理由说得要充分，办法要具体。嗣经我详细考虑，在此时局急剧转变时期，出任这个"长官"等于为人作嫁，实在没有什么意义。并想起在我要离开张家口去北平投靠国民党政府时，陈国藩、霍而义、郭木布札布、伍如恭格等青年职员们劝我说："你是搞民族事业的人，何苦去当国民党的工具。"在北平居住期间，也有些蒙古族青年对我做过这样的建议。我如出任这个"长官"，不但得不到什么好处，起不了什么作用，反会失掉一些蒙古族青年的信任和拥护，实属得不偿失。想到这个地方，就去面见白云梯婉言说明在此时期，没有出任这个"长官"的必要。白云梯见我如此说法，就对我说"那就算了吧"，就在"组织蒙古各盟旗自治督导长官公署起草计划案"上批以"暂缓"二字搁浅起来。因此反引起蒙藏委员会主管人员的怀疑和议论，说白云梯不同意我当这个"长官"。

我在南京期间，薛兴儒对我说立法委员中有一个刘不同，对于蒙古问题颇感兴趣，他愿介绍前来和我谈谈，我答称可以。薛兴儒就在饭馆约我

和刘不同聚餐，边吃边谈。刘不同向我建议说：“你们蒙古不是建立过大元帝国吗？你现在可以进行复国运动呀。你如果愿与美国大使馆或苏联大使馆联络时，我可以为之介绍。”我这时虽然正与美帝国主义进行勾结，但对苏联也有试试看的心理，便和他说：“请你试向苏联罗申大使谈谈关于蒙古独立建国问题。”经他联络后向我说：“罗申大使表示，在当前形势下，德王想搞蒙古独立建国，殊不相当。”

为时不久，解放大军迫近浦口，南京局势顿时紧张，国民党反动政府各机关准备疏散迁移，呈现动乱状态。蒙藏委员会当局想把我送到青海塔尔寺居住。但我这时认为国民党军队已退守西南一隅，无暇顾及“蒙古问题”，人民解放军尚未到达西部盟旗，正好趁此机会，进行“西蒙自治”，与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分庭抗礼，便向蒙藏委员会当局表示不愿到青海去，愿到阿拉善旗居住。经征得阿旗札萨克达理札雅（达王）的同意，就乘坐飞机到了定远营（巴音浩特），纠集我的旧部李守信、德古来、吴鹤龄、乌古廷、札奇斯钦等，联络国民党政府的旧军政人员达王、白海风、巴文峻、何兆麟等，进行组织所谓“蒙古自治政府”。这个“政府”甫经成立后，西北局势又趋紧张，札奇斯钦急于要去美国，请我给他一张盖有这个“政府”大印的空白公文纸，以备应用。因为札奇斯钦是我信任的旧部，又知道他与美国关系搞得很好，就毫不犹豫地给他盖有这个“政府”大印的空白公文纸一张，请他相机行事。这是因为我具有崇美思想，妄想在第三次世界大战爆发时捞一把，实现我的政治野心。

（1965年）

德王、李守信部队接受解放的经过

陶布新*

1949年1月间，我在国民政府蒙藏委员会任职，嗣因解放军迫临浦口，南京局势顿形紧张，国民政府所属各院部分别迁往广州、桂林等地，我也随同蒙藏委员会一部分职员到了桂林。在初到桂林的几个月，因为家属远在北平，只身流落南方，我的心情很是苦闷、不安。仍然追随国民党政府流亡吧，眼看国民党大势已去，全国解放在即，不知何年何月才能与家属团聚，也许终身要过流亡生活；蹲在桂林等待接受解放吧，又顾虑个人的安全。踌躇徘徊，无所适从。但是为时不久，解放大军胜利渡江，南京、上海一带相继解放，广西、湖南等地也在酝酿和平，国共隔江而治的幻想已成泡影。在这战局急剧变化之时，我从一个湖北籍的同仁（忘其姓名）处，看到毛主席的《论联合政府》和《新民主主义论》两本书，对共产党的政策纲领有了初步了解；同时从广播中听到了共产党的宽大政策，这才减轻了我对个人安全的顾虑，做接受解放的打算。

到了当年6月初，忽然接到德穆楚克栋鲁普（以下简称德王）给我来的一封电报，邀我速到广州，并附寄银洋24元做旅费。我接到德王电报后，即搭乘飞机赶赴广州，到凤凰大酒店面见德王。德王说：“我这次

---

* 作者时任德穆楚克栋鲁普的秘书。

来广州是要求当局许可蒙古自治，很感左右无人，所以特邀你前来，帮我办理文书工作。你是跟我多年的人，想是愿意从事这个工作吧？”我因与德王有过多年的部属关系，并感蜗居桂林，至为无聊，也就听从他的分派，当即走马上任，做了他的随从秘书。当天晚上，他的随从人员都到街上闲逛，只有德王和我在屋，我就向德王建议说：“现在进行蒙古自治，从全国大环境上说，共产党已占领中国大部，正在胜利进军；国民党退处西南一隅，已入垂危之途。我们向国民党要求自治，即使许可了，也是无济于事。从西北小环境上说，二马（指马步芳、马鸿逵）盘踞，统治甚严，是否允许我们进行自治也是问题。依我之见，莫如赶快回去，改走共产党路线，派代表前往北平接洽为宜。”德王回答说：“现在二马方面业已说通，表示不干涉我们进行自治活动。国民党中央方面，我是尽力要求，无论许可与否，我们决然要搞自治。只要搞起了自治，有了政府组织，就有办法。那时即便共产党来了，我们也可组织流亡政府，等待苏美冲突，爆发第三次世界大战，那时美国一定会支持我们的。我们是为了蒙古民族。谁对蒙古好，我们就跟谁合作。据我所知，美国对蒙古的政策是主张内外蒙古统一，建立大蒙古国，所以我们应当与美国合作。”我又对他说：“依您的打算，是有两条路可走：一是，回到蒙古地方搞自治；二是，如果自治搞不成，就周游列国，宣传自治。具体说，也就是把蒙古自治问题，寄托在美国身上，等待第三次世界大战爆发。但是，第三次世界大战究竟能否爆发呢？什么时候爆发？就是爆发了究竟谁胜谁负？从实力上讲，美国比苏联较强；从主义上讲，苏联比美国进步，很难预断美国必胜。如果美国败了，您将终身流亡国外不能回到蒙古地方，还谈什么自治呢？我看还是赶快回去，改走共产党路线，接洽自治问题，较为合乎现实情况。”德王说：“那样也是一条路，我们回到定远营再考虑吧！”

这时李守信、吴鹤龄等已由台湾来到广州，帮助德王与国民党中央军政当局接洽。我在居所从事办理文书和信件。经他们奔走联络，得到的结果是：行政院长阎锡山严词不许自治，副院长朱家骅默许自治，并允许补助经费1万元，加拿大手枪50支，海军司令桂永清允予发给旧式步枪200支。

到了6月中旬，德王托赵雁川留在广州办理请领和押运加拿大手枪，把未了事宜交由吴鹤龄续洽办。德王偕同李守信等20余人携带步枪50支和领到的银洋约1万元，由广州飞经重庆、汉中，抵达兰州，从兰州改乘汽车经由银川来到阿拉善旗定远营。德、李在汉中、兰州、银川停留时，曾受到胡宗南、马步芳、马鸿逵的招待，并分别会谈，所谈内容无非是请其支援蒙古自治，增加“戡乱”力量，共同保卫西北等语。

当“蒙古自治政府”在定远营正式成立之后，我被任为“内务署”副署长兼“蒙古议会”秘书长，仍然兼德王秘书。阿拉善旗和平解放之前，德、李又率部属流窜阿旗沙漠腹地改组“政府”时，我又被任为“教育署”署长。嗣又派我充任代表，往返定远营、银川、牧区之间三次，从事接洽和平解放工作。因此，德、李部队流窜阿旗情形，是我亲所目睹；德、李部队投诚经过，也是我亲身经历。为了能把这段经过完整翔实地介绍出来，除根据我个人的回忆之外，还访问了当时参与其事的孙鸣海（解放后曾任巴盟公署交通局副局长）、汪亲扎布（解放后曾任阿旗第一中学总务主任）、达希敦都布（解放后曾任阿旗政协驻会委员）、吉致祥（解放后曾在巴音浩特居住）等，加以补充、核实。只是事件经过已久，当时又很少有文字记载，所写的这个回忆资料，难免有不详尽和谬误之处，希望知其事者，予以补充、纠正为盼。

德、李部队流窜阿旗时期，时走时停，到处滋扰。但以在图克木庙、西沙尔札庙、拐子湖三地盘踞时间较长，活动较多。为了叙述方便，特把这段经过，分成为在图克木庙、西沙尔札庙、拐子湖三阶段加以叙述。

一、在图克木一带流窜情形和第一次接洽投诚经过

德王、李守信等由广州来到定远营后，既收罗了一部分旧属和部队，又得到国民党政府的资助与默许，于是就联合达理扎雅、白海风、巴文峻、何兆麟等，1949年于7月8日召开了“蒙古人民代表大会”，7月15日宣

告成立了“蒙古自治政府”。在“蒙古自治政府”成立后，我曾敦促德王派遣代表前赴北平接洽，德王也表示要派白海风和我做代表前往。但是为时不久，中国人民解放军就向西北进军，很快就解放了兰州和宁夏，局势紧张，日甚一日。这个消息传到定远营后，“蒙古自治政府”内部就发生了分裂：以“副主席”达理扎雅为首等一部分人，决定留在定远营接受解放；以“主席”德王为首的一部分人准备出走。在德王没有出走之前，我曾劝他与达王紧密合作，留在定远营主持军政大计：一方面派人到牧区收拢部队，作为政治资本；另一方面派代表赴兰州、北平等地进行和谈，前途尚有可为。如要轻易出走，就会重蹈在日本投降时由张家口盲目出走的覆辙。德王说：“我们还是到草地看看情势的变化，共产党对蒙政策如何再说。眼下我们还有两条路可走：第一条路是经由阿旗草地，通过青海、西藏进入印度，转往台湾，再到国外流亡，宣传蒙古自治运动，等待国际局势的演变；第二条路是和外蒙接洽。对外蒙，我过去曾有过联络，现在还有阿公（德王的侄子，名叫阿拉坦敖其尔）和雄王两个人在进行接洽。外蒙是蒙古人，我们也是蒙古人，遇难相求，是会念在同族，收容或者帮助我们的。”我又对他说：“据我看，南进是死路。因为现在西北既然解放，各处要路必然派兵把守。凭我们这一点力量，很难通过。北上外蒙也是有问题的。因为内蒙是中国的领土范围，我们是内蒙的人，中国内部问题，应当前往北平接洽解决，和外蒙接洽是解决不了的。并且我们的家属都在北平，无人照顾，扔下一走，也觉于心不忍。我是不打算走的。”德王又说：“我看你还是跟我一同走。我们和达副主席等不同。他们仅和国民党有关系，没有和日本人合作过，是可能得到宽恕的。我们既和日本人合作过，现在又同国民党打交道，深恐得不到饶恕。你跟我10余年之久，现在处在穷途末路的时候，更应患难与共，一同出走。你如缺乏骑乘马匹，我可叫图副官（名叫图门德勒格尔）设法解决。”我看他已决心出走，再劝也是无用，遂即辞出。

9月20日晨，德王即带着敖木巴图尔、达格瓦齐尔、赵宝刚等30余人离开定远营向阿旗西北出走。21日又派图门德勒格尔副官带着骆驼、马匹

来接我和徐实斋。徐因年迈，骑上骆驼被摔下来，只好留下。当时我虽然愿意走和平解放这条路，但对于共产党的政策尚不十分清楚，也有到牧区隐蔽一个时期看看局势变化的心理。我还很感激德王殷意拳拳地劝我走，又派图副官带着骑乘来接我，对我个人安全这样关怀！我与德王有过多年的部属关系，在此穷途末路时期，一旦脱离，也觉对不住德王，因此就于21日随同图副官一同出走牧区，寻机劝说德王走回头路。记得当天到了库列图，就与德王相遇。22日晚住到贡胡都克，23日晚住到那干套里。我和汪亲扎布在帐房内与德王谈话，敖木巴图尔突然进来说："依我的意见，我们暂不必走，在此等候李总司令（指李守信）等带领部队前来会合后，抽调一部分强壮队伍，直驱定远营，夺取电台和装备给养，并把达副主席强制请来，利用他的名义号召阿旗牧区人民供应给养，再向国民党中央政府以及世界各国发出通电，呼吁支援蒙古自治运动，要干就大张旗鼓地干一下，比这无声无息地悄悄出走为佳。"德王当时未加可否。待到敖木巴图尔出去后，我向德王说："我们来到阿旗数月，阿旗待如上宾，可谓不薄，临走时还要抢掠定远营，实感对不住人家。并且定远营也驻有阿旗保安队，驻在银川的解放军几小时就能开到。如果我们派兵前往夺取电台、给养等，很可能与阿旗保安队发生冲突，或者有被解放军包围歼灭的危险，应当慎重考虑，不要轻举妄动。"德王说："达副主席倒是一个有血性很爽快的人。但是可惜太无政治雄心，愿做顺民。强迫请来参加，也是于事无补。现在我这一出走，可能把一切责任都推到我身上，由他们去说吧，我不计较这些。现在部队尚未到来，等到图克木再说吧。"翌日就继续向前进发，约在9月底到了图克木庙，就暂时停留下来。

到达图克木庙以后，德王就偕同达格瓦齐尔、赵宝刚等前往国境线上与蒙古人民共和国人员会谈，去了三天才回来。我向他询问接洽经过，他对我说："这次到边境上会见了蒙古人民共和国一个少将，谈吐很好，足见外蒙建国后比从前进步了。据这个人说，这次来本打算叫我的儿子都嘎尔苏隆一同前来和我见面。只因飞机仓促起飞，没有来得及一同前来。"一面说着，一面掏出带回来的外蒙纸烟，让我吸食。我又问商谈的

情况，他含糊其辞地说："商谈结果甚好。答应帮助我们，对我个人也很尊重。"接着就临时组织了"主席行辕"，派吉利占太为"总务处长"。吉利占太就任总务处长后，就把当地巴格达叫来，令其征用牛羊、粮食等物。为时不久，吉致祥用阿旗政府借给的80峰骆驼，驮运粮食赶到。李守信、宝贵廷、苏和巴图尔、孙鸣海等率同新编骑一旅1000余人，由陶乐县到达磴口渡过黄河，经由阿旗草地前来图克木与德王会合在一处。

德、李等会合后，就着手改组"政府"、编制军队。"政府"改组的结果是，仍由德王任主席，并给达理扎雅保留副主席的位置。因秘书长巴文峻、内务署长何兆麟、实业署长白海风留在定远营未来，教育署长林庆僧格回了中公旗，财务署长吴熙宪逃往广州，乃改任吉致祥为秘书长，阿由尔扎那为内务署长，汪亲扎布为财政署副署长，贺华儒为实业署长，陶布新为教育署长。蒙古议会由议员海福泉代理议长职务，新任张世杰为议会秘书长，军事方面，重新组织"蒙古军"总司令部，德王自兼总司令，李守信任副总司令，宝贵廷任总参谋长，都固仍仓（白广信）为副参谋长，下设副官、参谋、军需、政工、军法等处。把骑一旅和锡察零散部队整编为两个师，第一师师长苏和巴图尔，副师长孙鸣海，参谋长赵殿臣，师下分编两个团：第一团团长萨伯音，第二团团长撒嘎拉；第二师师长吉利占太，副师长塔拉巴，参谋长拉西那木济勒，师下也分编两个团：第一团团长罗布僧巴克希格根，第二团团长翁盖。两个师共1000多人。为了表明与国民党政府没有关系，显示蒙古的特征，不用中华民国的旗章和纪年，恢复了伪蒙古联盟自治政府时期所用的旗章，改用成吉思汗纪年，俨然又把伪蒙疆政府这个死魂灵复活。改组"政府"和整编军队初步就绪之后，就召集文武官员及全体士兵在图克木庙东边开会。德王在台上训话，首先宣布"蒙古自治政府"的改组和"蒙古军"总司令部的组成以及各师团长的名单；继而强调要继续进行蒙古自治运动，打开民族出路；最后号召大家坚固团结，克服困难。德王训话完毕，会议就告结束。这支部队形同土匪。他们四出争抢当地牧民的骆驼、粮食、牛羊、衣服、器皿等物品。特别是一些官兵强奸妇女和杀戮牲畜，糟害粮物，更引起当地牧民

的痛恨！例如，在抢夺骆驼和马匹时，如驼马四散奔跑，就用枪打死；抢掠人民的粮食喂马，任其撒落满地；把驮运所用的草席子割破喂马；等等。住在这一带的牧民实在不堪其扰，一部分人逃往蒙古族人民共和国境内，大多数逃往沙窝和山区中躲避。但因德、李部队多系蒙古族人，既通晓民族语言，又惯于草地生活，无论牧民躲到哪里，也能追踪赶到，翻箱倒柜，乱行抢掠。稍不如意，非打即骂。我听到这种情形，就向德王说："部队这样乱抢乱夺，不仅会失掉民心，对你的名声也不好，牧民都说这是德王的军队。这样下去，必将引起牧民的反抗，必须设法约束部队。"德王不胜感慨地说："我德某人从事蒙古民族复兴工作多年，虽然在蒙古民众中没有什么好的印象，但自信也没有什么坏的印象。这次到阿旗来，部队纪律这样坏，恐怕对我就只有坏印象了！"我还将这个意见向李守信说了。李大发牢骚说："我是拉杆（东北土语，即当土匪）出身。拉杆还讲义气，还有纪律。这个部队真比土匪都难带。到处乱抢，约束也不听。这样下去，怎能存在得住！"嗣即由德、李等召集有关人员开会讨论征用给养、约束部队、收拢人心的办法。认为在目前缺乏粮食的情况下，也只有向当地人民征用。但是部队出去征用时，必须配属政治人员，向牧民说明部队的艰苦情况，不得已而征用给养的苦衷，以取得牧民的谅解。并且在征用时，要给牧民留下可资糊口的粮食，并且征用多少，要开给借用证，将来照数还清。当即组织统筹给养委员会，由汪亲扎布任主任委员。但因政治工作人员太少，部队居住又极分散，无法统筹解决，部队仍然外出抢掠。这时部队官兵对德王、李守信等也是怨声载道。有的说，把我们领到这个沙漠草地来，人无粮食，马无草料，怎样维持下去？早知如此，就不跟他们到这里来了；也有的说，我们冒险出外抢，他们坐在家里吃，还说这说那，难道等着饿死吗……德、李等人也只好听之任之，无动于衷了。

德、李部队在图克木盘踞期间，有些人认为，此地有新绥公路通向绥远，绥远一旦解放，军队很快就能开到，实非安全之地。德王曾对人这样说过："这条路倒不要紧。据我所知，驻在包头的部队有刘万春所部约3万

人，鄂友三骑兵旅约7000人。他们二人未必愿意投降共产党；就是勉强接受解放，也未必派兵来打我们。我们如与刘、鄂等进行联系，还有共同合作，壮大声势的可能。”德王曾有联络刘、鄂的意图，只因摸不清当时绥远包头一带的情况，又无适当的人前往联系，方才作罢。当时德王虽对绥远这一条路不做戒备，却很关心通往乌盟中公旗这一条路。因为当时听说乌勒吉敖喜尔率领内蒙古人民解放军在乌盟一带驻防，深恐前来围攻，曾派汪亲扎布代表前往联系做缓冲，只因道路不熟，未能前往。乃又派人联络乌盟盟长兼中公旗札萨克林沁僧格和他合作。林鉴于大势已去，未为所动，只送给德王全副鞍辔的走马一匹和一顶帐房了事。对于图克木通往定远营和银川这条路，德王更是担心，深恐驻在宁夏的解放军和阿旗保安队配合前来围剿。因此，不敢在图克木久停，计划向巴伦沙尔札移动。

适在这个时候，达理扎雅派洛不登、包国栋二人前来图克木送达文件，并说兰州彭德怀司令员和宁夏解放军同意同德王商谈和平解放问题，希速派员前往。但因当时虽有南进找国民党、北上归向外蒙、东去接受解放的三种主张，而以南进一派主张最占上风。深恐洛不登等前来传达商洽和平解放问题，动摇军心，就把洛不登、包国栋二人软禁起来，不叫与部队接触。这事为我所闻，就向德王建议说：“两国交兵，尚不斩来使，何况洛、包二人曾是和我们共过事的人。这次冒险前来送信件，传达宁夏方面的意见，竟把人家软禁起来，殊觉不当。依我意见，应当立即解除监禁，恢复自由，并考虑派代表前往商谈和平接受解放的问题。”德王和李守信、宝贵廷等商量后，决定派我为代表，并将洛、包二人解除了软禁，准备和我一起回定远营进行商谈。我即依照德王的意旨，草拟致宁夏方面的函件，内中首先说明“蒙古自治政府”是蒙古民族选出的自治机关，不是国民党的附属品，与国民党没有关系。其次是说明德王从事“自治运动”有年，是一个熟悉蒙古情形、体察蒙民愿望的有资望的人，并非国民党政府的官吏。最后提出几点意见：第一，要求承认蒙古自治政府；第二，要求统一东西蒙古。我拟好函件初稿之后，就送请德王核阅，并说：“我们在函件中既要求统一东西蒙古，又要求承认统辖西蒙的蒙古自治政

府，这是自相矛盾。既是商谈和平，接受解放，当然就要涉及部队改编问题，不先谈判这个具体问题，仅谈东西蒙古统一和要求承认自治政府的问题，双方距离太远，我这个代表不好当，应当再做修改和补充。”德王说：“要求承认蒙古自治政府是先决问题。这个承认了，才能谈到其他问题。现在大家主张南进找国民党，反对东去接受解放。你如果主张接受解放，会有生命危险。你还是先去宁夏，看对方如何答复。宁夏方面如果解决不了，你可去兰州见彭德怀。如再解决不了，也可去北京见毛主席。你还是尽快走吧，我们明天就率领部队前往巴伦沙尔札。”我又向他要求说：“既然派我当代表前往宁夏，你们就应当等候我回来。否则我当代表和人家接洽，你们率队向西转南逃跑，我还代表谁？那我就成为你们缓冲的牺牲品了！”他又对我说：“你去吧。我们到沙尔札庙等你，也许再向西或南移动。你如交涉不成，就随后赶我。”并又嘱咐我只谈要求承认“蒙古自治政府”问题，不要谈他个人出路问题。随即召集李守信、宝贵廷、吉致祥等研究讨论商谈函件，他们均表同意。

经过这次和德王谈话之后，我觉察德王并无接受解放的诚意，所以派我当代表去商谈，是怕宁夏方面派兵围剿，把我当作缓兵之计的牺牲品。当时，我虽然意识到了这一点，但仍欣然接受了商谈任务，是因为我认识到再不能跟德王走死路，就是德王部队不愿和平解放，我个人也要接受解放归向人民。于是就在当年10月下旬，带着我的族侄陶世昌，随同洛不登、包国栋等一同到了定远营，面见达理扎雅。达对我说：“现在彭总司令派张钦武前来，宁夏军政方面也给我有信，嘱我协助争取德王、李守信部队归向人民。你当代表前来很好，赶快去银川商谈吧。”达即派张钦武、戚涛、罗升日平三人陪同我前往银川。张钦武曾和我说过这样的话：“我率队起义之后，面见彭总司令和政委张宗逊，嘱咐我到阿旗做争取德王和他的部队的工作。彭、张等领导人还说，德王过去投靠日本，组织伪蒙疆政府，已经成了人民的敌人；只要今后不再与人民为敌，投向人民的怀抱，过去的事可以谅解，不再深究。”我们到了银川以后，由省委统战部长王志强、军管会联络部长甄华等领导人出面接待。翌日，潘自力主

席、孙殿才副主席、曹玉参副司令员等军政首长在宁夏人民政府接见了我。我即将带来的函件送上，并在口头上又作了些说明。潘主席答复说：“德先生所要求之事，较为复杂，牵涉面很多。我们希望德先生亲自前来面谈。请你把这个意见转达给德先生。”曹玉参副司令员说：“我们对德先生是宽大为怀，特请他前来面谈。如仍执迷不悟，继续扰害阿旗人民，我们即将派兵围剿。”阿旗代表戚涛说：“现在德、李部队扰害阿旗人民甚烈。阿旗政府为了保护人民生命财产，准备调动保安队及民兵抵抗。希望省政府从速解决此事，否则难免发生冲突，酿成流血事件。”谈话之后，把我安置在达理扎雅在银川的住宅，招待至为周到。王志强部长时来看望，殷切垂询我还有什么意见，德、李等人还有什么顾虑？我即对王志强部长说：“德王等所考虑的问题，归纳起来有两点：一是民族的出路；二是个人的安全。关于民族出路问题，我已经在首长们接见时都说了，不必重复再说。关于个人安全问题，无论是德、李等首脑人物，还是部队中的一般员兵，都有一定的顾虑。德王曾和我说：‘像我这个有点名声的蒙族人士在毛主席那里，或者能够得到宽大；但在内蒙就恐怕得不到饶恕。听说已经宣布我为战犯。’”王志强部长当即对我说：“党中央并未宣布德先生为战犯。内蒙公布与否我不详细知道。别说未曾公布，即便公布为战犯，如若不再战，投向人民，就不是战犯。例如傅作义就曾是主要战犯。但自放下武器，归向人民之后，不但不是战犯，还予以适当的位置。希转告德先生不要以此为虑。”我又谈了部队里的思想情况。我说：“德、李部队是从东北逃到西北来。一路抢掠烧杀，造下很大罪恶，因此顾虑重重。深恐投诚之后，即便党和政府既往不咎，宽大处理，但恐被害人民起而告发，仍然究办。”王志强部长答复说：“德、李部队归向人民以后，如被害人民起而告发，党和政府可以向人民解释。党在人民群众中有很高的威信，一经负责解释，人民会宽恕的。”宁夏军管会的联络部长甄华也曾对我说：“抗战胜利后，我们初到张家口时期，曾把伪蒙疆政府副主席于品卿这个大汉奸枪决了。因为在那个时候，是敌我对垒时期，斗争激烈，当然对敌政策从严。现在全国已经面临解放，需要确立安宁秩

序，反动派无论跑到哪里，也逃不出人民之手，所以从宽。”同时我也看到：宁夏解放后，旧政府官员均都妥善安置，待之至为宽大。我深以王、甄二位部长所述为然。在银川住了三天，就带着潘自力主席回复的信件和赠送的礼品，回到定远营。后由阿旗政府发给护照派人带路，备好乘驼，护送我前往巴伦沙尔札庙。

二、在沙尔札一带流窜情况与第二次接洽投诚经过

我由定远营经由图克木到巴伦沙尔札途中，经过几个村落，均是寂无一人，住家门窗多被损坏，食物抛落满地，许多陶瓷器皿砸成碎片。我们一行三人进入图克木山中，才遇到一些牧民。我向他们说明，我是商谈和平的代表，他们才消除敌意，并希望早日和平，把被抢去的骆驼归还他们。大约走了七天的路程，才到了巴伦沙尔札庙。看到庙宇的墙壁上，写有蒙汉两种文字的标语，词句多系“拥护蒙古自治运动”“复兴蒙古民族”“蒙古自治政府万岁”……见到德王，我即将所带信件和礼品交给了他，报告了接洽经过，并向他建议说：“现在中国大部已经解放，在北京召开了政治协商会议，通过了共同纲领，成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这样一来，国民党统治下的中国，已变成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新中国当前主要是安定人心，确立社会新秩序。对蒙旗的政策更为宽大，听说还要争取王公。您现在如能亲自前往接受解放，参加新政府，个人安全自无问题，还可得到适当的安置。因为您在蒙旗王公中名声最大，中央对您宽大不究，更能影响其他王公消除顾虑，这对安定蒙旗社会秩序和人心都有积极作用。我觉得您个人的安全定能得到保障，希望您能亲自前往接洽。”德王当时答复我说：“我已发誓，今生不做被人委任的官，要做就做人民选举的官。我到任何时候，也要搞民族复兴工作。固然搞民族复兴工作未必由我而成功，但白云梯之流，腐化堕落，追随国民党这些年，什么名堂也没搞出来，真是饭桶。他如能够搞出一个蒙古统一的局面来，也

好收容我们这些流亡的人。乌兰夫倒是很行，现在已经搞出一个蒙古自治局面，快把东西蒙古统一起来了。这一点我是佩服的。但可惜他走的是共产党的路线，所做的是共产党的工作，不是民族复兴工作。当今之世，以蒙古民族复兴事业为己任者，舍我其谁！”他就这样妄自尊大地把自己吹嘘了一番，也没有表示去不去宁夏。

接着，德王主持召开了“政府”科员以上、部队排长以上人员参加的会议，由我传达前往宁夏接洽的经过。我即宣读了潘自力主席回复德王的信，并根据宁夏军政首长的指示及所见所闻，谈了以下几点看法：第一，关于民族出路问题。我说，在宁夏我曾看到一些传单标语，提出了扶助少数民族，实行区域自治的政策。并且在事实上，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已经成立，业已奠定东西蒙古统一的基础。蒙古民族的出路已经不成为问题了。我们多年的愿望就快实现了。第二，关于个人安全问题。由于现在全国已经大部解放，中华人民共和国业已成立，当前首要的问题，是安定人心，确定秩序，所以政策比从前宽大。现在，像傅作义这样的人都给了很重要的职位，宁夏的旧官员也都平安无事，照旧供职。我们的罪恶再大，还能大过傅作义吗？主要战犯傅作义还能够得到宽大，我们也一定能够得到宽大。彭总司令和宁夏军政首长都说过：只要不再与人民为敌，从此归向人民，是可以得到人民的原谅的。我传达之后，第一师参谋长赵殿臣发言说：陶代表的传达和看法，我认为很有见地，大家应当详加考虑。德王就潘主席请他亲去面谈，当众征询大家的意见。有人发言说：主席是军政领袖，不能轻易离开此地前往，仍应派代表继续接洽。会上没有讨论出个结果来，就宣告散会。

会后，我又分访其他首脑人员征询意见。李守信表示：“东去接受解放，深恐以后无保障；就地进行自治，也不可能；赴外蒙又恐不安全，我还是主张西进。”宝贵廷对我说：“老陶，我和你不一样。你在蒙疆政府时期是做教育工作，没有做下什么了不得的事，可以接受解放，我则不行。在过去我是担任部队长，在战场上不知杀伤了多少人，就是共产党容我，恐怕包海明、高庆春等也不容我。所以我仍主张西进。西进不成，北

上外蒙也可以。我是不敢前往接受解放的。”我对他说：“在战场上杀伤之事，是两军阵前，刀枪无眼，依常理推断，当在不究之列。希你不要顾虑于此。傅作义当过华北几省‘剿匪’总司令，在战场上杀的人不知有多少，起义之后依然得到宽大，不就是很好的例子吗？”他又对我说：傅作义有傅作义的作用，我有我的情况，不能相提并论。我知敖木巴图尔是第一师师长苏和巴图尔的灵魂，我和敖木巴图尔的私人感情较好，很想通过他劝说苏和巴图尔接受解放。不想他也反对我的意见，说：“我在解放区当过司法厅长，我知道阶级斗争是共产党的基本政策，任何时候都不会改变的。你说现在由于政府新成立，要安定人心，斗争比从前缓和，我是不相信的。我所以背叛共产党跑出来，就是因为不满意激烈斗争。我是仍主张西进。西进不成，甘愿跳海而死，决不投降！”我又对他解释说：“彼一时也，此一时也。斗争即便有时激烈，有时也趋于缓和，不能一成不变地去看问题。希望你还是再想一想，并劝苏师长也考虑东去接受解放的问题。”虽然这几个人和撒嘎拉等一部分人还是顾虑多端，不愿接受解放。但是也有一部分人愿意东去接受解放。这时，第一师副师长孙鸣海向我表示，愿争取部队走解放这条路；第二师师长吉利占太、副参谋长都固仍仓也表示同意接受解放，汪亲扎布、韩聿修等也支持我的意见，并在政府职员和部队中争取同情者。吴天寿、白晶泉等就在这时转向同情接受解放这方面来。总之，在这个时候，北上外蒙古的意见较占上风，东去接受解放的也大有人在，南进意见较在图克木时期低落，仅有少数人在坚持。

德王在这个时候，开口团结，闭口复兴，关于应走哪条路线问题，不做明确表示。有一次，宝贵廷催促他表明态度，明确方向，不要优柔寡断，失掉时机。德王非常气愤，对宝贵廷大发雷霆说：“我并不是优柔寡断，而是慎重考虑。像你那样，把蒙古军送给傅作义当了炮灰，作了无畏的牺牲，使多年培养、训练的蒙古军，完全葬送到你一人之手，那就叫作当机立断吗？”二人争吵甚烈。在座的人把宝贵廷强拉出去，这场争吵才告平息。等德王怒气平息之后，我向他进言说：“宝参谋长说话对您有不够尊重之处，对他当面予以斥责也是应该的。但在此人心动荡时期，您指

出方向，明确态度，让大家有所遵循，也是必要的。”德王对我说：“我现在只有号召团结，不明确态度，才能收拢住大家，不致马上散伙。我一表明态度，马上就有分裂的可能。你知道，在我们这个团体中，有的主张西进找国民党，有的主张北上投向外蒙，有的主张东去接受解放。假如我现在表明东去接受解放，主张西进和北上的人，马上就会分离而去。我们这个团体很快就会垮台。”我对他说：“我觉得这样维持下去，也不是办法。既然主张不同，就不会都跟着您走。与其将来难免分家，不如早些明确方向，早些分家，能争取大部分人就行了。这样委曲求全，我看也不是办法。”他不胜感慨地说：“我从前处理事情是有些机智的。甚感现在不如从前，遇见复杂困难的事情，不能及时作出明智的处理。南进吧？部队纪律很坏，各处要路必有重兵把守，很难通过。东去吧？很多人拦阻，不让前往。要不然我去外蒙吧！因为我过去与外蒙有过联络。在蒙古、察南、晋北三治合并时，很感日本的做法不合我的意见。我当时想经外蒙通过苏联转往重庆后方，曾与外蒙进行过联系。只因重庆方面指示，当时日本和苏联订立了互不侵犯条约，如果经由外蒙通过苏联，深恐被引渡到日本去。指示叫我经由包头前往重庆，并派白海风率队到黄河岸接我。因为这一条路有日本军警特务密布，封锁甚严，深恐不易通过，乃即作罢。后来又奉重庆蒋介石方面指示，叫我忍辱负重，以待将来。”他继续对我说：“听说乔巴山（当时蒙古人民共和国总理）对我的印象还不错。他随同苏联军到达西苏旗的时候，曾检查我的王府，没有发现金银财宝，检查出来很多的书籍和枪械，当时乔巴山曾说：看来德王这个人，是个有政治头脑的人。并且我认为：如按从事共产主义革命的先后而论，苏联最早，是爷爷辈；外蒙其次，是儿子辈；中国较晚，是孙子辈。孙子一定要听爷爷的话。因此，我想通过外蒙去苏联面见斯大林，要求解决蒙古民族问题，你看怎样？”我即对他说：“内蒙是在中国领土范围之内。内蒙问题只有向中国共产党接洽才能解决，外蒙恐怕不管。并且外蒙和中国都是共产主义一类性质的国家。不能因为容留你引起外交问题。你如去外蒙，很可能通过外交手续把您引渡到中国来。与其那时让外蒙缚着送来，莫如现

在应潘主席之请，自由自在地去接受解放。”他当时表示点头的样子说：“可也是呀！你的看法是有见地的，容我再行考虑考虑。”之后，我又恳切劝他务要趁着潘主席邀请前去的机会，前往宁夏或兰州接洽。他也有点活动的意思，但经主张南进和北上的一些人从中阻挠，又变了卦。后来，我一再催问他，怎样回复潘主席的信？他说：“还是你再去一次吧！”我即对他说：“人家希望您去面谈。您仍叫我前往，叫我到宁夏说个什么呢？”他答复我说：“你这次主要是催促答复上次函件所要求的各事。宁夏方面如不予肯定答复，你就要求去兰州面见彭德怀接洽解决。”我说：“仅我一个人不好自圆其说，应再加派一位职位较高的一人同往。”他允准了我的请求，又加派第二师师长吉利占太和我一同前往，我也就准备再赴宁夏。

在这个时候，阿旗政府为了制止德、李部队四出抢掠，保护当地人民生命财产，调动保安队布置在德、李部队的外围，把守要路，封锁粮食，监视行动。遇着德、李部队出外抢掠，就派兵暗中袭击，因此，发生过多次冲突。有一次，在巴音诺尔公巴格所属的舍尔木台地方，德、李部队第一师的50余名官兵，正在抢掠人民财产和牲畜的时候，被阿旗驻守此地的段塔拉登岱带队袭击，打死10余人并得其枪支。同年10月初旬，在树贵巴格所属吉尔格朗台地方，有20多个德、李部队士兵正在抢掠之际，又被阿旗保安队打死4人，夺回被抢的牲畜。当年10月间，在巴伦沙尔札巴格所属的古拉本都拉干地方，阿旗保安队派出几个小队，围击抢掠人民的德、李一股部队，结果击毙2人，夺回骆驼300多峰，蒙古包10余座，阿旗保安队方面仅伤了骆驼10余峰。也是10月间，在沙尔札巴格所属塔本阿拉塔地方，段塔拉登岱队长率队与德、李部队出外抢掠的50余人遭遇，德、李部队被击毙7人，伤10余人，阿旗保安队只伤2人。

总之，在德、李部队由图克木到沙尔札流窜期间，与阿旗保安队发生冲突多次，被打死50多人，使德、李部队的粮食给养遭受很大困难。韩撒嘎拉团长，因为他的部属王连长受了重伤，至为气愤，想全团出动大干一场，围歼阿旗保安队部。但德王、李守信等考虑到，与阿旗保安队发生

大冲突，有可能招致解放军前来围剿，仍以缓和冲突、消除敌意、取得谅解为宜。遂派汪亲扎布、图门德勒格尔二人，到沙尔札庙北边巴音高勒地方与阿旗保安队副总队长罗瑞光接洽，请派代表到沙尔札庙与德王面谈。罗瑞光当派左甲木英、段塔拉登岱、达希敖都布三人前往与德、李等会面，提出两点要求：第一，劝说德、李等接受和平解放；第二，约束部队不再抢掠。德王以不属这次谈判内容为由，对于第一项要求未作表示。对于第二项意见表示赞同，但又强调说：部队给养和职员生活无法维持，这个问题应由达副主席负责解决。现在你们既然代表前来，应当尽快为部队确定驻扎地方，并解决给养、乘用骆驼问题。阿旗代表对于德王所提出的问题，采取了有利于监视和作战的原则，指定拐子湖作为德、李部队驻扎地方，答应在部队开到拐子湖以后，就接济粮食。并把拐子湖说成是水草丰盛，人口众多，既有商号，又有农田，交通方便，燃料丰富的地方。实际上拐子湖是三面环沙，交通不便，人烟稀少的地方。是希望德、李部队离开人烟较多的沙尔札，进入人烟稀少、三面环沙的地带，为的是便于对其控制和监视，也有利于包围作战。但是，由于德、李等不熟悉阿旗地理情况，信以为真，就于当年12月下旬率领部队由沙尔札向拐子湖开发了。关于接济粮食的问题，本是当时会谈中应付的话，而且双方是在对立的情况下说的，当然也是不能兑现的。我和吉利占太也就动身赴宁夏。到达定远营后，达王很关切地对我们说："我已得到报告，听说你们来了。当你们路过图克木红古尔玉林一带时，阿旗民兵听说吉利占太来了（因他在图克木庙时，曾主持征用牛、羊、骆驼，甚为当地民兵所憎恨），就集合民兵，随后追赶。幸亏你们中途未走大路，改走草原，才未被追上。不然可就麻烦了。今后往返，我将派要员护送，以保障你们的安全，你们也应随时注意。"由此可见，阿旗蒙民对德、李部队真是恨入骨髓了。

我和吉利占太由定远营赴银川，面见潘主席等军政首长，报告德王不能亲自前来的缘由，要求对前次提出的要求给予答复，并报告了德、李部队的思想动态。当把我们安置到招待所后，潘主席曾亲自前来照拂垂询一切，并说："已把前次函件中所要求的事项转报兰州请示，正在听候答

复。德穆楚克栋鲁普过去依靠日本，出卖祖国，已经成了蒙奸卖国贼。现在党和人民仍在耐心等待他觉悟，回到人民这方面来。希望他不要执迷不悟，自绝于人民。”王志强部长也和我们说：“德先生这次没有亲自前来商谈，足见还有顾虑。你们回去以后，应尽量说明党的宽大政策和民族政策。特别是当前距中国全部解放已为时不远，国民党现在退处西南一隅，已无力再行抗拒了，不久也将解放，请把当前的形势转告德先生，不要再存什么幻想，赶快归向人民方面来。如果德先生仍有顾虑不肯来，争取其他人来也可；部队全体不能来，争取大部前来也可。”并且给我们补助了旅费，派车送回定远营。这时，何兆麟从北京回来，带有乌兰夫主席致德、李等的信件，信中恳切说明只要向人民低头认罪，不再与人民为敌，可以既往不咎，宽大处理。吉利占太因恐途中出事，留在定远营未回。我即带着乌兰夫主席的信件，由阿旗政府派人备驼护送前往拐子湖。

三、在拐子湖盘踞时的情况和第三次接洽投诚经过

我到拐子湖后，才知德王已于1950年1月初（记得是旧历腊月初八）带着秘书色仁道尔吉、副官图门德勒格尔二人赴蒙古人民共和国。后由蒙古人民共和国边官都嘎尔札布送来德王的来信，说有大事相商，叫李守信、宝贵廷、苏和巴图尔、都固仍仓、敖木巴图尔等前往会商。李守信等六人即于当年2月初前往中蒙边境。这时德、李部队主要由孙鸣海、吉致祥、塔拉巴、达力札布、汪亲扎布、赵殿臣、韩聿修等人主持。不久护送李守信等赴蒙古人民共和国的韩撒嘎拉团长、翁盖团长带着护送队伍从国境线上回来，说：“李等到达国境后，就被带上蒙眼，推入汽车，疾驰而去，看样子结果是不会好的。”因此，北上空气逐形低落。我就和孙鸣海、吉致祥、汪亲扎布商量，召开全体文武官员大会，我当众宣读了乌兰夫主席致德、李等的信件，并说明当前局势变化情况和中国共产党的宽大政策和民族政策。继又召集排长以上人员开会讨论出路问题，我们强调西进找国

民党是死路，东去接受解放是生路，北上外蒙古这条路现在看起来也不妥当。孙鸣海、吉致祥、汪亲扎布、韩聿修、塔拉巴、达力札布等大部分人同意接受解放，只有韩撒嘎拉等少数人仍主张西进。也有一些人虽然表示愿意接受解放，但对于到定远营接受解放有顾虑，认为曾掠夺过阿旗人民，如到定远营去接受解放，即使党政方面予以宽大处理，还恐为被害人民所不容。我当时予以解释说：关于这个问题，我在宁夏时，王志强部长曾和我说过，如果被害人民告发，党政方面当为之负责解释。并且我们是蒙古人，接受解放后，在阿旗从事工作或安家生产也是方便的。吉致祥也说："前往定远营接受解放，已经陶布新代表往返接洽二次，宁夏已准既往不咎，可以说已经接洽妥善了。假如再改变其他地点，仍须重新接洽，需要相当时间。"经过这番解释，这一部分人也减轻了顾虑。当时我又看到部队中有个"跳大神"的萨满巫师，当在"神佛附身"的时候，总说西进、北上好，东去不安全，对于接受解放不无影响。乃向孙鸣海建议，应暗示"跳大神"的人，改变说法，果然在他神佛又附身的时候，改说现在情况变了，东去也安全。这对一般士兵消除顾虑、接受解放起了一定作用。

晚间，我和吉致祥到韩撒嘎拉住的蒙古包里，恳切劝他，只要接受解放，保证生命财产的安全，但他仍是执迷不悟。他冷言冷语地对我们说："你还保证我的头呢？谁能保证你们的头呢？我在八路军那里当过几年区长，对于共产党的政策和做法比你们清楚。现在你们去接受解放，也可能暂时无事，但以后还会收拾你们的。今后我们只有各走各的路吧！"我们劝说不听，又请孙鸣海劝说，仍然无效。据孙鸣海说：韩撒嘎拉坚持西进，绝不投诚的原因是，他在背叛共产党时，曾杀害革命干部，积下累累血债。附和他的一些人，也是因有很多罪恶。就以阿拉木苏而言，就曾打死过11人，所以坚决不投诚，劝也无用。据我所知，韩撒嘎拉是喇嘛出身，早已准备下喇嘛穿用的衣服和度牒等证件，准备在万不得已时，化装成喇嘛逃往青海塔尔寺或西藏隐蔽。我听到孙鸣海这一番话之后，也只好任其自便。但韩撒嘎拉看到愿意接受解放的人越来越多，对他的西进企图不利，竟阴谋策划率领他的一团部队，伺机袭击阿旗保安总队部，制造流

血事件，并计划把我杀害，以断投诚之路，迫使孙鸣海率领部队跟他一起出走。但由于子弹不足，曾向孙鸣海部属周福成借用。此事被孙鸣海发觉，至为气愤，乃持枪去找韩撒嘎拉说："听说你要集合团队去打阿旗保安队并杀害陶布新代表。你真要这样做，最好先把我打死，或者我把你打死。否则，只要我存在，你绝对办不到！"韩撒嘎拉知道计划业已败露，不能如愿，便向孙鸣海痛哭流涕地说："我之所以想这样做，是为了拉你一同走，率领全体部队打通西进的道路，现在你既然不同意我这样做，我也只好罢休。那就请你同意我单独率一部分部队出走吧！"孙鸣海当即答复他说："你既然坚持不肯投诚，也只好听你自便吧！"从此，韩撒嘎拉就与其亲信筹划出走。在他们出走的那一天晚上，达力札布把我拉到他的账房，对我说："有人想谋害你。今晚你就住在我这里。我还有亲信卫兵六七人，叫他们轮流守夜，以策安全。"他又说："自从德王他们走了以后，大家很感群龙无首。因为过去我曾当过他们的司令，现在他们想拥护我当头目，领着他们拉杆。我认为当土匪总有被剿灭的一天，所以没有应允。"他问我："你看怎样？"我当时对他说："乱世出英雄，在时局动荡不定之时，你能拉拢起一部分人来，就会有人来争取收编。现在全国已经解放了，天下已经太平了，就是国民党的正规军，尚需精简整编，还要那些纪律不整的土匪队伍何用？我认为你不干才对，要干可就错了。"他很同意我的话，表示坚决不干。孙鸣海很担心我的安全，亲自前来把我请到他住的毡包里，打麻将消遣，包外布置士兵守卫，以保安全。这日晚间，韩撒嘎拉一伙人喊天叫地折腾了一夜。翌日黎明，韩撒嘎拉带着100多人出走，先到额济纳旗抢掠一番，后即逃入马鬃山盘踞。听说由于内部互相残杀及解放军围剿，俱归消灭。韩撒嘎拉是否化装喇嘛逃入青海或西藏，我就不得而知了。

德、李部队第一师第二团副团长葛瓦拉西，对前往定远营接受解放仍有顾虑，表示愿到乌盟一带向解放军投诚。我通过他的妹夫吴天寿劝他与我们一同前往定远营，不要单独行动，葛瓦拉西执意不肯，也只好听其自便，因为到那里投诚也是一样，只要不再散而为匪就行了。他们走后，我

和吉致祥、孙鸣海等就发起组织“蒙古自治政府和蒙古军总司令部全体官兵迎接解放委员会”，排长以上人员均为委员，推选吉致祥为主任委员，孙鸣海为副主任委员，负责办理安抚部队、缴纳枪支，准备前往定远营接受解放等事宜。正在这个时候，蒙古人民共和国边官都嘎尔扎布又来拐子湖送来德王的信件，叫吉致祥、陶布新、汪亲扎布等前往乌兰巴托。我们因已决定东去接受解放，当即以主持政府和军队工作要务在身，无法摆脱为由，婉言谢绝前往。这个边官又说：“部队如缴纳了枪支，可以以蒙古人民资格前往蒙古人民共和国居住，如带武器，因关系国防和国际问题，不能收容。”这样，等于关上了北上这条路的大门，只有走东去接受解放这条路了。待这个边官走后，就派我和赵殿臣为代表，先行前往接洽，由第一批缴械投诚的塔拉巴率领部队40名护送。当到阿旗保安队附近时，由于事先联络欠妥，阿旗部队开枪向我们射击，子弹纷纷落在乘驼周围。我当即下了乘驼，举起手帕摇晃，以示信号。阿旗部队即停止射击。我即乘驼到了阿旗部队中，与队长乌图那逊见面。他深为歉疚地说：“今天由于联络欠妥，几乎发生误会，险些把你这代表打死，甚为抱歉。”我即随同他们到了阿旗保安总队部所在地，面见过总队长罗瑞志、中队长杨福存，告知德王部队业已接受解放，不日前来缴纳武器，务要通知所属各队，避免发生冲突。正在这时，宁夏军区特派曹玉参副司令员前来定远营，主持政治争取德、李部队投诚事宜。打来电报说：“对德、李部队在磴口县及阿旗扰害行为，一概免于追究，务即就地向阿旗保安队缴纳武器，前来定远营听候安置。”德、李部队听到这个指示，甚感政府宽大为怀，即相率投诚，缴纳武器。阿旗保安队即派扎木苏车林、达希敦都布二人负责点收投诚人员和缴纳的枪支，造册上报阿旗政府。吉致祥、孙鸣海即率缴械投诚的官兵和眷属，为2000余人，前来定远营投诚。

这里应当补述一点：在德、李部队开到拐子湖之后，额济纳旗党政方面，曾派周国良、汪畸云、苏斐然三人前来争取德、李部队投诚。只因他们到后，德、李等已去蒙古人民共和国，未能商谈。周国良和汪畸云回额旗报告情况，苏斐然留在拐子湖等候德王回来。但德王一去再未回来，苏

斐然想争取一部分队部到额旗投诚，因已决定东去接受解放，没有愿去额旗的。苏曾对人说：我来此住了这些日子，没有争取到一个人。周国良向来与我不睦，一定会向额旗党政方面说我的坏话。从此心怀忧虑。当德、李部队大部分人表示投诚，韩撒嘎拉小部分人准备西窜的动乱之后，苏斐然也表示即回额旗复命。但一出拐子湖，就用手枪自杀。后被德、李部队的人发现，将从尸体上发现的给其妻子的遗书交给孙鸣海，孙又上交曹又参副司令员。就在这个动乱的时候，额旗代表周国良又来到拐子湖附近，给韩聿修来信邀其前往会谈，并说汪畸云与他同来，因被乘驼摔伤，中途又返回额旗，仅他个人前来。这事为韩撒嘎拉所闻，当即向韩聿修说："苏斐然之死与周国良有一定的关系。看起来这个人不是个好东西，我派人去接他，利用他带队前往额旗，必要时把他收拾了，为苏斐然报仇。"我听到这个消息，即嘱咐韩聿修派人向周国良告知这里动乱的情况，不必前来，速离开拐子湖，免遭不测。我这样安排后，就动身到了阿旗保安队转赴定远营。周国良是否已返回额旗，还是为韩撒嘎拉所获，就不得而知了。

我和赵殿臣到达定远营后，即面见曹又参、曹动之、达理扎雅等领导人，报告德、李部队缴械投诚的经过。到了当年3月，塔拉巴、孙鸣海、吉致祥等也相继率领部队和随同的布里雅特及锡盟一部分蒙民前来投诚。曹副司令员在向投诚人员讲话时，再一次阐明起义投诚既往不咎的政策，并当众宣布安置办法：（一）具有一定才能，愿在阿旗服务者，就地予以安排工作；（二）愿意回家者，资遣回籍；（三）愿意学习者，保送到银川、兰州等地学习；（四）愿意当兵者，先在阿旗保安队入伍当兵；（五）愿意在阿旗落户为民者，帮助安排生产。从此，德、李部队由黑暗走向光明，由反动营垒投向人民的怀抱，不但得到既往不咎的宽大待遇，更得到各得其所的安置。同时宁夏方面，对阿旗遭受德、李部队扰害的人民，发给了大批的粮食、物资，以为救济。

四、结束语

德、李部队流窜阿拉善旗时，经过苏木图、吉兰太、图克木、红古尔玉林、巴彦诺尔泰、巴伦沙尔扎，巴彦乌拉、宗乃、拐子湖等十几个巴格，流窜数月之久，最后终于缴械投诚，归向人民。这是大势所趋，不得不然，也是中国共产党的民族政策和既往不咎的宽大政策感召的结果。

但是德王等首脑人员，开始主张南进找美、蒋，之后又逃往蒙古人民共和国，最终没有接受解放，归向人民，是什么原因呢？据我所知，这主要是因为：

第一，德王发起所谓“西蒙自治运动”，是以美帝国主义为背景的，是由追随美帝国主义一些蒙古民族败类居中策划的。因为美帝国主义在中国失败之后，实不甘心，时思卷土重来，企图继续奴役中国人民，特别是对蒙古更具有侵略的野心。美帝国主义在解放战争时期，就由它的新闻处拉拢一些民族上层分子和知识青年成立所谓“蒙古青年同盟”和“兴蒙会”等组织。这些人士按照美帝的意旨，一方面安置一些蒙古族青年接受美特训练，带着电台潜伏在阿拉善旗接近蒙古人民共和国的边界一带，进行间谍活动；另一方面拥护德王为“领袖”，做招牌，发起所谓“西蒙自治运动”。成功了则售美帝货色，统治蒙古人民；失败了则逃往国外，组织流亡政府。德王在北平赋闲期间，就与美帝国主义时有往来，为了实现自己的政治野心，重登政治舞台，也就处处仰照美帝鼻息办事。例如，在定远营举行所谓“蒙古人民代表会议”时，大家提名德王为“蒙古自治政府”主席候选人，他曾向我表示说：“在组织蒙古自治筹备委员会时，我当时为了表示谦逊，把主任委员一席让给阿王（伊盟盟长，杭锦旗札萨克阿拉坦瓦齐尔），我自己甘愿退居副主任委员。不意由此引起一些美国人士评论说我在蒙古地方的声望低落了，不如阿王声望高。这次大家既然愿

意推选我为主席，我也就当仁不让了。”待到宁夏解放，德王率一部分人到达图克木庙时，就想通过美国新闻处布置在此地的美国特务伯音巴图所掌握的电台，向美蒋方面通信联络，但是伯音巴图和电台都被蒙古人民共和国缴获，以致德王大失所望。后来又让随从电务人员贡森将所带电台修复发报，但因临行时未带电池，不能拍发，德王为此甚为焦急。所以在我充任代表赴宁夏时，德王嘱咐我务要购买些电池带回，如购买不着，向达副主席借用亦可。我到定远营后，曾向达理扎雅提及此事，达则表示拒绝，我也认识到如为其购买电池，任其架起电台与美蒋通信，对于接受和平解放工作不利，所以也就没有购买。回去之后，我托词向他说明，德王甚表怀疑和不悦。由此可见，德王等所以主张南进找美蒋，是有其原因和企图的。

第二，德王以后又改去蒙古人民共和国，主要是因为西北各地相继解放，各处要隘均有重兵把守，很难通过。其次也由于德王对自己评价过高，认为自己是“蒙古民族的领袖”，是中外驰名的政治家，到处都会受到人们的重视。他夜郎自大、自命不凡，认为不但日本、美国要尊重他，就是苏联领导人斯大林也得重视他，蒙古人民共和国更得优待他、帮助他，最次也会容留他，可以隐蔽一时，以等待国际局势的变化。此外，德王之所以去蒙古人民共和国，还因为他的眷属和子女都已先去蒙古人民共和国。据他说：他的长子在库伦（乌兰巴托）大学读书，他的儿媳在师范学校读书，他的次子在念中学。德王这个人家庭观念很深。为了谋家庭的团聚，也是促成其北上蒙古人民共和国的原因之一。

总之，德王之所以不归向人民，主要是封建统治阶级本质所决定。宁夏解放之后，中国共产党采取和平方式争取他归向人民，耐心等待达半年有余，真是仁至义尽。但是他仍执迷不悟，毫无接受解放的诚意。记得有一次德王曾对我说，在北平即将解放的时候，苏联领事馆曾派人和他联系，劝他不要走。他当时认为，如果不走，留在北平等待解放，今后就不能有所作为了。就诡称国民党派很多人员在他的住地周围监视，劝这个人以后不要再来，嗣即乘机飞往南京了。在图克木流窜时，德王又向我说：

"苏联对待少数民族比日本强；共产党对待少数民族要比国民党强，从外蒙的进步和内蒙古自治区的成立就可以看出来了。"他口头上虽然这样说，但是他总愿意依靠帝国主义，不愿归向人民，这还不是封建阶级本质促使着他吗？狂妄的政治野心支配着他吗？至于李守信、宝贵廷等，远在"七七事变"以前就做了日本帝国主义的走狗，在解放战争时期又做了国民党反动派的帮凶，给人民造成很大的损害，顾虑重重，不相信党的宽大政策，不接受和平解放，甘愿与德王一道走反人民的道路。